

20世纪
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

上册

A Chronicle of Historiography in
20th Century China

王学典　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团队项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1900～1949)

上册

王学典 主编
陈峰 姜萌 编撰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王学典主编;陈峰,姜萌编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691-7

Ⅰ.①2… Ⅱ.①王… ②陈… ③姜… Ⅲ.①史学史-中国-20世纪 Ⅳ.①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0695号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

王学典 主编

陈峰 姜萌 编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691-7

2014年11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3 ¼

定价:256.00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言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着手于2005年9月，撰作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象之外。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

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撰作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20世纪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

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

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次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 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

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20 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 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 3 世纪、5 世纪,也不是 17、18 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 30 世纪还是 40 世纪,人们都会把 20 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作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 20 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翔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 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择，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作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文革”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10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10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

主观上的追求是一回事，但客观上能或已做到什么程度，则有待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审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读过本部编年初稿的学者们均给予这项工作以较高评价。出于审慎和郑重，我们于2012年将编年稿本送呈12位学者审读，这12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国史，既有史学理论，又有具体学科，既有专门史，又有断代史，而且这12位学者多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们恳请这12位专家既审读与各自专业相关部分，又通审全部稿本，而审读的重点在于：有无重大遗漏？评估是否准确？体例完善与否？最后这12位专家均就和自己的专长相关部分和全部编年，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之认真令人感动。之后，我们的编年团队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落实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增删意见，最后才形成现在的面貌。所以，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在这里感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提出建议和看法的同时，顺便也表达了对整部编年的鼓励和赞赏，认为“有功学林”，“厥功甚伟”，“学术意义重大”，还认为编年“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尤其是学术史入门与导读的作用”，甚至预言本部编年“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等等，等等。我们深知，这只是专家们对我们这些劳作者的慰劳之语而已，但我们也深为这批最早读者的积极反响所鼓舞！

事实上，来自学界的鼓励之声，并不始自这12位专家，这项工作从一着手，我们便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笔者从这些鼓励声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新史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行程之后，无论是史学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

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历史学回顾”或“世纪盘点”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望，而一部翔实的20世纪史学编年，将会给这种“回顾”和“盘点”的进行提供基本的凭借。这大概就是朋友们对这部编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们由此找到了支撑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所付出的心血也将因此获得足够补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这样一部世纪编年！而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自己的专业编年？我们感到，至少以下三类编年需尽早着手：一是断代史编年，如先秦史研究编年，秦汉史研究编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年，隋唐史研究编年，宋辽金元史研究编年，明清史研究编年等；二是专门史编年，如考古研究编年，经济史研究编年，思想史研究编年，文化史研究编年，经学史研究编年，政治史研究编年等；三是专题编年，如孔子研究编年，《论语》研究编年，《史记》研究编年，《汉书》研究编年，甲骨文研究编年，乃至儒学史研究编年，道教史研究编年，佛教史研究编年等等。相信这些编年不仅具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更具有指引当下相关研究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者不仅要指导社会，他自己也同样需要自己历史的指引。而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翔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至于我们这部编年稿本，表面上是得风气之先，实质上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如恒河沙数，此书篇幅虽巨，仍难以均衡地照顾历史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舛误之处想必所在多有。限于学力及识见，难免会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学术史价值的作品，留下遗珠之憾；同时，也可能会有不该收录而予收录的现象发生，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最感惶恐的。另外，书中对于若干作品和史事的评价判断也不无可议之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本部编年从编纂构想到体例制订，从框架设计到具体作品的评价口径，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时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来进行和决断的。因此，本书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由笔者来负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诚恳期待着来自学界和读者的批评。

王学典

凡例

一、本书以20世纪中国史学史事和重要论著为主，凡与史学变化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社会等重大事件也酌予辑录。

二、本书所指“史学”，乃一外延较广之称谓，与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存在出入，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学”重合，大体囊括文、史、哲诸领域，文学和哲学方面主要侧重于重大的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活动。盖因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渡状态，在西方学科体系的影响下，旧有的史学形态面临改造和重组，其学术定位和学科特征还相对模糊，及至20世纪后半期，现代中国史学才基本成型，与今人心目中的“史学”相吻合。

三、本书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细致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概貌。本书取材力求广博，基本涵盖百年史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展现其整体学术面目，同时也有所倾斜和侧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尤其关注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重要成就。

四、本书文献与记事并重，前50年侧重文献，后50年突出记事，大体包括下列内容：

1. 与史学有关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文化大事；

2. 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交流、历史教育等；

3. 史家生平经历、学术交游及行止；

4. 史学及与史学相关报刊之动向；

5. 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译著）、文集及报告；

6.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

7. 波及全局的学术思想事件。

五、本书力图在体例上作若干探索，以年代和时间为主线，同时吸收整合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长之处，尝试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诸体冶为一炉。

六、本书纪时，采用公历，个别地方注明旧历或民国年号。本书正文按年、月、日次序编排。凡无日可考者系月，标明月份或称“是月”；无月可考者系年，标明“是年”。

七、本书各条目，一般包括标题和内容两部分，标题均以黑体标示，内容为对标题的进一步介绍和说明。基于对问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的条目仅有标题而未作内容上的说明。

八、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港台史学，暂未网罗。

九、本书以原始资料为主，同时参考利用了相关研究成果，囿于篇幅和体例，恕未能一一详注。



1900 年

※ **章太炎《訄书》成稿。**
※ **敦煌遗书发现。**
※ **斯坦因开始发掘古于阗遗址。**
※ **王先谦《汉书补注》刊刻。**

1 月

章太炎《訄书》成稿。

此书是章太炎早期关于政治、学术（包括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最早的一篇《明独》始撰于 1894 年 9 月，最晚的《帝韩》完稿时间为 1900 年初。此书共五十篇，首《尊荀》，终《独圣》。其中《原人》、《序种性》、《原变》等篇用进化论解释中国历史，考察了人类的原始状态、古代华夏族的形成史及古代胡汉姓氏的同化史，内含不少卓见。

夏秋间，《訄书》刊印补佚本，加入《辨氏》、《学隐》二篇。补佚本显示了章氏思想立场的转变。

2 月

14 日　慈禧下令各地缉拿康梁，并严惩购阅康梁所办报章者。

谕令称“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虽迭经谕令缉拿，但“迄今尚未弋获”，对于康梁所办报馆，如有购阅康梁所办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以“使购阅无人”，康梁“自无所施其伎俩”。

是月　法国人伯希和赴华进行第一次学术考察。

伯希和抵达北京后，适逢庚子事变，应征保卫法国公使馆。1901 年伯希和返回西贡后，旋即受命再次赴华考察，该年 3 月至 6 月的第二次学术考察，带回大量汉、藏、蒙古文书籍及文物。1902 年 5 月至 10 月，伯希和再度赴华考察，带回 24000 余册文献及大量文物。法国科学院院士路易·勒奴在《伯希和的传奇学术生涯》一文中指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

汉籍特藏本是从零开始，而从现在起却可能是在中国和日本域外所存在的最大规模的特藏了”。

3月

21日 《清议报》第39册刊载（日）有贺长雄《第十九世纪外交一览》。

第40、41册连载。

是月 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沙漠发现楼兰古城。

据斯文·赫定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一书记载，该年3月5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离开设在中亚的营地，前往塔里木盆地考察。3月28日斯文·赫定等人发现楼兰遗址，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29日，由于铲子丢失在28日的营地，斯文·赫定派人回到28日营地寻找铲子，意外发现一些“艺术气息浓厚的木刻”，但是由于饮水出现困难，斯文·赫定被迫撤出，决定第二年再来发掘遗址。

4月

20日 《清议报》第42册刊载（日）佐藤弘《俄国侵略中国志略》。

第43册连载。

5月

19日 《清议报》第45册在“本馆论说”栏目刊载《埃及近世史叙》。

是月 崖州设志局修纂《崖州志》。

该志共22卷，第二年冬纂成，1908年增订，因经费缺乏一直未能刊印，1914年地方士绅筹资交由广州天成书局印刷出版。1962年，郭沫若重游崖县，将此志点校重印。郭沫若称其“于疆土沿革，气候潮汐，风土人物，纂集颇详，颇有史料价值，在地方志书中尚属佳制”。

6月

7日 《清议报》第47册刊载（日）有贺长雄撰、瑟斋主人译《社会进化论》。

第48、51、52、55—57、61—63、70册连载。此文传播了社会进化

论观念、人类社会进化形式及中国人种西来说等，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确立有重要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璱斋主人”即康氏弟子麦仲华。

22 日　敦煌遗书发现。

道士王圆箓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16 窟甬道北壁发现一个复洞（现编号第 17 窟），洞内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逾五万件，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主要是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所涉年代，自北魏至宋初约七八百年之久；其内容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全部，其中尤以经卷为大宗。

敦煌遗书对研究魏晋至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宝贵的资料价值。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内容看，敦煌遗书的出土都可谓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之一。

27 日　《清议报》第 49 册刊载（日）柴四郎撰、璱斋主人译《埃及近世史》。

第 50—61、64—74 册连载。此文是晚清编译的亡国史中较早的一种，对晚清以后的民族主义、改良和革命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该文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署麦鼎华译。《新民丛报》多次介绍此书，1902 年第 6 号介绍该书时说“读建国之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读亡国之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虽然，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1902 年第 9 号该书广告又说“埃及文明开化最古之邦，今几不国矣。观其近世国权所以外流，实有足令吾华人猛醒者。我国民当人置一册，以作前车之鉴”。柴四郎撰写的《埃及近世史》另有章起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03 年出版。1903 年 4 月 16 日起，《童子世界》第 11、13、15、22、23、25、26、30、31 号还连载叶锦清译撰的此书。

受当时国势衰微刺激，译写亡国史一时成风，仅 1900 年至 1911 年间出版的亡国史论著多达五十余种。梁启超的系列弱小民族亡国史《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越南亡国史》、《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李芝圃的《朝鲜亡国史》、署名“痴庵者”的《越南亡国惨话》、赵伸的《海外血泪书》、高黎贡的《缅甸灭亡小史》、张成清的《缅甸史》等是其中较著名者。

7月

吴汝纶回直隶深州避乱，设馆修订刊刻《深州风土记》。

吴汝纶在1871年（同治十年）就任深州知州后，即“奉檄”修志，此后虽离任但修志工作未曾中断。义和团事起，吴汝纶避地深州，又设馆对《深州风土记》做最后修订，并于同年农历十一月由深州文瑞书院刊刻行世。该志三十九万余言，分为历代疆域、河渠、赋役、学校、金石、人谱等二十一类和叙录一篇。该志条例清晰，考证精详，文辞优美，故吴汝纶以“字字有本，篇篇成文”自许，梁启超也赞其“是颇为可观的专记风土佚闻的专辑”。该志在体例、方法等方面突破前人窠臼，被后人高度肯定。有书无图，是该志较大的缺憾。此志在1900年刻印后，于1909年、1910年、1968年多次重印。

8月

15日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携光绪帝出走西安。

27日　慈禧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许景澄以“极谏”之罪被杀，京师大学堂生徒四散，校舍封闭，藏书损失，慈禧乃下令停办，同时同文馆师生亦全体解散。

10月

12日　张之洞向慈禧光绪进呈历代史鉴、名臣奏议文集等书十二种，以供慈禧光绪考览古今。

11月

1日　郑贯一、冯自由等编撰的《开智录》在日本横滨创刊。

12月

6日　《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

编辑兼发行人初署“坂崎斌”，第二年起改署“胡英敏”，实系留日学生戢翼翚（元丞）、杨廷栋（翼之）、杨荫杭（补孙）、雷奋（继兴）等主持。该刊被冯自由《革命逸史》称为“留学生界杂志之元祖”，张静庐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称其为“留学界最早出版之月刊”。

创刊号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撰写的《近世政治史》（第2、3、6、8

期连载）、《近世外交史》（第 3、5、6、9 期连载），酒井熊三郎撰《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第 2 期连载）等文章。《近世政治史》一文实际只刊载了第一部分《德意志》，对德意志近代的政治、文化、军事及扩张政策等都有所论述；《近世外交史》一文对拿破仑战争及其意义、维也纳会议召开的情况及取得的成果、维也纳会议之后的世界外交等情况进行介绍梳理；《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一文从“拿破仑一世之败亡”入手，对维也纳会议、维也纳会议后之欧洲、欧洲的政党、欧洲的革命运动等 19 世纪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作了介绍。

这些文章的译介刊布，对新史学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 日　英国人斯坦因开始发掘古于阗遗址。

该年 5 月 31 日，斯坦因率领中亚考古队从克什米尔出发，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考古，并于 6 月 29 日进入中国境内。斯坦因此次探险活动系英属印度政府派遣，目的是经天山南路到和田等地进行调查发掘。7 月 29 日到达喀什，为考古探险做准备；9 月 11 日向和田进发；12 月 7 日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寻找古于阗遗址；12 月 18 日到达遗址。发掘工作从 12 月 19 日开始，至 1901 年 1 月 3 日结束，斯坦因共获得了包括汉代文书在内的文物一百多件。

21 日　《开智录》“改良”第 1 期刊载（日）涩江保著、冯自由译述《法国革命史》。

第 2—4、6 期连载。该文内容仅有“封建时代之法国”、“学者新思想之发达”，以及孟德斯鸠、福禄特尔等人的小传。在《开智录》第一期目录中，该文题名为《法国革命史》，但在正文中题名为《法国革命战史》，后又统一为《法国革命史》。俞旦初认为，该文是中国近代介绍法国革命史的最早著作。此后数年间，由于革命思潮的发展，这部《法国革命史》又有多个译本出现。1903 年 1 月，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天骥的译本《法国革命战史》；1903 年 4 月，商务印书馆又将“中国国民丛书社”翻译的《法国革命战史》作为“战史丛书”第 1 集第 4 编出版；1903 年 5 月，文明书局又出版了“人演社社员”翻译的《佛国革命战史》。

同期还刊载了“自强”（郑斯栾）撰写的评论《义和团》。作者指出无论是对义和团仇视，还是对义和团同情，“皆非适论”，义和团是一种中国人“独立之性”的表现。作者认为中国人都应有“义和团之精神”，所以提出“义和团之事可哀，义和团之精神可嘉，义和团之志可悯”的观点。

是年

王先谦《汉书补注》100卷由虚受堂刊刻。

该书除颜师古注所收二十三家注解外，又广泛征引萧该、刘敞兄弟、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兄弟、王念孙父子、周寿昌、俞樾等四十七家著述。该书以常熟毛氏汲古阁本为主，用官刊本校定，不仅对汉史进行诠释、梳理，纠正班固《汉书》的错误，而且又尽力疏通古字古训，使《汉书》中晦涩的篇章变得通顺易解，并对各种制度也加以钩稽贯穿，在参证诸说的基础上，纠正过去诸多误说，抒发自己的心得。此书对推动《汉书》研究作用巨大，亦为后人研究《汉书》提供了方便，被推为汉书研究第一善本。

陈毅赴日本考查教育状况。

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武昌两湖书院教习陈毅1899年9月至1900年3月赴日考察。期间，他关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购回东京大学史学会编辑的《史学杂志》，对白鸟库吉所著《阙特勤碑铭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弱水考》等篇，“深服精博”，并拜访了日本史学会评议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那珂通世，与之会谈数次，推许那珂“识达古今，学贯东西，穷乙部之阃奥，启后学之颛蒙，洵推当代泰斗”。那珂告以日本缺少元代史料，托其访求李文田、沈曾植等校注的《元圣武亲征录》、《双溪醉隐集》、《元秘史注》等书。陈毅归国谒见梁鼎芬、沈曾植，备述那珂学行，二人“俱不胜钦仰，以不获识面为憾”。

徐乃昌刻成《鄦斋丛书》。

该丛书共21种，46卷，为清代学者著述稿本及徐乃昌自著书汇集而成，所收著述大半为“乾嘉道咸四朝鸿生巨儒之所著未尽刊布者”，如戴震《经考》、丁晏《易经象考》、任云倬《周易诸卦合象考》、田普光《后汉儒林传补逸》、徐乃昌《后汉儒林传补逸续》等。

《史学报》在温州创办。

据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该报由黄庆澄编纂，木刻本，每月一册，寿昌编书局出版，栏目有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中外政治家言论，自1902年第3期改名《瓯学报》，内容又增加地理学、哲学、算学等，成为综合性杂志。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史学专业报刊。

1901 年

※ 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
※《普通新历史》印行。
※ 梁启超《李鸿章》一书编撰完毕。
※ 梁启超开始编撰新式《中国通史》。
※ 清廷开始推行新式教育。

1 月

5 日　自强（郑斯栾）撰《论基督天主教传道中国之利害及其改良之法》在《开智录》“改良”第 2 期发表。

作者通过对佛教和“耶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之简要分析，指出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具有一种宽容传统，后来针对“耶教”的“教难”不断发生，主要原因是“耶教”传教方法的弊端太多，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20 日　冯自由编著《贞德传》在《开智录》“改良”第 3 期发表。

第 4—6 期连载。该文又名《女子救国美谈》。俞旦初认为最早介绍贞德事迹的中文论著可能是梁启超在 1899 年撰写的《爱国论》，而最早以“贞德”为名的传记则是此文。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贞德”的译名有“若安”、“如安打克”、“惹安达克”、“周安达克”等。据俞旦初考证，清末出现多种“贞德”传记，有（日）中内蝶二著、上海国民丛书社译、新民译印书局 1903 年出版《法国奇女惹安达克》，（日）岩崎徂堂、三上寄上著、赵必振译、广智书局《世界十二女杰传》之《如安打克娘》，胡适《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竞业旬报》第 27 期，1908 年 9 月 16 日）等。

28 日　英国人斯坦因开始对尼雅河故道遗址进行发掘。

此次发掘至 2 月 13 日停止，共出土了六百多件文物，其中不少是佉卢文和汉文简牍，其中汉文简牍属魏晋时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斯坦因此后又进行了一些发掘，并于5月12日返回喀什。

29日 清政府在西安颁布“预约变法”上谕。

慈禧命令大臣就朝章、国政、学校等方面提出建议，以便朝廷采纳。清末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是月（日）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著，徐有成、胡景伊、唐人杰等译《欧罗巴通史》4卷由东亚译书会印行。

王国维作序，魏丙尧作叙，徐兆玮作跋。是书四册凡四部：第一部上古史，分四篇，自太古西洋诸国兴亡时代至罗马之大一统时代；第二部中古史，分三篇，自西欧混乱时代至国家主义发生时代；第三部近古史，分二篇，第一篇西班牙、法兰西对抗时代，第二篇革命时代；第四部最近世史，分十四章，自神圣同盟迄19世纪下半叶普法战争。

3月

3日 瑞典人斯文·赫定开始发掘楼兰遗址。

发掘至3月9日结束，出土佛像、汉字文书、汉字简牍、佉卢文简牍、毛毡、毛笔、钱币、武器等文物，据所出文物断定这个遗址就是楼兰遗址。楼兰遗址的发现，对历史学、考古学等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5日 《译林》在杭州创刊。

此杂志由林琴南、林长民、魏易主编，译载了若干日本人的史学论著，如涩江保《印度蚕食战史》、清浦奎吾《明治法制史》、六条隆吉《世界商业史》等。

20日 贯公（郑贯一）在《开智录》“改良”第6期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作者认为西方“文明国”侵略其他国家的行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义和团是北方人民不堪外侮，“出于爱国之心”而兴起。作者认为义和团在倾覆满洲政府、促进国民“知有国耻”、促进中国政治改革、促使列强改变侵略瓜分中国的政策等方面“有功于中国”。作者最后指出，义和团有此数功，使“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不可徒目之为匪矣”。

北京东文学社开办。

该学社由吴汝纶倡议，李鸿章、刘鹗等襄助，日本人中岛裁之负责教务。该学社的宗旨是整顿学校以为维新奠定基础，目标是培养开设师范学校所需之教师。该学社学生分专门科和普通科，不仅学习语言，而且学习

“万国史”、“东邦近世史”、“清史揽要”、“俄清关系” 等。

4 月

3 日 《励学译编》在苏州创刊。

此刊译载（英）阚磻师《欧洲近世史》、（日）涩江保《印度蚕食战史》、（日）秦政治郎《日本政体史》等论著。

18 日 《译林》第 2 期刊载（日）六条隆吉、近藤干吉《世界商业史》。

第 3—11 期连载。

29 日 梁启超在《清议报》第 77 册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

第 78—84 册连载。文章从历史入手，努力探寻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并希图寻找解救之道。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积弱根源于“理想者”是“爱国之心薄弱”；根源于“风俗者”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之恶风恶俗；根源于“政术者”是王朝奴役、愚化、引诱及控制人民的政术；根源于“近事者”是“严满汉之界”的政策、文字狱及加强君权政策、咸同年间之动乱及曾左李等人不能图治之失、那拉氏三十余年之专权等。

此文由于表彰保皇、反对革命，引发章太炎撰写《正仇满论》予以驳斥。

5 月

29 日 斯坦因携带 1500 余件文物从喀什返国。

斯坦因 1901 年 7 月回国后，迅即写作发表了此次考察发掘的报告，并于 1902 年 9 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宣读了这份报告。

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做出决议，“肯定赞扬”斯坦因在新疆进行的极其重要和丰富的探险，会议进一步正式成立了中央亚细亚和远东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土俗学国际学会，以协调英、法、德、俄等列强在中国的探险式“考古”活动。自此以后，世界不少国家的考古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甘肃等省的“古丝绸之路”一线，进行非法发掘，以劫掠文物。

是月 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

此为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主要撰稿人除罗、王外，还有张元

济、高风谦、樊炳清、罗振常等，1908年1月停刊，共出166期。该刊先后刊载了《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内外教育小史》、《十九世纪教育史》、《教授法沿革史》等教育史及历史教育论著。

7月

12日 张之洞、刘坤一开始向清廷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文化教育改革方案。

在第一折中，他们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以“育才兴学”为先；而要兴学，又必须先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创建各种制度。他们还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指导思想提出了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方案，头场考中国政治、史学，二场考各国政治、地理、武备等，三场考四书五经经义等，以使学堂教育和科举取士并行不悖。该折中还有“奖劝游学”一项，称游学可以解决开办学堂教习不足的问题，而“教法以日本为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经费省而事成快，“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文武两途及农工商等专门之学均须分门认习”，学成归国后按成就给予功名。同月20日，张、刘二人又上会奏第三折，其中一条为“多译东西各国书”，请谕令奖励翻译外国有用之书的士人，并令出使大臣访求“该国新出最精最要之书，并聘求翻译人员”。

会奏三折上达慈禧以后，准“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江楚会奏三折”是清末新政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教育、学术的现代化转变产生了重要的推动。

8月

29日 清政府发布改科举、废八股的谕令。

谕令称科举取士“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故“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况近来各国通商，智巧日辟，尤贵博通中外，储为有用之才，各项考试不得不因时变通，以资造就”。清廷决定“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此外，庶吉士散馆、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而且“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科举考试中较大幅度地增加史学的内容，对“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

9 月

3 日　梁启超在《清议报》第 90 册发表《中国史叙论》。

第 91 册连载。全文共有“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八个部分。此文实为作者拟议中的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梁氏在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编修新中国通史的设想，从理论上阐述了重撰新史的必要性及原则、方法以及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在文中作者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了在《新史学》中的一些史学观念，如作者指出“前世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所记事实之关系，其原因结果。前世史家，不过记叙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牒谱；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关于历史分期，作者认为旧史中的二十四史为断代史，以一朝为一史，即使像《资治通鉴》这种号称“通史”的史书，也是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划分时代，应仿照西方“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模式划分中国史的时期。关于历史纪年问题，作者认为应该抛弃中国传统史学以皇帝年号纪年的方法，而采取以孔子生年为纪年的方法；关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作者认为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极有关系，“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梁氏在文中还用西方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来比附中国早期的历史。

此文为晚清“史界革命”、“新史学”运动之先声。稍后梁氏发表的《新史学》一文即是在此文基础上形成的。

7 日　辛丑条约签订。

14 日　清政府发布改书院为学堂谕令。

谕令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但是“近日士子或空虚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故“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所设学堂“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

17 日　清政府发布谕令，命各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谕令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命各省督抚仿照“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情形，“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资

送国外留学。所学专业包括“一切专门艺学”，学成归国后考验通过，“奏请奖励”。自费生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归国，和官费生“一体考验”，分别赏予“进士举人各等出身”。

是月 《普通新历史》由上海普通学书室印行。

本书为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之一，由上海普通学书室据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东洋历史》增删改编而成。

全书十章，自太古至戊戌变法，略古详今。“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国内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

此书原印本多讹误，且“依东文译录，故叙述事件及词句间之语气，不免日人口吻”，故一月后即出版《校正普通新历史》加以订正。1902 年普通学书室出版《增补普通新历史》，补入近年史实。1902 年上海广智书局三版《校正普通新历史》，1913 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由周鹏校订、赵玉森增订的新版本，至 1917 年 8 月发行 28 版。

10 月

10 日 谭嗣同的《仁学》由东京“国民报社出洋学生编辑所”出版。

谭嗣同在甲午之后撰写了《仁学》一书，1899 年 1 月此稿分别在《清议报》、《亚东时报》上连载，其中不仅借鉴西方学术思想、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进行了新的认识，也对清代正统的历史评价基准，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中兴名臣”的正统评价提出了质疑。

该书面世之后，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一文中指出：“推崇太平，痛訾曾胡，自谭嗣同登高一呼以来，几成为革命党人之口头禅。”

12 日 梁启超在《清议报》第 94 册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20 日 由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合办的江楚编译局正式开办。

该局初名江鄂编译局，又名江楚编译官书局、江楚书局，局址位于江宁。该局以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罗振玉为襄办，柳诒徵、陈作霖等为分纂，罗振玉、王国维、樊炳清等在上海为书局负责编译日本书籍。周馥就任两江总督后，以陈季同总领该局事务，陈季同去世后，端方

任命陈庆年为坐办，主持译局工作。该局编译出版的史学书籍有柳诒徵《历代史略》（1902）、刘鉴《埃及近世考》（1907）等。

是月 （日）小川银次郎著，东文学社樊炳清、萨端同译《西洋史要》由金粟斋译书社出版。

此书共2册，附图1册。作者将西方历史分为四期：第一期上世史，自上古至日耳曼人入侵罗马；第二期中世史，自日耳曼人侵罗马至寻获新世界之前；第三期近世史，自寻获新世界后至法国大革命；第四期现世史，法国大革命以后，迄至普法战争。1903 年京师大学堂将此书审定为学堂用书，1908 年被学部审定为中学教科书，《学部审定书目提要》称“此书与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相对待，其宗旨体例一如彼书。其中所叙如波斯等国在亚洲中、埃及等国在非洲中，以其自古与欧洲各国有关系，不得不编入，而标其目曰古代东方诸国，极为分明。凡治史学当详今略古，中外皆然。学者观此书则于西洋历史之变迁大势得其概要，可进而观西洋诸大国最近之历史及各专门之史书矣”。

《新民丛报》第 32 号刊载此书广告称“本书价值早喧腾于禹域，其叙列之翔实，译笔之高洁，洵如侯官先生所谓信、达、雅三长者。各省官私学校多取以为教程，故初印数千部，转瞬即罄。兹更大事修辑，取东西洋史乘之良者十数种，采择菁华，熔铸其中，方诸初版，益臻完善”。

11 月

4 日 山东巡抚袁世凯向清廷上《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山东大学堂开办。

袁世凯在此折中指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为了应对时艰世变，必须“兴学以培才”，故拟“先于省城改设大学堂以为倡”。该折后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详细报告了山东大学堂开办的“办法”、“条规”、“课程”、“经费”。袁世凯所拟办法主要内容是先立备斋，次立正斋，待各级学堂“依次有成”后，再立专斋；在教学内容方面，备、正各斋教法，“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在课程安排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备斋”课程以中国经史掌故为主，兼习外国语言文字、史志等；“正斋”分政、艺两门，其中政学一门又分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学”三科；“专斋”分“中国经学”、“中外史学”等十门。同月，山东大学堂在原泺源书院正式开办。1904 年改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 年改称山东高等学校，

1914年因民国大学区设立停办，师生转入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等几个专门学校。

山东大学堂是继1898年京师大学堂之后另一所官办大学堂。

23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咨送自费生汪荣宝等五人前往日本游学。

25日　清政府谕令各地仿照山东办法速办学堂。

谕令称“政务处奏请饬各省速办学堂等语。建学储才，实为当今急务。前经谕令各直省著设立学堂，责成该督抚学政切实通筹举办。通省学堂同时并举，财力或有不逮。若必待各府厅州县中小学堂帑足始行开办，转致观望迟延。查袁世凯所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拟先于省城立学堂一区，分斋督课，先从备斋、正斋入手，俾初学易于速就，渐有师资，再行次第推广。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而谆谆于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德达材、本末兼资之道。著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其如何选举鼓励之处，著尊前旨，由政务处会同礼部，速行妥议具奏”。

各地先后根据此谕令仿照山东办法开办学堂，江苏巡抚将中西学堂改为省城大学堂（1902年1月13日奏请）、河南巡抚设立河南大学堂（1902年3月7日正式开课）、广西巡抚将各书院及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1902年5月13日奏请）、四川总督将尊经书院改为四川省城大学堂（1902年5月26日奏请）、两广总督将广雅书院改为广东省大学堂（1902年6月1日正式开学）、贵州巡抚将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1902年7月31日奏请）等。

是月　《普通学报》在上海创刊发行。

该学报由1900年11月29日创办的《亚泉杂志》改版而来，仍由杜亚泉创办，设有经学、史学、文学等八个栏目，刊载了《西乡丛道传》、《支那史论》等文章，发行5期后停刊。

12月

5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派罗振玉等前往日本考察中小学教育及教科书。

张之洞认为编译教科书是“教育根基，关系极重”，但“着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定不可”，希望湖北农务学堂总经理委员罗振玉率人到日本“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然后回到湖北由张之洞“全力速编成书”。罗振玉乃率自强学堂汉文教习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等人前往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开办和教学方

法，并访求中小学堂新出教科书。陈毅在日本滞留三个月，与那珂通世、内藤虎次郎等多有往还。陈毅归国后向张之洞建议应当继续在史地研究方面与日本学者进行交流。

21日 《清议报》出版一百册后停刊。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指出，“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于前人之事业”“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以故历史的思想甚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以不生”。

梁启超在《清议报》停刊号发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

在该文中，梁启超既不认可旧学对尧舜禅让的赞美，亦不赞成新学以禅让为中国古代民主制度的观点，而是以西方政治社会形态理论来考察中国政治演进历程。梁启超认为“中国上古之国体，盖有力之诸侯及豪族选立帝王而委以政权，己亦从而参与之也”，在黄帝以前，“君主无世袭权”，大禹以后，“君主有世袭权”，而“黄帝至大禹之间，则世袭权定而不定之过渡时代也”。梁启超以“主权”掌控者的变迁为线索将中国政治社会划分为四级：“自黄帝以前为第一级野蛮自由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为第二级贵族帝政时代”、“自秦始皇至乾隆为第三级君权极盛时代”、“而自今以往则将交入第四级文明自由时代”。此种观点与划分，体现了他在文中宣称的“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的观念。

是月 梁启超《李鸿章》一书编撰完毕。

该书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共十二章，分别讨论了“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

序例中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裁，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梁启超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作此传“不得不以近世史之笔力行之”，于时局著笔“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梁启超还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是“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要勿失真相而不能有心“作怨词”，故书中多有与俗论不同的“解免之言”。

《梁启超年谱长编》称“书中对李氏的批评，尚称公允，所记时代的

事迹，也很详尽，所以出版后，颇风行一时”。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评价该书“于文忠一生事迹，备载而加以论断，有褒有贬。其褒也，郑重其词，其贬也，则游移其词。吾逆知著者盖深服文忠之为人，其于文忠生平办事不得已之苦衷，皆洞若观火。然于书中，仍不免委屈其词，而不敢直言者，可以少学耶”。

梁启超《康南海传》一文编撰完毕。

该文详述康有为的生平、教育、宗教、政治思想，并评估了其历史地位。梁启超还探讨了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指出“文明弱国之人物少，文明盛国之人物多”，而历史人物可分为“应时之人物”和“先时之人物”，“应时人物”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先时人物”是“造时势之英雄”，“应时人物”一般“尊荣安富”，而“先时人物”则“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但是如果无“先时人物”，则时势不可能出现，故“今日中国所相需最殷者，惟先时之人物”。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就是中国的“先时人物”，后世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康有为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

（日）中西牛郎著、普通学书室译述《支那文明史论》由普通学书室出版。

该书论述了中国汉族文化、家族、政权、儒教、中国未来等问题。《游学译编》1902年第1册评论指出，将中国四千年历史纳于区区小册子之中，而探讨其缘起、发展与进化之大势，且能评判之是十分不容易的，而“其尤有特色者，看破中国专制政治、奴隶学术之真相，屡发卓议痛诋，诚救中国之良药也”。

（日）山上万次郎编、叶瀚译《新撰大地志》（亚细亚洲之部）由上海正记书局石印出版。

此书共七章，先为世界地理总论，分天文、地文、人文三部分；次为亚细亚总论，分地文、人文两部分；三为朝鲜，分地文、人文和地方志三部分；四为中国，分泛论、地文、人文和地方志；五为西伯利亚、中亚细亚、高加索；六为南亚细亚，包括印度、南洋等；七为西亚部分。

是年

邵之棠编纂完成《皇朝经世文统编》。

这是经世文编中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部。邵书分十部九十九目。十部为文教部、地舆部、内政部、外交部、理财部、经武部、考工部、格物部、通论部、杂著部。

书中首次出现了“史学”的分类。该书卷 1 为“文教部”，分为学术、经义、史学、诸子、字学、译著、礼乐、学校、书院、藏书、义学、女学、师友、教法、报馆。史学所收文章，除传统史学样式文章，也收录了中国人所写的涉及外部世界的几部书：《答东洋近出古书问》（姚文陈）、《瀛环志略》（徐继畬）、《日本国志凡例》（姚文陈）。“地舆部”分列有地球事势通论与各国志，汇集了关于外部世界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外交部”又分列有交涉、通商、遣使、约章、中外联盟、各国联盟、中外和战、各国和战、教案和外史。

梁启超开始编撰新式《中国通史》。

这可能是中国人撰写新式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但因故未能完成。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至 1902 年，该稿完成不到十分之二；后又改名《中国民族外竞史》，但梁氏在 1904 年见到陶成章编写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后，又改题为《国史稿》，已成二十余万言，并拟付印第一编，最终无果；1907 年，梁氏门人何天柱请求梁氏印刷《国史稿》以挽救上海广智书局困境，也无果而终；此后梁氏由于投身政治实践，无力撰写《中国通史》，直至 1917 年梁氏回归学界后，才重新开始编撰此书。

周维翰编《西史纲目》首批上古史部分 20 卷由上海经世文社出版。

这是一部纲目体世界史编年著作，其中引用了不少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外国译著，书前所附上古史引用书目，达 58 种。1903 年湖南书局刊行此书全本。

章太炎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等借今文经学“治史”的路数。

章氏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指出“治史尽于有征，两征有异，犹两曹各举其契，此必一情一伪矣”，并对“往世诸子”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为“竞于扬己”，往往“著书陈辩，败人则录之，己曲则不述也。转以九流相较，而更为雌雄者众。其有从横之士，短长之书，必不自言画策无效，或饕天功以为己力”。

王先谦撰成《日本源流考》22 卷。

此书用编年方式叙述日本开国至明治 26 年（1893）的历史。作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富强安定局面并非变法的结果，而是广兴工艺、课农桑、举办制造业、发展商业造就的，因此中国求强的首要任务不在变法，在实业。王先谦认为日本一脉相传的“世王”制度，是日本得以稳定和强

盛的根本原因，故君主政体并不妨碍中国走向富强。本书主要取材于中国及日本史籍，略加铨叙排比，史料价值不高。该书由王先谦自刻刊行。

（日）增田贡《清史揽要》由上海书局出版。

该书所记起顺治至同治二百三十年治乱盛衰之迹。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称该书“叙述二百年来事，颇有为中国史家所讳者，亦可以供参考也”。该书先后有杭州白话报馆本（1901）、开明书店本（1902）、善成堂刻本（1903）、商务印书馆本（1904）等。

廖平《春秋图表》2卷由四川存古书局印行。

是书图十，表二十四，考一，弁以九州图，“以春秋与群经比附牵缀，不惮求详”。1901年审定增补，收入新订六译馆丛书印行。作者标新立异，谓春秋禹贡九州，推广为八十一州，即全球大九州。

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52卷汇刻本刊印。

1903年，由江西学政吴士鉴上奏朝廷，称“纪述淹赅，考定完密”，为“乙部中不朽之作”。

吕海寰《庚子海外纪事》4卷由上海办理商约行辕刊印。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印行。

1902 年

※ 柳诒徵编纂《历代史略》印行。
※ 梁启超发表《新史学》。
※ 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章太炎提出编修新式中国通史的体例和宗旨。
※ 邓实发表《史学通论》，提出“中国无史说”。
※ 陈黻宸发表《独史》，提出“史权”说。
※ 汪荣宝发表《史学概论》。

1 月

10 日　张之洞向朝廷举荐沈曾植等十二名人才。

此次共举荐人才十二名，有李盛铎、伍廷芳、汪凤藻、黄绍箕、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陈宝琛、胡惟德等。同年 10 月 27 日，张之洞又保荐杨守敬、胡钧、陈毅、陈曾寿等十六人为经济特科人才。1903 年 1 月 13 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再次保荐缪荃孙、张謇、曹元忠、吴廷燮、王季烈、孙诒让、罗振玉、陈衍、沈曾桐等三十人为经济特科人才。张之洞所荐人才，多是清末文史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

京师大学堂恢复，张百熙任管学大臣。

17 日　柳诒徵编纂《历代史略》印行。

1902 年 10 月 17 日，该书编竟，于 1903 年由江楚书局印行。《历代史略》分六卷八册，从上古至宋代，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蓝本，稍加增易而成，有的只是改动了标题，如把首篇第二章人种之别改为历史大旨。元、明两卷，为柳诒徵所增辑，体例依照《支那通史》，中世纪末的五代，作为近世史开端；元朝作为近世史中，内分六篇二十一章，并附元及诸国世系表、元帝在位年数及年号表；明朝作为近世史下，内分六篇二十六章，并附说明及诸国世系表、明帝在位年数及年号表、元明官制沿革表、明儒传授表等。元明两朝，史实取精于诸史，和《支那通史》前四卷

联成一体，叙述了自上古至明的历代史事。

此书出版后畅销一时，上海等地竞相翻印，多次重刊。江楚书局初印本无署名，后上海中新书局重版时才署柳诒徵之名。该书曾被学部审定为“中学暂用历史教科”。《审定书目提要》称“日本人述中史，究不免疏漏。此书既略为汰冗存真，又其善者，原书惟能举史鉴中所立之纲相并，故历朝大事尚无遗漏，其用合并始末之法，乃无从前目录年表及东人年契年鉴之枯燥……此书于世次统系及典制事项均立有图表，部居于每纪之末，其用例殊不苟……原书至宋而止，此书所增元明二卷皆得要领”，并认为此书“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

当时一些学者受日本人著作影响，开始尝试以章节体编写中国教科书，柳氏此书实开风气之先，张舜徽认为“清末以来，编历史教科书的，大抵以此书为蓝本”。

2 月

8 日 《新民丛报》半月刊在日本横滨创刊。

该报在“史传”、“学说”、“学术”、“绍介新书”等栏目刊载《新史学》、《读史随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万国思想家年表》、《欧美各国立宪史论》、《中国上古旧民族之史影》、《泰西教育学沿革小史》、《中国人种考》等史学论著。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 号发表《新史学》。

第 3、11、14、16、20 号连载。此文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节。

作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批判，将其缺点归纳为“四弊二病”，并谓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二病”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作者对史学作了重新界定：“历史者，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

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作者还指明了建设新史学的现实意义，史学乃“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时，梁氏指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文章学、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等，“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借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此为跨学科研究的最早倡议。

此文被认为是晚清“史界革命”、“新史学”运动的宣言书，标志着“新史学”运动的发端。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号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梁氏认为学术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并以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福禄特尔、福泽谕吉、托尔斯泰为例阐述了学术对于改造社会政治之作用，目的是敬告“我国学者”“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呼吁他们以学术为中国文明进化贡献力量。此文说明了梁启超以及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从事学术活动的目的在于传播文明，改造政治社会以复兴中华。

14日　浙江巡抚奏请将求是大学堂改设为省城大学堂。

求是书院建于1897年，1901年10月改为求是大学堂。浙江省城大学堂为浙江大学前身。

24日　《政艺通报》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主张“法无所谓中西”、“学无所谓新旧”。

《政艺通报》以“通中国政治外国政治艺学为主义，上下古今旁罗中外以备”为宗旨，设有“历代政治文钞”、“皇朝政治文钞”、“皇朝外交政史”、“万国外交政史”、“万国现世新史”、“史学文编”等与史学有关的栏目，刊登了一些重要的新史学论著，如邓实的《史学通论》、《民史总叙》等。该报一直出版到1908年，共发行146期，是清末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之一。

是月　《翻译世界》月刊在上海出版。

此刊由支那翻译会社编辑发行，刊载有关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方面论著，多译自日本及欧美大学教本，其中译自日本的尤多。所刊登与史学有关的有《哲学史》（蟹江义丸）、《政治学史》（浮田和民）、《教育史》（仲野礼四郎）、《经济学史》（伊势本一郎）等。

3月

4日 《外交报》第3期译载（日）有贺长雄的《外交史及其研究法》。

7日 河南大学堂正式开课。

河南大学堂由巡抚锡良仿照山东办法设立，以孙葆田为总教习。学堂教课以四书五经伦理纲常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西学为辅，所设课程有经史、文学、中外史地、算学、格致等。1903年河南大学堂遵旨改为河南高等学堂，开设的课程有经学大义、皇朝掌故、中外历史等。

10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第4、5、7、9、12、16、18、21、22、53—55、57号连载。文章以约八万字的篇幅，系统论述我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趋势，划分为七个时代（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时代、老学时代等），点评了众多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作者把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演进视为前后关联、互为因果的链条，论列各个时代思想的主要成就和特点，不同时代的学术之间的渊源和影响。此文为近代学术史的编撰树立了典范。

胡适回忆他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阅读此篇的感受是"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称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并由此确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志向。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此实第一部有系统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寓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之影响。则民国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

11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2期刊载《论经学有关于国政》。

此文为《鸡鸣风雨楼说经》系列之一，认为"六经者，人才之根本也，人才者，国家之命脉也，是故以经学成人才，以人才维国运，古今兴亡，罔不由此"。此种重视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逐渐积累发展为国粹保存主义。

17日 四川大学堂成立。

该年5月26日，奎俊又上《筹办大学堂折》，仿照山东章程，将尊经书院改为四川省城大学堂，将中西学堂并入。1902年底按《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要求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并于1903年2月24日按改书院为学堂谕旨将尊经书院合并。该校正科分为文科类、理科类、医科类，文科类又由经史、政法、文学等专业组成，所修历史类课程有中国历史、外国

历史、中外政治地理等，此外，“中外史学”也是理科类学生必修的课程。

24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4 号发表《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

第 6、7 号连载。该文叙述匈牙利独立运动领导者噶苏士的事迹，并以噶苏士的传记为载体展现了匈牙利的独立历史，其目的是寻找可与白种人抗衡之“黄种之光”，建立黄种人竞胜白种人的信心。

《经济丛编》半月刊在北京创刊。

该刊由华北译书局编辑发行，设有中外大事记、人物、历史等栏目，内容包罗甚广。创刊号在“历史”栏中刊载《百年埃及兴衰记》（第 2、4、5、7、16—20、29、32、40、41 期连载）。

是月　（日）高山林次郎等撰、罗普（罗孝高）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此书分“学术思想史”、“政治史”、“军政史”、“外交史”、“财政史”、“司法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交通史”、“产业史”、“风俗史”及附录“三十年间国势进步表”等篇。《新民丛报》第 9 号所刊此书广告称该书是“东方文明之大活剧”，系日本博文馆为纪念日本维新三十年聘请“通人将三十年来国运之进步叙述成书”。该广告指出，近年中国所译日本书“详于政治而略于其他，盖犹旧史之体裁也”，而此书对于“国势民情无一不具备”，可谓“兼有《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长，东史中佳本未有过此”。1931 年 11 月，上海华通书局又出版了古同资译本，收入“日本研究丛书”。

4 月

3 日　《译书汇编》第 1 期刊载《欧洲财政史》。

第 2、3 期连载。此文是最早专门介绍西方财政制度发展史的文章之一。

7 日　马君武为其所译《法兰西近世史》作序。

序文指出：“唐虞以前之事，不可考矣。尧舜禅让，民政萌芽，夏禹传子而遽斩矣。自是厥后，民贼代兴。故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

所译《法兰西近世史》4 月初完成，由上海作新社印行。

8 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 3 期发表《学强》。

此文为《鸡鸣风雨楼著议》系列之一，作者批评后世将“通经而致

用”的孔门之教、“参天而尽物”的孔门之学、“因时而制宜”的孔门之政，变为“浮躁之文辞，丛脞之考据，腐败之时文，肤浅之讲章”，结果造成“不痛不痒之痿痹无知之天下”，使“外人窥我人才之衰乏，挟其国力横行无忌，猛压无伦”。邓实认为国以人强，人以学强，故要强“国”，先强“学”，所谓“学”，就是“孔子之学”，孔学而外，“无汉学无宋学也，无新学无旧学也”。

11日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该年2月13日，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的奏折中，主张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审定名词，编译教科书。4月11日，再度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随后清廷批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成立，严复为总办，林纾、曾宗巩、魏易、严璩为副手。该局开设主要是为了编译教科书，其章程明确将“列国史略”列为应翻译的门类，数年间翻译的史学类书籍有《东西洋伦理史要》、《新体欧洲教育史要》、《美国通史》、《世界史》等。

22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6号发表《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该文是中国介绍希腊哲学史的早期论著，由“总论希腊学术”、“希腊哲学胚胎时代”两部分构成。该文标有“上编上古时代”字样，收入《饮冰室文集》时改为《论希腊古代学术》，估计此文仅是《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一部分，后无再写，故易题名收入文集。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6号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

第8、9号连载。文章先论及中国各地域中都城变化等政治大势变迁，后论及各地域之哲学、经学、佛学、词章、美术、音乐、风俗等异同变迁，再论及兵事上之革命割据等。此文是第一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概论性著作。

26日　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章太炎认为“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故提议在崇祯皇帝殉难日——3月19日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唤起汉人的族群意识，反抗满清。章太炎为该会特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一文以示纪念，构建了一个简要的汉族明末英雄系谱，更推动了反满革命派汉族史书写的初步展开。

是月　（日）田口卯吉著、刘陶译《中国开化小史》由上海广智

书局出版。

该书原名《支那开化小史》，又名《中国文明小史》，共十五章，从上古述至明亡。由于该书以现代的观念对中国历史变迁予以特别关注，故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高度评价此书，认为“其论则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新民丛报》第 1 号介绍该书说：“彼以其新学说新眼光，观察吾中国数千年治乱兴亡之由”，“论断数千年之史迹，目光如炬，读之可辟一新境界”。

孙诒让《周礼政要》2 卷由瑞安普通学堂刊印。

1901 年清廷重议“更法”，孙诒让受盛宣怀之托，撰成《变法条议》。因未合盛意，次年由孙改名《周礼政要》自予刊行。全书共四十章，按篇目分：（1）政治类，有朝仪、达情、博议、宫政、奄寺、冗官等十章；（2）文化教育类，有广学、通艺、教胄、广报、通译等六章；（3）经济类，有考工、矿政、冶金、保商、同货、教农、水利等二十章；（4）治安刑政类，有治兵、巡察、谕刑、狱讼四章。

此书不是研究《周礼》的学术专著，而是表达维新改制主张的政论性作品。

5 月

8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7 号发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第 9、13、17、19、23、51 号连载。该文是梁启超辑译删减英国人 Ingram、意大利人 Cosa 和日本人井上辰九郎等人所著之经济学史而成，是中国较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最早文章之一。

22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8 号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

第 9、17、49 号连载。此文是用西方进化史观系统考察中国历代政体演化过程的第一篇专题论文，把中国历代政体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大期、十三个小期，“自黄帝至周初，为封建未定期；自周至汉初，为封建全盛期；自汉景武以后至清初，为封建变相期；自康熙平三藩以后，为封建全灭期”。

白钢《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认为“把中国专制政体的演化看作是由低级向高级，由不完善向完善发展的历史过程，具有科学性；其缺点则是没有弄清楚国体与政体、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将它们混为一谈。当然，他对中国历代政体发展阶段的划分，也缺乏严格的科学标准”，并

认为梁氏此文对“后来学者在运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所起到的启迪作用，却是不容忘却的”。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8号发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

梁氏指出自己被欧美日本人言中国人“与异种人相遇辄败北”的言论刺痛，要寻找中国外竞史上之“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以雪此言”，张骞班超就是梁启超认为“吾历史亦足以豪”的英雄人物。该文不仅叙述了张骞班超之事迹，也论及两汉时期西域形势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交往和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历代导致“得地而不能守，开边而辄致乱”现象之原因。

是月　张寿镛等编纂《皇朝掌故汇编》100卷由上海求实书社出版。

该书内容上起清初，下至光绪后期，按事务性质分内编、外编，内编有帝系、官制、田赋、盐课、钱法、刑法等，外编有各国政情、海关税则、华洋借款、赔款、防务等，每类下有编年叙事及细类分述。该书辑录了清代列朝皇帝谕令及大臣奏对，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史料，是清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书之一。

（日）长谷川成也著、敬业学社译《欧洲历史揽要》由敬业学社出版。

6月

1日　广东大学堂开课。

两广总督仿山东大学堂办法将广雅书院改为广东省大学堂，“堂中功课，恪遵上谕，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复照各国通例，分别伦理、政法、本国文、外国文、历史、地理、数学、格化、博物、图画、乐歌、体操诸门”。

4日　（日）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

此书分总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今代史六卷。另附地图一册，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译者序言认为，此书“叙录我国自开辟以迄今代数千年来政治上变迁之大纲，提要钩元，不烦不漏，至于学术风俗之有关政治上者，亦择要著论，更附各表，以便参照，其有便初学，岂浅鲜哉”。陈毅译介此书还寄寓了现实目的，“史学者，国民之龟鉴，爱国心之根源也。今泰西诸国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论

者以为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传统旧史竟无一完善之本，故将《支那史要》“爰译之以公于世，以为爱国国民初学研究之用”。此书篇幅适中，叙述简明，曾被学堂广泛采用，颇受时人欢迎。

6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9 号发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第 10、14—17、19、22 号连载。该文详述意大利建国三杰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的英雄事迹和意大利建国之历史，塑造了三个坚韧不拔、志趣高尚、勇于牺牲、善于斗争的建国英雄形象，认为此三人足“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梁启超在此文中提出了“察往以知来，鉴彼以诲我”的观点，是对传统的“鉴往知来”史学功用的新发展。同一时期梁启超写作的外国爱国志士传还有《罗兰夫人传》等。

7 日　岑春煊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签订合办山西大学堂协议。

此协议决定将教会所办中西大学堂并入原山西巡抚所办山西大学堂，组成新的山西大学堂，原山西大学堂改为中学专斋，原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中学斋课程初期分经、史、政、艺四科，1904 年新巡抚宝熙改革课程，除经学外，其余改设为外语、数理、历史等科。西学斋课程以模仿西方设置，有英语、物理、历史等科。1912 年，根据新的法规，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1931 年 7 月改称山西大学，并于 1936 年 9 月开设史学系。

17 日　《大公报》在天津创刊。

该报由满族天主教徒英敛之创办，办报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20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0 号发表《格致学沿革考略》。

第 14 号连载。梁启超认为，“格致学”本为中国“所最缺者”，自新学输入以后，学界虽“颇谈格致”，但是对“格致学之范围”、“与他学之关系”及其“进步发达之情状”未有闻。该文论述了西方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代的“格致史”，是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史最早的论著之一。

是月　（英）摩尔化著、出洋学生编辑所译《西洋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

5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1 号介绍法国人基佐所著《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

梁氏认为“基氏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此书在欧洲，其声价几与孟德

斯鸠之《万法原理》、卢梭之《民约论》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于彼者居多”。

19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2 号发表《斯巴达小志》。

第 13 号连载。梁启超从文明史的角度建构了欧洲历史的框架，认为欧洲“古代近代有历史，而中世无历史”，古代历史以希腊罗马为重心，而希腊历史之中心则是斯巴达和雅典。梁启超认为“宪法立而革命之惨剧”永绝这个“过渡时代绝妙之法门”的精神体例都是来自斯巴达，故“斯巴达实今日全世界十数强国文明之祖师也”，“斯巴达之魂魄历二千余年后”将复生于今日。该文撰写虽有政治目的，但其对斯巴达的“立国起原”、“立法”、“政体”、“民族之阶级”、“国民教育”、“行政”、“国势”、“缺点”等方面之研探介绍，可视为中国希腊史研究的开山。此文与 10 月 31 日《新民丛报》第 19 号梁启超的《雅典小史》一起，初步勾勒了希腊史的轮廓。

25 日　《译书汇编》第 5 期刊载赤门外史编辑的《欧美日本政体通览》。

第 6、8 期连载。

29 日　章太炎致信吴君遂，商谈修史事。

章氏在信中称“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并批判旧史家云“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吴均诬造《西京杂记》，其“通史之污秽可知也”；近人马骕“考证不及乾、嘉诸公，而识断亦伧陋”。

故章太炎对自己修史寄予厚望，“吾侪高掌远跖，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章太炎还指出“今世求史，固当于道家求之。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

是月　章太炎开始重订《訄书》。

至 1903 年春脱稿。共收论文六十三篇，附录四篇，首《原学》，终《解辫发》。相比于初刻本，重订本思想立场大变，由尊清变为反清；主题大变，由宣传社会改良变为提倡民主革命；体系大变，由康有为改良主义异端理论变为以“光复旧物”相号召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朱维铮认为“《訄书》重订本的问世，首次为当时还是幼小的革命民主派，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日）本多浅治郎著、出洋学生编辑所译《西洋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 1906 年又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湖北兴文社译本）。本多浅治郎的另一著作《西洋史》在 1909 年 6 月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百城书社编译）。

（日）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译述《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8 月

4 日 《新民丛报》第 13 号发表《章太炎来简》，提出编修新式中国通史的体例和宗旨。

章太炎主张在兼采各种传统史书体裁的基础上，创立新通史。仿效郑樵《通志》，以典志为主干，叙古今制度沿革。同时采纪事本末体，作“记”以论述中国史上重大事端。作表是为了补典、记等之不足。这种通史设想，综合了各种传统史书体例之长，主要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

他以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记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

书末附所拟“中国通史目录”。后章氏又将此目录稍事修订，改为五表、十二志、十记、八考、二十二别录，以《中国通史略例》附列入 1904 年《訄书》重订本《哀清史第五十九》。他提出的关于新通史的体例实际仍未脱旧史的形式和框架，对日后新型通史的编纂影响不大。章氏设计的新通史也并未修成。

8日　章太炎因撰《中国通史》而重新认识"小学"功用。

章氏为撰写《中国通史》而重读乾嘉先贤著作，他感到小学非仅为经学的附庸，同样可为通史明进化的津梁，他在该日致吴君遂的信中指出，"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被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借以发见"，"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章氏指出，西方社会学借语根探迹皇古，创获极多，是固上古史迹留于传记者甚少，"惟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又一次郑重宣布："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这就是"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章太炎还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小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

15日　清政府颁行《钦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对历史教学作了规定。

章程把分科设学的观念纳入大学讲授之中，预备科的部分以政、艺两科为主，政科之中列有"中外史学"课。由于大学预备科的程度相当于各省高等学堂，学级的规划必须与大学衔接，所以政科预备生必须于二年内修习"中外史制度异同"、"中外治乱得失"及"商业史"等课，以便因应将来升入大学政治、文学、商业等分科的需要，因此在课程设计上显现出强烈的实用倾向。

仕学馆和师范馆的史学课程也并没有太大差别。仕学馆内加入掌故学的项目，其"国朝典章制度沿革大略"、"现行会典则例"及"现行政事之利弊得失"等内容，都是提供从政为官之基本常识；而师范馆在外国史学部分以上世、中世、近世分年教授，则与中学堂史学科的规划相同。

同时颁布的还有《钦定考选入学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中等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蒙学堂章程》。这些章程构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壬寅学制。

18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12期发表《史学通论》，提出"中国无史"说。

第13期连载。邓实首先对中国旧史进行批判，认为旧史是"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又指出了新史学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提出并论述了"神史"、"君史"和"民史"的概念：所谓"神史"，就是神权时代的历史，"神之

外不见所谓史职也，神之外，不见所谓史文也”；所谓“君史”，就是“君权时代”的历史，“私天下于一家”并“私其史于一家”；所谓“民史”，就是“民权时代”之史，是记录总结人群进化发展、竞争的成绩和事迹，此种历史不仅可记录“既往之文明现象”，还可对“未来文明”产生影响。邓实在文中高度赞扬梁启超的新史学，认为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

是月 （日）重野安绎《万国史纲目》由东京劝学会翻译出版。

9 月

2 日 《新世界学报》半月刊在上海创刊。

陈黻宸为总撰述人。主办者认为要在“智存愚灭”的二十世纪“舍我所短，效人所长，与列强诸巨子相驰骋上下”，就必须在学术上“摘英撷彩”开通风气。故该刊“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以通古今中外学术为目的”，设立经学、史学、政治学、法律学、心理学、兵学、教育、宗教学等栏目。

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第 1 期发表《经术大同说》，论述了经学在新时代的转化复兴路径。

第 2—9 期、1903 年第 2、3 期连载。陈黻宸将周季以后经学分为“经术排外之时代”、“经术封建之时代”、“经术统一之时代”、“经术专制之时代”，并认为“自汉以来之治经术者，派别不一，榷其实二端，一为己，一为古人”，结果导致“今之十三经，是四万万人公共骨董耳，今之五帝三王孔孟，是数千年古冢之朽骨耳”。他反对“经之祸中国”的观点，反对将经学视作阻碍西学发展的原因，认为“不论经学、西学，但以益人理想，振人精神，为救中国要策”。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处“正经术世界中之一大变动时”，“经必以能行为要”，故经学复兴实自战国始，而“孔子者，经术大同之起点”，只有“春秋战国时之经术之贯输于学士大夫之智脑中者，转而贯输于群天下之民之智脑中，而后大同可望矣。若是者可言经术，若是者始可言经术之行”。其实他所谓的“经术大同”，其精神主要是开放心态，取人所长，“不问其信经、爱经、尊经、重经，而即非经、诋经、排斥经，而其目中心中口中犹有所谓经者存，则亦我大同之目的所系也”。

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第 1 期发表《史学总论》，提出史学“为一国文明之所寄”。

第 3 期连载。作者强调史学的重要性，认为“史学，群学也，名学

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史学“为一国文明之所寄”，“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所以中国人“有志兴国”者，“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他称赞西方史学，以为“泰西各国人人有作史之权，其文学哲士著书立言，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他批评中国旧史“自嬴刘私国，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接迹后世，而史氏之称颂，洋溢行间，不问其贤与否也。史无公心，此污秽灭亡之史，不足观也”。他主张史家需要具有“特别之精神”，包括所谓“公心”、“理心”、“质心”和“曲心”，这是“史氏之命根”，“四者亡一，则非良史。非公心无以明政权之本。非理心无以推世界之进化，达事理之本原。非质心无以见治乱兴亡之实，而施诸作用。非曲心无以显历史之功夫，而行诸当世”。

《政艺通报》第13期刊载（日）藤田丰八《序泰西通史》，提出“历史哲学”的概念。

藤田丰八认为，如果历史是“鉴邦家之往事而说政治，征人类之遗事而教道德，是往迹遗事实”，只是“为政治道德等学”输送资料，历史就不能说“为独立之科学”。史学只有展现人类生存兴亡过程中的“理法纲维”和精神，才“始得成立”。揭示历史现象中的“因果之关系”和“特别之意义”，才是“史学之本领”的实质，而“一有机团体相翕应相维系而起”是“历史最宜致意者”。藤田丰八在文中还分析了世界史、西洋史的区别。

16日　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第2期发表《独史》，提出“史权”说。

作者不仅认为“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独识以成独例，而尤贵有独力以副之”，而且认为史学是“天下之公言”，要复兴史学，就要先谋求“史之独权”。陈氏认为史学应“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系列比例以发明之”，所以他要借鉴西方史学“于民事独详”的优点，重新撰写一部中国通史。陈氏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历史编修方案，该方案根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自五帝始，下讫于今，条其纲目，为之次第，作表八、录十、传十二”。陈氏在文中还特别指出只有引进西方的统计方法，才能对历史上的平民户口、风俗、习业等情况做出精确计算，为定性研究提供可靠基础。

罗香林认为此文对“史权之提倡、统计方法之重视、平民习业之重

视、四民风俗之重视、氏族语言之重视，皆有其不可磨灭之特识，谓非清季史学界之大殿，不可得也”，乃撰《陈介石先生独史评述》专为介绍。

杜士珍在《新世界学报》第 2 期发表《论秦后政治家派》。

该文从战国思想，尤其是孟子荀子入手，将汉至明的政治思想家分为“孟子派”和“荀卿派”。作者认为荀学盛而孟学衰，最终导致中国人才衰微国事败坏，所以要救中国之弊，并不一定要“尊西人为帝天”，复兴孟学即可。

李振铎在《政艺通报》第 14 期发表《十九世纪外交史之概略》。

第 15 期连载。文章以“正统主义”和“国民主义”为线索对 19 世纪世界外交史进行梳理，指出“今日国际历史日益发达，势将迫压第二流以下之国家，使失其独立”。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中国的自存之道。

是月　日本人大谷光瑞率领考察队到达新疆，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掠夺性考古行动。

10 月

2 日　郑浩在《新民丛报》第 17 号发表《学术变迁论》。

作者认为学术变迁分合之处，“每有其自然流转之机”，故中国学术也遵从事物的进化发展规律，可划分为“简单时代”（含“结绳类”、“质行类”）、“繁杂时代”（含“官学类”、“师学类”）、“统一时代”（含“经学类”、“理学类”、“制艺类”），而“通商以来以至今日”，中国学术正在经历“由腐败而变通，由变通而开放，由开放而精辟”，可谓中国学术的“现在世与未来世”。

16 日　陈黻宸在《新世界学报》第 4 期发表《地史原理》，提出研治“新地理史”的主张和路径。

第 5 期连载。陈黻宸指出地理与“识古今理乱之大要、中外兴坏之大局，而于当时得失之林、利病之数，较然有直接之关系”，故为“史学一大宗而通儒所乐从事也”。传统学术有“考据家之地理”、“游历家之地理”、“探险家之地理”、“格致家之地理”、“农家之地理”、“工商家之地理”、“兵家之地理”、“名学家之地理”，但“此皆未足言地理也”。西方学者认为地理学是“必合历史学、政治学、人种学、物理学、生理学及一切科学、哲学、统计学，而后能精能审”，陈黻宸曰：“吾信之，吾愿为地理家推言之”。陈黻宸进一步提出，“地理者，统斯民之种类、习俗、性情、德行、学术以合而成焉者也”，“我中国有此学者矣”，其代表就是

《史记·货殖列传》和《通典·州郡篇》。“以司马氏、杜氏之才，厕身史家之林，而其所见于民人社会之义者，复能洞彻本原，隐隐为千百年后言新舆地学者道其先声”。

陈黻宸表示，“今欲以彼之所学者，为我中国之民辟一新地理史”。要写好此新地理史，则要至少做到四点：调查贵实、区划贵小、分类贵多、比例贵精。地理史关注的重点应包括户口表、宗教表、族类表、学校表、职业表、疾病表、罪人表、儒林表、文明原始表、历代君主表十个方面。陈黻宸将西学的地理学概念和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较早地探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治学方法路径。

同期还刊载了杜士珍《班史正谬》和黄群《秦汉后法律之变相》（第5期连载）两文。

《班史正谬》重在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史学观念的短长。作者认为“史学之衰，起自班固”，所以要对班固之书“辨其得失，破其屯蒙”。“中国历史之学自昔大盛”，虽然秦祸以后学术大衰，但是司马迁之《史记》仍为“千古不朽之宏著”，但是此后“末流无术，蹈袭故常，故魏晋以来之史，有每况愈下之势”，其原因虽有“后世史氏之无识，实班固《汉书》有以作之俑者耳”。作者指出“历史之用全存贯通”与比较，如此方可得历史之因果，而班固“文学士，本非作史之才”，“浅识末学”、“不学无术”、妄讥古人，导致“史学之衰”。

《秦汉后法律之变相》一文对中国的法律变迁进行了初步梳理。作者认为法律是导致西方之“政治”、“人心”、“风俗”能够“日进而日上”无止境的原因，也是“保全生命之护符”和“国家之基础”。中国周季以前数千年“法建无专科之书，旁见于政治学者，得其实矣”；而“自周迄于今”，“法虽具存，而桀黠者所摭袭变本加厉，阳附而阴弃之”。该文又从“游侠为法律之动力”、“酷吏为法律之公敌”、“滑稽为法律之间助”、“佞幸为法律之隐蠹”、“循吏为法律之私仆”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法律进行进一步分析。

樵隐在《政艺通报》第17期发表《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

作者认为中国“三代以降有君史而无民史，有君书无民书，有治人法无治生法”，导致民愚国弱，被人欺凌，虽然在外力作用下，朝廷已“敦促变法，讲求译述”，但是“文人学士，群喜致力于欧美列史、法律、政治、舆图、兵学，以为猎取富贵功名之计，而农工商之守旧如故，内地之闭塞如故，民性之野蛮如故”，所以他主张“裒集中国古今物产土性、工商宜忌、盛衰之沿革，国家征税出入轻重利弊之关系，各业物质法度、生

理替待盈虚之变更，一一证以欧美当师法、当修改、当参酌之实际，以补列朝国史所未备”，提高国人之智慧，以使民强国强。

31 日　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第 5 期发表《中国无史辨》，为中国传统史学辩护。

第 9 期连载。马叙伦虽然认可“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但是不认可中国无史的观点，指出“史记”、“通志”是“空前绝后的大著作”。作者反对如“乡曲愚夫妇之信佛”一样崇拜西学，“诟旧学如寇仇，斥古书为陈腐”，而认为“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表现出国粹主义的主张。

《新民丛报》第 19 号转载《私史》一文，批判中国旧史。

此文原刊星架坡（新加坡）《天南新报》。文中指出，过去中国为“君权极盛、专制政体之国”，史家“慑于君权，压于专制”，“史之地唯知有朝廷，史之人唯知有君主”，“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

是月　京师大学堂编书处成立。

该编书处是专为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编纂中国经史教科书而设。该处章程规定，“普通学课本之用，应取中国学问为学堂所必须肄业者，分门编辑，派员办理为编书处。其西学各项课本，俱由译述西书，应归译书处一手办理”，“编纂课本，拟按照中小学堂课程门目分类编纂，一曰经学课本，二曰史学课本，三曰地理课本，四曰修身伦理课本，五曰诸子课本，六曰文章课本，七曰诗学课本”，“史学课本，拟以编年为主，删除繁琐，务存纲要。史家论断，所以明是非而别嫌疑，于人事至为切要，拟就先哲史论文集精为择取，或逐条系附，或另卷编列”。章程还规定了教科书总的编纂宗旨，“一曰端正学术，不堕畸邪；二曰归于有用，无取泛滥；三曰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四曰博采群言，标注来历”。

（日）杉山藤次郎编纂、中国广东青年译《泰西政治学者列传》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内有《基率特传》，对基佐的生平著作，特别是对其《欧洲文明史》在史学理论上的意义和贡献，作了详细介绍。其中指出，“有历史而无史理学，则国家治乱兴废之原因，文明进步之本故，不可得而知”，如果只知道“治乱兴衰之实迹”，而不去探究“治乱兴衰之故”，则历史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基率特氏者，实为史理学之嚆矢”，“基率特后讲史理者

虽仅得邈克尔（即巴克尔）一人，而其影响之及于寻常史传，而因以改良进步者，亦属多有之”。并认为基佐的《文明史》，可与中国“孔子之《春秋》、左氏之《传》”比肩。

另有《邈克尔传》，简要介绍巴克尔的生平和著作，认为巴克尔“深有见于人事开进之理，遂大为著述，以论历史成败隆污之所由来，欲自成一家言”，又认为巴克尔的“所有著述，立论尖新，着着出人意表”。“邈克尔总论二卷，已倍于基率特文明史全书，使天假以年，则全卷落成，不几如涑水通鉴之大著”，“至于史理，则以基率特为嚆矢，邈克尔次之。若比较其议论之高下优劣，则又非同日而论，邈克尔应处以高度，基率特应处以低度”。这是国内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文章。

11月

4日　《外交报》第28期译载（日）有贺长雄撰《十九世纪外交总论》。

第29、30期连载。《经济丛编》1903年第22—32期亦连载此文。

14日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

《新小说》专辟“历史小说”专栏。《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指出，该栏目标举“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的宗旨，并对“历史小说”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严典重之文。”

沈曾植会见日本人内藤湖南，赠其《吐蕃会盟碑》。

30日　陈怀在《新世界学报》第7期发表《方志》，主张从传统的方志学入手建设新史学。

作者认为“修史必自方志始，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者也”。方志在于古则“得之周官之书”，在于今“则见之欧洲统计之术”，西方统计史“于四方民事纤细，无不备列”，“史学必得欧人之统计学而后于史家可无憾，方志者，统计之学之所由出也”。

同期还刊载了马叙伦的《农史》，作者希望有一个“能人”出现，可“高步阔视，抽毫慷慨而作农史”。

是月　（日）松平康国著、作新社译《世界近世史》由作新社

发行。

此书五编，分别是：近世之发端、欧洲宗教改革之时代、欧洲列国之波澜、东洋诸国之变动、欧美自由主义之发动。

此书是汉译历史教科书中少有的世界断代史作品。《大陆报》、《新民丛报》刊登广告推荐此书，《大陆报》第 4 期上的广告称此书“纪载不惟欧洲，而以欧洲为最详，其特色乃在记事而能有条理、有脉络，不致阅者生厌”；《新民丛报》第 32 号上的广告甚至称许该书为“东国史籍中第一善本”；商务印书馆在为该书制作的广告中称该书“叙事简而不漏，论断卓而不偏，煌煌巨帙，诚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作”。该书后被审定为历史教科书，在学堂中风行一时。

1903 年 1 月，商务印书馆推出较为完整的译本，包括“原例”。上海广智书局译本 1903 年 3 月发行，增加了梁启超的按语。三种译本内容略同而文句稍异。

张肇桐编辑《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张肇桐系留日学生，其编写此书的宗旨是“发育爱国精神”。1903 年《江苏》第 1 期刊载此书的广告称“中国历史博而深，非儿童所敢问津，此书以百余页小册，网罗四千载事迹，既简且明。本书仿各国读本例，分全史为二百课，前后长短，秩序整然；小学读本，以发育爱国精神为最要。本书于近世国权之得丧一一加意，务令儿童有所感发”。该书是较早的国人自编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之一，1903 年 5 月文明书局再版此书。

12 月

9 日 《大陆报》在上海出版。

戢元丞、杨廷栋、秦力山等人主持，设有“论说”、“学术”、“谈丛”等栏目。该刊先后刊载《德意志六十哲学者列传》、《希腊哲学家各派学说纲领》、《近世世界史之观念》、《世界文明史提纲》、《战术史例》、《论文明第一要素及中国不能文明之原因》、《再论中国不能文明之原因并改良之方法》、《人类学之目的及研究人类学之材料》、《教育之历史的研究》、《古今战法史》等论著。

10 日 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第 9 期发表《史学概论》，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

第 10 期连载。该文主要根据坪井马三、浮田和民等人的著述编撰而成，探讨了史学之定义、研究法、历史之分类、关于史学之辅助学科等问题。汪荣宝指出该文“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

大异其趣”：第一，社会是“进化之物”，历史是“记录过去现在人间社会之陈迹”，而史学是“研究社会之分子之动作之发展之科学”，其应该去历史之锈而发其莹，“以速吾人之进步”；第二，当采用以“时代之顺序”观察“时代之思潮”的“纵观法”和从内外角度探讨“文明之所以起原、国家之所以成立”的“横观法”以使学术研究“视线大于对象之全体”；第三，从内容本质上将史学区别为政治史、文明史，从空间范围上将史学区分为世界史、列国史、国别史、地方史，从时间逻辑上将史学区分为朝代史、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第四，历史之材料“不必限于典册”，“虽败鼓弊履苟为古代之遗物”亦历史之材料，而“实际地理若古建筑若画像若骨董乃至歌谣口说遗谶逸谚凡足以代表古来人间之情状者，无不为史学之证据物”；第五，指出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为史学研究所需借助汇通之最重要学科。

作者认为史学是“研究社会之分子之动作之发展之科学”，而“社会之分子”则是指“通体健全，旦夕任事或苦心焦思，以谋尽力相集而维持社会者”。同时他认为史学的目的与价值应该是就“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所以不应对古代之历史“辄以今日之思想解释”。汪荣宝虽然承认古代学者受“君相权威”和“儒学之流弊”影响，使“一切学问皆束缚于旧例故格之形式”，但他对于传统的学术批评较温和，认为传统史学“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之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

14日　《游学译编》在日本东京创刊。

该刊由东京游学译编社编辑、长沙矿务总局发行，系湖南留日学生杨笃生、周家树、陈天华等创办，黄兴亦参与编辑。该刊设有“学术”、“历史”等栏目，先后刊载了《十九世纪学术史》、《政治学说》、《记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埃及亡国惨状记》、《史学肆言》、《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十九世纪欧罗巴历史之壮观》等译著。

30日　陈怀在《新世界学报》第9期发表《学术思想史之评论》。

作者指出“学术之辨”为“史氏大宗”，故分析“欧美之载籍”，发现各学科“莫不有史，而惟学术思想史最精”。中国学术“于史籍为附庸”，不仅不重视且“无特别之学术思想史”，此乃是“中国数百年来学术日衰日弱日趋于窳败”以至于外人讥我无学的原因之一。考察中国古代有关学术思想的学术史载籍，非简即误，以至于难以继承认识前人之思想

学术。作者在文中还认为秦汉以后，“百氏之学，后世不复专门”，导致“天下有杂家而无专家”，于是学派“无正宗”，而“部次书籍者”乃“弃七略而为四部也”。

黄节在《政艺通报》第 22 期发表《国粹保存主义》。

文章提倡国粹保存主义，并重新界定了“国粹”的含义，即“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

是月　顾燮光编、徐维则增补《增版东西学书录》出版。

徐维则辑《东西学书录》曾于 1899 年出版，蔡元培序。此次增补再版，有本年 10 月蔡元培再序。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史志”按先通史，次编年，次古史，次专史，次政记，次战记，次帝王传，次臣民传记方式编辑。

通史包括：《万国史记》、《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东洋史要》（徐维则补，简称“徐补”）、《泰西新史揽要》、《欧洲史略》、《欧罗巴通史》（徐补）、《西洋史要》（徐补）、《欧洲近代史》（顾燮光补，简称“顾补”）。

编年包括：《万国通鉴》、《四裔编年表》、《和汉洋年契》、《历代帝王年契》、《中等教育日本历史》（徐补）、《日本新史揽要》（徐补）。

古史包括：《万国通史前编》（徐补）、《古希利尼建国考略》（顾补）、《希腊志略》、《亚述国沿革考》（顾补）、《罗马志略》、《腓尼基喀颓基考》（顾补）、《马其顿考略》（顾补）、《犹太地理择要》、《埃及述略》（顾补）。

专史包括：《支那通史》（徐补）、《清史揽要》（徐补）、《支那最近史》（徐补）、《大英国志》、《英国纪略》（顾补）、《俄史辑译》、《俄史译要》（顾补）、《法兰西志》、《联邦志略》、《米利坚志》、《日本外史》、《日本维新史》（顾补）、《日本维新始末》（顾补）、《日秘史》（顾补）、《高等小学日本史》（顾补）、《特兰士拔尔建国记》（顾补）、《暹罗考》（顾补）。

政记包括：《支那文明史论》（徐补）、《列国变通兴盛记》、《列国现状》（顾补）《英俄印度交涉书》、《英俄争中部亚细亚始末记》（顾补）、《英兴记》、《俄罗斯经国大略》（顾补）、《俄罗斯近状》（顾补）、《俄国政治通考》（顾补）、《俄政考略》（顾补）、《俄国秘事》（顾补）、《美国政体》、《法政考》（顾补）、《明治法制史》（顾补）、《埃及政柄记》（顾补）。

战纪包括：《东方交涉记》、《欧洲各国和战表》（顾补）、《土国战事述略》、《俄土战纪》、《印度蚕食战史》（顾补）、《闽江观战记》（顾补）、《中东战纪本末八卷续编》、《中东战纪本末三编》（顾补）、《记美日两国战争缘起》（顾补）、《美西战纪本末》（顾补）、《美人侈谭战略》（顾补）、《英攻黑人日记》（顾补）、《斐南战衅推原》（顾补）、《拳匪纪事》（顾补）。

帝王传包括：《环球国主表论》（顾补）、《天下各国帝王总统姓氏即位年岁表》（顾补）、《华盛顿传》、《欧洲八大帝王传》、《英维多利亚大事记》（顾补）、《英君主维多利亚一代内所增属地情形记》（顾补）、《彼得中兴记》（顾补）、《德王纪略》（顾补）、《威廉振兴荷兰纪略》（顾补）。

臣民传记包括：《古雄逸语》（顾补）、《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俾斯麦传》（顾补）、《渥雅度小传》（顾补）、《日本龙马侠士传》、《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传》（徐补）、《明治中兴云台图录》（顾补）、《日本维新三杰传》（徐补）、《维新三杰事略》（顾补）、《日本近世名人事略》（顾补）、《日本中兴先觉志》（顾补）、《开辟美洲阁龙航海家独列几合传》、《高隆传》（顾补）、《古克传》（顾补）、《爱尔兰威廉母传》（顾补）、《伊达邦成传》（顾补）、《巴思端尔传》（顾补）。

是年

孙中山嘱托刘成禺编撰太平天国史。

20世纪初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之时，孙中山鼓励并支持革命党人重书太平天国史。1902年，孙中山与刘成禺谈话时说“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他授意刘成禺从宣传民族革命的角度，编纂全新的太平天国史著，“此吾党不朽之盛业，子宜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细大皆录之”，嘱托刘成禺“搜罗遗闻”，以曾根俊虎之《满清记事》为基本，“再参以欧美人所著史籍”来“撰著成书”，以“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曾根俊虎遂以《满清记事》，孙中山以英人呤唎所著《太平天国》两册，犬养毅以“另一英人”所著 *Taipen Rebellion* 交给刘成禺。

袁宗濂、晏志清辑编《西学三通》由上海文盛堂石印。

此书篇幅达508卷之巨，包括“西政通典”、“西史通志”与“西艺通考”。《西史通志凡例》曰：“郑氏《通志》之作，盖病断代史之隔绝不通而通之也，故汇采历代之史，一以贯之，法至良也。若西史更琐杂不一，非贯不能通。特施其义，不同效颦。”

“西史通志”目录为：太古志 2 卷，日本志 14 卷，印度志 7 卷，亚洲各国志 2 卷，欧洲罗马志 1 卷，法志 8 卷，英志 7 卷，德志 2 卷，希腊志 2 卷，俄志 9 卷，欧洲各国志 1 卷，非洲各国志 1 卷，美洲志 4 卷，美洲各国志 1 卷，澳洲各国志 1 卷，疆域志 28 卷，沿革志 12 卷，兴盛志 4 卷，战伐志 8 卷，礼俗志 2 卷，图籍志 1 卷，人物志 7 卷，编年表 4 卷。由此类目可见，日后通行的“国别史”与“专门史”已成为编纂“西史”的主体架构。

曾廉开始据《元史》编《元书》。

曾廉编《元书》102 卷，其中纪 15 卷、志 10 卷、列传 76 卷、自序 1 卷，1911 年在友人的资助下刊刻行世。曾廉自称，他编撰《元书》的目的，主要是有感于旧《元史》没有完全遵循《春秋》的褒贬标准，欲“继麟经之志，而后君臣之位定。君臣之位定，然后邪说不敢肆，而《春秋》之义行矣”。他重新铺排史事，主要是以封建纲常对《元史》进行修改。在处理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上，极力仿效“《春秋》笔法”，以褒“忠直”、斥“奸臣”为宗旨。《元书》主要依据《元史》删定而成，总篇幅较后者少得多，唯对直接体现封建纲常思想的内容有所扩充。该书被认为是以封建卫道自居，系补修元史各家中最不足取的一家。

丁谦《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出版。

作为晚清舆地学考证派的代表，丁氏承道咸以来治西北地理之成果，并参较西史，对舆地学的内容扩充和方法拓展都有推动。

此套丛书分为两集，共二十七种。第一集为《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正史中地理志及外国传记的考证。第二集为《穆天子传》、晋释法显《佛国记》、后魏宋云《西域求经记》、唐释辨机《大唐西域记》、唐杜环《经行记》、元耶律楚材《西游录》、《元秘史》、《元圣武亲征记》、《先经世大典图》、元张参议耀卿《纪行》、元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刘郁《西使记》、图理琛《异域录》等地理书的考证。

该丛书主要研究边疆地理和外国地理，多为填补空白之作。

王舟瑶入京师大学堂讲授经学和史学。

王舟瑶的《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共七章，自三皇五帝至隋唐五代，采用新式“章节体”，不过王舟瑶认为章节体与中国固有的纪事本末体无异。全书内容实际相当于学术史，他认为“学术为政治、风俗、教育之原素，历史上种种之现象，无不根据于是”。尽管作者强调“读史宜以

正史及通鉴为最要”，但也同情于所谓中国无史、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的主张，认为“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为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当下编写中国历史应多参考国人之书，“中国旧史，病在于繁，不适时用。日人新编，较为简要，且多新识”，“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有志者能自为一书，则善矣”。

作者主张在研究本国史的同时，也要留心外国史。以便知己知彼而战胜之。

（日）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由广智书局出版。

全书分三编，每编区以章节，第一编论安石时代之政治和财政，第二编论新法之主义、总说、纲领、由来，第三编论新法之所短及其所长。

（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杨志洵译《中国学术史纲》由开明书店出版。

该书采用篇章“近世新史家之例”，共分为六编，梳理了从太古到清代的中国学术情况。沈兆祎在《新学书目提要》中认为，“为学术各有发达，放一奇异之光彩，不免近阿谀。盖中国之学术名儒之实际，有非扶桑雏儿所能得其梗概者，若小说、戏曲不过文人游戏之笔，何与于学术”。

出洋学生编译所《世界大事年表》由普通学书室印行。

此表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至1902年的中国、日本和世界大事。

王树枏《墨子斠注补正》2卷由中卫县署刊印。

张金铃《十七朝史事今论》刊行。

王廷熙、王树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46卷由上海久敬斋刊印。

（日）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亚西里亚巴比伦史》由广智书局出版。

（菲）棒时著、东京留学生译《菲列宾独立战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作新社编印《哥萨克东方侵略史》出版。

1903 年

※ 刘成禺发表《史学广义内篇》，鼓吹书写“人种史”。
※（日）浮田和民撰《史学通论》译刊。
※ 曾鲲化著《中国历史》出版。
※（英）巴克尔著《英国文明史》译刊。
※ 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
※ 丁保书撰《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
※ 刘鹗编《铁云藏龟》问世。
※ 章太炎撰成《清儒》篇。

1 月

8 日 《大陆报》第 2 期“论说”栏刊载《近世世界史之观念》。

该文指出，中国在闭关时期“知识未周，见闻不广，并不知有亚洲，遑问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无闻焉”，但是海禁开放后的数十年来，西方事物涌入，“宗教、贸易、外交、学术、技艺之会通，我国民耳濡目染”，“则世界之观念，宜其勃然兴起，以成世界史，而沾溉同胞矣”。

13 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 23 期发表《政论与科学之关系》。

邓实指出，“今日日本之输入泰西学术，输入其政论者耳，吾国转贩泰西学术于日本，亦转贩其政论者耳。夫政论喜理想不喜实验，其学说一干而少枝叶，可外袭而能（如自由平等民权之说是），故其风潮入少年之脑筋也易，科学重实验不重理想，其学说皆万枝万叶，未易耳，其根干非可由外袭也，故其风潮入少年之脑筋也难，唯易，故学人之好为政论者多，唯难，故学人好为科学者鲜”。邓实对此深为担忧，认为“东瀛学风其影响于吾国学术界者唯政论，唯有力焉，而吾国学界青年之思潮，而唯喜政论而不喜科学，将来流弊恐为吾群之害，有非新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吾甚愿诸君子之一审焉”。

29日　刘成禺在《湖北学生界》第1期发表《史学广义内篇》。

第3期连载。刘成禺在此文中旗帜鲜明地倡导“人种史”研究。他在小序中指出，导致香港人、台湾人、北京人、天津人甘为外人统治的原因就是“吾人种的历史不发达”，“史界不转运”，“予种”将“淹葬于民族帝国主义世界之风潮中”。文章从“历史上人种之关系”、“人种的历史之范围”、“历史上无人种学之害”、“有史以前之人种”等方面来叙述应该如何书写中国历史。刘成禺在此文中不仅以西方史学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有别于梁启超《新史学》的批判，认为“吾数千年史学专家知有一姓史之断代而已，知有一朝史之纪年而已，知有争正统争年月日历之法例而已，未闻直叙盛衰兴亡之理，为吾人种而作史也。茫茫黄帝子孙，来不知由何地，始不识由何年，陵夷达折，残灭吾种而未有已也”，还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为人种竞争之历史，旧历史之缺点不去，必不能养成国民反对异种，独成一历史”，故新史学是“考究人种进化顺序及法则之学”，而“新历史家”要学习西方史家著史，“以人种为命”，“树种族为史骨”，叙述一民族存在繁衍之情况，“开拓吾民族精神”，“使生爱种之遐心”，“画保种之良策”。

刘成禺在文中还指出，有史以前之时代，分为三期，为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要“考见”有史以前之人种，要依靠“古物发现学”、“歌谣想象学”、“土俗状态学”。

刘成禺此文对当时反满革命者的历史编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焘在《湖北学生界》第1期发表《黄梨洲》。

第5期连载。作者认为“英雄者，非一身一家族之名誉，而全体历史之名誉”；“英雄者，实孕育全世界之母也”；“英雄之数富者其国富，英雄之事业强者其国强”。在这种英雄崇拜和英雄史观的作用下，作者将“埋没于悠悠是非”中的“同种之英雄”黄梨洲发掘，称其为“复仇勤王兼忠孝之两德”的旷世英雄，此文开启了晚清赞颂明清之际英烈贤人之风。

是月　（日）浮田和民撰、侯士绾译《新史学》（《史学通论》）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此书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印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发行。全书八章，论及历史的特质以及范围、历史之定义、历史上之价值、历史与国家、历史与地理、历史与人种、历史上之大势、历史研究法等诸问题。作者博采西方史学名家之说，系统扼要地阐述了近代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一般认为，该书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是梁

启超撰写《新史学》等最主要的参考书。

此书一时好评如潮。在《史学通论》中译本出版前，章太炎就托人购买，以为其“于修史有益”。中译本出版后，闽学会及《苏报》、《游学译编》等刊物纷纷登载广告大力推介，或称其于史学宗旨“阐发无遗，其中蕴奥，能一取而观之，亦可以定读史之方针矣”。

此书在中国出现过多种译本：（1）李浩生译《史学通论》，上海作新社刊，杭州合众译书局 1903 年 2 月印行；（2）罗大维译《史学通论》，上海作新社刊，进化译社 1903 年 10 月印行；（3）刘崇杰译《史学原论》，闽学会出版；（4）杨毓麟译《史学原论》，湖南编译社发行。此外，《北洋官报》自 1904 年 1 月连载刘崇杰译本的节略本，后又汇编为一卷。杭州合众译书局还出版了李浩生、刘崇杰译本的合刊本。可见当时此书在学术界流行之广。

2007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有邬国义编校的《〈史学通论〉四种合刊》，收录李浩生、侯士绾、刘崇杰、罗大维四个译文。

2 月

2 日 《湖北学报》创刊。

该刊比较重视历史研究，先后连载过《东邦近世史》上卷（田中萃一郎著）、《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史》（佐藤傅藏著）、《春秋时代国际公法考》（新见吉治著）、《十九世纪宗教史》（真冈湛海著）、《历史与经济的关系》（萨格孟著）等史学著作。

7 日 《大陆报》第 4 期刊载《世界文明史提纲》。

第 5—7 期连载。

11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25 号发表《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

第 26、54、56 号连载。文章不仅历述克伦威尔的生平事迹，亦叙及英国革命时期的时代情势、国会等，是中国人研究英国宪政史、现代化史的早期论著之一。

12 日 高步云在《新世界学报》第 10 期发表《论周末诸大家学派与中国历史之关系》。

第 11、12 期连载。文章认为自黄帝至今，“中国之文明精神惟周末百余年间最发达，故惟周末诸大家之学派关系于中国历史尤密切”，诸大家所铸造之学派“为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是即中国历史之精神之发达也”，故文中对周末诸大家之“宗旨”、“理想”、“学说”、“施用”一

一论说。

13日 《直说》第1期刊载《俄罗斯蚕食中国史》。

该文从1643年沙俄第一次侵略黑龙江流域写起，系统地揭示了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历史。

16日 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11期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

作者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中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之人也。马克思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文章还附有《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

17日 叶公在《浙江潮》第1期发表《印度灭亡之原因》。

第5期连载。作者从"印度之地理上关系"、"印度之民族上关系"、"他族之侵入频繁"、"欧人侵略印度的情形"等角度，研究了印度灭亡的原因。

27日 《新世界学报》第11期刊载徐景清译《论经济历史研究之必要》。

该文指出，要知农工商兴衰之由何在，"必藉历史之观念"，且"历史之观念乃研究泛百学术所必经之阶段"，但是日本经济学界只知沉迷于"欧美之学说"而不借助日本历史来研究日本经济，导致经济学脱离日本实际，故作者提倡"挟历史观念"研究经济学。

是月 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由支那翻译会社出版。

据郑逸梅云，此系黄炎培、邵力子、张伯初编译。编译者痛感传统旧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而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所以取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所著《支那史》"关系于文明之进步者"，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此书。《新民丛报》第32号"介绍新书"栏目推介说："本书据日本市村、泷川两氏所著之《支那史》，去其廿四姓家乘之事实，而刺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编译而成。……吾国今日无佳史，得此亦庶足供浏览，若用以为教科书，亦一善本也。"此书颇受时人所重，多次重版，曾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

罗振玉编撰成《陆庵孴古录》。

罗振玉在序中指出，封泥虽在金石诸品中晚出，但是却有考见古代官制、考证古文字及考见古艺术等作用。

商务印书馆编辑《国史初级教科书》上下册出版。

该书率先在历史教科书中采用大小字配合编排的方法，正文采用大字，小字处理人物简介、事件背景、细节等，这不仅使内容活泼，吸引儿童学习，而且增加了许多正文不能包括的内容。

3月

4日　梁启超赴北美大陆，开始为期十个月的游历。

返国以后，梁氏“以两旬之力”将随笔所记整理为《新大陆游记》出版。此次游历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起到重要作用。由于自身思想的改变和拘牵于具体事务，梁启超的史学论著出产日少，逐渐淡出“新史学运动”。

18日　匪石在《浙江潮》第2期发表《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

第3、5、6、8、9期连载。作者认为，“中国之历史与世界异，故中国之英雄亦与世界之英雄异”，因为中国无国史，所以“可以髻发，可以辫发，可以忽髻发，可以忽辫发”。郑成功是中国少有的自有之英雄、爱国之英雄，应受到特别的崇拜。

是月　京师大学堂颁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

该书目规定中外史学门的教材包括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潘世恩《读史镜古篇》等，同时为了满足当时大批新兴学校历史课本的急需而“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诵习”，更多的则直接译自日本教科书，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上海广智书局），那珂通世之《支那通史》（东文学社），河野通之辑《最近支那史》（振东室），《世界近世史》（作新社），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东文学社），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译《西洋史要》（金粟斋），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东亚译书会）等。

（日）三岛雄太郎《支那近三百年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4月

12日　何负在《经济丛编》第23期发表《世界交通史略》。

第24期连载。

17日　大陆之民在《浙江潮》第3期发表《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

第6、7期连载。文章不仅从宏观上对18、19世纪进行了概括叙述，

还对18、19世纪的政治（如法国革命运动、波兰社会党等）、社会（如物质的进步、社会的不平等）、经济（如殖民地兴起、工业革命）、文化（如思想界的革命、平民主义、民族主义）等进行了系统解析，最后在此基础上还对20世纪进行了展望。文末有附录一篇，为“造时代的英雄”，介绍了张伯伦、罗斯福、德国皇帝和发明家爱迪生等人。该文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欧洲18、19世纪史大纲。

22日　《智群白话报》第3期刊载《古今年代表》。

30日　高尚缙、沈惟贤《万国演义》60卷由上海作新社出版。

全书“溯自地质物迹之始至于五洲剖别，泰东西诸国以次递兴，下迄十九世纪，先后五千年种族之盛衰，政体之同异，宗教之迭嬗，艺学之改良，崖略粗具”。内容包括地圆说、地质分层、五洲划分、五色人种以及亚当创世、古代文明国家（埃及、希腊、印度、罗马）的“宗教”与“艺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彼得一世改革、三次瓜分波兰、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对外战争、日本明治维新、意大利独立、德国的统一等，并对近代西方政体有所考察。

该书一方面以“文贵征实，不蕲于振奇”为指导，在每卷后都列出所引的西史著述；另一方面，强调通俗性，目的是要使“童稚可通”、“乡曲能记”，故“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之用，特为浅显之文，使人易晓”。同时，作者更欲以此充当教科书，“欲为学科达目的，非欲于小说界争上乘也”。1903年4月《大陆报》第5期《万国演义》广告曰：“其事理宏达，宗旨纯正，洵学界玮丽之钜观，教科切用之佳本。”

5月

10日　观云在《新民丛报》第31号发表《中国上古民族之史影》。

16日　公猛在《浙江潮》第4期发表《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

第5、7、10期连载。

是月　严复译《群学肄言》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该书据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而成，书中对“新史学”屡有阐述，如在《砭愚第一》中惋惜良史少见、批评旧史“重君史”轻“民史”的现象，“其有高识远瞩之彦，为之甄综史志，要删国闻，以求其变灭之源委，则累世不一遇”，“前史体例，于国事常载其然，而不载其所由然，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有不录。

故一群强弱治乱盛衰之故，至为难知。而积厨连轸之书，只以纪淫侈爽德佞幸亵琐之秽迹，兵家战伐纷论，焚轰相斫，朝党袄师，阴谋秘计，佹得佹失，于治理何关焉？则置之无足道也”。在《情瞀第七》中还揭示了“民治未开”、“尊君卑民之义”积毒导致的愚昧、“古之说在专制一君”等造成“史之所载，舍君若臣之言行无以云”和信史难得古史污秽的原因。严复在翻译时还补充指出“史家所以独详君公而不及民生”的原因，是他们为“缘尊尚权力之情瞀耳”。严复显然认同斯宾塞对历史的期望，即“世运进退”不仅仅是“贤圣豪杰”在起作用，所以国史并不仅是“人豪之国史”，“历史纪传之所载诵者，积声明文物，以为其群之成绩，亦于此可以得其种民治化之天演也”，历史要“民生风教兼收”，以开民智去愚昧。

曾鲲化编著《中国历史》由东新译社出版。

此书上卷是作者留日期间，参考东西洋名著及中国史籍编成的历史教科书，署名“横阳翼天氏”。首编四章，总论历史之要质、地势、人种和历代兴亡盛衰；甲编太古记七章，乙编上古记十章，叙三皇五帝至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沿革、文化、经济及社会诸情状。

曾氏认为，历史应“记录过去现在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而纪念国民之美德，指点评判帝王官吏之罪恶，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中国历史》即旨在“调查历代国家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撮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作者声称“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该书体裁受到当时东西方文明史的影响，“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内容广涉各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尤致力于探讨人群进化大势和盛衰隆替之因。该书序言在《政艺通报》第 9 期以《中国历史出世辞》为题发表。

《游学译编》1903 年 4 月 12 日介绍《中国历史》时认为“其材料，精选东西洋名著支那历史二十余种，及中国诸类朝史野史，上自古碑石记，下至昨日新闻，莫不一一搜罗而熔铸之。其内容，支配教育、学术、政治、外交、武备、地理、宗教、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诸要点，淬厉固有之特质，绍介外界之文明。其体裁，仿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分编章项节，以孔子为纪元，而文明（字）所不能尽者，详之以图，图所不能穷者，通之以表”，“痛国家之不血食，愤种族之将犬羊，特输万

斛热诚，为四万万同胞编辑中国历史，叙述中国大国民之社会如何起源，如何发达，如何变迁，如何进化，及盛衰隆替之因果、小退大进之关系，而绳钺之，而纪念之，而指点评判之。其宗旨，发挥光明正大之民族主义，激动爱国精神，斩绝奴隶根性”。《浙江潮》第7期“绍介新著”专栏称：“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然我国之史，非余一人之家谱，即强有力者同族相残之战斗记。以故人人不知国家，而为异族之奴。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1903年上海《中外日报》广告介绍说：“中国史书，类皆一姓家谱，而缺于种族情形，以致演成今日之腐败社会，殊非无因。横阳翼天氏欲以民族主义引导全国，乃取吾国政教学术风俗之要点，熔铸而贯通之，不仅体例精严，足以起二千年之衰，而图书肖像，犹觉灿烂异常，诚教科书中之有一无二者也。”

邹容《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作者在批判君主专制时锋芒及于传统旧史。他指出：在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人民只是“奴隶”而不是“国民”，“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实一部独夫民贼“争夺相杀，循环不已”的历史，中国人民“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无所往而非奴隶”，要争自由、求独立，必须“先去奴隶之根性”，粉碎精神枷锁。

（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中国文明发达史》由东新译社出版。

此书由“黑风氏”补译，“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作叙论。在此书出版前，《游学译编》预告说，是书将中国四千年来“形而上形而下之种种质点，支配于区区小册子中，而稽考其起原、发达、变迁、进化之大势，评判之，论断之，其尤有特色者，看破中国专制政治、奴隶学术之真相，屡发卓议痛诋，诚救中国之良药”。《浙江潮》认为该书对我国四千年来文明之梗概，如政治、宗教、学术、工艺、美术等，皆博采兼收，是“历史界中之珍本”。《中外日报》评价云，此书将中国古代各种文明之发达及变迁包括无遗，其“叙事处简而赅”，“议论处新而奇”。20世纪初年流传甚广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即主要经此书的绍述而风行。

6月，此书的另一种译本《支那文明史》由上海竞化书局译印。1903年上海会文学社出版普通学百科全书第67种《帝国文明史》，即由此书和

坂本健一《日本风俗史》组成，其中《支那文明史》只选译前三章。

（美）威廉斯因顿著、张相译《万国史要》由杭州史学斋出版。

此书在时间分期上采用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法，上编两册为“古代史”，涵括从上古自西罗马灭亡一段，述古代东洋诸国、希腊史事，中编两册为“中代史”，述自西罗马灭亡至十五世纪末史事，下编未见。

（日）酒井勉著、商务印书馆译《世界历史问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月

10 日　张元济在《外交报》第 12 号发表《读〈埃及近世史〉感言》。

此文即是张元济为章起渭译《埃及近世史》一书（此书 1903 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历史丛书”出版）所作的序言，又名《埃及近世史·序》。张元济指出“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都是“欧人弱国奸除异族之具”，应当以埃及为戒对列强侵略的伎俩保持警惕，“欧洲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已由近东而推至远东，凡与结接为构者，能无履霜坚冰之惧乎？虽然，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也”。

24 日　别士（夏曾佑）在《新民丛报》第 34 号发表《中国社会之原》。

第 35、36、46 号连载。在这篇文章中，夏曾佑首先指出，“人类至大之端，一曰种，一曰教，而二者常相需”。他认为在中国上古，“其优族（即外来之族）谓之百姓，其既有之族（即旧有之族）谓之民。百姓之俗尚术数，民之俗尚鬼神”，二者“至周渐合”，虽然人种与宗教已经混淆，但是“视民为异类不复措意，礼乐教化至士而止”，习成难改，“自黄帝至今无异也”。夏曾佑将上古的宗教分为“鬼神派”、“术数派”，并认为这两派在此后的作用分化，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学术与思想。如他认为老子“鬼神与术数皆不取”，孔子是去鬼神留术数，与“黄禹合”，墨子去术数而留鬼神，“与苗民合”。他认为“天下之治起于宗法，而孝为其本原，天下之归于复归，而忠为其断限，故忠孝者，孔教之根据也”。孔教不用鬼神之害，久而形成了“畏死”、“重子孙”、“无信”，夏曾佑认为，“有此三根，而辗转而生之习俗又不知凡几，以成今日之社会也”。仓修良认为夏曾佑在这篇文章有“极力夸大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孔子儒教的作用”之嫌。

25 日　黄纯熙（黄节）在《政艺通报》第 10 期发表《东西洋民族交通消长之大潮》。

第 11—14 期连载。该文分别从“旧日之交通”、“近世之交通”、“印度航路发现后东西洋民族之交通”等方面对东西民族的交往史进行了梳理概括。

是月　（英）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印。

此译本分五篇，即英文原书第一卷“概论”前五章。篇一总论史学考证之原、人事齐次之理。凡人事每受制于心理、物理，故史学与格致有密切关系；篇二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篇三论心理学家考察心理之法；篇四论心德、心慧，析心理为二，曰德，曰慧。此篇发明二者之关系，于治化而较其轻重；篇五论宗教、文字、政府三者范移治化之力。

此书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推崇。陈黻宸读后，赞叹“善哉《英伦文明史》曰：天下精微之理，极数千年，通人学士竭虑研思，万方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见闻之间，而其理悉备”。《政艺通报》新书广告介绍此书重译本谓其“考据精确，议论宏伟”，“学者手此一书，当有百读不厌之趣”。

此书中包含的许多重要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新史学”思潮中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注重文明史的趋向，研究历史中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以及探讨历史学和科学的关系问题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巴克尔的启示。

据俞旦初所言，此书又先后出现过四种中译本：（1）林廷玉通过日译本转译的《文明史论》；（2）王建祖译《英国文明史》；（3）1906—1907 年《学部官报》第 3—28 期刊载魏易节译的该书前三章，名为《文明史》；（4）1936、1946 年，胡肇椿译《英国文化史》上中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邵希雍译《万国史纲》由上海支那翻译会社发行。

全书共三编，谢无量作序。此书重于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宗教、文学等文明史内容，对“历史之对于世界文明，有如何影响，则一一论究，莫或遗焉”，而略于“王侯将相之事迹”等。故原著者认为该书亦可称为《万国文明史纲》。梁启超称该书详于“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拘于其陈迹”。

1903 年 7 月 1 日《中外日报》出版广告云：“欲知万国文明之变迁，

且研究二十世纪之新史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1904 年 3 月 24 日《中外日报》为再版《万国史纲》刊登广告谓：“是书去年五月间初印二千部，大受一般学者之欢迎，谓原书体制完密，译笔亦复明锐雅洁，于新史学界放无量数异彩。今复补印二千部，披沙炼金，益求美备，骎骎乎欲与祖国班马骖靳。世之究心史学者，当有同好焉。”

1908 年，学部将此书审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学部审定书目提要》称该书“通体叙述简明，颇挈纲要，而于历代之政治学术，则再三致详，可为繁简得宜，采撷有法。惟近世编挂漏太多，难为完全教科之用。盖近来西力东渐月异岁殊，必须一一讲明，始为有益。查本编说美洲事已至千八百九十三年，而言中英之事仅至南京条约，似未臻完备。即以全书体例而论，前于希腊罗马既详，言其学术则近世各种学术之发明尤不当无所记载……再本编所纪仅域西洋，题为万国，亦嫌未合”。

7 月

24 日　柳亚子在《江苏》第 4 期发表《郑成功传》。

作者对中国“无民族精神”的状况感到悲痛，呼唤可“排异种与殖新地”，使中国能“凌欧而架美”之英雄。柳亚子的理想是“使天假之年，内驱异族还我河山之后，余力犹多或尽取南洋诸岛，争霸权于海上，辟属地于环球”。基于此，柳亚子为可“焕扬我祖国之荣光”郑成功作传。该文是晚清革命知识分子所撰的民族英雄传记较早的一篇。章太炎读后致信柳亚子，认为该文“于斯时发现，可谓智勇参会，飙起云合者也”。

《汉声》第 6 期译刊《史学之根本条件》。

第 7、8 期连载。该文系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第 4 卷“史论篇”中一部分内容的翻译介绍。日本史学界元老坪井九马三，1891 年从德国留学归国，开始给日本史学界“带来了西洋近代史学的方法论”。《史学研究法》结合介绍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丰富地引用了有关日本史著”，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史学确立的标志之一。

坪井序云：“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倡言讲史者须先自研究法始，其论既已脍炙人口。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之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予虽不敏，讲述史学研究法，已有年历，自信应用科学研究法于史学上聊有所得。因此，为早稻田大学著是书，庶几乎与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

25 日　（日）高山林次郎《世界文明史》由作新社翻译出版。

此书首绪论，分三编：第一编非文明史的人类，凡两章；第二编东洋之文明，凡六章；第三编欧罗巴，凡九章。《世界文明史》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曾作为学堂教科书使用。《大陆报》1903 年 2 月 7 日所刊广告认为此书专发明政治、经济、宗教、学术，凡有关于人类社会之进化者，皆能精透说明之，“诚为文明进步时代所不可阙之善本”，欲求文明进步者，“其举此为圭臬”。《新民丛报》第 36 号广告云：“世界文明愈趋愈进，然皆有所自来。是书分纪东西洋各国政教学术，循流溯源，凡有可为今日文明之证者，无不备载。展卷读之，不啻萃全世界民族之精华，供吾赏玩。即欲去野蛮而进文明，亦可以识其途径。负文明思想者曷取读之。”梁启超评此书叙述全世界民族文明发达之状况，自宗教、哲学、文学、美术等，一一具载，“可以增学者读史之识”，而此书仅至 18 世纪戛然而止，未见继者，“良可惜也”。

同年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译本，该译本曾以《世界文明史提纲》之名连载于《大陆报》第 3—7 期（1903 年 2 月 7 日—6 月 5 日），后收入 1905 年作新社出版的《政法类典·（甲）历史之部》。

是月　萨幼实译《东洋文明史》由支那翻译会社出版。

8 月

6 日　观云（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 35 号发表《中国人种考》。

第 37—43、46—48、53、54 号连载。文章共八章，分别为“人种始源二派之论说”、“人种之多源一源及其产地种类”、“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西亚文明之缘起”、“西亚之种族”、“中国人种之诸说”、“昆仑山”、“结论”。作者最后列出了“挪亚时之洪水与尧舜时之洪水不同”、“令中国人种果由巴比伦来，当属迦勒底之阿加逖人而非塞米的种”、“上古汉人先居黄河之南而后居黄河之北”、“以黄帝为最古之教主”、“老子为老聃，非有他人”等二十五个结论。钟敬文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中指出，该文对古代神话、传说的运用和研究，“正是我国近代史学界在古史论述方法上的一种新开辟”。1906 年新民社将此文单独印行；1929 年 11 月，上海华通书局出版该书（又补充了他人写《中国民族西来辩》、《中国人种考源》两文）。

明夷（康有为）在《新民丛报》第 35 号发表《官制议》。

第 36—43、46—48、50—52 号连载。文章包括官制原理、中国古官制、中国后汉官制、宋官制等内容。

7 日　寄斋在《经济丛编》第 30 期发表《中国上古民族之史鉴》。

8 日　《国民日日报》第 2 号刊载《箴奴隶》。

文章揭示专制统治使人民沦为奴隶的诸种原因，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首先是“历史”的原因。文章指出，“历史为进化之义”，本来应该达到“使国民日趋于高尚”的目的。但是我们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历史”，只是“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入奴隶之宝筏”。“历史”完全掌握在“独夫民贼”的手里，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绝无民义可知”。“独夫民贼”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乃搜集前朝遗事，号曰史记，设局以编之，置官以掌之。以当年之效死于我者，既感其德，复苛以罪，曰某某贰臣，某某叛逆；当年之抵死于我者，既道其噬，复贡其谀，曰某某忠憨，某某节烈，意谓此种奴隶，吾先利用之以墟人国，今仍利用之以立吾义，毒鞭之更轻拂之，使人坠落奴隶而毫不知觉”。“中国三千年历史之功效”，不过如此而已。

15 日　《国民日日报》刊载《说君》。

16—21 日连载。

21 日　无畏（刘师培）在《国民日日报》发表《黄帝纪年论》。

作者提出废除以帝王纪年的方式，采用以黄帝纪年。刘师培参照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纪年法，反对以清廷皇帝年号纪年，提出采用黄帝纪年，“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刘师培宣称：“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原。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

有关黄帝纪元的讨论为当时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报刊所关注。《江苏》第 3 期刊登《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印行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陈天华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歌唱黄帝“始祖公公”，并且刊载黄帝像。1905 年宋教仁又将此像刊登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论著。《国粹学报》也连载黄节撰写的《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念之说”。1905 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取这种纪年方法，并在首页刊出黄帝像，作为象征性标志。武昌起义时，还曾经以这种纪年法发布文告。但黄帝纪年并不统一，“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文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

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该文发表后，一时间“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此“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

刘师培提出的这种纪年方式，是出于反满需要。他说：“故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状，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德）布列《世界通史》上册由上海通社出版。

下册该年10月印行。本书由特社（马幼渔、廖淦亭、范均之）译补，贺绍章作序例。全书分古代史、中古史、近世史三编。

《浙江潮》第6期广告云：“本社以德文原书为本，而参校英译、和译二书，考订增删，期归完善，凡人名、地名及各种名词，均依我国旧译沿用既久者，及近时著名新译本所酌定者，悉心校正，前后一致，且悉以英译本文按次增列，以便检查，而复于篇末加以按语，览其时势，述其变异，提其纲要，而抉其脉络，实历史界空前绝后，最占特色者也。”《新民丛报》亦许之为“最为读史简要之书”、“洵史学界所当欢迎之书”。

1903年12月9日此书出版叶瀚译自日本和田万吉译本的镜今书局本。叶瀚译本反响亦佳，《中国白话报》第1期所登该书广告谓“译者叶浩吾先生学术文章久为学界所推重，复竭年余之力，始成此篇，其评审不问可知”，实则叶瀚译本质量不及特社译本。

是月 （日）奥田竹松《法兰西革命史》中译本由上海明权社出版。

此书是秦毓鎏、张继、蒋百里等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集体翻译的第一部著作。他们认为法国革命“破封建之遗习，灭专制之恶政，以树民主平等之新旗帜”，故翻译此书以鼓吹民族革命。《浙江潮》第7期“绍介新著”中指出，此书翻译质量较高，称“改订再三，始行出版”，且“译笔之简洁，地名人名悉据旧译”，是“近日译界中之少见者也”。该书共三篇七章，探讨了法国革命的远因、近因及过程。

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还有冯自由译的《法国革命史》（1900），支那国民军译的《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1903），《游学译编》刊载的《记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1903），明夷（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法国革命史论》（1906），寄生（汪东）在《民报》发表的《法国革命史》（1907），沈炼之《法国革命史讲话》（改进出版社，1914），寿龄编《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1、1944），郎醒石、张国人编译《法国革命史》（上海民智书局，1928），威廉·布洛

斯著、李季译《法国革命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马宗融撰《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34），Albert Mathiez 原著、杨人楩译注《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47），迪野著、唐虞世译《法国革命史》（中华书局，1948）等。

9 月

6 日　马叙伦在《政艺通报》第 15 期发表《史界大同说》。

第 16 期连载。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实现"史学大同"的主张。他以为欧美"其于史殆亦能大同之观念"，"故有政治史而复析为法律史、理财史；有学术史而复析为哲学史、科学史，美词有史，修文有史，盖骎骎乎能析史而万其名矣"。他认为，"中国史之所以衰"，是因为"中国殆尚震慑于史名之尊一，若史者有不可及之阶级，非大通者不能作"。所以，为了振兴史学，"自兹而后，史宜以大同观"，这就是说，"去群籍之名，而总称之曰史，是则析史而万其名，不仅守政治、宗教、教育、学术，而凡立一说，成一理者，莫不谓之史是。"他认为，史乃群籍的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斤斤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划分而作茧自缚。马叙伦说："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

《游学译编》第 10 册刊载《史学肄言》。

该文内容为史学方法论，主要说明，"以最狭义言之"，历史"实不过民族之历史"，而"民族精神之横竖二方面"，即民族的社会精神和历史精神。"民族之所资以生活者，有物质之财产，有精神之财产"。"中国四千年已往之精神，即今固不能断绝"，就是将来"有崭新之精神"，也"必非四千年前之精神分量画井而不相连续者"。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精神都不能割断，才能进化发达。

10 日　沈兆祎编撰《新学书目提要》由上海通雅书局出版。

前 3 卷 1903 年出版，第 4 卷 1904 年出版。该书卷 2 为历史类，以"历史一门最切于今日学界，亦莫杂于今日学界"（《历史类总叙》）。其所著录，将中外史学汇为一编。

其所收书为：《万国历史》、《万国兴亡史》、《世界近世史》、《万国史

纲目》、《西史纲目》、《世界史要》、《欧罗巴通史》、《泰西通史上编》、《东洋分国史》、《支那近三百年史》、《特兰斯法尔》、《飞猎滨独立战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苏格兰独立志》、《英国维新史》、《佛国革命战史》、《美国独立战史》、《印度灭亡战史》、《希腊独立史》、《南阿新建国史》、《近世海战史》、《东方兵事纪略》、《国民同盟会始末》、《可萨克东侵略史》、《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清俄关系》、《近世露西亚》、《腓尼西亚史》、《亚西里亚巴比伦史》、《犹太史》、《希腊史》、《埃及史》、《波斯史》、《阿剌伯史》、《土耳机史》、《日本维新慨慷史》、《德意志史》、《亚美利加洲通史》、《英兰觇国记》、《埃及近世史》、《法兰西近世史》、《成吉思汗少年史》、《亚历山大》、《彼德大帝》、《拿破仑》、《恺撒》、《讷耳逊传》、《可莱武传》、《加里波的传》、《俾斯麦传》、《戈登将军》、《吉田松阴》、《日本维新百杰传》、《世界十女杰》、《岳飞》、《释迦牟尼传》、《东亚将来大势论》、《支那问题》、《现今世界大势论》、《泰西政治学者列传》、《未来世界论》、《史学通论》、《历史哲学》、《教育学史》、《东西洋伦理学史》、《罗马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纲》、《支那文明史》、《中国文明小史》。

13日　君武在《译书汇编》第3期发表《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

27日　《国民日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历史之血》。

28日、29日、10月1日连载。

是月　《国民日日报》刊载《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

该文在述评了古代限制君权的方法效果之后，以现代意识探讨了思想、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作者以为“天下有思想而后有学术，有学术而后有政治，政治之不善原于学术者也，学术之不善原于思想者也”。作者在文末指出，“三代以后之政体，皆君权最重之时代也，皆伪朝也；三代以后之学术皆文祸最重之时代也，皆伪学也。非伪学则伪朝不能兴，非伪朝则伪学不能保。伪学不除，乾坤将无宁日”。

三江师范学堂在南京正式成立。

张之洞在1903年2月5日所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中指出，“选派举贡廪增出身之中学教习五十人，分授修身、历史、地理”等科。1905年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该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中小学教师，历史舆地是其最早设立的科系之一，1908年至1909年，柳诒徵、刘师培先后担任历史教员。该校后演变为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

《教育杂志》第 59 期刊载（英）西额惟克著、王国维译《西洋伦理学史要》。

第 61 期连载。该文是较早将西方伦理学及其发展史引入中国的译著之一。

10 月

5 日　马叙伦在《政艺通报》第 17 期发表《黄梨洲先生传》。

第 18—21 期连载。文章概述黄宗羲生平，并寻找黄宗羲的现实价值。作者认为“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只有岳飞、文天祥、王夫之、顾亭林、李二曲和黄宗羲等几人。几人相较，黄宗羲“又迥乎出五先生之上”，之所以如此，主要不在于孝、忠、义、节，而在于黄宗羲“民贵君轻立说而为天下倡”的学术思想主张，作者认为黄宗羲是中国唯一可与卢梭相媲美的人物，可“不使黄人赧颜而白种人独傲也”。

吴趼人在《新小说》第 8 号开始发表《痛史》。

第 9—13、17、18、20—24 号连载，共刊 27 回。该小说据宋元有关史料，述南宋偏安事。

19 日　《大公报》第 478 号刊载《文明书局编辑蒙学中外历史教科书约恉》，对将日人著作直接翻译为教科书的做法表达不满。

文明书局这种对译本教科书的不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东新译社在《东新译社开办之原由及其特质》一文中指出“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皆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故计划出版自己编纂的文、理、商、农各科课本。国学社在《国学社编辑教科书启》中也感慨“自顷海内，明智之士，亦尝有意于教科书矣。然率勇于译述，而怯于编著，工于谈外情，而拙于言国故。甚或三千年之历史，十八省之地志，亦复求书异域，奋笔抄胥。呜呼！抑可谓穷矣”。国学社为“明内外之大别，发爱国之公心”，也要奋起自编历史教科书。

20 日　柳亚子在《江苏》第 7 期发表《台湾三百年史》。

第 8 期连载。

23 日　定一在《新民丛报》第 55 号发表《唐代西教之东渐》。

第 57 号连载。

是月　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文明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中国传统乙部之书不适合作教科书之用，故中国学堂多借用日本人的历史著作如《支那通史》、《东洋史要》等充当本国历史教科书，

但这些著作“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可惧孰甚”。所以作者“窃不自量，编成此册，以我国人述我国事”，以供蒙学、小学历史教育使用。

该书“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全书共分八编，分别为“中国之古代”、“秦汉三国时代”、“晋及南北朝”、“隋唐时代”、“五代及宋”、“元明时代”、“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我朝与外国交涉时代”。由于该书编选得当，在清末颇为通行，至1906年春，再版至20版。1906年4月，学部公布《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凡例》和《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历史教科书通过审查的仅有此书。

《国民日日报》刊载《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

该文概述了自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四十年间中国政治社会之思想主潮，指出“为一时舆论之所趋向者，即为一时之世风”，“世风”与其时代所出现之事物有巨大之关系。中国“四十年来之世风，条其大要”如下：19世纪60年代，“曾、左、李、奕䜣主之于内，而丁日昌、丁宝桢、沈葆桢之徒附之于外”，以“机器”、“制造”“喧喧于众口”，广设机器制造局及其附属机构，是谓“格致汇编之世风”；稍后，“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一名词焉，曰‘洋务’”，“朝野交哄，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是谓“经世文续编之世风”；甲午前后，于“群盲骚乱之秋”，“得盛世危言主义而实行之”，“时务”兴起，是谓“盛世危言之世风”；甲午战败后，康有为为变法奔走运动，又使弟子梁启超设立时务报为之援，“一般洋务时务之志士，靡然从风，举世若狂，变法之声，已遍满国中”，是谓“时务报之世风”；戊戌政变以后，流亡维新家创立保皇会，设立清议报，“乃收束其张三世通三统之门面语而重张旗帜”，“三年之中，百号之内”，日日张保皇之旨，攻后党之淫奸暴顽，“内地闻其说而兴起，固不乏人”，是谓“清议报之世风”；“继保皇复辟而后，产成一种新学说”，以新民丛报为阵地，鼓吹“立宪”，“耸动一时人士视听”，是谓“新民丛报之世风”。

刘鹗编《铁云藏龟》石印问世，罗振玉为之墨拓。

该书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著录拓片1058片。刘鹗在该书序文中首次指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并对干支纪年的一些词语进行了辨识。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广告称：“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于二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故出弊藏古文，拓付石印。兹先成二

种：一曰《藏龟》，乃乙亥年河南汤阴县出土。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刻于龟骨，即殷人亲笔书也。”

该书是中国甲骨学史上第一部重要书籍，对孙诒让、罗振玉等人的甲骨文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塞奴巴著，沈是中、俞子彝译《泰西民族文明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

2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41、42 号合刊发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梁启超痛惜中国四千余年北方“世世为中国患”，且中国败多胜少，只有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可谓“历史之光”，梁启超特为赵武灵王立传以树立与外族竞胜的信心。此文和 1902 年发表的张骞等人的传记构成了梁启超此时着力著述的“中国民族外竞史”之一部分。该文后附《李牧传》。

12 月

19 日　白话道人（林獬）在《中国白话报》第 1 期发表《历史》。

第 1 期所发表为第一章“人种”，第 3、5、6 期为第二章“政体”，第 8 期为第三章“交通”，第 9 期为第四章“学术”，第 11 期为第五章“兵制”，第 12 期为第六章“天赋”，第 13 期为第七章“刑罚”，第 14 期为第八章“宗教”，第 15 期为第九章“教育”。从第 9 期开始，署名为“光汉”。刘师培在 1904 年 8 月 20 日《中国白话报》第 19 期发表的《中国历史大略》中说：“我在前数册《白话报》上，登了九篇《历史》，但都是指一桩事情说的，不是指历代的事情说的。”按照这一说法，《中国白话报》上刊登的上述文章，看来都是刘师培所作。

是年

春，章太炎撰成《清儒》篇。

此文是对清代学术提纲挈领的总结，后收入 1904 年《訄书》修订本。此文对清学的分派、清儒与汉儒的区别、清代今古文经学的消长等皆有论述，实质上是一部清代学术简史。该文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文字狱高压说，一是以吴、皖中分乾嘉学术的观点。《清儒》在学术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周予同评价道：“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

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又云：“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

夏，陈天华《猛回头》出版。

陈天华以弹词说唱的形式揭露了清廷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剥削压迫国人的事实，提醒国人注意亡国亡种的危险局势。在此书中，陈天华突出了黄帝作为汉族“始祖”的地位，并初步构建了从黄帝到清初的汉族英雄与汉奸的系谱，对于推动清末“尊黄”运动和宣传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诒让撰成《古籀余论》。

此书为孙诒让在 1872 年撰成《古籀拾遗》之后另一部研究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原书二卷，孙氏在世时并未刊刻，后容庚得到此书，1929 年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刊刻，并改为三卷。1988 年，中书书局将《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点校出版。中书书局在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孙氏对铜器铭文的考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得出了一批令人信服的结论。虽然其中难免也有误释，总的说来，这两部著作体现了当时铜器铭文研究的最高水平，其研究方法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陈庆年将（日）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改编增补成《中国历史教科书》。

陈庆年认为“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依据或乖亦为匡救，与夫回易数字，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弥缝无缺”。但《中国历史教科书》并非单纯节选，而是有所完善补正。该书 1908 年被审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学部审定之书目提要》称：“原书属目于东亚全局，凡种族兴替迁移之大势，邦国侵并分合之关系，言之最详，而于一国之治乱兴亡、事实、制度，则略之。盖世界史之体例固然与国史异其宗旨者也，故其分编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间择得要，可为东洋史之善本。此编盖取中史之用，与原作者旨趣稍殊，事义较详，改错不少，……惟于历朝大事终嫌稍略。”

1903 年武昌印本仅改编至近古期元及明部分。

董鸿炜编著《中俄交涉史》由上海明权社出版。

该书共十一章，从俄罗斯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和尼布楚条约讲起，至俄罗斯在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的无理要求结束，梳理了清政府和俄罗斯交涉的几乎全部历史。

陈子祥编译《万国商业志》2 卷由广智书局出版。

本书分上下二卷，共四章，一曰太古商业志，记埃及、亚西利亚、巴

比伦、中国、印度、腓尼西亚、加塞治、希腊、罗马之商业；二曰中古商业志，记查列曼帝国、意大利、英吉利之商业；三曰近世商业志，记葡萄牙、西班牙、内则兰、法兰西、日耳曼、英吉利之商业；四曰最近商业志，记英、法、日耳曼、俄罗斯、奥地利、瑞士、西班牙、北美合众国、印度、日本、中国之商业。“盖追溯数千年上下商业关于文明发达之由，商战竞争之猛，于最近世章中尤三致意焉。至其搜辑精博，议论通畅，足为研究商学之助”。

上海作新社编译《万国历史》出版。

此书为章节体世界通史。全书三卷，分古代、中世、近世三期，叙述19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历史，注重各时代民智程度、地理物产、工商业、道德风俗、宗教美术、政治变迁及伟人业绩，旨在明历史进化之轨迹。

1908年被学部列为历史教科书，《学部审定书目提要》称“惟第三卷叙法国之乱，词语太繁，叙东西洋之关系，中间有过当语，必须删改。其余则皆纲举目张，无支离复杂之弊，而于列国形势之嬗变，各种学术之发明，尤能穷原竟委，有条不紊，每篇有总论，有约说，有分图，于教授法亦合作为中学堂外国史教科本”。

（日）山峰台著、中国汉阳青年译《续支那通史》由上海会文政记书局出版。

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是近代中国较早自日本引进的一种历史教科书，用汉文编纂，1899年由东文学社翻刻出版，罗振玉作序。此书采用章节体，以进化观点划分历史阶段。首总论，分上世史和中世史。上世史自唐虞三代至战国；中世史又分上中下三期；中世史上，自秦汉至晋并吴；中世史中，自晋南北朝至隋唐；中世史下，自五代至金章宗末年。此书还就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因事立题，分篇综论。

《支那通史》尚缺元明清史，有人就为其作增补和续编。《续支那通史》补全元明清历史，直至中日甲午战争。马雄读后，认为此书“凿破混沌，输入文明，将与欧美学者同上历史竞争之大舞台，所获岂有崖量”。1904年，文学图书公司出版日本狩野良知增订、那珂通世原本《增补支那通史》石印本。

（日）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著《支那史》由教育世界社译刻发行。

此书9卷，梁启超认为该书“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中国旧著中所无也”。1903年“支那少年”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即据此《支那史》，“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

系于文明之进步者”，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编成，又吕瑞廷、赵瀓璧据《支那史》“逐加考订正其讹误，而补其缺略”，编就《新体中国历史》一书，皆风靡一时。

《中国新史学》由上海镜今书局出版。

本书为著译文集。其例言云：“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

上海作新社翻译出版《世界中古史》。

全书十三章，起自公元375年，止于1453年，所叙实仅欧洲中古史及与其相关的阿拉伯、土耳其部分史事。

江子云等《万国历史汇编》由上海官书局印行。

此书以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区分历史时期，复以亚洲、欧洲、美洲区分地域，于列国史中寓国别史。刘师培为该书作序。

屯庐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97卷由上海蜚英书局出版。

自黄帝迄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盖欲赓续春秋罗织国际精神”，于我国古今交际诸大端略具。

秦宝瓒《遗箧录》8卷刊印。

此书为古钱币学研究著作。1926年秦氏《续遗箧录》4卷、补遗1卷由晚红轩刊印。

王闿运《尚书笺》30卷刊印。

姚永朴《尚书谊诂》28卷、叙录1卷李氏集虚草堂丛书甲集本刊印。

《清朝史略》8卷由江楚编译官书局印行。

林熙春《国朝掌故辑要》24卷由湖南官报局印行。

吴勇适译《世界史要》由开明书店出版。

（英）爱特华斯著，史悠明、程履祥译《鸦片战争史》、《中东战史》、《庚子战记》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

（日）木寺柳次郎著、章师濂等译《新译西洋历史》2册由文明书局出版。

（日）占部百太郎著、陈时夏等译《罗马史》2卷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

（日）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土耳其史》、《犹太史》由广智书局出版。

（日）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埃及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兴田竹松著、青年会编译《法兰西革命史》印行。

（日）山本利嘉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田中建三郎著、徐省三译《意大利建国史》由一新书局出版。

（美）那顿《苏格兰独立史》由商务印书馆译刊。

1904 年

※ 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 梁启超发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出版。
※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
※ 孙诒让撰成《契文举例》。
※ 梁启超撰成《中国国债史》。
※ 刘成禺撰成《太平天国战史》前编。
※ 杨守敬完成《水经注疏》初稿。

1 月

2 日　痛野室主人辑译《万国通俗史》在《中国白话报》第 2 期发表。

第 4 期连载。

13 日　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对历史教育做出规定。

1903 年 6 月 27 日，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修订学堂章程，此次所颁布章程即三人共同修订的成果。新学制规定从蒙学院、初等和高等小学、中学堂、高等学堂（包括师范学堂）、分科大学堂、通儒院、进士馆都设历史课。

初等小学堂之宗旨在“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其历史课“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其中国历史科“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堂之宗旨是“施较深

之普通教育”，使毕业后“不仕者”可“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有根砥”，其中国历史教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

《奏定大学堂章程》依据日本学制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制定了详细科目。史学课程分为主课、补助课及随意科三类。中国史学门的主课有：史学研究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国朝事实、中国古今外交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补助课程有：四库史部提要、世界史、中外今地理、西国科学史、外国语文。万国史学门的主课为：史学研究法、泰西各国史、亚洲各国史、西国外交史、年代学；补助课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万国地理、外国语文。此外，两个史学门还设有所谓“随意科目”，即选修课程，如辨学、各国法制史、中国文学、人类学、公益学、教育学、金石文字学、古生物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法律原理学、交涉学等，万国史学门还独有外国科学史课程。

《奏定大学堂章程》制订的“中国史学研究法”列举五十二项研究史学的要义，几乎涵盖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万国史学门的各科目的讲习法也只注明以译本讲授，并未详列讲授要目和参考书籍。

17日　《女子世界》在上海创刊。

该刊由常熟女子世界社编辑，“传记”、“译林”、“文苑”等栏目刊载一些历史上女英雄的传记、思想观念解放等文章。

是月　陈黻宸就任京师大学堂史科教习。

陈黻宸因所著《经术大同说》、《独史》、《地史原理》等文被张百熙见重，奏派为京师大学堂经史教习，后因到校较晚只被派为史科教习。同年兼任学部京师编译局编纂，次年又兼京师译学馆教习。

2月

14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6、47、48号合刊发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及《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欧美革命史进行比较，认为中国革命存在“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等问题。此文发表后，中外革命史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梁氏在《新史学》中即提倡用统计学来研究历史，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其以《文献通考》、《续通考》、《皇朝通考》之户口门中历代人口之记载，编制《中国历代户口比较表》，并对中国历代人口升降进行统计估算。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在近代中国学界，梁氏是第一人。

3月

11日 《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办。

本刊由夏瑞芳、张元济倡办，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初为月刊，1920年第七卷起改为半月刊。抗日战争时期，移长沙香港重庆等地断续出版。1947年1月迁回上海，1948年12月停刊。该刊不仅刊出过不少有影响的史学论著，并因逐期编制中外大事记（后改名时事日志）和录存有关时政的重要文献，保存了不少史料。

17日 亚卢（柳亚子）在《江苏》第9、10期合刊发表《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

柳亚子认为陈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推倒政府，普救国民，留绝大纪念于吾祖国之大英雄大豪杰"。该文是新史学运动中第一篇研究论述陈涉的文字，是研究农民战争史的较早文献。稍晚于柳亚子，刘师培也发表了《中国革命家陈涉传》。

26日 汪承镛编纂《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31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

《东方杂志》第3期转载。作者为"国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辩护，呼吁"知吾学以爱吾国"。

是月 （英）甄克思著、严复译《社会通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严复依据英国学者甄克思1900年出版的 *A History of Politics* 一书翻译而来。严复在书中特别指出中西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并提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如西方一样进化发展到现代国家的问题。

严复借助甄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分为图腾、宗法、军国社会三个时期的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初步估定。认为中国社会"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军国社会系民"以地著"，"于其种族旧居靡所问也"，宗法社会"其别民也，问其种族"。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

"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

《教育世界》第 72 期刊登《历史教授法》。

第 73、74 期连载。该文凡四章，一万五千余字，未署名，可能译自日文或德文教材。其内容包括教授历史之目的、材料、方法和历史沿革等，认为历史课具有"多途广用"的价值，可以对儿童的智、情、意起陶冶的作用，并阐明历史教材的编选，应遵循简明扼要、循序渐进和以近世史、本国史为主的方针。这是对西方近代历史教学法专门介绍的发端。

4 月

30 日　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第 10 期发表《孔子传》。

第 13、14 期连载。刘师培认为由于孔子的学说较其他诸子完备，适合于"专制政体"，能让统治者用来"愚弄中国人民"等原因，使孔子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几千年来受人尊敬。但是一般人只知尊敬孔子，而于"孔子的事实，孔子的学术，孔子的作为"都"不甚熟悉"，所以决定撰写《孔子传》来让人了解真实的孔子。作者最后指出，孔子虽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称道，但是认为"他的学问，也是个儒家的一派，一定说他是'至圣先师'，却也未免太过了"。

该文由"孔子的家世"、"孔子学术的来历"、"孔子的新学术"、"孔子的事业"、"孔子的教育"、"孔子的身后"等几章组成。此文是第一篇从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孔子的《孔子传》。

5 月

11 日　《警钟日报》刊载社说《论中国阶级制度》。

5 月 12 日连载。文章从宗法制、井田制和奴隶三个方面论证中国上古存在阶级制度，并指出"降及秦汉，封建变而宗法堙，井田更而农仆废"导致"三代阶级制度"废。而此后伴随九品中正制兴起的门阀制度亦是"中国之一特别阶级也"，不过至唐代，"尚科第而门荫之制以衰"。"自异族入主中夏而阶级之分愈密"，"蓄奴"之制逐渐盛行。作者指出，中国的阶级制度，是"由雇工而田仆，由田仆而家奴"，恰与欧洲相反，"与社会进化之公例相背而驰"，真"不可思议"。这是较早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篇文章。

8 月 6 日《东方杂志》第 6 期"社说"也转载此文。据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考订，此文为刘师培所作。

15日　三爱（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3期发表《中国历代的大事》。

第4—10、13、16、18期连载，从第13期更名为《中国史略》。作者认为中国人要首先晓得三件大事，第一是“要晓得中国在世界上什么地方”，第二是“要晓得中国人在世界上算什么种族”，第三是“要晓得中国人从什么地方来的”。连载的十一期共刊登出十一章，题目分别是“开国源流”、“汉苗交争”、“大禹治水”、“汤武革命”、“周初之隆盛”、“十四年共相”、“犬戎之祸”、“春秋时代之五霸”、“吴越争雄”、“战国七雄”等。该文是一部普及性白话通史作品，因刊物停刊连载至战国而中辍。

是月　章太炎重订《訄书》由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刷出版。

“重印本”扉页有章太炎介绍，其中有“素雄于文，博治经史百家，而尤注意于明季文史。深维汉族亡国之痛，力倡光复主义，作《訄书》以见志，文渊奥古，俗吏未之察也”。章太炎在该书中提出了“一切以种类为断”的价值标准，反映了章太炎历史观念的进一步调整。

（日）小川银次郎著、沙曾诒译《中等西洋史教科书》4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6月

8日　觉佛在《觉民》第7期发表《墨翟之学说》。

文章将墨翟学说和源自西方的思想连接，认为“墨子之学说在我国今日，岂非起死回生之妙药也”，可“养成公德”，“收回国魂”。作者将墨子视作是“我国社会学家第一伟人”，认为其“发明社会学，养成一种仗义敢死、摩顶放踵以利同胞之热力”，并将其学说和当时中国政治社会所需之现代精神连接起来，如他认为墨子之“兼爱”思想，可“打破重重之阶级”，再如“非命”之说，实乃与欧洲新发明之“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天演学理类同，有助于“策人进取之心”。

蘧照在《东方杂志》第4期发表《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

作者认为中国二百年前之颜李学派“镕孔墨于一冶，其学最切于今日救弊起衰之用”。由于颜李之学不媚于时，又无诠释提倡，故逐渐隐没无闻，故国家危亡之际，要发扬重光颜李之学以救弊起衰。

14日　《宁波白话报》第1期刊载《洋人入华史》。

第2—4期连载。

28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49号发表《子墨子学说》。

第50、52、53、57、58号连载。文章内容有"墨子略传"、"墨子之宗教思想"、"墨子之实利主义"、"墨子之兼爱主义"、"墨子之政术"、"墨学之实行及其学说之影响"、"墨学之传授"、"墨子之论理学"等。梁氏在序言中指出，杨学亡中国，而真墨学则可救中国。

有研究者认为，此文将中国古代学术与西方学术进行比较，并尝试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墨学，开创了墨学研究新路径，对此后胡适等人的墨学研究产生了影响。

是月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誉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

本书共三册，第二册在1905年出版，第三册在1906年出版。夏曾佑原计划编写五册："第一册，起上古至战国；第二册，起秦始皇至三国，第三册，起晋至五代；第四册，起宋至明；第五册，国朝。"实际只编刊到第三册为止。该书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再版不断，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再版。

夏曾佑在此书第二篇"凡例"中指出：编史"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1）"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虽有名人，如与所举之事无关，皆不见于书。"（2）"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3）"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此书在叙述上注重历史分期，尤为引人注目。作者取达尔文进化学说，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为三大时代："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

《东方杂志》第3卷第7期刊载的《新书广告介绍》中说此书"叙述古今，以十三经、二十四史为主，而纬以群籍。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其宗旨则在发明今日社会之原，故于宗教、政治、学术、风俗，古今嬗变之所以然，志之独详。此为从前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所未有而为本篇之特色。""至于篇中博采异说，悉注原书于下。学者可以按书翻检，随时触发，其益无方，尤便于学堂讲习之用。"

该书出版受到了学界的重视。1910年，章太炎评论此书说："夏曾佑所作中学历史教科书，比别人不同，可惜他所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讲一点儿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

缺陷，但这样的教科书，这样也算好了。”陈登原1934年在《出版周刊》第102期推荐该书时指出，此书至少有这些优点：（1）未把“经说”当作史料，（2）不曾轻信伪书，（3）不曾株守前人的成见，（4）不曾无选择地引书，（5）能用综合的方法治史，并认为“此书虽著于清季，而其引证审断之处，有至今为人所不能及者”。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中称此书是“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但是三十年来学术的进步，已使这书的内容陈腐不堪，不能采用了”。

《教育世界》第76期开始出现“史传”栏目。

该期“史传”栏目刊载的论著是《欧洲教育史要》（第77、78、80—83、85—87期连载）、《德国教育学大家裴奈楷传》和《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同期还刊载了罗振玉《周官教育制度》、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及《巴黎大学设日本文明史讲座》的消息。

康有为开始游历欧洲，并撰写《欧洲十一国游记》。

7月

8日　重光在《觉民》第8期刊载《人种史》。

作者认为，东西洋各国民族得以发荣滋长，主要原因在于有“人种史”。中国过去的历史，可称为朝史，不可称为国史，可称为“朕天子履历”，不可称为“种族史”，重视君主盛衰等问题，却忽视“人种性质之优劣，人格之高下”等问题，甚至以成败论英雄，故作者称“史家真君主之鹰犬也”。作者从汉族受辱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历史分为十二个“汉族失败”时期，认为“人种史发达之时，实我民族回生之日”，号召仁人志士迅速“作人种史”。

是月　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第16期发表《中国革命家陈涉传》。

第17、19期连载。文章把陈涉的历史地位看得同孔子一样重要，认为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如若没有孔子，就不能集学术大成，这教育就不能完全了。如若没有陈涉，就不能起革命风潮，这政治就不能改革了”。

8月

2日　无畏（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新史篇》。

作者注意到历代史官地位之递降及其对纂修史书的影响，并寻求纂修

民史的途径。在他看来，“书契以降，君权史权互为消长”，“魏晋以下政府操监督史臣之权”，“宋明以下史禁日严”，“及建虏入关，乃日以监谤为务”。于是，官修史书“大抵出于佞臣之手，以委曲失真”。“中国之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因此，史家欲为人民撰写新史信史，应当“仿所南修《北史》之例，参以野史之现闻”，如此，“则信史之成，必有计日可待者”。

20 日　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第 19 期发表《中国历史大略》。

第 21—24 期合刊本连载。刘师培指出，要看这部《中国历史大略》，“当注意的地方”有五个，第一是“华夷的界限”，第二是“民权的伸屈”，第三是“朝代的长短”，第四是“地方的分合”，第五是“战争的大略”。他把周以前划分为“上古时代”，称为“汉族增势时代”；把秦至唐划分为“中古时代”，称为“汉族扩张的时代”；把五代至明划分为“近古时代”，称为“汉族衰弱时代”；把清朝划分为“近世时代”，称为“异族窃占时代”。连载至第四章《夏》，此后该文未见续载。

25 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 13 期发表《国粹学》。

第 14 期连载。作者有感于“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乃作此篇。据前序邓实所记，该文乃简朝亮“所纂九江（朱次琦）先生年谱合叙其关于讲学之大者，著于篇，以与天下人士共学也”。其中对“清学”、“六经”、史学等多有论述。

黎士宏在《扬子江》第 3 期发表《为民族流血之伟人史公可法殉难记》。

9 月

24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53 号发表《朝鲜亡国史略》。

第 54 号连载。文章叙述朝鲜被日本吞并的历史，以为“吾国龟鉴”。

10 月

4 日　《湖北学报》第 23 期译载原田丰次郎《最近外交史》一文。

第 24—33 期连载。

《江苏白话报》第 2 期刊载《中国开港史》。

第 3 期、1905 年第 1 期连载。

23日　邓实在《政艺通报》第17期发表《民史》。

第18、19期连载。作者指出自己有志于修“民史”“已八九年”，“削笔从事者四五年”，仿照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做法，做了大量资料长编，“草稿所积已盈尺”，乃“先为总序一篇分序十二篇刊之于通报中，以正海内之君子”，至于全书则要较晚时间才能面世。以此可知，邓实在《政艺通报》中刊登的《民史》，只是该书的“导论”——《民史总叙》和《民史分叙》。

在《民史总叙》中，作者从政治对史学影响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认为秦汉以前专制政治尚未形成，故“史未定于一尊，私于一家之朝廷”，秦汉以后，专制政治逐渐形成，推行文化高压政策，“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私有之物”，“中国之史自司马氏而后中斩矣”，所以他要“法白种哲儒之为史学者”，“上追春秋史记之作，下述百家诸子之书，凡稗官野史之所记录，诗人之所咏叹，妇人女子之所讴歌，闾巷所传闻，田间所称道，虽细必书，宁滥毋缺”，撰写一部“以民事为统记”的《民史》。《民史分叙》分别是《种族史叙》、《言语文字史叙》、《风俗史叙》、《宗教史叙》、《学术史叙》、《教育史叙》、《地理史叙》、《户口史叙》、《实业史叙》、《人物史叙》、《民政史叙》、《交通史叙》等十二篇文章，系对《民史》具体内容和撰写计划的阐发。

《民史总叙》和《民史分叙》是对1902年所著《史学通论》中与“民史”有关部分的进一步论说。邓实是当时少有的将“民史”主张真正付诸实践的学者。

陈黻宸在《政艺通报》第17期发表《读史总论》。

作者指出“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所以“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陈氏认为史学不仅要“合政治学、法律学、舆地学、兵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而后成”，而且“又必合教育学、心理学、伦理、物理学、社会学而后备”，所以读史要“首重政治学、社会学”，同时要“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陈氏还在文中特别分析了“政治之原理”、“社会之原理”。

此文后与《孔子作春秋》、《孔子之门》、《孔子弟子之轶闻》、《孔子弟子之派别》、《老墨之学》等专题研究一起，合刊为《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一册刊行。1905年，此讲义战国以下部分因“清臣劾其提倡民权焚毁殆尽”。

是月（日）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由文明书局印行。

周同愈认为："桑原骘藏君为日本人，彼自爱其国，宜其尔尔。译者既为中国人，仍其旧而不为改易，爱国之心何在？"因此，全书统之以中国纪元，"凡吾之所为，勤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当时中国学者以日本史书充国内学堂教科，翻译时一般努力转换为本国立场，以求收到激励国民之效。

11月

7日　梁启超撰成《中国之武士道》，上海广智书局随后刊发单行本。

梁启超愤恨外国列强视中国民族为"不武之民族"，于是"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孔子、曹沫等七八十位人物，"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评论以发挥其精神"。梁启超有意将此书"充高等小学及中学之教科"，以使全国尚武精神得以普及，故不仅"所采事实皆最有兴味能刺激人脑识者"，且注意语言的优美和评论的力度。该书是在清末中国尚武思潮兴起时期从历史角度发掘中国传统精神遗产的最重要著作，亦是"新史学运动"中期有代表性的历史传记著作。出版后多次再版。

善（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15期发表《明太祖朱元璋传》。

第18期连载。文章分三章：第一章"太祖未出来以前的时势"、第二章"太祖的出身初出来做事的情形"、第三章"太祖初未统帅及定金陵"。从文章只叙述了朱元璋起义前半部分之事迹来看，该文连载可能未结束。

21日　瑟詹（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16期发表《近代安徽学案》。

第17期连载。作者认为"造就英雄，转移世运，全靠的是学术"，"一国有一国的学术，一时有一时的学术，一省也有一省的学术"，而各省"莫不有一种特别的精神"。作者认为安徽无论何时"皆有一种别开生面的妙处"，其学术"也有出色的价值"；作者认同姚鼐将安徽"三百年以内的学术"概括为皖南经学皖北文章的观点，将安徽三百年学术分为四派：考古派、格致派、文章派和美术派；治经学的人"个个皆是实事求是的，一字一句皆要穷追到所以然，也像现今研究电学、化学的精益求精、巧益求巧"；安徽人"从前讲那种的学术，既有这等特别的声光，于今拿

来讲科学，一定也是独树一帜的了”。

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发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

作者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即借助于社会学原理，可以理解中土文字的缘起。但是，迄今西方社会学远未成熟，“穿凿之迹，附会之说，虽其著作大家，也在所难免。是学的昌明，不能不借中土文字以为折衷”。与章太炎相较，刘师培更强调小学与社会学的互补性。

刘氏考证了舅、姑、妇、赋、君、林、田、尊、酉、社、牧、民等33字的字义，对这些字义作了近代阐释。他不仅通过阐发《社会通诠》、《群学肄言》中有关社会进化之理，探讨中国文字之来源及引申之义，而且运用《泰西新史揽要》、《希腊志略》等书中的史实，佐证中国文字演化之迹。

是月　陈懋治编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该书内容共有五编，第一编“总论”，分述“地势”、“人种”、“历朝兴亡盛衰之概略”；第二编为“上古史”，从“三皇五帝”到战国结束；第三编为“中古史”，从秦至唐末；第四编为“近古史”，从“五代及契丹”至明末；第五编为“近世史”，从满洲兴起至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之瓜分政策。该书是当时跨度时间最长的历史教科书，简练完备，至1908年秋，共出18版。

12月

7日　三爱（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17期发表《中国之兵录》。

作者认为尽管现在中国军人不如日本勇武，但在古代“轻死善仗的武士，也不在少数”，故要将这些著名的人事从古书上录下来，撰成此文，不仅是要给军人看，也要给学生和年轻人看，培养他们的善死义尚武的精神。所选人与事，无论他是“抵抗异族，是效忠君主，直要勇烈善仗，可歌可泣”如先轸、虎威将军、藏洪、弘演剖腹、睢阳血战等都被录入。

21日　刘师培在《政艺通报》第21期发表清代学术史论文四篇。

此四篇都是对清代学术进行梳理的文章，分别为《近儒学案序》、《习斋学案序》、《幽蓟颜门学案序》、《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在《近儒学案序》中，刘师培表示要仿“《明儒学案》之例”，撰写“《近儒学案》

一书”；在《习斋学案序》中，高度评价颜元之学问，认为其“以用为体，即以用为学，身体力行，一矫讲学空虚之习，至先生论学，惟存性一编，辟宋儒气质之说，实开东原学派之先”；在《并青雍豫颜门学案序》中，猜测颜元“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即认为颜元的学术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刘师培还拟定了二十七个“学案”细目，这是当时较早以学案体例反映清代学术的计划。

22 日　梁启超撰成《中国国债史》，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刊印。

梁启超在自序中指出，该书“以显浅通俗之言述近二十余年来国债之历史，使全国民知我辈及我辈子孙负担之重而推原其所由来”。该书最大特点是附列了大量图表，如《历年外债总额表》、《戊戌前旧债逐年摊还本利表》，表文结合，将中国国债多少、由来原因、偿还情况、与列国之对比情况等清晰简洁地展现出来。此书被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端。

是月　孙诒让撰成《契文举例》2 卷。

《契文举例》为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但书稿至 1913 年始被发现，1917 年出版。本书按甲骨文内容分为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类等十项，以《铁云藏龟》为依据，利用《说文》、金文等作为互证。孙诒让释读的甲骨文有一百多字是正确的，如干支中的大部分以及一些重要的名词和动词。此书在甲骨文识读上有筚路蓝缕之功。

1917 年王国维得孙氏手稿寄罗振玉，并附信云：“孙仲颂《契文举例》当即寄上，惟此书数近百页，印费却不少，而其书却无可采，不如《古籀拾遗》远甚，即欲摘其佳者，亦无从下手，因其是者与误者尝并在一条中也。上卷考殷人制度，亦绝无条理，又多因所误释之字立说，遂觉全无是处。我辈因颂老而重其书，又以其为此学开山，更特别重之，然使为书费钱到数百金，则殊不必。”不过，“此书虽谬误居十之八九，然筚路椎轮，不得不推此矣。”1920 年 3 月 24 日信又说：“其书无所发明，以孙君为首考卜文者，故存其书，实则不足观也。”罗振玉《丙辰日记》云：“《契文举例》……粗读一过，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盖此事之难非徵君之疏也。”

在罗、王之后，也有不少学者对孙氏的研究予以肯定。1935 年邵子风《甲骨书录解题》认为孙书“草创条例，审释殷文，在殷契著述中具披荆斩棘之功。后贤有作，皆此书所启发也”。1947 年钱南扬《孙诒让传》认为“近世甲骨之学自此始，其创辟之功大矣”。陈梦家更视孙氏为“初步的较有系统的认识甲骨文字的第一人”。胡朴安在《中国文字学史》

中说："据甲骨文为学术之研究者，当首孙氏诒让。孙氏著《契文举例》一书……椎轮伊始，虽未能洞悉奥隐，然为甲骨文研究者之先导……可谓难能矣。"裘锡圭曾对此书有总结性评价："应该承认《举例》是甲骨文研究方面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开创性著作。关于此书的评价，不但王国维所说的'实无可取'、'全无是处'明显不合事实，就是罗振玉所说的'得者十一而失者十九'也是不公允的。"

光绪《南阳县志》刊印。

该志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由南阳知县潘守廉主持修订，由山东学者孙葆田发凡起例。该志十三卷，分图一（舆图）、表二（沿革表、职官表）、志九（建置志、田赋志、学校志、祠祀志、兵防志、沟渠志、艺文志、人物志）、杂记，共三十余万字。全志引书皆注出处、义例俱佳、舆图精准、文字雅洁、条理清楚；职官志、祠祀志、兵防志等篇目记载太平军、捻军、反洋教运动等皆精详，是珍贵的史料。该志有近代方志佳作之美誉，被瞿兑之《方志考稿》称为"苦心经营之作"。

姚祖义编《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4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东方杂志》所刊该书广告称，"近年以来，稍稍有历史课本出，然大都取日本成书点窜一二以为之，颇有伤于国民之感情"，而"是书出自吾国人手，一切弃取，无所偏蔽"。全书二百四十课，上起太古，下迄庚子事变，不仅"于历朝盛衰之故，因革之端，固能举其大纲无所遗漏"，而且就清代从入关至庚子事变结束之间的"文事武功外交内政尤能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而措辞得体，绝无时下嚣张之习"。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刊印《最新高等小学东洋历史教科书》。

由于癸卯学制规定高等小学只有中国历史一科，至中学才有亚洲各国史及东洋史，故该书后改为中学历史教科书并在1908年通过审定。《学部审定书目提要》称该书"叙述简明，体裁亦合"。

常堉璋、刘乃晟编著《中国历史课本》由北京华新书局出版。

（日）小川银次郎著、张元济校订《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地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汉公（刘成禺）撰成出版《太平天国战史》前编。

1906年，刘成禺又撰成出版了该书的中编。该书以太平天国纪年附

以清朝纪年，“多采译西人从军日记诸书及日本人著作中国写本，参以官书”，“属记事兼编年体”。书成后孙中山为之序，站在反满革命的立场上，彻底为洪秀全等人翻案，并称该书成“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

1906 年《民报》第 9 号刊登此书广告称：“是书可作汉族近世独立史读，可作太平朝政治史外交史及人物志读。”1936 年简又文、谢兴尧认为“以科学方法及历史眼光叙述太平史者”，该书“实开其端”。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一文认为“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

此书面世后，革命党人又推出一系列太平天国史著述，如 1905 年黄世仲编《洪秀全演义》、1906 年留日学生编《太平天国人物考》、1906 年高旭编《石达开遗诗》等。

杨守敬完成《水经注疏》初稿。

杨守敬以毕生精力投注于《水经注疏》的撰著。但此书未及写定而杨氏殁，由其门人熊会贞继续论纂二十余年，“无间寒暑”，“志在必成”。据统计，全稿经注 159294 字，疏 574738 字，近四倍于原书，这是对《水经注》的一次全面整理与考释。

《水经注疏》的特点有四：第一，对于郦氏所述大小河流的迁徙，郡县建置省并，城市兴衰，以及当时各种地理现象均有考证并以今地注释，郦氏所引书籍，皆详注出处。第二，辨析经注，订伪纠谬，衡量明清学者众说，以别是非，其少明证者则以阙疑，并在按语中抒发己见。第三，对全、赵、戴三家校勘的讹误，摧陷廓清，尽力揭发推寻失实的原因。第四，对书中叙述历史事迹疏略之处，博采史志记传加以充实补证。

《水经注疏》是对以往研究得失的系统总结，是全面论述历史地理的巨著。然而，其疏误之处也在所难免，近人徐行可已校过“汝水”一卷，发现许多错误，就是显例。（《水经注疏说明》）此外，杨守敬尚停留在历史沿革地理的研究上，没有进一步从事于历史地理学的探讨，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局限。

陈去病《清秘史》出版。

该书分上下卷，上卷的主要由《满洲世系图》、《满洲世系表》、《二百四十年间中国旧族不服满人表》、《满洲职官前后异名表》构成；下卷主要由《佛库伦不夫而孕》、《满洲先世事略》、《汉奸惨报》、《满人不爱汉土之证据》、《下江南之苛求及其暴虐》、《那拉氏虐杀儿媳之原因》、《满人之诈骗》等三十二篇满清“秘辛”以及附录四篇构成。

刘师培、柳亚子为此书撰序。刘师培指出该书“仿古人别史之体，虽

掇拾遗闻，间多未备，然胡廷秽迹，赖以彰闻，则世之奉虏酋为神圣者，观此亦可自反矣”；柳亚子认为该书“网罗轶事组织旧闻，振笔疾书无稍顾忌”，“胡族之真相，虏酋之凶德乃大白而不可掩”，为“民族主义鼓吹之一助”。该书目的是为宣传反清而作，但该书也第一次较全面触及了满清掩藏的部分史事，开此后探研满清秘史之先河。

屠寄编就《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

1903年京师大学堂颁行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中指定的中国史学门的教材非古即洋，没有一部中国当代学者的著作。屠寄不满于此，奋然自编一本中国通史讲义，可惜仅成二编九章，从传说时代叙至春秋时期，未及编完就离开京师大学堂。

书中运用历史进化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是书编著宗旨，即为阐明“草昧以来人群进化之理”。屠寄认为传说时代至唐尧虞舜为太古史（第一编）、唐虞至春秋时期为上古史（第二编）。每编又分成若干章，如太古史分成“自开辟至叙命纪”、“自钜灵氏至神农”、“自黄帝至帝挚”、“人民开化之变”等四章，上古又分为“唐虞”、“夏后氏”、“商”、“西周”、“春秋之世”等五章。各章下又分节，共分成三十三小节。屠寄运用近代考古学和世界史的知识对“命历序”古史系统重新作了解释，触及了一些原始社会中“部落酋长制”、“杂婚”制和“知母而不知父”的现象并试图建立自己的一套古史研究系统。屠寄的历史进化观，还表现在对正统“五德终始”历史循环论的批判上。

《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为中国近代最早采用章节体并以进化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史著之一。

法国汉学家沙畹率考察团来华。

沙畹此次受法国远东学院委托，在华北对汉代墓葬和中世纪佛教雕刻等重要文物进行系统勘察和研究。

扪虱谈虎客（韩文举）《近世中国秘史》第1编由广智书局出版。

第2编1911年出版。该书采录晚明迄光绪末年世人罕见的官私文书和笔记而成，要旨在于揭示清代政治得失，旁及统治集团中的满汉矛盾，但选材不够严谨，多有伪误。

刘鹗《铁云藏陶》由抱残守缺斋刊印。

此书是我国研究古陶文的第一本专门著作。刘鹗在序中说明拓印《铁云藏陶》的目的是探讨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全书四册，其中第一到第三册拓印所藏陶器铭文，有刘鹗自序，第四册拓印刘鹗所藏泥封，有吴昌绶

序和刘鹗自序。

皮锡瑞《汉碑引经考》6 卷附引纬考 1 卷刊印。

作者依据熹平石经、岐阳石鼓、孔庙等两汉碑文，参以两汉时期的著作及经说，证明汉碑中所引经文均属今文经。

张之洞撰、江人度笺补《书目答问笺补》刊行。

马其昶《左忠毅公年谱》定本 2 卷集虚草堂丛书本刊印。

王闿运《庄子注》2 卷、《墨子注》7 卷由江西官书局刊印。

知新子（周桂笙）《二十四史论海》32 卷由美华镒记刊印。

董悟《历代奸庸殷鉴录》由上海开智社印行。

陈光宪《历代名将事略》由北洋武备研究所印行。

（日）民权社著、汉人魂译《十九世纪革命时代》印行。

（日）工藤武重著、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由江苏通州翰墨林书局出版。

汪荣宝自日本留学归国，在京师译学馆担任历史科讲师。

1905 年

※“国学保存会”成立，并创办《国粹学报》。
※ 刘师培发表《周末学术史叙》。
※ 邓实发表“国学四论”。
※ 王国维发表《论近年之学术界》。
※ 清廷下令各地修纂乡土志。
※ 科举制废除。
※ 孙诒让《周礼正义》刊行。

1 月

6 日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在东京出版。

根据陶成章设计的《总目》来看，该书是一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通史，应有四卷八章，内容涵括从“盘古”到作者生存之时代。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收录的该书只保留了第一卷前二章，写到夏朝以前，第三章仅见少量手稿残页。1907 年该书易名《中国民族史》再版。1907 年 9 月 4 日上海道瑞澂下令查明销毁此书。

此书最突出之处在于，把“汉族”等同于“中国人”。作者认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其他诸族之与汉族，有关系者附入焉”；“中国历史者，汉族统治之历史”；“中国民族者，一名汉族，其自称曰中华人，又曰中国人”；“所谓中国者，即吾汉人祖先所创建者也”。

20 日　观云在《新民丛报》第 61 号发表《论中国自食力派思想之发生》。

第 62 号连载。

中国之新民在《广益丛报》第 62、63、64 号合刊发表《近世学术史》。

是月　“国学保存会”在上海成立。

其会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本会志在收罗遗籍，其有古人已毁板之书，或尚有板而不多见之书，或写完未刊之书，或久佚之书。海内君子如有以上各书，皆可投寄本会。经同人审查，重版印行。本会月出《国粹学报》一册，为本会机关。”“入会毋须捐金，惟须以著述，或自撰，或搜求古人遗籍，或钞寄近人新著，见赠于本会者，即为会员。”据《国粹学报》第25期所载“会员姓氏录”，可知1906年初其正式会员仅19人。至1907年8月，该会仍称其会员不过21人。该会由邓实、黄节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12年春后，此会即少有活动。

国学保存会积极从事国学的普及工作，编写国学教科书。编写工作由刘师培任总编辑，邓实任总参校。他们认为，编写新式的国学教科书是普及国学最重要的工作。“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云：“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荟萃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扬国学之精粹，而合学堂教学之用。”

该会计划按照新式学堂的章程，用两年时间，重新编写五种国学教科书，把我国五千年学术中的重要内容，皆融会在教科书之中。这五种教科书是：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教科书出版后，公私学校，无不采用，清政府的学部也予以承认，并夸赞教科书宗旨纯正，文理明通。“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刘师培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则被学者赞誉为“中国史书中空前之著述”。

该会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搜罗珍贵古籍，广征会友，列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并拟建国粹学堂，在学术界广泛开展活动，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学术思潮。

2月

4日　绍炎在《直隶白话报》第1期发表《中国历代史略》。

第2、4—7、9—11、14期连载。

18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63号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梁启超被在东南亚三佛齐、爪哇、暹罗等地的华侨梁道明、张琏等人

的事迹所感动，“拨潜阐幽”为之立传，撰写了《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此文目的是为中国人树立对外竞争的英雄榜样，并探讨影响中国人海外扩张的因素。这是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早期论著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63号发表《世界史上之广东的位置》。

第64号连载。此文不仅详述广东在世界交通史上之地位、作为中国海上交通中心之变迁、与“世界文化之关系”、“广东人之海外事业”及广东之“现在及将来”等，亦以广东海上交通形势之变化探讨了中外民族的交流等情况。该文可视为探讨中国海上交通史的开山之作。

23日 《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

邓实担任该刊总纂，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刘师培、章太炎、郑孝胥、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五十多人。其宗旨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内容上“于我国学术源流派别疏通证明原原本本”，使“阅者得此可以知读书门径”。《国粹学报》略例中规定：“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该刊刊录名人画像、图片等六百余张，汇集当时国学权威著作六七百种，明末遗民和乾、嘉、道、咸以来诸儒遗文四五百篇，对经学、史学、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戏剧、音乐、美术等传统学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钩沉和考订。

该刊被视为中国近代纯学术性刊物之发端，其一再宣称：“本报全编，皆言学术之文”，“非关于学术源流、有资考古者不录”。1910年“更定例目”，“社说”取消改为“通论”，另设经篇（政学、地理学、目录学附）、史篇、子篇（理学附）、文篇（小学附）、博物篇、美术篇、金石篇（金石学附）、丛谈、撰录、藏书志、绍介遗书、报告共计十三个栏目。此外，在《国粹学报》上还最早发生了学术文体形式的改变，从传统札记变为近代学术的标志——论文。“文体纯用国文风格”，“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

1911年9月，在第82期出版以后停刊。停刊后，改名《古学汇刊》，从1912年6月至1914年8月止，共出12编，每编分上下册，计24册。

这是第一份国学刊物，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学刊物。

黄节在《国粹学报》第1期发表《黄史》。

第2—9、13、14、26、27、33、38、45—50期连载。黄节痛感于国家种族濒绝，“夷夏羼杂，而惧史亡”，乃杂取官书正史，复“访及野乘，驰心域外”，发愤作《黄史》，“条别宗法，统于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全书计划“书十、表三、记八、考纪十、列传一百八十、

载记二”，实际撰成“种族书”、“礼俗书”、“伦理书”、“物土书”、“地平书”、“频复记”和列传二十人。在当时反满革命的背景下，作者提出了最为庞大的汉族历史撰写计划，但最终未能完成。

刘光汉（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 期发表《周末学术史叙》。

第 2—5 期连载。此文以新的学术史体例考察先秦诸子学术思想，论列先秦各门学科的渊源流变。作者把周末学术史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十六类，加以分析。其中，术数学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刑法等部门。此文为刘氏计划中的《周末学术史》一书的提要。

刘师培力图打破传统学案体，依据西学学科分类法，创制新的学术史编写体例。该文“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区别在于：“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黎锦熙指出，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返观兹篇，其分科举证，容有可商，虽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此为中国第一部以“学术史”命名的论著，对现代学术史研究有发凡起例之功。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 期发表《论古学出于史官》。

刘师培开宗明义地提出：“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古代之初学术发展是史的发展，因此诸子百家和各种古代学问全部起源于史。先秦学术分为三派，六艺出于史，九流出于史，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周代之学术，即史官之学也。”上古之时，学术掌于史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史官普设于各诸侯国，二是史官为世袭之职。学术掌于史官对上古学术有保存之功，但亦有弊端：一是卿士有学而庶民无学，二是有官学而无私学。1906 年刘氏又在《国粹学报》第 2 卷第 5 期发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

章太炎与刘氏观点相近，持“诸子出于王官”说。后来胡适则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驳“王官”说。双方针锋相对，难以形成共识。金毓黻则认为，若谓六经百家之学，悉出于史官，有断限不明之嫌，但“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则无可疑者也”。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 期发表《读左劄记》。

仪征刘氏四世治《左传》，一直拟撰一部《左传旧注疏证》，但未能成书。刘师培自幼就“思述先业，牵率人事，理董未遑，先成《读左劄记》一书”，以为“考订麟经之一助也”。刘师培在此文中，提出了对

《左传》的一系列见解，如不赞同近儒将《左氏春秋》定为伪书的观点，认为“《左氏传》为《春秋》古文”，其书“与《春秋》经文相辅，特西汉之初，其学未昌，不及《公羊传》之盛耳”。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1期发表《读书随笔》。

此文为刘师培的读书札记，其中主题并无联系，长短不一，但不少都具有学术价值，如《儒林、文苑、道学分传之由》、《景教源流》、《古代以黄色为重》、《西域道路古今不同》、《太康失邦非避羿乱》、《史记用古文尚书考略》、《孔子生卒年月》等。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1期发表《国学原论》。

作者认为“神州学术其起原多在天人相与之际”，因为“上古之社会，皆出于神话”，“其作尊之人，无不以神目之”，所以“明堂清庙者大教之宫，而中国历代政教所从出也”。邓实将上古之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兴起于中国“土族”的“鬼神一派”，“至夏中叶而大，至殷而不废，至周而可谓极盛”；一类是来源于“客族”的“术数一派”，其起源“远在五帝之世”，直“至宋儒而尽废”。此两类学术“始于神州太古之社会”，“自春秋以前二千余年之政治礼乐教化风俗，千枝万条而莫不以鬼神术数二者之学为其质干，故明堂大祭者，为古代国家至重之典，一代治学之原也”。

28日 《东方杂志》第1期刊载《论中国古代经济学》。

文章简要概括了中国上古的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学始于周易”，以“利民为重”，孔子、曾子、孟子皆“本以此言经济学”；墨子以“务本去末为主，非矜矜于节俭也”；管子“亦以利民为主”；“田赋问题为当时经济之一大问题”等。作者还指出，中国“至秦汉以后”，“士夫高谈性命讳利字”而“古代之经济学亡矣”。

是月 王国维在《教育杂志》第93期发表《论近年之学术界》。

作者借助对佛教东传和西学东来的分析，论证了“欲学术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和西学只有“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方能保其势力两个主要观点。

作者直陈其时中国的学术思想“停滞凋敝”、“无能动之力”，西洋学术以汹涌澎湃之势涌人，“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近三四年，法国十八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之介绍，而入于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西学”引入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可谓“大哉”。然而，“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

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关于学术之独立，作者认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因此，“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王国维较早提出了学术独立和政学两分的主张，在当时可谓一种不同于流俗的卓识。不过他对晚清康梁、张之洞及留学生的学术文化活动的批评也有一笔抹杀的倾向。

3 月

16 日 《商务报》第 40 期发表《渔业考》、《农学考》。

第 41—48 期连载。

20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65 号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第 66 号连载。该文系梁启超受当时民族问题触动而撰写的一篇“史论”，附录《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则是梁氏所撰《国史稿》的一部分。梁启超在此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汉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汉族的来源除了“炎黄一派之华族”，还有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等八族。

25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2 期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

第 6、7、9 期连载。文章包括“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几部分，对传统学术因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南北学术的分合流变作了系统考察。

刘师培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分为南北两支，又将各地的学术特征予以概括。在他看来，“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 2 期发表《国学微论》，提出“史为天下学术一大总归”说。

邓实给予“史”以极高的学术地位，认为神州学术其起源在鬼神术数，鬼神术数之学“其职掌在乎史官而已，三代之初天人之学实司于史”，

“史为古今天下学术一大总归、文书之库”，老、孔、墨三家之学，“其学同出于史官者也”，诸子九流之学同出于古之官守也，“且同出于其官守之史官”。春秋之际“一代学术，不与俱亡者，实赖史官保存之力。”邓实认为“春秋以前，天下之学归于鬼神术数，春秋以降，天下之学归于史官。是故鬼神术数者，神州学术之原也，史官者，神州学术之微也”。

文章写道：“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

4 月

24 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 3 期发表《国学通论》，提出“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

此为作者继《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后对中国学术的进一步梳理。邓实认为中国学术“春秋以前归于鬼神术数，春秋以降归于史，汉以后归于儒”。具体来说就是“自汉以降，神州之教为儒教，则神州之学为儒学，绵绵延延历二千余年而未有变也”，而“儒者之学术，其大者在乎六经而已”。整篇文章“举历代儒学之盛衰得失而论列之”，所论时代有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这些时代的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

29 日　《外交报》第 107 期刊载《中欧交通史》。

第 108—112、114、116、118 期连载。

是月　（美）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迈尔通史》由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

此书分四部分：上世记包括东方各国记、希腊记、罗马记三卷；中世记包括黑暗时代记、中兴时代记二卷；近世记包括宗教改革时代记、国政改革时代记二卷；新世记为工业进化时代记。原书 1900 年在美国出版，为高等学校教科书之善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以之为山西大学堂课本，由黄佐廷、张在新译出。

此书体裁颇受称道，被认为“举数体而兼备之”：“上世诸记，国别体也；大事诸记，纪事本末体也。凡有影响于历史之人物，上自帝王，下至杂伎，或表，或附见，则纪传之体具焉。强国帝王，著其统系，为之年表，各国学问艺术之源流，国制民风之得失，择其要者，具著于篇，则表

志之体寓焉。”此外，“其议论之纯正，取材之精审，文字之茂美，尤为读者所共赏”。夏曾佑曾为此书译本校阅润色。

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 96 期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

文中提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而“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 98 期发表《周秦诸子之名学》。

第 100 期连载。王国维以西方名学为参照，对墨子、荀子之名学思想进行整理。他认为“学问之发达其必自争论始”，春秋战国学术因此盛，但“暴秦燔书，学问之途绝”，汉代定儒学一尊，“学术之争绝”，“名学发达之止于此”，诸子之名学遂寂寂无闻。

5 月

18 日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69 号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梁启超详列郑和海航之船及其盛举，以郑和为“国史之光”。梁启超探讨了导致中西航海事业不同结局的原因，即欧洲航海探险目的在于寻求殖民而中国人航海出洋在于怀柔远人以娱君主虚誉，“此吾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

23 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 4 期发表《国学今论》。

此文对“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进行“论列”。作者认为清朝学术有“三变”：顺康之世，“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大义为先，惟求经世，不分汉宋”；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法是曰汉学”，方苞姚鼐“治故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为宋学”，门户对立，汉宋互诋；道咸之世，“常州学派专治今文，上追西汉，标微言大义之学，以为名高”。邓实指出学不应分汉宋，“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此篇和《国学原论》、《国学微论》、《国学通论》构成了一部简要的中国学术史。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4 期发表《古政原始论》。

第 6、8、12 期连载。文章分别从“国土”、“民族”、“君长”、“宗法”、“田制”、“阶级”、“职官”、“刑法”、“学校”、“礼俗”、“财政”、“兵制”等方面来考察中国“古政”的起源。

刘师培主张运用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之法，再借助西方社会学

的定例，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况”。其文曰：“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文字未兴，史官未立，而三坟五典复历久无征，间有记载之书，又以语失雅驯，为缙绅先生所弗道。惟《世本》诸编，去古未远，虽记事各殊，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其可考者一也。二曰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此可考者二也。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考古家珍如拱璧，此可考者三也。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

此种见解在氏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具体运用。

28日 《东方杂志》第4期刊载《论中国民族文明之起原》。

此文以进化论为指导阐释民族文明的起源，并论证中国文明西来说之不确。

6月

3日 公民(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期发表《汉族侵略史·叙例》。

作者在文中自称“汉史氏”，以优胜劣败的天演法则观察汉族历史。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七个“汉族侵略”时期，“采辑自黄帝迄有明，上下五千年间，吾汉族之所以对待汉族而最有优势者，述为汉族侵略史”，以凸显祖宗“排外之主义，进取之政策”，为二十世纪之中国“还魂还魄”。该文还分别探讨了历史的界说、纪年、种族、地域、时代等问题。《二十世纪之支那》第2期印出即被没收，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此后未见继续发表。

4日 黄世仲编著《洪秀全演义》在香港《有所谓报》开始连载。

《有所谓报》刊载了前29回，第30回以后改在香港《少年报》连载，至54回而止。1908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社出版单行本。

“是书全从种族着想”，“以天国纪元为首，与《通鉴》不同”。《自序》称：“余尝谓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是纲也，鉴也，目也，只一朝君主之家谱耳，史云乎哉！是以英雄神圣，自古而今，其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者，类湮没而弗彰也。藉有之矣，其不訾之为‘伪主’与贬之为‘匪逆’，其又几何?”

1906年秋，章太炎为此书作序。章太炎追述了演义体小说产生的历

史，指出了历史演义既要忠于历史、又要有适度虚构的特点，强调了此类小说的社会功能。他又从种族革命的角度高度评价《洪秀全演义》。他相信，此书传世之后，人们定会追念洪秀全，并奋起进行革命斗争。

23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5 期发表《东原学案序》。

刘师培认为戴震是继黄宗羲、毛奇龄后“与宋儒相诘难”的“集大成者”，其学虽有小疵却“不掩大醇”，“凡小儒迂墟之说足以害政蠹民者，咸扫除肃清”。刘师培讽刺方苞、朱一新等人“于东原有微词”，是“以蜉蝣而撼大树”，“何损于东原万一哉”。刘师培自“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故要“掇拾精语，翦彼荒词”，作戴东原学案。刘师培认为戴氏之书以《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为最著，故在文中对此二书中之主要观点进行了阐释。

7 月

22 日　守微（许之衡）在《国粹学报》第 6 期发表《读国粹学报感言》。

作者认为欲倡国粹当注意的两件事，一是孔子与宗教，一是国魂与国学。作者批评了梁启超、章太炎对诸子的提倡和对宗教的非议，认为“孔子之为中国教几于亘二千年，支配四百兆之人心久矣”，所以“吾国不信教则已，苟信教，则莫如信孔教”。作者认为吾国自有国魂，主张“黄帝而外，宜并揭孔子，国魂始全”，因为“黄帝为政治之纪元，孔子则为宗教之纪元”，二者“皆处吾国自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为吾全历史之关键”。

作者认为编写历史应当仿照《史记》、《通志》、《通典》，在他看来，只有曾鲲化所著《中国历史》的通史方法，才有前途。

24 日　清廷下令各地修纂乡土志，并将京师编书局监督黄绍箕所撰《乡土志例目》颁行全国。

清廷谕令各地组织志局，限一年为期编成乡土志，作为小学历史教材，体例依黄绍箕《乡土志例目》为准。该例目规定乡土志“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理，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共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十五门。据巴兆祥《方志学新论》载，自此令颁布后至 1911 年，中国有大量的乡土志得以编纂，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449 种，年均 64 种。清末乡土志的大量出现，保存了很多地方史料。

25日 《东方杂志》第6期刊载《论中国史乘之多诬》。

此文指出中国传统旧史除了此前人们批评的"相斫书"、"东邻产猫之事实"和"二十一姓之家谱"外，还有一个前人未言之病——"不实"。作者指出，专制国家不仅使上无诤臣，下无直民，"社会无公是非无真毁誉"，而且使国"无信史"。作者认为如果说"民族之存亡"真以"历史之有无为断"的话，希望后来者知"中国史乘之多诬"的弊端而矫正之。

8月

20日 许守微在《国粹学报》第7期发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

作者认为国粹是"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其国亡。国粹不仅不阻欧化，而且"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

陆绍明在《国粹学报》第7期发表《旧学魂》。

第8—16期连载。作者认为学有学魂，"书契成而著作兴，著作兴而学术盛，学魂于兹发达矣，考著作之源流，始以理想，继以实事，备以议论，变以实学，演以寄寓，终以文词"，这些不断兴起的学术形态，保证了"学魂将失而又不失"。作者感于"竟谈西学，旧学之魂去无影响"，乃"采撮旧学"，"作十言以招学魂"，十言分别为"言音"、"言图"、"言字"、"言文"、"言经"、"言纬"、"言史"、"言学"、"言作"、"言述"。文章连载至《言音篇》后中止，未见后续。

25日 蘧照在《东方杂志》第7期发表《崔东壁学术发微》。

崔述《考信录》三十六卷，"其书考核古事与史学极有关系"，"为考求汉族古史不可不涉历者"。作者认为"崔氏之书，阐前人未发之隐，有功于史学"，而其"为学之意，亦足为少年进德修业之助也"。

是月 重庆商务总会主办的《重庆商会公报》创刊，该刊于1906年开设"商史"栏目。

9月

1日 光绪发布"多派学生分赴欧美游学"上谕。

上谕命令各省督抚"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还明确指

定所派学生“皆应讲求实学专科，以期致用”。由此，晚清出洋留学的学生少有攻读文史和社会科学者。

2 日　清廷下令废止科举制度。

是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上《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指出因科举不停，民间观望而不入新学堂，请清廷果断立停科举，以培养人才。当日光绪帝发出上谕，“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令各地“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并“着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就此废除。

14 日　震旦学院正式开学。

1902 年 11 月，南洋公学二百余学生因反对当局压迫，集体退学，马相伯亦决定创办震旦学院收留部分学生。1905 年，为反对法国天主教会对学院之抢夺，震旦学院学生集体退学另组复旦公学，于 1905 年 9 月 14 日正式开学。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1917 年，复旦公学改名为复旦大学，1941 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 1905 年即在文科中设置了历史课程，但由于是私立学校，经费紧张，故 1925 年才设立史学系。初期人数很少，开设的课程仅有近代欧洲史、英国史、美国史、中国近百年史、外语等，学生须以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为辅系。1938 年春，史学系改为史地系，1949 年同济大学史地系史学组、暨南大学文科并入复旦大学以后，又恢复为史学系。

28 日　陈瀫宸在《广益丛报》第 84 号发表《论史学与政治社会之关系》。

29 日　师姜在《醒狮》第 1 期发表《学术沿革之概论》。

作者把中国历代的学术分为八个时期：神学全胜时代、官学昌明时代、诸子竞争时代、儒学统一时代、佛老混合时代、理学发明时代、考据学披猖时代、西学输入时代。作者最后认为，在新形势下，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不能一概菲薄，对于外国输入的学术不可一概拒绝，要吸收与保存并行，使中西学术化合为中国的新学术。

严复在《政艺通报》第 16 期发表《政治讲义》，认为政治学与历史学“互为表里”。

第 17—23 期、第二年（丙午）第 1—8 期连载。1905 年，严复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政治学，演讲稿汇集成《政治讲义》。在严复看来，近代史学与古代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专门史增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

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针对专史而言，国史为普通史。后者因专史增加而愈益减少所记之事，“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严复认为，政治学与历史学“互相表里”。“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

书中对“新史学”派斥传统史学为“相斫之书”、“帝王家谱”的观点提出质疑。他指出：“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

严复也指出，近代史学的进步即应探求因果，“抽出公例”。“我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远行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

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该年11月《直隶教育杂志》第16、18—20期转载，商务印书馆1906年3月结集出版，并于4月重印。

是月　《教育世界》第107期设立“教育史”栏目。

该栏目刊载的第一篇文章为蒋黼编撰的《中国教育史资料》（第107—109、111—114期连载）。

上海南洋官书局译订刊行《最新中等美国历史教科书》。

该年10月，南洋官书局又相继刊印《最新中等法国历史教科书》、《最新中等英国历史教科书》。

10月

18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9期发表《古学复兴论》。

作者认为“古学”虽“微”，但“实吾国粹”，都应“光大之”、“搜讨之”，“惟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

11月

9日　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

该校由圣约翰书院仿哥伦比亚大学改组而成，设文、理、医、神四学

院，文科包含历史、文学、社会学、语言、宗教等课程，其历史课主要是西方历史，如“泰西近古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法国历史”、“德国历史”、“英国政治史”等。五四时期，增加了关于中国历史的课程，如“中国外交关系史”、“中国社会之变迁”等课程。1919 年圣约翰大学设立政治历史系，1941 年分离为政治学系和历史学系，1950 年历史系停止招生。

16 日　陆绍明在《国粹学报》第 10 期发表《论史学之变迁》。

文章指出，“溯自有文字，即有史”，“至春秋而史学愈备，至战国而史学乃奇合先王之政典而成六经，六经为周史之大宗”。孔子定六经，“由史政而入于史教”，是史之第一变迁；诸子争鸣，由“史才而入于史识”，为史学第二变迁。从体裁来说，“史之变迁，原于经学，重诗则为议论之史，重书则为传纪之史，重春秋则为编年之史，重易则为类史”。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0 期发表《两汉学术发微论》。

第 11、12 期连载。文章指出自汉武帝“崇六经表扬儒术后”，汉代学术“有今古之分争，有齐学鲁学之派别”，就汉人经术来说，约分三端，“或究训诂，或究典章，或宣大义微言，而宣大义微言者或为通经致用”。刘师培有感于“两汉鸿儒思想学术悉寓于经说之中而精神粹言间有可采”，但“后儒未能引申”，故作此文。文章由“两汉政治学发微论”、“两汉种族学发微论”、“两汉伦理学发微论”几部分组成。

26 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

张继、章炳麟等先后担任主编。《民报》是革命派史家发表史学论著的主要刊物，先后发表了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等文章。

是月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由国学保存会印行。

刘师培认为中国传统史书“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不能满足新式历史教育的需要，而“近日所出各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所以他要在“征引中国典籍”的同时，“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以编纂一部“繁简适当”的历史教科书，来促进新式历史教育的发展。刘氏在《凡例》中指出，该书用意“与旧史稍殊”，其重点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五端。

该书第一册共三十六课，前五课先讲商以前之时代演变，后三十一课分别讲此一时期之“地理”、“禹平洪水”、“交通”、汉族与“异族之关系”、“政治”、“阶级制度”、“封建”、“伦理”、“宗教”、“文字”、“学术”、“风俗”、“礼制”、“官制”、“田制”、“兵制”、“刑法”、“学校”、

“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内容。第二册亦三十六课，分别讲西周之“勃兴”、“兴亡”、“疆域”、“与异族之关系”、“政体”、“地方自治制度”、“宗法制度”、“宗教”、“学术”、“教育”、“官制”、“财政”、“刑法”、“田制”、“军制”、“礼俗”、“王礼”、“商业”、“工艺”、“宫室之制”、“衣服之制”、“美术”等内容。

1906 年 8 月出版第二册之后，该教科书未见续出。从已有内容来看，刘师培编纂的教科书具有三个较突出的特点：一是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章节体，刘氏尝试将西方章节体与中国传统的编年体、三通体结合起来，在略述时代政治演变的基础上，用专题的形式探讨中国历史的各主要方面；二是在内容上不仅注重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注意通过经济状况、文化表现、制度设置等方面来总结研究中国的社会形态；三是注重比较各时代的不同并能阐释其原因。

12 月

6 日　清廷设立学部，京师大学堂直接归属学部管理。

清廷派荣庆为学部尚书，专管全国教育，熙英为左侍郎，严修为右侍郎。京师大学堂直接归属学部管理。1906 年 5 月 13 日，学部奏定官制，国子监亦归并于学部。

16 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 11 期发表《永嘉学派述》。

第 12 期连载。文章梳理了宋永嘉“经制之学派”的起始与发展过程，认为永嘉之学“以经言事功，尤合于古人政学合一之旨”，乃“述其学术之大旨”。作者提出两千年来神州之学术其最盛者有三期，“一曰周秦诸子，一曰永嘉诸子，一曰明末四先生”，三期之学“其学风相似，其规模盛大相似”，而永嘉一期之学派，则“固上继周秦下开明末四先生之学统者也”。

陆绍明在《国粹学报》第 11 期发表《史学稗论》。

第 14—16 期连载。作者认为“史学之衰，衰于史官”，因为史官“无不深明忌讳之学，而善为颂扬之文”。此文“舍正史而言史学”，对传统史学中的杂史、载记、志、史评等进行了分析评价。其中一些论断颇有见地，如他认为郡志省志等“志类足补正史之不足”，“读史而不参考诸书，是揣摩一人之文而非欲研究古人之事迹，则亦失读史之旨者也”，“由汉至明之事，载记有专本，诚研究二十四史之一大助也”等。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1 期发表《群经大义相通论》。

第 12—14、16、18、31 期连载。刘师培认为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

争，只有齐学、鲁学之别，“凡数经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于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齐学善于“典章”而鲁学则善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矣”，刘师培乃就“齐鲁学之大义，辑为一编”，为《群经大义相通论》，使“齐学鲁学之异同辨析昭然”，以为“治经之一助也”。文章由“公羊孟子相通考”、“公羊齐诗相通考”、“毛诗荀子相通考”、“左传荀子相通考”等部分组成。

是年

夏，孙诒让《周礼正义》86 卷刊行。

《周礼》初名《周官》，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孙诒让先采录汉唐至清儒之说为《长编》，继而草拟《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比照近儒异义加以检讨论辨。孙氏在书首“略例十二凡”中云：“此经在汉为古文之学，与今文家师说不同。先秦古子及西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殽混。”

本书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是孙诒让一生用力最久最深的著作，自同治十一年（1872）着手，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才最后写定，历时二十余年，考证精详，是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巨著，为清代经学殿军之作。

孙诒让撰《名原》刊行。

本书主要依据金文、石鼓文和一些甲骨文材料，对文字的源流和演变的规律进行了探究，内容包括“原始数名”、“古章原象”、“象形原始”、“古籀撰异”、“转注揭橥”、“奇字发微”和“说文补阙”七部分。

本书一定程度上跳出了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窠臼，在汉字的起源及演变原因和字形繁简变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探索，是近现代文字学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的一部著作。

杨守敬撰《水经注图》刊行。

杨守敬在撰《水经注疏》的同时，与熊会贞复作《水经注图》。将《水经注》记载的 137 条水道，1252 条支流和水道所经流县城邑、湖泽分布、名胜古迹以及各种自然地理现象，都作了细腻准确的描绘。

杨氏此图将汉魏时代的大小河流、湖泊城邑等变迁，一一呈现。若将杨守敬描绘的水道和城邑复合在今日的地形图上，则大多数确切可据。

柳诒徵撰《中国商业史》讲义由江南高等商业学校印行。

全书二册，用章节体写成，分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三编，太古至春秋战国为上古史，西汉至五代为中古史，北宋至明为近世史。《中国商业史》受到西方进化论和经济政治学说的影响，主要采用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以及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柳氏运用刚刚掌握的一些西学知识，整理旧史中的货殖列传、食货志、平准书，各省通志、府志、州县志，以及海关税册等有关商业资料，汇编为此书。该书不仅阐述了商业史的范围、性质、材料，还详细叙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措施、商业地理、通商贸易、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

中国古代一向缺乏商业专史，此书是较早运用专史编撰方法，全面考察古代商贸行为的著作。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再次在东北进行考古调查。

鸟居龙藏1895、1905、1908年先后三次在中国东北的辽东半岛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的遗址，这是中国境内开展时间最早的近代考古工作。1910年，综合三次调查成果的日文版《南满洲调查报告》在日本出版。1906年，鸟居龙藏作为蒙古喀喇沁王府女学堂的教师进入蒙古地区，把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延伸到了蒙古草原地区，著名的赤峰红山后遗址就是此时发现的。1911年出版《蒙古旅行》一书。

马其昶《庄子故》合肥李氏集虚草堂丛书本刊印。

（日）曾根俊虎《粤军志》由上海广智书局译刊。

周世棠、孙海环《东洋历史地图》由上海新学会社印行。

1906 年

※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宣扬国粹。
※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发表。
※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发表。
※ 章太炎《说林》发表。

1 月

9 日　观云（蒋智由）在《新民丛报》第 72 号发表《论中国人崇拜岳飞之心理》。

文章指出，对于英雄之崇拜，不是“历史事实如何之一问题”，而是“国民心理上如何之一问题”。

23 日　蛰伸（朱执信）在《民报》第 2 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第 3 号连载。该文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文献，文中介绍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

25 日　观云在《新民丛报》第 73 号发表《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系论》。

该文是蒋智由对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的评论。蒋智由认为梁启超此文“启学者研究国史上观察我国古代人种无限之法门”。蒋智由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认为“戎狄者，非外来之种族，而原始居住中国之古民族”，“汉种与戎狄实为同一种族，惟于其后有进化不进化之别而已”。

2 月

13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3 期发表《戴震传》。

该文对戴震的生平、治学经历及在小学、音韵学、典制学、算学、地学、经学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介绍。文中还重点分析了《六书论》、《尔

雅文字考》、《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论著，归纳总结了戴震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学术特点，并高度评价了戴震的学术成就，认为他是“郑朱以还，一人而已”。

是月　王国维在《教育世界》第118期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第119期连载。王国维认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王国维对《奏定大学堂章程》里的设科不满，提出他的一套看法。例如他认为经学并无别立一科的必要，应与其他文科项目等列，文科大学里可包含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五门，其中史学科科目包括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哲学概论、历史哲学、年代学、比较言语学、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外国文。

王氏著述甚多，此文在实际上虽未曾发生重大影响，但其思想超越，颇为时人所重。

3月

14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14期发表《古学出于官守论》。

第15期连载。文章意图补章学诚“周代学术掌于官守”说之未备，提出：上古之时“政治、学术、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备于明堂”，而“有周一代之学术，即由此而生”，后来“明堂各典掌以专官，及官失其传，私家著作，乃各执一术以自鸣”；周代时“学术掌于官府，周代既衰，官失其职，由是秦汉以降，于史官以外，别设掌握学术之官”，此后“学术亦掌以专官”。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77号发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第78号连载。梁启超指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弊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且“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系一大革新之时代”，所以应该研究“我先民已有之法理”。梁启超在此文中分别研讨了中国“法之起因”、“法字之语源”、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法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主义”等。

在第80—88号上，梁启超又发表了《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此文是梁启超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所撰之“附录”，不仅梳理评论了梁以前所有成文法之编制，还探讨了它们的缺点以及“今后法典编纂之方针及其预备”，是对《中国法理学发达史》的补充和深入。这两篇

文献对此后的中国法学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

4 月

8 日　严复在《外交报》第 138 期发表《论南昌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

第 139、140 期连载。文章概要介绍了耶稣军（会）的历史及从明至清传入中国的历史。

13 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 15 期刊载《明末四先生学说》。

第 16、17、25 期连载。文章认为"有一代之变，即有一代救变之学"，学术能"通时变而为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四先生"为一代救变之学"。已刊登的部分只有"顾亭林先生学说"。

18 日　《东方杂志》第 3 期刊载支恒荣《会奏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

该折指出："学堂科目赅括中西，其于经学、史学、理学、词章学，皆未暇专精"，如此将导致"中学日微，必至各学堂亦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故请饬各省"办理学务，注意经学、国文、国史"，并请允改设学堂以保存国粹。入此类学堂者要"自尊经学"，"奉钦定诸经为准的，博采历代训诂注疏、诸家经说，以求会通"；要"博览史学"，"奉钦定二十四史、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为准的，其他史可以证明本史，并经义诸子之可以证明本史，以及关系历代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盛衰、兵农礼乐、嘉言懿行，均应分类采辑。外国史译本典雅者，亦兼涉猎"。后学部认为所奏不合定章，令所拟设立之学堂改为师范学堂。

是月　学部颁布《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凡例》。

根据《凡例》，文明书局编印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被审定为学生暂用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育史》被审定为教员用书。同年又颁布《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文明书局编印出版《蒙学西洋史教科书》被定为暂用教材。《凡例》特别以独立条目说明，"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小学科目有中国历史，此次审定各图书惟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

祝震编纂、胡宗楙校阅《最新中等西洋历史教科书》4 册由上海南洋官书局出版。

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第 122 期发表《中国古代科学之发达可征于古金文字说》。

5月

4日　鲁迅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在日本出版。

此志系汇辑德、日、俄、法等国地质学家关于中国地质矿产的论著，并广泛参考中国各省通志和古籍中所载关于矿产等方面的记载而成。全书共二十二章，其中“矿产与矿业”章梳理中国自上古起的矿业开采情况。该书广告称“特搜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撮精删芜，汇为是编”。

是年12月，该书增订再版，至1911年出版第4版，被学部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

13日　陆绍明在《国粹学报》第16期发表《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

作者认为“偶文韵语者”谓“文”，“无韵单行者”谓“笔”。中国史学自古以来分为“文”“笔”两派，班固《汉书》、房玄龄《晋书》是文派的代表，“降至有宋，尚文学派愈衍愈盛”，“欧阳修宋祁集其大成”。不过总体来说，“重笔之学派更盛于尚文之一派”，司马迁、范晔、陈寿等皆属尚笔派之史家，“辽金宋三史”，“得迁史之精义，是皆重笔之一派也”。作者在文末指出“记言之史，宜于尚文，而记事之史，宜于重笔”。

同期还刊载了罗惇曧《文学源流》（第17—21期连载）。该文由“总论”、“三代以上文学”、“周秦诸子总论”组成。由“总论”部分所言来看，作者意图梳理总结从上古三代至清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变化之迹，但是在“周秦诸子总论”部分论管子以后，再无续文。

是月　周世棠编辑《初等小学简明历史教科书》（上下册）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

黄朝鉴编《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由上海振东学社出版。

6月

8日　英国人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开始第二次西域探险。

此次探险再次发掘了尼雅遗址，还发掘了楼兰、米兰遗址，所获甚丰，至1908年8月结束。斯坦因此行窃取了大量文物，其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对敦煌骗宝经过有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

11日　陆绍明在《国粹学报》第17期发表《史注之学不同论》、《史家宗旨不同论》。

前文将史注之学分为“训诂史注”、“考据史注”、“文辞史注”和

“自注”，认为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未能分辨这些不同的史注，使“后世欲从事于史注者不得其门径”。

后者认为二十四史“宗旨各有所在”，如司马迁“著《史记》其志欲继六艺”、班固“著《汉书》其宗旨在善恶比较”、范晔著《后汉书》“其宗旨在以笔胜班固之文章”等。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17 期发表《孔学真论》。

作者认为“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并阐发了孔学“真相”：(1) 六艺依赖孔学而不亡；(2) 孔子兼明九流术数诸学，“孔门不废九流学矣”；(3)“欲知孔学之真，宜注意者凡二事”，一曰“兼具师儒之长”，二曰“政教之途合一”；(4) 孔学之失有四，一是“信人事而并信天事”，二是“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三是“有持论而无驳诘”，四是“持己见而排异说”。

26 日 《民报》第 5 号刊载勥斋（宋教仁）译《万国社会党史略》。

该文从“万国社会党之起原”和六次“万国社会党大会”的情况等方面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简史。文章还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为“社会革命”，并称赞《共产党宣言》对世界的影响。

7 月

6 日 刘师培在《政艺通报》第 11 期发表《周代官制发微》、《汉代法制发微》。

第 12 期连载。

11 日 陆绍明在《国粹学报》第 18 期发表《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古代政术史总序》。

前文认为史学可分二十家，如班固代表的“辞章家之史”、朱熹代表的“经学家之史”、司马光代表的“理学家之史”、苏辙代表的“理想家之史”、刘知几等人代表的“评论家之史”，此外还有“考订家之史”、“文献家之史”、“地理家之史”等。作者又将这二十家归入了诸子流派，如将“辞章家之史”、“经学家之史”、“理学家之史”等归入儒家，“理想家之史”归入道家等。

后文认为“今泰西政术尽善尽美，及证之周礼一书，无不相合”，因“此神州古政非不足观也”。该文在第 20 期连载，只有“总序”、“刑法史序”和“工商史序”，并未完全连载。

15日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生平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演讲，宣扬国粹。

章太炎指出“近日办事”最要紧的，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这里的“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而这个历史，“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章太炎还指出，要增进国人爱国爱种的心，就要在“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

此后，章太炎在《民报》上连续发表宣扬“国粹”的文字，并在《民报》社内设“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主讲国学，发行讲义，与国内的《国粹学报》等遥相呼应。《民报》第8号刊登《国学振起社广告》称：“本社为振兴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分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当时不少留日学生都曾受业于章氏，如黄侃、钱玄同、鲁迅、马玉藻、许寿裳、汪东、朱希祖等，这些人回国后形成了所谓“章氏门人”群体，在中国文史学界和教育界影响深远。

16日　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在《复报》第3期发表《中国灭亡小史》。

第4—8、10期连载。据《柳亚子年谱》载，此文撰于1903年夏。也有学者认为，此文当写于1904年。该文又名《中国灭亡历史全稿》，从满洲源起讲起，主要内容包括满洲入关、南下、南明诸帝灭亡、剃发令颁行、郑成功及台湾被清政府收复、顺治的“虐政”、三藩、顾黄王三大思想家、文字狱、台湾林爽文等人起义、白莲教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日清战争”、戊戌变法、自立军、“孙逸仙”、学界风潮、学生军、苏报案、“沈荩之流血”等。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作者自撰，也有一小部分改编自他人作品。

是月　《新世界小说社报》创刊。

其“发刊辞”云：“中国数千年来，有君史，无民史。其关系于此种之小说，可作民史读也。”该刊第6—7期刊载署名“佚名”的《读新小说法》，提出“新小说宜作史读”、“宜作子读”、“宜作经读”。

8月

9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19期发表《国学讲习记》。

第20期连载。文章认为国学是“一国所自有之学”，要想增加国人对

国家之了解，必使“知其历史，熟其遗事，则必以读本国之书，学本国之学为亟”，作者因此提倡导讲习国学，以“申明大义正气，尚存国光不泯”。

马叙伦在《国粹学报》第 19 期发表《史学存微》。

此文提出“古人之书皆史也”，“三代以上文与史合，三代以下文与史离，文与史合故著书难，文与史离故著书易，三代以上书少而三代以下书多”，“中国之史，其大别曰编年记事而已，而二者皆不能去者，记注而已”等观点。

14 日　荷介在《东方杂志》第 7 期发表《孟子学说为西学之祖说》。

文章认为“今日欧西之文明，虽自谓发源于希腊，而按之孟子之学说盖在隐相符”，“今日所谓西学者，皆若剽窃孟子之绪余也”，孟子“为欧西之学界所崇拜而欢迎者”。《东方杂志》第 10 期刊登的《王船山学说多于斯密暗合》与此文类似。

24 日　留美学生章宗元在《商务官报》第 13 期发表《论古今生计界之竞争》。

此文简述上古以来人类生存及其竞争的过程，并重点介绍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可“民族之智者，国富而人口不过繁”的观点。

9 月

1 日　伯希和率领由法国远东学院委派的探险队到达喀什开始探险考古。

5 日　章太炎在《民报》第 7 号发表《俱分进化论》。

此文对当时影响甚大的达尔文进化论提出了校正看法，认为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

8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20 期发表《诸子学略说》，此文第一次将儒家与诸子并列。

第 21 期连载。文章认为诸子学“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并分别论列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杂家”、“农家”等十家，还将这十家分类：“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

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通者”。章太炎将诸子和儒家并列，提升了诸子的地位，直接推动了诸子学研究的兴起。

是月　章太炎在日本东京《民报》社内成立国学讲习会。

国学讲习会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

《民报》第7号刊登《国学讲习会序》云：“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国学不兴，则“将影响于国家之存亡”，“所以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未有能诋为无用者也”。

国学讲习会出版有《国学讲习会略说》，收章氏所作《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10月

3日　陈黻宸离北京赴广东主持学务。

7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21期发表《编辑乡土志序例》。

第22—24期连载。文章认为国家是由无数郡邑而成，“郡邑无志乘，则一代之史无所取资”，但是“就近世之志承观之，征文考献，既不足供国史之采择，则志乘以外不得不另编乡土志，广于整材，严于立例，非惟备国史之采也，且以供本邑教民之用”。刘师培不满于世人“教民之法”略于近而详于远，重外国而轻乡土，乃提倡编辑乡土志，以激发国人的爱乡爱土的感情。刘师培认为一个较好的乡土志应该包括“舆地志”、“政典志”、“大事志”、“人物志”、“方言志”、“文学志”、“物产志”、“风俗志”，另有附录“金石志”。在《乡土志凡例》中，刘师培又对这些分志如何撰写，进行了规划。

19日　梁启超在《申报》发表《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

20—22日连载。文章对清代学术进行了概括梳理，认为“中国历代学术之盛衰，无不与政治有关系”，清代三百年学术亦然，故以此为视角将清代学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满清入关初期，学术要矫正晚明政治腐败学术空疏之弊，故“不得不求体用兼备之学”；而遗民欲反清复明，“不得不讲经世之方针，求郡国之利病”，且培养坚韧刻苦之精神，待复明计划无望后，乃转求“坚贞绝学”为寄托，故以顾黄等人为代表的“国朝学派”发生。第二期是“自顺康至雍乾”，因文字狱之恐吓和功名之笼络，汉学发达，经学复兴，文学昌盛。第三期是“由雍乾而入嘉道”，时

局动荡，学人“渐知墨守训诂之无益”，乃“诸学派突然并兴”，包括今文经学、舆地学派、汉宋调和派等。作者提出“三百年之学术，亦可为历史上放一大光彩”，而“近世新学之士”，“于国学一无所知”，“背本诬祖”，“乞邻之醯而毁家之宝”。

22 日　杨志洵在《商务官报》第 19 期发表《中国度量衡考》。

文章对中国历代的度量衡变化进行了梳理，并将中国各地所用度量衡与英国、日本所用度量衡进行了比较。

《北洋法政学报》第 5 册刊载徐家驹译述《论我国古代之国际法》。

该文认为中国实具有世界上最古之国际法，史乘古籍中“良法美意与现今所奉为金科玉律之文明惯例相吻合者不一而足”，并提出中国之国际法萌芽最早却在后世不发达之因素，在于中国人保持天下观念而无国家思想。作者还从古书中抽取那些符合现代国际法的记述，如交战双方战时之联系、对待他国首领之礼节、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以为我祖国光，以壮我国民气，而尤冀我国人之深自省也”。

11 月

6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22 期发表《春秋时代地方行政考》。

刘师培认为“春秋虽未乱世，然祸乱咸起于邻邦，而邦内之治自若也”，并且“列国诸侯，于邦国之中，凡邦邑都鄙之地，咸各设官以施治，一境有一境之官，即一境有一境之政”，文章对这些不同作了考证。

15 日　章太炎在《民报》第 9 号发表《说林上》，对明清学术学人重新评定。

该文共由“谴王氏”、“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谢本师”六部分组成，以“春秋大义”对王守仁、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戴望、惠士奇、惠栋等学者的思想进行了评述。其中，“谢本师”因评俞樾“尝仕索虏食其廪禄”有失春秋大义，致与俞樾决裂，影响最大。

是月　《月月小说》创刊，突出历史小说的重要性。

该刊主笔吴趼人认为历史小说比史册更通俗、有趣味，能够将“教育”和“趣味”统一于一体，是普通大众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所以在《月月小说序》中表示将“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吴趼人

在《两晋演义自序》等文中还指出历史小说的撰写非常有难度，因为若历史小说“以附会为能，转使历史真相隐而不彰”，不仅“乱人耳目”，而且会使“愚人益愚”，所以真正的历史小说，必须力图正确叙述史实。

12月

10日　蛤笑在《东方杂志》第11期发表《述学危言》。

1906年第4期连载。作者批评“日言保存国粹”者“第斤斤然守考据训诂之门墙”的这种“专己守残”行为，主张“修明周秦诸子之学，析其流别发起精义，证诸西籍，淬而厉之，以成吾国之新学”，此乃“以诸子补孔学之不足，非崇诸子而卑视孔学也”。

20日　章太炎在《民报》第10号发表《说林下》。

章太炎以古文经学立场对清代经学家、文学家等进行评判，指出近世经师皆“以狱法治经”，即“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以此而观，“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苏州惠学此风少衰。常州庄、刘之遗绪，不稽情伪，惟朋党比周是务”。章太炎对同时代的经学家亦有评判，认为俞樾、黄以周、孙诒让为上，皮锡瑞为次，王先谦再次，王闿运更次，廖平为最次。

30日　《新民丛报》第94号发表黄国康译述的《历史哲学及哲学史》。

此文据日本人建部遯吾所著《哲学大观》中一部分译述，文章探讨了历史与哲学、历史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

是年

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18卷刊印。

该目收录了缪荃孙所搜集的金石拓片10800种，不录砖、瓦，其中以石刻为主，金器寥寥数种。卷一至卷十七收录周代到元代的各类石刻目，卷十八收录周代到元代的各类墓志。

此书是一部高品质的金石目录著作。汤寿潜赞道：“辱示《艺风堂碑目》，叹其精博，足与欧、赵诸家并传。”柯昌泗云：“缪小山编修丈所藏金石拓本一万有八百余通，编为《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光绪丙午刊成，其书盛行于世。自刘燕庭以来，著录之家，未有若此精博者也。”

傅岳棻编译《西史课程》由山西大学堂出版。

该书第一卷《西史概要》讨论了西洋史的含义、概念体例、与地理的关系、与人种的关系、研究法等理论性内容，第二卷为上古史，第三卷为中古史，第四卷为近古史，第五卷为现世记。全书主旨“阐发文明进化精要”。

1908 年学部公布的《审定书目提要》称：“西史译本极多，而繁芜谫劣可备教科之用者甚少。是编杂采诸书，抉择精当，编次亦多合法度。泰西史家最重批评，编中案断多俊伟自意之论，足以开浚学生智识，于中外交通，考证详确，尤为各本所无。惟分目稍简，而篇幅太长，微嫌不便教授，末附图表亦为疏漏。”

该书 1909 年由商务印书馆改为《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再版。

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三国郡县表补正》刊印。

杨氏对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的遗漏和讹误进行补正。对于一些疑难问题，作者采取数说并存的处理方式，留待后人进一步研究。

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由上海江浙渔业公司印行。

全书分为前代渔业总论、渔界总论、渔业公司、渔业设官、渔捞、制造、养殖等八部分，其叙述以清代渔业状况为主。此书为最早的渔业史，也是较早的经济史论著。

陆心源撰《宋史翼》刊印。

此书系宋代人物传记汇编，分为十一类传，所引书籍达四百余种，多为《宋史》所无。

秋，蔡元培被译学馆馆长章梫聘请为教授，讲授西洋史和国文。

曾廉《元书考订》刊行。

杨守敬《禹贡本义》杨氏鄂城菊湾本刊印。

曾廉《禹贡九州今地考》2 卷邵阳曾氏三种本刊印。

魏声和《中国实业界进化史》由上海点石斋印行。

邵修文、王用宾《中国历代法制史》由东京古今图书局出版。

梁焕均《西洋历史》由湖南群治书社印行。

张楠《日本历史》由江楚编译局印行。

王双岐《东亚外交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1907 年

※ 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首次发现汉简。
※ 刘师培发表《清儒得失论》。
※（日）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刊行。
※ 皮锡瑞《经学历史》刊行。

1 月

4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24 期发表《汉代古文学辩诬》。

第 25—30 期连载。刘师培认为，“六经均先王旧典，先王用之以垂型，后儒赖之以考古，睹往轨而知来辙，舍此未由”。六经所记的是“事”，“舍事则无以为经”，然“记事之最详者莫若古文之经”，三代之史“书缺有间”，“记载互歧”，“惟见于古文之经者，则大抵近于征实”。但是“近人创伪经之说，扶今文而抑古文”，结果“人人有疑经之心，于典章人物载于古文经者，亦视为郢书燕说”。刘师培担心此风长久，则不仅“古文之经将废”，而且“三代典章人物载于古文经者，亦将因此而失传”，这将是“经学之厄”，也是“中国史学之一大厄矣”，所以“即今人之疑古文经者，陈其说而条辨之，以证古文经之非伪”。文章包括“辨明汉代以前经无今古之分”、“论今古文之分仅以文字不同之故”、“论古经亡于秦火”、“辨明今古文立说多同非分两派”、“论西汉初年学者多治古文学”、“论西汉今文家不废古文”、“论宋于庭之说不足信”、“辨魏氏之说不可从”等部分。

6 日　清廷谕令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曲阜学堂。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上《奏请建曲阜学堂疏》，请在曲阜建学堂，“以尊祖训，而崇孔教”。

清廷据此疏下谕旨，称奉慈禧懿旨，“孔子为万世师表，昨经降旨升为大祀，曲阜圣人之乡，自应建设学堂以拓宏规而启后进”，故准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悉心筹划妥慎办理曲阜学堂，经费由湖广总督筹措，并发帑银十万两，由山东藩司拨给。

14 日　清廷学部宣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的教育宗旨。

是月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由国学保存会印行。

该书是刘师培为国学保存会编纂的系列教科书之一。该教科书仅编成两册，第一册为“经学总论”，共三十六课，前七课论述“经”的含义、六经起源、六经到十三经的变化等，后二十九课叙述从汉代到清代的经学演变；第二册亦三十六课，介绍《易经》的基本情况，并分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等方面探究《易经》蕴涵的学理。作者尝试用现代学术观念对经学进行探讨，并尝试用现代方式展现，对此后的经学研究影响深远。

国学保存会开始出版乡土历史教科书。

1906 年 12 月 5 日，《国粹学报》第 23 期刊登了《已编成江宁江苏安徽广东四省乡土历史教科书及参考书》一文，称国学保存会拟编“十八行省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以供初等小学教授之用，盖使幼童入学先感发其爱乡爱土之心”，“今江宁、江苏、安徽、广东乡土历史及参考书”已编成即可出版，“其余各省亦陆续编辑”。率先出版的是刘师培编纂的《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附《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参考书》）、《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附《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参考书》），均署“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首版”。上海国学保存会、乡土教科书发行所发行出版的乡土教科书还有陈庆林编著的《湖北乡土历史教科书》、《直隶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西乡土历史教科书》、黄晦闻编著的《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此一时期，不少地方都推出了地方“乡土历史教科书”。据俞旦初调查，除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七种之外，另外浙江、江苏、广东的学人编纂的九种。

（美）彼德巴利著、陈寿彭译《万国史略》由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

钱宗翰编辑《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3 册由上海彪蒙书室出版。

2 月

13 日　《学报》第 1 号刊载吴渊民编译《史学通义》。

作者摘译国内外史学家之说，对“历史的定义”、“读史之目的”、“历史之种类”、“历史之范围”、“人种由来之说”、“人类起源之年代”、

“人种之差别”、“有史以前之概况”、“历史的人种”、“世界史之历史的人种阿利安人之本土”等问题逐一探讨。文中不乏卓见，如认为“吾侪今日读史之目的”，“一言以蔽之曰在明中国之位置而已”。

3月

4日　国学保存会在《国粹学报》第26期公布筹设国粹学堂计划。

该会痛惜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且“今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忧患于“后生小子入学肄业辄束书不观，日惟骛于功令利禄之途”，乃拟师颜元王夫之等人启迪后生之法，“增益学科，设立国粹学堂以教授国学”。学堂宗旨是“保存国粹，阐明定义，养成通才”，开设的科目有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等。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26期发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

刘师培认为“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所以唐代以前学优文绌“未之闻也”。宋儒“立义理之名”，多“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近儒又“立考据之明，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至明末以后之近世，学人对于辞章或视为小道，薄而不为，或“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以此可知“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而且“由于实学之昌明”。文章还分析梳理了明末至清的文学派别、观念和“变迁之大略”，并表达了对“日本文体”输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的冲击之担忧。

6日　章太炎在《民报》第12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

文章驳斥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以图腾、宗法、军国的社会演化序列硬套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指出中国当时并不是宗法社会。同时他指出“条例”即公例与具体历史的关系“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被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昔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

26日　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首次发现汉简。

是月11日，英国人斯坦因到达敦煌，24日，开始调查发掘汉代遗址，26日发现汉简，至5月21日，共掘得汉代木简705枚，其中100余枚可以考定年代。

4 月

2 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 27 期发表《国学真论》，区分“国学”与“君学”。

邓实认为“国学别于君学”，“自秦汉以来，一君学之天下而已”，无所谓“一国之学”。近人知有国家和朝廷的分别，但是言学术时却不知国学与君学的不同而混淆。邓实指出儒学有“真儒之学”和“伪儒之学”，真儒之学“只知有用”，其所学者“上千载洞流索源，考即国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发愤著书以救万世，其言不为一时，其学不为一人”，此乃是真国学，而“伪儒之学”只是为了帝王一人统治服务，是“君学”而已。文章还考察了经儒分立与君学国学混合的过程及学术专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等问题。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27 期发表《中国古用石器考》。

文章分别考察了中国古代所用于战争和田猎的主要石器，还列举史料论证了中国社会进化次第符合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顺序。

同期还刊载了刘师培的《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第 28 期连载）。文章详细论述了上古时期所谓的“三公”和“六卿”、春秋时期的“正”“师”“旅”三级、秦汉的“三公”“九卿”的名称、起源和变化等内容，并简单概括了“秦汉以后职官变迁之大略”。

7 日　《外交报》第 171 期刊载《中国二千年外交通论》。

17 日　《外交报》第 172 期刊载上海外交报馆译《中国欧洲交通史》（东邦协会杂志本）。

第 175、177、179、183、186、189 期连载。

5 月

2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28 期发表《近儒学术统系论》。

文章指出，自周季诸子起，学术就有流派门户，“近儒治学，亦多专门名家”，江藩等人著文“以详近儒之学派”，然于学派异同多未备言，“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晚近以来，风尚顿异，后生学子“屏异先哲”，刘师培乃“试举平昔所闻者”来论近儒学术流别，“以考学术之起源”，使“后来承学之士”学有所据。文章简单论列了明末以来的各地、各流派学术情况，对认识清代学术的起源与发展有助益。

21 日　斯坦因再次到达敦煌，准备实施骗取敦煌文献计划。

斯坦因以帮助修缮庙宇等方式取得了道士王圆箓的信任，得以进入藏

经洞挑选文献。6月13日，斯坦因将用约二百两白银的代价从王圆箓处骗取的经卷佛画等敦煌文献运走。四个月后斯坦因又获得了一批汉文和藏文的经卷。

1909年，斯坦因骗取的二十四箱经卷和五箱绘画等文物经新疆、印度运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斯坦因一共骗取了完整的文书约三千卷，单页或残篇六千多篇。此批文物运抵欧洲后，引起世界轰动。作为第一个发现并骗取如此众多文物的探险家，斯坦因也因此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赞誉。

31日　马叙伦在《国粹学报》第29期发表了《书体考始》。

第30期连载。作者对中国文字的“八书”、“六体”之说及相关观点进行了梳理，并考察了中国文字书体的变化，认为“古文之体，五帝三代殊异”，秦始皇时期，始有统一简化之隶书，“隶书降而有真书”，“真书”即晋唐之间所谓“今隶”，因其体较古隶为真正，故亦曰楷书。

6月

5日　蛤笑在《东方杂志》第4期发表《论国朝政府之历史》。

作者认为“立宪国之官制所以有百利而无一弊”，故以“立宪国之官制”为参照，将清代政治流变分为六期，重点论述了中央政治体制之变迁、满汉之争等问题。

8日　刘师培在《民报》第14号发表《清儒得失论》。

刘师培认为“明人多行”，即明人“砥名励行”，“尊义轻利，以圣自期”，其学术“疏于考古，切于通今，略于观书，勤于讲学”。与明人相较，“清人多病”，清儒“智而谲”、“弃而湿”，即“清儒之学用以保身”，“士之朴者，惟知诵习帖括，以期弋获；才智之士，惮于文网，迫于饥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汩于无形。加以廉耻道丧，清议荡然，流俗沉昏，无复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荣辱”。细而言之，“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卑者或沦于裨贩。其言词章、经世、理学者，则往往多污行，惟笃守汉学者，好学慕古，甘以不才自全”。

章太炎在《民报》第14号发表《答铁铮》。

章太炎对民族主义和历史的关系、新史学派对旧史的批判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指出：“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沉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

《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在此观点基础上，章太炎认为今文经学之说，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章太炎还批驳了以“邻家生猫”、“谱牒之流”来讥评比喻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

章太炎在《民报》第14号发表《官制索隐》。

章太炎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为未来的政治实践进行理论探讨。他在文中说：“吾侪所志，在光复中国而已。光复者，义所任、情所迫也。光复以后，复设共和政府，则不得已而为之也，非义所任、情所迫也。”

该文由《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古官制发源于法吏说》、《古今官名略例》四篇组成。《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引用《诗经》、《尚书》、《周礼》等文献，论证了“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等观点，《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引用《尚书》、《周礼》、《礼记》等文献，对经学家宗奉的“封建君臣之义作了彻底的否定”。姜义华认为章太炎的这些研究“不仅使儒家经典从经天纬地的至圣宝典下降到古史地位，而且使他们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这些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章太炎的经学批判所贯彻的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

章太炎此文的一些观点，对于今天的政治史研究，仍然具有参考意义。

10日　蔡元培以随员身份随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

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期间（1907—1913），选听了朗普勒希特的文明史课，并入朗氏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从事研究，用中文编写中国文明史资料，由顾孟余翻译给朗氏，成为中国较早接触德国新文化史的学者。

11日　《学报》第5号刊载（日）坪井九马三著、张玉涛译述《历史地理学》

第6、7号连载。该文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社会国家的起源、欧洲原始国家、“日本豪族起源之根据地”等内容。据此文可知侯甬坚在《“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一文中认为，日本“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刊“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为1912年”的观点有误。

30日　邓实在《国粹学报》第30期发表《国学无用辨》。

邓实对数千年古学无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如果墨翟、顾亭林等为代表的“国学”用于世，则不仅“晚近衰亡之局”不会出现，中国帝王专制的局面早已打破。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30期发表《政治名词起原考》。

刘师培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其所定之名，均以崇高表贵显，故政治之名词多由表象之词引申”，故“操政之官，谓之大麓，守土长官，谓之四岳，而郊天祀地之所，谓之圜丘、方丘”，其原因在于上古之时“以所居之高下，判爵位之尊卑”。

作者同期还发表了《古代要服荒服建国考》。

是月 （日）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由董康诵芬室刊行，震动中国文化界。

皕宋楼为归安陆心源藏书室名，收藏两百多部宋元旧刊，其他图书逾二十万卷，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海内四大藏书楼。岛田翰游学中国入皕宋楼翻阅藏书后，怂恿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十万元之低价卖给三菱财阀岩崎兰室。岛田翰载书东归后，专门撰写《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一文，不仅考述皕宋楼藏书的源流，评陟藏书价值，还记载了购书过程，并从日本寄给董康刊印。此书刊印后，震惊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界，痛悼中国古籍流落异域，也刺激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中国古籍的保存、收藏的热潮。

《四川学报》第5期刊载《犹太学术沿革论略》。

7月

9日 张之洞上《创立存古学堂折》，建议开办存古学堂。

张之洞以“东西洋强国之本原”在于保存国粹以“养其爱国之心思，群乐之情性”为理由，提出要将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并请“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以延正学而固邦基”。张之洞所创立存古学堂以经学、史学、词章三门为主，其他西学项目则一概从简，在史学门中甚至连西史也一概剔除。

自张之洞开办存古学堂之后，其他各省皆纷起仿效。江苏、山西、贵州、广东等地的官员纷纷奏设存古学堂，由政府扶持、专门讲求国学的存古学堂在各省的逐渐建立，进一步刺激了“国学”的发展。

10日 《学报》第6号刊载张玉涛译述（日）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

第7号连载。文章实际未完整刊载，仅刊登了第一卷“总说”开头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

8 月

23 日　刘师培在《政艺通报》第 13 期发表《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

第 14、15 期连载。刘师培认为“由自立以求自强，必自敦尚气节始”，风俗影响气节，学术影响风俗，故“欲考中国民气之变迁，当先知中国学风之变迁”。该文总结了从春秋至宋代的学风与政俗的特点及其关系，认为学风“始于春秋之世”；战国“不及春秋者，则游说是也”，因其“起浮夸之习”；两汉以降，儒生日趋于智，儒术衰，节义之风逊于两汉；魏晋尚清谈，学“不域于卑近”，人“不染于污时”，故士风“知远害而不知趋利”；六朝以降，科举兴起，士人锐志功名，情操逊于前人，惟唐人对学术无所迷恋，“无复崇拜圣贤之念”，不为名教所囿；至于两宋“士风日伪，其弊愈不可言”。

28 日　曹书昌在《国粹学报》第 32 期发表《原史》。

作者认为“史之有别如人之有伦”，正因为有“九史”、“六经”这些类别、体例和条目之分，史学才能发展，史学有自己的“经纬”，若无“经纬”，则“史之功用不成”；“经纬之义不明”，则史学“体弗可备，名弗可正，法弗可立，政弗可修”。

9 月

2 日　《东方杂志》第 7 期转载《论中国治乱与人口之关系》。

文章探讨了中国治乱兴衰与人口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中国“百数十年以来其治乱”，“不以在上者政治之良否为比例，而以在下者人数之多寡为比例”。史家所谓治者，“非真有求治之方”，实际上是“杀戮重，则人民稀，人民稀则求食易，而求食易则人各安其所分而世一治”。反之，“太平久则生齿繁，生齿繁则衣食艰，衣食艰则铤而走险，而世又一乱”。

27 日　沈维钟在《国粹学报》第 33 期发表《服物考》。

第 34 期连载。文章论述了绡、练、绮、棉等衣物的历史，是较早关于中国服饰史的研究。

是月　《北洋法政学报》第 37 册刊载（日）野村浩一讲授、徐家驹译《明治维新过渡史》。

第 39、40 期连载。全文共八章，讨论的主题分别是“维新原因及其事迹之概略”、“明治新政之基础及其准备”、“征韩论及其破裂之结果”、“立宪政体之发达及确立”、“西邻诸国之关系”、“日清战役及条约改正”、

"制度法律之变迁及整备"、"学制及学术之进步"。

10月

2日　胡炳熊在《东方杂志》第8期发表《论中国种族》。

作者持民族融合的态度，认为"中国民族非尽黄帝子孙"，"黄帝来自西方之说亦不能遽以为非"，指出"世愈进化，则民族融合之范围愈广，至其极则种界悉破"，今满人"受中国同化二百余年，已无所谓种界"，"今苟持满汉分界之说，各为其私"，只能"自裂其国，涂炭同胞，虚耗国力。授外国以渔人之利"。

26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34期发表《崔述传》。

该文对崔述的生平、学术进行介绍，并高度评价崔述《考信录》一书，认为其"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虽有通蔽，然较之马氏绎史，固有殊矣。近人于考证之学，多斥为烦芜，若人人著书若崔述，彼繁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11月

25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35期发表《论考古学莫备于金石》。

刘师培指出"玩物之风，起于两晋"，"然偏于审美，略于考古"；自"北朝、隋唐之士，以翰墨自娱"，遂"启好古之风"；北宋达官显贵"以见闻之博为后进所倾心"，欧阳修开"考订古器之始"，此后蔚然壮观，但多是"以鉴赏之余力及之耳"；近代以后，考古之学发生，从顾炎武等人开始，金石之学逐渐成为考订训诂学之助。刘师培认为金石之学，"足为考古之资信矣"，乃于"前儒所言之外，诠明数例"，以示例金石之学对于史学小学等问题考证之助益。

是月　《北洋法政学报》第44期刊载《中国纸币起源考》。

文章从汉代的皮币说起，将纸钱、飞钱、交子等一一考证，认为纸币起源于中国，"自十世纪之年以至于宋明之世，周转流通，殆无间断"，"可谓世界经济史上最可注意之现象"。

《教育世界》第161期刊载《孔子之学说》。

第162—165期连载。

是年

皮锡瑞《经学历史》5卷由长沙思贤书局刊行。

本书以时代为序，将中国古代的经学发展区分为十个小时代。作者认为，自从孔子删定六经，才正式有经，此为经学的开辟时代。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各家所说不同，经学进入流传时代。到西汉武帝时，经学最为纯正，成为经学昌明时代。西汉元帝、成帝及东汉时，经学臻于极盛时代。东汉灭亡，经学步入中衰时代。南北朝时期经学转入分立时代，南学、北学风格迥异。到隋朝经学北学并入南学，进入统一时代。北宋庆历以后，宋学勃兴，经学一改汉唐重训诂的取向，崇尚性命义理，而转入变古时代，但自此经学走向衰微。元、明则是经学的极衰时代，明代尤甚。至清代，汉学再度繁荣，今文经学重兴，经学进入复盛时代。

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和后来的《经学通论》两部书，虽囿于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对经学史派别流支的爬梳，对前代论述各经的诸家说法的整理，都颇具条理。因此，此书对初学者是重要的入门书，对研究者则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英）葛耳云（格林）《英民史记》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

此书即格林《英国人民简史》一书，由英国医生马林和中国人李玉书共同译述。译者序说："中国史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其中所记者，不过君主之仁暴智愚，臣工之忠佞邪正，或一二贤士大夫嘉言懿行而已。至于进化之公理，自由之大义，暨夫人民程度之高下，团体组织之有无，皆阙焉而未之载。故欲使读者考求此数千年来之民德民智，群策群力，竟渺乎其不可得，此亦中国史书上之一大缺点也。若兹编则不然"。"其名之曰《英民史记》者，则以国家之立，实由人民之团结而成。故书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此意也。"

齐思和认为，此书于政治沿革之外，兼重社会经济之演变，学术思想之升沉，"为新史学开山之作"。

刘师培发表《字诠自序》，指出文字学对考史有所助益。

该文说："政俗迁移，礼制损益，夏殷而上，书缺有间，欲阐发厥隐，惟恃文字：察所从之形，一也；穷最先之训，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假借之故，三也……此均文字之裨于考史者也……若斯之属，咸为诠史之资。"

龙学泰《历代舆地沿革表》20卷刊印。

王树枏《希腊春秋》由兰州官报局印行。

皮锡瑞《春秋通论》、《三礼通论》由思贤书局印行。

1908 年

※ 俄国人柯兹洛夫发现黑城遗址。
※ 叶昌炽开始刻印《语石》一书。
※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少年丛书”。
※ 张尔田《史微》刊行。
※ 湖北史学会在武昌成立。

1 月

15 日 《天义报》第 15 卷开始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

本卷所刊为《〈共产党宣言〉1888 年版英文版序言》译文，后又在第16—19 卷译刊《共产党宣言》的前言和第一部分“绅士与平民”。编译者在编者按语中指出：“《共级（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稗于历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当时思想之变迁。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从此入门。”

刘师培作《〈共产党宣言〉序》，其中虽掺入无政府主义观点，但他也指出“马氏暮年虽与巴枯宁离析，致现今社会民主党利用国会政策陷身卑猥。然当其壮年，则所持之旨固在共产，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23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37 期发表《与人论国粹学书》。

该文由两封信组成。第一封信指出“渔仲《通志》、实斋《通义》，其误学者不少”，“渔仲所长，独在《校雠》、《图谱》、《氏族》数事，其他皆无可采，《六书》尤谬”；“实斋虽少谬语，然其用只在方志”，其他如《易教》、《史德》等多有陋误。第二封信指出“学名国粹，当精研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

该文后收入章氏《别录》，改题《与人论国学书》、《再与人论国学书》。

2 月

1 日 《河南》第 2 期刊载《豫省近世学派考》。

文章简要梳理了清代河南学术的发展脉络，认为河南学术受孙夏峰、颜元影响，具有“务朴”、“征实”之特点，是清末较早考察一省学术的文章。

25 日 伯希和率中亚考古队到达敦煌，骗取了大量的敦煌文献。

3 月 3 日，王圆箓允许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伯希和在三周内对藏经洞的敦煌文书进行了初步分理，并以五百两银子的代价骗取了六千余卷写本精品和三十八幅大型绘画等文物。

25 日 有妫血胤（陈去病）在《民报》第 19 号发表一组关于满清早期历史的研究文章。

此号共刊发《明清最初之交涉》、《清初赫图阿喇四祖考》、《南关北关考》、《明清递嬗之往迹》四篇文章，从满清和明的交涉、清初世系等方面揭示满清的起源及入主中原前后的情况。

26 日 《学报》第 9 号刊载仲遥译《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

第 10—12 号连载。

3 月

17 日 刘师培在《政艺通报》第 2 期发表《颜氏学派重艺学考》。

27 日 《东方杂志》第 2 期刊载《关于传教条约之研究》。

作者“甄录咸丰八年以来与各国立约，关于传教之条款，都为一篇加以研究”，文后附《缔结各约之历史》一篇。

是月 （日）桑原骘藏著、金为译《东洋史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桑原《东洋史要》一书的另一译本。据译者介绍，是编拟名重译考订东洋史要，考其异同，订其疏舛，于原文篇法章法，悉仍其旧。

此译本曾多次再版。

贵州陆军小学成立“历史研究会”。

由席正铭、阎崇阶等学者创办，属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主要活动为联络学生界，通过讲史宣传爱国革命思想，仅开讲二次即遭清方取缔。

4 月

1 日　俄国人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阿拉善沙漠发现黑城遗址。

柯兹洛夫对遗址进行了盗宝式发掘，获得了泥像、佛画、金属用具、陶瓷用品、妇女饰物、钱币、纸币、佛事用品及大量佛经文书。1908 年装满 9 俄担（每担 16 公斤），经库伦运回圣彼得堡。1909 年 6 月，柯兹洛夫进行第二次盗宝式发掘，在城外西北隅的一座墓塔内发现一批书籍、手稿以及版画、绘画、唐卡、雕像等，还有一具完整的人骨架。柯氏自称用 40 头骆驼“运出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图书馆，计 2.4 万卷”。运抵俄京的文物，文献部分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实物藏冬宫博物馆。其中文献部分至今尚无确切数字，经整理登录的西夏文书有 8090 件，汉文书有 488 件，还有藏文、蒙文、波斯文等文献。约有数千卷，15 万页左右。

黑城西夏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佛经约占 90%，已编目 345 种，世俗文献有 60 种，涵盖国家法典、军事法典、字典辞书、文学作品、童蒙读物、历史、医书、占卜书等，还有译自汉文的儒典、史书。汉文文献也以佛经为主，还有儒典、道藏、史书、字书、医书、历书、童蒙读物、版画、占卜书、纸币等，其中不乏宋、金、元代之物。这些文献包罗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研究和释读西夏文字、运用西夏文文献研究西夏提供了条件。这是考古史上最早的有组织有目的的西夏考古发掘。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正式开学。

该校为岑春煊倡办，由 1905 年 7 月所办两广速成师范馆扩建而成，1906 年，模仿日本东京高师改称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原京师大学堂教习王舟瑶、陈黻宸主持。该校设文学、史舆、数理化、博物四科，学制四年。1912 年改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演变为中山大学文、理两院。

20 日　黄节在《国粹学报》第 40 期发表《岭学源流》。

黄节认为宋东莞翟杰上接濂洛之源，下开陈白沙一派，是岭南学者有宗派之始；明中叶新会陈献章崛起，“岭南学派其流始伸，讲学之事亦至是而其风始开，是故岭学源流肇于翟杰而导于白沙”。此后岭南学术被白沙之学、阳明之学数派学术垄断，直到阮元主政岭南，陈澧等人“以著书

考据显岭外”，白沙之学、阳明之学等衰落，后来朱九江主张融合汉宋，于白沙阳明之教皆有所不取；西学涌入以后，岭南接触最早，学术又呈新局面。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40 期发表《辽史地理考》。

第 42 期连载。文章对《辽史》中涉及的一些地理问题，如“忽汗城”、“铁骊”、“乌梁海”、“辽史水名”等，进行考证。

作者在第 59 期又发表了《金史地理志书后》，对金元时期地理建制沿革进行了简单梳理。

25 日 《新世纪》第 44 期发表《国粹之处分》。

文章批评“专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标异于人，而以助国界之愈严明，梦想草昧，而使人群之日退化”的国粹保存主义潮流，提倡“科学超于国界，良知贯于万民，固无分于东西，更无区于黄白种”的学术开放意识。

28 日 张成清在《云南》第 13 号发表《缅甸史》。

第 14、16 期连载。

5 月

17 日 重庆商业学堂教习胡大中在《重庆商会公报》第 92 期发表《编辑商业历史叙》。

19 日 叶昌炽开始刻印《语石》一书。

至 1909 年春刻竣。此书不是简单地编纂目录或抄录碑文，而是从不同视角对所收碑刻进行研究：第一卷按时间顺序梳理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梳理中外碑刻，第三、四、五卷研究碑刻的种类、形制等，第六卷研究碑刻文字体例等，第七卷研究不同时代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研究各类书写者、书写字体等，第九卷研究碑刻文字的格式等，第十卷谈及拓本、收藏等问题。该书共四百七十四则，视角多元，分类细致，结构合理，为碑刻研究的经典著作。柯昌泗后来撰《语石异同评》，对《语石》多有补正。

24 日 叶昌炽被聘为江苏存古学堂史学总教习。

叶昌炽特编纂《史学讲义》，以为学生指引读史之法为宗旨。该书共十二章，分为流别、体例等，有别于刘知几的《史通》。至 1910 年，叶昌炽一心校勘增订《藏书纪事诗》，乃辞去存古学堂教习。

蛤笑在《东方杂志》第4期发表《晏子春秋学案》。

6月

1日　章太炎作《与孙仲容书》，并请孙诒让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勉治经术”。

章太炎自述学术倾向，自言“学殖荒芜，无可自熹，内省素心，惟能坚守旧文，不惑时论期以故训声韵，拥护民德，远不负德清师，近不负先生，虽并世目为顽固，所不辞矣”，并请孙诒让以“父执”的身份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

5日　凡人在《河南》第5期发表《开通学术议》。

作者指出“今日中国学界之黑暗与进化之迟滞”，根源在于“今日学术”不开通，主张“合古今、贯东西而熔铸于一炉，从今世界学科之各大家舍吾中国学者其孰与归，吾何必株守一家言，不深图世界万世之业欤”。作者不反对在世界激烈竞争时代“深究其国固有治学”以“强其民族、扩张范围”，但其“研求国学之方针”是“研求孔学之所以学，以解决数千年来迷信之历史”，具体就是考研孔学“君主的个人主义”、“奴隶的为仁学说”、“冒昧的性命解识”、“迷信的宗教余孽”。

令飞（鲁迅）在《河南》第5期上发表《科学史教篇》。

鲁迅对西方科学史“索其真源”，考其“流益曼衍”，得其经验教训，并以此批评当时中国人对科学的功利主义倾向。

19日　《学部官报》第57期公布《本部审定中学暂用书目表》及《审定书目提要》。

共有八部历史书被审定为中学用历史教科书，分别是：中新书局据日本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改变的《历代史略》；陈庆年以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为底本编纂的《中国历史》；汪荣宝《本朝史讲义》；商务印书馆《东洋历史》；作新社编译的《万国历史》；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炳清、萨端同译，金粟斋译书社出版的《西洋要史》；山西大学堂出版的《西史课程》；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著，邵希雍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国史纲》。

22日　孙诒让因病逝世，享年61岁。

23日　《现世史》在广州创刊。

该刊由莫任衡编译，其“例言”称：是编专取现世大事“参酌史例，分别部居，纂录纲要，即名现世史”。黄节为之撰序。据《中国近代期刊

篇目汇录》可知，此刊至少出版了 17 期。

7 月

18 日　田北湖在《国粹学报》第 43 期发表《石炭考》。

作者对煤炭在中国的发现、使用历史及名称进行了梳理，提出“汉之初乃有石炭发现，然博物之士，犹不能识”，至“南北朝而石炭之名渐著”，被称为“不灰木”或“石墨”等，到六朝时，煤炭开始用于饮食做饭。

23 日　蛤笑在《东方杂志》第 6 期发表《史学刍论》。

作者将史学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指出“综已往之事而考其本末，甄其异同，是皆过而不留者”的，是客观的史学，是“历史之筌蹄也”，而“略其粗迹而求其精义，风俗之盛衰，政教之隆污，国力之强弱，文明之进退，观其会通，测其因果，固皆永远存在，厘然可接于心目者也”的，是主观的史学，是“历史的精神”。

作者将中国史学分为“典制之学”、“议论之学”、“考证之学”三派，并批评中国史学的“两弊”：“不知进化之例而以为古胜于今”，“不知宗教学术之别，而以中古以来之儒术横加皇古”。

是月　李岳瑞编著《国史读本》12 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8 月

10 日　章太炎在《民报》第 23 号发表《五朝法律索引》。

作者认为上至魏，下迄梁之“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数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故其“为捃摭其文，附以说解，令吏民有所取法焉”。

16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44 期发表《俞先生传》、《孙诒让传》。

章氏对其师俞樾学术有批评有肯定，但对孙诒让则大加表彰，认为“诒让学术，盖笼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治六艺，旁理墨氏”，“三百年绝等双矣”。

9 月

5 日　梯岩在《广益丛报》第 180 号发表《论尚书为中国古代最完备之文明发达史》。

第 184 号连载。

25 日　清廷谕令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均从祀文庙。

是月　王国维完成《曲录》初稿。

此为研究宋元戏曲史的第一步工作。赵万里《王国维年谱》言“先生以宋之官本杂剧、金之院本、元明之杂剧奇谈，其名不见于史志，其源流变迁又不尽可寻……因思有以董理之。董理之方，其道有二：一则由元明而上溯宋金，以求其阐变演化之迹，于是有《戏曲考源》、《宋大曲考》及《曲调源流考》之作。一则就各家书目所载及有传本者，录其名目，并作者爵里为一编，以便稽考，于是有《曲录》之辑”。

沈恩膏编辑、朱寿朋校订《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

（日）坪井九马三著、吴渊民译述《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10 月

14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46 期发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

作者认为，中土文字对社会学有补益之功。文中指出“中土史编，记事述制，明晰便章。惟群治之进，礼俗之源，探赜索隐，鲜有专家”，社会学“大抵集人世之现象，求事物之总归，以静观而得其真，由统计而征其实”，“今欲斯学之得所折衷，必以中土文字为根据”。“文字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而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故治小学者，必与社会学相证明”。“故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然欲治斯学，厥有数例：察文字所从之形，一也；穷文字得训之始，二也；一字数义，求其引申之故，三也。三例既明，而中土文字，古谊毕呈，用以证明社会学，则言皆有物，迥异蹈虚。”“今欲扩中土文字之用，……以考社会之起源”。

是月　安徽提学使沈曾植开始筹办安徽存古学堂。

蒋维乔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简明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

13 日　黄节在《国粹学报》第 47 期发表《版籍考》。

第 49 期连载。黄节将中国版籍发展变化的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刊石，“始自汉之一字石经”；第二期为镂版，兴“自隋开皇间”；第三期为活版行用，“始自宋庆历中”。文章不仅进行了分期，还细致梳理了这三种版籍形式的变迁过程。

是月　日本大谷光瑞率领考察队进入吐鲁番，对西北进行第二次考古探险，劫获古物众多。

12 月

13 日　王国维在《国粹学报》第 48 期发表《戏曲考原》。

第 50 期连载。该文的贡献在于将戏曲起源追溯至宋代赵德麟及曾布之词。王国维引宋人记载，认为“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而始于“有宋一代”。因为“考其变迁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与文学有关而非“出自异域”，之所以能以元代最有成就，“不过因元人音乐上之嗜好而日益发达耳”。

张采田（张尔田）在《国粹学报》第 48 期发表《古律书篇目源流》。

作者结合史籍对秦汉至隋间的法律观点变迁、典籍流传进行考证梳理，认为“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后商鞅、萧何等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改造、完善。此文是较早研究中国法律史的论著，对了解中国法律起源和变迁，以及古代法律典籍保存的情况有所助益。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少年丛书”。

该丛书“把中外伟人的言行事业，用简明的文字、兴趣的体裁，编成这部丛书，一人一本”，每部人物传记为二万字左右，文言体，十章上下，以“专供青年男女及学校生徒之观览”，增长知识，坚定志气。丛书第一任编辑和作者为林万里（即林白水），第二任编辑和主要作者是孙毓修，后期钱智修也加入了这套丛书的撰稿工作。该丛书收录的中外名人传记主要是有林万里编纂的《毕斯麦》（1908 年 12 月）、《哥伦布》（1908 年 12 月），孙毓修编纂的《诸葛亮》（1913 年 3 月）、《岳飞》（1913 年 9 月）、《文天祥》（1914 年 4 月），钱智修编纂的《林肯》（1918 年 5 月）等。该丛书的编撰，前后历时十年，从 1908 年到 1919 年分六批先后推出，其中外国历史人物 14 种，中国历史人物 16 种，是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丛书。各书以后都多次再版，如林万里编纂的《毕斯麦》至 1924 年已出版至第 18 版，而《文天祥》、《岳飞》等书至抗战后仍陆续再版。

是年

张尔田《史微》4 卷初版刊行。

作者认为“六艺皆古史，而诸子又史之支舆流裔也”，而该书亦是“为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而作”，故虽以“史微”命名，除了《史学》、《原史》等少数几篇，其余皆探讨诸子百家之学，如《原道》、《原儒》、《案春秋》、《古经论》等。

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学研究者的重视。钱基博在《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一文中认为“张尔田《史微》，绍述文史，匡谬拾遗，不为墨守。然章氏文史，以周官为门户，媲于古文；张氏此书，以《公羊春秋》为根极所主今学；而张氏调停其说，颇多新义”。钱仲联在《张尔田评传》认为此书可与《史通》、《文史通义》并称三大史学著作。该书还被日本帝国大学“采为必读之书”。次年张尔田之弟张东荪将此书由 4 卷析为 8 卷，并增删调整了部分篇章后再刊。除 1926 年曾重刊 8 卷本，作者又有数处修订，增附“覆校札记”于后。此外，1916 年在《中国学报》第 2—5 期，张尔田刊发《史微》中的《原道》、《原墨》、《原杂》、《原名》诸篇。

冬，湖北史学会在武昌成立。

李步青、姚晋圻等发起，为湖北地方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专业学会，成员有进士、举人、副贡生、各级学堂教习和省谘议局议员等。该会主张“本各国修史之旨，循汉儒治经之法，殚力研究，搜集散失，加以摫䤄，各令斐然成章，而退以通学术之流，进以资政治之用，是则倡斯会者之意尔”。学会简章还就推进史学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和专题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设想。研究范围包括普通史、专门史、国别史、史料、考证等 10 类；拟“先编专门史长编及普通史教科书”。

据俞旦初考证，它与贵州陆军小学“历史研究会”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专门的历史学会。

廖平《左氏春秋古经说》12 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刊印。

此书创获有两点：一是作者受《汉书·艺文志》中《左氏微》的启发，将《左氏春秋》中的记事与义例分开，记事为传，义例为说。《左氏传》虽“不传《春秋》”，而《左氏说》则是传《春秋》的。于是，廖平便把汉人以来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而为能传《春秋》的《春秋左氏传》。二是踵刘文淇《左传正义》之后，博采汉师贾、服诸人之说，以匡杜预说之不逮。

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21 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以《国语》一书流传既久，讹误甚多，而韦注故训尚疏，又感近

人论著多不完备，故参阅各家撰述，择其说之合者，纂为是编。吴氏以清黄丕烈刊印天圣明道本为主，以他书相校，补正韦昭注。其中笺注者约八九百条，又有校对异本者百余条，总计千条以上。

端方编著《陶斋吉金录》8 卷印行。

该书收录铜器 159 件，其中包括陕西斗鸡台出土的柉禁 12 件，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论著之一。

1909 年刊印续录 2 卷，收录铜器 80 件。

冬，梁启超撰成《王荆公》，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

梁启超不满于世人对王安石的诟病，“为荆公作洗冤录”，“对于王氏所创之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徐念慈《中国历史讲义》由上海宏文馆印刷。

作者原拟撰写中国文明史，而实际撰成的《中国历史讲义》中，历代之政教、典礼、风俗、实业等内容皆付之阙如，“惟书中独无文明史”。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11 卷由衡阳东洲讲舍刊印。

此书是对《春秋公羊传》何休《解诂》的补充校释。

黄镕《春秋王制尚书周礼九州疆大小考》（又名《经传九州通解》）乐山黄氏六译馆丛书本刊印。

王先谦《王葵园自订年谱》3 卷刊印。

潘博《中国名相传》由广智书局出版。

陈家锟《中国商业史》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

晏彪、廖宇春《世界历史》由甘肃官报书局印行。

北洋陆军编译局《亚洲各国史》由甘肃官报书局印行。

1909 年

※ 汪荣宝编、张元济校订《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
※“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
※ 王仁俊辑录《敦煌石室真迹录》刊行。
※ 章太炎发表《原经》、《原儒》。
※ 罗振玉发表《鸣沙山石室秘录》。
※ 罗振玉、蒋斧编《敦煌石室遗书》刊行。

1 月

11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49 期发表《秦四十郡考》。

作者在文中对秦三十六郡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秦实际设置了四十郡，并对其沿革进行了考辨。该文是秦代历史地理较早的研究之一。

2 月

10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50 期发表《穆天子传补释》。

第 51—53 期连载。刘师培在序中说“师培幼治此书，病昔治此书者率昧考地。因以今地名考古地名，互相证验，古义古字，亦稍阐发”。该文中提出的西王母是“西膜”的转音，“为种族名”的观点有较大影响。

25 日　严复撰《泰晤士〈万国通史〉序》。

作者主张史学应研究人群社会的进化，指出：“左氏固相斫之书，柱下乃家人之语。至若究文明之进步，求世变之远因，察公例之流行，知社会之情状，欲学者毋忘前事，资为后师，用以迎蜕进之机，收竞存之利，则求诸古人著作，或理有不逮，或力所未皇。此十八世纪以降之史家所为远轶前修，而其学蔚成专科，最切于人事而不可废也。”

严复提倡通史著述。断代史“以求致精，证之详尽，故所发明于一姓或不过一王朝，于一时或不外一二事，此所谓炳烛之明，可为细书，而不利远望者也”，而通史长于反映进化之状况，“言人群者，知世变之来，不

独自其相承之纵者言之，必后先因果，倚伏召从，无一事之为偶也，乃自并著之横者观之，亦远近对待，感应汇成，缺一焉则其局不见”，尤其是“当国事者为教育、为内政、为外交，思欲高视远规，造一章程，立一法典，不至枯守其旧，盲随于新，而以阶其国之大历者，非通史之求将无幸尔”。

3月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

20日　梁启超开始撰写《管子传》。

撰写工作至5月5日结束。梁启超认为“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导致中国历史上“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在此风气下，管子、商鞅、王安石等人虽为举世伟人，却“为世诟病以迄今日”。梁启超出于“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的“史家之职”，在《王荆公》之后再撰《管子传》以纠偏正误。

梁启超在例言中说“本编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对管子的“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论之尤详，且“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全书分十三章，共计六万余言，除“法治主义”和“经济政策”外，还叙及管子的时代、生平及其在政治、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张与事迹，是近代以来管子研究的开山之作。

29日　《广益丛报》第198号刊载《论二程学派与中国学风之关系》。

5月

20日　叶昌炽开始重新校订《藏书纪事诗》。

叶昌炽于1884年（光绪十年）开始编写此书，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完成初稿，并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由江标辑入《灵鹣阁丛书》刊印。由于初稿中存在错漏和不足，辞官回乡的叶昌炽乃决定校勘增订此书，1910年（宣统二年）该书增订版刊印。该书共记载了从五代末期迄清代末期共739位藏书家的事迹，大量采录自正史、笔记、方志以及官私目录、古今文集等文献，并将记述一人或相关数人的有关资料各用一首叶氏自作的七言绝句统缀起来，间附叶氏按语，实际上是一部资料汇编

式的藏书家辞典。本书同时还收录了历代刻书、校书、抄书、读书等方面的资料，因而对于研究目录、版本、校勘及文化学术的演变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被誉为“藏家之诗史，书林之掌故”，伦明、王謇、吴则虞等多人沿此体例进行续补仿作。

是月　伯希和再度来华，中国学界开始知悉敦煌遗书。

伯希和此次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置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8月中旬，伯希和抵达北京，正当伯希和准备启程归国，“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此时北京学界始闻敦煌发现的消息。“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继续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当时在京的许多名流如罗振玉、蒋黼、王仁俊、曹元忠等，都纷纷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

9月4日，北京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瀚、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斧、吴寅臣等。伯氏表示：“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誊写者，自可照办”。

7月

4日　清廷准许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选科举举人及优拔贡入经科大学”的奏请。

7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55期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

作者认为“无论何代，其施行国有政策者，罔不病民”。文中先后讨论了中国的“土地国有之弊”、“茶酒由官专卖之弊”、“盐铁国有之弊”、“均输平准之弊”。刘师培严厉驳斥了国有政策是“以一切利源操于国家，以均配于民间，可以泯兼并之风，收抑商之效”，指出凡“所行国有制，均君主利有此策，假限制富民之名，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兼为黩武穷兵之用，实则商民未必抑，而贫民亦未必富也”，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

10 日　光绪批准外务部、学部联合上《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

该折奏请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组成，管理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理的留美事务，同时请设肄业馆一所，以为游美预备。9 月 4 日，学务处开始第一次考选留美生，选取梅贻琦等 47 名学生，于 11 月 13 日启程前往美国。1910 年 12 月学部批准游美学务处提交的改革办法，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

是月　汪荣宝编、张元济校订《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京师译学馆的讲稿，原名《本朝史讲义》，共有三编：第一编，开创时期，从努尔哈赤起兵至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第二编，全盛时期，自康熙中叶迄于乾隆末；第三编，忧患时期，自嘉庆初迄于咸丰同治之际，包括三省教军起义与太平天国革命。这是第一部清史教科书。《学部审定书目提要》称“书分三大时期：自本朝创业之始迄三藩、台湾平定为开创期；自康熙中世讫乾隆末年为全盛时期；自嘉庆初年讫于今日为忧患时期”。

辛亥革命后，汪氏投身政治，由许国英续写至清廷灭亡，即第四编，改革时期，自同治光绪至清亡，民国建立。1913 年 4 月该书以《清史讲义》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能是最早的清代通史。许国英在该书绪论中指出：“历史之要义，在以钩稽人类历史之陈迹，以发现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得渐成科学，其道由此。夫人类之进化，既必须有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该书把民族统治放在首位，序言说：“专制之祸不自清始，而变本加厉，其故由于种族之畛域者一，而利禄之罔阱又其一也。”该书流传较广，1913 年 4 月初版，至 1923 年印行第 5 版，有一定的社会影响，1966 年台湾又将该书选录再版，后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94 辑。

许志毅编辑《简明新国史教本》由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出版。

8 月

《四川教育官报》第 7 册“教材”栏目刊载《历史讲义》。

第 8—10 册连载。讲义从东汉讲起，采用纪事本末体，对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大事，如光武中兴、明章时事、党锢始末、三国大势、

八王之乱、刘宋之兴等进行了较细致的讲解。

9月

9日　学部奏设京师图书馆获准，以缪荃孙为监督。

京师图书馆接收了原国子监南学所藏书籍和内阁大库残卷，另藏敦煌石室劫余写经八千多卷，并购进积学斋等一些民间藏书。由于种种原因，图书馆建设缓慢，直到清帝逊位，京师图书馆始终没有正式开放。民国建立以后，京师图书馆由教育部接管，1912年5月教育部任命江翰为京师图书馆馆长，先后调取原存书籍及各省官书，并定《阅览章程》十四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同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1916年京师图书馆按规定正式接受国内出版物呈缴本，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部分职能。

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50年3月6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6月12日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28日　“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

该会是由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标志着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会长张相文把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地理学家白眉初、地质学家章鸿钊、水利学家武同举、历史学家陈垣、张星烺以及热爱地学的教育家蔡元培、张伯苓等，都团结在中国地学会里，组成一支我国最早研究地理学的队伍。以后又陆续吸收很多地理、地质等方面的专家参加，如丁文江、邝荣光、姚明晖、翁文灏、袁复礼、刘玉峰、王成组、殷祖英、张印堂、黄国璋、谭其骧、盛叙功等，队伍不断扩大。

其成立伊始，即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不少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

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历史地理”一词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发表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的《历史地理学》一文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月《地学季刊》。

28日　经董康介绍，罗振玉携王国维等拜访伯希和，商讨敦煌文献研究。

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知，罗振玉与王国维前往伯希和住处拜访的时间为中秋节早上。罗、王“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

翁独健在《燕京学报》第 30 期发表的《伯希和教授》中说：“次年（1909）夏，复至京师，得识直隶总督端方，相与研讨考古问题，且与罗振玉、王国维诸先生商榷敦煌写本之研究与计划，先生之学问为我国学者所认识盖自此始。”

是月　王仁俊辑录《敦煌石室真迹录》6 册由国粹堂石印出版。

此书收录敦煌文书三十八篇（八篇有按语无录文），王仁俊或介绍内容，或考订时代，对每篇文书都加有按语。此书系中国第一部敦煌文书资料集，其按语是“是最早利用敦煌文书对中古时期的历史、地理、宗教等所作的初步研究”，这部文集被林家平等人所著《中国敦煌学史》誉为“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山之功”。

10 月

3 日　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敦煌遗书剩余部分解运北京。

罗振玉、李盛铎等人从伯希和处得知千佛洞还有一批经卷存在后，催请学部下令将剩余的敦煌书卷运到北京，由京师图书馆收藏。是日学部电令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1910 年 11 月 11 日，敦煌县令奉命搜寻千佛洞所存经卷六七千卷，并解往北京。但在此过程中，押运人员、地方官、北京相关人员等趁机截留了一些遗书精品，导致这些珍贵的文献又损失不少，交付给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献仅有六千余卷。更为恶劣者，一些偷盗截留经卷者为掩人耳目，将一卷割为数卷以充数。

是月　《四川教育官报》第 10 册编载《文字探源》。

编者认为国粹的根源在于文字，故将四川先儒吕竹庐“殚精竭锐，博考详稽”撰成的《六书十二声传》之序和其弟子陈篠帆所撰之《文字九部通考》之序以《文字探源》之名刊登出，以供“欲保国粹，趋重国文者参考”。

11 月

2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59 期发表《原经》、《原儒》。

在《原经》中，章太炎提出了“诸教令符号谓之经”，“经不悉官书，

官书亦悉不称经”，“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等论断；在《原儒》中，章太炎提出了“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盖出于需”等论断。此两文对后世影响不小，胡适在《说儒》中说：“太炎先生这篇文章（《说儒》）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题号由古今异’的一个历史见解，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

章太炎还在此期学报发表《致国粹学报社书》，对《国粹学报》的现状表示担忧，对当时的国学研究多有批判：“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无不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绝，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近世言汉学”，“其病在短拙，自古人成事以外，几欲废置不谈”。章太炎最后希望《国粹学报》“宜力图增进，以为光大国学之原，延此一线，弗以自沮”。

罗振玉在《国粹学报》第 59 期发表《鸣沙山石室秘录》（改订本）。

此文是我国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文章之一。林家平等人著《中国敦煌学史》中认为我国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文章是《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但从刊载日期上此文要比《鸣沙山石室秘录》晚五天。

7 日　罗振玉在《东方杂志》第 10 期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罗振玉在此文中记录了敦煌遗书十二种和书目三十一种，包括经史子集等。在《东方杂志》第 11、12 期上，罗振玉又发表《莫高窟石室秘录》，系对此文的补充。此后敦煌文书才逐渐广为人知。

12 月

罗振玉、蒋斧编《敦煌石室遗书》刊行。

罗氏将伯希和所得敦煌石室珍本影印，编为是书。此后又刊行了《石室秘宝》十五种、《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罗氏又将王国维翻译的《流沙访古记》（原书为日本人藤田丰八寄送的英伦地学协会所载斯坦因《中亚西亚探险记》）附刊于遗书后。

此书是我国最早的敦煌资料汇编，初步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

是年

朱寿朋编成《光绪朝东华录》220 卷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出版。

此书仿蒋良骐、王先谦《东华录》体例，编录光绪一朝史料而成的编年体史料长编，所辑朝章国典、政治文教、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奏折、上谕等（所收文件多全文抄录），对研究光绪一朝之历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沈桐生辑、董元、董润校《光绪政要》由上海崇义堂刊行。

编者据光绪的谕旨、奏书、官书、报章及私家著述，仿《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要》及《东华录》等书体例，纂为是书。起自于清光绪元年（1875）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年一卷，卷首列本年大纲目录，内政、外交诸大事，卷内逐月记叙光绪朝重大史事，如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中外交涉等，对研究光绪朝历史具有较重要文献价值。

王先谦《庄子集解》8 卷由思贤书局刊行。

此书在对郭庆藩《庄子集释》进行删削简化的同时，也补充了大量材料，尤其是集纳了前人注庄的许多成果，为研究庄子者所必览。

端方《陶斋藏石记》刊印。

此书共 44 卷，主要收录了端方收藏和经手的自汉至明末历代石刻铭文拓本七百余种，包括造像、题名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零散残刻，较为罕见。卷首所刊龚锡龄撰序言中指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模拟，惟篆隶诸碑，以成书稍促，则但释以楷字”，在序跋中又结合相关材料进行了考订。

端方《陶斋藏砖记》刊印。

本书着重记述清末河南出土的一批东汉刑徒砖志资料。作者不但如实展现砖志文字内容和字体字型，还结合《后汉书》中《郡国志》等史料，对于砖志中古地名变迁以及汉代刑罚改革等史实进行分析，对砖文残缺部分加以推断。该书对汉字字体的变化也有所讨论。

陈家锟《中国工业史》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

全书四编十章。陈氏将中国工业演进情形区分为工业开化、进化、退化、退化而趋进化四个时代：工业开化时代指黄帝以前小开化，黄帝至尧舜为大开化；工业进化时代指夏殷小进化，周为大进化；工业退化时代指秦汉小退化，魏晋南北朝为大退化，其后一直为大退化，然有唐、宋、明三代小进化；清代是退化而趋进化时代。

叶昌炽《语石》10卷刊行。

该书将从上古到宋元时期石刻的碑刻制度、书法演变、文字内容等予以讨论，是研究石刻的经典论著之一。梁启超认为“此书专博不及清代石学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

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标点出版，后多次再版。现通行本为中华书局1994年版，系与柯昌泗撰《语石异同评》合编点校本。

冬，罗振玉成《唐折冲府考补》1卷。

1912年9月又成《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1932年又成增补1卷、1934年又撰拾遗1卷、1938年编附录1卷。

陈寅恪开始游学欧美。

蒋斧《摩尼经残卷》（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1卷）由诵芬室敦煌石室遗书本刊印。

沈曾荫《中国实业史要》由北京顺天时报社印行。

伍瑶光《亚洲各国史》由广州粤东编译公司印行。

（日）天野为之著、吴启孙译《万国通史》2卷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日本人鸟居龙藏发掘旅顺老铁山积石冢。

1910 年

※ 章太炎发表《驳皮锡瑞三书》。
※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出版。
※ 章太炎《国故论衡》出版。
※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版。
※ 崔适《史记探源》刊行。
※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出版。

1 月

1 日　羲皇正胤（易本羲）在《民报》第 25 号发表《南洋华侨史略》。

第 26 号连载。作者曾在南洋任教，因病回到日本后，乃“于病骨支离之际，勉辑是书，冀或有以表彰我侨南汉族千百年光荣悲惨之历史于天下”。该文不仅对南洋华侨的起源、唐宋明时代的发展、海禁、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虐待、客家人的“南渡与洪天王之关系”、“华侨的膨胀力”、清政府笼络华侨的原因等都有论述，还初步解决了华侨史研究的资料、地理名称和纪年的统一等问题。

此文是目前所见以“华侨史”命名的第一部作品。

26 日　两江总督张人骏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缪荃孙为总纂。

2 月 23 日缪荃孙就任，4 月 28 日聘李详、丁国钧、陈作霖、柳诒徵等三十四人为分纂。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编纂中辍，其草稿涉及诏谕、天文、地理、渠道、经政、学校、武备、故事、人物、艺文等十二类。1917 年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为总纂，缪荃孙遣其子缪僧保参与编纂，数年后志局再被裁撤。1929 年江苏省又以庄蕴宽为总纂组织志局，其后中辍。1945 年，汪伪政权以吴廷燮为主编，方成全编，除金石等少部分志书沿用旧稿外，余均有较大改动，但只《大事记》、《建置志》的部分

印行于世。缪氏所著《金石志》于1921年以《江苏金石志》为名单独刊行。

30日 《国粹学报》第62期刊载《国粹学报明年之特色》。

该文称《国粹学报》“发刊至今已屈五周年矣，神州学术五千年来广大日新，靡有穷尽”，《国粹学报》“力避浮华而趋于朴学，务使文有其质，博而寡要，非关于学术源流，有资考古者不录。庶几韩子所云惟陈言之务去者。至于保存古物，不遗故闻，训释周秦诸子之书，使尽可读，引申乾嘉诸儒之学，不绝其绪，铨明小学，以为求学之门径，谨守古谊，以毋越先民之训，五年于兹。抱兹坠绪未敢或渝，是则本报区区之志，所欲天下共见之者也。明年之体例则益求美备，分为二篇。外篇则录现世海内鸿硕新著，外篇则兼收前人未刊之著作，及已刊而系孤本世所罕睹者。上至明末国初诸儒，下逮咸同学者。苟有遗编，悉加甄录。志在上包国朝二百余年学术之流派，下尽数十年海内名家之著作，掇其菁华，成兹巨制”。

是月 国民教育社编《新体高等小学中国历史》(第1、2册)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2月

金陵大学成立。

1907年美国教会将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2月又将宏育书院和汇文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该校史学系科虽然是金陵大学建校时期就创设的系科，但初期开设并不理想。1914年改组文科，历史科被并入社会学系。1921年教育部视察该校报告指出，“文学、历史等科，虽有中国教员二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历史科甚至涵盖在社会学系下，“当世无此类别”。根据教育部的建议，金陵大学文科改科目为系，创建独立的历史学系。金陵大学历史学系特别重视中外近现代史的研究和史学理论的探讨，并强调兼习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培养出了不少史学名家。

刘师培《左盦集》刊行。

《国粹学报》刊载广告称，“近扬州刘申叔先生将平昔说经及考订子史之作编为《左盦集》”。该书是刘师培最早的自定文集，在古史研究、文献研究等方面有许多参考价值。

沈文濬《国耻小史》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

3 月

1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63 期发表《与王鹤鸣书》。

章太炎在此信中提出如下观点：一、“学者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六艺”，故“经术致用，不如法吏”；二、“左丘明之学，赖《史记》存其故训，不绝如线，言先黄老后六经诚过，八书乃不逮《汉志》翔实”；三、不太赞同辞章诗歌能“用贤于历史”之说，而“荀卿欲隆礼仪，杀诗书，仆亦以为当如是矣”；四、不认同“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的观点，指出“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涂，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

王国维在《国粹学报》第 63 期发表《宋大曲考》。

第 64—68 期连载。

10 日　《教育今语杂志》在日本创刊。

该刊是光复会的“通讯机关”，由章炳麟主办，实际为陶成章等人所办，钱玄同任编务。其《章程》云：“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刊行教育今语杂志的缘起》指出：近世以来，“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弃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章氏等人因故设立《教育今语杂志》，以“明正道，辟邪辞”。共设“社说”、“中国文字学”、“群经学”、“诸子学”、“中国历史学”、“中国地理学”、“中国教育学”、“附录”八个栏目，每月一期。

章太炎在《教育今语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文章以伏羲、仓颉、孔子、老子为线索，将中国历史的起源、语言文字的变迁、史学的发展和哲理的演化一一简述，是以白话文普及中国学术文化史的尝试。

15 日　朱肇飏在《商务官报》第 2 期发表《论各国赛会之种类及沿革》。

第 3、4 期连载。文章将博览会分为国内劝业会和万国博览会，梳理了两种博览会的变化和重要会议。作者指出劝业会始于 1761 年英国所办之农具发明等奖励会，万国博览会始于 1855 年法国巴黎第一次万国博览会。作者最后指出希望借助这种博览会，能使国人冲破旧法束缚，开拓眼界，更新实业思想，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

30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64 期发表《驳皮锡瑞三书》，

挑起今古文学派在清末的又一次论争。

章氏对皮锡瑞所著《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以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曰："《王制笺》者，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说已荒忽"；"《经学历史》钞疏原委，顾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法，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开办。

1908年8月，学部奏请分年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列为八科，经学、法政、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以"所以造就专门人才，研究精深之学业"，并计划1909年"必须设立"。光绪谕令准许办理，但因种种原因，延至1910年才正式开办。经科大学以柯劭忞为监督，文科大学以孙雄为监督，罗振玉为农科大学监督。

是月 《国粹学报》改版。

新版《国粹学报》不仅以经史子集设栏，而且将每个栏目分为内外两篇，内篇是当世学人的著述，外篇则"录前人旧著"，多为汉学考证性文字或"有关于学术源流之大者"，如黄宗羲的《深衣考》、孙诒让的《汉卫鼎考》、郑文焯的《南献征遗》等。

4月

9日 章太炎在《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发表《常识与教育》，对历史教科书编纂提出新主张。

作者认为历史教科书应该这样编写："大概历史中间最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都在志和杂传里头"，"把这几件为纬，历年事迹为经，就不怕纷无头绪"。

章太炎在《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发表《论经的大意》，反对废经。

章太炎指出，尽管诸子著书也称"经"，但"经"本来"只是官书的名目"。此文中不仅对"六经"本身有所讲解，还论及历代六经注疏"好坏"，十分有助于学识不深或初学者对"经"的把握。章太炎认为"经典是最初的历史"，是不能废的，如果中国史可废，西洋史亦没什么用处，所以"废弃经典的妄论"，是"没有立论的根源"。

20日 沧江（梁启超）在《国风报》第7期发表《中国古代币

材考》。

文章考辨梳理的币材有贝、龟币、皮币、粟、帛布、禽畜、器具、珠玉。作者最后得出结论，指出“古代之货币，非自始即能用金属以为材也”，金属币是最后才确定的。该文固然有错误的地方，如以出土的甲骨文为龟币，但其结合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考据学等知识进行研究，在当时具有开创性。

25 日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在兰普勒希特重视世界文明史研究思想的启发下，梳理中国从上古到清代中期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作者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的创始时期，一是汉唐的继承时期，一是宋明的理学时期，并认为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儒家学说不断成熟和系统化的过程，戴震等人试图冲破理学束缚的努力意味着中国伦理思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该书虽然有模仿借鉴日本学者成果的痕迹，但由于蔡氏对中国传统经史资料的熟稔和他对西方近代伦理学观点的融合，使得这部著作仍具有开创性意义和学术生命力。1937 年该书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再版，并在 1941 年被日本学者翻译为日文。

5 月

8 日　章太炎在《教育今语杂志》第 3 册发表《论诸子的大概》。

章太炎对“诸子”进行通俗的阐释。他认为“诸子”都是源于“官”，诸子并立格局初步形成“总在周末”，而“开九流著书”风气的，是老子。章太炎并指出“各家虽有不同，总不能离开历史”，“九流都有历史的根据”。章太炎并批评“把道家道士看成一样”、小说家里“只剩了许多闲谈奇事”、把名家、墨家、纵横家全“送在杂家圈子”等“荒唐事”。

28 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 66 期发表《原学》。

作者认为“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细征乎一人，其巨征乎邦域”；学者“非徒博识成法，挟前人所故有也”；“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

该文与《訄书》重订本所刊《原学》有较大不同。该文被收入《国故论衡》。

6月

7日　章太炎《国故论衡》由国学讲习会出版。

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中卷论文学，共七篇。第一次提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著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并论及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尤其推重道家，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

章氏最先发明“国故”一词，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始者。后来钱穆评价说：民初新文化运动，实“亦一套《国故论衡》，将旧传统逐一加以新观念、新批评，如是而已”。“太炎此书特称国故，此国故两字，乃为此下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所激赏。……《论衡》者，乃慕效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以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

钱穆认为，胡适曾颇受此书启迪：“适之归国，讲学北大，写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上册，……此书中观点及取材，颇多采自太炎之《国故论衡》”，“适之则径依西学来讲国故，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

26日　章太炎在《国粹学报》第67期发表《原道》。

此文分上中下三篇，旨在发表章氏对道家之认识。胡适认为此文是对道家学说贯通的看法；贺麟认为此三篇最能道出道家的长处；姜义华认为此三篇以阐释老子为中心，比较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以及他们的政治实践。近有研究者认为，章氏仅对《老子》、《庄子》中部分文句或篇章感兴趣，《原道》三篇并不以研究道家学说为指归，而是借题发挥，表达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该文被收入《国故论衡》。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67期发表《元太祖征西域年月考》。

刘师培认为元太祖一共两次亲征西域，第一次在太祖九年，一次在十三年，此次亲征至二十年始返。但因为“元太祖征定西域，典籍所记年月各有不同”，刘师培乃撰文考辨，以正诸人之误。

是月　胡适考取第二批留美官费生。

胡适决定攻读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入学不久转学文科，1914年毕业。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其学术兴趣逐渐集中在哲学、史学和文学方面。

7 月

7 日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由谋新室出版，为我国第一部以“文学史”题名的著作。

该书内容广泛，涉及字体变迁、音韵变迁、训诂变迁、文体变迁等内容。该书虽受到《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及教科书形式的制约，内容繁杂，但在一些论述中也接受了一些新观念、新学理。郑振铎等认为该书是在我国自著且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名的最早著作。

该书封面标“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版权页标“宣统二年六月朔校正再版”，可能是因为此书曾在1910年的《广益丛报》连载。版权页另标“宣统三年起至中华民国三年六版”，“印行兼发行者：武林谋新室”，“发行所：上海棋盘街北段上海科学书局”，以此判断，此书可能就是一些研究中国文化史研究者所谓林传甲191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

有研究者认为，该书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关系亦不深，实际是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在用意与宗旨上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是月　四川存古学堂开学。

该学堂的宗旨是保存国粹，并尊蜀贤，培养文史通才，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第一任监督为谢无量。1913年10月该校改称四川国学学校，1918年9月，经学、史学、词章三门改为哲学、历史、国文科并定名为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1927年8月改称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在该校任教的先后有张森楷、曾学传、杨赞襄、吴之英、罗时宪、刘师培、廖平、宋育仁等。存古学堂建立后接受了原锦江、尊经书院三百余种著作的雕版，并设存古书局刊印古书，如《四史》、《廿二史劄记》、《相台五经》、《许氏说文》等。

8 月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滨田耕作等人调查旅顺刁家屯汉墓等遗址。

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人此行主要是调查旅顺刁家屯汉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冢，1911年10月和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人对这些古墓等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白陶残片。

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等到北京调查被斯坦因、伯希和洗劫后残余的部分敦煌遗书。

日本人大谷光瑞考察队第三次进入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掠

夺，骗购若干敦煌文书。

9月

14日　梁启超在《国风报》第22期发表《日本吞并朝鲜记》。

第23期连载。日俄协约成，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梁启超有感于此，撰文叙述分析日本吞并朝鲜之过程，并分析日本能够吞并朝鲜之原因，文后附《朝鲜对于我国关系之变迁》一文，是中韩关系史研究的早期作品。

同期还刊载了梁启超的《朝鲜灭亡之原因》一文。

10月

5日　缪荃孙重编《续碑传集》目录。

缪荃孙将近三十年辑录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人物的碑传编成《续碑传集》86卷，并在1910年送江楚编译局刻印。该书共收人物1111位，引用文章作者359家和志书16种，分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属、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官、佐贰杂职、武臣、忠节、藩臣、客将、儒学、文学、孝友、义行、艺术、列女二十二类。由于缪荃孙为文私淑全望祖“以翔实为主，不尚空言”，所以该书注重收集文献，记录史事。该书在编排体例等处继承了钱仪吉的《碑传集》，但也在不少地方有突破，如范围不限于“名臣”，收录自己撰写的碑文，不分经学、道学、理学、儒林，悉改“儒学”等。

11月

伍光建编《西洋纪要》第一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第一编从上古讲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第二编讲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1918年3月第二编出版后，未见第三编出版。

12月

21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73期发表《周代吉金年月考》。

文章以“三统历、周历为主，以殷历、鲁历为辅”来考证周代青铜器之年月，以为“治吉金者之助”。刘师培共考证了“散季敦”、“师旦鼎”等可见的三十多个周代青铜器铭文所记的时间。

是月　曹佐熙《史学通论》由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出版。

此书共有史学之源流、史学之经纬、史学之繁难、史学之关系、史学之研究、史学之旁通、史学之未来等内容，在诸家史论中较为系统。作者

认为，“史”与“史学”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客观事实以及历史书籍，而后者则为研究历史、编纂史书及培养人才等等。

是年

章太炎主办的《学林》在日本出版。

《学林缘起》云：“中道剥丧如今日者”，“其咎不专在趋新。徒以今文诸师，背实征，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已先冒赣，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重以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匿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今之所急，在使人知凡要”。《学林》共分十二目，主要有“名言部”，“以发明小学为主，经典传记诸子杂文之诂亦附焉”；“制度部”，“略采《通典》之法以成斯部，三礼之说尤要”；“故事部”，“自经籍及后代诸史所记事迹，有所考证，皆如此部”；此外还有“文史部”、“学术流别部”、“风俗部”等。

《学林》每三月刊行一册，实际上共出二册，第一册除《缘起》外，均为章太炎撰文，有《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上下）等。其中《信史》一文批评了当时舍经籍而唯以金石器物证史的倾向，驳斥了历史进化论。第二册有《征信》、《秦政记》、《秦献记》等文史类文章。

崔适《史记探源》崔氏觯庐初刻本刊行，对后来的疑古派产生了很大影响。

全书八卷，首为序证，论说贯串全书的问题，如春秋古文、尚书古文、书序、终始五德、十二分野等，然后分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一加以考辨，除《管蔡世家》等十篇外，皆有深入辨析。作者结合《汉书》，对《史记》作了较细密的辨证，探源竟委，旨在删剔后人伪窜，勘正颠倒脱误，恢复其本来面目。此书从经学角度研究《史记》，其核心思想是今文经学的观点。作者认为今本《史记》乃经刘歆窜乱，又有后世妄人所增，“刘歆之续（史记），非不足于太史公也，亦既颠倒五经，不得不波及龙门以为佐证、而售其为新室典文章之绝技也。”

从学术渊源上看，作者明显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其观点和论据多有采自康书者。崔氏此书为后来顾颉刚、钱玄同等疑古派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

本书后有北京大学印本。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出版，开创了甲骨文研究分类推求的

研究方法。

日本人林泰辅1909年发表《清国河南汤阴发现之龟甲兽骨》，并寄给罗振玉请教。罗氏遂撰写此书。此书分四章：考史第一，“以订正史氏之疏误”，主要涉及“殷之都城”和“殷帝王之名谥”；正名第二，主要讲文字；卜法第三，系用出土实物来验证传世文献关于卜法之论述；余说第四。本书考证了甲骨出土之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为商“武乙之墟”，卜辞为王室的遗物，不仅补日本学者林泰辅所作《清国河南汤阴县发现之龟甲兽骨》一文所未备，而且为殷周史研究，指出了最可靠和最基本的历史地理根据，为后来研究甲骨文字的学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由《教育今语》杂志社在日本出版。

此文系陶成章在南洋的演说，1910年经整理在日本出版，该文对中国的秘密会教门的发源、派别、演化、会教门制度的弊端及其与清末反满革命的关系等都有阐述，是研究中国秘密会教门最早的成果之一，对此后的秘密会社研究颇有价值。1928年5月，此文被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收入“史料丛刊”再版。

孙德谦《诸子通考》3卷刊印。

作者自云：“诸子通考内外篇，为古人辨诬、来学辨惑而作也”。“诸子为专家之业，其人皆思以救世，其言则无悖于经教。读其书者，要在尚论其世，又贵审乎所处之时，而求其有用。”

1921年8月，胡适读此书后，认为“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此书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很有见地的议论”，“此书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

吴士鉴《九钟精舍金石跋尾》自刊。

本书甲编一卷，乙编一卷。作者“于暇时讲求金石，遍搜厂肆，得拓本益多。考证地理官制，积有跋尾若干通。是为《九钟精舍金石跋尾》之创始”。

《中国教育史》出版。

这是第一部中国教育史，1910年著成，无出版日期和出版社。原署“瑞安黄绍箕”编，柳曾符认为实际黄仲弢只拟一个目录即去世，后由柳诒徵辑补而成。

杨赞襄《史记发微》在成都刊印。

刘瑞霖订，孙凤翔、赵荫同辑《东三省交涉辑要》一书印行。

1911 年

※ 罗振玉创办《国学丛刊》，王国维撰写发刊词。
※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出版。
※ 杨守敬主持编纂《历代舆地图》完成。
※ 屠寄纂《蒙兀儿史记》行世。

1 月

20 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 74 期发表《白虎通义源流考》。

文章对传统学术中“通义”概念的出现、各家之说、使用情况等进行简要梳理，并阐释其含义，以为说经或校勘古籍者助。作者认为“通义”与“议奏”不同，“通义之于议奏，采择全帙，割裂书卷，裁篇别出”，“通以通经为旨，义取释义为名”，“通义出于众，论成于独”。

30 日　《山东通志》总纂孙葆田去世。

1890 年山东巡抚张曜奏请设局修纂《山东通志》，不久张氏死于任上，纂修中辍。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杨士骧就任巡抚，重启纂修工作，仍以孙葆田为总纂。孙葆田又聘法伟堂等协助，但不久杨氏调任直隶，法氏去世，孙葆田独自经过六年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书稿主体。孙葆田积劳成疾去世后，在籍候选道历城人毛承霖提调局事，督率编辑诸人继承孙葆田未竟之业，又历半年时间而稿本初就，但随着清廷灭亡而搁置。1914 年，张英麟、王晋藩等又集资开局，对孙稿进行校补，1915 年交山东通志局铅印，三年方竣。1934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又据此影印出版。

该志叙事以宣统辛亥年为止，共 200 卷 620 万字，分舆图、通纪、疆域、职官、田赋、学校、典礼、兵防、河防、艺文、人物、杂志等目。该志体例完备，卷帙浩繁，参稽古籍，赡博精审，刊印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山东通志之集大成者，通志中不可多得之善本，对研究山东地方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是月　张国淦初步修成《黑龙江志略》。

作为黑龙江历史第一部通志，该书共十四万字，分地理、人种、官制、财政、外交、实业、交通、边务、宗教等十四卷。此志参照了《河南通志》、《陕西通志》、《广东通志》等地方志的体例，义例分明，条理清晰。此志最大的特点是突出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既记录了黑龙江的史实，又突出现实情况，起到"经世致用"的效果，故张国淦在序言中指出，他编纂此书的"微意"是能"供当事者之参考"。由于时间仓促，此志也存在缺人物、艺文等志，宗教、边防有目无文等缺点。

王国维撰成《古剧角色考》。

此文"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角色考其源流变化，并附以私见，但资他日之研究"。王国维在文中逐一考辨梳理了"净"、"末"、"旦"、"生"、"丑"等戏剧角色，并认为戏剧萌芽时代"无所谓角色"，宋代戏剧角色表示"人之地位职业为多"，自始以后，角色变化约分为三级："一表其人在剧中之地位"，"二表其品性之善恶"，"三表其气质之刚柔"，"自元迄今，角色之命意不外此三者，而渐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之势，此其进步变化之大略也"。文末附有《面具考》、《涂面考》、《男女合演考》。

章起渭编译、傅运森校订《西洋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依据日本濑川秀雄1907年所著《西洋通史》教科书改变而成。濑川秀雄在该书序中说"日本帝国将一跃而与欧美列强伍立于最光辉之地，为国民者不可不熟读西洋史，览其文化发展之次序，国民隆替之状态，及欧美现时之大势，俾确知日本所处世界之位置也"。作者在书中不仅梳理了从古代到"最近趋势"的西洋历史，而且探讨了西洋通史的理论性问题，是清末民初影响较大的一部西方通史著作。

2月

18日　刘师培在《国粹学报》第75期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

第76—82期连载。该文为中国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

是月　罗振玉创办《国学丛刊》。

由王国维、罗振玉编辑，北京国学研究会发行，石印线装书形式，附有甲骨文拓印的图片和各种铜符的拓片。其宗旨是："续前修之往绪，助学海之涓流"。内容分经、史、小学、地理、金石、文学、目录、杂识八类；侧重中国古代典籍的辑佚、校勘、考证和注疏。该刊发表过罗振玉《周易王注唐写本校字记》、《殷虚书契前编》、《隋唐兵符图录目录》，王

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缪荃孙《艺风堂题跋》等文。

因武昌起义爆发，刊出两编即停刊。

王国维为《国学丛刊》撰发刊词。

王国维提出学无中西、新旧、有用无用之分，试图冲破“中体西用”思维模式的束缚。王国维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是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是史学、“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是文学。三者非截然有疆，实则紧密相连，互相影响，故“真知学、真为学者”，要破除门户之见，会通各学，以求真知。王国维还阐述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认为“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治文史之学，如无科学上的知识为之辅助，则不能得其真”。这些话初步体现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学方法论的重大改变，此种观念在此后中国史学发展中逐渐得到实践。

《王国维年谱》按：先生早年治泰西哲学，本思有以“贯串精博”，虽未能终其业，但对世界学术之潮流，文化发展的大势，固已早有所了解。如云治文史之学，如无科学上的知识以为之辅助，则不能得其真。这句话，已为现代历史学者奉为圭臬，先生以前的大学问家都没有道及。然其卓见远识，又不特此一端而已。先生虽也以半生精力专治经史考证，但方法不同于乾嘉诸老，而深度又过之，其故就在先生已具备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知识，而乾嘉诸老于此茫然，所以日本汉学家狩野宜喜说：“王静安先生的伟大，就在于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道理在此。

吴曾祺编、赵玉森重订《中国历史读本》（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月

25 日　张其勤在《东方杂志》第 1 号发表《西藏宗教源流考》。

第 4—6 号连载。作者认为应该加紧研究佛教，因为“佛教与西藏有密切之关系，外人固欲利用之以施其政策也”，且“今欲谋西藏行政之改良”，不可“不于宗教加之意”，故著此书“以为言西藏政教者之一助”。作者张其勤在藏三年，“于藏中之政教历史，博考周谘，征要典于档案，稽异同于番书，所纂辑甚宏富，宗教源流考，其一种也”。

《东方杂志》第 1 号转载蒋瑞藻《小说考证》。

是文以辑录为主，分别对《琵琶记》、《西厢记》、《三国志》、《水

浒》、《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施公案》等著名小说进行研究，实开此后胡适小说考证的先河。

4 月

3 日　学部上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

该章程将存古学堂的办学宗旨定为“养成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与此同等学堂之经学、国文、中国历史教员”；学制为“中等科五年毕业。高等科三年毕业”；专业仍分“经学、史学、词章三门”；在课程方面，不仅细致规定了课程讲授时间，还详细制定了“分年讲授法”，从经学和史学来看，其研习之书及方法，基本是乾嘉汉学的内容。

23 日　孙毓修在《东方杂志》第 2 号发表《唐写本公牍契约考》。

此文共对十分敦煌文献进行诠解，系中国人利用敦煌文书社会经济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较早学术论文之一。

29 日　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1912 年 10 月改“学堂”为“学校”。由于该学校系为赴美留学预备的性质，故该校课程以英文、美国文学、美国史地为主，学制和教材等亦多搬用美国学校，“国学部”不受重视，课程较少，内容陈腐，“新文化”运动发生和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到清华授课以后，此种状况才开始改变。1925 年 4 月 23 日，清华学堂改组为包含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的学校。1926 年 4 月 16 日，清华第一次评议会决议设立 17 个学系，其中 11 个设立专修课程，分别是国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等，29 日由教授会选举系主任，历史学系由陆懋德担任系主任，陈寅恪担任暂不设专修课程的东方语言学系主任。

5 月

23 日　傅运森在《东方杂志》第 3 号发表《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

文章对元代西域阿鲁浑父子与西方联系的情况进行考证，并翻译阿鲁浑致法兰西国王信的内容。

6 月

26 日　梁启超在《国风报》第 15 期发表《学与术》。

作者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

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中国之敝，“一则学与术相混”，“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以用诸他事”，离术言学，“故有如考据帖括之学”，离学言术，“故有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袭取他人之名称，朝颁一章程，暮设一局所，曾不知其所应用者为何原则，徒治丝而棼之也”。

是月　殷鉴社编刊《近世亡国史》。

该书分别叙述朝鲜、越南、印度等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原因、经过及亡国后的惨况。

7 月

20 日　《东方杂志》第 5 号刊载《永历太妃谴使于罗马教皇考》。

该文对南明桂王朱由榔之嫡母太妃王氏等人信奉之事迹及其遣使前往罗马祈福事进行考证梳理，并概述所涉及人物之生平、录存永历太妃致罗马教皇之信。

是月　刘师培撰成《周书补正》6 卷。

此书是刘师培在朱骏声、田普实、戴望、孙诒让等人对《周书》研究基础上的再探讨，有较大价值，是刘师培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之一。

8 月

20 日　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作者在例言中指出该书“以介绍我国外交失败之历史于国民为主眼，故凡有国际重大交涉，其源委曲折，及其变迁，均不厌详细述明，俾国人知国家演成今日现象之由来”。本书初版共十四章，内容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俄罗斯对中国之侵略、琉球之丧失、云南马嘉里事件、安南之丧失、缅甸之丧失、中日战争、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西藏问题、日本与中国之关系、清末时期各列强对话之态度等。1914 年 8 月出版增订版，加写民国成立后的外交及各国对华之态度，1921 年 6 月出版增订三版，增补了“老西开”事件、西藏、外蒙问题、中俄、中德关系等内容。

该书出版后获得好评。胡适《归国杂感》中所说“此外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可能就是指此书。

9 月

1 日　酉海在《进步杂志》第 1 号发表《东方旧文明之新研究》。

12 日　《国粹学报》出版第 82 期后停刊。

10 月

10 日　辛亥革命爆发。

是月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大革命写真画》开始出版，为最早的辛亥革命史图册。

至 1912 年 4 月，此图册陆续出版 14 集，每集收录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军政人物和时事的照片 40—50 幅，中英文对照，内容编排较系统。此画册是辛亥革命全记录，从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成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场景，如清军火焚汉口民居、武昌民军预备出队、汉口民军巡行租界、广东北伐决死队、湖南独立后特别议会开幕等，均以影像形式真实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1 月

3 日　江苏巡抚程德全上《奏存古学堂暂行停办折》。

其以咨议局在“宣统三年苏属地方经费岁出预算案”内请裁撤存古学堂和学部《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内允许各省视财力情形办理为由，请准江苏暂行停办存古学堂。此后各地存古学堂陆续停废。

是月　武昌起义爆发，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弃文学而转向研究经史考据之学。

王国维旅居日本四暑五冬，其师藤田丰八等人皆来相聚。罗振玉云：“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人狩野直喜也指出：“中国革命发生，王静安君携家与罗叔言君同来我国京都，居住了五六年，在这段时间，他与我经常有往来。从来京都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当时王君学问研究的领域，已转了一个方向，当时王君似在精读《十三经注疏》，前四史也在精读之列。”此后王国维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的崇慕西洋文化，舍旧谋新，惟恐不力，从此也绝口不谈了”。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国第一部社会史

专著。

该书主要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饮食、婚娶、丧葬、忠义、名节、风节、廉耻、乡评、清议、淫祀、巫觋、氏族、游侠、佛道、美术、诗歌、士习、语言等。作者将风俗的变异划为四个时代，并以此分四编叙述。此书后多次再版。

是年

杨守敬主持编纂《历代舆地图》完成。

1906—1911 年陆续刊行。这部地图集的编订始于 1876 年，其间经过多年的艰辛劳作。其弟子熊会贞共同参与编制，还得到邓永修、饶国秩、马范畴、陈济等帮助。

《历代舆地图》共 34 册，是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历史图籍。总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共 71 幅，分图则依朝代和所据材料加以标题，自春秋至明代共 45 幅。《历代舆地图》根据历代正史地理志，无史志则以后人补修的志为据，在图上标绘出每个统一王朝和分裂割据期的疆域范围，勾画出一级行政划境界线，标出各代统治中心、郡县设置和著名历史事件地点，提供了明确的今地概念，超越以前任何地图，对于研究历代政治地理，极具参考价值。此外，它采用清初胡林翼实地测绘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本，以每方里约百万分比例绘制。这样编绘出的历史地图，内容详细准确，实乃创举。

《历代舆地图》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历史地图。过去虽有许多史地学者从事历史地图的编制，但是基本停留在断代编绘上。直到杨守敬才有了各朝详细完整的以疆域沿革为主体的历史地图。

屠寄纂《蒙兀儿史记》初刻 54 卷本行世，开创了民族专史编纂的先河。

此书系作者 1895 年宦游黑龙江时着手撰写，边撰边刊行，至 1921 年辞世尚未完稿。遗稿经其子孝实、孝宧整理，陆续刊行，至 1934 年定本 28 册 160 卷本始全部面世。辛亥革命爆发的同时，发生了所谓“蒙古独立”事件。屠寄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热忱而刊刻此书。

《蒙兀儿史记》160 卷为纪传体蒙古族通史，计本纪 18 卷，列传 129 卷，表 12 卷，志 1 卷。因是屠寄未完稿，经其后人整理而成，故全书 160 卷中有 14 卷为有目无文，而诸志亦只有《地理志》。该书采用自撰自注形式，正文之下有分注，注明正文所载史实的来源，或对正文作补充、说明、考证。每卷或篇之后皆有“论曰”。

《蒙兀儿史记》对元史学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屠寄广泛利用了元人的文集、诗赋、金石、方志等资料，以及近人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大量采录西方史料，补充了元朝史以外的大量史实。正如孟森所言："所得固多出于旧史，然其参订旧史以综合新材，无一字不由审订其地时日而后下笔。"《蒙兀儿史记》记载范围不局限于有元一朝，而着眼于其民族来源、发展过程及其延续线索。时间上，详于蒙古族起源、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等先元四朝史实，以及补充了妥欢帖木儿汗以后元政权衰亡的线索。地域上，详于蒙古族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国过程及其后王事迹，对西北、东北地理及历代中西交通亦有所记载。此书对旧《元史》史实上的讹误也有订正。

《蒙兀儿史记》系统完整地展现了蒙古族和蒙古帝国的历史，从而突破了历来元史研究的格局，将元史研究扩大为蒙古史研究，开创了民族专史编纂的先河。

春，王国维撰《隋唐兵符图录说》，为王氏治古器物学之始。

该文后刊入《国学丛刊》第 3 册。此文系对罗振玉所辑《隋唐兵符图录》的研究成果。王国维在该书中详细论述兵符制度，并考定《隋唐兵符图录》所收兵符的种类、名称等。此为王国维治古器物学之始。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集虚草堂丛书本刊印。

全书 12 卷，借鉴《史记》、《汉书》体例，采录明初至清末桐城籍人物九百多人的行迹，各有专篇或附见，略依时代先后编排。所收人物包括王侯将相，仆役村民，或名卿、硕辅，或忠孝、义士、烈女，涉及约五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农田、水利、交通、文化、艺术、医学等方面的历史。此书征引文献广泛，有《明史》、《桐城县志》、传主文集、谱牒、墓志，以及口述史料和个人见闻等。

康有为著、麦仲华辑《戊戌奏稿》印行。

该书辑录康有为在戊戌年间所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等奏章二十份。该书出版后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重要资料。但此书所收奏章后来被黄彰健、茅海建等研究者认为存在故意篡改的问题。

罗振玉编印《殷虚书契前编》。

该书由《国学丛刊》石印，1913 年珂罗版影印本 8 卷，共收录甲骨 2221 片。很多重要材料被后来研究者广泛引用。

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刊印。

罗振玉得知甲骨文出自安阳小屯，派其弟到小屯调查并收购、发掘甲骨，前后获得三万余片。

1912 年

※ 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 马裕藻、朱希祖等发起“国学会”。
※ 历史陈列馆成立。
※ 马相伯等提出创建“函夏考文苑”。
※ 黎世蘅《中国经济史讲义》印行。

1 月

1 日　清帝退位，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陆费逵等创办中华书局。

3 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19 日　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掀起修订历史教科书的运动。

该办法不仅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对经学的传承影响深远，而且指出“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此方法颁布后，教育界出版界进行了一次全盘修订教科书的运动。

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原主编陆费逵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就意识到一旦革命成功，则教科书必改，建议商务修订适应共和国体制的新教科书，但商务印书馆因担心革命失败而有所顾虑，未开展此项工作。陆氏乃暗中邀人修订新教科书，并于中华民国成立时组建中华书局，大举进入现代教科书市场。中华书局 1912 年陆续出版了一套小学各年级的各门课本 44 种，称为“中华教科书”；27 种中学和师范课本于次年出齐。“中华教科书”由于配合了政治形势，适应共和政体的需要，中华书局也由此迅速崛起。中华书局修订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有汪楷、华绍昌编辑《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1—4 册），开智编译社编《小学历史教科书》（1—2 册），汪楷等编《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1—9 册），潘武、章嵚编《新编中华

历史教科书》（1—6 册），潘武编《中华中学历史科教书》（1—4 册），潘武编辑、刘法曾参订《历史教科书》等。

同一时期其他出版机构修订出版的历史教科书还有赵钲铎辑、沈恩孚校订《中华民国高等小学历史课本》（1—8 册，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共和国科教书新历史》（1—6 册，商务印书馆），章钦编著修订《中学中华历史教科书》（上中下册，文明书局），陈庆年编、赵玉森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等。

是月　《新疆图志》由新疆官书局刊印。

1905 年 7 月清廷饬令各省州县修订乡土志，新疆巡抚袁大化于 1909 年设立新疆通志局，自任总裁，由布政使王树枏为总纂（后王学曾继任），王树枏、王学曾、宋伯鲁、钟镛、裴景福、郭鹏等人实际纂修，历时三年，至 1911 年撰成。全书共 116 卷，200 余万字，分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事二十九门。作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全省通志，该志另有不少地方颇有价值，在编写方法上，该志编者认为方志是“经世之书”，“足为边才之宅助”，所以最忌传讹，所写内容“必目有所见”；在体例上，编者们认为应根据时势适当调整，不必一味模仿古人，如创立“国界”门；在思路上，“图志并重”的编纂指导思想也颇先进（实际全志仅有图 22 张，且有错误，但鼎革之际，仓促编成，已实不易）。由于王树枏、王学曾、宋伯鲁等皆学有所成，故该书“建置”、“国界”等门类都是佳作。1923 年东方学会刊印的重校增补本改正了不少错误，1965 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此书。

2 月

10 日　四川存古学堂更名为四川国学馆。

28 日　章太炎弟子马裕藻、朱希祖等发起“国学会”，推章氏为会长。

马、朱等人认为，“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要“补偏救弊，化民成俗”，必须弘扬“可以固国，可以立，可以诏后生，可以仪型万世”的国学。故请章太炎为会长，并“随时延请耆儒硕彦，分科讲授”。国学会讲学的科目大别有六：甲、文，小学（音韵训诂，字原属焉）、文章（文章流别，文学史属焉）；乙、经（群经通义）；丙、子（诸子异义）；丁、史

（典章制度，史评）；戊、学术流别；己、释典等。

3 月

10 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是月　天笑生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1 册出版。

该书将中华民国元年 1—4 月发生的大事每月一编，汇集成册，第 2—4 册分别于该年 5 月、8 月、11 月出版。

上海自由社编辑的《中国革命记》由自由社刊行。

此书收录了同盟会革命的事迹回忆、言论、传记和一些重要文献。

4 月

1 日　古研氏在《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0 号发表《中国秘密会党记》。

“桃源逸士”在文前短序说，秦汉以来两千余年之历史，“革命之事殆居十之三四，盖未尝不与秘密会社有因果关系”。该文简单梳理了自汉以后秘密会党发展的过程后，详细研究了白莲会、三合会和哥老会，认为白莲会是宗教性的秘密会党，而三合会和哥老会最后都变成了革命党。

是月　商务印书馆成立“清史编辑社”，初步提出清史编辑办法。

“清史编辑社”拟分纪传、编年二体以编史，并发布征求材料的广告，希望征集的材料有“私家记载名人传记之向未刊行及虽刊行而流传未广者”、“因触当时禁忌而未经刊布之记事及传记等”、“大政令大兴革大兵大工大狱等与当时奏报公牍异词或加详之记事”、“蒙古新疆卫藏等处之记载”、“各处人物著作政令官吏等之题名表谱及各种汇录”、“赋役漕粮盐茶等征收方法变革之记载及所用各种文字格式”、“名儒名宦及有特别技术者之传记年谱行状与其逸闻逸事肖像等”、“各地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建筑之与普通不同者”其记载及图画照片等。从上可以看出，“清史编辑社”希望编纂一部包罗广泛且真实可靠的清史。此后无该社进一步消息，编辑清史事亦不了了之。

5 月

1 日　京师大学堂被改为北京大学堂，严复任校长。

15 日　教育部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该校分预科、本科、研究科，本科分国文部、英文部、历史地理部等

六部，历史地理部的课程为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等，1913 年 8 月，该校历史地理部实际开办。1923 年 7 月 1 日，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设国文系、教育系、史地系等，史地系在 1928 年又拆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

蔡元培以教育总长身份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演讲中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是月 （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原名《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对白莲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及同盟会、光复会等组织及其文献有所记载。该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出版。

郭孝成《中国革命记事本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有“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各省革命志略”、“民清议和及共和国成立”三部分内容。该书系作者“荟萃见闻所得详加纂订”，并认为“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当以是书为渊汇矣”。

（英）麦开柏著、吴敬恒译《荒谷原人史》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6 月

四川国学院成立，刘师培为院副。

四川都督尹昌衡改枢密院为四川国学院，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聘有廖平、谢无量等。该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沟通今古，切于实用为宗旨”，负责工作有“一、编辑杂志；二、审定乡土志；三、搜访乡贤遗书；四、续修通志；五、编纂本省光复史；六、校定重要书籍；七、设立国学学校”。该年 11 月，四川国学馆并入国学院。

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讲授《春秋左氏传》，答诸生所问者，后编为《春秋左氏传答问》。

傅运森编纂，高梦旦、张元济校订《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6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1 号刊载高劳录纂《清宫秘史》。

第 2 号连载。文章以所录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购之“端肃遗事秘札”

十二封为主体，附以简单阐释，对慈禧和奕䜣发动的“祺祥政变”进行了初步研究。

9 日　历史陈列馆成立。

至 1926 年 10 月，该馆正式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29 年 8 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1933 年 4 月改名为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平博物馆，1949 年 10 月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8 年 8 月国家决定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1959 年 9 月建成，1961 年 7 月 1 日开放。2003 年 2 月 28 日，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10 日　蔡元培在临时教育会议提出废止读经主张。

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是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临时会议，在演说中提出“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以破除“自大旧习”。

9 月

20 日　《四川国学杂志》月刊在成都出版。

该刊为四川国学院的院刊，“以发挥精深国粹考征文献为宗旨”，分“通论”、“经术”、“理学”、“史学”、“政鉴”等栏目，先后刊登了刘师培、廖平等人的研究论著，从 1914 年起，改名《国学荟编》。

是月　孙诒让辑校《永嘉郡记》由孙氏玉海楼石印再版。

《永嘉郡记》为南朝宋郑缉之所纂，唐以后散佚，孙诒让始为之辑校成书。1878 年（光绪四年）初刊，此系石印再版并加标点和注释，重新编定目录，将全书条目分成叙山、叙水、物产三类。另外，本书还收录了孙诒让所撰《永嘉郡记》校集本的三篇题跋及《温州建置沿革表引》。

10 月

7 日　陈焕章、麦孟华等在上海组织孔教会。

10 日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始写定。

此文初稿写于 1912 年春，日人铃木虎雄译为日文，刊于本年《艺文》第 4—6 期。此篇要旨，在考中国古代书册制度之演化。文中提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简策之别以长短为定，而周秦两汉间简策的种类也不相同。其所用方法是分类考究的办法，罗振玉在《集蓼编》中即说：“予在海东，与忠悫论今日修学宜用分类法，故忠悫撰《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皆用此法。”后沙畹考释汉晋木简，亦采此种分类法。

24 日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该令第一条即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它还改变晚清大学的分科方法，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诸科。

是月　马相伯联络梁启超、章太炎等提出创建“函夏考文苑”。

马氏等人主张仿法国“阿伽代米”（学院）之制，成立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从事语言文字、哲学、考古、数学、动植物、艺术等研究。其目的在于“作新旧学”，“奖励著作”。“该苑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以表彰学术、振兴道德和导引社会为任。成员“定额四十名，由苑公举。所举须有精当佳作已行于世者乃可，无其人，不如虚其位”。为实施这一计划，他不仅初步拟定了一份包括屠寄（史学）、陈汉章（群经史）、杨守敬（金石地理）、刘师培（群经）等十五位“苑士”的名单（加上马氏及章太炎、梁启超、严复四位发起人，共十九人），还为选择苑址和筹措开办经费到处奔波。后因经费、人才等方面困难未办成。

1913 年 11 月 22 日，章太炎致信袁世凯，重提设“考文苑”的建议。章氏认为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著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迩来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章太炎计划考文苑有四十人，经费数十万元，后终未成。

黄魂编《诸烈士血书》由上海神州广文社出版。

该书内分“血史”（中国古代抗金、元、清英雄的事迹）、“血魂”（收录民族英雄的诗歌）、“血书”（收明末清初一些抗清人士的绝命书）三部分。

李翊灼在《古学汇刊》第 3 编发表《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论著述目录》。

此系敦煌文献第一个专题目录。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称赞该目录“打开了我国研究敦煌佛经的门径”。

11 月

《中国学报》在北京创刊。

由中国学报社编辑发行。编者们认为虽“国体改建”而“吾道当昌经天之辉，未容稍晦”，“伤国学之侘，傺思鼓吹以休明”，故创办《中国学报》。该刊的宗旨是“保存国粹，瀹发新知”。汪精卫在“发刊辞”中指出，“古学复兴之世，或在斯时”，中国学人要“从此急起直追，乘欧

美学术思想之潮流，弃向日帖括声韵之细微，取历来学术文艺美术之大者而研究之，与欧美学者相周旋，当必能融贯会通，郁为国光”。栏目设有“论著”、“小学”、“史传”、“掌故”、“舆地”、“金石”等。至1913年7月第9期后停刊，1916年刘师培复刊后又出版5期。

王式通在《中国学报》第1期发表《答人问史稿凡例》。

王式通就传统史学尤其是通鉴类史书的体例、内容以及征引文献时的分注书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一些观点颇值得重视，如针对通鉴材料太多的问题，王式通认为“取材之法，须有世界眼光”。对于官修史书，王式通直接指出其操作方法和问题所在：“列朝实录，只据军机档册，国史馆所纂之志则（据）各部院公牍，表则题名录也”，而列传则“据疆臣奏疏或私访子孙状述，无以上可凭者，则按一定成式填写”。

郑业敩在《中国学报》第1期发表《独芙斋金石文考》。

第2、4—7期连载此文。该文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对一些金石器物的考释，如师虎敦、汉长安鼎、秦琅琊台刻石、毛公鼎、齐侯敦等，另一部分是对一些比较难以辨认的甲骨文等进行的解读，如“家”等。

《中国学报》第1期刊载李慈铭《越缦堂笔记》。

第2—5期，复刊第1—5期连载。1915年8月10日《甲寅》第8号刊载文廷式批阅的《李莼客日记》。从文廷式前识“《李莼客日记》数十册，尚未刊，其中论时事记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因种种原因未能甄采，乃“就其荀学斋一种略采数条，以著梗概”。以此可知此处所刊文章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一部分。在清末民初，《越缦堂日记》的价值已经为人所知。

12 月

1 日　罗惇曧在《庸言》第1期发表《庚子国变记》。

作者根据李希圣在庚子事变前后在北京时所做日记为基础，补入自己所闻慈禧光绪西逃后之事撰成此文。文章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北京的活动及慈禧光绪出逃时的情形、李鸿章的外交活动都有述及，为研究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 日　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历史教育做出规范。

该规则规定“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等为中学学科。关于历史科目，规定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

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历史分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历史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外国历史授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著名各国之兴亡，人文之发达，及与本国有关系之事迹”。

10 日教育部又公布《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历史为本科第一部（修业四年）的科目，其要旨“在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历史分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历史宜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外国历史授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著名各国之兴亡，人文之发展，及与本国有关系之事迹，兼受教科法”。

同月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则规定：“本国历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教授本国历史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

16 日　吴贯因在《庸言》第 2 期发表《中国动产私有制及不动产私有制之起源》。

作者认为“太古时代，一切财产，皆属公有，个人无所有权”，待生产方法进步，未来观念发生以后，“私有财产之制乃以起焉”。文章指出，财产私有制是从动产开始，然后扩及不动产，而中国财产私有制度之起源，“自周以前，殆仅限于动产，若夫不动产，尚非所得而私之也”，如像井田制那样，土地属于国有。“商鞅变法”以后，井田制被逐渐废除，不动产私有成为可能，进入西汉后，财产私有制全面建立。

李群在《独立周报》1913 年第 1 期发表《中国财产私有制之起原》，对吴氏此文提出商榷：第一，吴贯因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前是公有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公有之“有”是占领的意思，可是对于人类初生的时代，人与物品的关系怎样还不清楚，怎能知其是公有呢？第二，吴贯因凭借井田制说中国私有制是从动产向不动产过渡的观点也存在问题。因为首先公有制在私有制以前是否存在有疑问，而且人类初生时是否是有条理之组织也不好说，再进一步说，井田制以前中国是否就没有农业，也是待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吴贯因的观点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未能详审社会经济之实相，误以后起制度为事实之起源”，既昧于社会进化之情状，又昧于中国往古之情事。

是月　傅运森编《东西洋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华鹏飞编《清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可能是民国以来中国人自己编写，且以“清史”命名的第一部专著，但学术价值不高，影响较小。

是年

黎世蘅《中国经济史讲义》印行。

此书系作者在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作者认为“吾国自来经济史实，散见于政史政书中者，正如沙里淘金，尤宜然矣。或谓经济史实之研究，尚未抵充分发达之域，其构成因果也，亦第述过去之经济史实，为经济学之辅助学科，而不为一独立部门，斯盖误矣。夫经济史者，其自身努力于发现史的发展之法理，是当然具有科学之本能，岂仅为经济学之辅助学科而已耶。”作者专门阐述了经济史的定义、特质、范围及种类、材料收集方法等。关于经济史的定义，黎氏认为：“经济史以考述经济现象之发展为职志，是属于纵的研究。换言之，即须注意于自古至今，长期间之经济现象之变迁，其第述一时代之经济事实，及说明生产、分配之方法，交换、消费之状态者，乃为‘经济志’，而非‘经济史’也”，经济史要“罗集经济事实，自客观方面而为赓续的系统的研究，以明其变迁及沿革也。”他还论述了经济史与经济概论、经济政策的区别，以及经济史与经济学史、史学的关系。

蒋廷黻自费赴美留学。

蒋廷黻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州派克学堂、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 年春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应南开张伯苓校长之聘回国任教，入南开任历史学教授，讲授西洋史。1925 年，蒋氏的同乡、同学、同事何廉劝其开中国史的课，他便改攻中国近代外交史。

秋，沈家本撰成《汉律摭遗》22 卷。

此书是中国法制史巨著《历代刑法考》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汉律》律目及篇幅分卷，共 22 卷。作者搜录散见于史籍中的汉代法规，对研究久已亡佚的《汉律》有重要帮助。

缪荃孙《国史儒林传叙录》国粹学报社古学汇刊本印行。

清《国史儒林传》最初于嘉庆年间由阮元创修，以后陆续增修，光绪九年（1883）由缪荃孙专办。宋学为上卷，汉学为下卷，宋学分派，汉学分经，援《经典释文》例编叙录。此叙录是缪氏对清代儒学的总结。

缪荃孙《蜀石经校记》古学汇刊本印行。

蜀石经经注并行，素为世人所重。石毁六百余年，拓本存者亦罕，缪

氏先后借得《周礼·秋官》二卷、《左传》襄公二年一卷、《穀梁》十九行、《周礼·考工记》二十二叶、《公羊传》二十二叶，“以唐石经校经字，以岳本校注字，疏其异同于别纸”。缪氏还用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今本”、“淳熙本”等书进行校勘。其中很多可为阮氏校勘记之别证，辨误补阙。该校记近六百条，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钱恂《史目表》在杭州刊印。

史目表创自清洪饴孙，叙列正史、逸史的体例篇目。钱氏重加改订。

丁谦《西辽立国本末考》一卷《疆域考》一卷《都城考》一卷古学汇刊本印行。

渤海寿民编《辛亥革命始末记》12册由五族民报社出版。

1913 年

※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
※ 罗振玉编成《殷虚书契前编》。
※ 王国维发表《宋元戏曲史》。
※ 王国维辑《齐鲁封泥集存》。
※ 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1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7 号出版“纪念增刊”。

增刊共有《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十年以来世界大势综论》、《十年以来中国大事记》、《十年以来世界大事记》四个部分，旨在对庚子事变以后十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进行梳理。

罗惇曧在《庸言》第 3 期发表《拳变余闻》。

作者自《庚子国变记》刊出以后，“复搜集记载及连年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此文，对义和团名称之由来、义和团之起源发展、首领之情况、官员与义和团之连接、八国联军之进攻等，都有较详细论述。

12 日　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对大学教程做出规范。

其中规定历史学门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和“西洋史学类”。“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的课程为：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尚书》、《春秋左氏传》、秦汉以后各史）、塞外民族史、东方各国史、南洋各岛史、西洋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史、法制史（周礼、各史志、通典、通考、通志等）、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西洋史学类”课程为：史学研究法、西洋各国史、中国史概论、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年代学、经济学、法制史、外交史、宗教史、美术史、人类及人种学。该规程还规定了哲学门需习哲学史、文学门需习文学史、法律学门需习法制史、政治学门需习政治学史和政治史、经济学门需习经济学史、经济史等。

26 日　《独立周报》第 3 期译载《中国借款之历史》。

此文系美国学者撰写，翻译者认为此文可为“吾人参考之资并以见美人对我之心理”，文中对中国借外债的历史之梳理，有利于了解近代列强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渗透。

是月　吴曾祺《清史纲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共 14 卷，起自顺治元年，终于宣统三年，主要叙述清入关后之历史，对于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只一笔带过。据作者《例言》，该书道光以前为吴曾祺所编，完成于辛亥革命以前，咸丰以后由其他同仁续作，目的是“供学校及自修者研究近代史之用，且备修有清一代正史者参考之资”。此书为了适应当时社会上阅读清史的需要而编辑的，并非专家研究之作，取材大部分来自《东华录》，比较通俗易懂。此为辛亥后出版最早的一部清史著作。

罗振玉编成《殷虚书契前编》8 卷。

此书收录罗氏自藏及别家所藏甲骨拓片，1911 年前就着手编纂此书，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氏将拓片带至日本，在日本以珂罗版精印出版，实收 2221 片。

罗氏在序中回忆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岁在己亥，实为洹阳出龟之年，予时春秋三十有四，越岁辛丑，始于丹徒刘君许见墨本。作而叹曰：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故汉以来小学书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者也。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我之责也。夫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之编印之。”

1932 年修订再版。

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高等小学 1—6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卷首《编辑大意》中，编著者指出：“本书供高等小学三学年之用，用圆周法分为两周，第一周用史谈体，第二周用开化史体”；“编辑要旨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民国肇建，合五大族为一家，故本书尤注重于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而于五大族之豪杰，择其最有关系者，一律编入本书，以资儿童观感，务使此书为民国五大族共同适用之书”；“小学教科书非能独立，须与各学科互相联络而历史一科尤与修身地理有不可离之关系。本书与此深为注意”；“国史教科书固以发挥本国文化启儿童爱国之心为要旨，然世界大通，中国方处于重要之地位，故本书于中外之交

涉、文化之转输，择要编入，而于第二周为尤详”；“我国专制时代君主年号最多，名目纷纭，疲于记忆。本书一律删除，概以民国纪元前若干年代之。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比较计算”；“本书详今而略古，于近世史实为尤详，俾儿童得就其所见闻以知事之因果”。

作者在最后指出：“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集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故将来发达文化，巩固国家，必赖五族之相亲相保矣。”

同时出版的还有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上下卷。该年 8 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傅运森编纂的《共和国教科书东亚各国史》。

2 月

1 日　吴贯因在《庸言》第 5 期发表《史家位置之变迁》。

作者秉持“万事皆循进化之公例”，认为万事皆由不良进化于良，历史学亦然，所以“时代愈近，则史家之记事愈可信，而其位置亦愈见重于社会”。作者指出太古之史“多传闻失实”，上古史家多为卜祝，“以神道记事非以人道记事”，故“春秋以前之史多秽史而非信史”；孔子以儒家修史，其“地位离卜祝而独立，于是史事乃渐有可征信之价值”；自此以后，史家屡有直笔被摧残者，此因其记事可信为帝王忌惮故。作者最后论定：“中国一部历史，自春秋以前，为卜祝之势力范围时代；自孔子以至于今，为儒者之势力范围时代，自今以往，则将成为国民之势力范围时代。”

罗惇曧在《庸言》第 5 期“史料”栏发表《中日兵事本末》。

此文记述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爆发、作战经过及《马关条约》之签订等，保存了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些史料。

20 日　康有为主持《不忍》杂志在上海创刊。

由康有为学生陈逊宜等人负责编辑，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刊除了“国闻”、“附录”部分外，其余文章都是康有为个人著作。先后刊登的重要论著有《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其中《孔子改制考》系 1897 年刊行后重新发表，其中“上古茫昧无稽考”等观点对此后的史学界影响深远。

24 日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

该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分为预科、本科和研究科。其中本科分为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博物部等。国文部要学习国文及国文学、历史

等科目，历史地理部要学习历史、地理、考古学、人类学等科目。

3月

1日　罗惇曧在《庸言》第7期“史料”栏发表《中法兵事本末》。

文章记述了中法战争的经过，对法国侵吞越南、在中国南方之活动、中法战争之经过及李鸿章对战争之领导与战后条约之签订等均有叙述。

19日　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

该标准规定中学第一学年需学习本国史（上古、中古、近古），第二学年需学习本国史（近世、现代），第三学年学习东亚各国史、西洋史，第四学年学习西洋史，每周二课时。

4月

1日　王国维在《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发表《宋元戏曲史》，为戏曲史开山之作。

第11号，第10卷第3—6、8、9号连载。作者不满于因元曲“讬体稍卑”而被“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被后世儒硕“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湮没无闻，故为此书。正如本书序云：“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也。”全书共分十六章，包含了“古至五代戏剧”、“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剧”、“宋之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古剧之结构”、“元杂剧之渊源”、“元剧之时地”、“元剧之存亡”、“元剧之结构”、“元剧之文章”、“元院本”、“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元杂剧之文章”等内容。

《宋元戏曲考》的开创性贡献，及其对中国文艺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考察文学与文艺的发展历史所产生的启蒙性影响，都是任何后起的著作无可取代的。

谭正壁认为，“戏曲之被写进中国文学史，确是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始的”。郭沫若称王氏此书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近代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而当此书问世之初，王氏适寓居日本，彼邦汉学界尤“大受刺激”。据盐谷温描述，其时从狩野直喜起，久保得二（天随）；铃木虎雄（豹轩）、西村时彦（天囚）等人，竞相研究中国戏曲，“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况。”

1915年该书列入“东方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据王氏自

述，其所以名“史”，实乃出版时的权宜之计，故王氏去世后，罗氏为编《遗书》，乃将书名由“史”改为“考”。

是月　王国维撰《明堂庙寝通考》。

明堂庙寝之制，关乎我国之社会家庭制度，历来聚讼不决。王氏汇集众说，以传世文献与甲骨金文相结合，考证明堂之制为古代宫室宗庙燕寝的通制。

1913 年 5 月王国维致函缪荃孙云：“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庙寝通考》一书，拟分二卷，己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

据乔治忠考证，在罗振玉校补的《雪堂丛刻》（三）收录的《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有一段话显示王国维此时已经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宋代以后，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晋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然则晚周、秦汉人之书遂不可信欤？曰不然！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或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伪也。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

孙德谦在《孔教会杂志》第 3 号发表《孔子再传弟子考》。

孙德谦撰写此文的目的是“见圣人之教，亦有赖诸弟子为之传授学者，乃能推行益广”。此后孙德谦又连续发表《孔子再传弟子续考》（第 6 号）、《孔子三传弟子考》（第 7 号）、《孔子四传弟子考》（第 8 号）、《孔子五传弟子考》（第 12 号）。

徐天啸编辑《神州女子新史正续编》由上海神州图书局出版。

孙毓修编纂《世界读本》订正版 3 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月

顾颉刚入北京大学预科二部学习，“梦想进的是农科”。

6 月

22 日　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

袁世凯在此令中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同年11月26日，袁世凯再下尊孔令。由于袁世凯的特别提倡，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复古读经的热潮，甚至一些人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

16日　吴贯因在《庸言》第14期发表《中国文字之起源》。

第15期连载。作者认为“先民一切之创作其有功于国家社会者当以文字为最大”，文字的出现，使“旧文明始得继续而新文明亦发生”，若无文字，则一切“文明皆将断而不续”，故“欲知一国文明发达之历史，不可不先知一国文字之起源”。文章从结绳记事说起，认为“结绳为文字之先河”；次谈仓颉造字，认为“仓颉为创造应用文字之元祖”；再谈“先民发明文字之动机”；最后简单梳理了文字从古文至篆、隶、楷、行、草的演变。

7月

1日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刊载（美）Eliot Blackwelder著、梁宗鼎译《论中国地史及其与人民之关系》。

作者认为有关天气、地质记载等书籍，“中国极罕，即关于人类的历史，吾人亦不易窥其真相”。作者以亲身游历为基础，对中国的地质变迁进行概括梳理，并对中国山川河流平原等不同地质“其影响于人民及事业之若何”进行了阐释。

是月　魏易译述《元代客卿马克博罗游记》2册由北京正蒙书局出版。

此书是《马可波罗游记》较早的一个中文译本，此后中国地学会（1924）、燕京大学图书馆（1929）、商务印书馆（1936、1937）分别出版张星烺之译本，亚东图书馆出版李季译本（1936），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承钧译本（1936）。

王树枏在《中国学报》第9期发表《新疆稽古录》。

复刊第1—5期连载。该文是作者宦游新疆时对当地出土文物及遗址遗物考察的基础上整理而得，篇幅不一，或记载或考辨。该文所涉及的文物众多，如汉张博望残碑、六朝写经残卷、北魏金刚经残碑、北凉刻石、轮台唐碑、唐回铜器文等，对于后人了解保护新疆文物和文化遗址具有重要意义。

8 月

王国维草拟《布帛通考》。

此文（后改名《释币》）对古今布帛之制及尺度之长短，考证至为详赡，并考自汉至元布帛丈尺价值之大略。该年 11 月王氏致信缪荃孙说："秋间作《释币》二卷。上卷由衣服制度考币帛之长短广狭，下卷为附录，考历代布帛之丈尺价值。"

作者广集汉魏以来历代古文献资料，对自汉至元历代布帛丈尺价值的贵贱，以及金银价值的涨落等情况，作了精确考证。此文以实物还证史书记载，开启了研究史学的新路数。

9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 10 卷第 3 号译载《中国茶与英国贸易沿革史》。

此文译自《英国财政时报》，对中国茶传入欧洲、中英之间的茶贸易史、茶价之涨落、英国茶税的变迁、茶埠沿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中国茶在欧洲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及其改良办法。

罗惇曧在《庸言》第 19 期"史料"栏发表《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文章叙述崇厚、曾纪泽等人在光绪年间围绕伊犁问题的交涉过程，并对后来中俄签订之条约的内容有所分析。尽管作者非当事人，但由于年代尚近，故所记对后人了解中俄之间围绕伊犁问题交涉的始末有帮助。

是月　英国人斯坦因到达喀什，开始第三次在中国西北的探险。

此次探险至 1915 年 6 月结束。斯氏重访和阗、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 570 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的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此次劫获的文物两倍于第二次，共装载 190 箱。

10 月

16 日　罗惇曧在《庸言》第 22 期"史料"栏发表《太平天国战纪》。

第 23、24 期连载。作者指出，洪秀全以匹夫之勇播荡天下二十余年，"可记者多矣"，但官书记载非"耀清室之武功"，既"颂德之常例"，李秀成之供词、王闿运之《湘军志》，因触忌被改窜或被禁毁。而"今已易

代，无复忌讳”，应有信史出焉。韦昌辉嫡子韦以成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忍痛直笔太平天国事，成《天国志》。作者病其文字繁猥，“尽取其事迹而行之吾之文词，削其事之繁碎”，撰成《太平天国战记》。

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一文认为“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所杜撰”，罗氏撰写的《战纪》“纯属迎合时尚的赝鼎”。

是月　王国维辑《齐鲁封泥集存》。

本书分目为“汉朝官印封泥”、“汉诸侯王蜀官印封泥”、“汉列侯属官印封泥”、“郡县官印封泥”、“无考各印封泥”、“新莽朝伪官封泥”及“私印封泥”等七类。王氏先据《汉书》之《人名表》、《地理志》为之编次，以补陈、吴二氏《封泥考略》所阙，复淘其重复者，得四百余种，成书一卷，其数虽略少于《考略》，而精审过之。

序云：“窃渭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复，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稗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事，而无待赘言者也。”因本书之辑，王国维遂有《秦郡考》、《汉郡考》等文之作。

罗振玉辑录《鸣沙石室佚书》4册。

该书同年由上虞罗氏宸翰楼影印出版。该书不仅新增了儒家经典及历史地理方面的材料，还收录了在边疆史、法律史、交通史等领域有重要价值的历史研究论著，如《补唐书张议潮传》、《水部式跋》等。

周希贤编辑《历史的研究》由宁波新学会社出版。

作者认为“史学者，爱国心之渊源，国民之明镜也，而学问中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亦莫如史学，故史学一科已卓然为近今之一大科学”。该书内容包括“历史进化之阶级”、“社会进化之现象”、“风俗之沿革”、“学术之变迁”、“南北学派比较表”等。

11月

1日　王桐龄在《庸言》第23期发表《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

第24期连载。作者要“以历史的眼光，批评汉族性格之优缺点”，做到“不置毁誉，不加褒贬，公平论断，以供研究历史者之参考”。作者总结汉族特质主要有：尊天命、敬祖宗、重财利、重文轻武喜平和恶杀伐、重仪式娴辞令、自尊与自屈。作者认为“汉族的优点在于文化”，过去“他族以武力压倒汉族者，汉族以文化击退之”，但是对于“将来之国民性如何变化”，汉族有被欧美民族同化的危险。

《进步杂志》第1号译载日本学者宇野哲人撰《满清一代学术思想之小史》。

作者认为有清一代，“支那学问之状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考据学而已，其目的在乎明了字句解释意义，研求古经，校勘旧籍。种种内容，固毫无哲学的价值者也”。不过数百年中亦略有变迁，大约可分为三期：从顺治到康熙为第一期，从康熙到乾嘉为第二期，从道光到现代为第三期。第一期学问不统一，“大抵皆仍明代之旧朱明季世阳明之学风行一时”，清廷弃王学而采朱学，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一反时学而为致用实证之学。第二期考据学源于顾炎武、黄宗羲，经阎若璩、胡渭提倡，考据学大盛。此学兴起不仅有“学问上之理由，实有政治的意味”，清廷打压引诱，使“有用之儒学一变而为无用之具，终致考据之学盛行”。第三期之学与“革命殊有关系”，最先是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派兴起，道咸以后，“西学东渐”，新思想涌入，“学问界因以混乱”，孔子和儒学的地位受到冲击。

是月　孟森在《时事新报》发表《朱三太子事述》。

此文是孟森从政治领域转向文史研究的开始，此后其一直致力于明清史的研究。

12月

1日　棠公在《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发表《理财学沿革小史》。

文章指出理财学历史甚短，“滥觞于十七世纪，成立于十八世纪”，并分析介绍了“该学发达独迟之故”、三个沿革时期及不同阶段之学派的思想，有利于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9日　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子学，每科编有讲义。章太炎“讲授时源源本本，如数家珍，贯穿经史，融合新旧，阐明义理，剖析精要，多独到创见之处”，且“讲学时绝无政治上感情”，使人折服。

《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者百余人，大都为北京各大学教员。其中有吴承仕、金毓黻等，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顾颉刚回忆指出，章太炎所讲小学、文学、史科、玄科，尤其是章太炎对孔教会及今文家之批评，使其深受启发，开始

“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是年

刘承干开始刻印《嘉业堂丛书》。

刘氏是嘉业堂主人，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嘉业堂丛书》是他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收书57种220册，从1913年始，至1928年方才刻成。该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收孔颖达等撰《周易正义》、《春秋正义》等，史部收曲大均《安龙逸史》、刘承干《南唐书补注》等。此后刘承干又刻印了专收吴兴乡贤著作的《吴兴全书》66种238册、以清末民初时人著述为主的《求恕斋丛书》35种145册、以理学著作为主的《留余草堂丛书》11种13册、以金石为主的《希古楼金石萃编》5种22册以及《景宋四史》、《章氏遗书》等。刘承干刻书“力求精雅”，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指出，刘氏先后“延请缪荃孙、叶昌炽等至少八名学者主持校勘”。

“中国史学研究会（The China Historical Research Society）”在北京成立。

陆征祥任会长，北京大学外籍华人教授周慕西（Dr. Moses Chiu）任名誉干事。其目的是：中西学者合作，进行古老国家民族历史的比较研究；培养对古老中国的热爱和尊敬，在年轻一代心中植根深厚的爱国主义。

秋，柳诒徵就任北京明德大学堂历史教员。

柳诒徵在此任教至1916年，此后南返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历史教员。

范文澜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次年转入本科国学门，至1917年毕业。此间范文澜深受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的影响，完全沉浸于训诂、考证之学，其目标是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国学大师的传人。

胡思敬《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2卷南昌退庐全书本刊印。

作者对王夫之《读通鉴论》两汉三国部分的史论进行考辨，选取十九例，指摘其偏颇。

章嵚编《中华历史地理大辞典》由中华图书馆出版。

英敛之在香山创办辅仁社，提倡研究宗教史。

1914 年

※ 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
※ 罗振玉、王国维撰《流沙坠简》出版。
※ 孟森《心史史料》出版。
※ 章太炎增删修订《訄书》，更名《检论》。

2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 10 卷第 8 号译载《历代饥馑史》。

作者引希腊罗马、埃及以及近代欧洲记载，认为西方世界从希腊至20世纪共发生了“证据确确、历历可考”的饥荒四百多次，死亡二亿人以上。

是月 梁启超为清史修纂撰写《清史商例》。

梁氏的主张和观念可概括为四点：(1) 合理设目，秉笔直书（如认为不必为满清“发祥沿革”设“专篇”或“润纪”，要“主德污隆，务存直笔”等）；(2) 详略得当，简洁有趣（如对于“大征伐之方略、大制度之变置”、“为治绩所关者”的用人，尤其是“破格超拔”者，还有“帝学所臻”等因为有关兴废，应该详记）；(3) 寻求因果，以利借鉴（如对于事关重大的人事，则应浓墨重笔，如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这个“清代第一大事”，则要单列一表，详述前因后果；而清代的财政收支的情况与清王朝兴亡有着紧密的关系，梁启超创“国用志”“以鉴来兹”）；(4) 关注“今务”，用心“别裁”（梁启超认为“一代之史，必有一代着异之政俗”，所以对清代出现的新事物应特别关注，特别设置新的篇目以示重视：为突出科学，用“历象志”代替“天文志”；为突出“都市”、“物产”，将之从“地理志”中分出；为海关、厘金、盐政设“征榷志”、“盐法志”；关注金融货币制度设“钱法志”；对于学校、邮传、“邦交”、“使臣”等新事物都设志或合传）。

3月

5日 王桐龄在《庸言》第3期发表《中国文化之发源地》。

9日 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

1914年初国务院呈请袁世凯设立清史馆，其呈文云："春秋而降，凡新陈递嬗，每纪录成篇"，"先朝记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招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鉴于无穷"。此项呈请正合袁世凯借修史以笼络前清遗老之意。3月9日，袁世凯批准国务院呈文，决定设立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并以大总统名义，延请赵尔巽为史馆总裁主持清史馆。

开馆伊始，馆内外人士提出了各种体例方案。其中主要有：（1）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吴士鉴、杨钟羲、陶葆廉六人所上《拟开馆办法九条》。（2）梁启超《清史商例第一、二书》。（3）吴廷燮《清史商例》。（4）金兆蕃《拟修清史略例》。（5）吴士鉴《陈纂修体例》。（6）袁嘉谷、陈敬第《陈清史凡例商榷》。（7）朱钟琪《拟修清史目例》。（8）袁励准、王桐龄《上纂修清史管见书》。（9）张宗祥《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10）朱希祖《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11）刘树屏《陈述邦交志意见书》。（12）卢彤《条陈征集书籍及分类纂修办法》。

诸人所议修史体例，除梁启超外，"多数偏重于旧史体裁"。经过数次集会讨论，最后"馆中所采，以于氏等人'九条'为主，而参取各家所长以补之，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迁"。

是月 姚永朴《历史研究法》由京师京华印书局印行。

全书约三万字，共八篇，分别是史原、史义、史法、史文、史料、史评、史翼、结论。全书限于中国历史，不涉及外国史。叙述紧密结合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和史论，类似于古代史学史导论。内容大都是技术性问题，例如传统史书编撰方法、体例确定等；对理论层次较高的史学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全书举证精当，文词典雅，不失为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向导。但该书缺乏时代色彩。杨鸿烈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评价这本书所宣讲的方法依然"是我国从古以来老师宿儒教人读史的方法"，"充其量不过只是认识中国几千年来历代的史事，并非真正的一般的历史研究法"。

此书是我国近代出现较早的史学方法论专著。后收入1935年《国学小丛书》。

吴廷燮《清财政考略》铅印本印行。

此书是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的财政情况进行了梳理，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论，书后附有一些统计表格。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了一些史料。

冯仁佺编《民国经世论说文集》由文明进行社出版。

此书为民国初年的史料集，主要收录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史料一百余件，包括北洋政府及各地的通电、外电报道等。

4 月

5 日　王桐龄在《庸言》第 4 期发表《历史上中国六大民族之关系》。

文章指出，共和以后常言“五族平等”有误，中国实系汉、苗、通古斯、蒙古、突厥、藏“六大族”，“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也”。作者认为，四千余年以前，是“汉苗冲突时代”；春秋时期，是“有史以来汉族与通古斯族及蒙古族冲突之始”；汉代是“汉族第一次大一统时代”；南北朝时期，是“西北民族第二次侵入中原时代”；隋朝“合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西藏族，铸成一大帝国，是汉族第二次大一统时代”；五代时期，是“西北民族第三次侵入中原时代”；宋室南迁，是“北方民族第四次侵入中原时代”；元代是“蒙古族大一统时代”；明代为“中原复归于汉族”时代，但声势远不及汉唐；清代为“通古斯族大一统时代”。

5 月

5 日　恽毓鼎在《庸言》第 5 期发表《崇陵传信录》。

作者以在光绪身边“侍左右近且久”的亲身见闻为基础，撰成此文，对同治之死、慈安之死、戊戌政变、囚禁光绪、义和团闹北京、光绪之死等都有记载，为后世研究晚清史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材料。

25 日　北洋政府设国史馆，王闿运任馆长。

民国肇建，胡汉民、黄兴、王宠惠、马君武、于右任、冯自由、高鲁等人，向临时大总统孙文建议设置国史院，撰辑中华民国建国史以详民国成立之始末，这一建议案后经参议院多次草拟办法通过，于 1914 年正式成立国史院。国史馆于该年 6 月 17 日正式开馆工作，但王闿运志不在修史，所聘之人多为友朋晚辈，且民初政局不定，帝制再起，纂修国史之议

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国史馆几乎形同虚设，后归入北大办理。

是月　罗振玉、王国维撰《流沙坠简》在日本石印出版。

斯坦因将1907年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废墟发现的千枚汉简及此前在尼雅及古楼兰遗址所得的魏晋木简，连同若干古纸文件帛书等物，交由巴黎法兰西学院沙畹代为研究。沙氏选取其中较完整者991枚，撰成考释付印。书中每段考证，各在其有关释文之后，按出土地区汇集为三编，列敦煌汉简共705枚，记有年代的共98枚。1913年秋，沙畹将其在英国出版的《汉晋木简文字考释》一书初校本邮寄给罗振玉。罗振玉与王国维阅后认为有必要重新加以编撰，乃发愤重行分类考订。次年2月，罗、王自沙畹书991枚中选取588枚，编撰为《流沙坠简》三卷。2月24日，王国维作《流沙坠简序》，叙述木简出土之地及其情况，文长数万字，为近代研究西陲古地理的第一篇文字。

此书是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简牍研究著作。全书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小学术数方技书"和第三部分"简牍遗文"由罗振玉考释，第二部分"屯戍丛残"则由王国维考释。罗、王二人利用简牍实物，结合文献资料，对汉代历谱、书体、两汉边塞和烽燧系统、玉门关址和楼兰故城、海头位置、汉代边郡都尉府职官制度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作了详尽的考释。王国维自认为此书"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使竹汀先生辈操觚，恐亦不过如是"。

沈颂金认为，《流沙坠简》实为简帛研究肇始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汉简研究的基础，王国维可以说是近代汉简研究的开创人，他对汉简研究的某些论点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到第二阶段中居延汉简的研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声誉。他很注意把汉简的内容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恢复汉代烽燧的排列和组织，这是极有见识的。"

6月

1日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2号刊载《修清史》。

作者认为，"修史之难，莫难于前清一代"，因为"非独文事武功，超轶前代，网罗宏富，鉴别宜精；而大地交通，新理与旧学吻合，实开自古未有之局"。作者"欲为史家进一解者"，在"主持公论，以正人心，发救世之宏愿，宜立言得体要"。不过从作者"前清政绩，善则归于君主，恶则罪在当国之臣"来看，作者所谓的"公论"也有偏向。

《东方杂志》第10卷第12号转载《满洲名称考》。

作者以"清代官书、与日本所蒐集之明人及朝鲜人记载，相互钩稽，

知清人诚有矫诬之嫌，日人亦有未尽密征之处”。作者考证“满住即满珠，亦即满洲，为建州酋长之尊称”，而“满洲即文殊之佛号”。

是月　罗振玉续办《国学丛刊》。

王国维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述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及变迁。此序与1911年所撰《国学丛刊序》立意完全不同。序云：“宣统辛亥，某始创《国学丛刊》于京师，遭遇国变，中道而辍；今年春，海上友人，乞赓续之，亟允其请，编类既竟，乃书其端曰：秦汉以还，迄于近世，学术兴替，可得而言”。

王国维撰《宋代金文著录表》。

该书将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十一家宋代金石学家“所录古器有文字者”，“错综诸书，列为一表，器以类聚，名从主任，其有异同，分条于下”。《王国维年谱长编》称“我国学者重视索引之书，先生此表实起筚路蓝缕之功”。

王国维此年又起草《国朝金文著录表》6卷。后罗福颐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增订为《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

7月

13日　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开始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

桑志华对黄河流域开展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的考古，并于1919年在内蒙古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时期时代遗址，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三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同时，桑志华积极筹建北疆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

20日　卫系在《学生杂志》第1号发表《说史学》。

文章认为，“社会与国家相因而演进，其成迹之昭示于吾人者，即所谓历史”，故“历史之学，舍时与地二者，更无标准可言”；主张“国史分期，宜于西史一律”；“历史当以全领土全民族为范围”，汉唐宋明以外，匈奴突厥等皆“国史之资料”。文章最后指出，“以活泼之青年，令其研究已陈之化石，其无意趣所不待言”，而对“所谓时与地者又复漫然不加审慎，则学校中历史一科直为有害而无益，不如废除之”，所以校中之学生“其对于历史一科，视为重要而欣然听受不厌者，究不宜觏”。

是月　刘法曾《清史纂要》出版。

全书共七章，将清史分为四个时期，从后金建国到平定三藩为“崛兴时期”，康熙中叶至乾隆末为“极盛时期”，嘉、道、咸、同为“衰弱时

期”，光、宣为“改革及灭亡时期”，与汪荣宝《清史讲义》大同小异。该书主要资料取材于《东华录》，“参各家书而甄采”。

《大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1 期广告称该书“将有清三百年之事实，收之于一小册，而不病其漏，撷十三朝东华录，而不觉其略，自入关以迄逊位，期间内政外交文化武功，以及党祸之变迁，宫闱之要闻，无不原原本本，详其始末，纪事既无顾忌，又不偏激，文字简明，尤合史裁，年代以民国纪元，地舆用最新名词，尤为特色。宣统朝事实，采诸公牒，详确可征，其讪谤失实者，概不羼入，欲考有清一代治乱之原，不可不读此书”。

傅运森编《世界大事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采取中外历史对照的方式，上栏为中国部分，以干支纪年，起自甲子黄帝元年，下栏为外国部分，采用公元纪年，起自公元前 2697 年。

8 月

15 日　陈衡哲赴美留学，攻读历史学学位。

1914 年夏，清华学校首次开科招收赴美留学女生，陈衡哲以第二名考取。陈衡哲于 1915 年进入美国瓦莎大学攻读历史学，系当时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的专攻历史学之人。陈衡哲于 1918 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 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历史学女教授。

20 日　俄国奥尔登堡率领考察队到达敦煌千佛洞。

奥尔登堡对敦煌进行了较彻底的测绘、复描、摄影、发掘等，1915 年 1 月 26 日返回俄国时，奥尔登堡劫走一批敦煌写卷、雕塑、壁画、艺术品等。

30 日　江苏省长韩国钧下令将停办的两江师范学堂改办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该校于 1915 年 8 月 11 日正式招生。学校简章规定本科分为国文、历史地理等六部，历史地理部的课程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英文、考古学、人类学和体育，而国文部、英文部亦要学习历史科目。1919 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1920 年，国文史地部和数学理化部合并为文理部，历史系是所辖八系之一。在教员方面，南高逐渐罗致了柳诒徵、徐则陵等任教于此，并邀请梁启超等名流前来讲座，形成了“南高史地学派”，使南京高等师范逐渐成为与北京大学对抗的中国史地研究重镇。

是月　谷中秀撰写的记录中华民国成立历程的《开国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作者在“组织政府之初”，即作为代表“往来鄂宁”，后又担任参议院国会议员至国会废止，对民国肇建过程知悉甚详，乃将“见闻所逮凡关系治乱得失，荦荦大端，著为实录”。此书价值在于保留了从辛亥革命爆发筹建国民政府至熊希龄组阁这段时期的相关政治史料。

该书 1917 年再版时改名《中华民国开国史》。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 月

25 日　袁世凯发布《祭孔告令》，决定 28 日举行祀孔大典，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尊孔复古运动。

是月　钟山《中国历史》在成都刊印。

该书叙述从三皇五帝至清末的中国历史，依据康有为的“三世说”，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太平世史，即阶级制度未产生时期；第二编为升平世史，即先秦时期；第三编为据乱世史，即秦至清末。

孟森《心史史料》由上海时事新报馆出版。

该书收《满洲名称考》、《清朝前纪》、《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朱三太子事述》四篇文章，着重探讨清入关前之历史，为孟森明清史研究早期代表作。此后孟森渐以“心史”享誉史坛。

10 月

9 日　罗振玉撰成《瓜沙曹氏年表》1 卷。

此书利用敦煌文献对瓜沙曹氏世系和统治时间进行了较细致的梳理，开辟了瓜沙归义军历史的系统整理与研究的新途径。后姜亮夫又作《〈瓜沙曹氏年表〉补正》。

此月罗振玉还完成了《秦金石刻辞》3 卷和《唐风楼秦汉瓦当文字》5 卷的编撰工作。

是月　李圭撰《太平军中被难记》由上海振环书局出版。

11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 11 卷第 5 号转载《上海开埠史述》和《五

十年前之上海》。

《上海开埠史述》录自《时事新报》,《五十年前之上海》录自《字林西报》，两文以上海租界的变迁为中心，对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的开发史进行介绍研究。

20日　黄铁崖在《学生杂志》第5号发表《本国历史研究之注意》。

作者认为中国历史研究中应该注意人种、国家政治两个方面的问题：在人种方面，一不应称汉族，而应该称华族，二“帕米尔高原实为人种发源处”，中国人种西来，始至黄河南岸。在部落与国家方面，作者认为“由部落时代进为国家，各国皆然”，中国的国家“自黄帝始”。

是月　李秉钧编《新制东亚各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2月

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前梁氏曾在清华学校作关于此主题的演讲。此书介绍了参战各国的政治、社会、军事情况，并预言德国将取得胜利（亦预测若战事持久，则德国可能致败）。

近代史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近代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麦可莱、格林和威尔斯。

教育部公布《整理教育方案草案》。

要求中小学校修身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保存固有之道德，大学院添设经学院，以发挥先哲之学说”。

是年

年底，章太炎增删修订《訄书》，更名《检论》。

《检论》共62篇，另有附录7篇，分为9卷。作者删去了辛亥革命前反清斗争性较强的《客帝匡谬》、《分镇匡谬》、《族制》及《不加赋难》等，以及历史分期的《原学》篇和推测未来的《订实知》,《通讦》等篇。新增的《小过》、《大过》等篇，其内容主要是褒扬清朝督抚大臣；而《易论》、《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春秋故言》等篇，则是进一步论述“六经皆史”的意义。至于所增《唐案》、《通程》等篇，则增补了《訄书》“学术典”之缺略。《检论》中删去了《訄书》原有

《哀清史》所附《中国通史略例》，而代之以《近史商略》，《近史商略》主要评论《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指出《初定清史叙目》的错误。总体说来，“革命”消退，“国故”增加，是《检论》的最大特色。朱维铮认为相较于《訄书》重订本，章氏《检论》在问题的展开上更具逻辑性，更有历史感，在“对中国问题的完整认识的陈述形式”上，“已由笨拙到流畅了”。

罗振玉编成《殷虚书契菁华》1 卷。

此前罗氏已将搜集到的殷墟遗文中重要的拓本编成《殷虚书契前编》一书。1914 年，他又将那些因骨质脆弱不能拓墨者，为之摄影，印成《殷虚书契菁华》一书。全书包括序、拓本照片，共收录甲骨六十八片。该书第二至第八页，是武丁时期四版大牛胛骨正反两面的照片；第九至第十一页是六十版小片甲骨，大多为第一期和第五期，少量为第二、第三期。其中整版甲骨八纸，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陈黻宸专任北京大学史学与诸子哲学教授。

1913 年春，陈黻宸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到京后兼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陈黻宸专任北京大学教授。陈氏深受北京大学学生推重，被认为“自有大学以来，讲师将千人，未有出瑞安陈先生右者”。陈黻宸在 1913 年完成《中国通史》20 卷，内容自黄帝迄于清世，突显了以民为重的史学观念。专任北大以后，陈氏著述不断，1914 年撰成《诸子通义》10 卷，1915 年撰成《老子发微》2 卷、《庄子发微》2 卷，1916 年撰成《中国哲学史》，皆北京大学讲义。

1915 年

※ 罗振玉撰成《殷虚书契考释》。
※ 清史馆正式开办。
※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
※ 陈垣开始在京师图书馆阅读、研究、查对《四库全书》。
※ 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两校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
※ 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刊印。

1 月

1 日 《东方杂志》第 1 号译载《欧洲战乱小史》。

第 2—4 号连载。该文由许家印节译自《日本外交时报》，对欧战爆发情形、战争期间各国的交战经过以及外交上之活动，进行较详细的介绍。

20 日 梁启超主笔的《大中华》杂志创刊。

梁启超任主任撰述。该刊在《宣言书》中表明创办目的有三：一是“养成世界智识”；二是“增进国民人格”；三是“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指南针”。中华书局邀集的撰稿人除了梁启超，还有吴贯因、谢无量、张君劢、王闿运、马君武等。此杂志刊登不少学术论文，涉及哲学史、宗教、历史、经济史、文学史、社会学等，如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 7 期)，吴贯因《中国经济进化史论》、《古史索引》(第 8 期)，《中国六大文豪》(第 2 卷第 3、6 期) 等。该刊至次年 12 月停刊，共出 24 期。梁启超在创刊号发表《西疆建置沿革序》一文。

吴邦俊在《学生杂志》第 1 号发表《春秋列国疆域考》。

作者对春秋时期的鲁、齐、晋、秦、宋、楚、郑、卫、许、陈、蔡、吴、越等十几个诸侯国的疆域进行考证勾勒。

22 日 袁世凯发布《特定教育纲要》，提倡尊孔尚孟。

该纲要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文科大学“宜注重研究中国文

学、哲学、史学，并佐以考古院，以发扬国学之精神”，同时计划在大学院外设立“经学院”，“按经分科，并佐以京师图书馆，以期发明经学之精微”，而于各省“设立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之所”。

是月　罗振玉撰成《殷虚书契考释》。

王国维襄助其手写并作前后两序。此书凡八篇，一都邑，二帝王，三人名，四地名，五文字，六卜辞，七礼制，八卜法。这部考释甲骨文字有“导夫先路”之功的专著，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东方学会出版的增订本中已增加到571字。

此书被认为是甲骨文研究中的里程碑著作。罗氏能在文字的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而且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更多地注意文通义顺，同时已开始注重对甲骨文字作偏旁分析，对后来的甲骨学家启发很大。郭沫若曾盛赞本书之成绩，言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陈梦家认为甲骨文字的审释直到此书才走向成熟，并因为能偶通读卜辞，“我们才有可能从卜辞中抽出有用的历史材料”。胡朴安评曰：“罗氏此书，已据甲骨文字而有古史之研究矣。即其文字一篇，与文字学之关系极巨：一可以正《说文解字》之误；二可以辅金文之研究。自有罗氏之书，甲骨始稍稍可读，而古文字学遂辟一新路矣。”

后世对此书实际作者产生疑问，一说罗振玉（商承祚、陈梦家、张舜徽），一说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一说罗、王合作（周传儒、何士骥）。后经学者考证，尤有陈梦家亲见罗振玉手稿后的描述，及张舜徽的辨正、罗氏后人的撰文解释，学界仍认同是书为罗振玉所著之说。

2 月

20 日　吴贯因在《大中华》第 2 期发表《古代社会政策》。

3 月

30 日　罗振玉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探访，此为中国学者第一位亲赴小屯考察者。

是月　张相文在《地学杂志》第 3 期发表《成吉思汗园寝之发现》。

作者认为成吉思汗陵寝在鄂尔多斯。但是元史专家屠寄并不认可，认为成吉思汗陵当在克鲁伦河曲之西、土拉河之东、肯特山之阳。此后张相文又发表《成吉思汗陵寝争议案》（1915 年《大中华》第 12 期）、《成吉

思汗陵寝辨正书》（1916年《地学杂志》第4、5期）。而屠寄则发表《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正书》（1916年《地学杂志》第10—11期，1917年《东方杂志》第1—2号转载）等文章反驳。张相文又发表《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寝辨正书》（1917年《东方杂志》第9—11号）及《成吉思汗陵寝之旁证》（1917年《地学杂志》第10期）等文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是月　王国维撰《鬼方昆夷猃狁考》。

鬼方之地，历来意见纷纭。王氏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及盂鼎、梁伯戈、毛公鼎等钟鼎彝器铭文论述鬼方、昆夷、薰育、猃狁等先秦游牧部族的活动地区和活动情况，并从地理分布及音韵学论证鬼方、昆夷、薰育、猃狁及其与后来的匈奴、胡皆系同一族名的异译，否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首次提出殷代的鬼方才是匈奴的族祖。

这一观点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不少学者如梁启超在《汉书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国历史上之民族之研究》、方壮猷《匈奴语言考》、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佟住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等论著中都附和支持其"鬼方、昆夷、猃狁等族即匈奴"的论断。但蒙文通在《犬戎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书中，认为鬼方、荤粥、猃狁并非匈奴族，义渠则与匈奴同族；黄文弼在《古代匈奴族之研究》中认为鬼方、荤粥、昆夷、猃狁都是古代羌族，与匈奴不同。尽管众说纷纭，但《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广泛征引先秦两汉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论文。

浙江开始筹建通志局，以沈曾植为总纂。

浙江政府为续修省志，决定成立通志局，并开始筹备工作。沈曾植提出"文献有沿无革"、"旧志体例完备"当续修，时间上起1736年（乾隆元年）下迄1911年（宣统三年）等条件，并在至吴庆邸信中说"行吾说，吾党任之"。此后通志局筹建顺利，浙江都督朱瑞聘请徐定超、喻长霖任提调，沈曾植任总纂，聘朱祖谋、吴庆邸、陶葆廉、章梫、叶尔恺、朱福清、金蓉镜、喻长霖、孙德谦、王国维、张尔田、刘承干、缪荃孙等人为分纂并设立了浙江征书处等附属机构。该局在该年冬正式开办，至1918年1月4日提调徐定超因海难去世后不久，浙江通志局裁撤，编纂工作停顿，仅遗存《续修浙江通志稿》三百多册，涉及疆域、关梁、水利、古迹、蠲恤、职官、选举、文苑、陵墓、寺观、祠祀、艺文等门类。

4月

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商磋古韵之学。

王氏自述："甲寅岁莫，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虚书契考释后序》，略述三百年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以此愿质之。"

王氏于老辈学人，其前交柯劭忞、缪荃孙，其后则以沈为主，并及于沈周围的一批"遗老"、"寓公"。他与在沪名士颇有交往，如叶昌炽、章梫、朱祖谋（古微）、杨钟羲、曹元忠、邓实、张元济、王秉恩、徐乃昌、陆树藩、刘承干、蒋汝藻、张尔田、李详、况夔笙（周颐）等。

5月

10日 《东方杂志》第5号刊载《新修清史宜增图学一门议》。

文章建议于"纪传表传之外，当添图象一门，以补正史之阙漏，而开文化之新例"。

16日 《时报》报道章太炎着手改修《宋史》。

报道称"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杂，褒贬亦多不公。太炎顷已着手改修，政府亟赞成此举，遣人通意，且允助以经费"。此后并未有成果面世。

是月 王国维撰成《三代地理小记》。

王氏利用出土文献对古史上争论较多的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殷代迁都问题、殷商名称问题、秦郡问题等，提出了西周时宗周是镐京，成周是洛阳等观点。陈致认为该文"揭示了观堂在方法上真正采取了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

该文刊入《国学丛刊》第11卷，后改为《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秦郡考》六篇。

6月

10日 易培基在《甲寅》第6号发表《清史例目证误》。

易培基对缪荃孙所编之"清史例目"进行批评，认为其例目"误漏""触目皆是"：有的是乱设没有意义的志目，如国语志、氏族志；有的是志目设立不符合实际，如兵志分为防军、边防和海军，但是无有关新军者；有的是当设而不设，如有属国传而无外国传，尤其是"党籍诸人，立业渊宏，规法覃远，非刺客任侠所能比拟"者，亦无传。该文的发表，为此后查禁《清史稿》埋下伏笔。

20日　赵夔龙在《学生杂志》第6号发表《中国历代火器源流考》。

文章对中国火药武器的起源、发展进行梳理，认为火炮“始于宋金元之际而盛于明清”，火枪宋代虽有却制艺未精，用途不大，至明代“始臻美备”，后来西洋火器东传，中国的枪炮渐完全西方化。

是月　孙毓修《模范军人》第1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至1926年7月8册出齐。此书是经北洋政府陆军部鉴定的历代著名武将传略，所收人物有关羽、岳飞、张飞、赵云、王睿、谢玄、贺若弼、李靖、尉迟恭、苏宝方、李光弼、郭子仪、王彦章、曹彬、狄青、韩世忠、刘琦、旭烈兀、郭侃、徐达、常遇春、冯胜、蓝玉、戚继光、周遇吉等。

殷汝骊编《亡国鉴》（附《国耻录》）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7月

10日　述曾在《东方杂志》第7号发表《古代中西交通考》。

作者指出“上溯中世，远及古初，中西关系阙焉不详”，而“东西交通之迹不明，则世界史研究，终于空谈”。作者乃深入典籍，“详考古代中西交通往事”，讨论了“西人称中国之名称”、“中国罗马之交通”等问题。

20日　梁启超在《大中华》第7期发表《复古思潮评议》。

是月　《章氏丛书》由上海右文社出版。

此丛书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辛亥革命期间的一些政论史论皆被刊落。鲁迅指出章太炎在革命之后“亦渐为昭示后人计，自藏其锋芒”。此时章太炎已逐渐从革命斗士向“儒宗”回归。《章氏丛书》销路甚好，至10月即再版。

9月

1日　清史馆正式开办。

6月赵尔巽到北京，向袁世凯提出：“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縶遗贤。”（徐一仕《清史稿与赵尔巽》）袁世凯大力支持，拨付充足经费，辟故宫东华门内数百间老屋作为清史馆。史馆一开，赵尔巽立刻“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请陈汉第、李经畬、金还、周肇祥、邵章为提调；沈曾植、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金兆蕃、秦树声、

章钰等为总纂；俞陛云、姚永朴、袁金铠、张尔田等为协修；吴缪、何葆麟、叶尔恺、金兆丰、朱希祖等为校勘。

后又增聘马其昶、刘师培、夏曾佑、王树枏、夏孙桐、奭良、姚永概、朱师辙、金梁等一百余人。实际到馆者五十余人，其中进士及第者有四十余人。柯劭忞、缪荃孙、夏孙桐、王树枏、马其昶、秦树声、姚永朴、朱孔彰、朱师辙、金兆蕃、邵章、张尔田等都属桐城古文派，且熟悉清代掌故。除极个别人外，几乎全是清朝的遗老和旧史家，“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

赵尔巽据各人专长分配撰稿，“校对已成文字，尝一日阅至二万字”。但因组织不严，问题丛出。有些撰稿者草率敷衍，且总纂与协修互不协调。结果，成稿虽多，但“形同废材”。

15 日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

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它成为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园地。

《新青年》哺育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之一。它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启蒙。1935 年胡适为《新青年》重印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1916 年 2 月出至第 1 卷第 6 号休刊，同年 9 月 1 日复刊，改名《新青年》，期次从第 2 卷第 1 号起。1922 年 7 月出版第 9 卷第 6 号后休刊。1923 年 6 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 4 期后休刊。1925 年 4 月复刊，出 5 期，同年 7 月停刊。

25 日　孟森在《小说月报》第 6 卷第 9 期发表《董小宛考》。

第 10 期连载。

是月　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文艺丛刻”。

该丛刻共 19 种，分为甲乙二集，除收录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 年 9 月）外，还收录了许家庆编纂《西洋演剧史》(1916 年 4 月)、钱静方编纂《小说考证》(1916 年 4 月)、留庵《中国雕版源流考》

（1918年5月）、蒋瑞藻《小说考证》（1923年10月）、《小说考证拾遗》（1924年6月）、《小说考证续编》（1924年6月）、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1927年6月）等书。

曾毅《中国文学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10月

陈垣开始在京师图书馆阅读、研究、查对《四库全书》。

据刘乃和《励耘承学记》记述：陈垣“开始研究《四库》，是在民国初年定居北京以后”，“前后断续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几万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把这书著录的书名和撰者作了索引，并将当时流行的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与实际存目相考核，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对等情况。了解了《四库》收集、编纂、禁毁、抽换的变化过程，写成《四库书目考异》五卷。又因纂修《四库》的掌故，私人多不记载，乃利用乾隆御制诗文集注，写成《四库全书纂修始末》一卷”。

王国维撰成《古礼器略说》。

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此篇初刊《雪堂丛刻》，收入《观堂集林》卷三。

11月

萨端《社会进化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上海进步书局编辑印行《太平天国轶闻》4册。

谢无量《阳明学派》由中华书局出版。

12月

15日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4号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此文从历史进化论的视角出发，通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对中国的民族性和国民性积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20 日　张大钘在《学生杂志》第 12 号发表《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伦理上之变态观》。

作者认为由于“奸雄之提倡”、“种族之殊异”、“利害之冲突”、“人类性之复古”等原因导致“人治之退化”，引发人性恶的大爆发，使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伦理观发生了“变态”。

30 日　《京师教育报》第 24 期“研究资料”栏目刊载《高等小学校历史教科书编纂纲要草案》。

该草案由教育部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编纂。对小学历史教育规定颇详，如规定“叙述法以传记体为主”，记述要“断代为史”，“不必仿西洋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诸期”，“叙述史事宜略古代详近世”，而史料“宜求大体包举。不可支离灭裂有乖史序”等。

同期还刊载了“教育部教授要目编纂会”编纂的《高等小学历史教授要目草案》、《中学师范中国历史教授要目草案》、《中学师范东亚各国史教授要目草案》、《中学师范西洋历史教授要目草案》。

是月　（日）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稻叶君山原名稻叶岩吉，内藤湖南的学生，1900 年曾经留学北京，1905 年日俄战争时间曾任随军翻译，到过努尔哈赤龙兴之地兴城，引起了清史研究的兴趣。1909 年又任满铁历史调查部研究员，与内藤湖南到东北实地考察，搜集资料，约以十年之力，1914 年写成《清朝全史》一书。

但焘在《编辑大意》中说：“是书为日本稻叶君山原著，本年四月出版，东瀛啧啧，风行一时，若者博采覃思，阅十余岁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吾国清史，尚在编纂，亟为迻译，饷我国学人。”

该书取材较为丰富，尤其是所依据的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是未经修改过的日本传抄本，保存了许多未被隐没的材料；另外还有朝鲜官方的《李朝实录》以及各种私家记载，还有西方人的记载，日本的记载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史家此前未能采用的；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

《清朝全史》是当时唯一对清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写出的学术著作，影响很大。

容闳著、恽铁樵等译《西学东渐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容闳晚年用英文撰写的自传式回忆录，原名为 *My Life In Chi-*

na & America，1909年在纽约出版。后由徐凤石、恽铁樵两人节译为中文，改名为《西学东渐记》，1915年1月开始在《小说月报》第6卷第1期发表，连载至第8期。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二十二章，起自1828年迄于1901年。第一、二章追忆他的幼稚时代和小学时代；第三至五章写其在美国留学；第六章以后，叙述其学成归国，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和生平从事教育、政治、经济等活动。

此书是第一个留美毕业的学者在中国和美国生活的真实记录，为研究19世纪晚期中西思想学术交流史和晚清思想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英）林德力著、孟宪承节译《太平天国外纪》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在1859年来到上海，并于次年参加太平军炮队作战，1864年回国后撰写此书，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抨击了英国干涉政策。由于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此书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12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主要由清代一百多种笔记野史辑录而成，分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五辑。

谢无量《孔子》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之纯《中国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两校历史地理部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

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此类学会。

北高史地学会由相关专业师生组成，以“研究历史地理，交换学说为宗旨”。1915年4月至1919年，举办讲演会达四十余次，会员发表的讲演稿每年平均在二十篇以上，内容除历史、地理以外，还涉及哲学、天文、经济、国势民情诸方面。

武昌高师史地学会宗旨为“联合同志，考求史地图书，增进学业”。学会规定，每学期召集大会一次，每月召开常会一次。四年之内，实际开会十三次，活动内容包括名人讲演、特别会员命题、会长会员发表心得、质疑问难和旅行报告等。据其公布的“历年讲题一览”，会员历年发表的专题讲演达六十二个，内容广涉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律算、音乐、文学，乃至现代风土、教育等各方面。

1918 年以后，北高由于史地部 1917 年已改为国文历史地理部，遂又成立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简称文史地学会），并于 1920 年 5 月以学会名义出版《国学卮言》。1923 年，该会以张春霆为名誉会长，胡小石为会长，聘朱希祖、李大钊为名誉指导员，李汉俊等为指导员，会员已囊括国文史地部、国文系、历史社会学系等部、系师生，还出版会刊《文史地杂志》。

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由浙江图书馆刊印。

本书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考证中国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丁谦说："中国史书，皆始于盘古，而三皇继之，伏羲、神农、黄帝又继之，并无言他处迁来之事。自光绪二十年法人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引据亚洲西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如刘光汉之《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章太炎之《种姓篇》，蒋观云之《中国人种考》，及日本人所著之《兴国史谭》等，虽各有主张，要无不以人种西来之说为可信。"

西来说起源于 1894 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编撰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他断定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除欧美学者的提倡外，日本小川琢治也撰写《东亚文化的源流》，主张在金石时代，三代人是相继从中亚移民过来的。日本向井章翻译安利马斯比罗《支那文明的始源》，也认为中国文明发源于地中海。（黄孝可《1929 年日本史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

西来说经过十余年的论争，直到我国考古工作起步，仰韶古文化遗址发现，才渐渐销声匿迹。

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80 卷由上海文明书店出版。

该书每事叙其始末，一事一卷。作者《例言》云："本书大旨均取材于东华录而酌删其繁文，汇参以诸家通行可信之书，以成实录"。

章太炎开始口述《菿汉微言》。

章太炎被囚禁后，吴承仕（时为司法部佥事）因钦慕章太炎，对章氏执弟子之礼，并常探视章氏。章氏为吴承仕口述"玄理"，"令其笔述"，内容多是阐释印度哲学、中国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等。至 1916 年初，共得 167 则，名为《菿汉微言》。最后一则自述学术思想变迁，其中有"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等语，常为人引用。

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30卷由虚受堂刊印。

此书是搜集整理汉儒马融、郑玄以来历代学者《尚书》传注疏笺而成。作者取参正孔传《尚书》之意，于古文伪经二十五篇多录前人考辨以证其伪；于汉传二十九篇《尚书》，利用文献和金石材料加以校正；并兼及马郑传注，旁征诸家义训，且多有按断，全面考释了《尚书》两汉今、古文及孔传本的文本及其说解、虞夏以至东周史地等问题。此书是清代《尚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120卷由虚受堂刊印。

此书未成而王氏逝世，其门人黄山总校，并完成部分未完成稿子。该书以李贤《〈后汉书〉注》、惠栋《〈后汉书〉补注》为基础，广采博收，“请益同人”，校版本之异同，订记载之讹误，考名物地理，释典章制度，有益于汉史研究。

刘承干《明史例案》9卷吴兴刘氏嘉业堂刊印。

此书收录清代编修《明史》的诏书、上疏、信札、移文、凡例等，几乎网罗了当时可见的关于《明史》纂修的全部文献，为《明史》研究提供了集中的资料。

1916 年

※ 王国维撰《生霸死霸考》、《史籀疏证》、《毛公鼎考释》。
※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出版。
※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成立。
※ 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 李泰棻编《西洋大历史》上卷刊印。

1 月

20 日　梁启超在《大中华》第 1 期发表《禹贡九州考》。

是月　李本道在《中国学报》第 1 期发表《五德终始西汉主胜东汉主生考》。

作者对“五德终始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尧后之说，始于左氏，火德之说，本于赤帝，肇起者略引其绪，继起者尽力以争，凭借国力，而学说以遂。”

王国维撰《生霸死霸考》。

作者以西周铜器历日考《尚书》、《说文解字》等文献，提出了周代“四分月说”，对以后的先秦年代学、青铜器研究影响极大。

顾颉刚编纂《清代著述考》。

1915 年 8 月，顾颉刚因伤寒病休学半年，期间以《书目问答》之《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基础，“依学术派别分作者，在作者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成《清代著述考》二十余册。

此书是顾颉刚早期的学术成绩，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立基础。胡适阅后予以高度赞赏，认为其抓住了三百年研究的中心思想。

2 月

4 日　王国维自日本京都启程归国，任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学术

丛编》编辑。

应同乡邹景叔之邀赴上海，就任英籍犹太人哈同开办的哈同花园仓圣明智大学《学术丛编》编辑。后来仓圣明智大学调整出版计划，将《学术丛编》分成二集，更名为《广仓学窘丛书甲类》，另一位编辑邹景叔负责编辑的《艺术丛编》更名为《广仓学窘丛书乙类》。《学术丛编》的宗旨是“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此杂志仿近代欧洲学报而办，从 1916 年出版至 1920 年停办，前后共出 24 期，刊行论著 52 种，其中甲类一集 25 种 6 卷，甲类二集 27 种 37 卷，除收录一部分前人著作外，主要有有罗振玉《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3 种，王国维《周书顾命礼征》、《周书顾命后考》、《乐诗考略》、《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毛公鼎铭考释》、《史籀篇疏证》、《汉代古文考》、《魏石经考》、《流沙坠简考释补正》、《汉魏博士考》、《殷周制度论》、《太史公系年考略》等 24 种。

10 日　《东方杂志》第 2 号转载《间岛交涉之旧历史》。

此文摘录宣统年间在中朝边界有关间岛问题交涉时中国官员所撰之条陈，涉及间岛的名称来源、位置、主权、治体、物产等问题。

同期刊登的《图们江界碑之历史》，亦是关于东北中朝边疆问题的论述。

15 日　易白沙在《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6 号发表《孔子平议》。

《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连载。文章指出那些认为孔子为“今日风俗之坏，学问之无进化”的罪人，或谓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必人人崇拜孔子的观点，皆不可取。易白沙认为，在春秋季世，“孔子只得谓之显学，不得称以素王”，此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统治者“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以利于统治的阴谋。结果孔子愈尊，风俗愈坏，学术愈退，统治者统治愈安全，此乃“中国两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何以孔子会被利用，一是由于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二是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是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藉口”，四是“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作者还认为，孔学与国学绝对不能等同，因为孔学、九家之学和佛学等共同构成了国学。

此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揭露孔子和儒教与封建专制关系的文章，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是月　王国维撰《史籀疏证》。

3 月 4 日又撰叙录一篇，述此书的变迁，刊入《学术丛编》为第 1 集。

王氏从古今文字体势之演变，驳斥长期来由古而籀，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的谬论，创造性地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新见解；并从声音训诂上证明史籀不是人名，《史籀》非周宣王时之作，从而使流行了数千年的苍颉造字，以及史籀作大篆的说法，被彻底否定。这对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的古文字研究乃至古史研究是一重大突破。

胡朴安称王氏此篇倡“籀文即古文说”，乃“古文字学一大翻案”。

商务印书馆将孟森在《东方杂志》等刊载的清史论文汇编为《心史丛刊》第 1 集出版。

第 1 集收录《奏销案》、《朱方旦案》、《科场案》三篇论文。此前，孟森曾有《心史史料》刊行，他在《心史丛刊》第 1 集自序中提到，“向刊‘史料’一册，荦荦大事为谈清史者所必留意”，“而此书则‘多网罗轶事，非史家必取之资’”。

该书后来又出版了第 2、3 集，第 2 集收录《横波夫人考》、《孔世贞考》、《金圣叹考》，第 3 集收录《董小宛考》、《字贯案》等文章。1936 年 4 月大东书局出版《心史丛刊》3 集合刊本。

3 月

吴廷燮在《中国学报》第 3 期发表《北宋经抚年表》。

第 4、5 期连载。该表逐年列举了北宋各路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的变迁，是系统研究北宋各路“帅司”长官的开山者，但错讹较多。

中国社会与政治学会成立，此前成立的中国史学研究会并入。

4 月

23 日　王国维撰《毛公鼎考释》，为考据学别开生面。

《毛公鼎铭》在古文字学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为周代史事与制度文物研究，尤其是经济制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云：“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这种方法不仅用于吉金文字的考证，而且用于考证甲骨文，其后考释殷先公先王及汉魏石经都运用了这种方法。戴家祥称王氏序中提出的考证方法，乃从事金甲文字研究的“基本原则”。继罗、王之

后，如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陈梦家、商承祚、余永梁、杨树达、陈邦怀、唐兰、朱芳圃等，“并世学者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一般说来，都没有脱离王先生所规定的基本原则”。

是月　蔡元培开始为在法华工办的学校讲学并编写讲义。

其中谈道：“历史者，记载已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者也。”还提出要编写不同于中国传统史书的“新历史”：“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统系。是谓文明史。”

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2卷编成。

1915年春，罗氏亲赴殷墟甲骨出土之地，归来尽出所藏，拓录《殷虚书契前编》中文字所未备者1104片，辑为《殷虚书契后编》2卷。次年精印行世。

同时期罗氏编成的还有《金泥石屑》2卷。

王国维撰成《释史》。

作者提出古史字“从中之意”，并认为古之官名多从史字出。这一观点对此后的史学史研究影响颇大。

5月

20日　曹鸿文在《学生杂志》第5号发表《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

文章考辨汉、满、藏、蒙古、苗五族名称的由来，简单梳理了中华民族同化的史迹。

是月　罗振玉编撰《殷虚古器物图录》1卷和附说1卷。

有评论者指出此书以后，殷墟研究范围骤然扩大，开始由文字扩充到器物的研究，并“转移视线于殷商一代之文化”。

王国维编成《裸礼榷》。

其内容包括：《林博士读〈国学丛刊〉一则》、《复林博士第一书》、《林博士评罗王二氏之答书一则》、《复林博士第二书》。后收入《观堂集林》卷一时，改题为《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

自序云：“乙卯之春，余撰《洛诰笺》一篇，印入《国学丛刊》中，日本林博士泰辅读而善之，惟于王宾杀理之释，颇不谓然，作《读国学丛刊》一篇（《东亚研究》第5卷第9号）指其瑕璺，刊于《东亚研究》杂

志中，余以书解答之，博士复就余书有所违覆（第 5 卷 12 号），余于是有第二书之答，此事关于殷周礼制至巨，有非可以疑文虚说及一二人之私见定者，故将往复各书布之海内，以俟达于礼者论定焉。”王氏提出研究学问，“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

6 月

16 日　胡适至康乃尔大学，与勃尔“谈历史考据之学”。

胡适“告以近治先秦诸子学，苦无善本”，“是以今日学者至多不过能作许多独出心裁之读法，及许多独出心裁之解读而已矣。推其至极，不能出‘猜测’之外”。勃尔先生谓:“当着力访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间，或在地下，则今人之穷年校注，岂非枉费时力？西方新史学初兴之时，学者亦枉费几许有用之精神时力为笺注之功夫。至近世始以全力贯注于寻求古本原本耳。”

是月　《民铎》杂志在东京创刊。

该杂志由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主办，撰稿人有李石岑、朱谦之、杨昌济、郭绍虞、易家钺、张东荪、梁漱溟、范寿康以及李大钊和郭沫若等。除了与当时政治联系紧密的文论外，该杂志还刊登哲学、史学、经济等方面的学术性文章，如李石岑《晚近哲学之新倾向》、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之摘录》、郭绍虞《孔门弟子学风只有物外与主内两派》、周予同《经今古文之论争及其异同》、何炳松《章学诚史学管窥》、盛朗西《先周教育制度》等。

7 月

10 日　《东方杂志》第 7 号刊载蒋瑞藻辑撰《小说考证》。

第 8—12 号，1917 年第 1—2、4—7、9—12 号，1918 年第 1—12 号，1919 年第 1—12 号连载。此书共十卷和一个附录，1919 年 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本。该书是蒋瑞藻 1911 年所作《小说考证》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完善。此书仍然是以辑录为主（“取各家著述小说者，略次其时代之先后，类为一编”），附以论断辨析（“条分缕析，本末并状”），以使“读各小说也，如土委地矣”。全书涉及的古代小说主要有《荆钗记》、《董西厢》、《西厢记》、《拜月亭》、《汉宫秋》、《燕子楼》、《杏花庄》、《城南柳》、《琵琶记》、《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平妖传》、《新机锦》、《金瓶梅》、《红楼梦》、《英烈传》等上百部。

21 日　张元济、沈曾植等在上海与伯希和会晤。

欧战期间，伯希和调任法国驻中国使馆武官次官，赴任途经上海，主动拜访张元济等人，希望能与中国“通人”相见。张元济于是日设宴招待伯希和，并请沈曾植、叶昌炽、张均衡、缪荃孙、蒋汝藻作陪。据叶昌炽记载，沈曾植与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而伯希和则展示敦煌唐写本《经典释文》之《尧典》、《舜典》两篇残帙照片。

是月　蔡东藩完成《清史通俗演义》，《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开始问世。

1916年至1926年间，蔡东藩共著述出版历史通俗演义13种，分别是《清史通俗演义》（1916年7月）、《慈禧太后演义》（1918年11月）、《中华全史演义》（1919年3月增订）、《元史通俗演义》（1920年1月）、《明史通俗演义》（1920年9月）、《民国通俗演义》（1921年1月）、《宋史通俗演义》（1922年1月）、《唐史通俗演义》（1922年9月）、《五代史通俗演义》（1923年4月）、《南北史通俗演义》（1924年1月）、《两晋通俗演义》（1924年9月）、《前汉通俗演义》（1925年11月）、《后汉通俗演义》（1926年9月）。

除第2、3种外，总称《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又名《历朝通俗演义》，从秦始皇起到1920年止，均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中国历史通俗演义》11种初版时为石印线装本。1935年5月，会文堂加上许廑父续编的《民国通俗演义》第4集40回，全部改铅印再版，总称为《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4册，另有总目1册，共651万字。

蔡东藩的历史演义树立了通俗史学的样板。蔡氏继承发展了吴趼人等关于撰写演义体史书的理论，即把握历史的真实，以通俗易懂的笔法加以表现。一方面，蔡东藩以历史为本位，严格选择史料，反对歪曲和虚构。另一方面，在求真的基础上，兼采历史小说的“文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做到“语惟以俗”。所以，其通俗演义是典型的通俗史学作品，而非普通的小说或演义，性质是史而不是小说。它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方面，大大超出了历代正史。

这部演义体史书初版时就风行全国，销售至十万册。改版后更令人瞩目，到1936年5月已出第4版。

8月

谢蒙《韩非》由中华书局出版。

谢无量《朱子学派》由中华书局出版。

9 月

商务印书馆编印“饮冰室丛著”。

该丛著收录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墨学微》、《史传今义》、《中国之武士道》、《外史鳞爪》、《饮冰室自由书》、《新大陆游记》等 13 种论著。《外史鳞爪》三册系梁启超在晚清时期所撰历史著作汇编而成。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阶段。上古即先秦哲学，论述儒、道、墨、法、名诸家；中古即两汉至隋唐哲学，评点陆贾等汉儒及魏晋以后儒、释、道三足鼎立之思潮；近世即宋元明清哲学，涉及周敦颐以下三十多人。

就体例而言，这部书具备了中国哲学通史的规模，比陈黻宸等人的中国哲学史更完整，在观念上也有不少进步，确有拓荒之功。但是该书缺乏系统的说明，只能算是一部哲学史料。

10 月

1 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2 号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对康有为提倡“孔教”的行为进行了痛斥，认为“吾民之德弊治污，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认为康有为可以“休矣”。

3 日　教育部为京师图书馆通咨各省征求最新地方志。

教育部在咨文中指出，“方志之书，同重于中外”，但京师图书馆所藏各省县志书寥寥无几，且都是百余年前的本子，所以请各地“征取最新修刊之志书，其未经新修者，取最后修成之本，逞为邮送本部”。实际上，这是鲁迅主持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期间，为充实京师图书馆馆藏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之一。

5 日　教育部通饬各省征集碑碣石刻。

公文指出，“金石之文，传世最久，洽闻论古，罔不取资”，碑碣石刻可以“证经”，可以“订史”，可观“政教”，可考“典守”等，被学界艺林重视，但是私家收藏毕竟力量有限，不能很好保存。前清三通馆曾征集天下金石，以考订纂修金石志，外国亦都是由政府征集，藏之于国立图书馆以“备学者之考究”，教育部因此饬请各地将所属地著名的碑碣石刻拓印寄送教育部，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此亦是鲁迅主持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期间，为充实京师图书馆馆藏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之一。

20日　王闿运去世，终年83岁。

李启沅在《学生杂志》第10号发表《中国历代工业考》。

文章对黄帝、夏、周、秦、东汉、三国、西晋、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工业情况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中国“上古之工业亦已发达极矣”。

是月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成立。

该所由1913年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发展而来，以丁文江为所长。参与这一机构创办和发展的还有翁文灏、步达生等人。地质调查所先后聘请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外国科学家，其中最重要有五个人：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魏敦瑞和德日进，在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取得了相关的成绩。李济认为安特生是第一个以实际成果在中国古代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面的西方科学家。胡适称，在丁文江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下，地质调查所“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

地质调查所最大的学术成就是对北京周口店地区的系统发掘。在1927年后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四十多具遗骨，轰动了世界。因为周口店发现的材料多而重要，需专门研究，所以地调所和北平协和医科学院的解剖系合作，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1929年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步达生为室主任，专力从事中国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研究。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梳理了从上古至明代的妇女文学创作史实，为我国第一部妇女文学专史，有较大的开创意义。但该书撰写仓促，体例不精，类似资料长编。

罗振玉编录《古明器图录》4卷及《隋唐以来官印集存》1卷。

翦伯赞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在武昌商专三年期间，翦伯赞接触了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的理论，受到形式逻辑的训练，并开始了中国经济史的探索，最终写出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毕业论文——《中国币制史》。

11月

1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3号发表《宪法与孔教》。

陈独秀认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它宣扬的“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与宗法封建时代所同然”，民国宪法“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故孔教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

是月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 1914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梳理了中国从上古到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该书系用英文撰写，1915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1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周盘译、黄炎培序的中文版。黄炎培在序中称该书是“一部中国教育制度简史，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誉为“空前之作”。

12 月

10 日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推举章太炎主国史馆。

电报云：“民国既设国史以求实录，开办未有成绩，馆长王君遽逝，总统知人善任，继职者自必妙选长才。以文所见，则章君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

1917 年 1 月 21 日，章太炎致函友人，表示不愿就任国史馆馆长。信中说“中山、西林诸公遽以国史相邀，盖未知吾辈本情也。今之人情，信国史不如信野史，果欲表彰直道，元遗山非不可为，焉用断滥朝报为也”，而章太炎“欲闲处数年，或东游日本，宣布国华”。

26 日　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 1917 年 1 月 4 日到校任职，并于 1 月 9 日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指出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深学问”，并以此为指导来整顿北大。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方针网罗具有高学术水准的新旧学人任教，造成研究学术的新风气。在历史学方面，蔡元培采取将国史编纂处纳入北大、开设“史学门”等措施。

是月　李泰棻编《西洋大历史》上卷刊印。

本书“绪论”论述了“史之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进化”、“史之辅料”等内容，第一编为上古史，叙述了埃及、希伯来、腓尼基、波斯、希腊等地历史，第二编为“中古史”，叙述了日耳曼诸国、教会、突厥诸王朝、英法诸国等的历史、第三编为近古史，叙述了航海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各国的发展及美国独立；第四编为近世史，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意大利、普鲁士、俄国的兴起、美国的发展、欧洲列强的殖民活动、一战等历史。此书吸纳了国内外不少论著，涵括政治、军事、文

化、宗教、学术、外交等内容。该书中卷于1917年2月刊印、下卷于1918年5月刊印。《西洋大历史》3卷本后来多次修订重版，1921年7月增补此书的相关章节，北京武学书馆第3版发行。1930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西洋大历史》第5次印刷本，遂为定本，共4大册，100多万字。

是年

江谦辑撰《两汉学风》由江苏省教育会在上海出版。

该文介绍了西汉和东汉时期治学与事功两不废的著名人物如司马迁、公孙弘、匡衡、郑玄、梁鸿、诸葛亮等38人，以倡导俭朴务实之两汉学风。

暑假，傅斯年从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毕业，随后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

1917年

※“白话文运动”发起。
※ 王国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两周金石文韵读》。
※ 陈垣《元代也里可温考》出版。
※ 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成立。
※ 胡适发表《诸子不出王官论》。

1月

1日　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运动”。

该文系统论述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还在文中提出了一些论断，如文学应该有情感和思想；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文学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元代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若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等。胡适呼吁“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陈独秀在文后按语中喊出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口号。此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文化界、思想学术界的关注。此后，钱玄同、刘半农、曾毅、傅斯年等都著文对“文学革命”予以响应，“白话文运动”迅速发展，并走向了实践，很快取代了沿用数千年的文言文，不仅文学采用了白话文，史学等学术论著也多采用了白话文体。

陶履恭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

第2卷第6号、第3卷第1号连载。文章认为“文化发源已至久远”，若“欲究人类之源，文化之端，必先究地史古生物学以资比较”。文章第

一节“地质期”介绍了利用地质中的化石来研究古生物之嬗变；第二节“有史前期”，主张用比较法来“严动物人类之别，以究文化之起源”；第三节“无文化之人类先代”，认为先代之民，能超乎一般动物“必先有手，然后能制作器具”，且必为“群居生活”无家族制度；第四节“人之成就”，讨论了“群与言语”、“手及器具”、“火之发现”等问题。此文较早以人类学的知识来探讨人类文化起源问题。

9日　全国水利局咨请征集各地省县志。

15日　王怡柯在《东方杂志》第1号发表《中国币制考略及近时之改革》。

第2号连载。作者考辨载籍，梳理了中国从上古至清代币制的演变和中国近现代币制改革的过程。

15日　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北迁。

2月

1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文学革命论》。

作者认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此文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5日　洪铭在《学生杂志》第2号发表《长城考》。

文章指出春秋末叶，井田制度废，“寇敌冯陵，防守匪易，于是有国者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作者将长城分为塞上长城和腹地长城两种，腹地长城是为防御诸侯国的攻击，兴建的国家有齐、楚、魏、韩、赵。塞上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秦朝以前建长城的有魏国、秦国、燕国、赵国；秦始皇修长城以后，在汉代、北魏、北齐、周、隋、唐、金、元、明、清也都有建设或修补。

是月　王国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被认为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

4月中旬，王国维复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和《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基本相同，从而证实了《史记》的史料

价值和殷商史的真实性。屈万里云："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而用它来证史则始于王国维。"二文"告诉人们对于《史记》所记的古史，固然不能全盘相信，但也使疑古的人们对于《史记》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利用甲骨文的材料，重建殷代的信史，王国维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山之作。"傅斯年认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二文，"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并指出最重要的几个贡献：一是"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是"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是"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些都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郭沫若也说："卜辞的研究，要感激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王世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

王国维撰成《太史公年谱》。

该谱对司马迁的生平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史记》之名起于三国"，"乃《太史公记》之略也"的观点。

（英）洛加德著，林纾、魏易译《拿破仑本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后有多个版本的拿破仑传记出现，如钱智修编译的《拿破仑》（商务印书馆 1919 年 4 月出版），法国莱翁·格尼爱尔等著、陆翔辑译的《拿破仑外纪》（上海广文书局 1919 年 4 月出版）。

3 月

4 日　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

该会"以研究亚洲文学，联络感情为宗旨"，希望联合亚洲各国有关人士研究"亚洲古学"以抗击"西势东渐"，挽救亚洲传统文化。

该月 8 日，亚洲古学会开第二次大会，通过章太炎所拟"暂定简章"，对亚洲古学会之"定名"、"宗旨"、"责任"、"义务"、"会期"等都有所勾画。此后亚洲古学会又多次开会，但最终不了了之。

是月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撰成。

仓圣明智大学印行，后收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自序云："《汲冢竹书纪年》佚于两宋之际，今本二卷，乃后人搜辑，复杂采《史记》、《通鉴外纪》、《路史》诸书成之，非汲冢原书。然以世无别本，故三百年来学人治之甚勤，而临海洪氏颐煊，栖霞郝氏懿行，闽县林氏春浦三校本，尤为雅驯。最后嘉定朱氏右曾，复专辑古书所引《纪年》，为《汲冢

纪年存真》二卷，顾其书传世颇希，余前在上虞罗氏大云书库假读之，独犂然有当于心。丁巳二月，余复作《殷先公先王考》毕，思治此书，乃取今本《纪年》一一条其出处，注于书眉，既又假得朱氏辑本，病其尚未详备，又所出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去取亦不能无得失，乃取朱书为本，而以余所校注者补正之。凡增删改正若干事，至于余读此书有所考证，当别为札记，将继是而写定焉。”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上下两册约百万字，资料收集丰富、分析细致，对民国财政沿革、“岁入”、“岁出”、“国债”、货币等都有涉及。1932年，作者又撰《民国续财政史》。两书在中国近现代财政史研究领域都较有价值。

梁启超在此书序言中指出，“民国成立后，国用益繁，制度之变更益数，讵可无所记载矣”，而且“今日之财政，由古代递嬗而成，或数百年一大变，或数十年一小变，期间兴革利病之源，有史焉以资观览，乃可取鉴往事，徐图革新”，此书可为之助。

罗振玉编录《殷文存》3卷。

收录商代铭文拓本755器，有罗振玉序和器名目录，但没有拓本说明，是重要的金文汇。1917年，罗振玉又编辑了《续殷文存》2卷，1935年编印。

罗振玉编成并影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6册。

全书分为“群经丛残”和“群书丛残”两部分，按经史子集顺序，“开以后敦煌文书辑录分类编纂的先河”。此年罗氏又影印《鸣沙石室佚书续编》。

王振先编著《中国厘金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中国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5月

1日 《新青年》第3卷第3号译载日人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

此文原载日本《太阳杂志》3月号，因其内容与中国的“国学”关系密切，《新青年》遂予以全文转载。桑原骘藏指出中国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使最重要之书“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整理之后，再以科学的方

法研究之始可”。桑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桑原还建议说，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桑原则提出应替历代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便查检。

胡适读后觉得获益良多，在 1917 年 7 月的日记中留下一大段读后感说，“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其“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胡适读这篇文章时，特别注意到“整理”一概念，并对桑原提出应“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书籍这一说法，尤表激赏。桑原上述观点与两年后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接近。其提出的治中国学的途径与发刊宣言提出的国故整理的三个方向——“索引式”、“结账式”、“专史式”也大体一致。

10 日　陈垣《元代也里可温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

陈垣述其著述宗旨云：“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作者专用中国史料考证元代基督教情况，廓清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元代也里可温之称谓、本义、词源及相关的史学问题。

本文引用文献近 50 种，除正史官书外，还有大量文集、方志、碑刻、金石考古录及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国外的有关研究论文等，私人史著及地理、金石类著作、地方志、总集、文集、笔记等，几将所有文献全部囊括，并在此基础上就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和研究作了全面清理和系统总结。

此文引起了国内外元史和宗教史专家的注意。1917 年 12 月陈垣访问日本时宣读《元也里可温教考》，震惊了日本学术界。12 月 8 日他在日本东京《致慕元甫函论刻公教丛书》云：“拙著也里可温，此间学者颇表欢迎，将引起此邦学界之注意。”有评论认为该书“把沉埋了几百年的这段历史，作了充分的阐明”，因而著成之后，“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

初稿梓世后，陈垣继续研究元也里可温，由于“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于是对原稿作重大补充修改，并于 8 月再版。

1918年1—5月又刊于《东方杂志》第15卷第1—5号。以后他又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经1920、1924、1934年三次修订，题目改为《元也里可温教考》。

是月　（日）今井嘉兴著，马鸣鸾、吴炳南译《列强在中国之竞争》由晋新书社出版。

该书分七章，记述16世纪以来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尤详。

黄毅《中国耻辱记》由上海国民书社出版。

6月

15日　姚公鹤在《东方杂志》第6号发表《上海报纸小史》。

第7、12号连载。文章对上海华文日报的兴起、盛衰、兴废等“有历史上必要之记载”外，而且对一些影响上海报纸发展的大事进行了梳理考辨。此文是中国新闻史、印刷史的较早作品。

是月　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成立。

蔡元培接长北大后，国史编纂处改隶于北京大学，并以协助纂修国史之名成立中国史学门。史学门的教员主要由不满于新文学的文科教员和国史编纂处的部分人员组成。据此后颁布的《北京大学文、理、法、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可知，史学门计划开设的课程有：历史学原理、中国通史、东洋通史、西洋通史、人种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外国语（欧洲近代语）为“通科”。中国地理沿革、西洋地理沿革、年代学、考古学、中国文明史、中国法制史（法理学及西洋法制史）、中国经济史（经济学）、欧美各国史、亚洲各国史、欧美文明史、欧美政治史、欧美殖民史、中亚西亚地理及历史为史学门“专科”。除了这些课程外，还设有三种“特别讲演”（一是以一时代为范围者，二是以一书为范围者，三是以一种事件为范围者）。在预科文科课程里，一年级需修本国史、西洋文明史，二年级需修西洋文明史。另外在预科法科的政治学门、经济学门、商业学门，都有本学科的发展史作为基础科目。

1917年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通史（黄节）、地理沿革史（张相文）、法制史（陈汉章）、经济史（蒋观云）、学术史（叶瀚）五门。1918年增列东洋通史（钱硕人）、历史研究法（曹馥珊）、中国与亚洲诸国交通史（曹馥珊）、人类学与人种学（陈映璜）四门。史学门的课程内容大多与国史纂辑的方向有关，例如中国通史一课不以时代为序，而是以“分类法”作为讲授方式，明显是为了迁就纂修国史分类工作的需要。国史长编

中政治史、文明史的各类纂辑项目，亦多是中国史学门的开课内容。

北京大学史学门，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史学系，是中国现代史学学院化进程关键的一步，此后各大学陆续建立起史学系。

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成立。

黎元洪令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在文科附设国史编纂处。国史编纂处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处长，分纂辑、征集两股，文科学长兼任纂辑股主任，蔡元培亲自筹划编纂处工作，拟定编纂略例，聘请屠寄、刘师培、叶瀚、童学琦、蒯寿田、孙诒棫为国史纂辑，张相文与邓之诚被聘为民国史编纂。根据章程规定，国史编纂处的首要工作为编纂通史与民国史长编，主要为政治史、文明史。纂辑工作采取分工的方式，各人根据专长认取不同领域着手进行，例如张相文、邓之诚负责民国史之纂修，叶瀚侧重于学术史之纂辑，刘师培则着力于文明史之风俗类长编及政治史志书的编定。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出走，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取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国务院直属，仍称国史馆，致使编纂工作中断。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由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印行。

王氏前作《辑校》，取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为本，逐条注明其出处；至《疏证》，则梳理今本纪年每条之所由出，以辨其伪，并得以明古本之真相。是故此二书并行而成，而《竹书纪年》作为研究古史之重要纪年体史书，遂得以征信。

7 月

10 日　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

胡适在上海停留 12 天，专门调查了上海的出版界，发现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版过一部哲学书”，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史学方面，“只有一部《中国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书，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胡适认为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胡适说“看了这个怪现象，真可以放声大哭”。

15 日　《东方杂志》第 7 号转载《中国之喇嘛教及回回教》。

第 8 号连载。该文译自日本《支那》杂志，文章考辨了喇嘛教、回回教的名称、传入中国及传播、教派发展等情况，并介绍了在民国初年的存在情况。

31日　陈黻宸卒于浙江瑞安，享年59岁。

8月

4日　何炳松被聘为北京大学预科讲师。

9月10日何炳松就任北大预科讲师，讲授外语和“西洋文明史”，同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教授，讲授西洋历史。

是月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清外史丛刊”。

该丛刊收录（英）马噶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英）朴笛南·姆威尔著、陈冷汰等译《庚子使馆被围记》，（英）普兰德著、陈冷汰等译《清室外纪》，（美）卡尔著、陈霆锐译《慈禧写照记》等。

9月

10日　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教授。

据耿云志《胡适年谱》考证，胡适于该日到达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在9月21日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礼上作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胡适该年担任“中国古代哲学”、“英文”等三科教学任务。

胡适讲授的古代哲学史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做法对当时的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时北大学生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是月　王国维撰《殷周制度论》，开制度与文化变迁研究之先河。

9月13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云：“《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流者为嫡庶之制，由是孳生有三：一、宗法，二、服术，三、为人后之制。与是相关者二：一、分封子弟之制，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出于亲亲之统者，曰庙制。其出于尊贤之统者，曰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皆不世之制（此殆与殷制同）。又同姓不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

《殷周制度考》等文，考证出商代没有嫡庶之制，而是祖父兄三世兄弟世系相承。殷代制度不同于周代，而嫡庶之别起于周代。王国维指出："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云："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与吉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有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先生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可也。"

虽然，由于所据史料及思想的局限，王氏自谓"寓经世之意"的这篇"大论文"，不无"周公制作之本意"的"旧式观念"，但蕴涵极高的学术价值。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王氏在卜辞研究之余有《殷周制度论》之作，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一篇轰动了全国学界的大论文，新旧史家至今都一样奉为圭臬。"

以后随着殷周制度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王氏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就得出与王氏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在当时王氏能依据甲骨文、金文资料再参以《诗》《书》《礼》等经典，所得结论使得殷周制度的异同从此成为古代研究中的大问题，以后论殷周制度与文化者无不参考此文，莫不循斯途以展开研究。

王国维撰《两周金石文韵读》，刊入《学术丛编》第 2 集。

自序云："自汉以后，学术之盛无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文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栖霞郝氏之于训估，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然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其时亦上起宗周，下讫战国，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部目谱而读之，虽金石文字用韵无多，不足以见古韵之全，然足证近世古韵学之精密，自其可征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作者认为古韵之学，至清代王念孙、江有诰诸人而极密，但这些学者没有搜集金石文字等方面的资料，故以此补之。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受陈康祺《郎潜二笔》所记徐柳泉以《红楼梦》中人物影射政治人物之说的启发，以“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三法，论证“《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其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胡适《红楼梦考证》批评是书为“附会的红学”，“走错了道路”。

10月

7日 《章实斋遗书》开始由刘承干刊刻。

章学诚临终前将文稿交托友人王宗炎，王氏将其编为30卷，但未及定稿刊刻即去世，一直未能刊行。桐城萧穆于1903年11月2日请南昌知府沈曾植帮助刊刻此书，沈氏乃转请江西学政吴士鉴相助，最终无果。《中国学报》第9期曾刊其《与陈观民工部论湖北通志》部分，但后因《中国学报》停刊而无再续，直至1917年10月7日，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从沈曾植处借得王宗炎编30卷《章实斋遗书》，另增补20卷方付刻印，至1922年告竣。刘承干记载沈曾植在借书时言“此书予向极宝贵，从不假人，今阁下可刊，尽可取去，予不禁为实斋庆也”。刘氏刊本为当时收罗最富的章氏著作合集，也是此后章氏著作校勘增补的底本。

15日 胡适在《太平洋》第1卷第7号发表《诸子不出王官论》，将今文学说引入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

在诸子学的缘起问题上，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认为诸子学出于王官。胡适撰《诸子不出王官论》，一方面是要肃清千年以来《汉书·艺文志》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破除章太炎的诸子学出于王官之论。他认为，“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惟太炎先生为最详”。胡文一半的篇幅用来驳斥章太炎。

钱穆曰：“尝谓近人自胡适之先生造《诸子不出王官之论》，而考辨诸子学术源流者，其途辙远异于昔。《汉志》所列九流十家，决非一源异流，同时并出，此即观于各家立名之不同而可见。”顾颉刚也说，自读了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

此文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骨架，被胡适作为《大纲》的附录。余英时认为这是“他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其“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

《东方杂志》第10号转载《中国回教传衍之历史及各省回教之近况》。

此文节译自日本《新日本杂志》，对回教传入中国、“流行于中国”、“回教徒散在中国全境”，以及各省回教徒的情况都有介绍。

11 月

7 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引起普遍关注。

15 日　李俨在《东方杂志》第 11 号发表《中国算学史余录》。

作者认为阮元《畴人传》未具系统，而“中国数理学说渐就沦亡”，反倒外人于此有所研究，乃于“研读所得”，“删繁就简，求其源委”，撰成“自上古以迄于隋”的中国数学史。但因欧战爆发等原因未能印刷，于是乃有此文的发表。

16 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 1 号刊载《国史编纂处纂辑股编纂略》。

《编纂略》称：（一）纂辑股分为通史和民国史两部；（二）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三）长编分为政治史和文明史，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志、列传四部，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四）民国史全书分为长编、诸志、列传、年表四部分。《编纂略》还规定了年表、志等具体的体例、人名地名等标识等相关问题。

17 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简章》，对国史编纂处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规定；18 日，《北京大学日刊》又刊载《国史编纂处征集股条例》。

12 月

4 日　《重修常昭合志》正式启动，藏书家丁祖荫被推为主纂。

常熟县为修志特别设立“修志征访处”以征集史料，丁祖荫等人对修志也认真负责，至 1924 年共计 170 余万字、22 卷的《重修常昭合志》完稿。该志总括前志、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考证精详、突出时代变迁，是民国初年纂修水平较高的一部县志。此志在 1924 年秋既已开始刻印，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方才全部印出。该志金石、艺文两部分曾被丁祖荫以《常熟金石志》、《常熟艺文志》为名刊行。

是年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

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关于有清一代的朝野遗闻，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的事迹。本书分门别类，按事情的性质、年代先后，以事类从，共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余条，记载较为完备。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比较严肃，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特别是关于社会经济、下层社会、民情风俗的资料，对于研究清代社会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全书事以类分，类以年次，分类详细，纲目明晰，文字简约可读。

徐世昌主编《大清畿辅先哲传》40卷成书刊刻。

该书是清代北方人物传记的汇编，由王树枏等人负责撰写。该书以事迹为重，尤其突出品行、文学、学术等，为研究清代学术文化的重要文献。

缪荃孙开始编纂《江阴县续志》。

此书由缪氏手订义例，同人分任，最后由缪氏总纂成书，于缪氏病逝后1920年刊刻（扉页标“庚申六月”）。该志是缪荃孙的最后一部地方志作品。在篇目设置、内容记述、编纂方式上都有所创新：篇目上，全志共28卷23门类，新添了天文、石刻、前志原委、杂识、前志证误、叙录6个类目；内容上，改变了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做法，重视经济方面的论述；编纂上，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编制舆图和统计表。此外，该志虽然止于1911年，但是附录《江阴近世录》较好地保存了1912—1918年的史料。该志被认为是缪荃孙地方志作品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冯煦在该志序指出缪氏“宗实斋说，以赓续前志为准，而又甄综载籍，咨询耆旧，弼违补阙，与前志相发明，虽阅续志，其义例之严，文质之宣，前志有不逮焉”。

冬，陈寅恪经由上海赴美，入哈佛大学，学梵文、希腊文、巴利文等。

1918 年

※ 蒋梦麟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
※ 许国英编纂《清鉴易知录》出版。
※ 傅斯年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 胡适借赴南开讲学之机访问梁启超，自此二人开始在学问上直接切磋问难。

1 月

15 日　高一涵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1 期发表《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高一涵认为“述西人政治思想之变迁，以为吾国政治思想变迁之引导，诚为今日之急务”。此文探讨了西方近世“国家观念之变迁”、“乐利主义之变迁”、“民治主义之变迁”。

20 日　蒋梦麟在《教育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10 周年纪念号”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

作者从历史教育角度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检讨。他说：“吾国旧日之历史，以消极言之，则一姓之家谱也，以积极言之，则其范围实不越乎政治道德。夫政治道德，不过历史之一部分而已。若以此范围历史上种种变迁，则推因不远，探源不深，其所测人事变迁之原因与结果，不能恒合乎事实之当然。”用这样的历史来教学生，无疑是毒害学生，所以，史学应当革新。

他主张要“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以革新中国之旧史学。他还提出要向美国史学界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该文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有学者在论述“前清与民国史学之趋势”时，把它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并列，誉为“中国史学之新潮流，即示中国现代史

风之一大倾向”。这是一篇较早介绍美国新史学的文章。

是月　许国英编纂《清鉴易知录》出版。

许国英与汪荣宝合写《清史讲义》后，又以编年体编纂了《清鉴易知录》此书是仿照过去的《纲鉴易知录》体裁编纂而成，将有清一代历史，时间上按年月，纪事则按纲目，编成一书。前编四卷叙入关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朝，正编二十八卷叙入关后顺治至宣统十朝。取材除当时流行的官书《东华录》、《圣武记》、《满汉名臣传》而外，又有《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明纪》、《明鉴》、《大义觉迷录》以及新近出版的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兼及野史笔记等。

该书虽用传统体例书写，但作者的观点仍然反映了时代潮流，宣传种族革命，赞扬共和，寓有排满思想，与当时正在编纂的《清史稿》截然不同。此书另一特点是略古详今，正编 28 卷中，鸦片战争以前 200 年历史占 13 卷，鸦片战争以后 70 年则占 15 卷，近代部分占全书一半以上。

本书仅用 20 万字的篇幅将清代的重大事件，用纲目的方式条贯起来，通俗易懂，便于读者掌握基本史实，在当时是一本较受欢迎的著作。1918 年 4 月再版，1923 年 8 月 3 版，1931 年又重版。1978 年北京古籍书店重印时，王钟翰在《校订叙言》中说：“过去对初学清史的人从这部书里得到基础知识，就是到了今天，只要能用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它，对一般想学习一点清史的人也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2 月

15 日　《东方杂志》第 2 号刊载《世界饥馑史》。

此文译自美国《地理杂志》，作者认为兵灾、饥荒和疫病是人类的三个大敌，三者“犹之三角形之三边，恒相联接，而饥荒则其底边也”。文章对历史上最古之饥荒、古罗马、纪元以后之埃及、英国、法国、爱尔兰、印度、中国、俄国及南北美之饥荒史，都有介绍论述。

3 月

2 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 81 号开始登载国史编纂处征集股的启事。

内容为“自国史馆归并本校后，本股专司征集史料，现在由京外各机关寄到志书暨经公布印刷品为数不多，深恐不敷纂辑采用，本校全体诸君平日如有搜集前清秘史，以及有关民国史料各种书报，尚乞借抄一份”。由此可知，国史编纂处开办以后，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在图书资料征集等

问题上存在不少困难。

15 日　易白沙在《东方杂志》第 3 号发表《中国古代社会钩沉》。

第 4 号连载。作者指出“今中国学者稍稍知社会学，然其所习不过介绍一二哲儒之说，而祖国社会之情状，不可得而言也”，而“今日治此学者”责任实非常重大，不仅要使“太古之事灭而复存”，而且要“晓然于过去之社会，何以变为现在之社会”。作者试图解读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今之关系，不过文章只刊载“绪言”和“论中国社会结合由于社神第一”即终止。

18 日　陈汉章在《北京大学日刊》第 94 号发表《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

连载至 4 月 11 日的第 108 号结束。陈汉章认为中国的大学之制：萌芽于上古；详备于周；春秋战国学校之教术废，惟孔门传述而讲明之；秦是开始设立学官博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博士制度变化时期；大学学科至唐而分为六；宋代推行三合法；辽用唐制，金参以宋制；明清国子监教法大致相同；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的大学制度开始学习模仿西方制度。

22 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 98 号刊载胡适关于短篇小说的演讲辞。

此文是胡适在“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上的演讲，其中一部分是谈“中国短篇小说之发达史”。胡适认为中国的短篇小说起源于诸子寓言，汉唐间“礼记体小说盛行”，唐代杜甫白居易都有韵文绝佳的短篇，宋代笔记体小说盛行，明代小说走上高峰，但至清代后趋于衰落，多是些札记体小说。

是月　江瑔编《新本经学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

15 日　傅斯年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发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傅斯年认为“中国学术一切谬误，必有基本谬误”，今“欲起中国学术思想界于较高之境”，欲“探西洋学术思想界之真域”，“惟有免除此谬”。傅斯年所列举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有：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三、“中国

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六、中国学术“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七、“中国学术思想界中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间架，到处应用”。概括起来说，可谓是“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

其中作者对传统学术好谈致用的弊病抨击曰：“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镕陶德行，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由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剀切，势必流入浮泛。”

《东方杂志》第4号转载茅以升《中国圆周率略史》。

作者以数年之力，“就我国圆周率史迹，提要刈繁”，撰成中国圆周率略史，对上古、秦汉以至明代的各家主张和圆周率变化进行了梳理。

17日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日刊》第113号发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第114—118号连载。作者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多模仿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的分期之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而后者实以远东历史为依据，并不适宜中国情形，应重新确立分期标准，同时指出史学“要以分期为基本”，历史“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傅斯年指出，为中国历史分期，要注意四事：一是汉族于陈隋间大起变化，二是唐宋时期胡汉消长之迹与南宋之亡为中国历史又一大关键，三是分期宜具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期之标准，四宜在初分大框架下进行“枝分”，使之纲目毕张。

6月

刘师培在国史编纂处会议上提交编撰报告。

计有：（1）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6册，已编3册；（2）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12编，已编4册。

7月

15日　《东方杂志》第7号译载《罗马灭亡之经济考察》。

此文译自日本《国民经济》杂志，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罗马灭亡之原因，认为早期罗马人“根本于农业者最多”，勤劳善战终成霸业，但是至其季世，大多数罗马人“厌恶劳动，舍弃农业”，导致“食料缺乏、人口锐减”，不得不走向灭亡。译者认为“罗马之覆亡实可为吾民族前车之鉴”，不能“舍本逐末”，更不能于“食料问题多不注意”。

是月　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2 卷编成。

此书主要是罗振玉为此前印行古籍古器等书籍，尤其是敦煌文献所写之“序跋”的集合，在目录学、校勘学、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小的价值。

8 月

上海文明书店编辑印行《清鉴辑览》。

此书又称《注释清鉴辑览》，28 卷。起自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攻尼堪外兰，终至宣统三年（1911）共 329 年。作者叙言云，此书仿《历代通鉴辑览》而作，“今者易满清为民国，时代一变革矣，易专制为共和，政体一变革矣，时移势殊，清代兴亡，已成陈迹，然回忆革命之际，仅七年耳，倘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则清鉴之作，本满清数百年之政策，以数十万言编之，固大可昭示来兹，而为读近世史者不可一日离者也”。

该书主要取材于《东华录》兼及《国史列传》等书。叙事的特点是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地点，正文简要论列而外，又加以小字注释。系年先用干支，下系年号，明清并存时，大字书清年号，小字书明年。

傅幼圃《中国痛史》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10 月

8 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 222 号刊载傅斯年致校长蔡元培关于“哲学隶属文科之流弊”的信函。

傅斯年认为，“中国人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而从哲学历史发展来看，每当自然科学进步时，哲学即随之进步，所以主张将哲学归并理科。蔡元培在批复中指出，不论是治哲学、文学还是史学，都应该根据科学，用科学的研究法。如果哲学并入理科，则文学史学似都应归入，则文科将不复存在。与其归并，“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道”。傅蔡二人的讨论，反映出了中国学人在中国学术分科化和科学主义冲击下面临的困惑。

15日 《东方杂志》第10号刊载甄绍燊《中国刑法之沿革》。

此文录自《政法学报》，作者按中国刑法观念变更的特点将中国刑法之沿革分为四期：唐虞三代，为刑法观念最发达时期；秦汉魏晋，为刑法严酷时期；梁武帝泰和新律至前清，为中国法系时期，民国新刑律施行以后，为欧洲法系时期。

是月 谢无量编《中国大文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将中国文学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代四段，并较详细地梳理叙述各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变迁过程。1940年出至第18版。

11月

15日 《东方杂志》第11号转载C. S. Lobingier《马来人种考略》。

此文原载《字林西报》，对马来人种之起源、发展、向北方之传播、中国文化对马来人之影响、阿拉伯文化对马来人之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论。作者认为马来人是“三大文化”融合的产物：“马来人种之语文，起源于印度，其商业及社会习惯，则本于中国之文化、其宗教及法律，又系由回教所嬗蜕而来。”

19日 北京大学新潮社成立，成为青年学生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主要团体。

新潮社是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的一个宣扬新思潮新文化的学生社团。

23日 胡适借赴南开讲学之机访问梁启超，自此二人开始在学问上直接切磋问难。

胡适在此前致梁启超信中说：“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

12月

3日 司徒雷登受聘为燕京大学校长。

美国各教派决定将在中国北方所办学校的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为新的大学，并聘司徒雷登为新学校的校长。1919年夏，合并后的新学校正式定名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特别重视中国文史的研究和燕京大学文

史学科的发展，在建校时就组建了中文系、历史系，并与哈佛大学合建“哈佛燕京学社”。

15 日 《东方杂志》第 12 号刊载《欧洲大战与中国历史之比较》。

此文译自日本《东方时论》，作者认为“征古而察今，同时征今而考古，乃历史家一大任务”，作者用比较的方法，将“欧战中诸事实与中国历史上诸事实互相比较，列举其两厢暗合之事”（从人口、交涉等十九个方面论述），以证明佐藤一斋所言“往古之历史，是现世界，今来之世界，是活历史”之正确。作者比较推崇比较研究法，认为“一切之事，均不可不比较研究，非仅历史为然”。

22 日 中华新教育共进社创立。

该社由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等联合组织，目的是“直接输入东西洋学术，使我国固有之文化受新潮之刺激，而加速其进化率”。该社出版《新教育》月刊、《新教育丛书》，是其输入外国学术、观念的载体。

23 日 梁启超从北京动身前往欧洲考察。

梁启超将欧游途中所见所闻、观察感想等随时记录，后整理为《欧游心影录》（1920 年 3 月至 6 月以《欧游心影录》为题同时连载于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

是年

春，梁启超摒绝百事，专力于通史撰作。

数月间成十余万言，可见到的有《太古及三代载记》（含《三苗九黎蚩尤考》、《洪水考》、《古代民百姓释义》）、《纪夏殷王业》（含《论后代河流》、《禹贡九州考》、《又禹贡九州考》）、《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志语言文学》、《志三代宗教礼学》、《列子批注》。至农历八九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通史之作遂搁笔。通史之作停后，转而读佛书。春夏间，梁启超“治碑刻之学甚勤”，“所为金石跋、书跋、书籍跋最多”。

清史馆总纂缪荃孙返京布置清史编纂工作。

缪氏主张先拟目归卷，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柯劭忞、金兆蕃、奭良任国初；缪荃孙、吴士鉴任顺康；金兆蕃独任雍乾；夏孙桐、朱师辙任嘉道；王树枏任咸同；马其昶、金兆丰任光宣。实施过程中，总统府秘书吴士鉴因忙于公务，缪荃孙不久辞世，恰值张尔田回京，权以代任。

主持三井会社中国研究室的今关寿麿来华。

今关1931年归国。在北京十余年，每年巡游大江南北，与新旧各派学者如熊希龄、陈宝琛、金绍城、董康、陈三立、蔡元培、胡适、陈衡恪、康有为、黄侃、章炳麟、沈曾植、郑孝胥、李宣龚、吴昌硕、鲁迅、完颜景贤、梁启超、戴季陶、于右任、邹鲁等相识。

1922年曾撰写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界状况的小册子，分别概述中国南北中各地的新旧学派。1931年又据以扩展为专书《近代支那の学艺》（东京民友社）。

张穆撰、缪荃孙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1卷附校补1卷嘉业堂丛书本刊印。

1919 年

※《新潮》、《国故》创刊。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
※ 胡适发表《实验主义》、《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
※ 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发起“国故整理运动”。
※《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 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初编》。

1 月

1 日 《新潮》杂志创刊。

它由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潘介泉、毛子水等学生自发创办。胡适为顾问，校长蔡元培题写刊名。该杂志主要介绍西方近代思潮，讨论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问题，“目的是将年轻人的思想从僵硬顽固的成规陋习中解放出来”。

《新潮》明显受到《新青年》的影响，傅斯年在《发刊旨趣书》中指出，北京大学今“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此刊“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当时学术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

《新潮》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不如《新青年》激进。它最关心的是“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唤起群众对于学术的“爱好心”。而《新潮》的英文名字是“The Renaissance”，取“文艺复兴”之意，与国粹派主张的“古学复兴”非常接近。

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故书新评”栏目发表对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的评论。

傅斯年认为“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但在他看来，

"与其过而信之也，毋宁过而疑之"，因为中国人的通病在于"信所不当信"。梁玉绳此书"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富于一股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

9日　蔡元培、张相文为编纂《国史前编》上书孙中山。

蔡元培等"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并征询孙中山对清世秘密会党的意见。

孙中山复函，强调"信史"的编纂要求。他说，编纂国史"关系至重，亦不宜仓卒速成。要须经以岁月，几经审慎，是非照然，事实不谬，乃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耳"。孙中山表示不赞成"革命原起"始自秘密会党之说；他认为，"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当另编秘密会党史"。

11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284号刊载《通史材料征集议》。

第285号连载。国史编纂处名誉征集员马衡认为编纂历史，当以征集材料为先，而通史与民国史征集之法略有不同，民国史所宜征集者重近事，"取材于公报新闻者为多"，其"要点在从各方面探索各界之真相"；通史则范围较广，但由于"年堙代远"，征集艰难，故"非准诸实验，不足征信"。文章还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征集品，如书籍、金石、器物等材料的不同处理方法。

21日　国史编纂处附设"史学讲演会"召开。

鉴于在国史编纂处设立征集会由校中诸生担任征集员的效果良好，编纂处张相文等人认为"众擎易举事"，在考虑到"通史体裁宏博，门类繁重，非勤为搜讨，详加论究，万不能纲举而目张"，乃提出在国史编纂处附设"通史演讲会"，一月一集会来讨论诸史体例。

21日，蔡元培、张相文、马衡、马裕藻、叶瀚、沈尹默、陈中凡等52人在国史编纂处召开第一次"通史演讲会"，决议改名为"史学讲演会"，推举张相文为主席，并将讲演会分为"通史组"、"学术史组"、"法制史组"、"宗教史组"、"交通史组"、"经济史组"、"地学史组"、"风俗史组"。

26日　刘师培、梁漱溟、黄侃等发起组织国故社。

刘师培、黄侃等教师六人和"学生数十人"在刘师培宅中开"国故月刊社"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北京大学国故月刊社章程》，规定刊物名称为《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内容分为"通论"、"专著"、"译著"、"艺文"、"著述提要"等九项；人事安排上，刘

师培、黄侃被推举为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心孚等八人为特别编辑，张煊等十余人为编辑。

是月　《北京大学月刊》创刊。

1918 年 9 月 20 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根据此种思想指导，北大于同年 9 月议定出版刊登全校师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稿件的全校性学术刊物《北京大学月刊》，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编辑。这是当时北大唯一的学术刊物，故其内容“网罗各方面之学说”，为一综合性的期刊。

周瘦鹃编译《世界秘史》由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出版。

2 月

1 日　傅斯年在《新潮》第 1 卷第 2 号发表《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作者不满于已有文学史“于分期一端绝少致意，竟有不分时代囫囵言之者”的，而北大国文门教授文学史的分期办法，虽“大体可行，然于古今文学转变之枢机，尚有未惬余意者”，作者乃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四期：上古（从商末叶到战国末叶）、中古（从秦到初唐末）、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近代（自明弘嘉至今）。

12 日　屠寄任国史编纂处纂辑股主任。

国史编纂处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通告”，宣布“因文科学长（陈独秀）教务太烦”，无暇顾及国史编纂处纂辑股事务，特由校长商承教育部，“另聘特别纂辑员屠寄为纂辑股主任”。

是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该书是在胡适的留美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以及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讲义的基础上扩充改订而成，首次对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规定，使其从传统的学术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该书出版后产生了极大轰动。蔡元培的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毛子水谓是书不只是对读者讲中国古代的哲学，亦告诉读者研读一

切古代书籍的门径，从做学问方法的观点讲，这本书在我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余英时认为这部著作在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的同时，还在国故整理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史学革命”（或称“考证学革命”），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范”的地位。

该书在观念、方法等方面对当时的文史研究均有启发作用。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备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胡著的不足在于，对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订占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与其说是一部系统的“哲学史”，不如说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另一缺憾是，该书上卷在时间断限上止于先秦，他计划中包括中古、近世部分的下卷，终未成完璧。此书既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

此书日译本名为《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译者杨祥荫、内田繁隆，1925年由东京岩松堂发行，1939年出至第4版。

3月

7日 《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刊载国史编纂处向教育部提交的一年来工作报告。

据张相文、邓之诚撰写的民国史部分报告，长编已拟稿四十七册、列传三十余人；在通史部分，屠寄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对元史的本纪、列传、表志及相关史料整理，蒯寿田在上古、秦汉，陈浏在两晋，叶瀚在学术史等，都有进展。教育部特嘉许“成绩斐然”，勉励国史编纂处再接再励。

15日 《东方杂志》第3号转载《中华民族起源考》。

此文译自《字林西报》，系美国人类学协会远东事务部主任威廉士在美国人类学协会会议上宣讲之论文，对有关中国汉族起源的四种观点分别阐述，作者认为汉族起源于中央亚细亚之证据较其他观点更为确凿。

20日 《国故》月刊创刊。

本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黄侃在发刊词中表示“任典籍之散亡，则文武之道终于坠地，六艺之传承绝”，尤其是处于“国乱俗坏”、“数典忘祖”的时代，更要有志之士来“延古学之一线”。该刊栏目分为“通论”、“专著”、“艺文”等九门；其在思想上与《新潮》、《新青年》不合；形式上全用文言，不用新式标点；内容上发扬汉学传统，注重考据训诂。

创刊号刊发俞士缜《古今学术沟通私议》、《夏小正词例举要》、刘师培《毛诗词例举要》（第 2 期连载）、《礼经旧说考略》（第 2、3 期连载），许本裕《汉书艺文志笺》（第 2—4 期连载）、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第 2、3 期连载）、吴承仕《王学私议》（第 2—4 期连载）、陈中凡《诸子通谊》（第 2、3 期连载）、朱骏声《尚书学》（第 2—4 期连载）等。

30 日　王国维为沈曾植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序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是月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3 号发表《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

朱希祖认为，应将中国古书中有关历史、哲学、文学，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建筑、制造等记载"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其法"最要者是分析、比较、综合；而尤要者在乎经验"。以历史研究而论，"先须考核事实，用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顺序排比，然后以历史、哲学，及法制、经济等科学的眼光说明之。不合于事实的空议论，一概排斥"。

胡适在教育部会场作《实验主义》的演讲。

此文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实验主义"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斯，尤其是杜威的相关思想。胡适特别介绍了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法，认为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胡适对于"实验主义"的宣扬，为此后的"国故整理运动"和"疑古"运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演讲稿刊于《新青年》第 6 卷第 4 号。

4 月

1 日　傅斯年在《新潮》第 1 卷第 4 号发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傅斯年主张用"清代学问"比"汉学"和"朴学"称呼清代学术更合适。他将清代学问概括为四派五期，四派是朴学派、今文学派、理学

派、浙东学派；五期是胚胎时期（从王应麟到焦竑）、发展时期（从顾炎武到江慎修）、极盛时期（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等人的时代）、再变时期（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结束时期（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傅氏认为："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事业就是——（1）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2）清朝人的第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若是继续研究下去，竟把中国语言的起源演变发明了，也是件痛快事。（3）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以上的三种事业，必须用清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

是月　陈万言《西北种族史》由北京亚东制版印刷局出版。

5月

1日　杜威来华，在中国11省作巡回讲演，宣传实验主义。

杜威讲演，由胡适口译，毋忘、邓初民、郭绍虞笔记，在各大报上连载，影响颇大。其讲演活动一直持续至1921年7月。由于他的积极活动和胡适的大力宣传，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实验主义热潮。

毛子水在《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

文中肯定了乾嘉朴学至章太炎以来的清学正统派的成就，认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确有研究价值，但是不应将其与欧化对立，更不应以为其无所不包，而是要视之为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历史的材料"，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将"国故"变为"国新"。而用科学精神研究国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学的精神去采取材料"。

傅斯年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文后加了一个附识，他认为国故的研究对世界学术的发展，对于科学的事业，都是很有必要的。他说自己最佩服的是"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系统的事物来"，认为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

等等的材料上占有重要的部分。他把研究国故的手段分为两种：一是整理国故，认为这部分事业是很有必要的；二是追慕国故，认为这种态度是忘了理性，是愚不可及的。

这是《新潮》杂志上对“国故”问题进行讨论的第一篇文章。“整理国故”的名词正式由对国故的讨论而提出来了。

《国故》社的张煊等对毛子水的观点提出尖锐批评，坚持国粹无阻于欧化，认为国学之讲与不讲，实关系到国家存亡。毛子水又在《新潮》第2卷第1号发表《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反驳，认为张煊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倒自己的观点，说来说去“不过要把‘国’和‘故’争一个地位”，而且“许多说话毛病很大”，乃逐一订误。这意味着保守的《国故》一方和激进的《新潮》一方直接交锋的开始。

《国故》和《新潮》的交锋，引起了胡适的关注和回应，把“整理国故”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4日　“五四运动”爆发。

7日　刘鼒和在《北京大学日刊》第371号发表《日本文名辞考证》。

断续连载24期，至第406号结束。文章对日本语言中常用的一些文辞，结合中国古籍记载进行了梳理考证，如国权、国务、权利、宪法、警察、宣言、生活、自由等。这些文辞的梳理考证，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有助于中国人了解中国现代语言中从日本文中引入之新名词之根源。

11日　《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该专号刊载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附简译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政治经济学〉导言》)、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同期还发表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克水著的《巴枯宁传略》等。

这显示出，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李大钊主持下，《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15日　《东方杂志》第5号转载王宠佑《中国矿业历史》。

作者首先分析了导致中国开矿事业虽“数千年前已有发明，而至今迄不能发达”的地域、思想、心理等五个原因，然后参照西人所著之中国矿业历史，梳理了从上古到清代的中国矿业之发展历史。

6 月

26 日　英、法、日、美、意等国专使同意退还庚子赔款，但规定须将此款用于教育。

是月　蔡元培开始筹划刊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此一时期蔡元培不仅为刊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编订原稿，而且征求发起人与资金，并与商务印书馆和浙江公会商谈印刷事宜。1920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该书 51 册，1933 年又补出 13 册。

公民救国团在上海编印《国耻痛史》，旨在揭露近代以来日本侵华罪行。

7 月

20 日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 31 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针对安福俱乐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行为指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主张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8 月 3 日发表“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8 月 17 日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由此开始“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8 月

1 日　《建设》杂志在上海创刊。

本刊为中华革命党（10 月改为中国国民党）创办，亚东图书馆印行。孙文撰发刊词。胡汉民、朱执信等编辑。撰稿人有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汪兆铭、吴敬恒、李煜瀛、林云陔等。该刊共出 2 卷，每卷 6 期。1920 年 7 月停刊。

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杂志的一项重要内容。戴季陶、胡汉民、林云陔等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还连载了从日文转译的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全文。其中以胡汉民最为突出。他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第 1 卷第 3、4 号）、《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第 1 卷第 5 号）、《阶级和道德学说》（第 1 卷第 6 号）、《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第 2 卷第 4 号）、《考茨基底伦理观与罗利亚底伦理观》（第 2 卷第 6 号）等文章。胡汉民不仅客观地介绍唯物史观，而且应用唯物史观来解释

道德、伦理和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与胡适展开古代井田制问题的辩论。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并没有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社会科学体系，而只是当作欧美政治经济学说中最新的、比较有势力的一种来加以研究”。也许正是因为基于这一立场，《建设》杂志才能以尊重的态度介绍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是月　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更名为史学系。

因国史编纂处被国务院收回，北大评议会决议将中国史学门更名为史学系，以康宝忠为主任，分立后北大史学系开始添设西洋史课程，陆续聘请了王徵、杨适夷等人担任西洋上古史及西洋通史教员，并且增设不少新课，如哲学史大纲（胡适）、史学史（朱希祖）、法制史（康宝忠）、金石学（马衡）、外交史（姚恨吾）等，文科教员开始加入史学系的阵容之中。

朱希祖谓此为史学系的第一次改革，其最主要的变化即在于改一国之史学为世界之史学。当时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说：“北大新文学运动，那是人所共晓的。至于史学的革新，却为一般人所忽视，民初蔡元培长北大，初设史学系，大家都不大重视，凡学生考不上国文学系的才入史学系，但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

王国维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一文。

作者云：“宣统元年，吴县蒋伯斧郎中《跋巴黎所藏摩尼教残经卷》，附考摩尼教入中国源流，仅及唐会昌而止。后上虞罗叔言参事印行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一卷，法国伯希和教授译之，后复附《摩尼教考》，并增宋世摩尼教事实，较蒋君所考甚为该博。伯氏书用法文，余曩曾抄撮其所引汉籍。数年以来，流览所及，颇有增益。”

9 月

20 日　《国故》月刊遭新文化运动冲击，出至第 4 期后停刊。

是月　王国维撰《西胡考》、《西胡续考》。

8 月 17 日，致书罗振玉商量撰《西胡考》事，信云：“前日在君楚处见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职演说，始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术之进步。伯君此文益将近日发明及研究之结果总括言之，于学术关系极大，故榊博士为译之，载诸《艺文》杂志上。其所言新疆南北路古代多行波斯一派之言语文字，此发明至为重要。因忆我国古书西域诸国汉时谓之西胡，自晋宋以后专称之曰胡。唐人于突厥及胡分析至严，盖胡者实自西域西迄波斯之总

名，而北之突厥南之梵皆不与焉。近来言语学之发明与古籍吻合，岂非大快欤。维因拟作《西胡考》，将古书所云胡者集为一书，亦快事也。”

10 月

14 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 460 号刊载何炳松编译《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

此文断续连载 33 期，至第 531 号结束。该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历史是何物；第二章教授历史的目的及价值；第三章欧洲各国学校中之历史教授；第四章美国学校中之历史教授；第五章历史教授法之由个人入手者；第六章历史教授法之由社会入手者；第七章如何能使历史有实在的风味。其中一些观点值得注意，如何炳松认识到“历史与化学物理不同”，但是最后又承认历史一科“仍不失为一种科学”，因为现在有名的史家，“莫不以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历史”，而现在史学之发达，“就是受科学思想的影响”。

17 日 南开大学成立。

南开大学于该年 9 月 25 日开课，10 月 17 日是南开学校十五周年纪念日，宣布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分文、理、商三科。历史学门隶属文科，建校伊始即已设立，但师资力量较弱。1921 年聘请梁启超任教南开大学中国历史课程后有所改善（梁氏在此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3 年正式成立历史学系，聘请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蒋廷黻到南开历史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此后又聘请了刘崇鋐、蔡维藩等任教于此。

25 日 刘文典在《北京大学日刊》第 469 号发表《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

第 470、471 号连载。刘文典从梳理中国接受西方的过程，即从枪炮技艺到思想文化的过程，批评了后来出现的以中国古典学术思想附会西方学术思想的观点，认为这不是中西学术沟通的心态和方法。刘文典高度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就，认为“是中国近代一部 Epoch making 的书”，就是西方人写西方的哲学史，也只有两个人和胡适这样有成就。刘文典所认同的中西学术沟通，就是胡适这样的，“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虚体面的客气，晓得了近世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明白了学术之历史的发达路径，把中西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文明的化合”。

30 日 胡适在《新潮》第 2 卷第 1 号发表《论国故学——答毛

子水》。

这篇文章是他为回应北京大学进步与保守的两派青年围绕“国故”问题的争论而作。胡适提出，做学问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具有同等价值。“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是月　王钟麒在《新潮》第2卷第1号发表《拟编高等小学史地教材的大纲》。

王氏对当时高等小学史地教材提出了批评和改革意见。顾诚吾在此文前序中指出，“现在通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哪一种不是以皇帝做本位的？皇帝的统系，便是历史的统系”。尽管二十年前梁启超已经批评“二十四史是皇帝的家谱”，“哪知到了今天，民国学校里教授给孩子的功课，依然是一部大家谱收缩而成的小家谱”，这样怎能有利于培养除掉做皇帝的思想、培养现代国民呢？顾氏认为王钟麒拟编的历史教材，“注意于民族的演进，文化的演进，社会的推嬗，教学生心里有真确的历史观念”，只有“历史观念准了，自然为学立行，也能照着进化的轨道上走去，不会倒行逆施梦想复古了”。

汉民（胡汉民）在《建设》第1卷第3号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

第4号连载。胡汉民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他还列举了以唯物史观考察哲学史的六条要义：一、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二、社会的关系和社会物质的生产不能调和，于是成为问题；拿一种主义理想调和社会的关系，于是发生学说。一切主义理想，皆是历史的生产物，又是移动的生产物。三、哲学有两重目的：理论的目的，关系时代一般智识发达的程度；实践的目的，关系社会生活的状态及社会个人的要求。四、社会的生活如何、要求如何，直接支配哲学者之头脑。五、考察时代及国民的生活所向，提出明了的人生观，是中国哲学家共同的本领。六、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可以得中国哲学盛衰变迁的原因。

胡汉民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时势说”。他对胡适列举的求因的三个方面逐一进行解剖。他认为，个人才性对于评判单个哲学家的确重要，但对于评判一个时代的思想就并不重要了。其次，所受的思想学术，它本身是不变的，之所以发生变化，还是离不开时代的影响。至于

时势，它比前两个原因更为重要。但胡汉民并未停留在时势上，而是进一步追索，他说："时势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胡汉民还承认"经济事情是一个最重大的原因关系"。

具体到先秦哲学的发生，胡汉民认为井田制度的崩坏是最重要的原因。春秋战国时代，人口增长、商人势力膨胀等问题的存在，使井田制难以维持，井田制的崩坏使整个社会生活根本动摇。影响及思想领域，老子以次的哲学由此产生。

11 月

15 日 《东方杂志》第 11 号刊载杨昭悊《近世经济思想之变迁》。

作者认为"经济行为足以促进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又足以支配经济行为"，"近世以来，经济行为千变万化，经济思想，亦日新月异，惟以思想能支配行为，故一种思想之发生，必有其前因后果之关系，影响于经济学者甚巨"。历代研究经济者因为观察点不同，各有偏重，于不同之处，"所发之问题独多"。作者乃"就近世经济学派，考起思想之变迁"，撰成此文。文章关注的经济思想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正统学派、历史学派、社会改良主义等。

20 日 刘师培在北京病逝，享年 36 岁。

刘师培因患肺结核病，最终无治，逝世于北京和平医院，享年仅 36 岁。刘师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指出，刘师培撰述的著作"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学校教本六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钱玄同在《刘申叔遗书·序》中将刘师培与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炳麟、孙诒让、蔡元培、王国维、崔适并列为 1884 年开始中国文化"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并认为刘氏最精要者有四，"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

刘师培死后，著作一直未能整理，1934 年刘师培旧友南桂馨决心搜集刊行全部刘氏遗书，在钱玄同、郑裕孚、陈中凡、刘文典等友人学生的帮助下，1936 年刊印了收录刘氏 74 种著述的《刘申叔遗书》。2008 年，广陵书社又出版了万仕国辑校的《〈刘申叔遗书〉补遗》。

是月　胡适在《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5 号发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第 7、9 号连载。作者通过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其主要点即是在占有一定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假设，然后再细心搜求事实，以证实假设是否可以成立。其间证据是关键。

胡适说：“清儒之所谓汉学者，一名朴学，对于宋儒之理学而言，不外文字训诂校勘考订之学。而其治学之法，不外两事：曰‘大胆的假说’，曰‘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此欧儒之所以治科学；而吾国惟治朴学者为得其意焉！”文章以“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作结。

胡适此说在史学界影响甚为深远。钱基博认为此文揭示了“新汉学”的旗帜与主要理论。他指出：“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附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

后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内容也有修改。

郭浠汾（郭绍虞）《中国体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约六万余字，初步梳理了中国的体操术、拳术及其流派、剑术、射箭、舞蹈、游泳、蹴鞠等，并探讨了中国体育与道教、佛教的关系。此书是中国第一部体育史著作，商务印书馆此后多次再版，《郭绍虞学术年表》称胡适曾将此书推荐为大学教材。

12 月

22 日　缪荃孙病逝于上海，享年 76 岁。

是月　胡适在《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标志着“整理国故”作为一面学术运动的旗帜正式扬起。

这篇说明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名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纲领，体现当时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

胡适把“整理国故”列为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之外，为了达到“再造文明”目的提出的对于旧文化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手段。胡适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概括新思潮的基本精神，他指出，在新思潮运动中，人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都应抱持一种“评判的态度”。所谓“评判的态度”，指的是现代中国人应该怀着“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的态度，来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

是年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出版。

此刊本印制精良，较 1915 年上海右文社本增加《齐物论释》重订本、《太炎文录补编》、《葑汉微言》三种，《文录》也略有删改。

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初编》。

由张元济主持，这套丛书从 1919 年底开始印制，于 1922 年底出版。丛书收四部图书 323 种，8548 卷。1926 年至 1929 年重印时加“初编”序次，称《四部丛刊初编》，抽换了 21 种版本，并对一些古籍加作校勘记，仍为 323 种，但卷数增加为 8573 卷。《四部丛刊》以所印古籍底本精善而享誉学林。

当时曾积极参与这项工作的叶德辉追述《四部丛刊》的刊印缘起和过程云：“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襄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

《四部丛刊》是近代著名的善本丛书，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称誉说：“《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余册之多，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准，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经部收《十三经》单注本及《大戴礼》、《韩诗外传》、《说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鉴》、《国语》、《国策》。而如同一普通之丛书，如《通志堂经解》、《经苑》、正续《皇清经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诗》等，则一切不采。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

至于《四部丛刊》的缺点，叶德辉指出：一、没有包罗杨氏海源阁所藏“四经”、“四史”之善本；二、因经费关系，没有收入日本各图书馆所藏善本；三、采印者有“明刻中下乘”之书。（《书林余话》卷下）神田喜一郎在《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中检讨说：“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源，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幸此书尚须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

一完美之大丛书。”

褚德彝续补《金石学录》2 卷由石画楼刊印。

此书增补李遇孙《金石学录》和陆心源《金石学录补》二书，收录清至民初研究和收藏三代青铜器者 232 人。作者对所收之人，“学术行谊，不敢妄加评骘”。

王树枏《希腊学案》4 卷新城王氏陶庐丛刻本刊印。

1920 年

※ 李大钊开始介绍唯物史观。
※《建设》第 2 卷第 1 号开始井田制问题的讨论。
※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成立。
※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史地丛刊》创刊。
※ 胡适完成《〈水浒传〉考证》。
※ 朱希祖接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推行史学系改革。
※ 柯劭忞《新元史》成书。

1 月

1 日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 7 卷第 2 号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作者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孔子及其学说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二千余年，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二千年来没有很大的变动，孔子的学说适应这种农业经济状态的原故。而现在，"时代变了，西洋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压迫而生动摇，那么建立在这个经济结构上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及其全结晶体——孔子主义就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断断没有人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此文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思想史的论作。

《建设》第 2 卷第 1 号开始井田制问题的讨论。

参加这场讨论的主要有胡适、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季融五等。胡适从怀疑史料的真实性入手，认为井田制乃是孟子为"托古改制"而构建的乌托邦，汉代有心救世的学者，依据孟子的话，逐渐补添，演绎成井田论。胡适进而建立起"井田论沿革史"的假设，并谓："井田论的史料沿革弄白了，一切无谓的争论都可以没有了。"

胡汉民说，井田法虽不可详考，总是土地私有权未发生的时代，共有共用土地的习惯之整顿方法。廖仲恺则假定井田制是“上古由游牧移到田园、由公有移到私有当中的一个过渡制度。”

胡汉民、廖仲恺的研究方法与胡适有明显的分野。胡汉民从斯宾塞以外“其他社会学者底著书，及蛮地施行家底报告”中寻觅通则，说明欧洲农耕民族土地共用现象，并推论中国古代井田制的实施情形。廖仲恺借鉴了西方社会科学成果。他通过“考究欧洲古代‘均产制度’沿革和经济农政学者对于土地公有私有问题互相聚讼的学说”来证明中国井田制度的存在。

一位外国学者在总结 1920 年的井田制辩论时说，参加者不仅更完全的利用原有的材料，而且还企图将中国农业的发展和欧洲相似的过程连贯起来。他指出这次辩论的功绩之一，就在于“把中国的学识和在社会科学中那些成就——欧洲的科学常以此自傲的——结合了。”而且他认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唯一可能解决问题的道路。

“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则从中受到另外的启示。他说：“适之先生在《建设》上发表的辨论井田的文字，方法正和《水浒》的考证一样，可见研究古史也尽可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这点明了其著名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的渊源所自。童书业即认为，“井田辨”是七大册《古史辨》的前驱，在“古史辨”中充满着胡适“井田辨”的精神。

2 月

江绍原在《新潮》第 2 卷第 3 号发表《耶稣以前的基督》。

第 4 号连载。江绍原认为宗教学的左右是宗教历史、宗教哲学，“讲宗教历史以明宗教过去之变迁，讲宗教哲学以明宗教将来应趋的方向”。作者指出“独脚的宗教学跳不出好戏来”，所以北京大学在添加宗教哲学功课后应该“竭力提倡宗教历史的研究”。该文就是取材于德英美学者“研究初期基督教原始基督教的著作”，来介绍基督教早期的历史。

陈怀《清史要略》由北京大学出版。

该书将清代历史分为“崛兴时期”、“隆盛时期”、“衰弱时期”、“灭亡时期”四个时期进行梳理。中华书局 1931 年 2 月重新出版该书。

3 月

10 日　陈垣在《东方杂志》第 5 号发表《开封一赐乐业教》。

第 6、7 号连载。

31日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在李大钊主持下，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等19人，联名发起组成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会员发展到120多人。

1921年11月17日，该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刊登启事云，“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研究的方法分四项：（1）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2）讨论会；（3）讲演会；（4）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此为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该会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和造就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是月　梁启超自欧洲考察返国，决意弃政从学。

梁氏决定自此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国民实际基础之教育事业，如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等。其本人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

4月

皮锡瑞《经学通论》4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发现其《经学历史》一书虽从总体上大致勾勒出经学发展的时代脉络，但未将每一经的传授源流厘清。于是又撰《经学通论》，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简要论述了《易经》、《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五种儒家典籍的撰著流传、内容大意、历来考订注疏的得失、诸家研究门径等问题。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由香港社会主义研究所出版。

5月

5日　顾颉刚致函罗家伦谈研究计划。

顾氏函云：“期以二十年，我始可成三部书：（1）《世界文明史》，（2）《中国文明史》，（3）《中国书籍目录》。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目录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大概用学、派、时、地、人等来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这固然是终身的事业……我想有了这一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

《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13 日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成立。

其前身是成立于 1919 年 10 月 1 日的地学研究会。1920 年 5 月 13 日开会，“初会员鉴于地学与史学，似不宜偏此忽彼”，决定改地学会为史地研究会，通过简章。

该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和其他科系学生的联合组织，成员以文史地部学生为主，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会员人数大体维持在百人左右，诸葛麒、陈训慈、胡焕庸、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陆维钊等人相继担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柳诒徵、竺可桢、白眉初、王毓湘、朱进之、梁启超、徐则陵、陈衡哲、顾泰来、萧纯锦、曾膺联、杜景辉等担任指导员。其中史学方面主要有柳诒徵、徐则陵、陈训慈、缪凤林等。

该会定期举办学术演讲，有徐则陵的“史料之收集”、“新史学”，柳诒徵的“史之性质与目的”，缪凤林的“历史与哲学”，陈训慈的“何谓史”等，并经常请外校及外国学者演讲。

史地研究会成立后开始着手筹办会刊。研究会第二届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从事会刊的筹备和地质考察。“本会以中国史地界之沉寂，拟就力所能及，出其一得，以供社会之商榷，久蓄此意，至本届始决定”；创办出版会刊——《史地学报》。此外，他们还先后办有《史学与地学》、《地理学杂志》(《方志月刊》)、《史学杂志》、《国风》、《史地杂志》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柳诒徵、竺可桢、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胡焕庸、向达等人发表了大量史地学方面的文章。

1925 年东南大学发生学潮，柳诒徵于 6 月率缪凤林、景昌极、郭斌和等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会中骨干也多已毕业离校，该会遂涣散解体。

是月　影印《四库全书》开始酝酿。

法国总理班乐卫来华，建议退还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当时徐总统允许影印后，分赠法国总统及中国学院，并明令派朱启钤督办其事，又派陈垣往京师图书馆就文津阁书实地调查架函册页确数，以为入手办法。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由北京武学书馆出版。

此书分三部分：第一原史，阐述了文字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起源、史之进化、史学之目的、史之界说；史与科学；第二读史，讨论了史识、

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之法、史料整理之法；第三作史，论列了家法、编体、史病、重事实、务贯通、明因果、作表解。

此书融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旧学新知。李泰棻深受近代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大量引用西方学者言论。首先是德国兰克史学，在其著作中屡屡称引。其次是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思想，本书全篇译载了鲁滨孙《新史学》的第三章。再次为伯伦汉姆、瑟诺博斯、塞诺波等人的思想。其讨论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法、史料整理法，参考了英译本《史学原论》。李氏对日本史家也有所参考，尤其坪井的《史学研究法》。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及近代史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如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陈黻宸等人的史学思想。

李氏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借取，最接近何炳松，而比何氏更多“综合融贯”的功夫，更侧重于应用。同时，李氏对晚年梁启超也有影响。据说，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就参考其《史学研究法大纲》。柳诒徵认为“史学革命”之后，新史学之书，不及旧者甚多，然能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

1921年4月该书再版。经过增订，又散见于第5版《西洋大历史》及第2版《中国史纲》绪论。

蔡元培在《新潮》第2卷第4号发表《美术的起源》。

6月

10日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史地丛刊》创刊。

编辑部主任何炳松撰《发刊词》云：“溯自达尔文（Darwin）人类进化之说兴，历史之观念大变”，“夫研究人类进化之陈迹者，史学家之责也；研究人类进化之现状者，地理家之责也。乃进化之说，不出诸史家之口，而出诸研究动物学之达尔文，与研究地质学之利爱尔，宁不可耻。抑有进者，自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日新月异，而要以进化二字为宗。返观史地著述，犹是陈陈相因，以‘明灯’、‘殷鉴’诸旧说炫世人之耳目。一若研究历史地理之徒，不识进化二字之于意云何。岂非可异之事耶。”因而提出：“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研究地理者，当观察地理与文化之关系，以资借镜而谋改善。必也知己知彼，博古通今，然后史地之为义始明，史地之为用始著，而吾辈研究史地之责始尽。”

该刊的投稿标准是“以关于历史地理之范围为限，其能阐扬史地学理以活用于现实诸问题者尤所欢迎”。

《史地丛刊》第 2 期出版后，因种种原因停顿多时。南高史地研究会深表惋惜，“北高《史地丛刊》，自《地学杂志》外，实导史地界定期刊物之先”。北高师史地学会与南高师史地学会甚为投契，双方互相交换会刊，“声应气求，志趣相合”。

15 日　陈垣等开始对文津阁《四库全书》作全面清点。

参与此次清点工作的有樊守执、杨韶、王若璧、李倬均、李宏业，另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和刘乃和等人回忆，参加这次清点工作的还有张宗祥、王冷斋等人。8 月 22 日清点工作全部完成。此次整理对其中每部书的册数、页数都做了清点和统计，列出书名、作者，并做索引。陈垣及叶恭绰等逐册清点，历时 3 月余，成《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全书计 36277 册。

1921 年，教育部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印成样书。1932 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完成《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

是月　《史地丛刊》第 1 卷第 1 期刊载杜威《历史和地理的意义》。

此文由吴相如摘译自《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认为一种学问最大的目的是“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使人有创造的思维力”。“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只是现在生活情形和问题”，“历史的自杀政策就是不顾现在的社会”。杜威还指出：“我们倘若是单只知道一个英雄的传记，而不注意社会的情形，和他当时种种现象，以及使他能够成为英雄的种种事实，那不算研究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全体的。”

关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杜威认为：“经济史比政治史更合人道，更合平民主义，解放的作用也比政治史大些。它所讨论的不是某种属地之存亡，某种权威之升降，乃是讨论一般人的自由幸福之发达。故不可不研究。”“实业史所讨论的是人类怎样去实现他的目的，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之成功，或失败，其功用比政治史自然好得多。”杜威还从人类知识发展的角度提出应重视思想史、知识史的研究。他说，过去“大抵学校所最不注意的就是思想史”，实际上通过思想史和知识史人们可以“明白野蛮人进而为文明人所经过的情形和发明，与夫一切所经过的阻碍和打破这些阻碍的方法”。

《史地丛刊》第 1 卷第 1 期刊载杜威夫人《历史学之研究》。

随杜威一同访华的杜威夫人在北京作了题为“历史学的研究”的讲演，由邬翰芬笔记。其中指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人们所需要的是新的活的历史，它“不是仅仅留心少数人的行为，为几个帝王英雄豪杰做

年谱的，乃是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

吴相如在《史地丛刊》第1卷第1期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意见》。

作者认为：“今欲铲除旧史教史者之弊，革新之方法在从‘经济’和‘思想’两方面为着眼之点。”因为“由经济界之种种变化，观察社会制度习惯之种种变迁，既与现代生活相接近”，又有助于人们思想能力的培养，使其“对于人生之见解，格外明了”。他还认为，思想的发展与经济同样重要。因为“思想为一切生活之基础，凡文艺、学术、道德、政治莫不出于是。则究其递演之程序，而现状以致此，因果之关系，不难了然于胸中也”。历史上不乏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学说。如“希腊之亚利士多德，欧陆中古千余年之思想，不能出其范围。吾国之孔子，其学说亦支配中土人心二千余载”。

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了1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

8月又发现2件。此发现推翻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没有旧石器的说法。

7月

23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决定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李大钊正式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

27日　胡适完成《〈水浒传〉考证》。

此为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传》一书所作长序，对《水浒传》故事的来历、流传、变迁和成书的过程，以及版本的演变，作了有条不紊的剖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运用历史演进法的新模式。该文是胡适考据学文章的代表作之一，是其方法论的一个实际运用，“是替将来的‘水浒传专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做了一点历史的考证”。

此文对正在形成“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念的顾颉刚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种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8月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所出版。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全译本。此书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由于出版印刷仓促，书名误印成《共党产宣言》，因为封面马克思的头像是红色的，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首版只印行1000册。9月，再版重印，改正书名，换成蓝色头像，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恩格儿（恩格斯）著、郑次川编译、王岫庐（王云五）校订《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此书只是翻译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第三章，文末附考茨基的《恩格儿传》。

9月

1日　陶孟和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新历史》。

此系作者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的演讲辞。陶氏以“新历史”为题，指出旧史四点弊端，新史学产生与进化论、科学的关系，历史之用处。这篇演讲稿受鲁滨逊的影响，他向读者推荐研究历史应读之书中，《新史学》英文本是第一种。

是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学社丛书”。

1920年3月4日梁启超欧游归抵上海，当天就向张元济提出了“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的想法。梁氏的计划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同月17日共学社便告成立。同年9月，共学社译辑的新书开始印行，丛书分为“马克思研究”、“文学”、“史学”、“时代”、“社会”、“罗素”、“政治”、“教育”等17小类，共86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构成了“史学丛书”，也是该丛书中不多见的自著著作。收入该丛书的还有（德）考茨基著、陈溥贤译《马克思经济学说》（1920年9月），易家钺《社会学史要》（1921年8月）、《西洋家族制度研究》（1922年1月），（德）考茨基著、徐六几等译《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1922年10月），朱枕薪编译《俄国革命史》（1923年11月）等。

《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租界。

《新青年》自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基本任务。开辟“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讨论”、“俄罗斯研究”等栏目。曾发表《新青年的新宣言》，指出刊物应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 20 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具有两方面开创意义：一是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

顾颉刚北大毕业后留在图书馆编目。

（日）河上肇著、李培天译《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10 月

9 日　徐世昌下令影印《四库全书》，由朱启钤督理相关事宜。

15 日　马叙伦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

作者提出从系统整理各类学术资料和研治传统学术两方面入手清理文化遗产的计划，并规定了搜集文献和文物古器实物材料的具体步骤方法。提出，我国传统学术遗产虽丰，但以西方现代科学视之，不免有“浑沌紊乱之景象”，“故今日欲阐扬吾国固有之学术，其道尤要于先整理”。整理之法，当“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补助”，具体措施有派遣深通国学的学者、学生留学海外，有计划地整理“学术之材料”、搜集整理各种文献和考古实物等，方能推动学术事业的进步。

梁启超在《改造》第 3 卷第 2 号发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会》。

是月　李大钊开始任教北京大学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课。

（美）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陶孟和校《经济史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为 1902 年出版的题为《历史的经济解释》（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小册子。作者提出以经济史观之名取代唯物史观。因为自然、气候、生物等皆为物质因素，唯物史观所指过宽，不如经济史观直接明确。“经济史观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却实在没有共同的地方。”“社会主义是‘应当怎样’的学说；历史唯物论是‘已过的事实是怎样’的学说。前者是讲结局的，后者是叙述的。前者是空幻的理想，后者是解释的准

绳。”“所谓经济史观者，并非只拿经济来解释历史，乃‘人类进步中最要紧的东西，是属于社会方面的；而社会变迁的重要元素确是经济的元素’。经济史观不说经济关系是唯一的改变社会进步的势力，他说经济关系有影响社会进步最大的势力。”

唯物史观派的先驱李大钊和胡汉民都受塞氏的影响。

高一涵编《欧洲政治思想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实际上只探讨了希腊时期（所谓“城市国家时代”）、中世纪时期以及西方近现代（所谓“政教冲突时代”）的政治思想，尤其是重点探讨了欧洲近现代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

1923年高一涵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欧洲政治思想史》三册，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希腊罗马至近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

（英）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由新青年社出版。

11月

5日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在台湾刊印。

1920年12月27日出版中册，1921年4月28日出版下册。该书体例仿《史记》、《汉书》体例，记载隋大业元年（605）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1290年的台湾史事，有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及附录。

日本人在占据台湾后，推行“皇民化运动”，连氏撰写此书之目的在于告诉台湾人民，台湾三百年之历史，乃汉人移民开拓史，台湾人应该认同中国，抵抗日本殖民化。章太炎、徐炳昶等人为该书作序，称赞此书的爱国情怀和开创之功。来新夏等研究者认为，该书以“爱国思想为指导”，对台湾历史进行梳理叙述，“成一方之全史”，具有重要价值。

是月　顾颉刚开始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胡适以自藏《古今伪书考》借给顾颉刚阅读，并鼓励其标点此书。顾颉刚借此机会，将古今造伪和辨伪的情况梳理清楚，并打算不单单从事《古今伪书考》的标点校注，而要将前人辨伪的成绩算一个总账。这个工作将此后的“古史辨”运动之准备工作又推进一步。

易家钺《西洋氏族制度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月

1日　李大钊在《新青年》第8卷第4号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认为用唯心史观所写的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以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掠夺”，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文章并指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作者指出，旧的历史研究法“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新的历史方法“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动力与指导力”。并指出两种历史方法根本区别在于把社会的发展看作“天意所存”或是“人力所造”。

5日　刘秉麟在《太平洋》第2卷第8号发表《中国租税史略》。

第9、10号连载。刘秉麟翻译美国人亚当斯《财政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后，因其书详于美制而于东方制度忽略，乃撰此文为补充。此文言简意赅地梳理了中国租税制度的变迁发展，是较早研究中国赋税制度史且有影响的一篇论文。

7日　北京政府国务会议批准在南京成立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制而成。1921年10月，东南大学开始招生。东南大学文科包括国文、历史、外语、政治、经济、哲学六系。柳诒徵、姚永朴、谢无量、徐则陵、汤用彤、陈中凡、施学齐等任教于此，文史学科的力量较南高时期有所增长。

25日　梁启超在《地学杂志》第12期发表《佛教东来之史地研究》。

该文系梁启超《中国佛教史》之一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学者赴印度参研佛学的历史和赴印道路。该年梁启超有作《中国佛教史》的计划，所以有十二篇关于佛教问题的文章如《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教与西域》、《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等。

是月　施肇曾和陆起发起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施、陆等人敦请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为馆长。唐文治为桐城吴汝纶高足，旧学功力深厚，且善于治校。国学专修馆在其领导下，一直名师荟萃，学风淳厚。当时的老师有陈衍、金松岑、李审言、孙德谦、钱基博、顾实等；先后培养出唐兰、王蘧常、吴其昌等学者。

顾颉刚着手编辑《辨伪丛刊》。

顾颉刚计划将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三书编为《伪书三种》并拟作《伪书考》跋文，将伪书所托时代、造伪书的时代、宣扬伪书者、辨伪书者、根据伪书而造成的历史事实列为五个表。顾颉刚认为此文如果能够做好“便是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史，跌到二千年的史；自周以前，都拿他的根据揭破了，都不是‘信史’”。胡适对此项工作予以支持，并认为“第五项尤其重要”。

1921 年 1 月，顾颉刚改计划为编辑《辨伪丛刊》，将三书作为丛刊第一集。后顾颉刚扩大了此丛刊的编辑，共收古代辨伪著作十一种，分三类：（1）通论四种，即张西堂辑《唐人辨伪集语》、白寿彝辑《朱熹辨伪书语》、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2）经学四种，宋郑樵《诗辨妄》、王柏《诗疑》、顾颉刚辑《书序辨》、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3）子学三种，赵贞信辑《论语辨》、宋高似孙《子略》、明宋濂《诸子辨》。1926 年 7 月《诸子辨》出版始，至 1933 年 7 月《左氏春秋考》出版止，全丛书出竣。

《史学年报》所刊《印行〈辨伪丛刊〉缘起》指出，“研究历史，首须审查史料以去伪存真。一切文籍器物莫非史料，莫不待审查，故考订之学兴焉。我国古籍至繁，伪者亦众，苟不于著作人、著作时代，及其所记者之然否一一辨明之，则伪品得以肆其欺罔，作史者必将错认虚言以为事实，而举世之人胥受其愚矣”，此书之编，目的在于“鼓起学术界审查史料之勇气”。

王襄编纂《簠室殷契类纂》由天津博物院石印出版。

该书正编 14 卷，依《说文解字》部次排列，收 873 字，附编 1 卷，收 243 字，存疑 14 卷，收 1852 字，待考 1 卷，收 142 字。所收文字取材于《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等书及王氏所藏甲骨。该书为中国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将文字分门别类，按部排列，方便检索，其编辑体例基本为后来同类书沿用。1929 年出版修订本。

是年

朱希祖接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推行史学系改革。

朱氏到任之初即聘请陈衡哲开设西洋史课程，作为他持续西洋史建设的第一步。他认为“本国史与外国各种史，须汇通观之”，现代史学对此绝不能有所偏废，因此极力要提高西洋史课程的比例，其目的一方面是为

了要改变史学系此前偏重中国史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更有“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之意。

朱希祖大幅度调整史学系的课程。他按照“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理念改造北大史学系的课程系统，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政治学、宪法、经济学之类视为史学的基本学科，并规定为史学系的必修课；为贯彻其史学科学化的构想，延揽归国学人或是与其志同道合者，如李大钊、陈翰笙和李璜等人，进入北大史学系讲授当时流行的西方史学观点，并请原本开设历史研究法的何炳松讲授新史学；朱氏还提高了专门史的课程比重。

柯劭忞《新元史》成书。

柯氏在清史馆任职期间就开始修撰《新元史》，1920年修成，1922年刊行。因《新元史》之作，柯氏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衔。

《新元史》有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外附目录1卷。仿照纪传体正史体例，与《元史》相比，也有增删损益。在《本纪》中，旧史将元太祖以前史事混叙于《太祖本纪》中，《新元史》则专立《序纪》一卷叙之。改旧元史《顺帝纪》为《惠宗纪》，又新补入昭宗纪。在《表》中，合并旧史《宗室世系表》及《诸王表》为《宗室世系表》。在《志》中，分旧史《礼乐志》为《礼志》、《乐志》，合旧史《祭祀志》、《舆服志》为《舆服志》。在《列传》中，分旧史《儒学志》为《儒林》、《文苑》二传，改旧史《良吏传》为《循吏传》、《孝友传》为《笃行传》，删旧史《叛臣》、《奸臣》、《逆臣》三传，新增入《蛮夷传》。《新元史》或有照录旧史原文之处，但大部分由柯氏自撰，故新、旧二史体裁略有不同，而文字几乎全异。

《新元史》成书较晚，吸取了前人元史著作之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 参照西方史料，补漏正谬；(2) 参照《元秘史》补订旧史；(3) 参照《经世大典》增补旧史之阙；(4) 参考元人文集以补旧史列传。该书也有一些缺漏之处，主要表现在：(1) 同为一事，前后屡出；(2) 译音无定，一字数译；(3) 人名、地名、纪年、纪事、世系之误；(4) 取舍删改不当；(5) 史料不注出处。柯氏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变革时代，《新元史》撰著于新文化运动勃兴之际，他仍固守旧思想、旧观念，体现出与时代思潮的隔膜。

王桐龄说：“二十四史之中以《元史》为最芜杂，搜集史料太草率，编辑时间太仓猝，后人欲纠正整理之者甚多……柯凤孙先生为吾国宿学，以四十余年之精力整理《元史》，根据《永乐大典》及金石文字与西方史料，对于旧史加以订正增补，删其繁乱，正其谬误，补其阙憾，使有元一

代百余年间之事迹一一罗列，若指诸掌。”王森然评价《新元史》“详博周备，取舍有法”。

王国维则对《新元史》持保留态度。萧一山《清代通史·清学者著述表》中说：“余曩在梁任公先生座次，逢王静安先生，谈及《新元史》书，均以未叙体例及取材为憾。”徐仲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中也说：“先生谓：《元史》乃明初宋濂诸人所修，体例初非不善，惟材料不甚完备耳。后来中外秘籍稍出，元代史料渐多，正可作一部新元史补正，以辅《元史》行世，初不必另造一史以掩原著也。”

刘师培遗著《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由北京大学出版。

1917年秋，刘师培经章太炎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史”，此书即是当时讲义汇集而成。第一课为“概论”，第二课为“文学辨体”，第三课为“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第四课为“魏晋文学之变迁”，第五课为“宋齐梁陈文学概略”。刘师培援引大量的资料，梳理了当时文学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时代特征，并对作家风格、师承源流等进行探讨。由于文章系讲义，且因时代原因，该讲义也存在一些疏漏，比如基本忽略了陶渊明等，不过这些问题并不能否定此书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颇有水平的一部，故该书今天仍是文学史基本专业书籍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叶德辉《书林清话》由长沙叶氏观古堂刊印。

该书共126篇，用笔记体裁对我国版刻图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每篇先阐明作者自己的见解、观点，然后排列资料作为论据。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书史，其对中国古籍版本的深入研究，对版本研究独立成一门学问影响重大。1928年叶德辉侄子将若干未定稿编为《书林余话》二卷铅印出版。民国期间此书曾有扫叶山房影印再版，1957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此书。

李大钊作《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作者运用唯物史观，依据地下发掘和古文字的演变，结合伏羲画八卦、“神农结绳为治”等古代传说，认为我国原始社会经过畜牧业经济发展到农业经济阶段，而且经过“女权”（母系社会）的历史阶段。他还利用殷墟发掘的古器物，以及《尚书》、《诗经》等古代文献，考求殷商社会历史及其经济发展情况，从而断定殷代尚为石器时代，而周代“已入铜器时代”。作者指出，“原人社会的经济情形，常与原人社会的文字书契以明著的反映。故今日吾人研究古代的社会情形，每能从文字的孳乳演蜕之迹得着确实的证据”。此文除运用唯物史观外，还借鉴了梁启超、刘师培

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此文为作者在北大的“唯物史观”讲义的第四部分，后收入193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

冬，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国学。

讲义编为《国学小史》（第二章“诸子总论”以《诸子考证及其勃兴之原因》为题刊载1921年11月《哲学》第4期）。该年梁启超所做有关国学的文章有《老子哲学》、《孔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论孟子》等。

柳诒徵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等课程。

柳诒徵在讲授过程中编写讲义，1921年《中国文化史》讲义编成，由高等师范学校印行，后又在《学衡》连载。

1921 年

※ 顾颉刚、钱玄同开始讨论辨伪问题。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出版。
※“仰韶文化”发现。
※ 胡适作《〈红楼梦〉考证》。
※《史地学报》创刊。
※ 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400 卷本定稿。

1 月

27 日　钱玄同与顾颉刚通信，主张将辨“伪书”的范围扩大至辨“伪事”。

钱玄同认为崔述、康有为、崔适被“伪事”所蔽，故其辨伪书不能取得更大成绩，所以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自此以后，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三位“疑古”运动的发起者将辨伪的目标集中到“伪史”。顾颉刚迅速制定了《伪史源》、《伪史对鞫》、《伪史例》三册笔记簿，并以《伪史考》总题之，着手收集材料。

是月　梁绳筠在《史地丛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历史谈》。

作者把旧史书从体例角度分为编年法、纪传年表法、志书法、纪事法四种，认为传统编史法指导下的史书体例，没有一种完全适合现代史学、能为新的历史所用的。所以，他主张要对传统史书体例进行改造。

同期还刊载了金兆梓《编纂本国史材料的商榷》、何炳松译《从历史到哲学》。

2 月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0 年蒋方震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作序，梁氏认为：“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

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他将清代学术思想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不料“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其篇幅几与蒋氏原书相当，不宜再作书序，只好独立成篇。1920 年 11—12 月，梁启超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改造》第 3 卷第 3—5 号。1921 年以《清代学术概论》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59 年被徐中约译成英文由哈佛大学出版。

本书分清代学术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谓：“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及其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有研究者认为“《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都是梁启超学术论著中的佳品”。

蔡和森致信陈独秀谈马克思主义。

信中说，鉴于“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他深感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称：“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概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3 月

27 日　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开“新红学”研究序幕。

11 月 12 日修改定稿。胡适批评以前的旧红学中的“索隐派”“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红楼梦》由曹雪芹作成前八十回，高鹗续成后四十

回；并考证出曹氏之家世生平：《红楼梦》乃曹雪芹之自传。第二年，胡适又发表了《跋〈红楼梦考证〉》，其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从此百余年的旧红学终结，新红学正式拉开了帷幕。1922 年，顾颉刚在致俞平伯信中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1923 年，其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作序时提出“新红学”的概念说：“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胡适提出要“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并指出了一条“科学的轨道”：“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具体演示了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对当时的文史学者的治学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4 月

3 日　梁启超作《复胡适之论墨经书》。

是年春梁启超致力于墨子研究，先后作《墨经校释》、《墨子学案》(《改造》第 10、11 号所刊《墨子讲义择要》即是篇概要)、《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等。

6 日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1937 年 7 月 1 日改为国立厦门大学。厦大历史学科在创校时即设立。厦大史学专业在当时各大学中较有特色，即课程规划逐渐落实社会科学走向，其中不但中西通史、断代史兼具，中外学术史、美术史、交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专史课程一应俱全，而且，在课程设置中各种社会科学和辅助科学所占的比重相当大，例如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统计学、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法学总论、人类学、金石学等课，几近一半。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学者先后有徐声金、薛永黍、张星烺、陈同燮、林惠祥、郑德坤、谷霁光、谭其骧等。

18 日　瑞典学者安特生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考察。

这次考察发现了重要的古文化遗址，10 月底开始田野发掘，并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发掘工作，得到了丁文江的支持，袁复礼参加了发掘。

由于当时尚未掌握层位学的方法，所以安特生所称之“仰韶文化”，

实际上是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混合。同时，还得出了单色陶器早于着色陶器的错误结论。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端。

5 月

中华书局推出"新文化丛书"。

收入"新文化丛书"的著作有（荷）郭泰著、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1921 年 5 月），常乃悳《中国思想小史》（1922 年 4 月）、《中国文化小史》（1928 年 11 月）、《法兰西大革命史》（1931 年 7 月），刘伯明演讲、缪凤林笔记《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1922 年 2 月），李翊灼《西藏佛教史》（1933 年 2 月）等。

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由上海爱文书局出版。

6 月

9 日　顾颉刚致函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

顾氏书云："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从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地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

是月　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出版"例言"中，编者指出此书"起自太古，断于清末，依据经史，参考志乘及私家撰著各书，遍征金石文字"，凡群经重要人名、圣贤、帝王诸侯、正史有传之人、在今中国领域之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匈奴南诏等）诸人、即使经史不载但在书画工商医卜领域卓然有成之人"显资刊载"，而史志所载后妃、宗室、忠义、孝友诸传因"往往有毫无事实"等"概不备录"。该词典是收录历史人物最多的人物词典，后多次再版。

7 月

23 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月　胡适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讲学，作《研究国故的

方法》的演讲。

胡适提出四个要点：（一）历史的观念；（二）疑古的态度；（三）系统的研究；（四）整理。这篇演讲表明，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已经成熟。

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等纂的《湖北通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0 年湖北成立通志局，湖广总督陈夔龙请张仲炘主持通志局事，辛亥革命后修志中辍，1914 年吕调元出长湖北，请张仲炘继续主持修志，1919 年最终成书。该志扉页标“民国十年辛酉六月版”，该书出版前数月，张仲炘已逝，无缘见书出版，故该书无前序。该志是续嘉庆通志而作，时间至于宣统三年（1911），计 172 卷，分舆地、建置、经政、学校、武备、祥异、艺文、金石、职官、人物十志，图、表、传收纳在志内。该志是民国以来修志成书出版较早的一部通志，被认为是“为各省志之先导”。

章鸿钊在《科学》第 6 卷第 7 期发表《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

章鸿钊认为中国“春秋战国之间，即西元前五世纪”就进入铁器时代，“吴楚诸国，冶炼渐精，始制铁兵，惟仍以用铜为多”；自战国至汉初是中国“铁器渐盛时代”，“是时农具及日用诸器已盛用铁，惟兵器尚兼用铜”；东汉以降，中国进入“铁器全盛时代”，“东汉兵器已盛用铁，其后铜愈乏，甚乃禁用铜器”。文章重点考察兵器用铁的过程，而对农具用铁和冶铁业论述非常简略，此为近代第一篇考察铁器史的文字。

8 月

25 日　胡适在《东方杂志》第 16 号发表《研究国故的方法》。

此文原为该年 7 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演讲的演讲稿。胡适认为“国故”是中立的，比“国粹”这个概念好，要研究“国故”，需要有四种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整理”。胡氏认为应该当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系统地研究国粹”。

有研究者认为，胡氏此文主要是主张以怀疑的态度，将一切“国故”当作历史来分辨其得失，系统地整理古籍。

9 月

15 日　梁启超在《改造》第 4 卷第 1 号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又名《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是月　中华书局开始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

该丛书收录柏格森等著、李璜译《法兰西学术史略》（1921年9月），李璜编《法国文学史》（1922年12月），杨钟健编译《古生物学通论》（1926年9月）等。

10月

27日　师丹斯基、步达生、袁复礼等开始发掘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至12月1日结束）。

是月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北京财政部印书局印刷。

此书是由1920、1921年在北京、山东等地所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词整理而成，共有五章，用比较的方法论述了东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和哲学进行了肯定，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氏此书面世后，立即引起思想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虽然褒贬不一，但其影响巨大，一是把东西文化论战推向高潮，二是对“新儒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该书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9年共出八版，此后众多出版社翻印，至今不衰。

刘伯明述、缪凤林记《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11月

顾颉刚与钱玄同讨论经书辨伪。

钱玄同认为“经”自来为学者尊崇，故“经”之辨伪较“子”之辨伪更重要。顾颉刚因整理郑樵、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著作，意识到“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顾颉刚在致钱玄同信中指出，“六经”皆孔子作品的观念已可推倒，并认为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事”，也开始造“伪书”，《尧典》即是伪造。顾颉刚还指出，希望“把古史分析开来，每一事列一表，每表分若干格，格上纪事以著书时代为次，看他如何渐渐地转变”，并主张依“现在的眼光”编排史目，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竹书纪年》于战国秦汉间等。顾颉刚将初步排列的几个表比较看时，“便立刻显出冲突的剧烈和渐次增高的可惊了”，至此“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之思想酝酿成型。

《史地学报》创刊。

此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会刊，柳诒徵、徐则陵、陈训慈、缪凤林、张其昀等人参与创办，设有评论、通论、

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读书录、史地界消息、史地家传记、史传、地志、论文摘述、表解等栏目。

柳诒徵在创刊号序中指出，“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日进矣”，但因“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导致“历史地理之知识，几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其可耻孰甚”。该刊的创办目的之一就是为纠正当时历史研究与教育存在的弊端。

该刊有几个特色：（一）将时事分析与史地研究相结合；（二）开设史地界消息、书报介绍和新书评论专栏；（三）转载、译载或摘述当前重要的史学研究论著。有研究者认为，“《史地学报》的创刊，其目的即在赓续清季的史地研究，因此，史地学报派一面向西学取经，一面自传统中国史学汲取养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较着重于历史学与地理学理论的探讨，但深一层的用意则在民族主义史学的建立”。

从 1921 年 11 月到 1926 年 10 月，《史地学报》共出版 4 卷 21 期，初为季刊，自第 2 卷第 2 期改月刊，1925 年第 3 卷第 8 期出版后，延至 1926 年 10 月第 4 卷第 1 期才出版，此后停刊。

陈训慈在《史地学报》创刊号发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

这篇近三万字的长文介绍了当时存在的历史观，附以中外史家的有关论述。陈训慈认为当时学界存在“美术史观、宗教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综合史观”等十一种史观，并以一种中立的立场剖析了各种史观的特点及其缺陷。

同期还刊载了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张其昀《柏拉图理想国与周官》，缪凤林《三代海权考证》，姜子润《我国古代金属器物之起源》（第 2 期连载），顾铁生《孔子适见老子年月考》，王玉璋《腓尼基通商殖民史》，（美）葛立芬著、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王庸《欧史举要》等文。

缪凤林在《史地学报》创刊号发表《历史与哲学》。

作者明确指出“历史”与“史书”不同：“通常言历史者，皆以历史为过去事实之记载，叙述与描述二字即足尽其义蕴。此实未明历史之真谛。盖其所言，乃组织成书之历史，而非历史之本体；乃历史之历史，而非历史之真象也。”“历史之本体”又称“历史之真象”，意指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的“演进和活动”。“组织成书之历史”意指记述过去事实的史书。又说：“所谓过去，常有活而非死。演进活动，在长育历程之中，无

有究竟也。”

文中提出：“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在他看来，探求历史公例虽然较为困难，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创刊号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

此文驳章太炎《诸子略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中国古代思潮篇》等论先秦诸子的观点。

文中提及三人皆举“客观”之大旗，逞主观之勇，于历史取舍有强古人以就我的取向。但三人之书却为学术大众所争相诵说，因此柳氏撰文揭穿其中谬误。柳氏举证说明：“章氏好诋孔子，笃信汉儒《七略》之说。……胡适之好诋孔子与章同”，“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以诸子之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大张之。”

章太炎在阅读此文后，致信柳诒徵，不仅接受柳诒徵的批评，坦承“云孔子窃取老子藏书，恐被发覆者，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民报》时期的一些言论皆已刊削，并认为“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直窃康长素之余唾。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此信及柳诒徵的复信刊载于《史地学报》1922年第4期。也有其他读者致函《史地学报》，认为柳氏此文“独具只眼，道人之所未道，读之深为畅快”，并认为“斯篇一出，吾知国中学术界当呈一大变化也”。

12月

4日　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颁令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

令文为：“教育部呈：柯劭忞所著《新元史》，精审完善，请特颁明令，列入正史，以广流传等语。《元史》原书，由宋濂、王袆，仓促蒇事，疆域姓氏，舛漏滋多。前代通儒，虑纠其失，间有述作，均未成书，柯劭忞博极群书，搜辑金石，旁译外史，远补遗文，罗一代之旧闻，成名山之盛业，洵属诠采宏富，体大思精，应准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以饷士林。”自此，《新元史》与前二十四史并称，合为二十五史。

19 日　河南通志局正式成立。

纂有《鹿岩乡土志》等志书的张凤台就任河南省长后，积极提倡续修河南通志。该日河南咨议局通过省长张凤台提交的《河南通志局组织章程》，宣告河南通志局正式成立，开始续修150余年失修的《河南通志》。该组织章程规定督军赵倜、省长张凤台为总裁，总纂为萧惠卿，提调范寿铭，实际纂修人员有秦树声、周云、蒋藩、陈嘉桓、赵金鉴、王佩箴、赵国光、刘海涵等。1923年6月，总纂萧惠卿辞职，改聘北京四存学会会长李见荃为总纂。《河南通志》计划四年修完，分图、纪、表、考、传、略六大类，舆地、风俗、物产等二十六门，但因政府更迭等原因，并未实现，只留下了一些手稿。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兴修志书后，韩复榘再次改组通志馆，留用一部分旧人，增聘一部分新人，此馆虽然一直存在，但亦未编成完整的通志。1942、1943年，敌伪政权的通志馆编印出版了舆地志、大事记等。虽然《河南通志》未能成稿，但蒋藩等人《重修河南通志意见书》、《修志义例》、《河南通志初稿例言三则》等都对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是月　王云五入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王云五掌管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事务后，决定创编各种丛书，包括百科小丛书、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等。

是年

秋，亚洲学术研究会在上海成立。

理事汪钟霖、邓彦远，孙德谦为编辑，任稿会员有王国维、罗振玉、曹元弼、张尔田、刘承干等，计划每月开讲书会两三次。

《亚洲研究会简章》云："本会以亚洲学术与世道人心，有极大关系，须加以研究，故名曰亚洲学术研究会。"宗旨是"本会大纲，以六条为体，八项为用。六条有目，曰主忠信以修身，尊周孔以明教，敦睦亲以保种，讲经训以善世，崇忠孝以靖乱，明礼让以弭兵。八项有目，曰亚人之性情，亚人之政治，亚人之道德，亚人之法律，亚人之礼俗，亚人之和平，亚人之教学，亚人之文化。将来在会讲书及发行杂志，悉本此旨。"

该会发行《亚洲学术杂志》，其《例言》云："论说者，将我亚洲旧有之学术，发明真理，著为专篇，以备世贤之研究。不过事高论，亦不为陈腐之谈。琐屑之考据，空耸之议论，皆在所摈弃。于近今学说之背谬者，则辞而辟之。"

杂志出版后，罗振玉特嘱咐王国维："深愿同人能合力作，发挥正论，

以振狂愚。”吴宓在《中华新报》撰文介绍，赞其“欲本礼教及旧学之精神，以淑世正俗者也”；“虽专事发明经义，整理旧学，然处处针对时势，以实用为归”。日人在沪出版之《周报》载文评“亚洲学术研究会”之发起，“实气运使之然，可以谓之为时势之要求”，“中国今日世道人心之颓败，已达极点”，故杂志之出版“有益救济时代”。该会及其所办杂志也引起东南大学史地学会的关注。

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400卷本定稿。

该书起乾隆五十一年（1786）迄宣统二年（1911）126年间的清朝典章制度，荟萃于一编。刘锦藻以清朝“遗老”自居，著述体例也是沿袭马端临《文献通考》和《清文献通考》等政书。此书原名《皇朝续文献通考》，计320卷，1910年刘锦藻进呈后得赏内阁侍读学士，清亡后刘锦藻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增订，上接《清文献通考》，下至清亡。该书于1933年刊行，1935年商务印书馆将《清朝续文献通考》合刻入“十通”，成为断代典制体史书的殿军之作。

尽管作者思想保守，但对晚清社会的一些新事物，书中也有所反映。马端临《文献通考》二十四门，《清文献通考》二十六门，此书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实政等四门，扩充为三十门。其次，各门子目也多有变更，如《征榷考》增加厘金、洋药两目；《国用考》增加银行、海运两目；《选举考》增加货选一目；《学校考》增加书院、图书、学堂三目；《王礼考》增加旧政、训政、亲政、典学四目；《兵考》增加长江水师、海防军、船政等目；此外《舆地考》、《四裔考》也有较大变更。

该书比较全面地整理了乾隆以来的典章文献，较系统地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国家建置沿革、文化发展、社会变迁，特别是书中新设的门类子目，增加了以前典制体史书所未有的社会内容，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开始辑印《四部备要》。

针对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另辟蹊径，编印自成特色的《四部备要》。茅盾称《四部丛刊》为“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四部备要》的立意为追求适用性、群众性、完备性。陆费逵在《校印四部备要缘起》中宣称：“吾国学术，统于四部。然四库著录之书浩如烟海，坊肆流传之籍棼若乱丝。承学之士，别择维艰；善本价昂，购置匪易。本局同人有鉴于此，爰于前年择吾人应读之书，求通行善本，汇而集之，颜曰《四部备要》。提纲挈领，取便研求；廉价发行，以广传布。惟是普通铅字，既欠美观；照相影印，更难清晰。适杭州丁氏创制聚

珍仿宋版，归诸本局，方形欧体，古雅动人，以之刊行古书，当可与宋椠元刊媲美。兹将第一集至第五集分年校刊，共计二千余册；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

《四部备要》选书精要，普及适用。陆费逵在《重印〈四部备要〉缘起》中说：“选辑之谨严，校对之精审，字体之优美，印刷之精良，早为艺林所共赏；前辈严范孙、梁任公诸先生无不赞许，甚至称为旷古所无。”

1921 年，杭县藏书家丁氏创制的聚珍仿宋版式归诸中华书局，于是始用仿宋版排印《四部备要》。到 1934 年，共出 2500 册，收书 351 种，计 11305 卷。《四部备要》初版为 6 开本，1934 年重印为 5 开大本，天地放宽，书品阔大，1935 年起改印“洋装本”，至 1936 年出齐。《四部备要》前后出版 3 种版本，并编印有《四部备要提要》。

安特生派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进行调查。

1923 年发掘出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两颗人类牙齿化石，一颗为石化很深的人类上臼齿，一颗为尚未露出颌骨的人类前臼齿。1926 年 10 月，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正式发布，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动。

1922 年

※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

※《学衡》杂志创刊。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

※ 罗振玉购买大库档案八千麻袋。

※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出版。

※ 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清内阁档案移交北京大学收管。

※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历史教学组讨论改进历史教育问题。

1 月

1 日　李璜在《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1 期发表《法兰西近代历史学》。

作者介绍 19 世纪以来法国史学的概况，尤其着重其师瑟诺博司等的“写实派”。

李璜认为瑟诺博司的史学观念主要继承了古朗治的遗说，即“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并且在评定往事里也避去今人所有之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或其他仇雠观念，这些观念不惟无益，而且容易变更遗文的意义”。

8 日　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今与古》。

此为作者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讲演，批驳“今不如昔”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14 日　北京大学决定成立包含国学门在内的研究所。

该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研究所组织大纲》，决定“预备将来设大学院起见，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研究所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

《国学季刊》创刊号刊登的《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称该组织大纲1922 年 1 月 14 日由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标注称该组织大纲于 1921 年 12 月 14 日第三次评议会通过。此据《国学季刊》记载。

是月 《学衡》杂志创刊。

此刊由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创办。《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其体裁及办法:（甲）于国学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乙）于西学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行文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

该刊设辩言、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栏目。撰稿者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刘伯明、柳诒徵、景昌极、缪凤林、刘盼遂、徐则陵、张荫麟、张其昀、李思纯、林损、孙德谦、赵万里、向达、黄节、郭秉和等。杂志于 1933 年 7 月停刊，共出 79 期。

在《学衡》杂志周围，形成了以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学生梅光迪、吴宓为首的“学衡派”，他们反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新人文主义重新阐释和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这一学派在二三十年代的国学研究潮流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有与北大国学研究分庭抗礼之势。

创刊号刊载柳诒徵《汉官议史》、钟歆《老子旧说》、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等。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梁启超 1921 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讲稿，部分连载于《改造》杂志第 4 卷第 3、4 号。商务印书馆初版时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

全书六章，十万余言。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阐述史学的对象、范围、任务和目的。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追溯中国史学的起源，考察主要史书体裁的源流优劣。第三章“史之改造”，提出今日史学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第四章“说史料”，将史料分为文字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详述史料搜集和鉴别的方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论自

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等。

此书在中国是开风气之作，至今仍具有指引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作用。张荫麟认为梁著“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陈训慈以为梁著“长于融会西说，以适合本国，虽非精绝之创作，要为时代之名著”。

也有学人对梁著的创新性持有异议，认为它与已流行于西洋和日本的史学入门、历史研究法一类书相雷同。罗家伦说：“梁先生看外国书的范围和了解程度，实在使我怀疑。我的怀疑或者错误，但是近来看他的几种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实使我增加这种印象。”若是“去看Bernheim、Shotwell等关于历史方法的书，岂不是比看梁先生的书所得多了多”？杜维运发现，梁氏可能受到法国史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合写的《史学原论》和德国史家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而齐思和认为梁著“虽于中国史学所入极深，而于西洋史学则似犹隔膜。故其书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犹未能令人完全满意”。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整体上肯定本书的价值，且相信其对中国史学的革新作用。若熟读德人伯伦汉的《史学入门》或日人坪井的《史学研究法》等书，本书便无参考的必要；但梁氏书中所旁征博引的中国史例，却是它书绝无仅有，因此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应多加重视。

顾颉刚开始整理郑樵《诗辨妄》。

从1月至4月，顾颉刚先后撰写了《〈诗辨妄〉序》、《郑樵著述考》、《郑樵传》、《〈非诗辨妄〉跋》等几篇文字，并自认为这几篇文字“建立了经学革命的旗帜”。

2月

10日　抗父在《东方杂志》第3号发表《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

作者认为：“最近二十年中，我国旧学之进步，求之前古，盖未有如此之亟者。……至近旧学之进步，则以罗、王二君为中心。罗君以学者之身，百方搜求新出之材料，而为近百年文化之结集，其研究之功，乃为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与奇异之综合力，发见旧材料与新材料间之关系，而为中国文化第二步之贡献，遂使群众旧学退步之近二

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

关于“抗父”，有人认为是王国维，有人认为是樊炳清。

11 日　北京大学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国学门正式成立。

该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决议成立由蔡元培（研究所所长）、顾孟余（教务长）、沈兼士（国学门主任）、李大钊（图书主任）、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构成的委员会。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金石学家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导师，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陈垣、钢和泰、伊凤阁、陈寅恪等人又陆续受聘为国学门导师。

胡适称北大国学门可以代表“‘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的“科学整理国故”的精神。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庄尚严《妙峰山・跋》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创设，与所作的工作，今日看来，可以说在全国是开风气之先。所中组织，分为考古、编辑、档案三室，歌谣、民俗两学会，都是彼时各大学没有的新学门。”

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等书认为国学门在 1922 年 1 月成立。但根据《国学季刊》创刊号刊登的《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称北京大学评议会 1922 年 2 月 11 日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来看，似应将国学门的正式成立放在该日。

是月　罗振玉购买大库档案八千麻袋。

北洋政府教育部为偿付职员积年欠薪，将历史博物馆档案中四分之三较为破碎者，分装八千麻袋，共十五万斤，以四千元售予西单同懋增纸店，为造还魂纸的原料，是为“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以三倍价钱将其购回，挑选出较为重要的资料，编成《史料丛刊初编》。其余因无力整理，又以一万六千元转售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8 年 9 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李氏处购藏。1929 年，史语所对这些档案加以整理，汇编

为《明清史料》甲、乙、丙、丁编四册。而历史博物馆留存的四分之一较为完整的档案，移交北京大学，整理汇编有《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及《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等。

谷凤池在《史地丛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历史研究法之管见》。

谷凤池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应是根据历史的性质来确定。因为历史的发展具有“进化性”、“连续性”和“因果性”，因此“治历史者，便当顺应其固有性而研究之”。他指出：第一，“历史既有进化性，治历史者，最好依据进化律而研究之”。第二，当“依据连续律研究历史”，“我们研究历史，也当作如是观，所谓某时期终，某时期起，特年月上的划分，而历史的进化，仍是承上接下的进行”。第三，“依据因果律研究历史”，“能按果溯因，就因推果，则全部历史之起伏，可推之矣。”“否则目历史为片断的事迹，不相连属，研究既不易，纵研究去，亦莫明其变化真相。不能养成推断未来之能力，历史之价值完全失了！”

梅光迪在《学衡》第 2 期发表《评今人提倡学术之办法》。

作者批评胡适等人“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小学生之类”。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0 年胡适读到日本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为内藤章谱“太简略”，“只有一些琐碎的事实，不能表现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所以，他决定自己编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

胡适章谱与旧的流水账式的年谱不同，以学术史的视角，探寻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生活的学术环境及其学术交往，总结章氏学术的主要成就，并突破一般年谱对谱主多加讳饰的做法，不但记谱主的长处，而且也指出其不足，对谱主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谱牒学”中说，“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是“近代学术界一盛事也”。姚名达在为本谱作增补后的序言中说，“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它“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注明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因而“对于个人的彻底研究，她是史学史的第一页了”。

胡适章谱的出版，引发了研究章实斋的热潮，在 20 世纪 20 年代遂成

显学。杜维运指出："领导中国新学术之胡适于 1922 年继写《章实斋先生年谱》，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筹设考古学研究室，委托正在日本京都留学的张凤举、沈尹默拜访滨田耕作。

日本京都大学首位考古学讲座教授滨田耕作详细介绍了日本东西两京考古学的状况，对中国同行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建立考古学研究室所应包含的设备、搜集材料所应注意的问题、与外国学术机构交换材料的办法、介绍国外东方考古方面的专家及参考书目等等。他主张考古学研究应与美学相联系，不要仅仅作为史学的辅助；应预定计划，以便将来成立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应视考古研究为自然科学，与理科的生物学相同；同时搜集中国和西洋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免偏蔽，为此，要培养年轻而通外文的人才，设立教授、学生研究室和陈列、实验、图书室；多搜集中国文物，与外国博物馆和大学进行交换。

滨田还推荐对东方考古素有研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劳佛来华任教，并开列了总价千余元的考古学应备书目，还赠送京都大学出版的两册考古学报告。后来该研究室的规划设施显然采纳了这些提议，对国学门日后发展考古学发生了重要影响。

王传燮《白话中国历史》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3 月

13 日　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讲演》。

连载至 17 日。梁氏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1)"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大纲》撇开夏、商、周三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不免让人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大纲》疑古太过，只拿《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这"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3)从老子讲起是不对的，因为《老子》成书的年代是在战国之末。(4)以"知识论"来讲孔子，是"弃菁华而取糟粕"，因为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第三的位置。(5)相信孔子杀少正卯一事，是厚诬孔子，是对孔子人格的不敬。(6)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

总之，"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对梁氏的公开批评略作回答：梁氏关于孔子、庄子的见解，“未免太奇特了！”“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孔子的学说受了二千年的尊崇，有了那么多的护法神了，这个时候，我来做一个小小的 advocatus diaboli（魔鬼的辩护士），大概总还是可以的吧？”中国二千年来替庄子“辩护的人也够多了，我来做一个小小的 advocatus diaboli，大概也还可以吧？”在次日的日记中，胡适逐条反驳了梁启超关于《老子》一书是战国末作品的理由。胡适从梁氏讲演中得到的教训是：“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15日　梁启超在《改造》第4卷第7号发表《地理及年代》。

是月　顾颉刚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

顾氏希望将“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人可以从中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顾颉刚编成的教科书从体例到内容都有诸多创新。课文部分采用大小字的做法，大字叙述课文主体内容，简明扼要，小字部分重在局部细化情节，增加情趣。这一体例因符合初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规律而于七十年后在中国大陆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重新使用。

该书后与王伯祥合编，至1923年初全书上中下全部编成，由商务在1926年出版。该书销路甚好，数年间卖出二十余万册。1929年山东参议员王鸿一等提出专案，弹劾该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是“非圣无法”，戴季陶亦认为学者进行疑古研究尚可，但在教科书采用宣扬此类观点，会“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该书遂被国民政府查禁。

陈训慈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

作者认为中国学术不振、出版界相当沉寂，其因全在缺少专门的史学团体，故组织专门的史学会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史学会将在三方面发生重要影响：一、促进史学之研究。二、表白中国文化。以史学会为中心，于古文化作忠实之研究，以发现完全之过去，畀中国文化以正当之地位，使外人明了中国的地位。三、增加与保存史料。考古发掘事业，我国尚无人为之；且“吾国古物其有旧藏或发见者，多为外人收买，而当代之史料，又散佚无人注意，收集而保存之，实史学会之责也”。

史学会开展的工作将有：（1）整理旧史；（2）编订新书；（3）探险考察；（4）保存古物；（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6）参预近史：a. 促进清史之编订，b. 发行年鉴为研究资料，c. 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之史料。

同期还刊载了胡焕荣《纪元问题》、《不列颠帝国》，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对于吾国最近经济变迁之观察》，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景昌极《易之国家观》，诸葛麒《周幽王时代国家社会概况》（第 3 期连载），张其昀《火之起源》等文。

缪凤林在《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2 期发表《中国史之宣传》。

作者指出，西方史学界对东方各国之历史较为模糊，“尤以中国为甚”，以至于许多西方史家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叙述上有很多误区，“西人虽有研究吾国历史之志愿，以文字之不同，典制之暌隔与史籍之浩如烟海，决难有成。际此以宇宙史为的之日，自我表扬，宣传吾国之历史，以答彼士之需求，因而免去种种误会，实吾史学界之天职”，要达到此一目的，“非特组史学会，造就专门人才不为功”。作者还指出“急匡西人已有之谬误”、“注意吾国特有之学术政法”、“留心吾国国史上之光荣”、“纂编详备之欧人侵略亚洲史”等数事为宣传初期“特别注意”之事。

柳诒徵在《学衡》第 3 期发表《论中国近世之病源》。

柳诒徵反对将近世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咎于孔子，而是举例归纳出“中国近世之病根在满清之旗人、在鸦片之病夫、在污秽之官吏、在无赖之军人、在托名革命之盗贼、在附会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并进一步认为“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

4 月

1 日　梁启超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开始作学术巡回演讲。

17 日　民国交通史编纂委员会成立。

1920 年交通部编译处长关庚麟、副处长雷光宇提议编纂民国交通史被批准，1922 年 3 月二人又以交通史编纂“事实既宜详备，体例尤贵谨严”为由提请成立民国交通史编纂委员会。4 月 17 日，交通部颁布《民国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简章》，成立编纂委员会，以关庚麟为会长，雷光宇为副会长，曾鲲化为总纂，王倬等为编纂。编纂委员会成立后陆续编纂《民国交通史》“邮政篇”、“航政篇”、“路政篇”等。

18 日　顾颉刚到上海拜访王国维。

顾颉刚日记记载王国维给他的感觉是“极诚朴，蔼然可亲”。顾氏归后又与王国维通信讨论《顾命》，并在信中表示自己“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并转达沈兼士提议：“凡一家著述散见各帙者，均拟由（北大）研究所汇刊为丛书，以为先生所著书，以新法

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如得汇刊一集，俾研究国故者有所遵循，实为盛业。因嘱刚趋前接洽，可否由先生编定目录付校中排印。”

5月29日，王国维复书顾颉刚，就所询《顾命》中“须材”二字作答。函云：“事诚不可解，自当以阙疑为是。”又谓：“读古书于不可通者阙疑，自是一法，与释古文字无异。”札中又提及胡适新著《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云：“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

1924年4月22日，顾颉刚致信王国维。信中表示：“拟俟生活稍循秩序，得为一业之专攻，从此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未识先生许之否也?”对于顾颉刚拜师求学的请求，王国维一直未有回应。

19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1004号刊载《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

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倡议发起史学读书会，目的有二：其一，“当今史学以溥遍史为归，融合人类全史，观其会通，固为要事，然不有分国之史，亦［无］以凭借”，集合同学中学习英、法、德、俄、日本诸国语文者，各出所学，广为搜罗翻译，则对外俨如开辟疆土，对内势同输给粮饷。其二，文明各国史家，类能应用最新史法整理其国史。中国史料宏多，散无纲纪，非分代整理，汇为通史，或分科精研，各成专史，实不足以有济。同学对社会科学习之有素，于本国通史亦略闻纲要，“正宜分代分科，各精探讨，散之则各启疆宇，合之则互输材料。”

是月 顾颉刚在《教育杂志》第4期发表《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

作者认为，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了解社会的演变以及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以确定努力方向，历史书的好坏，在于说明事实明了与否，说明事实的因果确切与否。所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要竭力克服旧教科书的弊端，用真实的史料，表现全社会的活动状况，体现进化的观念，表现现时代的最精彩部分。

文章系统论述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法说：“我们编纂历史教科书，自夏代以前，竟可不问。”“在剪裁上，我们的宗旨总是：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却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真确，不扼要。”关于教科书的内容，他指出，“应当不注重于政治上的沿革系统，……而在他方面则努力搜辑出材料来，务使全社会的活动状况大略可以表现”。今天的教科书应严密地审定史料，指示进化的路径，排斥复古观念，“使学生知道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另外应拣取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最精彩部分，作亲切的描

写，以革除旧教科书的文字呆板而冗长的弊端。

梁启超《墨经校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氏认为，“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今治百学者，咸利赖之”，但秦汉之后，墨学绝续，“学者徒以空疏玄渺肤廓模棱破碎之说相高，而智识界之榛塞穷饿，乃极于今日”。“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经有所校释，随札记于卷端，得若干条，未及整理，辄复亡散。今冬方在清华园为诸生讲《国学小史》，值岁暮休假，辍讲，利用余晷，遂检旧稿，比而次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

《清华周刊》刊载的《书报介绍》称“梁先生是第一个根据今本《墨经》（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做校释的工夫，所以有许多地方与前任如张惠言孙诒让之辈大不相同，很有新颖独到的见解，足供治墨学者的参考”。栾调甫在《读梁任公〈墨经校释〉》一文中指出，该书最大的问题是“随意改字删字”。

梅光迪在《学衡》第 4 期发表《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

作者认为“吾国现在实在无学术之可言”，其原因在于“今日学术不操于欧美归国之士，而操于学无师承之群少年”，所以“今日吾国学术界”之“第一需要在真正学者”，即这些有师承、有专长、严格谨严、惟真是求的“真正学者辈出”，“以养成深闳切实之学术界”。梅光迪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胡适：“今之中国时髦学者亦盛言科学方法，然实未尝知科学方法为何物，特借之以震骇非学校出身之老儒耳，故其为学也，毫无审慎与客观之态度，先有成见，而后援引相合之事实以证之，专横武断”，“以深通名学自夸于众，然其用归纳法则取不完备之证据，用演绎法则取乖谬之前提，虽两者所得结论皆合于名学原理而其结论之失当”。

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约，在上海讲授“国学”。

章太炎的目的是挽救“国学之衰微”。自 4 月 1 日，“每星期六午后进行讲授”，共十讲。内容为“国学大概”等，包括：一、国学之自体：（甲）经史非神话；（乙）经典诸子非宗教；（丙）历史非小说传奇；二、治国学方法：（甲）辨书籍真伪；（乙）通小学；（丙）明地理等。当时报纸对此事大肆宣扬，讲后载录讲辞。曹聚仁将讲辞整理，同年 11 月 11 日由泰东图书局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

刘伯明述、缪凤林记《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由中华书局出版。

施存统编《劳动运动史》作为“劳动学校教科用书”出版。

5月

25日　历史博物馆所藏明清内阁档案移交北京大学收管。

5月1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文教育部，请求将历史博物馆余下的档案全数拨归该校整理。沈兼士记此事原委说：“当民国十一年余方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闻罗叔言斥赀赎内阁大库档案，有慨于心，因与马叔平、陈援庵、朱逷先诸君共谋以其劫余归于研究所。”适值与沈兼士相熟的教育部次长陈垣代理部长之职，遂批准了北大的申请，由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委托北大整理这批档案。

北京大学得到的档案，计有62木箱1502麻袋。为此专门设立了明清档案整理会，由国学门与史学系、国文系的教职员共同组成，作为规划及主持档案整理的组织。整理办法分为三步，首为形式之分类，并区别年代；次为编号、摘要；再次则研究考证、分类统计。整理就绪的，即放置陈列室中展览。档案整理会成员包括：余文灿、沈兼士、陈垣、朱希祖、马衡、马裕藻、沈士远、程树德、单不庵、陈汉章、张凤举、李泰棻、杨栋林、魏建功、王光玮、胡鸣盛、王有德、皮宗石、潘传霖、张伯根等。

由于这批档案的数量太过庞大，1923年3月下旬，在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提议下，史学系大部分学生（超过50人）加入整理档案的工作，作为实习功课，由朱希祖、陈垣做指导。至1924年，初步的整理终告完成。在完成了分类、编号与摘录事由的工作后，这些档案分置在国学门的陈列室中，供国内外学者到所参考、研究；同时也将摘录的档案目录与重要资料，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后又汇编成册出版。

1924年9月，由于形式上的分类、编号已告一段落，档案整理会同人乃决定今后拟侧重档案内容之整理与出版，并将该会改称明清史料整理会，由陈垣任主席。

这是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流入民间后，学术机构首次以集众方式对这批档案的大规模整理。明清档案的整理，开辟了明清史研究的新纪元。

是月　“思误社”第一次集会。

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八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駉、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人。

《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3 期刊载《史地学报·编辑要则》。

该《要则》称："同人深维史地之学，一由时间之连续，示人类之进化；一由空间之广阔，明人类与自然界之关系。其博大繁赜，实超其他科学。""各种学问，靡不有所凭与史地；而史地之可贵，亦要在出其研几所得，供各学科之致用。此所以西洋自然科学发达，而史学地学与之偕进而无已也。吾国自黄帝置史，大禹敷土，史地之学，肇端特早。只以科学不进，实学沉涸，故史籍虽富，史学不昌；地志图表，尤阙精进。遂使先民之绪，坠而不振，昌明光大，归美白人。近年以还，国人盛言西学，谈论著述，蔚蔚巨观。顾于真实之学，辄相畏避，史学地学，尤稀过问。新说之灌输无闻，旧籍之研求日荒，怀古例人，宁非大耻。同人等问学旨趣，偏此二学，心痛现状，爰布兹册，将以求正有道，希助友声，以共阐前古之积绪，而期今后之精进。"

陆惟昭在《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3 期发表《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

作者认为研究理解历史，须"以人类社会为标准，不以特殊阶级为标准"；"要用真实的学者精神研究历史，不以作史为手段"；"中国史固当具世界眼光"，"以中国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编中国史正当方法，也即是今后必趋之方向"。

同期还刊载了陈训慈《清史感言》、徐则陵《历史教学设备之问题及其解决之方法》、束世澂《蜀汉开辟南蛮考》（第 4 期连载）、向达《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第 4 期连载）、王玉璋《车战之制的起源及其变迁》（第 4 期连载）、张其昀《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第 4 期连载）、全文晟《唐虞夏商祭祀考》（第 2 卷第 3 期连载）等文。

张其昀在《学衡》第 5 期发表《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

李泰棻《新著世界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月

董寝滋在《史地丛刊》第 2 卷第 1 期发表《研究历史当注意的三点》。

董寝滋说，研究历史要注意的重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变迁"、"社会的状态"和"经济的活动"三方面。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中国近世史要略序》，朱希祖、何炳松《改良

中学校历史地理教法议案》，朱希祖《历史的试验室的教学法》。

衡如在《东方杂志》第11号发表《新历史之精神》。

本文所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接受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主张。文中多处征引鲁滨逊之说，如"鲁滨逊于其名著《新历史》一书中"云，"新历史之兴起，依鲁滨逊之研究，所以促进之者，其重要原因，盖有二端：一为自然科学之发展，一即社会科学之兴起是也"；西方现代各派史学中，"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表现新历史之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以英国马尔文（T. S. Marvin）、美国鲁滨逊等人为代表，"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

王桐龄《新著东洋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从上古叙至明，以汉族盛衰为主线贯串史事，安排章节。缪凤林在1926年12月《学衡》第60期发表《评王桐龄〈新著东洋史〉》，认为此书"大抵以桑原氏书为本，杂抄各史四夷传及日人历史课本而成。芜秽缺谬，实无何种价值"。后来缪氏看到王书被用为课本，三年内一而再版，又在1929年11月《史学杂志》创刊号重刊此书评，以使"有国史常识者，即阅而知其误"。缪氏指出："书肆印行之国史课本多矣，简陋缺谬，十占其九。然以错误而论，恐犹以此书为最。王君主讲北平师大，闻即以此书为教本，谬种流传，不知伊予胡底也。"

7月

3日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历史教学组讨论改进历史教育问题。

会议在8日结束。其中，历史教学组参与讨论的学者有梁启超、何炳松、徐则陵、柳诒徵、朱经农。《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刊载了徐则陵整理的《今夏中华教育改进社关于史地教育之提案及历史教育组地理教学组之会议记录》。

梁启超的提案提出改造国史旧教本的两条主要方针：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即加强国史教科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据此，他把中国全史纵断为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等六部，又在国史教本目录里把六部分细分为192课。在这份目录中，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两部，占全书一半的篇幅。

朱希祖的议案主要是从历史教学内容讲授顺序的角度来论述的，且得到了何炳松的"附议"。朱氏既不同意梁氏初中学国史高中学世界史做法，又不同意民初部颁历史课程方案中规定的教学顺序。他认为，国史与外国

史应同时讲授，而且其中的现代部分应提前讲授，然后再讲其他部分。

何炳松的议案主要讨论历史教科书编写依何种标准来选择历史教科书内容，何氏指出，应以说明历代社会进化过程，使学生明白现代社会所由来。历史教科书也不应“偏重政治”。他认为历史教科书应使用“最初材料”，并且“应说明来历，附于每章或每段之末”。每章每节之后，应列参考书目，并对于参考书，加以简单评论。他还建议将历代历史名著，取其精华，专门编辑成一书，供学生参考。

徐则陵的议案主要关注中小学历史教学之目的、宗旨的设定，选择历史教材之标准、教学法，大中小历史教育衔接问题等。徐氏认为，要想对此种种问题进行彻底解决，当“组织中学历史教学委员会集合国内史学家教育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部研究。

陈衡哲的议案是从教学方法角度论述的，且得到了其先生任鸿隽的“附议”。陈氏批评中学历史教学中的种种弊端，如用一本“呆板”的历史教科书，偏重“注入事实”，而“不求发展学生研究学问之本能”，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导致学生视历史一科“如嚼蜡烛”。她认为应完全废止讲义，指导学生自修。如一时做不到，可以“用口述之讲义，而令学生笔记其大要，同时又令学生参考书籍，以为他日完全自修之预备”。后来唯一被否决的就是陈氏议案。

7 月 3 日下午，历史教学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徐则陵所提组织“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议案，推举徐则陵、何炳松拟定委员会简章；否决陈衡哲议案；认为梁启超、朱希祖、何炳松三人议案“问题重要而复杂”，应待“将来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从长讨论”。7 月 4 日下午历史教学组第二次会议，除部分问题外，基本通过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简章。

7 月 5 日历史教学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对修正简章无异议通过，对于历史教育目的，徐则陵提出 14 条意见，朱经农提出意见 3 条，何炳松提出意见 2 条，柳诒徵提出《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意见》一篇。柳氏认为“中小学校历史教科，只能算教育的一种工具，还讲不到学术，高级中学才可以渐渐的行到学术上面去”；历史教育既要让学生“晓得一国的历史”，也要“晓得世界的历史”；教育的目的是“逐渐使他们晓得人类社会蜕化的现象”；中小学历史教育要注重“实物的历史”与“书本的历史”相结合的办法。会议还决定，历史教学研究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北京方面由何炳松负责，南京方面由徐则陵负责。

是月　邝摩汉在《今日》第 2 卷第 1 号发表《唯物的中国史观》。

作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尺度”分析中国历史，

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黄帝至周末止，为发明工具，人类历史大开创时期”。这一时期“为手工工业时代，且为封建政治、共产主义时代”。第二时期，“自秦汉至清季五埠开商止，为无大发明，治乱相循，人类历史又趋于开创时期”。“第二期二千余年的历史，不过由政治上的封建制和产业上的共产制而改为政治上的独裁制和产业上的私有制罢了。而对于劳动技术，要（用）具和生产力，并无什么发明，并无什么进步。”第三时期，“自开港至现在止，为机械输入，产业革命，人类历史又趋于开创时期”。这一时期“如机械工业将次开创时代，且为改变民主政治和趋于资本主义时代”。这是较早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分期的尝试。

柳诒徵在《学衡》第7期发表《华化渐被史》。

第8、10、11、16连载。文章旨在梳理中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但仅刊载了日本部分，此后未见续载。

8月

31日　梁启超在长沙一中演讲《什么是新文化》。

梁氏认为新文化“很有几点和旧文化相同的地方”，并提出“儒家主义，可以说正合乎新文化”的观点。

是月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发表《清史刍议》。

柳氏自称“皆就旧史法立论，不敢讲新史学之义例也”。他认为：“今所当辨，惟在义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春秋所重，君臣夷夏，晚近争端，莫剧乎是。”该文分“本纪商例”、“诸表商例”、“诸志商例”、“诸传商例”四部分，有的还拟定了目录。柳氏特别指出修清史不能曲笔，因为“苟与清朝，甘从曲笔，凡今邻敌，殊不可从。英俄异族，日且同文，肤色不 殊，觊觎正亟。往车虽折，来轸方遒。保此华夏，文史系赖”。

附录“修史私议”，针对当时国史馆修历代通史和辑民国史的工作，提出看法。“今之倡议修改者，用意不出两途，一则以为君史，一则苦其繁重。夫学术思想，各有时代，由后责前，无异以耳消目”。由于政体更易，“不宜揿张帝王”是对的，但“法国学者必不读拿破仑之本纪，日本士夫率不谈德川氏之史册”，也就过当了。至于旧史书的“繁重”，“欲求简易，则坊肆教科，率仅数册，齐氏年表，鲍氏韵言，其为简括，尤便占诵”。但如果一定说“专家研阅，必如学童图陋，乃至广罗名宿，为此骈枝，则更不可解矣”。他也认为，史书的编撰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加以调

整，不必“默守旧例，缄秘实录”，则“前史根于帝王，故可专述一姓受命之基础；今史标举民主，则当历溯五族共和之渊源”。“历代旧史，不可轻改。今之史馆，宜以补刊正史，别修专史为职。补刊取其存古，专修取其通今。通史之例既定，民国史即踵之，事本一贯，不必强分畛域也。”“校勘考证，则属之本文；补撰表志，则增其篇第。”“至于别修专史，则宜事为一书。”“载籍极博，往事俱在，钩沉索隐，率可成书。是宜攟摭百氏，胪举万流，仿欧美之例，著专门之史。”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近世史料之一：1840 年之报纸》（第 2 卷第 1 期连载），何惟科《管老学说之比较》，弗尔格里夫著、胡焕庸节译《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第 2 卷第 2、3、5、6 期连载），《章太炎先生致柳教授书》等文。

《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4 期刊载短评《国际学术团体与吾国》。

作者指出 1921 年的国际美术史公会与维也纳东方古物展览会，都不曾有中国史家出席和阐扬中国文化，令友邦人士“兴吾国无人之叹”。作者认为“今后国际会集，必将频有，吾国殊宜多派学者参与，以与各国学者相联络。抑临事仓皇，委之政府，派遣往往不周，则根本之道，国中学者殊不能不亟起多组学会，以植实际之根基”，而“史学会可以发扬吾国之古文化，济世界学者之不及，实尤为切要之图也”。

胡适与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论中日史学。

胡适指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并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

王景濂、唐乃霈编《中华民国法统递嬗史》由无锡民视社出版。

9 月

26 日　梁启超开始撰写《大乘起信论考证》。

是月　《努力周报》增设《读书杂志》副刊，提倡整理国故。

吕澂译述《西洋美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

13 日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由国文系师生发起并组织。

国学研究会在成立初至 1923 年 1 月共邀请梁启超、柳诒徵、陈中凡、

江亢虎等人举办十次学术演讲（每周一次），1923年8月将十次演讲稿结集为《国学研究会讲演录》第一集出版。

22日　北京相关学术机构举行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欢迎会，梁启超参会并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演讲。

为欢迎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来华访问，地质调查所、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联合举办了此次欢迎会。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欢迎会上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参会，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

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31日　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开唯物史观课。

是月　胡适《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该书英文名为*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约九万字。日译本名叫《胡适の支那哲学论》，译者井出季和太，1925年由东京的岩松堂发行，1927年改由东京的大阪屋号书店发行。

译者在“例言”中说：“如原著之书名古代中国逻辑学之发展所示，著者也主要是力说逻辑的历史发展，对于一般哲学问题也是在论述其作为逻辑法研究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进行阐释。但实际上，原书的内容从古代中国各学派的史实考证开始，也很大程度涉及到一般哲学问题。因此本书便改名为《胡适の支那哲学论》。”对作者及原著，他评价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文学革命的提倡者，作者在西洋哲学方面是一个权威学者，同时汉学素养也颇有深造。其自身也通过本书的研究而对中国及我邦以往的学者所采取的陷入传统的主观偏见的资料审订和史实考证进行了客观的批判，从而完成了独创的体系。”“我国学者往往认为此书为比较年少

之作，或以为作者为中国人，对论文的内容未详加审定便产生轻视的倾向。这种卖弄学问的癖见是值得学界担忧的现象。要之，本书在近来盛行阐明古代中国文化及东西思想之比较研究中足以作为他山之石，故而加以介绍。”

蒙文通在《友声》双十增刊发表《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

据蒙文通自言，该文系应《友声》杂志约稿而写，但并未全部刊行。该书主要内容有《今学》、《古学》、《鲁学》、《齐学》、《晋学》、《王伯》、《诸子》等篇。此文是蒙氏在其师廖平说经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宏观性梳理的成果之一，在经学史领域有一定影响。该文中提出的一些论断也常为人引用，如：“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一部分是陈兰甫、桂文烁的余波，是主张汉宋兼治的，一部分是不辨别今古的，却还有乾嘉风流，这两派都是前时代的余韵，也不甚惹人注意。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的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他们的争议便占了汉学的大部分了。”

下旬，梁启超赴东南大学讲学。

梁启超计划每日下午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1 小时，此外安排各种讲演。后来因病计划未能完全实现。1923 年 1 月 15 日，梁启超离南京北返。

李泰棻编译《新著西洋近百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

10 日　梁启超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作《历史统计学》学术演讲。

梁氏认为，“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并指出“历史统计学”严格地说应该是“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此法“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梁氏指出，统计学的作用是要“观其大较”，而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共相’和‘共业’”，统计学这种“观其大较”的工作，实为“求共之绝妙法门”。演讲稿刊载于《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2 期。

此讲演产生很大影响，“历史统计学”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其后代表作有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朱君毅《中国历代名人年寿之统计研究》等。

15 日　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

蔡元培、朱希祖、蒋梦麟、胡适、马衡、叶瀚、杨栋林等以及史学系学生四十余人出席成立大会，由姚揖让报告筹备经过，韩树模为临时主席，蔡元培、朱希祖、叶瀚、杨栋林和学生王光玮、腾统昔发表演说。议定简章三条，选出委员十六人。

蔡元培强调现在“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

朱希祖则进一步阐明其改革课程的目的，“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现在我们研究史学，把普遍的连续的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共同方法，托付在讲堂上讲。至于分工的研究……特别研究，这种自动的研究，那就要靠诸君所组织的史学会了。”

杨栋林、叶瀚各自强调“史学研究法”和“集材料”的重要性。杨栋林指出新史学应社会科学化、社会学化、地方权化、数学化与平凡化。

北大史学会“以联络同志研究史学为宗旨”，研究科目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数种。史学会的主要功能是补课堂教学之不足，其活动内容是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演讲，参观考察，发刊杂志或各种单册著作及丛书。而实际运行中真正开展的主要是举行演讲活动，其他诸项则未能有效落实。如 1924 年初决议每年刊行《北京大学史学季刊》四期，“以中外史学及与史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历史的地理等为范围”，并开始组稿，但直到 1925 年 11 月仍未问世。

21 日　沈曾植病逝于上海，享年 73 岁。

24 日　陈中凡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作《秦汉间之儒术与儒教》的演讲。

是月　李泰棻《中国史纲》第 1 卷出版。

此卷为先秦史，由北京武学书馆出版。第 2 卷（秦至隋末）、第 3 卷（唐至清）分别于 1933 年、1932 年出版。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中国史学之起源》。

文章主要内容有“史字之本谊”、“有文字而后有史”、“再论书记官之史”、“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论历史之萌芽”等。此文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早期论著之一。

（俄）考茨基著、徐六几译《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

1926 年上海新闻社以《伦理与唯物史观》为名出版董亦湘的译本。

张廷休在《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1 期发表《欧洲大学起源考》。

12 月

7 日　柳诒徵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讲演《汉学与宋学》。

柳氏指出，重汉抑宋之见，当时普遍存在于读书人心中。他以为今日治学，不当再纠缠于“汉学”、“宋学”之辨，甚至建议废弃此等名词，而代之以文字学与伦理学的称谓，以彻底去除入主出奴之见。

8 日　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拟定由常乃悳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徐则陵起草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规定讲授历史的目的首先是“研究人类生活状况之变迁，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制御天然的能力”。课程内容以中外历史合编的专题形式呈现。“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状况，打破关于朝代国界的狭隘观念起见，初中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较分授之制为善。”

常乃悳在《新制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编制之一得》一文中解释合编的理由：一是历史的事实是互相联系的，二是中国历史在世界上自有其伟大的价值，三是现今讲授中外历史课时不免畸重畸轻。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指出：“文化起于人心与自然的环境及社会的环境之互感，其功力则出于观念之实现与开展。”“世界文化资料，可分为五类（宗教的、知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研究之途径有四（活动、状况、关系、组织）。”总括为“生活一体”。并强调：“本学程以说明世界文化之性质及现代文化问题为主旨。”“本学程以领会现代为归宿。”课程编排的原则是“宜用重要潮流，统率史事，无取乎博而寡要”，故亦采取中外合编方式的专史形式。此时中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完全遵循学制改革的精神，一方面仿效注重实用性的美式课程，另一方面则力求革新，改变清末以来中外分编、通史讲授的旧观。

北京政府 1923 年颁布了这两个纲要。

12 日　王国维致函马衡，请代为建议北京大学研究所设置满、

蒙、藏文讲座。

20 日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成立由张其昀、郑鹤声、王庸等 12 人构成的历史教学组。

22 日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成立史学组。

此组由陈训慈、刘掞黎等 15 人组成，研究范围“大致限于史学原理（如史之解释及历史哲学）以及史法考证等；于欧美学者及中国方面并加以研究”。

28 日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成立中国史组。

此组由张其昀等 20 人组成，“依国史性质，析为七门”，分别是种族门、社会门、政治门、经济门、宗教门、学术门、国际门，并将搜罗史料、编辑《中国史研究论文集》、“历史统计学之实习”、“民国史之整理”等列入工作计划。

是月　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作《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演。

梁氏在演讲中对自己的史学观念进行了修正，指出“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但是“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胡适在《努力周报》第 31 期发表《吴敬梓年谱》。

第 33、34、38、39、45、47、52 期连载。

王桐龄《儒墨之异同》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出版。

是年

夏，范文澜至南开大学任教。

范氏在教授国文的同时，继续深研国学。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反帝示威游行。1926 年在南开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秋，钱穆接到厦门集美学校之聘，结束小学教师生涯，开始八年的中学教读生涯。

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出版。

1923 年

※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
※ 王国维《观堂集林》20 卷印行。
※ 陈垣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
※ 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 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国学小丛书”。
※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出版。
※ 陈垣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
※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出版。

1 月

1 日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2 期发表《论臆造历史以教学者之弊》。

作者指出：“近年书坊有所谓新法历史教科书自习书者，专以引起读者之兴趣为主。虽能一洗从来教科书枯燥无味之弊，而任意傅会，又多溢出于事实之言。贻误学子，殊非浅鲜。”乃举数例，“以告世之留心教育及改革历史教学法者”。作者最后指出：“吾意历史教本，不妨采取演义之式，第须事事加以研究，语语都有来历，纵或加以波澜，要必不违本旨，方可为改良教育，刷新历史。”

同期还刊载了顾泰来《蓝盖氏论历史的政治价值》、徐则陵《学校设历史一科应以何者为目的》等文。

6 日　“朴社”成立。

本社由郑振铎、周予同、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谢六逸、沈雁冰、胡愈之、陈兼善、常乃悳等人发起。顾颉刚任会计。周予同为此社起名曰“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十分醉心于清代的“朴学”。后又陆续约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

耿济之、吴颂皋等人社。

9日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作《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

梁启超在演讲中指出："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于过去陈迹，以伪传伪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慎的态度，子（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梁启超认为这种工作虽然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而且"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的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都完全没有动手呢"。梁启超满怀希望地指出："我们现在作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

10日　顾颉刚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期发表《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

文曰："从前人对于国故，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现在我们就不然了。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

是月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

本刊由胡适主编，是专门登载"国学方面研究所得"的刊物。其编辑略例规定："主旨在于发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结果。""本季刊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相当之地位。"

胡适在代表国学门同仁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中简要总结盘点了自明末到当时的国学研究成果。他认为，成绩有三方面：一是整理古书，二是发现古书，三是发现古物。而其缺失也有三层表现：一是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是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有鉴于此，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途径：一是扩大研究的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可以说，此文是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系统阐述，实质上为国学门制定了一份"新国学的研究大纲"，进而对当时的国学研究的开展产生了重要指示作用。国学门的林语堂意识到，由此将"开新学界的一个新纪元"。他表示："我们有这些新的研究目标，新的考查问题，于是乎岌岌不可终日僵无生气的国学得了一大新运命新魄力，犹如久旱将干的溪壑忽得秋霖大雨，沛然而下莫之能御。"毛子水认为1923年以后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一点成绩，与胡适的这篇《发刊宣言》有一定关系。

来稿既有以现代学术撰写形式的论文，也有以传统“考”、“序”、“跋”与“书后”等形式发表的。这显示出学术转型期，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学术论著撰写方式同时并存的情形。除了在出版时将稿件一律加上新式标点，并以横行排印外；对于文字方面，也是不拘白话或文言的。虽然如此，《国学季刊》在形式上的这点“小小的革命”，已使许多人感到震惊，认为大学中讨论国学的刊物，竟以如此“蛮夷的”形式出现。从分类上看，语言文字学是《国学季刊》上最热门的一个研究课题。

《国学季刊》自 1923 年 1 月创刊至 1952 年 12 月停刊，历经 20 余年。期间曾因政局动荡和学校行政中断而被迫停刊。1923 至 1927 年间，《国学季刊》总共只出了五期。除 1923 年共出四期以外，其后就仅在 1925 年 12 月能再出一期，脱期情况相当严重。

本刊一直被中外学界视为研究中国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如胡适所说，在《国学季刊》的全盛时期，它对中国知识界是有极大影响的。

创刊号刊载了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朱希祖《萧梁旧史考》（第 2 号连载）、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第 2 号连载）、王国维《五代监本考》及罗福苌《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等文。

《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刊载袁复礼撰写的考古消息报道《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

文章介绍瑞典人安特生几年前在河南的考古发现。1921 年，安特生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支持下，在河南从事考古发掘，在渑池发现了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当时袁复礼担任安特生的助手。1922 年 3 月，安特生在北京协和医院作公开演讲，以“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为题，首次把这次发现的成绩对外公布。胡适听后意识到这次发现的重要性，当即请安特生为《国学季刊》撰文说明这次发掘的原委。安特生乃转托袁复礼写一简短介绍。袁氏在这篇报道中，将安特生的发掘工作，称为“从地质方面去研究文化史”，这其实就是西方考古学范围内的工作；而袁氏此文，则是把西方学者在中国境内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学术期刊上第一次公开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4 期转载此文。

《国学季刊》第 1 卷第 1 号刊载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

此为 1911 年伯希和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史学讲座时的讲演词。1919 年 9 月翻译此文的王国维认为是篇“实举近年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

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

伯氏明确指出由于古物学和古语学的复兴，改变了此前考中亚史事仅据典籍的状况，因而取得长足进展。胡适称赞“此文甚好”，并为之加上标点。

陈垣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发表《火祆教入中国考》。

文章共十二章，对火祆教传入中国，及在中国的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分析了唐代统治者尊崇火祆教的原因和前人多将火祆教与其他古教相混同的情况”。

此后又于1923年3月、1934年10月两次修订。

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

2月

2日　李大钊在湖北高等师范作《进步的历史观》的系列演讲，至4日结束，共三次。

9日　钱玄同致函顾颉刚，讨论群经辨伪问题。

自名“疑古玄同”的钱玄同强调“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

顾氏在同月25日的回信中指出，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以前的历史是永远讲不好的。

14日　科玄论战发生。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演讲，题为《人生观》，并在《清华周刊》第272期发表，宣扬“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孔孟思想、宋明理学，由此引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中形成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论战后期，陈独秀、瞿秋白等以“唯物史观派”参战，主要支持“科学派”。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科学是否要为欧战负责，以及科学能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等议题。

由此而衍生出汉宋之学的优劣的论题。面对丁文江的“痛诋宋学”，张君劢疾呼“宋明理学有昌明之必要”。“当此人欲横流之际”，欲正“人心风俗”，“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张东荪同情张君劢提倡宋学的主张，反对把“科学”和“考据”相提并论，否认汉学家的考据即是科学方法之说。对于丁文江称张君劢是西洋玄学鬼投入中国的宋学而作的“借尸还魂”，张东荪反讥其是把科学投入汉学，“做一个同样的借尸还魂”。

论战中玄学派力言宋明理学之长，引起了科学派的反击。汉宋之学的优劣问题被卷进东西方文化论战之中，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1928年，胡适将科玄论战视为清代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最近的一幕，是“拥护理学与排斥理学”的一段历史。这意味着晚清以来渐趋平息的汉宋问题再起波澜。

是月　申报馆主编《最近之五十年》大型纪念册出版。

《申报》为纪念发行五十周年，敦请国内名家对五十年（至1922年）来中国及世界的变化进行总结，并请张謇、章炳麟等为之序言。

该书分为“五十年来之世界”、“五十年来之中国”、“五十年来之新闻业”三部分。“五十年来之世界”收录徐则陵《五十年来世界进化概论》、《五十年来世界大事表》，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张嘉森《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任鸿隽《五十年来之世界科学》、华封老人《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等文。“五十年来之中国”收录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蒋方震《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等文。

此纪念册出版后成为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新闻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叶恭绰编著《五十年来中国之交通》由上海申报馆出版。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发表《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

3月

1日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发表《正史之史料》。

他对于当时盛行的疑古风气颇持异议，对其时的将古书一概抹杀的趋向表示了不满，他说：“今人读古史动辄怀疑，以为此为某某作伪，此为某某增窜，嚣然以求真号于众；不知古人以信为鹄，初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世。若谓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意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其小有出入，乃一时之疏，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人，不得执一以疑百。”

同期还刊载了张星烺《〈中国历史研究法〉纠谬》等文。

叔谅(陈训慈) 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发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

作者就中国历史学、地理学的发展前景着眼，提出："盖斯两学者，所包泰广，而整理阐发之业，尤非个人所能为力。必也共谋联结，倡导风气，分工合力，协志以赴；而掘地调查之业，尤必须联合统筹，非闭户独行者所可济事。盖联络共进在吾国之史学地学，其需要为尤急也。"

作者认为，西方史学向来落后于中国，但近数十年来却凌驾于中国之上，根源在于西方学者成立了学术研究团体，开展了史学运动。当时中国并非没有学会，如亚洲学术研究会、学术研究会、丙辰学社、尚志学会、中国地学会等，但专门的史学研究会却尚阙如。"若勉求其他从事史地研究之结合，则有北高之史地学会与南高之史地研究会，然此皆学生课余之团结，限于学校一部，审慎名义，殊未敢自侪于专门之学会。"史学会可开展的事业有：古史之开拓，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发见，多赖掘地事业之发达；旧史之全盘整理；近代史料之搜集；地方史迹之保存；历史博物馆之建设；学校历史教学之统筹改造，并进谋历史常识之普及。

而"根本之图，尤当注意人才之培养"。当时中国学界专门的史地学者"自若干耆宿以外，新进中实不多觏"，且"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为此，陈训慈建议，此后高等院校的史地二系都应扩充，留学国外的也应有人专修这两科；对于有志于专攻的青年学者，更应当设法补助他们的经济，使得他们不至于为稻粱谋，可以毕生研究；长此以往，专门人才增多，大规模的史学运动遂可全方位铺开。

11日　丁文江在《努力周报》第43期发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第44期连载。作者认为"历史同地理的关系，是近代科学上最有兴味的问题，也是最没有解决的问题"。作者计划"把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人物，照他们的籍贯，做一个统计，看看一个史地之中国，那一个地方的人，在政治上社会上，最有势力，最有影响"。此文就是这个计划的初步尝试，将西汉、东汉、唐、北宋、南宋、明六个时代正史有列传的人，按照省籍进行统计，并对统计显示的现象进行了分析。

胡适在此文前加注，称"丁君此种研究的结果，已屡见人征引；但丁君原作对于自己的方法，颇下严厉的批评，其防弊之意甚深"。1928年，傅斯年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期发表《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称"这篇文章我非常地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我信这篇文章实在很有刺激性"，这些研究"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地弄过的些新观点、新方

术，去研究中国历史”，但“这篇文章的功绩，在此时却只是限于这个胎形，看来像是有后文，我们却不能承认其中证求得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傅氏对此文提出了商榷，尤其是认为拿现在的省区划分去分割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存在问题，事实和表格中的数字多无直接的联系等。傅氏最后指出，“把统计方法应用在历史一类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细”。

是月　王国维《观堂集林》20 卷由蒋汝藻校印行世。

1921 年 5 月 22 日，王国维写定这数年来所为文字刊于《学术丛编》及旧作之刊于雪堂、广仓二丛刊者，删繁撷华，为艺林八卷、史林十卷、缀林二卷，名曰《观堂集林》。1922 年，友人乌程蒋汝藻出资以仿聚珍板印行。赵万里说：“先生之辑《集林》也，去取至严，凡一切酬应之作，及少作之无关弘旨者，悉淘去不存。旧作如《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亦只存一部分而已。”

蒋汝藻序云：“窃谓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博者也。君新得之多，因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王国维年谱长编》谓为王国维代撰）

罗振玉为之序，略述王国维前半期治学演变的经过及其成就。序文说：“余交君二十有六年，于君学问之变化知之为最深。光绪戊戌始与君相见于上海，时余年三十有三，君二十有二，君方治东西文字，继又治泰西哲学，逮岁丁未，君有《静庵文集》之刻。戊申以后，与君同客京师，君又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时则有《曲录》之刻，而《宋元戏曲史》亦属草于此时，然君治哲学，未尝溺新说而废旧闻，其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姑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甲寅，君与余共考释流沙坠简，余考殷虚文字亦颇采君说。丙辰之春，君自日本归上海。为英伦哈同氏编《学术丛刊》杂志，君之撰述乃益富。丁巳，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

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

今所传《遗书》本《集林》，乃王氏去世后，门人赵万里遵其临终前手定篇目，增辑而成。自辛亥东渡以后十数年间攻治古文字音韵、古史地，及版本目录诸学的主要成果，毕萃于此。故郭沫若谓此书乃王氏一生“学业的结晶”。

国学研究会主办《国学丛刊》创刊。

该刊由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国学研究会主办，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内容方面“凡关于国学论著，如通论、专著、诗文等不拘篇幅长短，不背本刊之宗旨者，皆可登载”。《国学论丛》还计划“陆续发刊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

创刊号刊载陈中凡《论读古书之旨趣》、《秦汉经师之方士化》、《〈诗经〉毛传改字释例》、《明儒》，顾实《周季文史之分途及文学之派别》、《秦汉烧书校书两大案平议》、《老子〈道德经〉解诂》，刘师培遗著《西汉周官师说考》，易培基《〈楚辞〉校补》，范希曾《屈子生卒年月及流放地考》，章太炎《散氏盘释文》等文。

4月

16日　逊帝溥仪下旨让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

是月　陈垣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

此文主要依据基督教史传中反对摩尼的言论、敦煌出土经卷及汉文材料，考察了摩尼教在中国的流传盛衰及演变过程。

刘铭恕《书〈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后》云：“摩尼教输入中国一事，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有甚重要之地位。”“从事于此事之研究者，颇不乏人。如蒋伯斧、伯希和、王国维与陈援庵等，皆著者也。”“具体之解决者，只有陈援庵一人。陈氏《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折衷旧说，附益新知，体大思精，得未曾有。”

1923年9月、1924年10月又做过两次校订。又校录京师图书馆及伦敦博物馆、法国图书馆所藏敦煌莫高窟摩尼教经残卷两种，作为本文附录。

胡适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作者认为崔述“以经证史”的治学方法和怀疑的治学精神是史学进入科学时代的法宝，所以“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并认为“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

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决定撰写此文绍介崔述。文章分为“家世”、“年谱”等。“年谱”只截止到乾隆四年，后因胡适兴趣变换及《国学季刊》停刊，该年谱未有续载（1931年赵贞信续写了后半部）。

同期还刊登了顾颉刚的《郑樵传》。

梁启超在《史地丛刊》第2卷第2、3期合刊发表《中华民族之成分》。

此文系1922年春夏间在清华和高师两校所作《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的演讲稿，通过对上古史的考察，梁氏认为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我中华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揆度情理，恐各由小部落崛起，彼此并无何等系属。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的根据地”；“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

俞平伯《红楼梦辨》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此书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主要有“论续书的不可能”、“原本回目只有八十回”、“高鹗续书的依据”、“后四十回的批评”、“红楼梦的风格”、“红楼梦的年表”、“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等。书前有顾颉刚序言及作者的引言。

此书是在作者与顾颉刚、胡适等人通信讨论及交换材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是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的又一“新红学”代表作，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胡适的观点，即《红楼梦》一书是作者的自传，还将红楼梦研究引入文学批评的领域。

1951年，作者将此书修订后题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引起对胡适的大批判。

于炳祥在《史地丛刊》第2卷第2、3期合刊发表《读〈新史学〉》。

这篇文字全面解读鲁宾逊的《新史学》。全文分序言、历史的意义性质和范围、历史的功用、新史学上急进的精神、新史学上对于过去历史的史识、结论八部分，论述了《新史学》各章节的思想要点。作者认为近代西方史学能摆脱文学、宗教、政治、爱国主义的支配，还它本来面目，是本着新史学精神去运动的结果，然返观我国史学界，“求一有系统、有组织、利用新眼光亦驾驭旧材料者，不可多得”，所以他“一面羡西史精神

之日进，一面叹中国历史界之无进步”。

5月

1日　徐则陵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4期发表《高级中学世界文化史纲要》。

文章对高中世界文化史的授课时间及学分、“治文化史者应具之概念”、“教学上应注意之点”、“学程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同期还发表了巴纳著、王庸译《社会学与史学之关系》，赫尔著、陈训慈摘译《历史之价值》，密尔著、张其昀述意《方志之价值》，Cowey著、向达译《赫台民族（The Hittites）考》，赵祥瑗《片马问题研究》等文。

5日　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

该会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组织，共200余人参加了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上不仅讲述了马克思的生平事略，而且还举办了相关演讲，如李汉俊的“唯物史观”、邝摩汉的“阶级斗争”、卜士畸的“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

6日　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文云：“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首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颉刚这一观点发表后，迅速引起了轰动。6月10日，《读书杂志》第10期发表了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谓顾颉刚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随后傅斯年也致信顾颉刚，认为“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傅斯年还认为，顾颉刚把“这个宝贝弄到手”，“是在史学上称王了”。钱穆1936年在《崔东壁遗书序》中表示：

"《古史辨》不胫走天下，疑禹为虫，信与不信，交相传述，三君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之人几于无不知三君名。"

"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这一史学认识论虽然存在搁置或消解历史本体的缺憾，但提供了一种"古史知识"的观念，即部分解答了"中国古史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胡绳认为这一观点不仅针对古史，而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是个卓识。这个观点不仅对古史，……我看甚至在当代史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好，也许会形成越是后来的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描述得越具体、越生动，但越来越多地掺入附会的、出于想象的甚至编造的材料。"

8 日　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开始招生。

在冯玉祥支持下，河南省议会 1921 年决议将 1912 年 4 月成立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该校是当时长江以北第三所以大学为名之高等学校。该校初设文理两科，冯友兰任文科主任。1927 年 6 月，中州大学合并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成为国立中山大学，7 月更名为河南中山大学，并于同年 8 月增设历史系，1930 年 9 月 7 日，该校改称省立河南大学。民国时期，冯友兰、郭绍虞、董作宾、刘盼遂、高亨、缪钺、蒙文通、嵇文甫、姜亮夫、萧一山、杨鸿烈、范文澜、姚从吾、赵俪生等先后任教于此，尹达、邓拓、白寿彝、姚雪垠等先后就读于此。

11 日　梁启超在《清华周刊》总 281 号《书报介绍》副刊第 3 期发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该文是应《清华周刊》要求而撰，内容包括"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所列书籍约 160 种。梁氏不赞同胡适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故此文立义不同，梁氏称青年学生"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该文后附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梁启超的《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该文又刊登在 6 月 14—23 日的《晨报副刊》。

15 日　胡适致信郭沫若、郁达夫，劝其不要攻击考据学。

胡适致信郭沫若、郁达夫，请他们不要因为自己规劝郁达夫译书要慎重，并且不要"破口骂人"而迁怒到考据学上。胡适指出，"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胡适认为考据学"是一种公开的学

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郁达夫的回信表示，“我们本来对你没有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

24日　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

调查会由马衡担任会长。计划先自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待经费落实，再组织发掘团。

该会章程不仅要求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人才通力合作，还规定可在不以输出发掘物品为条件的前提下接受外国财团与私人捐款，以及与外国发掘财团交换物品。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推出“国学小丛书”。

此丛书是商务印书馆三套著名国学丛书中首先印行的，系王云五在胡适的计划上提出并主持的。全套丛书涉及总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艺术、文学、史地等多个门类，共收录书籍212种，至1948年8月才停止印行，对民国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丛书所收书籍撰稿人大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故学术水平较高，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谢无量《诗经研究》（1923年5月）、《楚辞新论》（1923年5月）、《中国古田制考》（1932年12月）、《古代政治思想研究》（1923年6月），梁启超《陶渊明》（1923年9月）、《中国历史研究法》（1933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6年6月），钱穆《论语要略》（1925年12月）、《惠施公孙龙》（1931年8月），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2月）、《经子解题》（1926年4月）、《史通评》（1934年9月），周予同《经今古文学》（1926年2月）、《朱熹》（1929年10月），胡朴安《诗经学》（1928年3月），郎擎霄《孟子学案》（1928年3月），陈柱《周易论略》（1929年10月），贾丰臻《宋学》（1929年10月），钱基博《周易解题及其读法》（1931年11月）、《四书解题及其读法》（1934年1月）、《读庄子天下篇疏记》（1933年4月），罗根泽《孟子评传》（1932年11月），蒙文通《诗经抉原》（1933年2月），吴梅《辽金元文学史》（1934年3月），柯敦伯《宋文学史》（1934年4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6年7月）等。

丛书同时还收有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如（日）宇野哲人著、陈彬龢译的《孔子》（1926年8月），（日）儿岛献吉郎著、陈清泉、隋树森译《诸子百家考》（1933年7月）、《毛诗楚辞考》（1936年2月），（日）本田成之著、陈清泉译的《经学史论》（1934年5月），（日）青木

正儿著、郭虚中、江侠庵译《南北戏曲源流考》（1938 年 10 月），（日）三上义夫著、林科棠译《中国算学之特色》（1933 年 3 月）等。

“古物研究社”成立。

由丁文江、张元济、罗振玉等发起，以“发掘搜集并研究中国之古物为宗旨”。

6 月

1 日　顾颉刚决定响应胡适“重提《尚书》的公案”的号召。

5 月 30 日，胡适致信顾颉刚，认为“关于古史，最要紧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顾颉刚在今日所做的回信中表明“这事我颇想做”，并简单向胡适报告了已简单将《尚书》各篇分类。

是月　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其中收录的太平天国幼学读本《三字经》，乃是从日本学者稻叶岩志的《清朝全史》迻录，其底本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25 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日本《史林》杂志发表《大英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国史料》一文，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对海外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的注意。嗣后，一些中国学者陆续前往抄录或摄影回国。

胡朴安编著《中华全国风俗志》由上海广益书局出版。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风俗志著作，古代材料多取自方志，近代材料多取自报刊、笔记等，资料丰富、条理清晰、翻检方便，是中国民俗研究入门的资料性书籍。该书 1978 年后曾由多家出版社翻印，1988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中华风俗志》。

李法章著《太平天国志》由常州华新书社出版。

7 月

1 日　《读书杂志》第 11 期刊载刘掞藜、胡堇人二人文章，引发“疑古”与“信古”的论战。

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一文中认为：“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刘逐一反驳顾颉刚的几个观点：（1）“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2）西周时，在禹之前还没有黄帝、尧、舜。（3）“‘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4）“至于禹从何来？禹与夏

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

胡堇人在《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后》一文中认为：“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以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其根据是：第一，“古史官是世传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容易把史料保存。就是突遭兵火，他们因职务上关系，不能不尽法搜辑。况列国有史官，一国失传，还有别国可以参互考订，决不能各国同时间对于另时代造出一色的假货。”第二，“古人一命以上每每铸造重器，各有款识，流传下来，恰是考古的好资料，所以历代学者多很注意。春秋时代那虞夏彝器当然还多。”第三，“天文家岁差之说创始唐一行，其理论则萌芽于晋虞喜，三国以前并没有一人知道。若依顾先生所说《尧典》是春秋以后造出的伪作的，那么何以《尧典》的天象和春秋时代不同而又暗合岁差的公例呢?”刘、胡二人的见解基本上是针对《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的具体论点在细节上加以反驳。

顾颉刚同期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先说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并未全面充分地论述出他的观点：“我本来的意思，是要先把与古史有关的书一部一部的读了，把内中说及古史的地方抄出归纳成为一篇‘某书中的古史’；等到用得着的书都读完了，它们说着的古史都抽出了，再依了它们的先后关系，分别其真伪异同，看出传说中对于古史的变迁，汇成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答书”认为，“研究古史自应分析出信史和非信史两部分”。信史的建设方面，顾颉刚引用了胡适给他的一封信，来作为“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非信史的推翻即判明古史是否可信方面，他提出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刘掞藜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5期发表《史法通论》。

第6期连载。作者认为“史也者，所记人或人类活动——思想言辞行事——之迹也”，就空间言之，其种类有“世界史、一洲史、一国史、一省一乡史、一家史、一人之史”等，就事实上言之，有政治史、文明史等，“史类之多如此，然史法实为一”，乃以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为基础，“旁及他书，插以己意”，撰成此文，探讨了“史学”、“史识”、“史体”、“通史”、“史限”等内容。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婆罗门述》、全文晟《周代商业及交通》、郑鹤声《司马迁之史学》（第6期连载）等文。

是月　商承祚编纂《殷虚文字类编》8 册由决定不移轩刊刻。

此书共收单字 1575 个，《整编》790 字，每字均注明出处，《待问编》785 字，为未能确识之字，另附《通检》。此书是《簠室殷契类编》之后"一部比较实用的甲骨文字字典"。

王国维《〈殷墟文字类编〉序》认为"其所自释者亦十之一二，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此书"可以传世矣"。

8 月

1 日　《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6 期发表（俄）A. Presniakov 著、向达译《俄国革命史时历史研究之状况》。

5 日　《读书杂志》第 12 期刊载有关"疑古"与"信古"的文章，推动论战进一步发展。

8 月 5 日，钱玄同于《读书杂志》第 12 期发表《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云："看了胡刘二君的文章而联想到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三件应该首先知道的事"：(1)"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前人辨订伪书伪物，有许多已有定论的，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一则可以免被伪书伪物所欺，二则也可以省却自己辨订的工夫"。(2) 要敢于"疑古"。(3)"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他觉得胡、刘二人的文章中很有"信经"的色彩，因此联想到现在治古史的人仍旧不脱两千年来"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认为经是最可信的史料，这是不正确的。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连载于《读书杂志》第 12—16 期，对其"层累"说涉及的具体问题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并补充修正以前的一些观点。文章分为六部分：(1) 禹是否有天神性？(2) 禹与夏有没有关系？(3) 禹的来源在何处？(4) 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5) 后稷的实在怎样？(6) 文王是纣臣吗？顾氏此文长达三万字左右，是在古史辩论过程中，阐述他对自己的疑古学说中的各个问题的观点与见解的最全面的论文之一，文中的基本观点，讨论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对一系列关于古史问题的结论、推测与假定，都对当时及后世研究古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9 月 20 日，刘掞藜从《读书杂志》第 13 期起连续四期发表《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认为"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刘表示基本赞同顾颉刚的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中的两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反对另外两项，即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和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刘氏还就

钱玄同对他很有“信经”的色彩的批评进行反驳：“我对于经书或任何子书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闭着眼睛，一笔抹杀；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经过严密的考量映证，不可信的便不信了。但不能因一事不可信，便随便说他事俱不可信；因一书一篇不可信，便随便说他书他篇皆不可信。”

8日　胡朴安在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第14期发表《论今人治学之弊》。

胡氏在文中指出：“今之学者，新旧互相攻击，夫攻击非治学之弊，攻击之结果，恒有以策学问之进步……今之互相攻击者，不仅不见进步，且日见退步，于是知其相攻击也，非以诚恳之心，研究学问，徒以利禄之心，标榜声名，相当之战守器具，皆所不问，惟日以攻击为事，此真治学之弊也。”

他进而批评道：“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骄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

是月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922年5月4日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四次“五四演讲”，题目是《先秦政治思想》。10月下旬，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系列演讲，但汉以后阙如。讲义一部分内容《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在《晨报》12月12—20日连载，后整理为此书。

梁氏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根源为先秦哲学思想，然后从先秦诸子中提出儒、道、墨、法四家，以为先秦诸子的菁华尽在于此。也因此虽然以政治思想为书名，内容上则如梁氏所说，政治思想仍然以哲学思想为根基。梁氏对儒、道、墨、法四家，加以扼要的编列，并提出其个人的见解。

他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归功于西方学理的启发。他认为：“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

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

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出版“小学专号”。

此期专号刊载了顾实《六书解诂及释例》，陈旦《清儒治文字学之派别及其方法述略》，张世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陈中凡《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中国文字学上之原始宗教考》、《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起原考》，顾实《华夏考原》、《“结绳而治”时代之文书》等文。

陈寅恪在《学衡》第20期发表《致妹书》。

信中说：“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

罗振玉等在天津组织东方学会。

发起者为王秉恩、柯劭忞、陈三立、辜鸿铭、叶尔恺、郑孝胥、朱祖谋、陶葆廉、李孺、章钰、宝熙、王季烈、徐乃昌、陈曾矩、陈毅、金梁、刘承干、王国维、罗振玉等。

该会目的是要改变“中国兴学以来，数十年的光明，大半花掉在‘保存国粹’和‘贩卖洋货’两种工作上面”的状况，“努力脱离过渡的时期，赶上创造的领域去”。

洪业从美国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兼历史系代理主任。

洪业讲授几门历史与宗教课程，其中最主要的一门是“历史方法”。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桑西门的历史观》。

8 月

安特生在青海省贵德县和西宁市的罗汉堂、朱家寨、卡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至10月结束。

9 月

1日　夏光南编纂、王桐龄校注《云南文化史》由云南崇文印书

馆印行。

该书将云南文化分为第一编绪论，第二编古代史，第三编中古史，第四编近代史，第五遍近世史，一直叙至袁世凯取消帝制。该书依据实地古迹名胜的考察，参以当地父老流传的口碑与正史、野史、县志与近人笔记的资料。内容主要分文化史、政治史两部分，文化方面注重种族迁移、同化、学术思想的传播、生活方法、风俗习惯等；政治方面记述历史上本省重大政治变革、各代殖民政策的因革、对于世界各国的关系等。

15 日 《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

章炳麟任社长，汪东任编辑。章炳麟撰《发刊词》云，《华国》月刊“志在甄明学术，发扬国光，选材则慎，而体例至宽，举凡《七略》所录，分科所肄，以及艺术之微，稗官之说，靡不兼收并容”。章氏说，“学术之陵替，尤莫甚于今日”，若“国粹沦亡，国于何有”？

创刊号刊载孙世扬《国学通论》、章炳麟《新出三体石经考》（第 2—4 期连载）、汪荣宝《释皇》等文。

是月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 4 册，由绪论和五编构成，每编又分若干章，详叙自远古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全书依据社会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道光时期西人东来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以社会进化的观点区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有别于传统史书。

吕思勉说，这部通史有四个特点：一、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二、着重开示研究历史的门径和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还提示前人重要的研究成就。三、切实指示进一步阅读历史书的门径，引据的书和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次。四、着重讲究条理系统，注意社会历史变迁进化方面的论述。其《序例》说明吕思勉编写这部通史的目的，是“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所以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所引资料都注明篇名卷第，于是“这一部分书虽不过三十多万言，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

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但《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显示出其史料观尚有陈旧之处。

《白话本国史》是我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同时又是一

部史学普及读物。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论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蔡尚思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说，"吕先生是中国通史的正式开山者"，"是近现代编著《中国通史》者的先锋。其余的几部《中国通史》都是在他之后的。吕先生被人们一致称赞为中国通史的权威学者"。

此书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 1933 年至 1935 年间就重版了 4 次。

胡适撰《中古文学概论序》，批评旧史学。

其中表明对旧史学的态度："做通史的人，于每一个时代，记载几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动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例如记五代十国的时代，史家只叫我们记着那许多无谓的梁唐晋汉周，和高祖、庄宗、世宗……和荆南、吴越、南唐……等等。但我们今日若作一部'新新五代史'，我们就应该知道，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镠在浙江兴的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版的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记载桑维翰的大话，不如研究李煜、冯延巳一班人的小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里，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室里，前不多年，忽然发现韦庄详记北方饥荒的一首白话长诗，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史料来，什么谨严的史传，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的了。"

孙德谦在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孙益庵论学三书》。

作者批评王国维以先秦诸子附会欧美思想以及用遗书取代正史的做法，并指摘其"睹一古器，获一旧拓，详加考订，弟总嫌其穿凿而无关宏谊，有时独标新解，如释史籀二字，不作字体说，人且据之以推翻许叔重矣。为学而不守亭林'信古阙疑'之旨，一任我之颠倒失实，于人心风俗，亦大有关系"。

同期还刊载了吴梅《南北戏曲概言》、陈中凡《周代南北文学之比

较》、章太炎《论魏正始三体石经书》等文。

张荫麟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之质疑》。

张氏对梁启超考证《老子》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驳斥。梁启超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张荫麟自此一举成名。

据贺麟回忆，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曾当众回答张荫麟私函中的某个质问，又《学衡》杂志编者误以张为清华教授。

王倬《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六万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有“中国”、“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就中国交通史研究而言，应为目前所见的最早论作。

10月

5日　梁启超在《清华周刊》总288号《书报介绍》副刊第5期开始发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在此期的文章名为《读书法和群书概要》，从第6期开始改名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第7—9期连载。

10日　胡朴安在上海《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发表《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

作者肯定清季的学人及学术：“中国国学，至清乾嘉时而极盛，道咸以后，迄于光宣之际，日即衰微矣。然而未尝绝也。其矫矫可数者，瑞安孙氏诒让仲容，德清俞氏樾曲园，寻江戴之坠绪，群经而外，兼及诸子，参互钩稽，时有精言。四川廖氏平季平，广东康氏有为更生，沿刘庄之辙迹，变而加厉，掊击东汉，独尊西京，罢黜百家，独尊公羊，大同三世之说，比附礼运，先进后进之说，比附论语，时多怪诞之言，好为新奇之论，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虽非通才，足树一帜。长沙王氏先谦益吾，搜讨颇勤，见闻亦富，注史笺子，简明有法，最便初学。湘潭王氏闿运壬秋，文笔健洁，纪湘军尤可观，诗亦优长，惜无独到，所注墨子，浅陋无足论已。吴县吴氏大澂清卿，奔走潘氏之门，颇见三代之器，耳目既广，知识遂多，校其文字，为之排比，虽鲜发明，可资参考。上虞罗氏振玉叔蕴，海宁王氏国维静安，获殷墟文字，识其音义，证之许书，发千古未有之奇，校六书违背之旨，骨甲出土，有造于罗王二氏多也。杭州张氏

尔田孟劬，孙氏德谦益安，守实斋之成法，兼治史子，亦可以观。长沙叶氏德辉、吴县曹氏元弼，一则杂不名家，一则拘未宏览，要之一时之好，有足多者。其他诗文词曲卓然成家者，颇亦有之，不悉举也。"

不过，"兹数先生，虽为足当启发学术之任，亦可谓翘然异于众人矣。惟世界息息推移，学术亦时时递变，诸先生之学术，仅足结清室之终，未足开民国之始，其著作之精粹，可供吾人之诵读，其治学之方法，不能为吾人之楷式。虽诸先生在今日尚有存者，而于民国十二年之国学无与。"

15日　汪东在《华国》第1卷第2期发表《新文学商榷》。

针对当时学界"新旧两派的争执，往往各走极端"的情形，汪东批评道："讲学这件事，应当凭着商量的态度，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如果一个人能够新旧兼贯最好，不能便联络两派的学者，通力合作，重在互相引证发明，不要互相诋毁。至于辩论，自然是不可少的，却只要研究过的人，循持条理，破他自成，不要完全不懂的人，立在门外谩骂。"

16日　陈问涛在《学灯》第5卷第10册第16号发表《国学之"遗老化"》。

作者认为国学研究出现了一种"遗老化"的倾向，倘若这种倾向继续下去，"在国学的本身，一定要减损不少的价值；在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上，一定要生出不少的恶影响"，"国学的遗老化，真是现在学术思想上一件最可担忧的事"。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少年史地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书籍有徐寿龄编《法国革命史》（1924年11月），（美）房龙著、沈性仁译《人类的故事》（1925年10月），（美）达肯著、胡苏民译《世界的大河与文化》（1933年3月），何炳松编《秦始皇帝》（1933年4月），以及藤柱、顾德隆、高仲洽等人翻译的《日本小史》、《印度小史》、《加拿大小史》、《苏格兰小史》、《希腊小史》、《罗马小史》、《罗马社会史》、《法兰西小史》、《美利坚小史》、《埃及小史》、《爱尔兰小史》等。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刊载安特生著、袁复礼节译《中华远古之文化》。

本文是第一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进行系统和科学研究的论著。作者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提出了彩陶由西向东传

播的假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时代及金属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

11 月

1 日　缪凤林在《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7 期发表《历史之意义与研究》。

作者认为，史书与史有区别，“史之自体，即人类之活动”，“人类活动有多面，解释人类活动者亦有多说。各种史观之不同，即基于解释人类活动之歧异”；人类活动的之意义是“保生乐生之避苦求乐之需要”，历史之意义“亦不外乎是”；“史事皆属相关，无有孤立。研究历史，当探索其赓续蜕变之活动，而不能如自然科学家之任意分裂其研究之对象；由后知史事皆属唯一，无有重复。研究历史，当详考彼此相异之度，而不能如自然科学家之一味求同；研究人类赓续蜕变之活动，而求其相关相异，是曰研究历史”。缪凤林此处阐述的历史学观念，承接“新史学”运动中梁启超阐述的史学观念，而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主张有较大歧异。

同期还刊载了张其昀《地理学之新精神》、周悫《夏商二代学者考略》、全文晟《两汉对外政策》、束世澂《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等文。

《史地学报》第 2 卷第 7 期发表（美）李兰著、向达译《不鲁舍拉万国史学会第五次大会纪事》。

向达在“前识”中指出，此次大会虽以欧美为主干，但日本学者也有参加，关于中国史学之论文也不少，但是中国竟无一人参加，并认为一国万事颓坠，都不足悲，“唯学不如人，斯乃大耻，矧吾国有四千余年之文化，而史学之兴，又远在邃古，顾今乃忽不之重，不亦重可悲乎！吾兹愿吾国学人之有以自勉焉”。

15 日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2 卷第 1 号发表《孔道西的历史观》。

18 日　成仿吾在《创造周报》第 28 号发表《国学运动的我见》。

作者批评当时以考据为业的“学者名人”，不过“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想借用以显耀一时”；究其治学之“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

29 日　李大钊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研究历史的任务》。

李大钊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是月　孙德谦在《学衡》第 23 期发表《评今之治国学者》。

孙氏提出，凡有志于学者，应探索古书“义理”，而非以考据为“国学之止境”。文章驳斥持“汉学家言”者谓考据之学“合于科学方法”的论调，主要集矢于胡适《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

张尔田在《学衡》第 23 期发表《与王静安论今文学家书》。

作者认为“不通周秦诸子之学，不能治今文家言”。

张子高《科学发达略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是 1920 年张子高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讲稿，由周邦道记述。这是一部中国早期科学史的著作。1936 年出至第 9 版，影响较大。

陈中凡《古书读校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黄忏华《西洋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美）列德莱著，李季译、陶孟和校《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枕薪编译《俄国革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

1 日　梁启超在《晨报五周年纪年增刊》发表《〈清代通史〉序》和《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两文。

此两文与该月 2—4 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清初五大师学术梗概》都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相关内容。

5 日　顾颉刚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辑职务，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

21 日　陆懋德在《清华周刊》总 299 号发表《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

该文是陆懋德在清华华员公会上的演讲稿，陆懋德认为甲骨文的发现在学术研究上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订正文字，可以考订史事。

该文的最大价值是提出了“甲骨文”的概念，一般认为从此文发表以

后“甲骨文”成为通用的概念。

26日　顾颉刚在《歌谣》第39号发表《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

此为顾氏正式步入歌谣研究的开始。顾氏云：“老实说，我对于歌谣的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的研究歌谣是有所为而为的：我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部分确为民间流行的徒歌。……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

是月　陈垣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编。

后4卷发表于1927年12月《燕京学报》第2期，全本收入1934年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此为陈垣研究元史的代表作。该书考证元朝西域人学汉文化的情况，从大量的具体事实中说明西域人华化的程度，参考有关元朝民族、宗教的各种资料达210种，列举人物168人，各种事例不计其数，可谓史料繁富，考证精良。

这部杰作一问世，便赢得中外学人的赞誉。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陈寅恪为《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作序云：“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张相文认为《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搜罗宏富，抉择精详，于朝章国故，关系极巨”。

桑原骘藏称赞该书“资料丰富，考据精博”，“具有科学治史的方法”，并认为此书“征引考复，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非独为研究元代历史，即研究中国文化史者，亦有参考此论著之必要”。

《元西域人华化考》由美国学者钱星海和古德里译成英文并加注释，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华裔学志》专论第十五，于1966年在洛杉矶出版，“前言”中说他们译注的原因是“由于舆论界对这书所给予的高度评价”。

同期还刊载了容庚《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金文编序》，伊凤阁《西夏国书说》，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罗福苌译《巴黎图书

馆敦煌书目》等。

王国维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韦庄的〈秦妇吟〉》。

1923年，伯希和应罗振玉、王国维之要求，将敦煌文献中完整的韦庄《秦妇吟》卷文，寄给罗王二人。王氏此文即是对《秦妇吟》的简单校勘。此后，该文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有研究者专门撰写了《〈秦妇吟〉研究述略》，称“注家峰起，解者如云”，其中包括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家。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由中华书局出版。

1920年，萧一山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搜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1921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著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1922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著作”。1923年，三年级，“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及日本今西龙等为之序。

该书卷上六篇，从后金汗国成立与发展，到康雍时代武功与政教，包括清初学术思想。卷中五篇，从乾隆鼎盛及嘉庆乱事，到太平天国起灭与同治中兴，包括清代经济与社会状况（上）、汉学隆盛时清代学术。卷下五篇，从光绪时代朝政及外交失败，到辛亥革命运动酝酿及成功，包括清代经济与社会状况（下）、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全书有清代大事表、清帝爱新觉罗世系表、清代学者著述表、清代学者生卒年表、清代外交约章表、清代宰辅表、清代军机大臣表、清代督抚表等。该书于官爵、禄位、兵刑、选举、学校之制，多纳于表，卷首并详列大事。

《清代通史》体现出一种民族革命史观。其基本论断是：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该书颂扬民族革命，肯定太平天国、天地会等反清斗争，与《清史稿》的立论观点、体例形式形成鲜明对比。以至1933年吴宓公开批评《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

李大钊序曰：“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述的民国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愚故乐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中国各史之先声也。”梁启超序谓：“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1933年杨家骆最先

在《图书年鉴》推介此书。晚年又为萧著撰跋，概括定稿本诸特点甚详。其中解释其体例之善，谓其糅合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

1925年12月仍由中华书局续出中卷。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发行上卷，次年9月再出中卷。1930年又成《清代通史》下卷二册，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印行。三卷共约200万字。三四十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直至1963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面世，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北京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第5版。

该书存在一些错谬并引用传闻轶事而招致诟病，但就部头而言，此后的半个世纪还没有一部同类著作堪与比肩。

李大钊开始编印《史学思想史》讲义。

李大钊分别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等学校讲授了史学思想史课程。讲义由十个专题十篇文章组成，约六万余字，主要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一些欧洲思想家的历史观，同时也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的各种历史观与之作了初步比较。

讲义首篇《史观》于1923年12月8日送北京大学出版部讲义课印刷。其他各篇随讲随印，最后一篇于1924年7月2日印出。讲义收入了此前已公开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今与古》（1923年2月12日）、《桑西门的历史观》（1923年8月）、《孔道西的历史观》（1923年11月）四篇文章，另外《鲍丹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桑西门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六篇是1923年12月—1924年6月期间完成的。整个讲义在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出版过。

有学者或将《史学思想史》认定为“1920年北京大学讲义”，似乎欠妥。虽然讲义中有一篇发表于1920年，但是该讲义的印行却应在1923年12月20日至1924年7月2日之间。

白寿彝认为：“李大钊同志著《史学思想史》，这是属于史学史范围阐述历史观的第一部专著。”

东南大学在《国学丛刊》“史学专号”发布《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

此文由顾实起草，这是一份规模宏大的整理国故计划。内中提出：“以科学理董国故诚为今日之大利，而弊亦即可立见。盖今日学子之大患，

正在徒诵数册讲义、报章、杂志及奉某学术书为神圣，而未尝根本课读古书。即课读古书矣，亦以著有科学系统之色彩。狃于成见，信口开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镜，视中国所有，无一不可变为西式，是其弊也。”

他们主张“以国故理董国故”来弥补其不足。而“以国故整理国故”之法有三：疏证、校理、纂修。他们提出了一大批应该疏证的书目。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从学说、图谱、器物三方面，运用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思想学术、文学、诗词曲剧、美术、天文数学、法制、经济学、交通及国际交通、农商工业、哲学、教育、宗教风俗等历史现状。

同期还刊载了陈去病《明清最初交涉史》、胡韫玉《〈史记〉体例之商榷》、顾实《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日前之革命党》、柳弃疾《中华民国开国杰士传》、陈中凡《〈尚书·泰誓〉年月今古文异说考》、顾实《〈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等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由新潮社发行。

此为作者 1920—1924 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初版时由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改名《中国小说史略》。全书共 28 篇，叙述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始于神话与传说，迄于清末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描画出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数千年中国小说“进行的线索”，分析历代小说的思想、艺术，言简意赅，评断允当。该书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著作，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该书下册于 1924 年 6 月出版，1925 年 9 月稍加修改后由北新书局将上下册合为一册印行。1930 年又修订再版。

叶玉森在《学衡》第 24 期发表《殷契钩沉》。

叶氏将他人未释或以为他人误释的殷墟文字 131 条，广征铭辞经史进行考释或再释。1929 年出单印本。

范寿康、施存统等译述《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辑录当时《东方杂志》所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而成，包括范寿康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施存统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底位置》等。

东方杂志社编《中国社会文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收录稻叶君山《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中国社会之本质及其作用》、杜威《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易白沙《中国古代社会钩沉》四篇

论文。

高劳编著《辛亥革命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夏，李济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

其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部出版，系研究中国人类学的第一部著作。该书第二章由雷宝华翻译成《中国人种之构成》一文，发表于1925年《科学》月刊第9卷第11期。

陆懋德《周秦哲学史》由京华印书局印行。

陆氏有在美国习政法的知识背景，又专治儒道之学，1922年应北京清华学校之聘主讲中国哲学，1923年成此书。

陆著有与胡适对垒之意，从整体上对哲学史的意义、中国哲学的精神、先秦哲学的特点另立一说，对胡适书中的错误之处亦多有纠正。柳诒徵称此书“征引详赡，断制多当”。

肖静山《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由河北献县天主堂刊印。

此书全面考察了天主教传行中国的历史。其元、明、清部分引用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

1924 年

※ **北京学界举行“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
※ **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 **李大钊《史学要论》出版。**
※ **清华学校主办《清华学报》复刊。**
※ **（美）鲁宾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出版。**
※ **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编《孟姜女专号》，引起巨大反响。**

1 月

13 日　郭沫若在《创造周刊》第 36 号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

郭沫若不满于整理国故的盛行，他认为：“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息。”

他不赞同盲目反对整理国故的做法：“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只要研究者先有真实的内在的要求，那他的研究至少在他自己便是至善。我们不能因为有不真挚的研究者遂因而否认国学研究的全部，更不能于自我的要求以外求出别项的势力来禁止别人。”郭沫若表示，“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难解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代文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很必要的事情”。但“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他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

15 日　但焘在《华国》第 5 期发表《给事中制度论》。

作者在第 6 期又发表《御史制度论》，第 10 期又发表《乡官制度

论》。

25日　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1发号表《颜李学派与现代学术思潮》。

29日　北京学界在宣武门外安徽会馆举行“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会”。

由梁启超、胡适发起，出席者达三四百人。梁启超、胡适、沈兼士、朱希祖等各就戴震的学术思想发表演讲，戴震研究在北京学术界一时蔚为显学，掀起了一股热潮。北大国学门同人积极参与了这次纪念会，还特别把《国学季刊》第5期列为“戴东原专号”，胡适《戴东原的哲学》、魏建功《戴东原年谱》以及容肇祖《戴震说的理及求理的方法》，都是在此背景下写成的。

是月　陈衡哲《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下册1926年2月出版。本书以“‘文化的欧洲’及纯粹欧化的美洲为限”。供新学制高级中学使用，后多次再版。

胡适称此书“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胡适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作《再谈谈整理国故》演讲。

其中指出：“东大与北大，虽同为国立的，而在世界学术上尚无何等位置。要想能够有一种学术能与世界上学术上比较一下，惟有国学。”

2月

1日　郑鹤声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8期发表《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

作者不太认同梁启超所言清代史学著作寂寥的看法，认为清儒虽然“格于时势，惮为著述，因用其全力于旧史整理，以避其锋，披蓁斩棘，以启山林，遂开中国史界空前之大事业。盖史学之所贡于社会后世，固非一端。吾人享受其赐，乃得阶进而作更上层之整理，厥功伟矣”，但是清儒有关史学之“学说事业，亦颇散见于各人著述传记中”，乃“采各家言论，略加评论，庸为参证，以为治斯学者之一助”。文章分为“学说”、“事业”、“感言”三部分。另外，郑氏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4—5期

发表《清儒对于元史学之整理》。

同期还刊载了 G. P. Gooch 著、张廷休译《近五十年历史的讨源述略》，柳诒徵《大夏考》，陈兆馨《商尚质证》，刘掞黎《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邪真邪》，王焕镳《汉代讲五行者之异同》等文。

4 日　孙中山下令成立广东大学。

孙中山下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以邹鲁为筹备主任。在学科上，广东大学设立文、理、法、农四科（1925 年 7 月增医科），文科由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史学、哲学、教育五系，学生由原高师文史部和英文部转入。同年 11 月 11 日，广东大学成立典礼正式举行，邹鲁为校长，杨寿昌为文科学长，史学系主任未定。1926 年 6 月 19 日，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1926 年 3 月，郭沫若接任文科学长，1926 年冬，傅斯年受朱家骅之邀请，担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和中文、历史系主任。史学系课程除包括史学概论、东洋史、西洋史、中国史、中国法制史、中国经济史、中国财政史、近代政治史、近代外交史等通史和专史类型的科目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统计学、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所占的比例，几乎与史学本科的课程不相上下，体现了将史学导入社会科学的走向。

6 日　顾颉刚向丁文江请教“大禹治水”的真伪。

顾颉刚从胡适处听说地质学家丁文江不信“大禹治水”之说，乃致信丁文江，认为若能“从实地上证明治水之说的虚诞，于辨《禹贡》尤为重要”。丁文江在稍后的回信中指出，江河都是自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且《禹贡》中提到梁州贡铁，故是晚出的书。

10 日　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 3 号发表《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22 日　胡适在《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第 18 期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作者对《读书杂志》上的古史辩论进行总结评价。文章评价《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关于古史问题的讨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

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主义’。……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氏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和根本方法。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

胡适又对刘掞藜所说的对于古史的“察传”的态度和“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的方法提出疑问。“只希望他对他自己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只希望他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而不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

是月　吕思勉《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出版。

此书篇幅十一二万字，叙述自远古至20世纪20年代，是一部小型中国通史。因用作高级中学教材，曾广泛征求意见，各方都认为合适可用。教育部的核定批文云：“该书注重事实，少参议论，并于易启人之处，加以考证，颇能力矫近时新著随意采摭之弊。其叙次兼顾民族兴替，政治因革，社会变迁，思想表现诸方面，颇得要领。”直到1933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还印行了国难后第13版。

3月

2日　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

连载至6日。

是月　柳诒徵在《学衡》第27期发表《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

柳诒徵批评“国内学者及教育家纯然着眼国内，不敢一议及学术上对外之发展”，认为“吾国之人苟不自勉于传播文化，则彼我文化之交换终不易相得益彰”。柳诒徵将“今日治国学”者分为“求小学”、“搜罗金石”、“熟复目录”、“专攻考据”、“耽玩词章”、“标举掌故”六类，而“六者之中，各有新旧”，旧者“墨守陈法不善傅会”，新者提倡“科学之方法”，但柳诒徵认为要论中国文化，必须着眼于比较性地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异同，而中国文化“可持以西被者”和“在今日之世界具有研究之价值者”“惟在人伦道德”，其他如训诂考据金石之学皆为“附属物”。

顾康伯《中国文化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陈中凡在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第 2 卷第 1 期发表《老子学说略》。

4 月

1 日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 3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试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

柳文是针对顾颉刚 1923 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讨论古史的文章而发。柳氏认为顾以《说文》释"禹"为虫而未能依据《说文》的例。"今人喜以文字说史，远取甲骨鼎彝古文，近则秦篆，爬罗抉剔，时多新异可憙之谊。顾研究古代文字，虽亦考史之一途术，要当以史为本，不可专信文字，转举古今共信之史籍，一概抹煞。即以文字言，亦宜求造字之通例。""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不明《说文》之谊例，剌取一语，辄肆论断，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又说："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

此文刊出后，遭到顾颉刚与钱玄同、魏建功、容庚等人的激烈反击。1926 年 1 月 27 日，《国学门周刊》第 2 卷第 15、16 期合刊特辟"《说文》证史讨论号"，刊发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钱玄同（署名疑古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古史论战再起高潮。

同期还刊载了刘掞黎《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附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柳诒徵《拟编全史目录议——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研究组议案》，胡士莹《周代教育之研究》，周光倬、仇良虎《两汉太学学生考》等文。

陈训慈在《史地学报》第 3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史学蠡测》。

第 3、5 期连载。作者认为对欧美关于史学沿革得失的探讨情况不熟悉而空谈"整理国史"，恐将"志大而道拙"，故将"史学之要端，以及吾国与欧美史学之演进，作一最简略之叙述"。文章主要内容有字原、定义、综合史观与新史学、史之范围、史与人类之关系、史料之审别、史法之应用、史学是否一种科学、史学与其他学科、中国史学一瞥、西洋史学一瞥等。作者肯定了历史学的科学属性，认为史学研究如果"用审密之方法，广集古今之实证，则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至于"其名与科学与否，正复无关轻重"。陈训慈还认为，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

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

作者还认为：历史学科"有赖于其他学科之辅助，亦较其他学科为尤繁"；通史编纂与专史研究，二者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11日　曾鲲化自费印行《中国铁路史》。

18日　夏曾佑逝世，享年72岁。

5月

9日　《北京大学日刊》第1465号刊载姚士鳌（姚从吾）关于中国留德学生情况的汇报信。

信中介绍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如罗家伦、陈枢、俞大维、傅斯年等，称后二人"博通中西，识迈群流"，尤推崇陈寅恪，称其"能畅读英法德文，并通希伯来、拉丁、土耳其、西夏、蒙古、西藏、满洲"等十余种文字，"近专攻毗邻中国各民族之语言，尤致力于西藏文。印度古经典，中土未全译或未译者，西藏文多已译出。印度经典散亡，西洋学者治印度学者，多依据中国人之记载，实在重要部分，多存西藏文书中，就中关涉文学美术者亦甚多。陈君欲依据西人最近编著之西藏文书目录，从事翻译，此实学术界之伟业。陈先生志趣纯洁，强识多闻，他日之成就当不可限量也。又陈先生博学多识，于援庵先生所著之《元也里可温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祆教考》、张亮丞先生新译之《马可孛罗游记》均有极中肯之批评"。

19日　北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会更名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

到会的会员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韦奋鹰、容庚、马衡、徐炳昶、董作宾、李煜瀛、铎尔孟、陈垣等十二人。

会议决定更改会名为考古学会，修订后的简章规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为宗旨，强调"与国内外同志团体之互相联络"，特别捐款则不限于外国。

是月　李大钊《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六目，共四万余言，阐述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和作用，其中大量借鉴了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等的理论观点。

李大钊首先强调了"历史"和"历史记录"的不同。他指出，历史

“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而“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的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它们“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这就指明了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并将历史学和史料学区别开来。

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究一个个事实的真相，进而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寻求普遍理法”。李大钊云：“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许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以研究古今东西全般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正为史家的要务。”

陆侃如、杨鸿烈、卫聚贤、储皖峰、黄节等成立述学社，并出版《国学月刊》。

其《发刊引言》指出：“我们是极恨这种‘顽固的信古态度’及‘浅薄的媚古态度’的。我们宁可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

安特生、袁复礼及其助手开始在西北发掘多处遗址。

5 月在甘肃临洮调查发掘辛店遗址，后以此地命名此类文化。6 月在甘肃广河县调查发掘齐家坪遗址，后将此类文化命名为齐家文化。7 月又发掘了甘肃临洮寺洼山遗址、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青海民和县调查发掘马厂塬遗址、甘肃民勤县调查发掘沙井遗址等。

李泰棻编纂《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 月

5 日　王竟在《太平洋》第 4 卷第 7 号发表《郑玄著述考》。

25 日　梁启超在《东方杂志》第 12 号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第13、15—18号连载。此文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16章。

是月　清华学校主办《清华学报》复刊。

1915年12月，清华学校创办《清华学报》，以介绍欧美科技发展等重点，至1919年12月停刊，共出版5卷22期。此次复刊后，《清华学报》成为学术性刊物，并且重新编列卷期号。

在《编辑部启事》中，编者指出，"本报以研究学问为宗旨"；"文字横行，用新式标点，文体不拘文言白话"；"引用书籍，务必注明著者姓名，书名，卷数，页数，出版机关或地点，及出版年月"；"每学年出两期"。在《引言》中，编者提出"我们以为求学的态度，应以诚实两字为标准：第一，要存一个谦抑的心，然后实事求是，平心静气，来研究学问；第二，要有科学的精神，然后求学的方法，可以渐趋精确稳实，脱离虚浮的习惯"。"本报的论著，不用机械式的分类；除文苑一门暂时不登外，其余的著作，但求与本报宗旨相合，俱可选载"。

《清华学报》复刊后先为半年刊，1934年改为季刊，抗战军兴后，受时局影响，停办续办多次，1949年停办。《清华学报》刊登了大量史学论著，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史学学术刊物之一。

梁启超在《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文章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将全国各地分为不同的学术地域，并考察各地学者的产生情况。梁氏虽然指出此文"纯采'案而不断'的态度，胪列事实，略为比次而已。其所以产生此事实之原因，盖未遑及"，但在自序中，梁氏又指出"其后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所以"吾因是则信唯物史观派所主张，谓物质的环境具万能力，吾侪一切活动，随其所引以为进展，听其所制以为适应，其含有一部分真理，无少疑也"。但是梁氏并不认为"物质上环境"是"文化唯一之原动力"的观点，指出"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婀然悉听环境所宰制"，且"心力伟大者一二人先登焉，而其勃兴遂不可御也"。

梁氏还指出，本文所显示的研究方法"以为今日治史者所宜有事。踵而扩之，追溯宋明以前各时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乃至遍及文学家政治

家……等等之地理的分布，则皆治人文科学既有趣味，极有功用之业也”。该文是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对清代学术探讨的继续，也是梁氏文化史研究的新尝试，对此后的学术史、文化史研究均有一定影响。

同期还刊载了陆懋德《中国上古石器图说》、陈文波《伪造〈列子〉者之一证》等文。

张荫麟在《清华学报》第 1 卷第 1 期发表《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

作者认为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盛于清康熙间，至乾隆中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同治间之讲求洋务，“以迄今日”。而此文的目的“在整理第一期西学输入之史迹，而说明其与我国学术界之关系”，第一期西学输入，“为耶稣会传教士之附带事业。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之，而其余则附庸焉。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作者还指出，“此期输入之西学，其于我国学术界之重要影响，仅在研究范围之增加，(仅天文学及数学) 古籍之整理，及治学方法之改进，而终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以与远西并架也”。

刘离明在《学衡》第 30 期发表《治经杂语》。

作者对胡适等人提出严厉批评，本“一切学术统于经”的传统经生立场，传授治经方法门径，同时不满于“近世补血之徒震于日本及梁胡之呓语，祧经而祖子，主史而宾经，塞断学术本源”，痛批“胡适及胡适之类”是“焉知学”的“无知妄男子”。作者虽然也批评梁启超，但是最后指出，从梁启超和胡适开列的国学书目来看，“梁氏知有史学，其见识加胡氏一等”，其“书目所云作札记与精读成诵诸条，颇裨实用”，但因“知有史而不知有经，终是门外人”。

同期还刊载了孙德谦《秦记图籍考》、《左传汉初出张苍家说》，汤用彤《印度哲学之起源》等文。

罗振玉从上年所得大库档案中辑成《史料丛刊初编》22 种。

吴家镇《世界各国学制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月

(美) 鲁宾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鲁宾逊是美国 20 世纪初流行的“新史学派”的倡导者，《新史学》是其史学理论的代表作，对“新史学派”的形成影响至大，被视为“新

史学”的宣言。1920年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历史研究法”课，以《新史学》原本为教本，深受学生欢迎，系主任朱希祖遂请其译为中文。1921年2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江兴若的协助下，开始着手翻译。5月，江兴若离京，友人傅东华协助翻译。8月译毕，又经朱希祖、胡适等校阅。

全书共八章，尤以“新史学”、“史学史”、“史学的新同盟军”三章为重要，旨在阐述一种有别于传统史学的新主张。它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狭隘范围，把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要求史学家融会现代各种科学知识，使之成为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当时有人指出，该书“专论新史学者虽仅四篇，而文字又略显凌杂；然其破坏旧史，倡导新经，实研究历史者不可不读之书”。何译此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史学派”著作。“新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此后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类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或照搬了鲁宾逊《新史学》中的观点。

叶玉森在《学衡》第31期发表《契契枝谭》。

此文所论分为“方国”、“渔猎”、“农林”、“古兵”、“古刑”、“官刑”等专题，涉及上古典制社会等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叶玉森《说契》一文。

张仲和《西史纲要》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支伟成编《尚书去伪》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黄忏华《美学略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

15日　章太炎在《华国》第1卷第12期发表《救学弊论》。

作者指出当时的学术研究存在五项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

26日　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根据地颁布《考试院组织条例》。

条例规定史学科须考下列课程：史学原理、地理学、史学研究法、社会学、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言语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等。

是月　蔡和森《社会进化史》由民智书局出版。

此书根据恩格斯原著的精神，参照世界历史的材料编成。全书分三

篇，即“家族之起源与进化”、“财产之起源与进化”、“国家之起源与进化”，另有绪论“有史以前人类演进之程序”。

作者强调：“每一时代或每一等级的进化，具有普遍世界一切民族之通性；只是在时间上有演进迟早之距离，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

有研究者指出，该书阐述了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规律性，为人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总的方法论指导，揭示了认识国家本质和起源的思想方法。这些认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立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作《民生主义》演讲。

孙中山强调指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他认为：“古代之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原因。”孙中山坚持以“民生”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历史观的核心，从而建立了民生史观。

民生史观针对阶级对立提出阶级调和的论点，认为“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由阶级调和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变革，解决“生存问题”，此即“社会生理”。孙中山指出：“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他把社会进化的原因归结为人类为解决民生问题而进行的一切活动，其中也包括社会改良和阶级利益调和。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除评介作者生平、书籍性质、汉志体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如对今文经学的“来源、流传、演变”，古文经学的“派别、授受、流变、争论、是非”等问题“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参以己见，将学术史上这些关键而又复杂的问题考辨得比较清楚，使每部经书的来龙去脉清晰地显示出来”，对于其他著作也能指出源流等。并认为该书“一方面着重学术上‘考镜源流’，另方面又注意目录版本学上具体问题，超越以往考证诸作，对阅读古籍、研究目录学、探讨古代学术文化均有裨益，在学术和资料上自有其一定价值和功用，故长期以来人们乐于使用，显然非现行同类书所能代替”。

顾实在体例上进行了一些创新，如“每书首释存、亡、残、疑，俾可一览而了”；参考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等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悉注

出处。该书附录《见存六艺今古文表》、《见存百家真伪书表》、《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也颇具学术价值。

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至第4版。广文书局1970年重新出版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整理重新出版此书，2009年重印。

杨鸿烈《史地新论》由北京晨报社出版。

此书是论文集合而成，收录《今日研究历史学和地理学的一个根本错误》、《论历史家和地理家合理的态度》、《论历史的分类》、《论作史所应具有的两个要点》、《中国伪书的研究》、《历史上野心家的演进观》、《智识阶级历史上所表演的功罪谈》等论文。

高一涵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4号发表《唯物史观的解释》。

文章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的公式”、“唯物史观的公式的略解”、“唯物史观的必然性”、“唯物史观与人为的势力”等。作者原本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宿命论，后来经研究后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个人的努力的问题，并没有十分轻视”，乃决定撰写此文“说明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宿命论”。作者认为“唯物史观家最扼要的一点，就在看清楚了社会环境与人类思想的关系的重要”。

9月

5日　杨树达在《太平洋》第4卷第8号发表《汉代老学者考》。

18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

该会英文名为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简称“中基会”。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余下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其职责是负责接收与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余额，运用此款项促进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董事会由15人组成（中方10人，美方5人），按照章程，最初的董事由中国政府派定，第三届年会时以抽签决定任期，此后每3年有董事3人任满，由董事会自行选举继任董事。

该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教育总长黄郛呈请建立，范源濂为会长，孟禄为副会长，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顾维钧、杜威等为董事。

是月　郑鹤声在《学衡》第33期发表《汉隋间之史学》。

第35、36期连载。文章是以现代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较早成

果，系统探讨了“史实与史学”、“旧史学之范围”、“汉隋间史学之位置”、史官之沿革与作用、汉隋间之史家与史著、“史著之体例”、“五大史家（司马迁、班固、荀悦、裴松之、刘勰）之史学”、“史界之现象”、“三大史案之经过”。

柳诒徵以“一时无两”称誉该书。1924 年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时，柳诒徵为之题词，称赞其治学善于深思，运用新法，“恢廓史域，张我国光”。

10 月

22 日　清华学校筹备设立国学研究院。

是月　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由上海书店出版。

此书为作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科学系主任时，根据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复旦大学、南洋大学、东吴大学法科等院校共同举办的夏令讲学会上的讲演修改而成。

全书约 20 万字，其内容分为“总论”、“社会之意义”、“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现象之联系”等十二讲。此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力图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一切社会历史现象。

该书在内容上比较突出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指出“生产力是人类从事于经济行为之物质基础，所以生产力的状态变，经济关系也就变。社会制度是表现经济关系的形式，所以经济关系变更，社会制度也就变更”；一是提出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以往政治史的方法，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争政权之斗争，目的总在于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关系；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新阶级便非取得政权不能往下发展。因此，一切部分的日常生活里的小斗争，直接的间接的是阶级斗争”。

《社会科学概论》出版后，影响很大。1939 年 2 月，上海霞社再次校印发行，1949 年 6 月，上海平凡书店又以《社会科学十二讲》为书名出版。

何炳松《中古欧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衡哲为之序，指出国内非常缺少好的西洋史著作，何氏此书出版可稍稍缓解这一情况。此书材料源于鲁宾逊著作，何炳松的史识和史学素养在编译中亦得到体现。

顾颉刚开始为孔德学校作《国史讲话》。

此系顾颉刚从事通俗历史传播的第一次行动，至年底完成了《宋代的统一》、《契丹势力的南渐》、《西夏的始末》等文。1925年又作《女真的勃兴》、《蒙古的立国》、《编纂国史讲话的计划》等。

孙倬章《社会主义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月

23日　顾颉刚在《歌谣》第69期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编《孟姜女专号》，引起巨大反响。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分析古籍记载和口头流传的有关材料，考察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他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故事的研究中。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影响颇大，特别是对故事历史系统的认识，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至今还在沿用。

正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致信顾颉刚，称赞顾颉刚"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法来研究这故事"，而此文"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魏建功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认为，《歌谣》周刊所出的专号中，"成绩丰富多采的"是"孟姜女"，"顾先生用研究史学的方法、精神来对旧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一时成了好几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有的帮助收集材料，有的通信讨论故事内容，魏氏称"孟姜女专号"："最典型地体现了人们自发自愿、肯想肯干、互相启发、不断影响的范例。"

钟敬文在《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序中说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是使顾颉刚"取得世界声名的科学业绩"，其成果不但"为我们学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传说科学，而且给从长期封建社会的古旧学术传统中开始觉醒过来的青年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学术道路，形成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当时有不少的人是跟他走上这条道路的。用不着讳言，我自己也正是其中一员"。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贯穿了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12月

1日　束世澂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发表《王船山先生之政法思想》。

4日　顾颉刚请胡适荐王国维入清华任教。

5日　徐旭生在《太平洋》第4卷第9号发表《〈西游记〉作者的思想》。

该文提出应该从“历史的批评”、“艺术的批评”、“思想的批评”这三个层次来评价研究文艺作品，并认为胡适的文学研究多是“历史的批评”。

10日　朱希祖在北京汇记书局“购得升平署档案及钞本戏曲共一千数百册”。

该档案“仅此一份，另无副本，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之递代，以及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征之。”1931年12月朱希祖在《燕京学报》第10期发表《整理升平署档案记》，系对此档研究整理的成果。

27日　李玄伯在《现代评论》第1卷第3期发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

作者认为，“古史辨派”的古籍辨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依赖“古人直遗的作品”，假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地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相印证。“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

1925年2月24日，顾颉刚作《答李玄伯先生》（《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指出，“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即“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我研究古史的愿望还有一个，是把神话与传说从古代的载记中、后世的小说诗歌戏剧以至道经善书中整理出来，使得二者互相衔接，成为一贯的记载”。

是月　卫挺生在《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清季流行之货币及其沿革》。

作者认为清季流行货币非常混乱，不仅两汉至清代历朝之货币在民间流传，各地方有各地方之货币，且“日本、西班牙、墨、美、法、德、英国及其印度太平两洋近华之各属地，皆有铸货，并行于中国市面”，这些货币质地各异，形状不同，轻重不一，成色多样，故对清季中国境内流行的各主要货币的沿革、适用范围等进行探讨。

同期还刊载了胡适《词的起源》、陆懋德《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郑之蕃《四元开方释要》等文。

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由南京共和书局出版。

（日）服部宇之吉著、郑予雅译《儒教与现代思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章太炎《清建国别记》聚珍仿宋本印行，由中华书局代售。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曾北到黑龙江，“所在求其异闻”，注意于清开国前和开国史迹的考查，并搜集大量有关清开国前的文献资料，对清开国前历史进行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

此书主要考辨努尔哈赤建国以前的清开国史实。其内容不少地方仍沿袭旧说，未得深入。在史料运用上，不仅用“明人书校清史”，而且用明人旧本书校《别记》时，“援据二十余种书，而明著明刊居其半”。此书发掘了清开国的一些具体事实，在清史研究上有一定贡献。

章太炎在辛亥前已留心清史，在《訄书》修扩本中有《哀清史》等文。他之关注清史，意在辨“夷夏之义”，企图从汉满两族历史关系上，为其满族为胡为夷的反满思想制造理论根据。他写《清建国别记》时，虽没有以前写《哀清史》等那样愤激的言辞，但仍固持“夷夏之义”，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基本未变。

汪荣祖评曰：“章太炎写清代开国前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

罗福葆辑录《沙洲文录补》附在蒋斧《沙洲文录》后由上虞罗氏出版。

该书辑录社会史、经济史、文学作品等此前不甚注意的材料，对敦煌文献的收集和研究的方向转变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马叙伦《老子核诂》由景山书社排印出版。

此书共 4 卷，系作者对《老子》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研究者认为，马氏对于《老子》的核校“除了具有版本校勘的文献价值之外，还有语言学方面特别是词语训诂的成果，它们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并认为此书是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以前《老子》研究最有分量的成果之一。

1956 年 7 月，经过作者修订后，改名《老子校诂》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74 年由中华书局再版。

马衡编成《中国金石学概要》。

该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义，探讨了金石学的定义、与史学的关系、历代的铜器石器以及甲骨文、研究鉴别方法等。该书并未最终出版，后因战乱而散佚部分篇章，一部分内容被编入 1956 年出版的《凡将斋金石丛稿》。

1925 年

※《京报副刊》推出“妙峰山进香专号”。
※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
※ 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作《古史新证》。
※ 柳诒徵发表《中国文化史》。
※ 陈垣撰成《二十史朔闰表》。

1 月

1 日　何炳松在《民铎》6 卷第 1 号发表《〈史通〉评论》。

是月　缪凤林在《学衡》第 37 期发表《中国民族西来辨》。

缪凤林撰写的《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西来辨》，驳斥晚清以来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缪凤林的结论是：（一）中国民族，今日已有数万年之遗迹可考，若为外来亦必在数万年甚或数十万年以前，绝非最近数千年内之事；（二）西亚民族之历史，较中国民族为后，由年代、种族、文化及地理上之阻碍等考察，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

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名虽称“婚姻史”，但作者却并非采取历史学家的立场和方法，而是以“用社会学家底眼光”，从婚姻的制度、婚姻的现象、婚姻的理想三方面来研究古代婚姻，全书共分“婚姻底观察”、“婚姻底形式”、“婚姻底制限”、“婚姻底停止”、“婚姻底组织”、“婚姻底仪注”、“婚姻底影响”、“婚姻底关系”、“婚姻底济救”等九章。

2 月

15 日　邝摩汉在《学林》第 1 卷第 8 期发表《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各种思想之变迁》。

20 日　何炳松在《教育杂志》第 2 期发表《历史教授法》。

第3期连载。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发行“学生国学丛书”。

此套丛书是王云五、朱经农根据胡适的构想而编，目的是帮助学生提高课外阅读的质量，为青年学子提供一套整理后的课外阅读书籍。编写者“就我国古籍，每一种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并于导言中说明全书大要，使尝其一脔者，除细嚼其一部分外，并得窥全豹之外形与内涵”。本丛书是商务印书馆三套国学丛书中国部头最小的一部，所收书共95种，均系重要著作，经部如《诗》、《礼》、《春秋》等；史部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新唐书》、《五代史》、《宋元学案》、《文史通义》、《经学历史》等；子部如《庄》、《孟》、《荀》、《韩》等；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近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北宋，曲则撷取元、明大家，传奇、小说亦选其英。

曾参与丛书编写工作的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指出，丛书把孟子与庄子、荀子、韩非子并列，视为诸子之一，而不认其为“经”，“有点打破宋元以来传统思想的精神”；而把传奇（唐人传奇）、小说（明朝的三言二拍）列为国学，“也同样有打破传统的意味”。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政法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类著作有曾友豪编《中国外交史》（1926年10月），（美）麦利恒·鲍尔思等著、张虹君译《近世政治思想史》（1930年12月），（英）波拉克著、张景琨译《政治学史概论》（1931年2月），张金鉴《美国政治思想史》（1934年3月），（英）布勒德著、陈世第译《英国宪政史谭》（1936年8月）等。

杨树达《汉书补注补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系对王先谦《汉书补注》一书所作的“补正”，仍沿汉书体例，按纪、志、传等排列，约六百余事，计有六卷。

3月

1日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5期发表《〈中国史研究论文集〉序》。

编者指出，史地研究会原计划编辑的《中国史研究论文集》因故中辍，乃将柳诒徵为此论文集撰写的序言刊发于此。

柳氏在序言中指出，清以前虽有八股时文对学术水平的影响，但“大师硕儒，治经之余，研精史籍者，犹相望也。清季兴学，分张科目，大中小学，皆有历史，恒人之学，宜痛于前之空疏矣，然兔园小册，计年授

课，文实分途，各科并架，专以治史言之，其疏略肤浅，殆又甚于前焉。矫其弊者，日汲汲倡史学”，但是“以域外贤哲治史之法沉潜博洽以治吾国史学者尚未多观，高心空腹之士阁束旧籍，斥为无统系无价值，竟以俚语臆说改造历史，流风所被，亦一新式时文耳”。柳氏认为，“欲治史学，必先读史，读之入肉贯串，然后可言改革”。

同期还刊载了汪章才《周代丧制概略》、李长傅《志西沙群岛》等文。

是月　张相文总纂的《泗阳县志》成书。

该志分图、表、志、传、大事表五类，《田赋志》、《河渠志》等三十目，共 25 卷，60 余万字。仓修良在为该志撰写的“重印序”中指出，该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能体现民国社会特点，反映当时精神风貌和社会风气，又能重视国计民生大事，关心民众疾苦，而且独创性设置《乡镇志》、《氏族志》，是可和黄炎培《川沙县志》、余绍宋《游龙县志》媲美的民国时期佳志。该志于 1926 年铅印出版，1985 年删节再版，1991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全书。

章太炎在《华国》第 2 卷第 5 期发表《铜器铁器变迁考》。

该文以考察古代兵器为主，旁及手工制造所用工具（裁革、伐木、治材）、农具，探究古代利器制作的材质，重点突出铁制兵器应用之早。章太炎反驳“经传所述利器皆铜也”之说，指明“周初已取刚铁为斧钺刀剑，而数少不能布于行伍”，至“七国以后，凡兵器，无有用铜者矣”，至于传世的铜刀剑，章太炎认为“或佩带为容仪，或殉葬之明器”，而非实用的兵器，而铁制刀剑易锈蚀，难以长久保存。此文体现了章太炎治学以文献记载为依据，而不满于唯古器物是尚的特点。

张尔田在《学衡》第 39 期发表《史传文研究法》。

张尔田在“小序”中指出，“考论记之文，发源史传”，“不明乎史传文法，不能为论记之文”，故“先述史传文研究法，以为论记前导”。所谓“史传之文”，即“所以全配事实之一种程式”，是史家才学识的表现方式，其具体体现在“体”、“例”、“义法”三个方面。张尔田分别就“史与其他叙事方式之不同”、“史有成体之文与不成体之文”、“史有六家三体”展开论述。

陈中凡《诸子通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

5 日　何炳松在《学生杂志》第 5 号发表《改造学风的管见》。

作者指出，学风恶劣，“病根在于一部分一知半解的新学者误解新名词，学生盲从，以讹传讹，遂至学风天天堕落下去”。“现代学者，立言必出入于西洋，架上必杂置以外籍，乃为识时俊杰。”“吾国所谓学者，往往有拾人牙慧，矫枉过正的毛病。他们一旦看见了一个新名词，往往不肯加一番研究的功夫，就满口应用起来。青年学生亦就盲从实行起来。”他举“自由”、“平等”、“自治”、“自动”四个名词作为说明。最后说：“请一班所谓新学者先讲外国好看好听的新名词，加一番慎思明辨的功夫。认识他们的真意，明白他们的功用，决定他们是否适应吾国的状况。然后再去鼓吹，再去提倡。至于已经误用的新名词，赶快收回纠正。”

11 日　余绍宋修成《龙游县志》。

1921 年，龙游县聘余绍宋为县志总编，祝康祺为副主编着手修志，后余绍宋辞去司法部次长职，专心修志，历时四年方编成，至该年 7 月全部事务告竣，由梁启超作序，送京城印书局印行。该志共 42 卷，分正志 23 卷，附志 17 卷，分有纪、考、表、传、丛载、掌故等几大类。梁启超在该志序中高度赞扬了该志，认为“与实斋诸志校，其史识与史才，突过之者盖不鲜”。但是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则认为“梁氏之言，实属妄誉溢美之词”，该志“不仅不能贯彻自定体例”，而且存在六大缺点，“仅可说是一邑文献的私家杂记，既未实地调查，不合现实，谈不上有裨实用的地方志书”。

25 日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筹备成立。

是年 6 月 2 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协会组织大纲共 9 章 25 条。组织大纲规定该协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求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该协会的领导机构为董事部与执行部，梁启超被公推为首任董事部部长。该会会员分为机关会员、个人会员、赞助会员、名誉会员四种，协会成立之初，有机关会员 129 个、个人会员 202 人、名誉会员 33 人。该会对民国期间图书馆改革、与国外图书馆联系、书刊、善本调查保护等工作具有重要贡献，至 1949 自行停止活动。该协会还出版了《图书馆季刊》、《国学论文索引》、王重民《老子考》等书刊。

是月　张荫麟在《学衡》第 40 期发表《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

张荫麟指出顾颉刚及古史辨派与康有为的关系。顾氏的“层累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即他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

张荫麟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在于“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而误用默证。由于顾颉刚的论证“几尽用默证”，而用默证处又十有八九是违背限度的误用，所以“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

张荫麟的批评在史学界造成了不小影响，绍来、梁园东、徐旭生、陈垣、陈寅恪以及傅斯年都有类似的言论。

同期还刊载了瞿方梅遗著《史记三家注补正》（第42—45、55、57、58期连载）。

徐敬修编《经学常识》由大东书局出版。

（美）房龙著、沈性仁译《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下册同年10月出版。

5月

1日　竺可桢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发表《中国历史上之旱灾》。

亨廷顿（Huntington）在1924年秋曾在东南大学演讲气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认为“文化迁移，大都由于气候变迁”，“中国历史上之外患内乱，大致都可据此解释”。作者受此启发，乃撰写此文。文章将《图书集成》与《东华录》所载中国历来旱灾进行统计，并与亨廷顿“由地质与气候上考据相参证”，以观其是否符合。此文是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早期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盛朗西《宋元书院讲学制》、柳诒徵《奴儿干事辑》、陈训正《定海县志例目》等文。

13日　《京报副刊》第147号开始推出“妙峰山进香专号”。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受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与同人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庄严到北京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归后编辑《妙峰山进香专号》，在《京报副刊》连载6期至8月27日第257号结束。

顾颉刚在“专号”之首作《引言》曰：“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我们决不能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专号’为下俗，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我们也决不能尊重耶稣圣诞节的圣诞树是文明而讥笑从妙峰山下来的人戴的红花为野蛮，因为它们的性质也相同，很可以作为比较的研究材料。”

专号第一篇文章是容肇祖的《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此后又刊出孙伏园《朝山记琐》、容庚《碧霞元君庙考》、俞宗杰《妙峰山的漫游》、顾颉刚《游妙峰山杂记》、俞琴《妙峰山的传说、妙峰山上的口号》等共18篇文章。专号中的文章，以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最有价值。有学者指出："无论就方法的独特，还是就分析的缜密而言，该文都是难以企及的典范，除了奉宽的妙峰山琐记，至今还没有一篇研究妙峰山进香民俗的文章或专著能够与之媲美。"

1928年9月，专号中的文章与顾颉刚收集到的其他讨论妙峰山的文章共29篇，以《妙峰山》为题，作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丛书之一结集出版。

顾颉刚等人的妙峰山进香调查，是中国学界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开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提供了田野作业的典范。

是月　顾颉刚等人在北大成立救国团，并编辑《救国特刊》。

"五卅惨案"发生后，顾颉刚参加北大成立的救国团，并被推为出版部主任，负责为《京报》主编《救国特刊》。顾氏在《发刊词》中指出，此刊"宗旨有二件：一是用浅近的语言作演讲稿，可以供给演讲员的应用；二是把这次的事变寻出它的前因后果，以求不止于这一件事的解决，更进而了解多少件积案，慢慢的计划总解决的办法。"

顾颉刚撰写《上海的租界》、《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之一——江宁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二——天津条约》、《不平等条约之三——中法条约》、《永久的救国事业的真实基础》、《救国与工作》等数十篇讲演稿及评论文字，他想写出一部通俗易懂的"国耻史"，以昭示国人、唤醒民众。

（日）河上肇著、郭沫若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河上肇自1921年3月至1922年10月的论文集，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困境（上编）；探讨了社会组织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编）；考察了关于社会革命的若干问题（下编）。河上肇自称"在考察社会之组织及社会组织之变革的时候，我是始终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这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之实际的应用"。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是郭沫若思想转变的关键。他当时写道："这本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的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我现在成了个

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此书使他对“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有了明确的态度，由此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1928 年赴日本后，他又学习了《资本论》，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了深入研究。

陆懋德在《学衡》第 41 期发表《中国文化史》。

第 55 期连载。作者指出，朝代之史，多不重民族文化，现今数十年，文化史在欧洲兴起，但是相比于少数外人撰写的“材料缺乏，叙述简略”之论述中国文化史著作，中国人在这方面竟然“尚无专书”，乃仿英人巴克尔之《英国文化史》撰此文。陆懋德在文中探讨了文化史的含义范围、研究方法、中国文化的起源传播、与其他文化之不同等问题。

柳诒徵在《史地学报》第 3 卷第 7 期发表《历史之知识》。

作者认为人类由于“同情”、“应用”、“识性”、“好奇”、“求备”的缘故，需要历史的知识；只有掌握了普遍系统的历史知识，并能随时灵活运用，“才算有历史的知识”。作者还指出：“考据的方法，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不过学者所应留心的，就是须慎防畸形的发达，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了。”

胡先骕指出在当时“一般关于史学的研究，亦集中于史料或小问题之探讨”的风气中，柳诒徵却在东南大学力倡“史实之综合与推论，其精神与新汉学家不同”。

同期还刊载了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第 8 期连载）、张其昀《南宋都城之杭州》等文。

王襄编著《簠室殷契徵文》12 编由天津博物院石印出版。

此书是第一部将卜辞分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等 12 类加以考释的著作，颇便于读者了解商代的社会情况。但因为达到按事类进行编排的目的，王氏将完整的甲骨拓本割裂，以至于被人误以为作伪。

6 月

5 日　冯友兰在《太平洋》第 4 卷第 10 号发表《对于哲学及哲学史之一见》。

该文提出了“历史为哲学之实现，哲学为历史之精神”的观点，并认为“哲学史之专史，在通史中之地位甚为重要”。

27日　光华大学筹备会成立，以张寿镛为校长。

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支持“五卅惨案”与美籍校长产生冲突，被迫离校。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在数月后即筹备成立私立光华大学，并于同年9月开学。光华大学设有文理商工四科及附属中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大学。张寿镛办学效仿蔡元培兼收并蓄的思想，先后网罗了不少著名学者，仅文史哲方面就有吕思勉、钱基博、张东荪、胡适、张东荪、徐志摩、梁实秋、潘光旦、蒋维乔、王造时、罗隆基、杨宽、童书业等，实力不俗，其历史系长期由吕思勉主持，在民国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光华大学工科并入同济大学，文、理科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商科并入财经学院。

是月　安特生著、乐森浔译《甘肃考古记》由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

此书是作者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小规模发掘的报告，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将其作为《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出版。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该书将甘肃青海两省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齐家文化时代最早，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齐家文化之后每一期递减500年。此即仰韶文化“六期说”。

此说引起较大争论，梁思永、尹达、夏鼐、裴文中等先后对其进行了商榷。尤其是1945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现了两家齐家墓葬，从陶片出土的位置否定了齐家期的领先地位，准确无误地证明了安特生把齐家文化当成仰韶文化第一期的错误。

曹聚仁将在《读书杂志》上辩论古史的文字编为《古史讨论集》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本书收录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等人讨论古史的九篇文章和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朴社同人大哗。顾颉刚见此书错字很多，印刷粗劣，8月下旬开始另行编辑，并将此书定名为《古史辨》。

陈文波在《清华学报》第2卷第1期发表《中国古代跳舞史》。

文章分从“中国古代跳舞之起源”、“中国古代跳舞之制度”、“中国古代妇女之跳舞”、“中国古代跳舞之种类”、“中国古代跳舞之方法”、“中国古代跳舞之变迁”等几个方面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舞蹈。作者还简要概括了中国古代舞蹈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中国古代舞蹈表演的意义等。

同期还刊载了王国维《〈水经注〉跋尾》，A. C. Moule著、张荫麟译《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等文。

王世杰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3卷第3号发表《中国奴婢制度》。

文章探讨了“奴婢之渊源”、“奴婢之身分”、“奴婢问题之现状”等。作者认为，“吾国往往以夙无阶级制度见称，但是吾国奴婢制度之普遍久远与残酷，实在令我们不敢以此自承”，这种制度“是普及全国的一种制度”，其性质“实无以自别于一般之所谓阶级制度”。

柳诒徵因东南大学风潮赴沈阳就聘东北大学教职。

柳诒徵在东北大学任职时间较短，至1926年改就北京女子大学聘，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授。

7月

23日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由上海季陶办事处印行。

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结的目的．在生存的行进中，逢着一种障碍的时候，求生的冲动，便明明显显地引导着人发生一种生存的欲望。更由人类强弱贤愚的秉性，和时代环境的不同，生存的愿望也显出许多程度和种类的差异来。社会文化越是进步，人类的关系越是复杂，由生存欲望派生出的欲望差异也越繁多而明显。就欲望的性质上说，无论是哪一种欲望，都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这几种欲望的内含都是能生、所生的根源，都是为了求存的必要。”此即戴季陶“求生冲动”的民生史观。

是月　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

王氏云：“古来新学问大都出于新发见，汉之壁中书，晋之汲冢书，均其著者也。而最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之发见，又非昔日所能比。”所讲五项：（一）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此讲演稿后刊于《学衡》第45期。另一版本是刊载于《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1930年12月）的《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

陆懋德在《学衡》第43期发表《尚书尧典篇时代之研究》。

王昌谟等编译《世界各国志》3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 月

1 日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

清华大学在五四运动之后屡被人指责忽视中国文化，且为配合清华创建大学，清华校长曹云祥等顺应“整理国故”的浪潮，设立了旨在对西方文化进行精深研究、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通彻了解的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章程》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陈寅恪认为，“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研究院先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为讲师，并于 1925 年 5 月开始招考，9 月 9 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校长曹云祥勉励国学研究院师生“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以中国考据之法，希望从研究中寻出中国之国魂”。梁启超以《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致词，望同学们努力于自然科学、工学和史学与考古学之研究。研究院共招生四届，74 人毕业，先后培养了吴其昌、王庸、姚名达、方壮猷、高亨、杨筠如、姜亮夫、陆侃如等一批后来享誉学坛的学术名家。

1929 年，王国维、梁启超等导师先后去世，以及清华内部变动，国学研究院最终停办。

是月　何炳松编译《近世欧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为何氏 1920—1922 年在北大史学系执教时的讲义。大体以鲁宾逊和贝尔德合著的《欧洲史大纲》第 2 卷为蓝本，并取材于二人所著《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s*）。

此书出版后甚为风行，多次重版，有人称其为“中国近年来研究西洋史的唯一善本”，可与英国威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纲》相媲美；也有人认为此书有抓不住中心势力、错误未能尽免、译本疏忽之极等问问题。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第 1 册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其编辑大旨云：“旧日史书，偏于政治，本书兼重文化；旧日史书，详于个人，本书留意群众；旧日史书，喜述陈迹，本书指陈趋势。”

该书依政体变动将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称为“积弱时期”，戊戌维

新到辛亥革命称为“变政时期”，辛亥革命后称为“共和时期”。全书内容上先述内政外交，再及政治组织与社会状况。

全书共四册，第2册同年10月出版、第3册1926年7月出版、第4册1926年8月出版。1931年此书改编为《中国近百年史》由百城书局出版。

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从史的视角考察音乐与文学关系的专著。1935年10月，朱谦之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音乐文学史》。

9月

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作《古史新证》。

《古史新证》原本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自1925年9月开始至1926年春，王国维授课结束，讲义当时由清华研究院办公室以线装书的形式装订成册保存。1926年4月，王国维学生吴其昌据《古史新证》听课记录整理成《王静安先生〈古史新证〉讲授记》，刊于《清华周刊》第374期。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古史新证》曾在《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和1930年2月《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上登载。1935年，北平来薰阁影印出版。

全书分五章：“总论”、“禹”、“殷之先公先王”、“商诸臣”、“商之都邑与诸侯”。该书对甲骨文、金文“此二种材料中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之者一一述之”。《古史新证》可以看作是王国维的商史及上古传说时代研究的总结，也是他的古史研究方法论的总结。王国维明确地提出了将文物考古新材料与传统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古代历史的史学方法，即“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主张对传统历史文献采取审慎态度。“总论”中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里包含了对疑古过当的偏向的批评。

唐兰在《古史新证序》中指出：“近世竞尚疑古，非无由也。然古史

之有可疑传说之多虚妄，而须摧陷廓清，此固以为不争之事实，此为疑古者绝大之贡献。顾何以知其为信为疑、为实为虚、为真为妄，此非仅怀疑能决者。……考据之学，当尚实证也。夫处今日而考古史，必深谙古代文字与古文法且兼通考古学、古器物学、古器物铭学等科，非是不足以整理地下新发见之材料，而资为实证。然已发见之有限，而古史之范围至广，学者或取地下材料所未见，遽疑为伪，此亦非也。……疑古之说方盛，学者羞道虞夏，先生独举甲骨所载殷之先世与夏同时，且金文盛道禹迹，与《诗》符合，可知两周学人，咸信有禹，不仅儒墨也。此其证据明确而不轻下断语，后学之楷模也。"

高一涵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3 卷第 4 号发表《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

文章内容主要有"自秦到六朝的宰相制度"、"自隋到宋的三省制度"、"金元的单省制度"、"明清两代的内阁制度"、"内阁的职权"等。1930 年，作者又将此文稍加扩充，由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出版。有研究者认为，此文（书）对于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较大参考价值。

罗元鲲编撰《本国史表解》上下册由武昌新亚地学社出版。

国务会议通过教育总长章士钊提请，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后因战火中辍。

10 月

9 日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在北平北海静心斋成立。

1923 年 3 月下旬，日本众议院和上议院先后通过了《日本对华（支那）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为此先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柯劭忞等中方委员 11 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日方委员 10 人，柯劭忞任主任委员。《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由该委员会主持。

10 日　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内举行成立典礼。

故宫博物院设古物馆和图书馆。古物馆由易培基任馆长。张继、马衡副之；图书馆由陈垣任馆长，沈兼士、袁同礼副之。图书馆复分图书、文献两部，文献部由沈兼士主持，从事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

北京公教大学及其附属辅仁社正式开学。

北京公教大学是在英敛之的呼吁下、罗马教廷的鼓励下，由美国本笃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经过数年筹办终于在北京开学。该校在校内专设国学专修科，讲授中国文学、史学、哲学、英文等课，以为大学预科，取名北京公教大学辅仁社（1913 年英敛之就曾在香山创办让各省教会青年学习国学的辅仁社，但于 1917 年冬停办），在英敛之 1925 年 8 月制定的《辅仁社简章》中明确指出“本社专事国学之研究”。该校以英敛之为社长（又称国学部主任，1926 年 1 月 26 日陈垣接替去世的英敛之主持事务），聘请陈垣、张相文、郭家声、李泰棻四人为主讲。

杨筠如在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第 2 卷第 4 期发表《伊川学说研究》。

14 日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

该刊实际由《歌谣周刊》扩充而来，目的是将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搜集来得材料“编成一个略有系统的报告，以供学者之讨论，藉以引起同人之兴趣及社会之注意”。

从 1925 年 10 月 14 日创刊起，至 1926 年 8 月 18 日停刊，《国学门周刊》前后出版两卷 24 期。在全部 161 篇稿件中，民俗学一类达到了二分之一，这份刊物可以说是以民俗学研究为主要特色的。另有 11 篇涉及古史与经书问题，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古史辨”有关，其中 9 篇后来收入《古史辨》第 1、2 册。

21 日　胡适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2 期发表《汉初儒道之争》。

28 日　刘半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3 期发表《敦煌掇琐序目》。

此文为作者自欧洲归国途中所作，列举了他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中抄录而来的各种珍贵史料条目 104 种。他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作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仓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小辫，而闹复辟”。

是月　柳诒徵在《学衡》第 46 期开始发表《中国文化史》，被称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第 48—54、56、58、61—64、70、72 期连载。是书作于 1919—1921

年，原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讲义，共计70余万言。

本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具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以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作者大力宣扬三代至上的文化史观。

该书征引材料广博，“参考书目几达七百余种，自群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与近代报章杂志、统计资料，靡不广为搜集。主题鲜明，叙事详尽，论断谨严，引文完整。复以小字低格，复列于章节之后，以收相得益彰之效。”尤其在体例上，主题文字以大字顶格书写，资料引文以小字低格附列于相应的主题文字之后，既为主题的根据，又独立自成史实，二者相得益彰，被誉为“著作体例之创格”。

缪凤林称：“此书以六经诸史为经而纬以百家，举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皆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列举，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以明吾民族独造之真际。体例虽为近代史著，而性质则与顾亭林《日知录》之中篇‘治道’，阳湖赵翼《廿二史劄记》之第四类综论历代史迹相近，其议论亦在二氏之间。涵蕴富而义类宏，近百年来所未有之大著作也。”

1933年胡适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发表书评，认为柳氏此书“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为中国文化史立下草创的规模，搜集了有用的材料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详于古代而略于近代，对史料使用不严谨等问题。胡氏认为“中国文化史在今日本无法写定，良好的中国文化史必有待于较远的将来。”

1926年《学衡》出版合订本，1928年中央大学出版排印本，1932年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出版发行，1935年再版，此后该书屡被再版。

何炳松在《史地学报》第3卷第8期发表《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

作者认为中国典籍因经中有史，史中有经，子中有史有经；《二十四史》中各传相牵，纪传互系，只要附以索引，则一望可知，故“整理国故，索引为先”。作者主张取中古旧籍中的专名、术语、惯用词、异称编制索引。具体做法是由简到繁，最后扩大到四部以外。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张其昀《中国与中道》、王庸译《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郑鹤声《补〈史记·箕子世家〉》等文。

11月

11日 容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5期发表《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

第6、9期连载。文中批评疑古学风说："方今学风，喜欢疑古，于古人的制度文物学说无所不疑，那知意念一偏，万物纷错，随而转变，所谓看朱成碧，最是学者一大毛病。""胡适之先生述学……流弊所及，后生学子，与古书未尝深造，辄呈其私智，就主观所得随意抄录，加以评骘，愚己惑人，以为猎名的工具。胡先生在讲坛上常对此大发其牢骚，并说述学之不易，须知'怀疑'与'求证'相联，万不能易'求证'而为'武断'。"

18日 梁启超撰《〈龙游县志〉序》。

梁启超在序中指出"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因为"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赜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不此之务，漫然摭拾一姓兴亡之迹，或一都市偶发之变态，而日吾既学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国作何状，此又与不知之甚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梁启超不仅明确把地方志看作是地方史，而且还在此文中借总结章学诚、余绍宋所修志书的优点探讨了如何修纂优秀志书的方法。

该序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关方志的叙述构成了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雏形，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中认为"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方志理论的开创者"。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0期发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第11、12期连载。作者提出了"《诗经》中一大部分是为奏乐而创作的乐歌，一小部分是由徒歌而变成的乐歌"的观点。

25日 陈垣撰成《二十史朔闰表》。

同年底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刊行。陈垣自述云："始吾欲为中西两千年日历，曾将中史两千年朔闰考定。迨《中西回史日历》告成，凡二十卷。卷帙较繁，一时不能付印。而朋辈索观及借钞者众，故特将中史朔闰表先付影印。而西历回历亦附见焉。"

此表一问世便受到学术界的一片赞誉。老辈学者陈横山（庆年）致函陈垣说："展读一过，曾叹为史界未有之作。""一则中外史实有待考于比

照之日历者綦多，有此则无数纠纷可以解决。（回历尤要，自唐以来蕃客来华者甚众，影响于国史者甚大。）一则出版界沉寂殊甚，此书一出，如暗中得明，可腾耀于外邦也。……尝谓读史非比较时日，鲜不为古人所误。……即此一端，尊著之有功于考据界，岂不伟哉！”胡适评曰：“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在史学上凡做过精密考证的人皆能明了，无须我们一一指出。”“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了一个总结果，并且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刘乃和说：“《二十史朔闰表》当时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和欢迎，就因为它是一本读史不能离开的极好工具书，内容确切严密，使用方便。这书出版前，我国还从来没有一部贯穿二千年，中历、西历、回历可以互换的精确年表。……这部书是我国历表的创举，六十多年来，学人称便。内容有其自己的特点，为目前其他历表所不能代替。”

是月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由民国大学出版部出版。

作者从公私藏书中抄录关于中国币制的史料，并到相关国家主管机关、银行、商会等收集材料，最终编成此书。作为较早梳理从先秦至民国的币制变化情况的学术性著作，该书不仅系统全面，而且资料丰富，贴近实际，至今仍被引用。

12 月

1 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此文是为反对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所谓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而写。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关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立场和性质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30 日　曹聚仁撰写《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

作者认为“近顷之治国故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但“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他还将北大《国学季刊》视为

"'新考证学'的园地"。

是月　王国维撰《鞑靼考》及《鞑靼年表》。

王氏尝以此考为题，向北京历史社会学会作学术讲演。盖此考实承前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而启其后之《萌古考》。由此三考，可见王氏运用研究金甲文字的缜密考证方法，以治蒙元史之实绩；其所创获，对后世辽金元史研究者亦有启迪。

胡适在《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发表《戴东原的哲学》。

胡适认为戴震的哲学是在明末以来"反玄学"运动的大背景下，"注重实用"和"注重经学"的两大趋势结合的产物，并认为戴氏有与一般清儒有多方面的不同。文章还分析了戴震的治学方法、戴震的影响等。胡适在文末指出，"我们关心中国思想的前途的人，今日已到了歧路之上，不能不有一个抉择了。我们走那条路呢？我们还是'好高而就易'，甘心用'内心生活''精神文明'一类的揣度影响之谈来自欺欺人呢？还是决心不怕艰难，选择那纯粹理智态度的崎岖山路，继续九百年来致知穷理的遗风，用科学的方法来修正考证学派的方法，用科学的知识来修正颜元戴震的结论，而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呢？我们决心走那一条路呢?"

该文是戴震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不仅对戴震研究，而且对清代学术研究有较大影响。192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该期季刊为"戴东原专号"，还刊载了魏建功《戴东原年谱》、容肇祖《戴东原的理及求理的方法》两文。

陆懋德在《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发表《中国经书之分析》。

作者认为"今人所谓经书者，大抵皆为周代人士所纂述之书籍"，用近世科学方法，"诸经"可分为三类：哲学类包含《易经》、《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史学类包含《书经》、《春秋三传》、《周礼》、《仪礼》；文学类包含《诗经》、《尔雅》。

同期还刊载了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蒋廷黻《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赵万里《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语〉跋尾》、李俨《梅文鼎年谱》、张荫麟《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等文。

是年

容庚编著《金文编》由贻安堂印行。

作者在该书序中提出，"由《说文》而上溯金文，由金文而上溯甲骨

文"，则文字沿革之迹昭然可考；所谓并无仓颉其人，仓颉造字亦是荒渺无稽之传说；"史籀，书名，未尝言史官而籀名也"；"科斗文"亦属臆造；金文可证《说文》的"传写之误"、"解说之误"等。书前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等人的序，对此书赞赏有加。

1917 年，容庚拟《殷周秦汉文字》之编撰计划，是书为其一部分。1922 年，容庚曾至天津以是书稿本请正于罗振玉。1938 年是书补订重版，共收商周金文 1804 字，附录 1165 字。1959 年印行校补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考古学专刊》乙种第 9 号。作者晚年由马国权、张振林先后协助，继续增订，1983 年容庚逝世，书由张振林完成，新版于 1985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收 2420 字，附录 1352 字。

顾颉刚作《盘庚》、《金縢》两篇的今译发表，开《尚书》今译之先河。

顾氏意在明了经书的真相，辑出古代的真貌，并探索怎样使《尚书》能为今日研究工作所利用。该项工作在学术界甚得好评，朱自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整理国故引起了古书今译。顾颉刚先生的《盘庚》篇今译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书奥妙的气氛，所以将《尚书》里诘屈聱牙的这《盘庚》三篇用语体译出来，……他的翻译很谨严，也够确切；最难得的，又是三篇简洁明畅的白话散文，独立起来看也有意思。"

秋冬，梁启超作《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

梁氏拟撰一部多卷本《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为第一卷，《五千年史实鸟瞰》为第二卷，此文是《社会组织篇》的一部分，是 1925 年在清华大学之讲义。

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托，伯希和在亚洲学会会议上介绍国学门的概况。

在伯希和建议下，亚洲学会允诺把该会出版的《亚洲学报》与国学门的《国学季刊》作为交换刊物。

同年，伯希和又受法国远东学院及北大国学门两个机构共同委托，代表它们出席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万国地理学会，并在会上代表国学门向与会代表致意。

王志刚在中州大学《文艺》第 1 集第 2 期发表《古史稽疑楔子》。

王志刚对当时的疑古风气提出批评，认为："近数十年来，学者疑古之心甚切，古书中发见伪作者不少。《古文尚书》即其一例。然此特关于著作之一部分；从未有于数千年著作中所称之人物制度而疑其伪托者。有

之，则自康有为孔子改制说，以尧舜为古代所无之人，孔子改制，特假托之。此说当时信者绝少，故于学术界影响甚微。自新文化运动声浪日唱日高后，而所谓整理国故之大人先生，疑古之心尤突过前人。如疑古代文明为历代所发明，非至黄帝时而始一时出现者，胡适之唱之，一般学者和之；不特影响于荒古之历史，且波及于迁史所传之屈原。又如顾颉刚等又疑及神禹为古代之怪兽，立使神州古史与神话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强天下人舍古以从今，恐非易事，无怪乎又有人为抱不平之鸣也。”

此文后收入《古史辨》第2册。

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翁文恭日记》40册。

此翁同龢日记记载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事，虽有缺失，但仍记载了同光四十年间不少重大事件，尤其是有关戊戌变法的记载对晚清研究有重要价值。翁同龢被黜后，曾将部分内容改写，与真实情况有所出入。

1926 年

※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 1 册出版。
※ 李达《现代社会学》出版。
※ 朱谦之《历史哲学》出版。
※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
※ 张其昀、向达等组织“中国史地学会”。

1 月

6 日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2 卷第 13 期发表《一九二六年始刊词》。

由于国学门周刊创刊时未作发刊词，顾颉刚借 1926 年始刊之际作此文以表明国学门同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态度。

此文的主要目的是辨明“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强调学问不求致用：“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科学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而不是建筑于应用上的。”“科学的目的不在应用。”“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我们研究的东西也许是社会上很需要的，也许是现在虽没有用而将来可以大用的，但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作者持一种“学术平等的观念”，提出“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而是“一律平等的”。

顾颉刚反驳应研究科学而不应研究国学的责难，认为“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

此文发表后，不仅陈源、杨振声著文表示“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

认为此文是把国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的奠基石，日本学界亦认为此文标志着中国新国学的诞生。作者大力阐扬的学术求真理念，也成为民国学术界的主导性认识，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27 日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 2 卷第 15、16 期合册刊载以“《说文》证史讨论号”为标题的五篇文章。

编者先转载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然后以顾颉刚、钱玄同、魏建功、容庚四人的文章列于其后。

顾颉刚借编《古史辨》之机而作《答柳翼谋先生》一文，就柳氏对他观点的误解处做出解释，并说明他不把《说文》和清儒著述奉为治史准绳的基本态度。“我们现在研究学问，自有二十世纪的学问界作我们的指导。我们只有以不能达到当世的学问界水平线为自己的愧耻。至于许书和清儒著述，原只能供给我们以研究的材料，并不能供给我们以学问的准绳。就是要从文字研究古文，也应以甲骨文金文为正料，以《说文》等随便凑集的书为副料。”

顾颉刚写完答书后，交钱玄同过目。钱氏即撰《与顾颉刚先生论〈说文〉书》，支持顾颉刚的论点。钱玄同说：“对于一切古书，都只认为一种可供参考的史料而已……决不愿奉某书为惟一可信据的宝典。”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并不能因其为真书，就一味相信。这是跟姚际恒、崔述、康有为及崔觯甫、章太炎诸人最不同的一点。

钱氏的弟子魏建功作《新史料与旧心理》，将柳的观点看作是学术思想中存在的“因袭”和“谬妄”两种弊病的反映。“历来少有人怀疑的便是可信的”旧心理，是柳氏对待所谓信史的态度。顾与柳的分歧“是思想的基础和方法的施展的根本不同”，乃在后者缺乏一种勇于怀疑的精神。魏建功最后写道：“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会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通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迄；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

容庚的《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是火药味最浓的一篇。容庚治金石学，熟读甲骨文字，故对柳氏仅据《说文》治文字之学甚不谓然。全文不但列举柳文的论点，逐条批驳；而且一再引用柳氏批评顾颉刚的文句，反讥柳氏治学在“空疏”与“欠忠实”之间，“二者必居一”，又谓柳氏“疏于读书”，“深闭固拒，不一涉猎”，可谓极尽嘲

讽之能事。他强调说："方今甲骨及彝器日出而不穷，如欲治文字之学，当博采以为证，不能守许氏一先生之言为已足。"

这一系列具有论战意味的文章发表后，把三年前《读书杂志》上开始的古史论辩推向高潮。这是信古派与古史辨派发生的直接学术冲突。

是月 （美）亨利·约翰生著、何炳松译《历史教学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作品，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史教授，原名为《小学中学中的历史研究法》。《历史教学法》最初连载于1919 年《北京大学日刊》，题名《西洋史教授法之研究》，发表了九章。1922 年夏受王云五、朱经农委托翻译，经两年余完成。

本书十六章，详细讨论了历史教学的原理、史学研究法、史学新趋势、史学新学说等。作者认为，历史处于动态的过程中，是"在一种继续变化的进行里面"。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同最广大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明白现状"。讲授历史的价值，"就是道德的训练，公民的训练，记忆力的，判断力的，同想象力的训练"。何炳松对这种主张进化、古今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作殷鉴的工具，反对专去记忆历史事实与时期的新史学派的观点极表赞同，"可资吾国史学家之参证"。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公布。

该院为研究"中国固有文化而设"，其研究目标，既包括"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甲骨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料"，也包括"从实际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拓之本及属于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为此，该院分设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礼俗方言等）、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建筑、雕刻、瓷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研究等 14 组。（《厦门大学周刊》第 134、135 期）厦门大学国学院筹备之际，该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参与其事，所以包罗甚广。

王桐龄《中国史》开始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中国史》的长篇序论，阐述历史的定义、中国史的命名、中国史上之种族、中国史上之地理、中国史上之年代等若干理论问题。

全书共四编，将上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四段：从太古到战国时期末为上古，这是汉族萌芽的时代；从秦统一六国到唐亡为中古，这是汉族的全盛时代；从五代到明亡为近古史，这是汉族的衰微时代；从清初到清末为近世，为西力东渐时代。又将这四个大时代细分为八个小时代。其

中将上古分为传说时代、唐虞三代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中古分为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隋唐时期，近古分为辽宋金对峙时代、元时代、明时代，近世分为清室勃兴时代、清室衰亡时代。这与梁启超、夏曾佑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有所不同。

《中国史》的体例是由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及表结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王桐龄多用统括的形式，以一、二章叙述一时代的兴亡，把握一时代发展大势，充分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长。此书有大量附表。第一编附表76通，第二编附表135通，第三编附表81通，第四编附表70通，共有表362通。其中有世系表、职官表、疆域表、刑法表、兵制表、州郡表、田制表、诸侯兼并表、姓氏表、学术思想表、事物之间关系表、选举表、群雄割据表、人物表等等，内容涉及各个方面。

该书第1编1月出版，第2编7月出版，第3编10月出版，第4编1929年出版。

张乃燕《世界大战全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彬《西藏交涉略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2月

王国维撰成《观堂古今文考释》。

王国维此一时期撰成《克鼎铭考释》、《盂鼎铭考释》，并改订《毛公鼎铭考释》，合以前所授《散氏盘考释》，成《观堂古今文考释》五卷。《古史新证》至寒假已讲毕，故合此数考，连同其他周代彝器铭文考释，作为向研究院诸生讲授金文的教材。据周传儒记述："至于金石方面，迈越前贤，如欧阳修、薛尚功、王黻、赵明诚、王昶，以及吴大澂、端方、俞樾、孙诒让等，而对于古文字、古器物，别出新解，……其毛公鼎、散氏盘、大小盂、克鼎诸考释，能与历史、地理相结合，以一字一句证明史地若干问题。并且诸器铭文，洋洋洒洒，多则数百言，少者数十字，其幅度等于《尚书》之一篇。即比之于新发现一部《尚书》，亦不为过。"

梁启超评述："《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

中华学艺社编辑《唯物史观研究》作为"学艺汇刊"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学艺汇刊"还收录了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1926年2月）、《中

国教育史略》（1931 年 12 月）、《中国田制史略》（1935 年 5 月），中华学艺社编《国故论丛》（1926 年 5 月），钱宝琮《古算考源》（1930 年 6 月），李俨《中算史论丛》（1931 年 6 月）等书。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予同认为只有超脱学派偏见，“从历史入手，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是当时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乃在 1925 年接受李石曾的建议，撰写了《经今古文学及其异同》在《民铎》杂志上连载，并于 1926 年将此文合编增订为《经今古文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经今古文的诠释”、“经今古文异同示例”、“经今古文的争论”、“经今古文的混淆”、“经今文学的复兴”、“经今古文学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经今文学在学术思想上的价值”、“经今文学的重要书籍”。

该书抓住了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且跳出了经学门户的窠臼，出版后影响不小。1929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又将此书收入“万有文库”出版，1955 年中华书局又出版该书。

王国维《人间词话》由北京朴社单行出版。

卷首俞平伯序，高度评价这本寥寥数千言的书内“明珠翠羽，俯拾即是”，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瑰宝”，并揭出此书要旨在“论词标举‘境界’”及“‘隔’、‘不隔’之别”。

（日）三浦藤作著，张宗元、林科棠译《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月

15 日　中国大学主办《中大季刊》创刊。

第 1 卷第 1 号刊登吴承仕《经名数略释》、《尚书古今文说》，伍剑禅《墨经解难》等文。

25 日　孟森在《东方杂志》第 6 号发表《中国染业史》。

是月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4 卷第 1、2 号合刊发表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汉译《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

文章主要通过对北京城内一些老店铺的老账簿等第一手资料的分析，探讨 1900—1924 年间北京城内以主要商品如食品等的物价波动、家庭生活的资金分配等情况。文章还配有相关变化图表。该文不仅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风气之作，而且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桑弘羊之经济政策（附桑弘羊年表)》、陈翰笙《俄国历史的研究》等文。

陈衍主编《国学专刊》创刊。

创刊号刊载叶长青《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关系》、陈衍《周礼辨证》、《史汉研究法》(第4期连载)、陶然《中国活字版考》等文。

刘炳荣《西洋文化史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4月

“中华学术团体学会”成立。

此会由历史博物馆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等学术机构联合成立。

《实学》月刊创刊。

该月刊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刘盼遂、吴其昌、杜钢百等组织的“实学社”所办，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

徐宗泽编著《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由徐家汇圣教杂志社出版。

5月

梅贻琦被选为清华教务长后，开始建立学系制度，在大学部本科设立国文、历史等11个学系。

历史学系开设的课程第一年有“中国通史”(陆懋德)、“西洋通史”(刘崇鋐)；第二年有“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西洋近百年史”(钱端升）等；第三年有“中国上古史”(陆懋德)、“美国历史”(麻伦)、“日本史”(刘崇鋐）等。尚缺“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等教授。

程演生编《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出版。

此系程演生两年前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一说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共收《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颁行诏书》、《天父下凡诏书》等八种太平天国印书，内有三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该书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

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录九种太平天国印书。

王国维在《学衡》第 53 期发表《辽金时代蒙古考》。

中华学艺社编《国故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许啸天整理、胡翼云校定的《墨子考证》由上海群学社出版。

6 月

1 日　梁启超在《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发表《中国都市小史》。

此篇与 1926 年 12 月《史学与地学》第 1—2 期所刊《中国之都市》皆系《中国文化史》“都市”部分的内容。文章简要梳理了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商业城市的发展、设施等。有研究者认为，该文“实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

6 日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胡适对整理国故进行反思。

胡适表示：“这事我大约总得负一点点责任，所以不得不忏悔。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然而看看现在，流风所被，实在闹出多少弊病来了！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就是几万字的介绍。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材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他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走出一条生路。

马幼渔为胡适开解说，社会上复古思想的回光返照，与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并无因果关系。但他又主张，少数专家责在表现国故学这一“死路”之真相，不必因噎废食。“至于负有指导青年之责者如各大学教授，极宜大声疾呼，引导一般青年，向活路上走去。”

整理国故自 1919 年倡导，1923 年前后进入高潮，已引起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批评而面临危机。

11 日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 1 册由景山书社出版。

书首冠以顾颉刚长达六万言的自序，说明自己治学的经过，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产生这些见解的原因。顾颉刚谓：“我的唯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

此册共三编。上编三万字，是在《读书杂志》进行辩论前的文字，可反映辩论古史的由来，顾颉刚以为与胡适讨论姚际恒遗著的来往书信“实开予等治史之门”，因而置于上编之首。中编九万字，是《读书杂志》上

所发表的，顾氏认为“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下编四万字基本上是在《读书杂志》辩论后的文字，可反映其现在的研究趋向。

此书在当时的古史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胡适评价云：“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这些讨论至今未完。但我们可以说，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展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在中国古史学上，崔述是第一次革命，顾颉刚是第二次革命。”陆懋德称：“此书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于青年心理者极大，且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

到 1941 年，《古史辨》共出版 7 册，收入 20 年间考辨古史的论文 350 篇，约 325 万字。

在此书的推动下，一些学者纷纷加入，于是在中国史坛上形成了一个以疑古辨伪为旗帜，以“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为基本理论的学派——“古史辨派”。一方面，这一学派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他们以进化论为指导，打破了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摆脱了儒家经学的理论束缚，刷新了人们的历史观念。另一方面，古史辨派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是继乾嘉学派之后又一次带有典范意义的“古籍整理”运动，开启了古籍整理事业的新时代。有论者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布尔（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古史辨派成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巨的学术派别。

30 日　“东方考古学协会”成立。

协会由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学会与日本的东亚考古学会联合成立。日本京都大学的滨田耕作和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来北京，与北京大学的蒋梦麟经过会谈，双方正式组成“东方考古学协会”，并联合举行公开讲演会。

1927 年 3 月 27 日，在东京召开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回总会，同时举行中日学者的公开讲演会。中方讲演者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编辑部主任罗庸、北京大学教授马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讲题依次为“模制考工记车制述略”、“中国之铜器时代”、“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日方为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池内宏，讲题为“支那之古

玉器与日本之勾玉”、“汉人之缯绢” 等。

是月　李达《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长沙自修大学、湖南公立法政学校、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学讲义。

自序中指出马克思“所创之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实可谓空前绝后。彼不仅发现社会组织之核心，且能明示社会进化之方向，提供社会改造之方针，其贡献之功实有不可磨灭者”。并明确表示，此书之作，就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

此书内容广泛，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又论及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还批评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全书共 18 章，其中从第 1 章到第 11 章，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的变迁，如“社会之起源”、“社会之发达”、“家族”、“氏族”、“国家”、“社会意识”、“社会之变革”、“社会之进化” 等。这一部分约占全书的一半，似可视作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

《现代社会学》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草创阶段的一些重大理论空白。与先前问世的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以及瞿秋白《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相比，该书不论是研究问题的深度、广度，还是在阐述问题的准确性方面，均有明显提升。该书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都有研究。不过有研究者指出，李达书中所阐述的社会进化之原理，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表述译过来的，李达对于这一原理的中国化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方法论。

尽管该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它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研究，为后来郭沫若、吕振羽等运用唯物史观具体而微地研究中国社会史，提供了启示。吕振羽说：“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不会忘却的。”尹达说：“二十年代前期讲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最著名的是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和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循此，人们也找到了寻求中国社会进化法则的通道。”

自 1926 年出版至 1933 年，共印行 14 版，足见影响之广泛。1928 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

（日）高桑驹吉著、李继煌译《中国文化史》作为“历史丛书”

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叙述从周至清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着眼于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时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日本人的视角。

收入商务印书馆“历史丛书”的主要史学类著作还有（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1926 年 10 月），（英）司各脱著、钟建闳译《近代名人与近代思想》（1928 年 3 月），（德）米勒利尔著、陶孟和等译《社会进化史》（1929 年 10 月），木尔兹著、伍光健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1931 年 11 月），林泰辅著、陈清泉译《朝鲜通史》（1934 年 4 月），何鲁之《希腊史》（1934 年 7 月），（法）瑟诺博司著、陈建民译《古代文化史》（1934 年 10 月）等。

王国维在《清华学报》第 3 卷第 1 期发表《鞑靼考》。

作者认为《辽史》之阻卜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鞑靼，但因蒙古人讳言鞑靼，所以元朝史官将辽金史中的鞑靼一词删改殆尽。王氏还认为辽金时代根本就没有阻卜之称，该词系元朝史官有意颠倒误写。此文发表后引起争论，后经蔡美彪等人论证，王国维此文所提阻卜即鞑靼说基本成立。文后附《鞑靼年表》。

同期还刊载了刘大钧《中国古代田制研究》、钱基博《汉儒显真理惑论》等文。

郑观文《中国音乐史》由上海大同乐会出版。

7 月

1 日　广东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北伐战争自此揭开序幕。

11 日　周予同在《文学周报》第 233 期发表《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

作者对顾颉刚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作了评述。

关于辨伪的工作，周予同认为“在现在国内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国学方面，我承认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周予同建议作一部集大成的、有系统的《古今伪书伪物考》，这样“才能网罗古今来辨伪的片言只语而无遗漏，而学者也可以因此而对于古今来伪书伪物得到完整的、历史的、系统的而且彻底的了解”。

关于考证古史真相的工作，他指出：“大概我们要考证古史的真相，逃不了两个方法：一、实物考证法；二、记载考证法。而前者方法的价值实远胜于后者。”

关于用研究故事转变的方式来研究古史的方法，周予同认为“这是目

下研究古史的最重要工作，而且比较地容易有成绩”。

是月　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中国近百年资料数十篇，分为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太平天国、湘淮合军平捻记、勘定西域记、中英滇案交涉本末、中俄伊犁交涉始末、中法兵事本末、中日兵事本末、光绪帝与慈禧、戊戌政变、八国联军、蒙藏交涉、中国革命之经过等 13 项。1933 年 2 月，该书改名为《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出版。1933 年 9 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左舜生编辑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上下册。

陈寅恪到任清华研究院。

1925 年 2 月清华研究院即决定聘请，6 月陈寅恪复函同意应聘，由德归国后因父病请假一年。

陈万里《西行日记》由北京朴社出版。

此书系对西部石刻、壁画、雕塑、古城遗址等进行实地调查的调查报告。

姚际恒著、顾实重考《重考古今伪书考》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杨启高《史记通论》由青山阁出版。

8 月

21 日　沈兼士、顾颉刚等学人抵达厦门大学。

因张作霖入北京通缉进步分子，于 5 月前往厦门大学就任文科学长的林语堂乃聘请沈兼士、鲁迅、顾颉刚、张星烺等前往任教。8 月 25 日，厦门大学因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乃改聘顾氏为史学研究教授。

是月　王国维编校《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列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

此书凡四册，其目为：一、《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二、《圣武亲征录校注》；三、《蒙鞑备录笺证》；四、《黑鞑事略笺证》，附《鞑靼考》、《辽金时蒙古考》。

吕思勉担任光华大学教授。

此时光华大学尚无历史系，吕氏担任国文系教授。成立历史系后，始担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直至 1951 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先生也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9月

朱谦之《历史哲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提出“生命史观”。

本书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作者受新生机主义者杜里舒、柏格森、麦独孤、鲍尔文的影响，又借重孔德、克鲁泡特金等人。

朱谦之提出“生命史观”，又称“生机主义史观”。即采用生物学的方法，主要是西方生物学中的“新生机主义”，借助孔德的实证哲学，将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他把人类的本能看作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人类的历史就是本能与物质环境不断冲突的革命史。他称自己的历史观为以本能为本位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历史叙述的是知识线上的进化。人在生机力的推动下，造出了知识线上伟大的复杂的系统，如宗教、艺术、道德、政治、法律、经济、科学等。正是由于知识线的进化，人类才得以进化。他指出：“历史的原动力，决不在于施行残忍政治和激成民族仇怨的强权阶级，或少数的英雄，而在全体社会的知识线上的活动的体相。”并主张纪念那些知识线上的人物，而对于那些非知识线上的人物，“那些一向占历史中枢的帝王、贵族、军阀们，我们应该有胆量，把他赶在‘进化史’的外面”。

许冠三认为：“《历史哲学》的主旨相当鲜明，无非是摭拾流行的西洋学说凑成一‘生命史观’，以抗拒因国共合作而日渐抬头的唯物史观。”

王伯祥在《一般》创刊号发表《读〈经今古文学〉和〈古史辨〉》。

作者评述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和顾颉刚《古史辨》两部著作。文章指出：周是倾向今文的经学家，顾是万物齐观的史学家。他们外观虽不同，——只是研究的方面不同——而其终极之点还是归结到“实事求是”四个字。

王伯祥指出了顾颉刚“万物齐观”的治学特点：“他持平恕观物的态度，所以‘万物齐观’，而求所以各存其真；以此没有偶像的崇拜，没有门户的依傍，没有主奴的成见，不但把古今优劣的障壁打通，而且连那雅俗的鸿沟也填平了。”

《国学辑林》创刊。

本刊以“阐扬国粹，发达世界文化为鹄的”。创刊号刊载顾实《释中史》、卫聚贤《齐桓公西伐大夏的所在地》、蒋维乔《重考古今伪书考序》等文。

唐钺《国故新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郎擎霄《老子学案》由大东书局出版。

（日）渡边秀方著、刘侃元译《中国哲学史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月

10 日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

由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几位骨干加盟厦大国学院，组织上基本继承北大风格，设语言文字学、史学及考古学、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等 5 组，并组织风俗调查会。林语堂、沈兼士分别担任总秘书和主任，研究教授周树人、顾颉刚、张星烺，考古学导师林万里、陈列部干事黄坚、编辑部干事孙伏园、出版部干事章廷谦、图书部干事陈乃乾、英文编辑潘家洵，编辑容肇祖、丁山、林景良、王肇鼎，除后二人外，其余均出身北大。1926 年 10 月底沈兼士回京，张星烺代理其职务至 1929 年。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创刊。

该刊主要目的是将馆藏物品资料传布以利研究，其宗旨是“保文物以存国性”、“辑史料以供研究”、“重实验以正虚诬”、“整旧说以成学术”。

第 1 期刊登了《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太医院旧存针灸铜像沿革考略》、《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第 2、3 期连载）等文，并设“考古译丛”栏目，介绍国外考古等方面的消息。

胡韫玉主编《国学》创刊，由大东书局发行。

15 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此次发掘工作 12 月初结束，共获仰韶文化时代遗物共 76 箱。这批遗物运回清华后，曾进行公开展览，李济作讲演，王国维等人参观展览。关于这次的发掘成果，李济著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梁思永著有《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中之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英文，1930）。

西阴村的考古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科学发掘工作。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儿童史地丛书”。

该丛书收录（英）张伯伦著、陈锦英译《人类的住所》，（英）张伯伦著、何其宽译《人类的食》，（美）丁歇金鲍汤著、吕金录译《太古世界图

说》，（美）房龙著、陈叔谅译《远古的人类》等书。

《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改为《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

因教育部屡屡拖欠学校经费，致使《国学门周刊》不断延期。加之此刊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后，稿件往返京沪时间增加，脱期情况就更为严重，十个月里只勉强出了24期。为了改善状况，编辑同人决定将周刊改为月刊。

新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月刊》，篇幅较《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增加不少。在形式及研究趋向方面，刊载的文章虽仍以民俗一类居多，但其数量在来稿中所占比例，已从《国学门周刊》时期的二分之一减为三分之一。考古、学术思想及语言学方面的论著，也各占不小的比例。

第一号为“考古学专号”，刊载的主要内容为关于壁画、造像碑、经幢、古代器物、古代语音等。

李璜在《东方杂志》第20号发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作者指出：“近三四十年来，因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同时发展，更是彼此影响而关系愈密。”“历史学的发展，实大有功于社会科学。……近今社会科学的发达，也实使历史内容改了观。”“人类学和人种学使历史增加了生理的背景，风俗学和考古学使历史认识到文化的源头，经济学为历史指出经济生活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足以使历史学家眼界大开，头头是道；而近二三十年来社会学的进步，又使历史家深切的了解，‘社会’这个建设对于人类活动有一种超个人的力量。”总之，“社会科学每有所见，必定立刻要影响到历史科学；而历史科学每有所得，也必定要影响到社会科学”。

陈垣《中西回史日历》由北京大学刊行。

陈氏在自序中指出：“因中历闰月及月大小尽无定，不著中历朔闰，以中西回历互求，恒不能得其岁首以外之月日，于研究元史及中西交通史仍不便。乃发愤将二千年朔闰先行考定，以为根据，就《通鉴目录》中宋刘羲叟《长历》及《辽史》中耶律俨《辽宋闰朔考》，并近代钱侗《四史朔闰考》，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等。各以本历，参校各史纪志，正其讹谬，自汉迄清，成《二十史朔闰表》。又按西历四年一闰之月日，创为表格，然后以考定之中历朔闰及回历月首，按表填入，始自耶稣元年至于今，二十世纪，凡二十卷，名曰《中西回史日历》。于是中西回史之年月日，皆可互通矣。又制日曜表，按表而日曜即得。又制甲子表，据甲子表，据甲子以求日，或据日以求甲子，无不得。稿凡五易，时阅四年。”

《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是中国近代历表编制的创举，

是我国中西回历合编的最早著作，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方便而准确的换算工具，为运用中外史料打开了一条通道。

（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史学原论》于1897年8月在巴黎出版。此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史学的初基知识，包括搜索史料、辅助之学科两章。中篇论分析工作包括历史知识概说和外形内容鉴定两部分。下篇是综合工作，包括历史构造之概说、事实之汇聚分组、构造之理想推度、构造之大体编裁、史文造作五章。综观全书，可知这是作者根据自身研究经验，并且吸取德国人伯伦汉（Ernst. Bernheim，又译为朋汉姆）的史学观点而著成。

《史学原论》是“现代历史研究法名著中推为最完善佳本”。它和伯伦汉的《史学研究法》对中国学者关于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成为史学方法方面的基本依据和参照。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著作中论方法的内容多根据《史学原论》，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张荫麟等都受其启发。

张尔田在《学衡》第58期发表《上陈石遗先生书》。

张氏批评了时人对敦煌甲骨材料趋之若鹜、蔑视古经的风气：“若夫新郑碎金敦煌残楮，其所以为吾经典佐证者，盖亦有限。然此乃成学者取资。今悉屏落一切，驱天下之学僮惟是之从，至有正经疏注，终身未读其全，而中西稗贩，高谈皇古者，侮圣蔑经，行且披发于伊川矣。某生平师友，若孙仲年丈、王君观堂，其为学皆自有本末，乃亦为时风众势，扳之而去，私心诚不能无惜。”

萧楚女撰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书。

此后数年间，撰写出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蔚然成风，于树德、陈彬和、黄克谦、张佳玖、黄孝先、吴寿彭、黎炎培、王敬、知行丛书社、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等分别撰写出版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此外还有题名稍有不同的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唐守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痛史》等。

张世禄在《史地学报》第4卷第1期发表《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

高维昌编《西洋近代文化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

邓之诚自费印行《骨董琐记》8 卷。

作者从史学类典籍、前人别集笔记中摘录出有关“金石、书画、陶瓷、雕绣，尤详于明清两代的朝章国故，逸闻轶事”，共“七百余条”，成书 8 卷。该书出版后受到文史学界的欢迎，邓之诚乃在 1933 年又印行《骨董续记》4 卷，1941 年又成《骨董三记》6 卷，但未印行。1955 年 7 月，三联书店将此三编合为《骨董琐记全编》出版。

缪钺在《学衡》第 59 期发表《与学衡编者书》。

缪钺批评新旧两派各走极端：“居今之世，尊人尊己，举无一当。惟有镜照衡权，撷长弃短，镕冶为崭然之真新文学，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庶几得之。自三五钜子，以肤受末学，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登高一呼，得名而去，使后生嚣嚣然狂走不已，其敝既为识者所洞鉴矣。而鸿生硕彦，湛溺旧闻，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于西人之作，一切闭拒，以为绝不可相谋，斯亦未为得也。荀卿有言，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今哗众取宠之士，既蔽于今，蔽于浅矣，而老师宿儒，抱残守缺，又不免蔽于古，蔽于博。闳达不出，孰通其邮。此千钧之责，惟冀诸君子负之，而华夏文运，亦将于斯卜盛衰焉。”

（日）鸟居龙藏著、汤尔和译《东北亚洲搜访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 月

1 日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对教育学术界采取高压政策，大批学者南下。

《史学与地学》创刊。

此刊由中国史地学会负责编辑出版，出版 4 期后停刊。柳诒徵在该刊《弁言》中指出：“宇宙者，时空是和也，时无终始，空无畔岸，相赓相错，而成历史，而形地理，故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国家者，亦时空之和也，画时而为世，截空而为域，纵则有史，衡则有地，故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人生者，亦时与空之和也，演以年寿，孕以风土，心量所函，惟历史与地理所宰制耳，故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柳氏还指出，“求真之学，莫尚史地，膺斯任者，莫先吾族”，从传统看中华民族有能力治好史地之学。柳氏最后指出，“所以振吾族文明之零落，中国史地学会之兴职是故也”，“一刹那之溃

乱，曾何足以紊学者之灵府，昭我国光，进兹世运，持真学术与时空相副，永永勿懈，豪杰之士，无所于让”。

柳诒徵在《史学与地学》创刊号发表《中国史学之双轨》。

作者指出：“吾观近制，冥符古谊，剖析本末，标曰双轨。一则类举件系，原于《世本》；一则以时属事，本之《春秋》。”作者认为，旧史家一般是不研究专门史的，清代学者大多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或校订，或补充，于深入与重点研究某一个问题，则不甚措意。同时，旧史家根于帝王，专注朝廷，而忽略了历史进化的主体即民族与社会的生活，故视野狭隘。这反映在中国史部上，则是分目不广，大抵以书为类，甚少以事为题。今史标举民主，史例自当因时而变，即当扩大史的范围，如农商渔牧、工艺医药、建筑绘画、音乐文学、宗教风俗，以及军事外交、政治教育、路电邮船等，上下古今，胪举万流，无不可“仿欧美之例，著为专门之史”。不惟如是，从前的历史不过范围数千年，今则由人类学的发展而可推知数十万年之前；从前只人类有史，今则推至动物植物以至于矿物地质等等，莫不可以有史。依柳诒徵的说法，此为“革新正史”，“运用以新法，恢弘史域”，“于史界开新纪元”。

同期还刊载了缪凤林《读史微言》、向达译《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郑鹤声《各家〈后汉书〉综述》、张其昀《人生地理学之态度与方法》（第 2 期连载）、梁启超《中国之都市》（第 2 期连载）、陈汉章《中国回教史》、陈训慈《希腊四大史学家小传》、裴复恒译《比罗奔尼苏战役史》、王庸《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等文。

10 日　闻宥在《国学月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国学概论》。

闻宥将国学研究者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背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说，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说，在乎自视过卑。自视过满者，固不欲引人以自广，自视过卑者，亦不惮尽弃而从人。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

15 日　陈竟在《中大季刊》第 1 卷第 3 号发表《上古史学概论》。

是月　李思纯《元史学》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写作得到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朱希祖等的帮助。本书内容包

括元史学之鹄的、过去之元史学及其史料、元史学之各项问题、元史学之将来。本书以世界学术的眼光，对当时已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的蒙古学的兴起、资料分布、研究范围和关注点，特别是中外各家各派的得失作了综述，第一次为国内的蒙古史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学术史背景。

李思纯在考察了中外蒙元史研究的历程后，指出："中西两方之所研究，向日皆各自从事，不相贯通。自洪钧以来，已有双方融会之势，然终为时代与能力所限，仍未能有完美之效。今中西之交通大启，双方之研究成绩灿然列于吾人之目前。凡前人为见闻所囿，徒费辛勤而终不能成完美之工作者，吾人今日皆可一举而补成之。吾人当此优越之时会与境地，但能勤搜博采，即可将中西史籍中所得者，一炉合冶而收奇效。"

陆懋德在《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发表《评顾颉刚古史辨》。

作者认为"此书实为近年吾国史学界极有关系之著作，因其影响于青年心理者甚大，又足以使吾国史学发生革命之举动也"，及"余披阅顾君之书一过，甚服其读书之细心及其疑古之勇气，然亦惜其唯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辩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顾君愿为'科学的史学者'，余惜其书亦有未能尽合科学之理而易滋青年后学之惑者"。文章最后指出："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Pre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顾君之书虽未求得结论，而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而其地位已感其动摇，则此书势力之大亦可惊矣。"此文后收入《古史辨》第2册。

同期还刊载了赵文锐《唐代商业之特点》、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等文。

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傅斯年到校后，聘请了鲁迅、施存统、许德衍、容肇祖等人，1927年又聘请了顾颉刚等一批学者。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卷由北平师范大学出版。

李俨在《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4期发表《明代算学书志》。

是年

年初，张其昀、向达等组织"中国史地学会"。

柳诒徵为总干事，具体事项由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向达和张其昀负责。

“中国史地学会”的会员散居各地，如向达、张其昀在上海，陈训慈在浙江，柳诒徵在北京女子大学任教，缪凤林等远在东北，通过学会长久保持学术联系。柳诒徵等人组建的史地学会虽然以“中国”为号，成员为南高师时之师友，地域限于江浙一带，完全是一个地方性组织。他们特重发扬传统史学优长的治学倾向，可视也为南高史地学会的继续。

同年底出版会刊《史学与地学》，其供稿者以史地研究会同人为主。

刘复（半农）《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由北新书局出版。

此为刘复六年前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比张德坚《贼情汇纂》所刊15目多出十余种。还收有《忠王致护王书》、《忠王致潮王书》等重要文件。

此书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

李大钊与朱希祖制定1926—1927年度《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

其中指出：第一，采取中外汇通与比较方法。“盖现代史学，以人类全部之历史为归宿”，对于史学，要本国与外国并重，“本国史与外国各种史，须汇通观之”，“务期本国与外国同一时代之历史，详细比较”。第二，注重综合性、系统性。现代史学已是科学的史学，学习史学，首先要学习基本科学，即人文地理、生物学、人类学即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宪法、社会心理学等。又要学习各种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以及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还要学习“本国、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及治史方法”，如本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名著讲演、历史学、欧美史学史等。另外，考古学、统计学是史学的重要补助学科，外国语至为重要。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铅印本由大东书局出版。

是书计分三卷，考述了金元、明、清包括散曲、传奇、杂剧等在内的中国戏曲发展史。

夏，李济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特约讲师，讲授人类学、考古学等课程。

1927 年

※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出版。
※ 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
※ 李大钊遇害。
※ 王国维自杀。
※《燕京学报》创刊。
※《清史稿》陆续刊行。

1 月

(俄)波格达诺夫著、周佛海译《经济科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提出社会发展三阶段论。

其中，波格达诺夫提出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即“自然自足的社会”、“商业社会”和“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波格达诺夫还是“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创始人。他将生产方式归结为交换和消费形式，并把商业资本当作历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阶段，认为商业资本在分解封建的生产方法以后，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一个支配的时代。苏联史家波克罗夫斯基首先把波格达诺夫这种独创的经济理论应用于历史科学的领域内。在中国，陶希圣袭用了“商业资本主义”说，有人甚至将“商业资本主义”说称作“陶希圣主义”。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也多处征引此书。

本书另有施存统译本，名为《经济科学大纲》，上海大江书铺 1929 年出版。施存统在译者序言认为它是一部经济学名著，并说读了这本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经济现象”，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演进过程”。它对中国人尤其有益，“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现状”。

中华书局出版“常识丛书”。

该“常识丛书”收录李璜《欧洲远古文化史》(1927 年 1 月)、傅代

言《道教源流》（1927 年 11 月）、陈懋烈编《欧战小史》（1931 年 4 月）、朱君毅编《中国历代人物志地理的分布》（1932 年 7 月）、朱寿田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小史》（1934 年 12 月）等史学著作。

许啸天编辑《国故学讨论集》由上海群学社出版。

编辑者认为只有“得了门径，才可以进而讨论学术”，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国故学里有些什么门径”。该书收集了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吴文祺《重新估定国学之价值》等文章。

2 月

梁启超开始在燕京大学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演讲。

此演讲系受“疑古运动”风气影响而生，至 6 月结束。后来演讲稿收入 1936 年合集中，1955 年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

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是中国学者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梳理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还细致中肯地辨析、评价了传统的文学批评。

吴毅编《世界革命史》由新文书局出版。

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邵元冲讲演世界革命史》，第二部分是《孙中山先生在神户之演讲》。

3 月

5 日　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其主要内容是：一、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二、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三、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

此文关于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阶级产生了重要影响。

6 日　陈垣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的学术报告。

陈氏说：“二十年前，余即有意编纂《中国回教志》。其总目下：一、宗派志；二、典礼志；三、民族志；四、户口志；五、寺院志；六、古迹志；七、金石志；八、经籍志；九、人物志：经师、卓行、政绩、武功、

文苑、方术、杂流、列女；十、大事志。附：中回历对照表、历代哈里发世系表、唐宋辽大食交聘表、元明清回回科第表。但以关于户口、寺院、金石诸门，非实际调查不可，而中国回教团体，组织不完备，调查殊感困难，故此书至今尚未完全成功。近又思缩小范围，改变体例，名为《中国回教史》。”

这次学术报告，由研究所学生冯沅君记录，记录稿经过他本人修改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6号（1927年9月）发表。1928年1月10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转载时，改题为《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此篇讲稿集中表达了作者撰述《中国回教史》的构思和框架。

16日　顾颉刚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决定就聘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

31日　康有为在青岛去世，享年70岁。

是月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由东方学会出版。

该书系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写成，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篇，共考释485字。该书1914年曾有王国维手写石印，1923年商承祚将前四篇附于《殷虚文字类编》中。东方学会所出为增订版，书前有王国维序言一篇，对文字的考释增加到571字。该书对甲骨卜辞的释读将甲骨文研究从文字学的资料整理提高到历史研究的水平，对后来上古史研究影响重大。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

4月

7日　顾颉刚在厦门青年会作《研究国学的方法》演讲，明确提出了要打倒“帝系”、“道统”和“圣经”。

12日　“四一二”政变爆发，国民党开始“清党”。

16日　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始对周口店遗址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

此次发掘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是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者翁文灏在签订的合作协议中规定，采集到一切古生物标本可放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研究，但所有权归中国地质调查所，不得运出中国。

此次发掘由安特生负责，步达生主持具体的发掘工作。发掘至10月

18 日结束时，共获得化石材料 500 箱，发现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

1927 年 12 月，步达生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 7 号第 1 册发表《周口店堆积中一个荷谟形的下臼齿》。在此文中步达生提议建立一个人科的新属新种，即“Sinanthroous Pekinensis Black and Zdansky”，直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17 日　顾颉刚应中山大学之聘抵广州。

顾氏因为和鲁迅之故，旋即被学校派往江浙一带购书，历时 5 个月。顾氏作《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说明购书的宗旨和内容，他认为“藏书的目的是要劝人取它作道德和文章的。现在我们的目的是在增进知识了，我们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齐收来”，使“普通人可以得到常识，专门家也可以致力研究”，并认为“这一个态度的改变，是从恹恹无生气的，和民众不发生关系的图书馆改作活泼泼的，供给许多材料来解决现代发生的各种问题的图书馆的大关键”。

他计划购求图书资料有 16 类：经史子集及丛书、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帐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会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之图像。

中大图书馆馆长杜定友为作《书后》曰：“我们的宗旨，非但要把它作为购书的根据；而且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图书馆学上发生重大影响，以助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后来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在介绍此计划书文中说道：“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的称便。”

18 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26 日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等合组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和赫定分别担任中瑞团长，中方参加者有袁复礼、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等 10 人。5 月 9 日考查团从北京出发，对内蒙至新疆等地进行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综合科学考察。协议规定考察所得“关于考古学者，须经交与中国团长或其委托之中国团员归本会保存。关于地质学者，其方法同上。但将来运回北京之后，经理事会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与斯文·赫定博士”。西北科学考查团取得的成果有发现居延汉简等。

28 日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时年 38 岁。

是月　赵祖铭著、李时校订《清代文献迈古录》在北京出版。

陈友琴《现代中国经济略史》由中山大学政训部出版。

高尔松《国际社会运动小史》由上海光华书店出版。

5 月

9 日　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成立。

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任筹备委员。筹备处附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1928 年 4 月改为独立机关。

12 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发起清华大学史学会。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出席，并“各致己见于众”。

姚名达“感于中国史之范围过大而材料特丰也，非通力合作，则人自为战，永无成功之希望。若在外国，则国虽小而学会林立，所以裨益学问者无所不至，而史学会之为用尤显。吾国则他学容有学会，史学会独无闻焉，抑可怪也。间尝语之我师友，以谓吾院治史者众，又得梁、王、陈、李诸先生为之师，益以大学部史学系师生，不下四五十人，苟能联络组织，分工合作，其为功效，宜有可期……今年夏，更言之于刘寿民先生，适史学系同学亦有斯意，双方接洽，史学会遂以成立”。“若更扩之于北京，充之于全国，以大规模之团体，作有计画之事业，则不出十年，中国史学，必当一变昔日之偏蔽而为昂进之发展”。姚名达还追述：王国维“谓宜多开读书会，先有根柢而后可言发展。”会后，王氏“与寅恪先生同行，颇有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而不知其实欲有所贡献于史学也”。

是月　陈宝泉撰《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

此书以作者的亲身阅历为基础，是第一部较完全地记述近代学制变迁的专著。

范文澜到北京，下半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6 月

2 日　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

其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溥仪谥之为“忠悫”。

梁启超对自己的女儿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顾颉刚认

为，“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上、思想上”，“同样的一本旧书，信仰它的糊涂虫和研究它的学者，他们得到的结果是绝对不同的。静安先生在二十余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在新的思想和方法之下，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此外，北京《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还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

王国维之死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震动，日本学者在大阪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本《艺文》杂志两期都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业绩。法国伯希和也有多篇文章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在《通报》第26期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他也指出其欠缺，如认为王的蒙元史研究利用西方及蒙文史料太不充足等。

王氏一生著作，初由罗振玉汇编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后由赵万里等主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出版了《王国维遗书》。

16日　王国维悼祭大会在北京举行。

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尤其是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己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云：“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23日　国民党决定成立大学院。

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人提议，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同月27日，政治会议又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并于7月4日颁布。该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所设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关，决议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

重要问题”。同年 10 月 1 日大学院正式成立，蔡元培就任院长。1928 年 10 月 24 日，大学院改为国民政府教育部。

是月 《燕京学报》创刊。

此刊由燕京大学主办，编辑主任先后为容庚、顾颉刚、齐思和，冯友兰、许地山、洪业、谢婉莹、赵紫宸、黄万通、吴雷川等为编辑。编委会中大部分是知名学者，其中史学家占大部分。“简章”称：“本报以发表研究中国学术之著作为主旨，由燕京大学同人担任撰述。”从其刊发的论文的总体上看，《燕京学报》突出反映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考证学的发展情况。

稿件来源多属燕京大学文史哲三系教授的作品，也接受外稿。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论著者约有 148 人。其中不仅有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冯友兰、许地山等，还有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等。还不乏燕京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如冯家昇、张维华、杨向奎等。一些在中国的外国学者如钢和泰、顾立雅、鸟居龙藏也有论文刊载。

由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及西方学界的联系，该刊得以充分借鉴吸收西方学术期刊之长，积极介绍学界新书、引得、杂志。《燕京学报》介绍的学术论著、引得、杂志总计 300 余种。自第 30 期开设“书评”栏目，共发表书评 85 篇。

学报还刊载“学术消息”介绍传递各方面学术动态。“学术消息”栏目从第 8 期直至第 40 期终刊，不曾间断，总计近 200 条，内容有各学术研究近况、各大图书馆近况、考古消息、科考团动向、古籍珍本影印消息、学术杂志创刊或复刊消息、文物陈列开幕消息、方志纂修情况、学界名流逝世及其生平介绍等。

学报登载的文章最长不超过 4 万字，超过则出学报专号。专号的作者并不仅限于哈佛燕京社成员，而是旨在帮助学社内外的学者出版著作。专号一共出版了 23 册专著。1933 年开始出版，到太平洋战争以前出了 19 册，抗战以后只出了 2 册，新中国成立后还出了第 23 册。专号中包括了 14 册史学、4 册考古学、3 册文学史和 2 册语言学著作。作为专号的著作有比较大的学术影响。

《燕京学报》一年两期。学报出到 1941 年冬第 29 期时，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学报也停刊。1946 年夏以后恢复出版，至 1950 年冬出至第 39 期。1951 年春燕京大学改为公立，6 月印行第 40 期后停刊。《燕京学报》是当时与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清华学报》鼎足而三的著名刊物。

创刊号刊登了王国维《金界壕考》、谢婉莹《元代的戏曲》、冯友兰《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张荫麟《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容庚《殷周

礼器考略》等论文。

《国学论丛》创刊。

此刊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季刊，规定“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国学研究院结束后，《国学论丛》于1930年12月出至第2卷第2号停刊。

创刊号刊载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第2号连载）、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吴其昌《宋代之地理学史》、何士骥《部曲考》、周传儒《中日历代交涉史》（第2号连载）、余永梁《殷虚文字考》、卫聚贤《〈左传〉之研究》、陈守实《〈明史稿〉考证》等论文。

徐中舒在《国学论丛》创刊号发表《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作者通过对典籍相关被湮没的史料分析，认为殷与周并非“同种民族”，并认为当时周人“视殷人为东方异族”。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认为徐氏此一观点“对于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确是个重大的启发”。

（英）韦尔斯著、梁思成等译《世界史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上下册共三十九章，叙述从地球起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出版后风行欧美。梁思诚等据原书译出，后经向达、秉志、竺可桢等校订。

《世界史纲》流露出一种整体观念与世界眼光。该书的副题为“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囊括了从宇宙天体、生物进化到人类形成、文明演进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意在从“广阔的整体”来考察世界历史。此书打破了国别史汇纂的传统写法。如“导言”所云：“所谓世界史者，非直集合吾人习见之国别史而已，乃国别史之首经斟酌损益者，且临以不同之精神，施以不同之方法者也。”

雷海宗在《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中认为，该书翻译“又精致又正确”，但是韦尔斯之书其实是西方中心论严重的“西洋史”，只可作通俗历史读。1921年10月梁启超为翻译韦尔思《史纲》事，致信陈叔通，其中说“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实则无异我自译”。可见梁启超为翻译该书颇费润色之功。

1935年出至第5版，后收入“大学丛书”。

世界书局出版“新国民丛书”。

该丛书收录了查良鉴《中国学生运动小史》（1927年6月）、贺岳僧《中国罢工史》（1927年6月）、《孙中山年谱》（1927年6月）、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7月）、陈彬龢《中国佛教小史》（1927年8月）等书。

侯厚培在《清华学报》第4卷第1期发表《五口通商以前我国国际贸易之概况》。

文章分从“中外通商之起源”、“历朝之商业政策”、“市舶司及清代之公行”、“征税方法及其收入”、“通商口岸”、“出入口物品”几个方面简要探讨了五口通商以前我国国际贸易的情况。该文是中国学界较早研究国际贸易的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杨树达《跋〈后汉书集解〉》、唐钺《尹文和尹文子》、李奎耀《〈史记〉决疑》等文。

恽代英著《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由建国书店出版。

全书共有七讲组成，分别是：“由反清复明运动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及其影响”、“由太平天国运动至康梁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的国民党”、“五四运动”。

7月

1日　竺可桢在《史学与地学》第2期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

此文是竺可桢天文史研究的代表作，用天文学的方法推证出《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之年代”的年代约在商末周初，不仅有助于判定《尚书》的真伪，而且还示范了如何以自然科学帮助研究古史。此文与《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两文，被认为是竺可桢在天文史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得到国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说吴》、《〈宋太宗实录〉校正》（第3期连载），王庸《四海通考》，张荫麟《双忽雷影本跋》等文。

26日　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讲演会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在该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并指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该讲演稿经鲁迅修改后刊于1927年8月11—17日的《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后又刊于《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27年

11 月16 日)。

29 日　辅仁大学成立。

该校由北京公教大学改立，办学宗旨定为“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并只办文科，设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英国文学系、哲学四系，1927 年国文、历史、英文三系正式招生，陈垣为副校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张星烺为历史系主任。由于成立时间早、师资力量雄厚，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一直是民国史学界重镇之一，从 1927 年至 1952 年，先后在此任教的史学家有陈垣、沈兼士、余嘉锡、王静如、朱希祖、邓之诚、张星烺、陆懋德、方豪、方壮猷、金毓黻、朱师辙、王光炜、范文澜、柯昌泗、柴德赓、韩儒林等。1952 年 9 月，辅仁大学各系科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法学院。

是月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自序云：“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由于我国先哲讨论史法的著述十分丰富，但是能以新法综合且加以整理者却至今尚无一人，故作者以探险之精神撰述此书，以期对我国史学之研究有所贡献。此书主要依据德国伯因汉（又译为伯伦汉、明汉姆）《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罗瓦（Charlse V. Langiois)、塞诺波（Charles Seignobos）合编《史学原理》并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观点而成。何炳松的指导思想是“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书中多引中国古代学者的议论和事例，每一章的开头也必先录章学诚、崔述、王充等的有关言论。因此，本书既不是独出机杼的一家之言，也不同于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的直接编译。

全书部帙很小，而分为十章，依次为绪论、博采、辩伪、知人、考证与著作、明义、断事、编比、著作、结论。绪论对历史学的对象、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及其他学科的区别、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历史学的重要性等作了阐述。主体部分按照历史研究工作的程序，扼要论述了史料搜集、史事分析排比和著作方法程序等问题，主要是史料判断与史书编撰的具体技术问题，其中论史料鉴定占最大篇幅。但由于写法上通俗易懂，介绍西方的史学观点时，能以中国史学史上的事例加以解说，易于国内读者接受，加之出版时间较早，故影响较大。

梁启超发起主持《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工作。

此后梁启超撰写《〈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中国图书大辞典〉官录与史志》、《〈中国图书大辞典〉金石门丛贴类》、《〈中国图书大

辞典〉集部词曲之宗》等文章。后梁启超因病无法继续主持编纂工作，大辞典无果而终。

柳诒徵就任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

1929 年 10 月，该馆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柳诒徵先后聘任赵鸿谦、范希曾、向达、缪凤林等到馆工作，对民国国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山川均著、熊得山译《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此书侧重叙述欧洲经济史，分原始共产制、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端绪四章。在当时为关注社会经济史者所广泛参考。

王重民编《老子考》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

该书将从两汉至清代诸家关于老子的著述五百余种编辑成目，并绍介其特点，对后来研究者提供不少方便。

罗振玉编纂《纪元以来朔闰考》6 卷。

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8 月

2 日 《清史稿》编纂完成。

清史初稿已草成，但未经通核审定。然而，赵尔巽“以时势之艰虞”，更因“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决定立即付刊。夏孙桐则反对，认为：“为今之计，惟有仍依前议，实事求是，逐加修正……期以三年集事，纵使不幸时局有变，竟致中辍，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世人终能见谅。”但赵尔巽坚持己见曰：“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

不久，赵尔巽命袁金铠总理刊印事宜，袁又假手金梁。该年 9 月 3 日，赵尔巽病故，柯劭忞代理清史馆馆长。

6 日 张作霖令北京国立九校合组为“国立京师大学校”。

被合并的九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学院师范大学部、女子学院大学部、艺术专门学校。8 月 30 日北京军政府教育部公布《国立京师大学校组织总纲》，规定该校的宗旨为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士闳才，而教育部长兼校长刘哲在 9 月 20 日开学典礼上则提出该校今后的办学宗旨是“保存旧道

德，取法新文明”。9 月 21 日，军政府教育部令京师大学校国学门研究所改为国学研究馆，以整理、阐扬国学并指导学生研究高深国学。

是月　李泰棻《记录以前之人类史略》由北京青云阁出版。

本书包括人之由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耕种时代等八章，书末附《记录以前汉族文化发源考》一文，列举拉克伯里说、蒋观云说、章炳麟说、丁谦说和章鸿钊说。此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专著之一。

傅斯年、顾颉刚等筹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8 月，傅斯年正式就职语史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开始筹备工作，于“聘定教授，设置各研究组，招收研究生，成立各研究会，发行定期刊物及丛书等五个方面进行”。10 月 16 日，正在江浙一带购书的顾颉刚也提前返回。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作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丛书第 3 种出版。

本书为作者 1925 年至 1926 年参加山西考查团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此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篇科学的现代考古发掘报告。

9 月

潘光旦《小青之分析》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该书分为“小青事考”和“小青之分析”两部分，潘光旦在此书中不仅以大量材料证明了冯小青确有其人，而且用心理学蔼理士性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冯小青的心理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冯小青个案揭示了在制度和社会压迫下的中国古代知识女性患忧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的历史现象。该文是潘光旦踏上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仅开辟女性人类学的新天地，也可视为是心理史学的勇敢尝试。该书最初以《冯小青考》刊登在《妇女杂志》（1925），由闻一多配图，1929 年 8 月订正再版并取名《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共十五章，对 1872 年之后六十年的留学历程，包括中国留学之启动、留学美国、欧洲、日本兴起等都有梳理论述，书末附《六十年留学大事记》。作者利用当时可收集的资料，将经费、籍贯、留学科目、职业分配等情况都编制成表，让人一目了然。

作为第一部梳理中国近代留学史的专著，该书出版后就迅速产生较大

影响，至今仍为教育史、文化史研究重视。

吴其昌在清华学校《国学论丛》第1卷第2号发表《朱子著述考》。

刘秉麟《各国社会运动史》上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李大年编著《英美劳动运动史》由上海学术研究会出版。

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上下册由天津华泰印书馆出版。

10月

2日 《国学专刊》第1卷第4期“通讯”栏刊载张尔田与叶长青的来往书信。

张尔田接到叶长青等所办《国学专刊》，一方面赞赏其“取材丰备，固不限一族”，另一方面则不苟同其“总其大较，要以考据为归”的主张。希望“贵刊既以国学揭橥天下矣，由此驯而进焉，蕲以践乎其实，姬公孔父之道，吾国学一线之曙光，将惟公等是赖”。

张尔田对以考据为学术的倾向表示异议：“以为考据者所以为学之具，而未可即以此为学也。原夫考据之起也，盖以去圣久远，学者无所究索，不得不假此以邮之耳。宗邦文化，开明于周公，而大备于孔子，姬公孔父之书，乃其根柢。考据之所蕲，蕲以明此而已。三百年儒者，则古昔称先王，率崇尚考据家言，然而恒干未亡，故为可贵，末流驰逐，便辞巧说，至今日又几几有违离道本之惧矣。若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则今之所谓考据者，正可谓之骨董学，不得以冒吾国学……考据学之创始，厥维顾亭林，而亭林所志，乃在法古涤污，变夷用夏。下逮戴东原，尤今人所称能以科学方法治考据者，而其言曰：六书九数如轿夫然，所以升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

张尔田接信又复函云：“三百年考据学末流，至今日已渐离其本质，扶瑕擿衅，名为整理，乱乃滋甚。夫不能揽其弘体，而但指发纤微，即施嫱且无完美，况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矣。輓世学人，若孙籀庼年丈及吾友王君静安，其为学皆有其得力处，皆非毁圣无法者，不容破坏纤儿，得以藉口。”

31日 述学社《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出版。

封面由梁启超署签。前7页为王国维的几幅近照和遗墨手稿照片。由梁启超作序；内文有王氏遗著《鞑靼考》等六篇文章；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等三篇；另有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等两篇；刘盼遂

《观堂学礼记》一篇；附录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篇。

梁启超认为："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这是他的绝学！"梁启超还指出王国维的学术"以通方知类为宗"。"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的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陈寅恪在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愈甚……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来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之说，皆不足置辩。"

1928 年 4 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论丛》第 1 卷第 3 号出版的"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内容与此略同。

（瑞典）高本汉著、陆侃如译《左传真伪考》由新月书店出版。

原题为《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sn）。高本汉从文献考证和文法研究两方面论证《左传》在秦始皇焚书以前就已成书，从而否定刘歆造伪说。他通过对比《左传》和《国语》得出两书文法相近的结论。其本意是要证明《左传》成于先秦，但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却利用他的成果，反过来证明《左传》是刘歆从《国语》中割裂出来的看法。

1926 年胡适收到高本汉寄来的《左传真伪考》，在太平洋舟中读完并节译大要，欲请顾颉刚、钱玄同阅后发表。后因故耽搁。胡适阅陆侃如译文后写《〈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1927 年 10 月 4 日）的长序，对高氏以文法学的研究考证古书的创举表示钦佩，认为此方法"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进而与作者及为中文版作跋的卫聚贤讨论。

林语堂说："证明古书之真正可靠与否，需要更审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语言学的标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氏的《左传真伪考》是应用现代方法的一例。"

1936 年 4 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该书的增订版《左传真伪考及其他》。

顾颉刚正式就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文史导课"等，学生有黎光明、何定生、陈槃、李晋华等。

11月

1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

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和商承祚负责编辑。《发刊词》指出："我们生在此际，应该永远想着：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研究的学问有怎么大的范围？我们向那里寻材料？我们整理学问的材料应当用怎么样的方法？能够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的新道路，不至于据守前法，不能进步。""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并提倡"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迹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此外，《发刊词》还指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关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的作者，董作宾认为乃傅斯年所作，而顾潮则据《颉刚日程》1927年10月21日有"作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谓出自顾颉刚。实则此文代表了当时傅、顾二人的共识。

《周刊》出版数期后，很快引起北方学界的注意。当时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张荫麟（素痴）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一文指出，"广东中山大学近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其规模略仿旧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印行周刊，其体例亦仿旧北大研究所周刊"，"撰述人多为该校教授，虽取材间或不甚谨严，亦近日出版界中在水平线上之刊物也"。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7月，周刊共出版36期。

创刊号刊载余永梁《誓的时代考》、胡适《读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薛澄清《郑成功历史研究的开端》等文。

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号发表《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

顾氏从世界的范围着眼，对秦汉史进行纵论横观，批判了传统史学那种以中原概全域，以汉族代中华，就中国谈中国的局限性，认为"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是成立于统一的意志上的"。

傅斯年随后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1 集第 2 期发表《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对顾文及“古史辨”提出了一些质疑，认为“我总觉得你这篇文章，与在《古史辨》上，颇犯一种毛病，即是凡事好为之找一实地的根据，而不大管传说之越国远行。如谈到洪水必找会稽可以有洪水之证，如谈到纬书使想到当时人何以造此等等。其实世界上一些寓言，一些宇宙论每每远到数万里……”傅斯年特别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认为“放胆思想只能有很荒唐的话”，与胡适和顾颉刚均重视且喜发挥“历史的想象力”有别；强调“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显然对胡、顾二氏惯用“默证”来断定古人古事感到不满；复提出治学者宜守“阙疑”为原则，“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则更是委婉表达出对顾颉刚在材料不足时就提出一套假设的古史系统不以为然。

20 日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通过。

22 日　容肇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4 期发表《韩非的著作考》。

文章对今传本《韩非子》提出质疑，认为“篇次杂乱，最不可信”；《史记》将《韩非子》归本于黄老，可能是当时《韩非子》“已混杂有《解老》、《喻老》之篇”；《韩非子》“首篇为《初见秦》，此篇为《存韩》，已自相矛盾”等。该文后被收入《古史辨》第 4 册。对于容氏这些观点，学界有不同意见。

同期还刊载了罗常培《朱熹对于闽南风俗的影响》、黄仲琴《迭里迷实墓》等文。

29 日　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5 期发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作者认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以至于同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

傅斯年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7 期发表《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提出了“孔子不见得是纯粹的这么一个君子，大约只是半个君子而半个另是别的”，“古文一派恐不始于向歆”等商榷意见。傅氏并指出：“我有一个非常自信的成见，以为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而以书为单位，一经分析之

后，亦失其为单位。故我们只能以《论语》为题，以《论语》之孔子为题，不能但以孔子为题。”

是月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民俗学会。

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它刊行民俗学会丛书，又编辑《民俗》周刊，主张将收到的材料多多刊印，使中山大学收藏的材料为学术界所公有。

（美）房龙著、林徽音译《古代的人》由开明书店出版。

12 月

6 日　傅斯年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6 期发表《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

13 日　王肇鼎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7 期发表《前汉货币问题之研究》。

20 日　顾颉刚《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8 期发表《〈盘庚〉上篇今译》。

第 9 期连载。1922 年，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需要材料，将《尚书》中的《盘庚》、《顾命》篇翻译为白话文。1925 年 1 月 26 日，应《语丝》杂志之邀，顾氏在《语丝》第 11 期上发表了《〈盘庚〉中篇的今译》，反响良好。此次刊发的是《盘庚》上篇今译。在《古史辨》第 2 册，顾氏又刊发了《盘庚》下篇的今译和《金縢》的今译。

自这一时期起，顾氏对尚书的“今译”持续一生。顾氏的“今译”虽说是翻译，但是内容重包括介绍分析、评价解释、材料考释等，为古籍整理提供了一个范例。

同期还刊载了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第 9 期连载）、黄仲琴《漳州与长崎之交通》等文。

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设下属机构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

中方人所者，为总裁柯劭忞，副总裁王树枏，研究员王式通、王照、梁鸿志、贾恩绂、胡敦复、江庸、汤中、江瀚、戴锡章、姜忠奎、刘培极、胡玉缙、何振岱、章华、徐审义。研究项目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法制经济、美术、宗教、考古学、语言学等九部分，实际做法则是按

经史子集四部自选，具体为经部：江瀚、胡玉缙、徐审义、刘培极、姜忠奎、王照、杨策；史部：王式通、戴锡章、江瀚、汤中；子部：刘培极、胡玉缙、江庸、王式通、胡敦复、梁鸿志、汤中；集部：王式通、戴锡章、江庸、章华、梁鸿志、何振岱。

是月　冯友兰在《燕京学报》第 2 期发表《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此文从廖平、康有为论孔子说起，要“证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即今有所删正，也不过是一个‘选本多、门徒众’的教授老儒；但他却并不因此而即是碌碌无所建树；后人之以先圣先师等尊号与他加上，亦并非无理由”。冯氏认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他的行为像希腊之“智者”，他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历史上的影响相仿佛”。

同期还刊载了黄子通《朱熹的哲学》、张荫麟《九章及两汉之数学》、容庚《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之贡献》、顾敦鍒《明清戏曲的特色》等文。

许地山在《燕京学报》第 2 期发表《道家思想与道教》。

此文原稿是作者 1924 年在牛津大学“帝国宗教大学”上的会议论文，此次发表有所修改增订。文章包括“原始的道家思想”、“道教思想的形成”等。该文被认为是道教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陆懋德在《清华学报》第 4 卷第 2 期发表《由甲骨文考见商代之文化》。

作者认为甲骨文“在商史上之价值，实远过于汉人所传之数篇《商书》也”，乃通过甲骨文“考见当时文化之状况”。作者通过甲骨文考察了商代的“礼仪及习惯”、“家族及社会”、“宫室及居住”、“国邑及城市”、“饮食及衣服”、“器皿及工具”、“货币及交通”、“职业及生活”、“职官及政治”、“军事及武备”、“文事及娱乐”、“家畜及鸟兽”、“祭祀及宗教”等。

同期还刊载了王桐龄《宋辽之关系》、何廉《三十年天津外汇指数及外汇循环》等文。

《清史稿》开始陆续刊行。

是年秋，张作霖再改国史馆，柯劭忞任馆长，王树枏为总纂。柯氏对馆务不甚过问，交稿不阅即付金梁。金梁则“排日付印，如编新闻，主笔

督催，手笔立待，无复有片刻之暇……随印随发，前后不惶兼顾”。

程树德辑《九朝律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搜集公元前2世纪至7世纪间历代法律资料，并作了综合考证。此书包括汉律考、魏律考、晋律考、南北朝（梁、陈、后魏、北齐、后周）律考、隋律考，共八卷，1934年列入“大学丛书”再版。

是年

夏，侯外庐到达巴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就读，开始翻译《资本论》。

秋，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

至1936年初，会员已发展到校内71人、校外99人的规模。该会涌现出不少名家学者，如翁独健、齐思和、赵丰田、冯家昇、朱士嘉、邓嗣禹、王育伊、周一良、张维华、蒙思明、王钟翰、侯仁之、王伊同、谭其骧等。

该会多次举办学术讲演和史学座谈会，组织古迹参观与实地考察。它成为当时最为活跃且最见成效的史学专业学会之一。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还为北平史学界的组织联合做出努力。该会曾致力于联手他校史学会创办中国史学会，王桐龄、张星烺等积极参与中国史学会的筹组。后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无形解散。

郑鹤声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编印《正史研究》8册，《正史汇目》2册，油印讲义本，作为学生学习参考之用。

1928 年

※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始编纂。
※ 蔡元培等主编的“新时代史地丛书”开始出版。
※ 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引发各方争议。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
※ 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
※ 陈垣发表《史讳举例》。

1 月

1 日　《新生命》月刊在上海创刊。

总负责人是周佛海，1930 年底停刊。宗旨是“阐扬三民主义，研究建设方案，并介绍、批评各国社会思想学说及政治经济制度”。

围绕月刊形成了后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最先出场而且人数最多、声势最壮的所谓“新生命派”。陶希圣是“新生命派”的核心人物，此外还有陈邦国、朱伯康、梅思平、梁园东。它和新思潮派是革命后“回想”时期（即反省时期）社会史方面的两大派。

3 日　马衡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10 期发表《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

作者认为“欲改造旧史，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马氏本有在广州中山大学设立考古学系的计划，并草定该系成立后进行之事项与预算，后因取消南下而未能实现。

同期还刊载了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丁山《义和四宅说》等文。

4 日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霍尔将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遗嘱中规定三分之一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美国或者英国人控制下的亚洲或巴尔干

地区的教育事业，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定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策划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学社北平办事处。哈佛燕京社的总部设在哈佛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学社北平办公处随燕京大学的解体而终结。

1928年1月5日的学社章程中表明了该社的目的是“从事及帮助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教学和出版，或者亚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及日本，或者土耳其及欧洲巴尔干国家文化的研究、教学和出版”，以及“帮助有条件的中国和西方学者开展适合于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程度的研究和教学，目前迫切需要帮助学者为进入学社工作提供学术准备；资助其他学校发展本科教育，考察、发现、收集和保存文化和古代文物，或者资助博物馆及其他机构从事此类工作”。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将首先资助以下课题：如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共同的任务在于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鼓励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中国东方问题研究。”

该学社堪称中西方学术交流的典范，为汉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学社的成立尤其对燕京大学的学术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自1928年起学社为燕京大学拨付购书款，燕京大学图书馆四分之三的藏书是用此款购置的。学社补助燕京大学出版《燕京学报》和《哈佛燕京学社引得》。此外，齐思和、翁独健、洪业、周一良等大批知名学者得到过学社的资助。

15日 《文化批判》创刊。

成仿吾在创刊号的祝词中指出：新兴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是该刊的宗旨和任务。《文化批判》“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理论，将给予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火光，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

根据这一宗旨，《文化批判》每期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刊登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和译文。其中有朱镜我的《理论与实践》、《科学的社会观》、《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起源及其灭亡》，彭康的《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李铁声译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李初梨的《唯物辩证法精要》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文化批判》还专辟“新辞源”栏目，用以解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文化批判》出至第5号，即遭查禁。5月改名《文化》，不久被

查封，8 月 15 日又在上海改为《思想》月刊出版。《思想》月刊继续其使命，理论导向、编辑原则一仍其旧。在《思想》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有克兴《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唯物辩证法》，李铁声译《〈哲学底贫困〉底拔萃》等。《〈哲学底贫困〉底拔萃》篇幅较大，是按专题摘录了该书中关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部分内容编译而成。《思想》出至第 5 期停刊。

23 日　傅斯年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3 期发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第 14 期连载。傅斯年高度评价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认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

傅斯年建议顾颉刚说：“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层累地’，但这个层累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

在评述了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之后，傅斯年考论了几篇载记的时代、阐述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探索了“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殷周间的故事”等问题。

傅斯年此信，始写于 1924 年初，1926 年 9 月才抄成正本。顾颉刚发表此信时未经傅斯年同意，“傅先生见之，终以为不可”。

25 日　刘节在《东方杂志》第 2 号发表《〈洪范〉疏证》，大大推后了《洪范》的成文年代。

作者认为《洪范》为“秦统一中国以前，战国以后阴阳五行家托古之说”。梁启超在此文后“题记”中指出，“《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其“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可谓空前一大发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也”。

31 日　罗家伦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4 期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

此文系罗氏写给顾颉刚的信。罗氏指出，近代史资料如不收集，则一年困难一年，希望与顾颉刚共谋成立“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以收

集资料，并认为“清宫重要档案照相及钞一副本”、“赴北京研究清宫文件”、“设法购买忠王李秀成供词”三件事比较具体可行，希望顾氏能“商酌厦大诸公先后一办”。

是月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下属人文科学研究所正式工作，开始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人文科学研究所着手组建图书馆，大量收集《四库全书》后问世及《四库全书》未收的，重点是1795年至20世纪30年代近150年的图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书籍的主要范围是：（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已收录，但篡改、删削过甚或版本不佳的书籍；（2）修改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遗漏的书籍；（4）乾隆以后的著作和辑佚书籍；（5）禁毁书和佛、道藏中的重要书籍；（6）词曲、小说及方志等类书籍；（7）敦煌遗书；（8）外国人用汉文撰写的书籍。从1928年到1931年6月，主要拟定了待撰提要的书目27000余种，成《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一稿。

1931年7月，柯劭忞、王式通、江瀚、伦明、杨钟义、胡玉缙6人开始撰写提要。1934年1月，日人桥川时雄主持其事以后，在人事、制度等方面做了调整，工作进度加快。1938年，20多名青年学者又加入，前后共71人参加撰写。1942年财政经费日趋拮据，次年5月，撰写工作被迫停止。不久，对提要的整理工作也不了了之。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批提要稿及有关图书档案，全部由中方代表沈兼士接收。

续四库提要的撰修主要由桥川时雄主持，但提要的撰写则由我国学者承担，先后参加撰稿和整理工作的约有80余人。其中董康、伦明、王重民、赵万里、冯承钧、向达、吴廷燮、谢国桢、杨树达、余绍宋、傅增湘、瞿兑之、罗振玉、柯劭忞、江瀚、胡玉缙、徐鸿宝、李盛铎、王式通、杨钟羲、王照、江庸、王树枏等人，均为名家。

这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项影响深远的工程。1931年7月至1945年7月，研究所集中了中国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等领域学者，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收及《四库全书》编纂成书后问世的书籍近3.4万种，凡1800万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系继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编成的一部大型古籍提要目录。它把增收四库未收书作为重要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四库提要的缺遗。它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三倍，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文献解题目录。

学术界一直关注这部提要稿的出版。郑振铎、叶恭绰、李根源、梁启雄等，曾多次呼吁整理出版，却迟迟未能如愿。从1980年起，中国科学

院图书馆开始对这部原稿进行整理分类，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整理有绪。中华书局决定精装十册（经部二、史部三、子部二、集部三），陆续出版。至1996年，该书尘封半个世纪后，始由齐鲁书社影印问世。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认为是中国妇女史的开山之作。

本书以朝代分章，各章又以婚姻、礼教、妇女教育、妇德、妓女、贞节观、缠足、近代的女权运动等主题分节。作者系统论述自周以前至民国时妇女生活的状况，对于宗法制度下妇女生活的悲惨状况作了深刻揭露，并且分析其社会根源，指出女子处于卑贱地位的原因是宗法制度。书中绪论指出："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作者希望此书能为向往新生活的妇女指明方向。

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掌故丛编》创刊。

此"丛编"每月一辑，1930年第11辑改为《文献丛编》，至1943年停刊时共出版62辑。此刊系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和军机处档案的选辑，刊载了不少近代重要史料。

清国史馆修《清史列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

1日　戴季陶在《新生命》第1卷第2号发表《行易知难》。

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已经"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精密完备处，在能够统治一切社会科学，说明一切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各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当中，的确算是比较最有科学的价值而同时是尊重科学的方法的"。这也反映出刊物本身的基本立场。

7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5期刊载（美）M. Rostovzeff著、杨成志译《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

作者指出尽管许多不同的理论"说及历史的工作是一种科学"，但有一点都承认，即"历史家的工作显明地去宣告过去的人性，描写出人类种种式式的生活，并追寻其从太古时代迄至我们今日的进化历程"。

同期还刊载了马太玄《黄宗羲之生平及其著作》、《关于郑成功历史研究的材料》等。

14日　程憬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6期发表《殷民族的社会》。

作者认为商人的生活已经由渔猎时代和牧畜时代“进到一种粗耕的农业时代”，且“适应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的奴隶制度便逐渐的发展起来”。

同期还刊载了梁劲《评史记五帝本纪》、林乾祐《国语中之五帝——黄帝、颛项、帝喾、尧、舜——及禹》、蒋径三《日本研究阳明学说书目介绍》等文。

21日　胡光炜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7期发表《金文释例》。

第18期连载。

28日　陈灿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8期发表《整理账簿计划书》。

作者认为从普通人家的账簿可以看到物价的涨落、生活的状况、财政的情形、文化的关系，固有进行学术性整理的必要。文章还提出了具体的整理方法。

陈灿的提议引起了黄荫普的回应，在周刊第71期发表《论整理账簿计划》，为如何更好的整理账簿提供建议。

是月　郭沫若再渡日本，由文艺创作转向历史研究。

郭沫若转向历史研究的最早代表作，是1928年7月至10月撰写的《〈周易〉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两篇论文，前篇论证周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变成奴隶制”；后篇根据《诗》《书》“参考比验”，探讨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度变为奴隶制”，东周以后“由奴隶制度变成封建制”的变革。当他完成后篇文章初稿时，对使用的材料发生怀疑，于是开始研究甲骨文，将之作为古史研究的入门功夫。他认为“初由古代入手，即感旧有文献之不足”，单凭古代文献的记载来说明中国古代史，“且难征信”。因此，他强调研究古代社会历史首先“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些东西”。郭沫若不仅把古文字研究看作是研究古史找寻一手资料的门径，而且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周易〉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发表于1928年11月10日和25日《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22号，《〈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发表于1929年4—6月《东方杂志》第26卷第8、9、11、

12 号，署名均为“杜衎”。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此书系作者在大学的讲义改编而成，全书共八章，分别探讨了汉族的形成过程、从春秋迄清代汉族和周边民族接触、冲突、融合等问题。作者认为中华民族系汉、满、蒙、回、藏、苗六族为主的混合体，无纯粹的汉族血统，也无纯粹的其他种族，中国民族内的各民族不应互相排斥。该书的一大特色是运用了 231 个“表”，涉及民族分布、通婚统计、政权世系、改姓、少数民族汉化等问题，不仅减少了字数，而且扩展了内容容量。该书 1934 年再版。

3 月

1 日　杨朝杰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发表《中国民族问题发生之起源及其归宿》。

第 2 期连载。

6 日　杨筠如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9 期发表《春秋时代之男女风纪》。

7 日　顾颉刚为《民俗》周刊作发刊辞。

此文末尾高呼：“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这吹响了民俗学运动的号角，此文被称为“我国民俗学运动的一篇宣言书和动员令”。从此文“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精神看，表明民俗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若不加上‘民俗’两字和放在《民俗》周刊之内”，就会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可以说，广州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故较北大时期已有不同，并有进步。这是代表两个阶段，也是代表两个学派的”。

20 日　蒋荫楼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21 期发表《春秋时代的风气》。

27 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22 期刊发姚名达致顾颉刚讨论古史信。

姚名达指出："王静安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力辨古史之虚伪，不如从事发掘，研究地质或考古，去寻求古史的真相。换句话说，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名达则以为先生的辨古史，只是要叫人别上伪史的当，并不是要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原是要种种学者帮助才可以解决的，但先生从研究故事和神话的方法去研究，总不失为求真的一条路；况且这条路还可以有重大的发现哩。"

同期还刊载了方书林《〈庄子〉中的古史》等文。

是月 《流沙》半月刊由创造社在上海创办。

由华汉（阳翰笙）、李一氓编辑，郭沫若题写刊头。它以社会科学论文和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执笔者有华汉、彭康、朱镜我、李一氓、成仿吾等。5 月的特刊号登载李一氓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110 周年而编译的《唯物史观原文》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渊源》两文。还在特刊号"社会运动家和社会思想家"专栏刊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章。

《流沙》本年 5 月停刊，共出 6 期。

张荫麟在《学衡》第 62 期发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

作者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关于史学的科学性，此文论述三个问题："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二、此等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若可则三、如何控制将来之资料以打破或减轻此等限制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张荫麟认为，史料之限制"有十五种，可别为两类"，一是绝对限制（十一项），一是相对限制（四项）。"所谓绝对之限制者，非谓限制之本身皆为绝对不可变者也。谓其在过去所生之结果，后人无法补救也。吾人于不良之资料，自可摒弃怀疑，然终无法改善其质也。""然相对之限制，可因史学及科学之进步而逐渐减少。"他相信："苟认识此诸问题之意义者，必深觉其于史学及人类知识之前途有綦重之关系。盖此等问题一解决，新方法见诸实行，则将来世界之历史纪录，将来人类经验之库藏，必大改观。人类关于自身之知识，或因此而得无限之新资料与新观点，亦未可知也。"

许冠三评价此文观点云："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专务方法改良与材料发掘迥异，他的析论是从认识论出发，以省察史料限制与科学的史学的关系。"

舒新城编辑《近代中国教育史料》4 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从同治初年至民国十五年的中国教育史料，对研究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延续至今。1929 年 4 月，舒新城编著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也由中华

书局出版。

半粟(李剑农)编著《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4 月

3 日　黎光明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23 期发表《〈穆天子传〉的研究》。

第 24 期连载。

4 日　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吴氏在距平陵城约 2 公里的城子崖，发现了以黑色陶器和磨光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来命名为龙山文化。

是月　胡怀琛在《东方杂志》第 8 号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辩》，引发重大争论。

文章论证墨翟为印度人，遂引起一场讨论。方授楚在《知难》第 78 期发表文章予以反驳，胡适则在日记中斥责胡怀琛“其论甚谬”，称赞方授楚“其言甚有理”，“此论最痛快”，10 月 25 日的日记中，再次批驳胡怀琛的论文。据后来杨宽回忆，当时反驳胡怀琛的，“还有吴进修、郑师许，接着进行批评的还有钟泰（字钟山）、冯友兰、方授楚等，同时，也还有卫聚贤和太虚法师等人支持胡氏之说，卫聚贤主张墨子是阿拉伯人”。

具体文章有：郑师许《墨子为印度人辩驳议》（《东方杂志》第 8 号，1928 年 4 月），吴进修《正胡怀琛的墨子为印度人辩》（《东方杂志》第 16 号，1928 年 8 月），胡怀琛《墨翟续辩》（《东方杂志》第 16 号，1928 年 8 月），方授楚《墨子非印度人论》（《知难周刊》第 68 期，1928 年 9 月），胡怀琛《关于墨翟问题的讨论》（《知难周刊》第 80、81 期，1928 年 10 月），方授楚《再论墨子非印度人》（《知难周刊》第 87 期，1928 年 11 月），方授楚《驳胡怀琛墨翟续辩》（《知难周刊》第 88、89 期，1928 年 12 月），陈登原《为墨翟国籍——质胡怀琛君》（《一般》第 7 卷第 25 期、第 8 卷第 2 期，1929 年），胡怀琛《为墨翟国籍问题——答陈登原君》（《一般》第 8 卷第 2 期，1929 年），胡怀琛《为墨翟国籍问题——再答陈登原君》（《一般》第 9 卷第 1 期，1929 年），陈登原《为墨翟国籍——致胡怀琛君》（《一般》第 9 卷第 4 期，1929 年），卫聚贤《墨子、老子是印度人的考证》（《认识周报》第 2 期，1929 年 1 月），钟钟山《墨

翟非印度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6 卷第 67、68 期，1929 年 2 月），静因《墨子与穆勒是否中国人的问题》（《文学周报》第 8 卷第 7 期，1929 年 2 月）。

清华大学《国学论丛》出版“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

梁启超在该专号序中指出：“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其严正之学者的道德灌注而运用之。其少年喜谭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个问题与他问题的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先生古貌古饰，望者辄疑为竺旧自封畛，顾其头脑乃纯然为现代的，对于现代文化原动力之科学精神，全部默契，无所抵拒，而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

除了刊载王国维遗著《鞑靼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外，还刊登了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刘盼遂《观堂学礼记》等文。

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对北京周口店进行第 2 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于步达生回加拿大，实际主持者为翁文灏和福顿，参加者有步林、杨钟健、裴文中等人。此因为军阀混战，5 月下旬发掘工作停顿，至 8 月底重新开始，直到 11 月 25 日才结束工作。此次发掘发现了一件北京人的少年女性右下颌骨、一个成年人的右下颌骨及三颗保存完整的臼齿。

5 月

1 日　梅思平在《新生命》第 1 卷第 5 号发表《民生史观概论》。

梅思平说：“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得很好了，他们的中心理论，现在都建筑在唯物史观上面，由唯物史观从下推，则可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结论，由唯物史观从上推，则又可得有近代科学作后盾的唯物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

萨孟武在《新生命》第 1 卷第 5 号发表《民生史观》。

作者探讨了“阶级斗争与社会进化”、“制度之时间性”等问题。文章提出：“人类之生存欲望，当为社会进化之原因。”

9 日　陈槃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28 期发表《黄帝事迹演变考》。

作者认为，黄帝就是秦人迷信的“上帝”，然后传播到燕，被方士们制造了战蚩尤的传说，此后黄的传说又传播到齐、宋等地，并被加入了道家的血液等，不断被神化。作者认为：“司马迁以后的黄帝，虽然在表面上给儒家剁去方士和道家的袍服，拉来充了‘人王’，高高地坐在历史前头。但，怪迂方士，历代多有。黄帝仙人的传说，印入人们脑府已深，无论如何，不能洗涤净尽。所以，史迁以后的黄帝，仍旧具备‘神仙’和‘人王’的双重性格。二千多年已来，尽管各向各的方面生长发展，但二者互相影响的地方也很多。”

同期还刊载了马太玄《万斯同之生平及其著述》、于鹤年《关于“九州”之讨论》等文。

16 日　国立中央大学成立。

1927 年 6 月 9 日，国民政府命令将东南大学等江苏境内 9 所专科以上学校组成第四中山大学，1928 年 2 月 9 日又更名为江苏大学，5 月 16 日再次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基本接受了原东南大学的史学研究力量，成为民国史学界的重镇之一。

容肇祖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29 期发表《述阮籍嵇康的思想》。

30 日　黎光明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31 期发表《汲冢竹书考》。

第 32、33 期连载。

是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由蔡元培等主编的“新时代史地丛书”。

该丛书的编印目的是将“新时代必要之知识供给于一般读书界”，故全采用白话或浅近文言编写。丛书分为社会进化史、社会运动史、革命史、政治运动史、各国现代史、国际问题、国际运动史、战史、外交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经济史等十二大类。为保证图书质量，商务印书馆在作者之外还“另请专家一人负责校订”，如何炳松校阅王钟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王宠惠校阅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蔡元培校阅华林一的《中国国民党史》等。

丛书共80册，收录的著作主要有林定平、邓伯粹《各国劳工运动史》（1928年5月），陈博文《中日外交史》（1928年5月），束世澂《中法外交史》（1928年6月），张辅良《国际智识合作运动史》（1928年5月），唐庆增《中美外交史》（1928年10月），华林一《中国国民党史》（1928年6月），张其昀《中国民族志》（1928年6月），黄孝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828年11月），陈博文《中俄外交史》（1928年11月），陈叔谅《世界大战史》（1928年12月），张其昀《中国经济地理》（1929年6月），向达《印度现代史》（1929年8月），金兆梓《现代中国外交史》（1930年8月），王钟麒《中日战争》（1930年9月），陈功甫《中国革命史》（1930年11月），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年1月），武堉干《鸦片战争史》（1931年2月），陈捷《义和团运动史》（1931年3月），何子恒《现代欧洲各国侵略史》（1931年4月），童致桢《帝国主义史》（1931年6月），陈其鹿《资本主义发展史》（1931年7月），陈铎《日本现代史》（1931年12月），陈其鹿《农业经济史》（1933年4月），高鲁《最近欧洲外交史》（1933年4月），唐庆增《国际商业政策史》（1933年10月），束世澂《中英外交史》（1933年11月），陈安仁《中国近代政治史》（1933年12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1934年1月），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1934年2月），张星烺《欧化东渐史》（1934年1月），陈捷《回教民族运动史》（1934年1月），孙智舆《美国现代史》（1935年1月），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1935年9月），周景濂《中葡外交史》（1936年10月），吴清友《苏联建国史》（1937年11月）等。

曹养吾在《水荇》第1卷第1期发表《辨伪学史——从过去说到最近的过去》。

文章简述了从古至今的辨伪学的发展过程，论列孟子、韩非、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柳宗元、韩愈、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宋濂、胡应麟，阎若璩、胡渭、崔述、廖平、康有为、胡适、顾颉刚等人在辨伪上的成绩与贡献。作者把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放在中国辨伪学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

林定平、邓伯粹撰述、邵元冲校阅《各国劳工运动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6月

1日　章渊若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经济史学底发生与发展及其在学术上之地位》。

作者主张，经济史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一部，经济史学可脱离普通史学而独立。文章还分别探讨了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商学、史学、政治、法学的关系。主体部分考察西方经济史学的酝酿、发生和发展过程，并介绍了美国经济史学的现状。文章最后强调，欲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应大力研究经济史，并指明了应采取的方法和态度。

9 日　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蔡元培任院长。

当日，蔡元培在上海东亚酒楼主持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它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其院内组织分行政、研究、评议三大部，其中由各研究所、博物馆、图书馆组成的研究部门是中央研究院的中枢。中央研究院从 1928 年成立到 1949 年迁台期间，曾先后组建过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动物、植物、气象、历史语言、社会、工学、心理学研究所和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在内的 13 个研究所。它负责制订执行国家研究计划各类学术法规，统一协调中央与地方研究机构的关系，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评定奖励各类学术成果，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担任政府的学术咨询顾问。同时，作为中国体制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的全国性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还囊括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职业科学家。中央研究院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没有科学研究院的历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职业化和科学体制制度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18 日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引发各方争议。

此次大会的任务是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7 月 9 日通过政治决议案，确定："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因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是现时革命的根本任务"。

中共的决议一出，立即招来不同的声音。首当其冲的是中共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托派领袖陈独秀在 1929 年 8 月 5 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

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

中共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由此展开。

黄侃在日记中评议当时学风。

黄侃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近世之学，钩沉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并评论王国维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洽，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藏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

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进入北京，北洋政府时代结束。

20日　陈功甫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4期发表《征集近代史料意见书》。

作者负责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此时设立的“征集近代史料委员会”，认为应征集的史料门类主要有“关于普通政治方面”、“关于国际交涉方面”、“关于秘密社党方面”、“关于革命运动方面”、“关于政党方面”、“关于社会生计方面”，并指出要想较好地展开征集史料工作，应该“扩大委员会组织”、“请求公共机关援助”、“广征国人援助”。

同期还刊载了容肇祖《颜元的生平及其思想》、吕超如《战国时代的风气》等文。

28日　《清史稿》连同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委员会接收。

该日故宫博物院接受委员会以马衡为代表接受了清史馆及《清史稿》。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北京政府危在旦夕之际，《清史稿》尚有十分之一二未印，因此金梁加快进度，“史稿五百卷乃十之七八校订未竣……不得已，携归私寓，日夕赶办，撰校兼行，一月之内，竟补至百卷”，并“偷将各人之稿增改，复将卷首职名任意开列，又私作校刻记，窃称总阅”。及书

印就，金梁未经馆长核准，私运关外四百部。在接收委员会接收清史馆后，原史馆人员检阅史稿时，发现金梁偷改等情，遂决定将金梁窃改的部分抽换，其卷旨职名重写，并把金梁私作的《校刻记》及增人的康有为、张勋列传抽出。但是，已运往东北的四百部已无法追回，这就出现了《清史稿》的关内本与关外本之分。

是月　朱希祖在《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发表《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

朱希祖在此文中批驳了“世以吾国秦汉以前为铜器时代，仅有铜器而无铁器，更无铁制兵器”的观点，认为春秋战国之际已有铁兵，并以文献例证铁剑、铁钝、铁矢、铁铧皆先行于南方，而北方未闻有以铁为刃的兵器。

此文随后引发一场关于早期铁制兵器出现地域问题的辩论。1928 年 7 月 30 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介绍朱希祖的文章时批评道：“作者染近人翻案立异之恶习，力言古代南方文化之高。”朱希祖阅后致函编辑进行申辩。8 月 13 日，《文学副刊》编辑作《答朱希祖君》进行了答复，并附朱希祖来信。他列出铁兵先行于北方的四种证据，根本推翻朱说。同时，他还指出，章鸿钊的相同观点早于朱希祖，朱氏所引证的材料也大体不出章文的范围。9 月 17—22 日，朱希祖连续在《新晨报》副刊发表《再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三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书》。朱希祖申言自己与章鸿钊的文章的重心、取材不同，并对《大公报》编辑所提出的北方先行铁兵的证据进行商榷，认为多“弊在臆测而无实证，且有以伪书为证者”。他进一步从地理和逻辑两方面展开辩驳。10 月 1、8、15 日，《大公报·文学副刊》转载了朱希祖的两封答书。11 月 19 日，《大公报》编辑再度发难，刊发《再答朱希祖君》。文章重申了朱氏袭用章鸿钊文的问题，又针锋相对地列举铁兵先行于北方的证据。对于朱氏批评的误引伪书问题，编辑认为伪书和伪事不可混为一谈，书虽伪，而其所记录与真书契协，即可引为旁证。该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新晨报》副刊将《大公报》上的讨论继续下去，不过这次论争主要转移到章鸿钊和绍来二人之间。章鸿钊先后发表《关于〈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就绍来君讨论中国古代铁兵问题后之所感》、《就文副对于铁兵问题之结论申述所见》。绍来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又一讨论》、《结论中国古代铁兵问题并答章鸿钊君》。此外，陆懋德发表《评近人研究古代先用铁兵之地点》加入讨论。朱希祖发表《关于〈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之讨论》，同时回应《大公报》编辑、章鸿钊、绍来、陆懋德诸人。1929 年 3 月 10 日，翁文灏在天津《益世报·学术周

刊》发表《为古代铁兵问题进一解》一文后，讨论结束。

同期还刊载了陆懋德《中国人发明火药火炮考》、侯厚培《明代以前之金银货币》、李俨《李善兰年谱》等文。

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3期发表《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

作者指出“秦汉以降，新异之发明，不绝于史”，其中一些发明可以与西方佛兰克林之流比肩，可是中国传统社会技艺为儒士所轻，发明被统治者禁止，近世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后，一些浅薄之士又穿凿附会，“谓吾先民早已前知”，故“以科学态度，考察先民在发明史上成绩，亦史家应有之责任”。此文将中国发明史分为东汉以前、东汉至隋、唐至明末、明末至清四个时期，并分别对四个时期典型的发明成果及其作者进行考证。

此文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对此后的科技史研究者如刘仙洲、胡道静等人皆有影响，且早于李约瑟之研究。

同期还刊载了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张星烺《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黄子通《王守仁的哲学》、伦明《续书楼读书记》、朱希祖《明季史籍五种跋文》、洪业《明吕乾斋、吕宇衡祖孙二墓志铭考》等文。

容庚在《燕京学报》第3期发表《汉代服御器考略》。

此文首先从器物、花纹字体、铭辞等方面对殷周礼器和汉代服御器总体比较，然后分别对汉代之鼎、鋞、壶、勺、镜等进行考辨。胡厚宣后来回忆说，该文“概括明晰，图文并茂。我那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读之深受教益，极为佩服”。

杨树达在《燕京学报》第3期发表《汉书释例》。

该文对《汉书》中有关人物比较的“较量例”、有关人物记载的“附记例”、有关事情记载的“互文相足例”、有关批评的“微词例”、有关最早记载的“记始例”等常用手法进行了分析，以助人读《汉书》。

徐蔚南主编“ABC丛书”开始由世界书局出版。

在《ABC丛书发刊旨趣》中，编者表示此丛书的标准一是通俗有趣，二是系统简要，以有利于青年学习。该丛书包括文艺、哲学、史地等类作品，至1935年出版150余种，如玄珠（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刘叔琴《人类进化史ABC》、刘剑横《历史学ABC》、李宗吾《人文地理ABC》、高希圣《政治思想史ABC》、曹聚仁《中国史学ABC》、傅彦长《西洋史ABC》等。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由新月书店出版。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学史专著。计划写成上中下三卷，仅完成上卷。此书以西方“文学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以“白话文学史家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为论点，勾勒出官方与民间的两条线索，重新梳理中国文学千余年的发展历史，考证了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被视为“第一部通俗文学史”，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有重要影响。

张荫麟批评此书时，对胡适能运用新材料，为文学史开拓新境域表示赞赏，又称许胡氏书中对个别问题之“新考证”，能得出“极坚确不易”的“新见解”。

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由北平广业书局出版。

作者分从职业、资产、税赋、政治制度、交通、社会交往与习俗、住所、服饰、器物等方面介绍了汉代的各种社会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

此书是较早一部研究汉代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著作，至今仍被社会史、民俗等领域的研究者引用。

束世澂《中法外交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系统梳理了“金佛朗案”之前的中法关系发展历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法国对华政策的可能性。

姚永朴《诸子考略》由北平资研编译社出版。

7 月

1 日 《史学与地学》第 3 期发表王国维《〈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

此文撰成于 1927 年 2 月，许诺以此文刊发于《史学与地学》，后先刊于日本东京大学《史学杂志》。《史学与地学》杂志为纪念王国维，再刊此文。王国维指出，此前在阅读日本学者关于乣军的研究后就对此问题留心，后读《元朝秘史》时，“就史实上发现与金乣军相当之名称，此名称与乣军之音读，略有不同，于史实之同一及言语之歧互殊不能得其解”，乃撰写此文。经过考证，王氏认为《元朝秘史》中“‘主因’一语，即乣军之对音”，“主因亦尔坚即金末之乣军”，并指出这是可能是当时的部落种族名。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指出此文与《萌古考》一文是王氏“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方法的代表性论著。

该期杂志为悼念王国维，特刊登了“王国维先生遗像”及赵万里整理的《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

同期还刊登了柳诒徵《清德宗之大婚》，张星烺《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里诺黎使节之记载》，（法）白罗舍著、何炳松译《拉施特元史考》，钱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等文。

9日　张荫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

张氏认为冯友兰在《燕京学报》第3期发表的《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一文大体精当，但个别论断存在“比附”的问题。张氏进而指出：“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此乃近今治中国思想史者之通病。此种比附，实预断一无法证明之大前提，即谓凡古人之思想皆有自觉的统系及一致的组织。然从思想发达之历程观之，此实极晚近之事也。在不与原来之断片思想冲突之范围内，每可构成数种统系。以统系化之方法治古代思想，适足以愈治而愈棼。”

11日　陈槃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7期发表《周召二南与文王之化》。

18日　卫聚贤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8期发表《禹贡考》。

作者认为此书作于战国末年（前316至前290年）的秦。顾颉刚在《古代地理研究讲义甲种案语》认为：“卫先生这篇文章，是用现代的眼光，现代的方法来研究《禹贡》的第一篇。固然他只费了很短的时间草成，算不得完密，但平常人没有注意到而给他提出的大问题（例如袒护雍州，不知河套等）实在不少。有了这篇文章开了一条路，冲了一次锋，要继续加功就比较容易多了。”

同期还刊载了梁远中《古巴略述》、汪宗衍《西汉黄肠木刻考》等文。

25日　程憬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9期《商民族的氏族社会》。

第40、42期连载。作者认为商代存在一种氏族制度，并探讨了这一氏族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组织、社会阶级、信仰等问题。

同期还刊载了卫聚贤《古史研究自序》、陈柱尊《清儒学术讨论集序》等文。

是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正式成立。

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在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员。7月，该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代行所

长职务。10 月 22 日，该所迁入广州柏园，始有独立办公场所。这是由国家设立的第一个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考古、汉字、人类学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八组，后归并为三组：史学及文籍考订组（陈寅恪任主任）、语言学及民间文艺组（赵元任任主任）和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组（李济任主任）。1934 年，人类学自第三组分出，增设为第四组，由李济任主任，随后由吴定良任主任。

史语所是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重镇，其成立后的一二十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被认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史语所延揽聚集了大批优秀学者，如董作宾、徐中舒、罗常培、李方桂、梁思永等；取得了一批重大学术成果，如殷墟考古发掘、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各省方言调查等；除编辑出版集刊外，还印行各种专刊、单刊、田野考古报告，其中不少为学术价值甚高的名作；并且培养出一批年轻学者，如夏鼐、张政烺、胡厚宣、陈乐素、陈述、劳榦、全汉升、丁声树等，成为日后学术界的中坚。杜维运评价云：“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

史语所在学术路向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主要承受了德国兰克式实证史学和欧洲汉学的衣钵，一味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排斥史观和理论，将史学压缩为史料学，影响了史学的全面健康发展。正如余英时所批评的，“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结果是把近代中国史学推到了“‘事实主义’的狭路上去，以章学诚所谓的‘史纂’、‘史考’代替了史学本身”。就当时的世界史学潮流来看，它舍美国“新史学”而从西方传统史学，也确有落伍之嫌。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改组，胡适、赵元任、蒋梦麟等任董事。

胡小石《甲骨文例》作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考古丛书”之一出版。

是文作于 1924 年，开甲骨文文法研究之先河。

8 月

14 日　董作宾前往安阳殷墟小屯实地调查甲骨出土情形。

董作宾经过实地勘验，认为此地仍有继续发掘的价值，撰写了报告和计划书。傅斯年得到董作宾的报告后，决定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在小屯从事科学的考古发掘。

22 日　方书林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43 期发表《九章的真伪谈》。

是月　国立浙江大学创设史学与政治学系。

该系隶属文理学院，1930 年因经费紧张，该系被停办。1936 年 8 月浙江大学成立史地系，仍隶属文理学院。蒋介石对于浙江大学成立史地系非常赞同，认为“史地系之添设，于我浙学术之继承发扬，实为必要”。1938 年 8 月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成立，史地系为创院六系之一，与文理学院史地系并存。1939 年 8 月文、理学院分立，原文理学院史地系改隶文学院。《史地杂志》1940 年第 3 期所刊《本系概况》记载两系“实相需相依，其行政与师资设备现仍合一”。1937 年 3 月，浙大史地系开始举办读书会。1939 年 4 月，读书会改组为史地学会，由教授和学生演讲或报告读书心得。1939 年 7 月，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同年 9 月成立史地教育研究室。1936 年夏梅光迪回国后，受竺可桢邀请，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史地系、研究所史地学部、史地教育研究室均由张其昀领导，在梅光迪、张其昀等人的努力下，浙江大学网聚了原来“学衡派”的不少同人，使浙江大学成为“学衡派”的新基地。张其昀、张荫麟、钱穆、陈训慈、钱基博、刘节、陈乐素、谭其骧等人先后任教于此，使浙大史地系成为抗战前后史学界独具风格的史学重镇。

（日）上田茂树著、柳岛生译《世界史纲》由上海创造社出版。

此书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世界史著作，1930 年上海百纳书店和沪滨书局再版该书。另外，还有多个不同译本出版，如 1928 年 9 月上海文明书店出版刘叔琴题名《世界史要》的译本、1929 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施复亮题名《世界社会史》的译本。1931 年上海大江书铺将施复亮的译本以《世界史纲》之名再版。

9 月

5 日　丁山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44、45 期合刊发表《汉字起源考》。

丁山认为考察文字的起源，“不可为神话所欺方士所骗而说汉字是仓颉造的”，也不能受宗教说法的蒙蔽，或民族虚荣故意拉长文字起源。此文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夏代，来历“都是起于初民随意涂抹的写生画”。

是月　卫聚贤《古史研究》第1集由新月书店出版。

本集收录作者之《春秋》、《左传》、《国语》研究文章，对三部古籍的著作时间、著作地点及作者等进行辨伪考证。1931 年 11 月商务印书馆再版时，增加了《穆天子传》研究文章一篇。上海述学部 1929 年出版第 2 集，主要为对《穆天子传》、《墨子》、《老子》等的研究。1936 年出版第 3 集，主要受摩尔根影响，阐述母系社会、奴隶社会的递进规律。《古史研究》三册为卫聚贤在上古史方面研究的主要代表作，为当时史学界新锐之作，后被收入《民国丛书》及《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卫聚贤继承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并融入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又多采用历史统计学方法，他还批评“古史辨”派不注重考古材料，意欲纠偏，但他本人由于受考古材料限制，往往大胆怀疑过头，推论较随意，在《古史研究》第 3 集同一本书中，关于殷人起源就出现三种不同说法，因此而受人批判。

傅斯年向蔡元培求助收购内阁大库档案。

1927 年冬，李盛铎保存的七千麻袋内阁档案急于出售，陈寅恪、马衡等人获悉后，认为这些档案对明清史研究极为重要，乃请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设法购买，是月傅致信蔡元培，历陈购买这批档案之必要，并希望史语所能够负责整理这批档案。后中央研究院乃以 2 万元价格购入这批档案。

印维廉《中国革命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作者认为“中国国民革命自太平军发难起，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止，已有七十八年”，该书就是要对这七十八年间的革命事实“原原本本”地进行梳理。作者自称该书的目的有三：一是“要使全国国民明白认识中国国民革命已有七十八年的光荣”；二是“要使全国国民明白认识中国革命的对方，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目的在不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达到我民族自由解放不止”；三是“要使全国国民明白认识中国国民革命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不先打倒国内国际帝国主义的工具，如专制君主，封建军阀以及贪官污吏、洋奴买办、土豪劣绅、为虎作伥的反革命派”。

刘叔琴编译《民众世界史要》由开明书店出版。

此书是作者据日本上田茂树《无产阶级的世界史》一书编译而成。

（德）瓦德西著、王光祈译《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拳乱笔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张廷休编《近代革命史概要》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

谢彬《中国邮电航空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0月

1日　陶希圣在《新生命》第1卷第10期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作者否定了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笼统说法，认为中国社会从最下层的农户到最上层的军阀，乃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在陶希圣看来，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宗法势力还存在着”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的社会。左翼分子“力说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自此，“我在《新生命》月刊发表的论文，渐渐集中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与争辩”。

从1928年8月至12月，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并于年底由新生命书局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出版。

13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1次发掘。

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发掘工作由董作宾主持，参加者有王湘、郭宝钧等。此次发掘10月31日结束，共获得甲骨854片及其他一些遗物。1928年殷墟发掘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发掘的甲骨后由董作宾编为《殷虚文字》甲、乙编。

此次发掘对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傅斯年在《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中指出：“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

17 日　何定生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49—51 期专号发表《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

何定生因听鲁迅讲授文学史引起对《尚书》兴趣，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开设《书经研究》课，何定生选修此课，并在顾颉刚的指导下走上《尚书研究》的道路。作者认为一个时代的文章受一个时代意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作者有意作伪也难以抹去这种时代意识，故“我们要求古代文法，我们要从文法上发现上发现时代性，我们捉住此意识之流，什么假把戏都是逃不了的”，故作者运用现代语法分析法分析《尚书》的“代词”、“虚词”、“成语”等，以助考辨《尚书》各篇的成书年代。

此文发表之后受到迅速受到学界关注，顾颉刚在日记中称“此自有研究所以来之第一篇成绩也”。

24 日　余永梁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52 期发表《1881—1885 年扬州气候表》。

28 日　中国地学会举行“复活纪念会”。

经地质学家翁文灏倡导，会同地学会原干事陈垣、白眉初等以及会员谭其骧等，暂停活动的地学会得以恢复。翁建议由中华基金董事会每月补助 300 元活动经费，会刊亦得以印行。1930 年，地学会与北平研究院合作，张继任会长，黄国璋任总干事。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人员星散，学会被迫再度暂停活动。1946 年，总干事黄国璋同抗战前地学会理事张星烺等共商恢复中国地学会。协商决定重建地学会的组织机构，公推张星烺为理事长，黄国璋为副理事长兼总干事，王成组、张印堂、黄玉蓉等为理事。

1950 年夏，组建新的中国地理学会，竺可桢为会长，黄国璋为副会长，王成组为秘书，中国地学会宣告结束。

郭沫若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该文署名“杜顽庶”发表在《思想月刊》1928 年第 4 期，后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导论》。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发的发展，“经过了三次的社会革命”：商周之际的奴隶制革命、周秦之际的封建制革命、清代末年的资本制的革命。

郭沫若此月还开始撰写《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31 日　国立武汉大学正式开课。

1927 年 3 月，国民政府将原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文科大学、法政大学合组成国立武昌第二中山大学，但因政治原因该

年冬停办。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此校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该校设社会科学、理工、文学三个学院，文学院初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系。1930年增设历史系，以李剑农为主任（第2任为方壮猷，第3任为吴其昌），教授先后有徐光、郭斌佳、陈恭禄、韦润珊、陈祖源、杨人楩等。

是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广州创办。

蔡元培在《发刊辞》中指出，语言学与历史学，“是和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而创办集刊，就是要将在语言学、历史学方面“我们已有的工作作报告，听同志们的批判”。

该刊主要刊登长篇学术论文，内容为历史、史籍考证、语言、考古、人类学等。据统计，1928—1948年间，史学论文占60%以上。多数论文用中文发表，少数用英文发表。它以一期为一分册，每四分册为一本。由于种种原因，各本集刊的出版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但仍能一直维持出版不辍。直到1949年，在大陆共出20本45册，刊载论文500余篇。之后随中央研究院迁往台北编辑发行。

集刊是史语所最主要的学术刊物，多收录所内外学者的代表作，是众多名家的重要成果的首发之地，比如陈寅恪就在集刊发表文章60余篇。它成为民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王汎森说：“如果要了解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发生、发展，尤其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不可绕过。”

创刊号刊载商承祚《释“朱”》、胡适《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丁山《殷契亡尤说》、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占卜的源流》、傅斯年《周颂说附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等文。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此文是史语所的宣言书。傅斯年着重强调史学以史料为中心和本位。“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提出了历史语言学的发展标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一种学问能扩展它的研究的材料和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便是进步，反之则是退步。历史学的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的工具。

傅氏还倡导进行集团研究。“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能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他要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找材料，互补引会，互补订正，靠个人孤立的研究已显渐难，集中大众的工作渐成一种工作的样式。这集众的工作是几个人一起的合作也可是有规模的

系统研究。”

文章最后提出：“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吴相湘将《旨趣》与胡适所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相提并论，称它们“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而傅之号召比较胡适更具积极性”。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但也产生了较大的偏弊。

何炳松在《史学与地学》第4期发表《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

此文内容包括“演化问题的重要性”、“演化与变动的异同”、“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异同”、“社会演化的原因”、“社会演化的表现”、“研究社会演化的困难”、“社会演化的研究法”、“专史家玉通史家的合作”。

同期还刊载了陈汉章《〈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点校要略》，孟森《〈满洲源流考〉所考明代满洲疆域之发微》，陈守实《清初奴患》，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安特生著、陈训慈译《蒙古探险记——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探险队报告》等文。

陈守实在《国学论丛》第1卷第4期发表《〈明史〉抉微》。

此文主要探讨《明史》的缺失，以及缺失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明史》缺失主要有五条，一是“清帝之禁钳太甚致事多曲讳”，二是“因学派门户之偏见致颠倒失实”，三是“蒐访之漏略”，四是“明清关系多失真相”，五是“弘光迄永历之终史实多却”。

同期还刊载了余永梁《殷虚文字续考》、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梁启超《墨经通解叙》等文。

吕思勉《日俄战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1 月

1 日　奉天省通志馆正式成立。

该日，通志馆正式办公，同时启用关防。11 月 17 日，奉天省政府发出通志馆成立和关防启用通令，该令指出“省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一代有一代之史，一代有一代之志”，奉天已有百余年未有修志，时代变迁，典章政俗变化巨大，若不尽快修志，则征访愈难，考证尤为不易。通志馆以

张学良为总裁，白永贞为馆长，袁金铠为副馆长，总纂为王树枏、吴廷燮、金梁，吴闿生、金毓黻、世荣、王树翰，纂修为许宝蘅、陈思、于省吾、陶明浚、王光烈、杨宗羲、伦明等，共60余人参与纂修。

光绪年间，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时就曾经提出修志，徐世昌任总督后又令三省修志，吴廷燮、金毓黻、金梁等人都曾积极准备从事新志修订，吴廷燮在1909年完成了《奉天郡邑志》、《奉天沿革表》等著作，金梁也着手《奉天乡土志》的修订，后工作中辍。直到此次重新成立通志馆，修志工作才重新开始。“九一八”事变时《奉天通志》尚未成稿，机构瓦解，人员星散，被迫担任伪职的金毓黻独立承担续补统稿的工作，用两年的时间完稿，1937年刊行于世。该志260卷，700万字，被誉为“辽宁史籍之最”。该志在创设篇目、编纂体例、编纂方法、保存史料等方面都有传世的价值。

梅思平在《新生命》第1卷第11号上发表《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

作者说：“希腊历史，我们只晓得中古史；罗马历史，我们只晓得近世史。中国历史，我们所切实知道的，也不过是近世史。因为中国的信史，至早只可算以春秋时代为开始。”“春秋以前的史迹”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氏族斗争时期”、“原始封建时期”、“原始帝国时期”和“新封建时期”。认为中国在春秋时代商业已经“勃兴”，齐、鲁、郑、吴、越都是商业国，秦则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商业国，“秦的并吞六国，完全是商业资本阶级政治的成绩”。自秦以后，“中国的政权，乃完全是资本阶级的手中。为资本阶级所用的，乃是官僚。地主阶级乃为商业资本阶级的别动队。大概在中央政府或都市中，商人则利用官僚为工具。在农村中，则地主操有较大之权威”。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绝对不是封建的社会，乃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并认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制度，一直沿袭到近代。

10日　胡适在《新月》第1卷第9期发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此文又载1929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作者宣告：国故研究是条“死路”，青年人应该“及早回头”，不要再往整理国故这条“死路”上走了。文章以这样一段话作结：“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销磨在这故纸堆里，还没有甚么好成绩。我们应该换

条路走走了。等你们在科学试验室里有了好的成绩，然后拿出你们的余力，回来整理我们的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这等于宣告整理国故运动应当就此中止。

同时，此文标志胡适治学方向的调整。胡适提倡使用实物材料，感叹道：“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

是月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予同据思贤堂原刻本、商务影印本、群益书局铅印本等校勘、标点、注释，前加一叙述西汉以来经学简史的序，后补皮锡瑞的略传、对《经学历史》的订正和补遗。自此，此书成为普及性的经学入门书籍，先后被收入“万有文库”、“学生国学丛书”等丛书再版。

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由东南书店出版。

此书是作者在武大和北大所编写的讲义。包括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方法概论、欧洲文化史导言、历史教学法旨趣四篇。李璜此书对瑟诺博司之说多有采择，但又有所批判和超越，在其框架内加以新的阐发。此书借用了孔德的观点，还可能吸取了巴恩斯 1925 年出版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相关内容。李璜认为，历史学须有科学的和哲学的两种精神，以哲学的综合补救科学化的流弊。他注重与政治史对立的文化史研究，称赞兰克派的挑战者兰普勒希特富有综合魄力。这些都是对瑟诺博司的突破。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由上海革命史编辑社出版。

中卷 1930 年 11 月出版，下卷 1944 年 5 月出版，1946 年 8 月出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

常乃悳《中国文化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专任史语所所长。

12月

1日　周佛海在《新生命》第1卷第12号发表《明年的新生命》。

作者强调中国特殊问题的讨论。“社会科学，只能供给解决社会问题的一般原则。这个原则，只能做到大前提。这个大前提，须以各时各地的特殊环境为小前提，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中国人要解决中国问题除理解社会科学外，还要明晰中国的特殊情形。本刊过去对于这一方面，也有了相当的努力。陶希圣和梅思平两先生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特殊情形的极有价值的著作。”

康生在《新生命》第1卷第12号发表《中国社会的蠡测》。

作者提出，周末至战国，商品经济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金属货币的出现加速了土地的兼并，旧的身份制度也被打破，思想上出现一大解放。他从两方面说明中国产业不发达的原因：一、商业经济。商业资本只是扰乱了封建的秩序，而没有力量来代替封建社会。在历史上商业资本有两个趋向：一是促进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这是进步的；另一个是敲吸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自身于生产行程上没有什么建议或改良，即是退步的。中国的商业资本或许就是后一种。二、地理环境。西北部接触的都是野蛮的部落，侵扰中国几千年，并不时地占领中原，这一点影响中国的进化至大。康生没有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何，但他认为，从秦始皇到民国初年，政权都落在大地主阶级之手，总脱不掉封建社会的局面。

他的观点，如地理环境对于社会构成的影响，商业资本的局限性的分析，后来在陶希圣的文章中也多出现。他的文章明显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

3日　绍来在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第6期发表《整理古史应注意之条件——质顾颉刚的〈古史辨〉》。

作者认为：“我们整理古史，在零乱的、散漫的、传说纷纭的记载之中，要求出正确的、系统的观念，在应用考古学以外，应注意左列几个条件：1. 证据确凿，不可带模棱的、疑似的性质。2. 引证须有普遍性。3. 严格遵守逻辑上的规则。”他还提出三种逻辑推理方法，即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顾先生的《古史辨》，怀疑的精神很可佩服，他很致力于辨伪的工作；但是他的态度上、方法上，却太多令人可议的地方。”“总之，古史可怀疑的地方正多，却不能用这种牵强附会的方法来辨明的。怀疑是求知应有的精神；牵强附会，主观揉合史事，却是治史之

大忌。”

5 日　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57、58 期合刊发表《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春秋研究课旨趣书》、《孔子研究课旨趣书》、《中国上古史实习课旨趣书》。

在《古代地理研究课旨趣书》中，顾颉刚认为“古代地理研究”这个名词不甚妥当，实际应是“从故籍里看中国人对于古代的疆域观念和实际上汉以前的各时代的疆域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他强调了地理学、地质学和实地调查对于古代地理研究的重要性。

在《春秋研究课旨趣书》中，顾颉刚认为“尚书和春秋是两部历史书，圣人的法则是后来加上去的”，要用历史学的态度治春秋，“把许多混乱的材料分类，从它们各个的本身上指出各个的历史上的地位”，即将《春秋》分为“春秋本经”、“春秋三传”、“经的春秋”、“史的春秋”四种。

在《孔子研究课旨趣书》中指出，应该不管是非，不管善恶地对孔子进行深入的研究，“惟有把材料细细地分析，在分析之下判别他们的真实与虚伪，在分析之下寻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变迁的历程”，在此思想指导下把讲义分作四部分：“孔子事实及记载孔子事实之文籍考订”、“各时代人心目中之孔子”、“道统传衍问题”、“经书著作问题”。

在《中国上古史实习课旨趣书》，顾颉刚认为“研究史学的人必须动手搜集史料”，“惟其继续有新材料的发见和新方法的运用，才可在创造之中，有不绝的突破前人记录的成绩”，而要想打破古史材料的旧系统，建设新系统，就需要下大工夫整理史料。顾颉刚将史料的整理分为两类八组：第一类是“对于某种专书的整理”，包括年代总表、人名索引及世系表、地名索引及地图、材料考订；第二类是“对于某一件事件整理”，包括“人的传说的演变”、“制度的传说的演变”、“古史系统的传说的演变”、“书籍与学说的演变”。

7 日　清华大学边疆研究会成立。

《边疆研究会缘起》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而“帝国主义者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进逼”，“吾国若尚不早为固国之计，则唇亡齿寒，内地亦行见有沦亡之祸”，为挽救此等危势，决定成立边疆研究会，以切实研究边疆，谋求“妥善之挽救办法”。发起者有朱希祖、翁文灏、张星烺、冯友兰、汤象龙、刘崇鋐、罗香林、罗家伦等。

此后此类研究会陆续成立，如 1930 年金陵大学成立的“中国边疆问

题研究会”，1936 年燕京大学成立的“边疆问题研究会”，1941 年成立的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等。

19 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各省县一律修志。

该训令称各省志县志失修已久，长此不加整理，必至事实淹没，令各省议局修理，各县也应一律修理。此后军政部、内政部、中央宣传部、行政院等中央机关先后训令收集呈送志书。1930 年 1 月 25 日，行政院再次饬令各省督催县市编修志书。训令称“县志乃一切民政发轫之基础，路市两政之参考，尤为重要”，但令各地呈送志书以来，全国 1700 余县，县志送到者不过百部，省志送到者亦仅数省。1931 年 4 月 15 日，内政部又饬令各地修志须聘请“学识优长，并富有时代思想者主编”。在中央的不断督催下，各地都着手修订地方志，掀起了民国修订地方志的新一轮热潮。

是月　辅仁大学创办《辅仁学志》。

《辅仁学志》由陈垣、雷冕（Rev. Rudolf Rahmann）、英千里、胡鲁士、沈兼士、余嘉锡、张星烺等人组成的辅仁大学编辑会负责编辑出版，其主旨“在研究中国学术”，内容“凡关于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美术，金石等著作或疑问，均所欢迎”，“年出两期，并得随时增刊专号”，文体不限，但使用新式标点。

在创刊号刊登的《弁言》中，编辑会指出：“中华建国之早，史料之丰富，文物之美备，实为治世界史者所艳称，百年以往，乾嘉诸老努力朴学，极深研几，本实事求是之精神，为整理珍密之贡献，三古文史灿然大明。”“殆海国棣通，新知输入”，“八儒三墨，七略四部，廓之益广，大启尔宇，异书间出，敦煌写卷，多宋元学者所未见，殷墟龟甲，更汉注唐书所未言，访法画于山崖壁屋之间，征古文于流沙坠简之上，向之摩挲百千宋元者，今则须踝躞于新疆大漠，倾向既异，工作自殊，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欲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亚合作不可”，“吾人既承沟通文化之使命，发扬时代精神”，故该志“甄综客观材料，类聚群分，整齐百家杂语，同条共贯，惩向壁虚造之失，不辞远绍旁搜，洞因革损益之原，孟晋寻求背景，唯力是视”。

1947 年 12 月，《辅仁学志》停刊，共出版 15 卷。

姚士鳌（姚从吾）在《辅仁学志》创刊号发表《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

作者认为汉晋时代，由于西域事务繁多，“纸与简札，因军事政治的关系，由中国西北部于第二世纪，即传入西域各地”；唐代设置安息四镇，推行汉化政策，“造纸术也随着移民传到西域”，但罗斯之败，中国兵士有

知造纸术者若干人，被阿拉伯俘虏，“从此中国的造纸法，遂传入阿拉伯帝国的撒马尔干”；造纸术在阿拉伯通行后，由北非传入欧洲，13 世纪造纸术已经通行欧洲各国，“因助成欧洲活版印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姚氏此时正在德国留学，该文引用了许多外文资料，发表后引人瞩目，但方豪认为该文在若干拉丁名词上存在误解。

同期还刊载了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鞠增钰《四库总目索引与四库撰人录》、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等文。

陈垣在《燕京学报》第 4 期发表《史讳举例》。

为了解决治史中的避讳问题，陈垣全面爬梳了历代避讳的情况，系统整理了古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利用避讳现象校勘古籍、考证史事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撰成此书。《史讳举例》初稿曾经送胡适、杨树达、沈兼士、伦明、朱希祖等学者审阅。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部分观点和材料。

作者自言撰著《举例》的目的，即“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1940 年撰《通鉴胡注表微》还特设一《避讳篇》，并强调：“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吾昔撰《史讳举例》，职为是焉。”

《史讳举例》8 卷 82 例 8 万多字。前半部是对避讳的分类，揭示避讳所造成的古籍记载上的混乱讹误；后半部是对避讳学的概括和总结，讲述避讳学的注意事项、掌握避讳学的重要性、如何利用避讳学知识来考史及历朝避讳之演变。是书体例仿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列举案例的形式。通过举例论理，寓理于事例，不仅论证方法严密，而且于考据操作示范性极强。这部总结性著作一方面建立了避讳学的体系，为近代史学奠定一辅助学科——避讳学（史讳学），一方面为历史考证归纳了一个可资研习、利用的新工具。

胡适《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后记》：“此第八卷乃是避讳学的历史，又是它的骨干。其第五六七诸卷，都是依靠这历史的骨干，讨论避讳学的功用和流弊。陈先生此书，一面是结避讳制度的总账，一面又是把避讳学做成史学的新工具。”

同期还刊载了（日）羽溪了谛著、许敦谷译《西域佛教之研究》，郭绍虞《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吴其昌《印度释名》等文。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由上海复旦书店出版。

陈功甫《中国最近三十年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冬，新南社的主要成员胡朴安发起中国学会。

本会以“研究中国学术，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胡朴安说：“我们研究中国学术，完全是研究中国整个的民族。因为我们民族的思想行为，悉由历史之习惯养成。一切学术，皆为历史。”他说：“中国学术的系统与世界学术的系统完全不同。”学术是民族的精神，中国有中国的特殊的学术。

政、学两界反响热烈，南京政府的文化要员叶楚伧列名其中，吴稚晖也是84位发起人之一。该会成立才5个月，陆续加入者已达260余人。1929年初，很多学者表示愿意参与，有丁福保、王云五、王伯祥、吴稚晖、吴承仕、朱师辙、吕思勉、何炳松、柳诒徵、陈乃乾、孙人和等，几乎网罗了除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一系外所有学界的重要人物。

胡朴安的民族主义立场得到众人的支持。同时也有反对的声音。胡适就不能认同“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而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

陈寅恪开始研究《蒙古源流》。

据劳榦《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载，该年秋季，陈寅恪在北大兼职讲授“《蒙古源流》研究”。1930年，陈寅恪有蒙古源流研究系列论文刊出，即《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1930年6月；《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两篇同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年4月。这些论文是陈寅恪对中国蒙古学研究最主要的贡献，标志着我国蒙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29 年

※ **梁启超病逝。**
※ **中国史学会成立。**
※《**史学杂志**》、《**史学年报**》**创刊。**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
※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
※ **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清史稿**》**被国民政府查禁。**

1 月

1 日　陶希圣在《新生命》第 2 卷第 1 号开设《社会科学讲座》。

第 2—6 号连载。此为陶希圣在复旦大学文学科所作讲座。包括“社会进化说与文化传播说”、“马克斯的社会进化论”、“文化传播说的概要”等内容。其中认为，“历史的唯物论”并不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不过是“综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维科及其他唯物的历史观、法国的唯物论而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资本主义典型国英国为对象”，并不具有普遍性。至于马克思的“古代社会论”，则“天然是不正确的”，只有摩尔根《古代社会》算得是有系统的民族学著作。

7 日　朱希祖草拟《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

朱希祖称，发起中国史学会，出于三种动机，寄托七种希望。所谓三种动机：一是要打破孤独讲学的旧习；二是要打破专靠学校来讲史学的旧习；三是要打破史学为政治的附属品，而为社会的独立事业。

至于七种希望，也就是应办的七项事业：一、办一史学杂志（月刊或季刊），发表研究论著；二、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吸收各大学史学系毕业生、教员和在校学生，以及社会上研究史学的专家，分别调查全国的史料以及古迹古物，互相咨询报告；三、分组进行不同层次的工作，如编辑人名地名词典、历史索引、史料采集和编目，继续清代学者的事业，搜集

已引各史，翻译外国记载的中国史事和各国历史名著等；四、改良史学教育，对中小学史地教科书进行比较批评；五、推动高深的史学研究，会员各认定一种史学，专门研究数年，然后著述；六、北平的史学家尤其应当重视重修清史、倡修十七年民国史，以及整理利用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和民国档案，供给史材；七、改良地方史志，以最新最良之方法，定一最适宜体例，以改革各处地方志，使之不专属于地理，而属于历史，以为一切社会科学和史学最丰富的材料。

10 日，朱氏又与张星烺、罗家伦共同拟定中国史学会简章。

10 日　潘光旦在《东方杂志》第 1 号发表《中国家谱学略史》。

此文主要梳理中国家谱学发展的历史，认为《世本》是现存最早的家谱，从魏至唐，是“中国谱学最盛之时期”，五代而后，“谱学由官而私”，谱学亦逐渐衰微。此文是对中国谱学史的首次系统梳理，颇有价值与影响。1930 年，作者又发表《家谱与宗法》。

13 日　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 57 岁。

1 月 20 日，胡适、陈寅恪、任鸿隽等一批学界精英出席了梁氏大敛，因政局变化，丧事颇冷落。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受人哀悼。吁！可怪哉！”

1 月 21 日，张荫麟（素痴）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高调悼念梁启超，特别对梁启超在历史学上的意义做了极高估价：“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首创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至于梁启超这几年的抱负和贡献，先生“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按所长，尤专力于史。盖致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殁，实中国史学史上之一大损失也”。

是年《学衡》第 67 期转载张荫麟的文章并刊发缪凤林的文章《悼梁卓如先生》（《史学杂志》第 1 卷第 1 期）。缪文指出梁启超的著作虽多，但“其中有一义焉，则其研究以史学为中心是也”，并一一胪列他在国史新观念、政治史、学术史、财政史各个方面的贡献，说他“方面既众，观点亦异，实开史学无数法门”。大多数学术界思想界人士并没有忘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时执学界牛耳的胡适在 1 月 20 日的日记里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但对他仍有一些非议，如“才高而得不到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

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

1929 年 4 月，美国出版的《史学界消息》发表文章，称赞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

1932 年，林志均编辑《饮冰室合集》40 册，中华书局出版，共 148 卷，约千余万字。

中国史学会成立。

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史学系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等专家共 94 人召开成立中国史学会会议。会议选举朱希祖、陈垣、罗家伦、钱玄同、王桐龄、张星烺、沈兼士、陈衡哲、马衡九人为委员，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为候补委员。朱希祖任学会主席，下设编译、征审、出版、图书四部，计划组织各种专题研究，出版《史学季刊》及史学丛书，开设定期讲演等，并逐步将学会“扩充至全国，其第一步，先将各大学史学系及史地系毕业生散在各省者加入为会员，再由委员会敦请国内外对于史学有贡献之学者为名誉会员及通讯会员”。

何炳松在《东方杂志》第 2 号发表《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

作者批评了 17 世纪至 19 世纪末国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九种说法，认为“假使吾因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何氏还批评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的现象。

30 日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作为“新生命丛书”之一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陶希圣在书中说，“中国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要扫除论争上的疑义，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应当在研究中国社会史上“痛下一番工夫”。只有弄清楚“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才能解开中国革命的“谜”语。书中既总论中国社会性质，又分别对七大阶级、官僚制度、民族意识、宗法关系等问题进行社会史考察。

陶氏将中国历史分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代以前为氏族社会，以后即进入封建社会，未曾经历过奴隶制社会。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基本观察即士大夫阶级的存在。“士大夫阶级势力表现于政治则为官僚政治。对战斗团体的依赖性及对生产庶民的抑制性是官僚政治的特征。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隶属关系。表

现于思想则为等级思想。这种社会实具有封建社会的重要象征。工商业资本主义在这种势力桎梏之下，没有发达的可能。这种势力只有叫做封建势力。”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的问世引起了学界的争论，此书三年之内销了八版，数万册。齐思和认为：“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这个论战第一炮声是陶希圣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新生命书局推出的“新生命丛书”还收录了樊仲云《妇女解放史》(1929年3月)，文圣举、文圣律《各国革命史》(1929年4月)，朱新繁编《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没落》(1929年5月)等史学著作。

是月　柳诒徵等倡议建立“南京中国史学会”。

柳氏与范希曾、向达、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张其昀等弟子共同倡议成立“南京中国史学会”。倡议书称：“世运日新，浅化者或张皇震惊而莫测其始因及归趣……近世号称史学魁宿者，目涑水通鉴为帝王教科书，无裨于今之新制。”此史学会属地方性和同人团体性质，成员实际就是先前史地研究会中从事史学研究的会员。

该会还推出了“南京中国史学会丛书”，出版的论著有：(日)桑原骘藏著、陈裕箐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10月)，柳诒徵编著《中国文化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8月)，缪凤林编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9月)、《日本论丛》(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7月)，陈鼎忠、曾运乾《通史叙例》(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12月)，陈鼎忠《六艺后论》(南京钟山书局，1934年2月)等。

陈彬和选注《元朝秘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味之《近百年本国史》由世界书局出版。

2月

20日　方书林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9期发表《汉以前的尚书》。

是月　顾颉刚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吴承仕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2号发表《经典释文撰述时代考》。

3 月

6 日　郑泽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71 期发表《真孔子的史料》。

7 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 2 次发掘。

李济等在安阳洹上村设办事处，分别从村中、村南、村北三处进行发掘。这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王湘、裴文中等。此次发掘至 5 月 6 日结束，获甲骨 740 片，另有古器物等甚多。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为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登录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者坚持写发掘日记，因而第 2 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

10 日　《史学杂志》创刊。

本刊由南京“中国史学会同人编辑发行”，“以发表研究著作，讨论实际教学，记述史界消息，介绍出版史籍为宗旨”。此刊实际系由《史学与地学》分化而来，主要撰稿人和负责人仍是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等，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国学图书馆内。

柳诒徵在《发刊词》中指出，“鉴戒之不可不知往闻，近世号称史学魁宿者，目涑水通鉴为帝王教科书，无裨于今之新制，嗟乎，斯特皮相之论耳”，“欧战之后支配欧陆者乃讬兴灭继绝以削强大之邦，彼之坛坫主盟未尝读吾书也，然其命意则暗合焉，以是知不学固未必无术，然根据前事因应方今，其为术可以尤富。阁束不观，徒以自窒神智耳，《尚书》首称粤若稽古，解者诂若为顺，吾谓是真能解读史之法者。学童甫解一卷，便挟成见，谓某书伪制，不足信，某书腐旧不足观，其设心已与前人之经验相逆，恶能由之以获益？惟委心顺书优游餍饫于其间，然后数千祀无量数人之识解思想始可辐凑于今人之心”。

缪凤林在《史学杂志》创刊号发表《中日民族论》。

济南惨案爆发引起作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警惕性，认识到“以中日关系近代最密，而国人对于日本之研究，最不经心”，乃借在中央大学任日本史课的机会，在中央大学等处讲演日本问题六次，此文即其一。

缪凤林学生时代就留意日本史，见日本军国主义日渐危及中华，更加注重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唤起国人对日本侵华野心之警惕，在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日本军阀论》、《日本考略与日本图纂》、《中国民族由来论》和《评戴季〈日本论〉》等。

创刊号还刊载了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郑鹤声《班孟坚年谱》、柳诒徵《述宋史质》、张其昀《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第 2 期连载）、陈训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等文。

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3 期发表《敦煌的俗文学》。

此文不仅估价了敦煌文献及敦煌文学的价值，对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分类研讨，还探讨了中国小说的起源等问题。稍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4 期发表《词的起源》。此两文被认为是最早从文学史的角度探源敦煌文学的论文，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27 日　刘朝阳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 73、74 期专号发表《史记天官书之研究》。

此文探讨了《史记·天官书》的科学与非科学成分，并将它与《周髀算经》、《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天文志》、《汉书·律历志》及同时代西洋天文学进行了比较。

29 日　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召开大会，成立新的“北大史学会”。

其简章的基本精神与此前略同，但也有若干变动。如会名由“北京大学史学会”改为“北大史学会”，宗旨由“联络同志研究史学”改为“研究学术促进文化及联络感情”，会员资格也由原来北大史学系毕业及肄业者、本校他系同学及教职员有志研究史学者，以及由本会两名会员介绍的国内外有志研究史学者，变为“凡本校史学系同学及教员皆为当然会员”，他系同学则须两位会员介绍，主体增加了教员，范围却有所缩小。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北大史学系困于派系纷争和人事变动，学术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是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从广州迁往北平。

傅斯年为了便于开展学术工作，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北平，办公地点选为北海静心斋。该年 6 月，在搬迁完成后，傅斯年改组史语所，将在广州时所设八组改设为 3 组：第一组是从事“史学与文籍考订”的“历史学组”、第二组是从事“语言学和民间艺文”的“语言学组”、第三组是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的“考古学组”，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第一、二、三组组长。此次改组确立了史语所的基本架构。

关于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的时间众说纷纭，此处采用李光谟《李济先生学行纪略》中观点（李济在《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文中列为“十八年春”）。

钟泰《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为作者在之江大学的讲稿。作者强调回到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凡例》) 所以钟著就中国谈中国，不用西语，代表了彻底否定胡适路向的较为极端的一派。此书是从总体上对胡著的系统加以校正和抵制的最可注意的两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之一（另一种是陆懋德《周秦哲学史》)。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此书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封建阶级、重农轻商问题、地主豪绅、产业革命等。其最后一章《从中国社会史上说到中国革命》则概述了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国社会史研究》风行一时，为社会史论战中的代表作之一。

胡适向顾颉刚明确表示已从“疑古”走向“信古”。

3 月中旬，顾颉刚为中山大学之事赴上海，并访问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在此访问中，胡适明确告诉顾颉刚“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永乐大典专号”。

此期专号刊载了孙壮《永乐大典考》、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赵万里《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馆藏永乐大典提要》等文。

罗廷光《各国革命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华超《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 月

3 日　魏应麒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75 期发表《编纂五代闽史的引言》及《五代闽史稿之一》。

第 76—78 期连载。

19 日　北洋政府农商部正式批准翁文灏和步达生起草的新生代研究室组织章程。

《章程》规定，“本研究室的宗旨为开展一项广泛的人类古生物学调查计划。采集、研究和描述中国第三纪及第四纪的化石均为本研究室的目标。本研究室尤其关注人类生物学方面的问题”；研究室归地质调查所所长管理，以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杨钟健为研

究室副主任，“专门从事古生物学部分而不是人类学部分的研究工作”。该研究室是第一个中国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的研究机构，至抗战爆发前的十年，一直致力于发掘周口店遗址，共发掘人骨化石、动物化石、石器等十万余件。

该研究室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身。

25日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由南强书局出版。

书中分中国地理与民族、封建制度、集权国家、商人资本、土地制度等8章。作者认为，中国公元前400年以前，曾实行完全的封建制度，此后封建因素逐渐瓦解，但自然经济的优势一直持续到1500年。

1930年1月20日，杜荃（郭沫若）在《新思潮》第2、3期合刊发表《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他指出，“研究中国的社会：第一是方法的问题；第二是处理材料的问题。方法的比较简单，因为欧洲的不少导师已经把路径或者模型开设在那儿，我们后来者自然可以得到许多的利便。我们的良心假使真正是在科学的观点上说话，在目前除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以外是没有第二种可以采用的”。“他的方法大抵是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倾向，但只是倾向，应该还要有更正确的把握。”郭沫若对陶希圣的批评集中于材料方面。他的结论是：此书的错误太多，使人不敢“再往下读”。

郭沫若提出一个研究社会史的方案。“解决这个难题的我想只有一个方法，便是采取最新流行的委员制，由各人分担一个项目或一个时代，期以五年十年，那所成的一部‘中国社会史’，真就可以壮观一时了。我现在正怀着这样的一个意想，但这也并不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只要大家不要以无学为光荣，不要以清算主义为唯一的能事，不要兢兢于目前的名声风头地位，脚踏实地，和衷共济的来干这一份应该干的文化工作，我想这个委员会在上海立地便可以成立起来。”

由于此书大量应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货币、交换、地租等概念为分析工具，有人批评他是从河上肇的著作中照抄公式。（傅筑夫：《陶希圣著〈中国封建社会史〉》，《图书评论》第1卷第10期，1933年。）

此书是社会史论战中的名作之一。

是月　王云五主编的大型丛书“万有文库”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据王云五称，4月开始编印第一集，至1934年7月结束，1934年9月开始第二集，后因抗战军兴未再编印第三集，于1939年推出“第一、二集简编”。第一集收入经史书籍主要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道藏

目录详译》，诸子书，二十四史（部分），《通鉴纪事本末》，宋郑樵《通志略》，明陈邦瞻著、臧懋循补辑《元史纪事本末》，明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清戴震《戴东原集》，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孙诒让《墨子闲诂》、《周礼正义》，皮锡瑞《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墨子》、《王守仁》，周予同《群经概论》，陈柱《老子与庄子》，傅勤家《道教史概论》，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何炳松译《新史学》，李思纯译《史学原论》，郑振铎《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陈安仁《中国近代政治史》，陈捷《义和团运动史》，金兆梓《现代中国外交史》，束世澂《中英外交史》、《中法外交史》，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中国内阁制度的沿革》，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王孝通《中国商业小史》，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陈功甫《中国革命史》等。万有文库第二集收有国学基本丛书二集（300 种）、汉译世界名著二集、十通、《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佩文韵府》、《唐会要》、《五代会要》、《明会典》、《清会典》、二十四史（部分）等，此外还有清俞樾《诸子平议》，清崔述《考信录》，清马骕《绎史》36 册，清方东树《汉学商兑》，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周寿昌《汉书注校补》4 册，王造时、谢诒徵译《历史哲学》等书。

新生代研究室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新生代研究室正式成立后，立即组织了对周口店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此次发掘由裴文中主持，一直持续到年末。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开始编印“政治丛书”。

该丛书收录的史学类书籍有张韶舞、孙慕迦编《社会主义史》（1929 年 4 月），吴寿彭等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9 年 4 月），文圣举、文胜律编《中国革命史》（1929 年 4 月），柳克述编《近世外交史》（1930 年 7 月）等。

李达《社会之基础知识》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作者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可见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的重视。本书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介绍较浅显。李达还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

中国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趋势必然是社会革命。

(德) 奥本海末尔著、陶希圣译《国家论》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奥本海末尔关于“原始国家”起源于暴力征服，以及它向“海国”和“陆国”两条道路发展的理论，曾被一部分学者接受。

朱谦之赴日本留学。

朱氏得蔡元培、熊十力的推荐，由中央研究院提供资助，中央研究院所定朱氏研究题目是《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之比较研究》。他留日期间基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主要是孔德与黑格尔的哲学。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于上海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时，开设近代文艺讲座，其后在授课讲义基础上撰成此书。作者自“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沿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词曲、翻译文学这一主线，将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间文学之嬗变与转化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文学研究起到了开山作用。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背景出发，阐述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生发展，并分方言、军备、西艺等18个专题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作为较早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学术专著，1931年，该书被翻译为日文出版。

周策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由南京中山印书馆出版。

刘士英《欧洲的向外发展——帝国主义研究之一》由新月书店出版。

5月

1日 《史学杂志》第2期发表陈训慈译《国际历史学会第六届大会记》。

作者指出，“此次盛会，中国虽未有代表参与，然史学研究之国际合作近况，与各国研究之趋势，当为国内研治史学者所注意”，乃根据美国J. F. Jameson教授所记此次会议文章，“更定节目，译录其大要，以告国内之关系史学者”。文章最后指出，国际史学会第七届大会，决定将于1933年在波兰华沙举行，作者“尤望国内学术界得循政治之渐趋安定，而有健

实之进步，届时国内史学界再不致如此次之漠视此会，而能由学术团体与政府之合作，推定代表前往参与也”。

同期还刊发了缪凤林《日本军阀论》（第 3、4 期连载）、《〈汉书·五行志〉凡例》，柳诒徵《沈万三》、《记王锡侯字贯案》，郑鹤声《正史总论》，陈裕菁《朝鲜两次变乱之文件》等文。

15 日　杨筠如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81 期发表《姜姓的氏族和姜太公的故事》。

27 日　陈垣为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作《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讲演。

陈垣时任哈佛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讲演由翁独健笔录，经陈氏亲自修改增补，1929 年 7 月 10 日发表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 1 期。

作者分史籍、档案两类材料论述了整理的方法。在史籍方面，提出八条措施，除对古籍进行新式标点、分段和改进工具书的编写与书籍装订外，还应为所有的笔记和文集编写目录、总目及索引，并编出群书篇目汇纂、重要书籍索引、分类—专题编集等大型系列检索工具书。档案整理则可分为八个步骤，依次是分类（按种类、形式或文字等）、分年（按年集中，顺时排列）、分部（如兵部、礼部等）、分省、分人、分事、摘由（摘出每一文件事由）、编目。其提议得到史学界同人的响应。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的“明清史料编刊会”，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时，工作程序便系据上述“整理档案八法”制定。1930 年起，在洪业和聂崇岐等人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参照上述计划，精心组织编写了一系列中国古代典籍的检索工具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前四史、历代艺文志和食货志、《水经注》、宋至清人物传记、道藏、佛藏、《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引得共 61 种。

是月　应罗家伦邀请，蒋廷黻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蒋廷黻就任后，按照“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综合与考据并重”方针对清华大学进行了改组，使清华史学成为民国史学界独具特色、成果丰硕的一股力量。

罗尔纲《湘军新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探讨了绿营制度的缺陷、湘军的成立及主要将领、湘军的制度、粮饷来源、募兵及遣散制度、军纪、战术、湘军的影响等。罗尔纲认为湘军的出现不仅改革了清代的兵制，而且造成了兵为将有，导致晚清督抚权力扩大，中央集权制度衰微。该书 1984 年由被北京中华书局再版，改名

为《湘军兵志》。

李浩如（杨贤江）《教育史ABC》由世界书局出版。

此书系世界书局推出的“ABC丛书”之一，先对“教育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然后分别论述了“先史时代”、“古代”、“中世”、“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者”、“近代中国”的教育情况。

陶希圣在《新生命》第2卷第5号发表《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

陶希圣指出：唯物史观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唯物史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辩证论的方法。一是把辩证法的唯物论应用到社会所得到的论断。这两部分是应当分别观察的。”

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由中华印书局出版。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

6月

1日　梁园东在《新生命》第2卷第6号发表《中国社会的基础》。

第8、9号连载。梁园东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与商业相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其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1）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决定社会生活状况的原理，同时又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用于中国，将人口不断增加作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具体根源，以此解说中国地域的不断扩大而社会本身并无进步的原因；（2）运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法国农民时的观点说明中国社会为何呈散沙状；（3）社会本身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维系社会需要阶级的调和，统治阶级虽然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为了实现其统治，也需要顾及全社会的利益。

同期还刊载了方岳《三民主义之社会史的意义》等文。

5日　钱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83、84期合刊发表《易经研究》。

是月　瞿兑之在《燕京学报》第5期发表《西汉物价考》。

该文对西汉的金银、衣料、土地、人工、奴婢、粮食等价格进行梳理。此文是1928年出版的《汉代风俗制度史》一书中“物价篇”的增补。陈啸江稍后指出，“瞿氏开了此种研究之先声，但他所考出的，范围很有限，并且除堆积一些材料之外，也没有新颖的见解，所以我们觉得仍

有研究的价值”，故他撰写了《西汉的通货单位和物价》（《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 2 卷第 2 期）继续研究，此后马非百、瞿宣颖、劳榦、陈直等学者在此主题皆有研究。

同期还刊载了马衡《戈戟之研究》、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容庚《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伦明《渔洋山人著书考》等文。

奉宽在《燕京学报》第 5 期发表《燕京故城考》。

该文分别对燕京故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进行了考证，对建筑史、城市史、考古学等领域较有影响。

李长傅编《南洋华侨史》作为“南洋丛书”第四种由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出版。

收入该丛书的史学著作还有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的《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1928 年 8 月），（日）长野郎著、黄朝琴译《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1929 年 9 月）等。

（德）恩格斯著、李膺扬译、周佛海校《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书前有陶希圣序。《新生命》第 2 卷第 7 号广告称，出版这本名著的意义有二：“第一在使读者认识历史的唯物论的具体论据。第二在使读者引起研究民族学的端绪和兴趣。在这两种意义上，没有比这本书还适宜的。它是历史唯物论的宗匠所著作的。它又是根据民族学最初最有系统的名著——莫尔干《古代社会》——而下笔的”。

（德）莱姆斯著、王冰若译《社会经济发展史》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此书是根据他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知识的演讲辑录而成的。该书分六讲，为“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古代日耳曼的马克经济”、“古代社会的奴隶经济”、“中古时代的地主经济”、“城市及城市手工业的发达”、“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大资本主义及其达到社会主义的固有的倾向”。

蒋廷黻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2 卷第 6 号发表《评〈清史稿·邦交志〉》。

第 3 卷第 1 号连载。蒋廷黻认为“清史倘无《邦交志》，则清史无从理解，即今日中国之时局亦无从探研”，而“清史馆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遗憾的是，《邦交志》“书法及其根本史学观念则纯为袭旧”，对于

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及其变迁之根本理由两大问题，“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之主要问题”。蒋廷黻进一步指出，即使不以“新史学之眼光”评论，仅就《邦交志》“述事之失实”，也难容于“旧史界”，所以说“《邦交志》非史也”不为过。

刘汝霖《周秦诸子考》上下册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陈启天、常燕生《国家主义运动史》由上海中国书局出版。

文公直《俄罗斯侵略中国痛史》由上海新光书店出版。

7月

1日　陈裕青在《史学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北宋米价考》。

作者认为“米价贵贱，于民生关系至大”，此篇“以北宋为限”，考各朝米价之变动。至于米价涨落之背景及其影响，作者表明另文探讨。

同期还刊载了范希曾《评〈清史稿·艺文志〉》，柳诒徵《火葬考》，张其昀《宋代四明之学风》（第4期连载），束世徵《明季流寇之成因》，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缪凤林《日本考略与日本图纂》、《评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陈训慈《欧洲独裁政治之现状与其前途》等文。

5日　（德）米海里斯著、郭沫若译《美术考古发现史》由乐群书店出版。

此书据滨田耕作日译本转译。作者指出本书的价值在于将考古学“由美术的视野来观照，来叙述，把这一个分科就如象造成了一个万华镜一样”。

郭沫若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考古学上尽快地借鉴于西方。郭沫若从此书中得到很大启示，他说：“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我，因而我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是这本书赐给我的”；“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了”；郭沫若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接受了近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许冠三认为，郭沫若的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他的爬梳疏理所以有些成绩，实得力于重译日人滨田耕作所译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29），而不是某些妄人想当然耳的什么‘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结合”。

1931年9月1日由上海湖风书局再版，改名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48年8月改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时，书名又改为《美术考古一

世纪》，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再次出版。

10日 《史学年报》创刊。

该刊由燕京大学历史学会负责编辑出版。《发刊辞》指出，"吾国史学，渊源最早，而以其进步迟缓之故，及至今日反落欧西诸国之后"，导致史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袭多而创作少"；"反观西洋其史学之大形发展，亦不过近百年来事耳，然史料之分类与审定也，史学理论也，历史哲学也，考古也，类皆议论将定，成为科学，后进之士，苦于在其本国史中，无覆可发，且浸假而肆其精力于中国史焉。而我国学者，本其传统之实用主义，舍本趋末，专言富强，于史学一科，目为无用，摒而不讲甚至'现今我国学校通用课本，乃率皆裨贩迻译，以之充数'，其结果不但富强不可几，且行将为印度之续"！出于"深慨而不敢自弃"之念，鉴于"现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几"的形势，乃"忘其锢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一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由于相信"非学理无以指导研究工作，非有专门研究，则学理无所附丽"，故该刊内容"学理与工作并重，尤侧重于国史研究"。

据《史学消息》刊载的"吉佳"《史学年报回头录》一文可知，该报编辑有两个长处，一是匿名审稿制："除揭载燕京大学史学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之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二是"重校对之精审"：编者"每次校对，不但惮烦，或四五次，或七八次，虽未能必其绝无屯毛之误，亥豕之讹，然较之时下刊物，已有渊壤之判"。该刊很快受到学术界认可，"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

此刊计划年出一册，1940年12月停刊，共出12期。

陈垣在《史学年报》创刊号发表《中国史料的整理》。

作者指出，史料浩瀚，如果不对史料进行整理，则研究无法展开，并认为"整理研究的史料"是"以最经济的时间得最高的效能"的读书方法。陈氏将中国史料（单指文字记录方面）分为"成书册的史籍"和"未成书册的档案"，并细致探讨了如何运用索引等方法整理不同的史料。

陈氏认为，“假如我们各书的索引能告成功，就人人都可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了”；中国“有长远的历史，丰富的史料，而无详细的索引”可算是“中国的四大怪事”之一，“我们若是肯从此努力，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工夫，那就可以一人劳而百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

创刊号还刊载了孟世杰《戎狄夷蛮考》，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唐宋时代妓女考》，徐琚清《北边长城考》，张星烺《中世纪泉州状况》，瞿兑之《以日本平安京证唐代西京之规制》，次弓《两汉之胡风》，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李崇惠《石达开日记之研究》，李书春《李文忠公鸿章年谱》，齐思和《先秦历史哲学管窥》等论文。

24 日　许文玉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91 期发表《诗与史实》。

是月　王重民编《国学论文索引》初编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

该索引收录 1905 年至 1928 年 7 月以前发表在 80 余种报纸杂志中的国学论文 3000 余篇。索引共分总论、群经、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史学、地学、诸子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宗教学、音乐、艺术、图书目录学等 17 大类及若干小类。

1931 年 7 月出版徐绪昌编《国学论文索引》续编，增补初编未备之处。1934 年，刘修业编辑《国学论文索引》三编出版，收录 1928 年至 1933 年 5 月发表的论文。1936 年 6 月刘修业又编纂出版了四编，收录 1934 年 1 月至 1935 年 12 月间的论文。五编由侯植忠于抗战前编成，1955 年出版，收录 1937 年 6 月以前的论文。

范文澜等人为祝贺顾颉刚父亲 60 寿辰送寿屏，高度赞扬顾颉刚的疑古成就。

据牟润孙《北京学林话旧——跋钱玄同给魏建功的两封信》，为祝贺顾颉刚父亲 60 寿辰，钱玄同、范文澜、魏建功等商议发起为顾老送寿屏之事，大家公推范文澜撰文，最后署名者有马裕藻、马衡、马廉、董作宾、刘复、钱玄同、钱稻孙、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吴肇麟、魏建功。这篇寿序高度称颂了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成就：“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两汉经师蔚起，攟摭焚余，笃守残缺，缀葺不遑。黠诈者谄隙作伪，苟便私意，淆乱弥甚。自是以来，沿为风习，烟瘴蔽塞，不可清梳。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坚，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

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冰陶铸之甚厚。与夫器小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

唐秋生编《社会运动史》由现代书局出版。

瞿世镇编《中国历史问答》由三民图书公司出版。

8 月

1 日　佩我在《新生命》第 2 卷第 8 号发表《中国革命之史的分析》。

7 日　陈寅恪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92、93 期合刊发表《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

27 日　郭沫若开始与容庚通信交流研究甲骨金文的心得。

郭沫若致信容庚，对其所著《金文编》表示钦佩，并说“因欲探讨中国之古代社会，近亦颇用心于甲骨文字及古今文字之学”，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后二人又多次通信讨论学问。

28 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版“天文学史专号”。

此期专号刊载了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之一重大问题——周髀算经之年代》、《史记天官书大部分为司马迁原作之考证》，钱宝琮《东汉以前时月日纪法之研究》等文。

是月　教育部颁布《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

10 月又颁布了《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系统学习中外通史，循环式设课，初中阶段先学习一遍中外通史，高中阶段再深入系统学习一遍。课程目标的规定也更全面。如初中阶段的目标共有七条，尤其强调：“研求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研求重要各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今日国际形势的由来，以培植学生国际的常识，并养成其远大的眼光与适当的国际同情心。但同时仍注重国际现势下的中国地位，使学生不以高远的理想，而忽忘中国民族自振自卫的必要。”

高中阶段的课程目标共十条，对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历史意识的培养等方面有更高要求，如需了解“民族的分合，政治制度的沿革，民生经

济的利病”；“养成‘无征不信’的态度，随时提出历史上未解决或可疑的问题，讨论其真伪或其影响，以培养学生自由研究的习惯”。既有先前注重实用的色彩，又增加了大量基本知识、基本能力方面的新要求。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论丛》第 2 卷第 1 号发表《元代汉人译名考》。

此文对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关于元代汉人的八种称呼进行了考证，“疑其全袭蒙古最初故籍旧题之原文，绝未增损一语”。陈氏最后指出，“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误，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此文被认为是元史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论著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刘节《好大王碑考释》，（日）新城新藏著、戴家祥译《周初之年代》，吴其昌《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新城博士周初之年代商兑》，刘盼遂《〈天问〉笺注》、《〈后汉书〉校笺》等文。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

初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管理，1935 年该筹备处业务移并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郭真著《辛亥革命史》由北新书局出版。

（苏）金果尔、朴利果仁著，高峰译《西方革命史》由新宇宙书店出版。

9 月

1 日　蒙文通在《史学杂志》第 1 卷第 4 期发表《古史甄微》。

第 5、6 期，第 2 卷第 1、2 期连载。此文内容主要有“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古代文化”、“虞夏禅让”、“夏之兴替”、“殷之兴替”、“周之兴替”、“世传考异”、“历年考异”。1933 年，在此文的基础上，加入《三皇五帝说探原》、《中国开纪余东方考》等文后，以《古史甄微》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文是蒙氏代表作，被认为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简明中国古史通论。

同期还刊载了陈汉章《中国古代铁兵考》、毛乃庸《后梁书叙传》、王遽常《嘉兴沈乙盦先生学案小识》等文。

柳诒徵在《史学杂志》第 1 卷第 4 期发表《与某君论研究经济史之法》。

作者指出，“今日风气，由普通而渐趋专门。研究之风为盛。然以其

易视研究，往往标持单文只义，遽自诩为新得，余窃不敢苟同”，“余愿今之学者，故师亭林反复寻究，且勿即下定论”。

4 日　赵简子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97 期发表《新历史的范围与目的》。

此文译自 H. C. Jhomas 和 W. A. Hamn 合著的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Civilization*。文章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对历史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有益于教化和鉴戒，更重要的是帮助人更好地理解他周围的复杂世界。

同期还刊载了何定生《关于诗经通论及诗的起兴》、卫聚贤《墨子辨序》等文。

5 日　国立北平研究院正式成立。

该院归教育部管辖，以李煜瀛任院长，李书华为副院长。该院的设立似有与中研院分庭抗礼之意。

11 日　赵简子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第 98 期发表《近代文明之最初的构成》。

第 99 期连载。

20 日　郭沫若撰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

此文是郭氏第一篇关于甲骨卜辞的论文，“对商代的生产状况和社会组织进行了理论性概括”。

是月　顾颉刚就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研究员、学术会议委员、历史学系教授。

该年 5 月燕京大学聘顾氏为教授，9 月顾氏举家北上。顾氏在燕京大学主要教授“中国上古史研究”课，讲义至次年编毕。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序中说：“我编辑这份讲义的宗旨，期于一反前人的成法，不说哪一个是，哪一个非，而只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先后寻出它们的承前启后的痕迹来，又就它们的发生时代的背景求出它们异军突起的原因来。我不想取什么，丢什么，我只想着一窥这一方面的史说在这二三千年之中曾起过什么样的变动。……我想，待到它们的来源和变动都给我们知道之后，于是它们在史实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推翻，而在传说上的地位可以一个一个地建设了。这是我的研究这学问的大目的，而这编讲义乃是个造房屋的草图。”此讲义“是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提出之后，‘搜集本证旁证，一一加以说明’，以坚读者‘诸君之信’的奠基之作”。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整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

由于陈寅恪等的建议，史语所把7000麻袋档案购回，9月由徐中舒等把存在天津的一半运回北平，傅斯年亲自监督，立即开始清理和登录。10月整理了214麻袋、76席包，11月整理了500麻袋，12月又整理了468麻袋，陆续发现了《崇祯年间兵部题行稿》、《清初揭帖》、《摄政郑王吉儿合郎入关奏表》、《朝鲜与金国重申盟誓书》、《钞本建文帝实录》等史料。至1930年9月30日完工。

故宫博物院主办《故宫月刊》创刊。

此刊将故宫原藏书画金石等器形文字影印，于原物之考据尺寸，及历存所在注释綦详。其中刊出不少珍贵材料，如散盘、新嘉量、石达开职凭等，供学者参考。该刊于1934年4月停刊，共出版42期。

《辅仁学志》第1卷第2期刊载（德）柯劳斯著、姚从吾译并注《蒙古史发凡》。

姚从吾因感蒙古史是一种世界性学问，发愿以现代史学方法研究辽金蒙元史，在德期间翻译注释了此文寄国内发表，以期唤起国内对北亚研究的重视。柯劳斯此文对蒙古人的种族、蒙古史的史源、蒙古人的征讨史略及国家组织、“蒙古时代东西间之交通”等问题皆有探讨。

同期还刊载了张星烺《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常福元《旧时宪书编制法》、史学工具书努力者《汪辉祖年谱》、伦明《续书楼藏书记》等文。

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由大东书局出版。

这是国内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对财政问题、特别是晚清的币制改革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胡适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9期发表《〈水浒传〉新考》。

王纯一编译《西洋史要》由南强书局出版。

郭真（郭维文）《中国资本主义史》由上海平凡书店出版。

谷察著、程中行译述《国家主义之历史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月

7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第3次发掘。

此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王湘、董光忠等。此次发掘至12月12日结束，共得甲骨文字2742版，其中有“大骨四版”。河南省

政府派人发掘亦得有字甲骨等众多。

9 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版“百期纪念号”。

刘朝阳在《卷头语》中指出，民国以来“专门促进历史或语言或关于这两种科学的研究的刊物，能够继续满一百期的，似乎就是本刊，这次才在国内学术界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周刊主办者希望“用最新的思潮，从新替这两门科学奠成一种稳固的基础”；至于刊登文章偏重于本国古史和本国古文字，是因为“对于本国古代一段历史，似乎最有讨论的余地，而本国古代文字学的研究又可以促进古史的讨论，结果乃就不期然而然地致使国内学者对这几方面最感兴趣，关于他们的著作亦是特多，这又代表国内学术界的一种风气，并不是本刊特定的范围，而且亦并不是不好的征兆”。

此纪念号还刊载了闻宥《研究甲骨文字的两条新路》、蒋径山《〈山海经〉篇目考》、卫聚贤《〈穆天子传〉研究》、容肇祖《简书发现考》等文。

10 日 向达在《小说月报》第 20 卷第 10 期发表《论唐代佛曲》。

此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佛曲钩沉”、“佛曲考源”和“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

16 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01 期刊载（美）恒慕义著、王师韫译《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

恒慕义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当顾颉刚发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时正好在北京，他认为顾颉刚此文是中国近三十年中思潮变迁的最好记载，并且是说明现代中国的史学批评最好的例子，故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翻译为英文出版。此文是为《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英文版写的序，1929 年 7 月刊于《美国史学评论》第 34 卷第 4 期，此前曾在美国史学联合会于印第安那坡利斯召开的会议上宣读过。

19 日 东方考古学协会在北京举行讲演会。

由滨田耕作、梅原末治、徐炳昶、张星烺分别演讲“世界各国研究东亚考古学的现势”、“seythai 文化在欧亚考古学的意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工作之概略”、“中国人种中之印度日耳曼种分子”。

1929 年，“东方考古学协会”中方委员朱希祖因不满于日方的独断专

行宣布退出，后来中方学者陆续退出，该学会遂名存实亡。

日本学者关野雄认为，它和“东亚考古学会”一起“奠定了东亚考古学的基础”。这两个学会成立后先后出版了两期《考古学论丛》和14种《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和乙种）。其大部分是关于中国东北的，与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政策密切相关。

23日　郑师许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2期发表《八股文的沿革和它的形式》。

是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上海民志书店出版。

本书结撰于1923年至1925年春，原是作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1924年6—9月，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史地杂志》第3卷1—8期也连载此书。此后该书收入1932年的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1936年3月，中华书局又出版单行本，此后多次印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延续了《清代学术概论》的思路，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在哲学和思想层面进一步展开剖析，可称《概论》的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侧重于“史”，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作者意图“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在纵横并立、经纬交织的布局中，评述和勾画清代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其他科学等20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

作者提出了“学术史”的四条规范：（1）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2）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3）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4）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这是继其以前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胡适《四十自述》）后，又提出了学术史的撰写原则，这四条规范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得以贯彻。

（美）绍特韦尔著，何炳松、郭斌佳合译《西洋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先作为“西洋史学丛书”之一，后又收入“万有文库”。全书27章，论述了史学史的起源和演变，指出各时代史学观念的兴废皆与其时其地的环境风气有关，并依据“新史学”的观点对西方各派史学优劣作了评

价，认为以往对历史所做的各种神话、神学、哲学、物质、经济等解释，“无一可称尽心也”，欲求历史之真相，“必综合两大原质于一处而后可，一为心理，一为物质。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

1922 年此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发行，在美国颇受好评，《文学评论》（*Literary Review*）谓此书“撮录研究之方法，表示历史之事实，可谓获得相当之成功。然其论述之态度，令人可佩，更超过本书之科学价值”。同年陶孟和撰文推荐，认为这本书“多少可以报告我们关于古代历史研究情形”，“可以说是研究历史的人不可不读的”。此书详述西洋古今史学之发展，“尤足资吾国新史学界之借镜”，译笔明净流畅，“诚研究史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西洋史学史》是我国较早出版的西方史学译著。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 年问世的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只抓住了章氏学术重点的、思想性的材料，加之当时《章氏遗书》尚未出版，不免有些材料的错漏，故此，1927 年胡适要姚名达对自己所作的年谱进行修补。

姚谱不仅对重要资料加以搜集、补充，而且还有对胡谱错误的订正。胡谱侧重思想性、系统性，而姚谱具有资料性的优势。以后姚名达所著《邵念鲁年谱》“有许多创例，如用直叙法，多制图表，辟‘谱前’‘谱后’两体等”（姚名达序），都是受了胡适的影响。

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由中山书局出版。

书中将有关家族的问题分类加以介绍，“论”的性质更重于“史”的性质。《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作者指明宗与族的不同，对宗族的标志和姓氏做了说明。此外，还论及大小宗法、立嗣、异姓为后、共居同财、谱牒等问题。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家族问题的专门史。

该年中山书局还出版了吕思勉《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四种制度史著，1935 年 4 月由上海龙虎书局改书名为《史学丛书》出版。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智书局出版。

本书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历史。严昌洪、马敏《20 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认为该书颇具参考价值，“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

1938 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6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第 3 版，1960 年

北京中华书局重印。

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1月，王钟麒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太平天国革命史》。此时同类书籍还有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1月）和张宵鸣《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7月）。

徐朝阳《中国刑法溯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1933年3月被收入“国学小丛书”再版。“国学小丛书”还收录了徐朝阳的《中国亲属法溯源》（1933年5月）、《中国诉讼法溯源》（1933年12月）。

郭倬莹在《学衡》第72期发表《四部通讲》。

第74期连载。

余嘉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4号发表《刘向新序提要辨证》。

贾逸君《中华民国政治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黄凌霜《社会进化》由世界书局出版。

马克思等著、千香译《社会进化的铁则》由启智书局出版。

董行白《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析论》由上海南华图书局出版。

11月

1日　郑鹤声在《史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史与史字之解释》。

作者认为“史之意义在叙录宇宙间一切生长发达进化之现象，史之性质，既必合进化之原则，则宇宙之间，有天体之进化，有地球之进化，有动植物之进化，总称之为万有之史，故无不可，惟有万有之中，进化最大者，人类也，而人类中进化最著者，文明之种族也，故以史为文明种族一切进化之现象，亦无不可也。然普通言史，必以全人类为标准，学者明此，然后可与言史之意义，而明其内容矣”。作者认为兰克和班兹对“史”的定义“较为完备”，并指出“史之本谊”有二，一是“记事之官”，二是“记录知识”。作者认为“历史”一词是清季“昉诸日人之说”，古代并没有，且史前“不必再加历字”。

同期还刊载了蒙文通、缪凤林《三皇五帝说探源》，柳诒徵《南朝太

学考》（第6期，第2卷第1、2期及第3、4期合刊连载），陈汉章《史通补释》（第6期连载），范希曾《〈书目答问史部目〉补正》（第6期、第2卷第1期连载），陈裕菁《中法战事文件汇辑》（第2卷第2期连载），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等文。

6日　闻宥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04期发表《甲骨文地名考》。

第105期连载。

7日　蔡元培为黄季飞《经济史长编》作序，阐述史与长编的不同。

蔡元培认为史之作用重在开来，而不在罗举种种已往之事实，要于种种往事中抽出规律，昭示后人，固应言简意深；而要完成此等“圆而神”的著作，当先作一完备的长编，不可以成见为去取。黄季飞《经济史长编》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日　傅斯年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

傅斯年提出：“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他还就“疑古”与“信古”发表了新的认识，研究古史“完全怀疑，固然是不对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怀疑的有理，怀疑的有据，尽可以怀疑。相信的有理有据，也尽可以相信的。”可见他已不再倾向于单纯的疑古。

在报告中，他还介绍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的路数和史语所进行的殷墟发掘工作。他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他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傅斯年所讲的新方法，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这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报告以《考古学的新方法》为题发表于《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

15日　《新思潮》杂志在上海创刊。

此为创造社后期社会科学刊物，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撰稿人有李一氓、朱镜我、吴黎平、潘东周、彭康、杨贤江等，由朱镜我主

编。后改名《新思想》。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中共干部派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时称“新思潮派”。

16日　桑镐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3期发表《汉魏之际风尚与时代之背景》。

是月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

该会共有会员20人，除正副院长李石曾、李书华外，还有张继、朱希祖、马衡、马廉、陈垣、徐炳昶、沈尹默、沈兼士、白眉初、陆鼎恒、吴敬恒、李宗侗、肖瑜、汪申、翁文灏、刘慎谔、齐宗康、乐均士，李宗侗为常务委员兼干事。

史学研究会成立后，主要工作有：派吴世昌、张江裁带队普查北平古迹，以大小庙宇为重点，编辑《北平庙宇通检》等书；派刘厚滋任金石编纂工作；派吴丰培负责边疆史地研究，并为本组选购边疆图书。

从1928年11月到1938年11月十年间，史学研究会成绩斐然。在考古方面有：(1) 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之发掘（常惠等）；(2) 陕西丰镐、大邱、雍、阿房宫、陈宾祠等遗址之调查（徐炳昶、常惠、何士骥）；(3) 发掘唐中书省旧地，得宋吕大防所刻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何士骥）；(4) 发掘陕西宝鸡县斗鸡台遗址（徐炳昶、何士骥、苏秉琦、白万玉、龙元忠等）；(5) 整理斗鸡台发掘结果并调查陕西省境之古迹遗址（徐炳昶、苏秉琦、何士骥）；(6) 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拓片之研究（徐炳昶、顾颉刚、龙元忠、马丰）；(7) 调查邯郸县之赵王城、曲阳县之恒山庙（徐炳昶、顾颉刚）；(8) 道德经古本的校对（何士骥）。历史方面有：(1) 调查北平内外城庙宇882处，照相2000余张，测绘平面图700余幅，拓碑1200多品，访问笔录800余份；又调查北平西郊庙宇28处，照相135张，测绘平面图21张，拓碑102品，访问笔录28份（姚彤章、常惠、李至光、吴世昌、张江裁、许道龄等）；(2) 编纂北平史表长编；(3) 编纂北平金石目；(4) 编纂北平庙宇志（鲍汴、张江裁、吴世昌、许道龄、刘厚滋）；(5) 史记校点及索引（顾颉刚、徐文珊）；(6) 宋元学术史之研究（白寿彝）；(7) 边疆史料之整理（冯家昇、吴丰培）。

研究院考古组的成果主要在院办的《考古专报》上发表，而历史组则有《史学集刊》作为其研究论文发表的园地。另外，研究院史学所还编著专书，到1938年出版有18种。

因为出版丰富，其声势一度超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此书共五章：封建制度抑资本主义、士大夫身分与族制及科举、科举与学校、士大夫身分的意识形态——孔子学说之发展、中国问题解决之基点。

陶希圣宣称观察中国社会应持三个观念：一是历史的观点，二是社会的观点，三是唯物的观点。中国历史发展不是心的发展或观念的发展，不是天道或理气的流行。中国历史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

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必须诊治的毛病，一是因袭欧洲学者解剖欧洲社会所得的结论而漫加演绎。他说："中国社会的各个要素，虽大抵与欧洲社会史上曾经发现的各个要素不甚悬殊，但自要素的结构来说，却自有特殊之点。""共产主义者常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解剖所得的论断来应用于中国社会，所得的结论是中国已有尖锐的阶级对立，又或因中国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而主张制造无产阶级以求适合于社会革命的实行。二是把中国社会构造当作位于西欧丛山半岛之中的小国家来看。""中国社会是庞大的发达不平均的社会。社会的发达不平均，是研究中国史所必知的一个大原则。更加以地理条件之有异于欧洲，社会之发达，乃不得不取相异于欧洲之途径。"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出版后，"陶君便名震一时，为国内一部分青年所倾倒"，"特别是在青年里面，在有些地方曾经有过陶希圣狂的时期，即对他的论文非读不可，他的单行本也非买不可"。

（苏）拉狄克著、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由新宇宙书店出版。

该书原为1926至1927年春作者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讲稿，正当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辩论得最激烈之时。1933年再版时改名《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拉狄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及中国国家性质的看法。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

拉狄克说："中国的土地讲不到封建的特征，而是商业经济的土地占优势，商人占优势"，在中国"封建形式虽然存在，但终不能隐蔽现在的事实，这事实是说明利用那些形式剥削农民的阶级，不是封建时代的地主，而产生于资产阶级、商人及官僚的地主"。"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地主出身于资产阶级，而与商人及工业主发生密切关系，他本身或者在工业有股份，同时也投资于农村而成为地主。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帮助农民反对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并资产阶级无解放农民之可能"。

蒙文通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中国开化始于东方考》。

作者指出："近二百年欧美学者为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文化西元论，于是我国学者亦多穿凿史乘以附会之"，"一若西元之说已成定论。然文通窃有疑焉"，"吾友缪君赞虞作《中国民族西来辩》以折西来之说，而文通为此篇以明中国文化为我东方所自创，一破一立，相待相济"。

温熊飞《南洋华侨通史》由东方印书馆出版。

该书内容包括中国历代华侨南迁历程、华侨在南洋的遭遇、南洋华侨经济发展历程、华侨与秘密会社以及一些人物传记和文献等。

何炳松接替王云五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白鹏飞《近百年政治思想变迁史略》由华通书局出版。

12月

1日　缪凤林在《史学杂志》第1卷第6期发表《古史研究之过去与现在》。

第2卷第3期连载。缪氏将研究中国古史者分为四派：一为疏通知远派，其旨主"疏通知远而不诬"，司马迁、杜佑、司马光、柳诒徵等属之。二为博古派，其治古史"不以六艺为衷据"而能博征他籍，如三国蜀谯周《古史考》、清马骕《绎史》、林春溥《开辟传异》、近人陈汉章《上古史》等属之。三为杂糅派，其"迷信载籍逾于博古派，而博雅不足，无别择、无义法又过之"者属之，如南宋胡宏《皇王大纪》、近人王桐龄《中国史》等。四为儒家正统派，主张"屏百家之异说，据儒家之记载"以言古史者属之，如宋欧阳修之《帝王世次图序》、吕祖谦《大事记》、清崔述《考信录》等。

同期还刊载了张尔田《答德国颜复礼博士问〈管子轻重书〉》、陈训慈《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第2卷第1期连载）、缪凤林《南京明故宫发掘古物记》等文。

2日　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此为"完好之猿人头盖骨"，仅缺鼻部以下之上下颚及齿牙，余均完善，不必修理即可研究，"实学术界之重要发现"。贾兰坡在《周口店发掘记》一文中说："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象一声春雷震撼了学术界。不久，石器、骨器和用火证据的发现，又使北京人遗址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

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这个小地方来了。”

这一发现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为此，1930 年中国科学社授予其金质奖章。

3 日　陈垣致函台静农，提出近代史料宜分类搜集研究。

函云：“近百年史之研究，仆为门外汉。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前数年上海《申报五十年纪念特刊》，即此种办法。”

4 日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版《本所整理档案工作报告专号》。

魏应麒在《卷头语》中指出，“最近中国史学界对于古史已有两枝显著的不同的（怀疑派与反怀疑派）旗帜了”，两派各有立足之点，但是对于这两派的“是非”，“第三者知其然也，于是着眼于根本问题的解决——史料的征集；同时又因在地上的古代史料，毁灭几尽，搜采无从，遂转而想到了地下的宝藏，而发掘之议以起。至是史料的问题，真成为历史的根本的中心问题”！

5 日　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10 日　胡适在《新月》第 2 卷第 10 期发表《我们走哪条路》。

作者提出“五鬼闹中华”的论点，认为中国社会问题的“五大恶魔”：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才是革命的真正对象。“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而铲除“五魔”不靠暴力革命，要靠点滴改良。“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作者对当时社会问题和社会性质的判断与中共派学者截然对立。

16日　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

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列举其十九条错误：一、反革命；二、藐视先烈；三、不奉民国正朔；四、例书伪谥；五、称颂遗老，鼓励复辟；六、反对汉族；七、为满清讳；八、体例不合；九、体例不一致；十、人名先后不一致；十一、一人两传；十二、目录与书不合；十三、纪传表志互不相合；十四、有日无月；十五、人名错误；十六、事迹之年月不详载；十七、泥古不化；十八、简陋；十九、忽略。并提出“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

20日　行政院批准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查禁《清史稿》。

《清史稿》成禁书后，反而造成洛阳纸贵，印刷私售不胫而走。《清史稿》是一部接续“正史”系统的大型历史著作。它采用纪传体，依《明史》为样本，撰有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29卷，约500余万言，篇幅大于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部。《清史稿》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了清代历史，至今仍不失为清史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清史稿》汇集了各方面的公私资料17000余卷，又经过一番整理工作。如有人说它“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潘、朱四氏《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之大典，差足以纪轨历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祼矣”。（金毓黻《读清史稿札记》）还有某些新的创造。例如，它创立《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就能反映部分社会的新现象。

该书在学术上的疏失也不容回避。全书内容与目录、序例互相抵牾，断限参差不一，重复、疏漏甚多，至于译名歧异、人名僻错等等。史稿观念上的悖谬和学术上的偏失，就主观而言，史馆诸公大多是清末达官贵宦，“君死臣辱”的思想融入书中，必然会生衍出诸多观念上的错误。就客观而言，史馆组织不力、财政困难，加之时势窘迫，仓促付梓，仅仅是作为史稿公之于世，“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总之，全书优劣互见，可说是一部“大厦已成，尚待装饰”的未成之作。

后世学者对其批评多而肯定少，即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对

其政治观点和学术水平进行了多方批评。但也有学者认为“其编者并没有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不存在所谓尊清室而抑民国的问题，在学术上不存在严重的失误”。

24 日　孟森在《华北日报》发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

作者呼吁解禁清史稿，亲自编纂检索资料，以推动清史研究。孟森说：“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甚为重视，即将来有重作之清史，如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家所必保者。”该文后 1934 年被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 3 卷第 4 期转载，后收入朱师辙《清史述闻》等书。

25 日　金兆梓在《东方杂志》第 24 号发表《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

作者指出，1903 年《新民丛报》发表蒋观云《中国人种考》，蒋怀疑“吾国之旧传说，举一切文明之原始集中于黄帝轩辕氏，疑而不得其解，见法人拉克伯里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遂信其说，以为黄帝者，实来自巴比仑之一酋长，举巴比仑原有之文明，举而措之于中国，故有此顿进之像”。同时他又指出，何炳松虽力驳此说，却寄望于考古学，这也未必妥当，安特生是考古学家，但却支持“西来说”，所以，关于中国文化来源的争论，非科学与考古所能解决，而关键是一个解释的问题。

曹松叶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11 期发表《宋元明清书院概况》。

第 112—115 期连载。

是月　李济、董作宾、余永梁编撰《安阳发掘报告》第 1 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专刊之一出版。

该书内有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商代龟卜之推测》等。《燕京学报》于 1930 年评价《安阳发掘报告》“均有确切之举证，冲破向来考古学家，专在故纸堆中搜寻材料之沉寂空气。诚足称为学术界之曙光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的“序”中指出：“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证。”“若不扩充我们的凭借，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哪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因而自 1928 年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确是因应上文所说的要求而生的”。

《安阳发掘报告》共出4期，第2期1930年12月出版，第3期1931年6月出版，第4期1933年6月出版。以后另出《田野考古报告》。

顾颉刚在《燕京学报》第6期发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顾氏认为“《易经》中的历史观念和《易传》中的历史观念处于绝端相反的地位；《易经》中是断片的故事，是近时代的几件故事；而《易传》中的故事却是有系统的，从邃古说起的，和战国、秦、汉以来所承认的系统，所承认的这几个古人在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历史事实的异同是它们的著作时代有与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它们的作者说与不说的问题”。顾氏认为“《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易经》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道统的故事”，并指出“我们正可借着著作《易经》时的历史观念来打破许多道统的故事”。顾氏从《易经》、《易传》、《易林》三书得出“没有尧、舜禅让的故事”、“没有圣道的汤、武革命的故事”、“没有封禅的故事”等推论。

同期还刊载顾颉刚《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黎锦熙《三百篇之“之”》、容庚《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李俨《筹算制度考》、罗根泽《慎懋赏本“慎子”辨伪》等文。

陈垣在《燕京学报》第6期发表《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

该文对耶律楚材父子“耶律楚材信佛排道，耶律铸反佛好道”的信仰差异进行了阐释。

该文是陈垣元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许冠三认为该文虽属“小品”，但质量较高；来新夏认为此文与《顺治皇帝出家》等篇“叙事谨严有据，文笔条畅清新，是文史融合的佳作”。

陆懋德在《国学季刊》第2卷第2号发表《中国上古铜兵考》上篇。

陆氏借鉴西方考古学家研究上古器物“多由其形式变化之迹，而推定其年代，不必以文字为凭，亦不必以铭刻为断”的方法，认为中国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用铜锡合金制造兵器，并就“个人所藏”之上古铜质兵器，“择其形式各别者，略为图说”，以备参考。

同期还刊载了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清内阁所收明天启崇祯档案清折跋》，朱倓《明季杭州读书社考》，魏建功《古阴阳入三声考》（第2卷第4号改为《阴阳入三声考》），李正奋《魏书源流考》，吴其昌《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记功碑跋尾》等。

岭南大学主办《岭南学报》创刊。

该刊第一期所刊《〈岭南学报〉征文启事》指出，作为“岭表名区，开风气之先，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本应“为南中国文化之中心”，但是“其学术空气，异常沉寂；研究刊物，寥若晨星”，令人痛心。作为“南方最高学府之一”的岭南大学有“提倡学术，促进文化”的责任，故创办此刊物。该刊“以发表研究学术之著作为主旨”，计划年出四期，“并得随时增刊专号”，内容方面涉及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

在实际运作中，因筹稿困难等原因，该刊并未能完全按计划出版。该刊1937年9月被迫暂时停刊，1947年1月复刊，1952年因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而最终停刊，共出版12卷1期。

创刊号刊载谢扶雅《莱布尼茨与东西文化》、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文学中的赵氏孤儿》等文。

谢国桢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3卷第6号发表《清初三藩史籍考》。

谢彬《中国铁道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刘大白编《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孟世杰《先秦文化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是年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收入《沈寄簃先生遗书》出版。

此书计72卷，120万字，依次为：《刑制总考》4卷、《刑法分考》17卷、《赦考》12卷、《律令》9卷、《狱考》1卷、《刑具考》1卷、《行刑之制考》1卷、《死刑之数》1卷、《唐死罪总类》1卷、《充军考》1卷、《盐法考·私矾考·私茶考·酒禁考·同居考·丁年考》1卷、《律目考》1卷、《汉律摭遗》22卷。

此书以历史考证方法为主，立足正史文献，探究历代刑法、律令制度，辨析字、词的语义与源流，梳理各朝法律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并以按语形式加以分析评说。本书还注重运用比较方法，不但有中国法律不同朝代的比较，而且有中外法律的参照对比。

此书是中国法制史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此领域的基本参考书。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蒋维乔译撰《中国佛教史》出版。

此书是以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为底本补缀增订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式中国佛教通史。

1930 年

※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
※《新思潮》月刊第 5 期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出版。
※ 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
※ 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
※ 郑鹤声编著《中国史部目录学》出版。
※ 金陵大学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

1 月

6 日　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成立。

1929 年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党史编纂机关，1930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决议定名为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并推定蒋介石、吴稚晖、王宠惠、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戴季陶、邵元冲、叶楚沧、林森、张继等 11 人为委员，2 月 13 日，又聘请陈少白、萧佛成、张静江为名誉委员。该会初期设常务委员 5 人（胡汉民、林森、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下设总务、编辑、征集、史料档案库、史料陈列室（后又得名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等机构。该会成立后，开展了国民党史料征集等活动，编纂了《总理年谱长编》、《总理史迹简编稿》等书籍。

1936 年 1 月 9 日，国民党执委会常务会议通过该会组织条例，规定该会职责为编纂国民党党史史料及典藏国民党一切重要文献。条例规定该会设主任一人（国民党元老张继担任首任主任），副主任二人，主任秘书、秘书各一人，纂修 20 人，编审 4 至 6 人，名誉纂修若干人，采访 14 人，名誉采访若干人；内部组织设总务、编辑、征集、档案四处和设计考核委员会等机构。抗战爆发后，该会西迁重庆，1945 年 8 月，又迁回南京旧址，1948 年，该会携带重要史料等迁往台湾。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

放，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被解放军接管，后来成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0 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此书初稿成于 1929 年，至 1930 年又不断补充了一些对中国古史的专题性的考释内容作为该书附录。本书主要汇集 1928—1929 年作者在流亡日本期间所撰论文，如《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等。

作者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学说，并结合大量传说材料、历史文献、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等史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概括，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阶段，进行了开创性的划分和界说。作者认为，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相同的，"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郭氏此书的矛头所向是胡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评'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郭氏此书堪称唯物史观派的开山之作，自许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续篇"。侯外庐谈到此书对他的影响，"这本内容丰富而新颖的著作很快吸引了我。尤其是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历史规律的普遍意义。他这个大胆的科学发现，使我感到兴奋。中国历史几千年，史书可谓汗牛充栋，似是从来没有一本书像郭沫若的书这样对中国古史作出难能可贵的科学解释来"，郭氏的研究"开阔了我的眼界，启发了我的思考，唤起了我对古史研究的兴趣"。吕振羽也说："当时在这个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

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认为此书“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李麦麦称此书是“近几年来最时髦最出风头的一本著作”。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则谓：“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是月　常乃悳《中国财政制度史》作为“经济学丛书”之一由世界书局出版。

该书分27章，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简略。本书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做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

作者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

“经济学丛书”还收录了侯厚培《中国货币沿革史》、《十九世纪经济史》，安绍芸《经济学说史纲要》等书。

君素在《新思潮》第2、3期合刊发表《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

作者云：“1929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物虽不能说是已经衰竭，但总没有像关于社会科学的那样来得蓬蓬勃勃。这一年单只社会科学丛书之刊行或计划，据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了现代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的近代社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的苏俄研究小丛书”，“其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除开关于文艺理论之外，据我所知道的计有下列若干种”，他开列了一个清单，共计150种以上，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史、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史革命史以及关于帝国主义和苏联革命方面的。

作者总结这一年来新兴社会科学出版物的六个特点：第一，是新兴的社会科学抬头。这是新兴阶级的抬头的必然反映。新兴的社会科学在这一

年里，可以说已经明确实实的树立了它的存在权了；第二，是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第三，是关于经济学的书籍占多数；第四，是关于苏联的研究的书籍和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也占了不少的数目；第五，是关于历史方面，如经济史、革命史、经济学史及社会思想史等等，占了相当的数目。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中国的幼稚的思想界已经有渐渐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之倾向了；最后一点，就是这翻译之中，未免有些粗制滥造的缺点。但是这是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初期必有的现象，只要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向前发展，关于这类书籍的批评建立起来。这种缺点，是会逐渐消灭的。

洪北平编《国学研究》由民智书局出版。

此书主要是探讨国学研究方法论的合集，分国学研究方法论、经学通论、子学通论、史学通论 4 卷，采编了古今 17 篇文章。

王坚壁《社会主义中国史》上册由上海平凡书局出版。

后此书又以《中国史》、《中国新史纲》为名出版。

（英）贺益兰著、杨人楩译《世界文化史要略》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魏建功在《辅仁学志》第 2 卷第 1 期发表《释午》。

郑寿麟《中西文化之关系》由中华书局出版。

2 月

1 日　刘剑横《历史学 ABC》由世界书局出版。

此书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概论作品。全书分六章。前三章属于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史学渊源、史学范围及其分类，四、五两章属研究法，末章是历史观。本书内容比《史学要论》更加充实、完整，增加了如后书未涉及的研究法问题。另外，本书所论搜集史料之法中的“假设”范围之说，虽是平常之理，但却是其他学者未尝言者。

本书 1933 年再版。

8 日　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成立。

该学社以孙本文、吴景超、陶孟和、潘光旦等人为理事。蔡元培该年 5 月在社会学社成立的大会上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的演讲，认为应将民族学和社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古代社会。

14日　国民政府通令禁售《清史稿》。

26日　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20期发表《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

是月　（法）瑟诺博司著、张宗文译《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由大东书局出版。

作者自序称本书是根据积存的讲义编成。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采用了《史学原论》一书的某些内容，但从社会科学角度作了修订，论述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第二编论述研究社会史适用的历史方法。全书上、下编有明显区别。上编虽将研究对象定为社会科学，但所论述的研究方法则皆为历史方法，下编则主要阐述社会史的一般性知识。此书意在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参考，矫正其师法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弊病，"与其增了历史学家的兴趣，无宁增了社会科学专门家的兴趣"。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何炳松《通史新义》一书，与本书出自同一原本，不过加入了一些何氏对中国史学看法的少量文字，内容绝大部分与本书并无二致。

孟森《清朝前纪》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孟森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满洲历史时的讲义，全书分纲领、女真纪第一、建州纪第二、建州左卫前纪第三、肇祖纪第四、褚宴充善纪第五、妥罗纪第六、兴祖纪第七、景祖纪第八、显祖纪第九、附王杲纪等11篇。此书是《清史讲义》之上编。

作者指出"清一代在入关之初，以关外事实为忌讳"，在"易代之后，禁纲尽除，吾辈不能继先民忍死留待之意，为之胪列发扬，以成信史。徒据清世矫诬捏造之本，作成一代之史，是国民果可欺而国史真无足轻重？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也"，"虽不信官书，亦不轻听世俗之传说"，抱着"总使史书为征信而作"。本书以编年大事纪的体例，对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之先世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努尔哈赤时期统一女真各部、与明交战等重要史事作了考证勾稽。

高希圣《社会运动全史》由上海平凡书局出版。

此书是当时社会运动史类著作的巨制，近900页的篇幅介绍了国际运动史、革命运动史、政党运动史、劳动运动史、农民运动史、妇女运动史等内容。

周予同在《学生杂志》第2号发表《关于甲骨学》，首次提出

“甲骨学”的概念。

谢国桢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4 卷第 1 号发表《晚明流寇史籍考》。

第 2、4 号连载。

3 月

1 日　郑鹤声在《史学杂志》第 2 卷第 1 期发表《古史官考略》。

文章下标“本篇为中国史学史之一章”，主要内容有“古代史官之精神”、“唐虞以前史官”、“夏商史官”、“周史官”、“周秦史官”等。

同期还刊载了柳诒徵《论文化事业之争执》、钱穆《刘向刘歆王莽父子年谱自序》、陈直进《列国币考》、缪凤林《洪范五行传出伏生辨》等文。

5 日　葛定华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21 期发表《欧战前各国社会主义之运动》。

是月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3 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曾为辛亥革命参与者，他将收藏多年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告、信函、电报文稿、照片等加以整理，并结合自身经历，于 1927 年 6 月撰成约 45 万字的《武昌革命真史》。其书分前编、正编两部分，前编为上册，正编为中下册。记述自武昌起义前的革命准备活动到 1912 年 4 月 1 日南京临时政府解体的详情。其特点是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不良现象多有揭露和批评。此书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必备资料之一。

孙中山评价此书说：“所有资料，均由当日首义之主要军政人员及中下级干部所给予，盖彼等皆亚伯之知交或门人，亚伯穷数月之精力及奔走，始由各人之日记或经历中得来，事实详实，较之个人撰述更为可靠，汝等不必质疑。”但汪精卫、胡汉民等以“突出日知会功绩，批评起义人员过于露骨，记载失实，讥评总理”等为由予以查禁。

（日）桑原骘藏著、冯攸译《唐宋元代中西通商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4 年 9 月，桑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女师大学术季刊》创刊。

徐炳昶撰写的《卷头语》称该季刊研究的范围“是对于我国旧有的文化，就我们力之所能及，分门别类的研究”，一是“于工具一方面的工作，尤要特别努力”，一方面于“新输进的学术，要努力于介绍、翻译、

批评以进于高深的研究”。徐氏还指出，季刊“头一两期比较多整理国故的工作，也是现在学术界普遍的，无可奈何的一种现象”。

创刊号刊载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辨》、高步瀛《史记太史公笺证》、嵇文甫《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刘盼遂《甲骨中殷商庙制征》、陈子怡《洛阳石经考》等文。

钱穆《墨子》和《王守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

15日 《新思潮》月刊第5期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

专号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刊载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向省吾《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商业资本》、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前途》、李一氓《中国劳动问题》等文章。

其中潘东周和王学文的文章是代表作。他们着重从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性质。他们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本主义的势力，加紧的向中国整个经济进攻。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他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占支配的地位。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占压倒性优势。他们认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驳斥托派、“新生命”派等的观点。

20日 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瑞典贝格曼和中国采集员靳士贵在居延发现汉简。

在随后展开的发掘中，得较完整的汉简10200枚。居延汉简运抵北京后，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劳榦、余逊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此为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抗战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运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拟交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毁于战火。所幸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逃过一劫。1965年，这批珍贵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1972—1976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

又得汉简两万余枚。这两万余枚汉简又称“居延新简”，现藏甘肃博物馆。

居延汉简虽较敦煌汉简晚出，“但在量上却较之多出数倍”，其中有文书、簿录、信札、经籍等，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汉代史料的最大发现。居延汉简的发现不仅对汉代历史特别是汉代西北边郡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汉代语言、汉代艺术等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21 日　燕下都考古团在河北易县对燕下都故城进行发掘。

此考古团系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单位合组而成，由马衡率领。此次发掘至 5 月 31 日结束，获得物品众多。

是月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是梁启超在 1926 年 10 月至次年 5 月在清华国学院所作的学术演讲。因为当时他“扶病登坛”，“无力撰稿”，先由周传儒、姚名达记录，再经梁本人校阅，整理成书。《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问世后，梁启超认为该书所论方法问题“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做法而已”，还需要对其进行补充，故又作补编。《补编》全 11 万言，分为总论与分论两部分。总论有三章，第一章论“史的目的”，第二章论“史家的四长”，第三章“五种专史概论”是对后面分论部分的总说明。

梁启超重新解释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这与《研究法》中“求得其因果关系”有了很大差异。比传统的史家“三长”说更进一步，梁认为应具备“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梁启超以德、学、识、才为序，赋予它新的内容。

《补编》分论部分共五篇，原拟讨论五种专史的写法，但其中《事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和《断代的专史》三篇有目无文，只有《人的专史》《文物的专史》两篇有目有文，其内容较多，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强。

《人的专史》论述人物传记的写法，具体又分列传、年谱、专传、合传和人表五种。梁启超对每一种体式的沿革、编纂特点和方法都详细论述。

《文物的专史》论述中国文化史的写法，分政治专史、经济专史与文化专史三部分。梁启超把三者形象地比喻为社会的“骨干”、“血脉”和“神经”，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关于学术思想史及其做法，讨论最多。

1930 年 4 月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历史研究法》一起作为“万有文库”分册出版；1933 年 6 月作为“国学小丛书”出版；重庆中华书局于 1944 年 5 月出版。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该书和周谷城所著《中国社会之变化》（1931）、《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一起构成一个系列，是早期中国社会史和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周谷城在这些书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和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中国社会。

（德）毕尔著、叶启芳译《社会斗争通史》第1、2卷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第3、4卷同年7月出版，第5卷1934年8月出版。该书第1卷的内容是“古代社会斗争史”，第2卷的内容是“中世纪社会斗争史”，第3卷的内容是“近代农民斗争及乌托邦社会主义”，第4卷的内容为“近代社会斗争与社会思想”，第5卷的内容是“社会斗争史”。此书被认为是叶启芳生平最得意的译作，在当时影响颇大，多次再版。

在第5卷出版时，刊载了胡汉民为此书所作的《社会斗争通史序》（1933年3月，胡汉民已以《三民主义的历史观》为题刊发在《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胡汉民之目的，是希望以此书为三民主义历史观作注解。

武汉大学主办《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

王世杰在《创刊弁言》中指出，学术期刊可视为一个国家“文化的质量检验器”，中国学术期刊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贫乏不可名状”。王氏还指出，学术期刊是学术鉴赏、批评的媒介，从事同一学问的学者以学术期刊为媒介，将“鉴赏者或批评者的见地立为新的研究基础，以企图新的结果”，学术研究才能成为“集合的研究”，并取得发展。

创刊号刊载了谭戒甫《论晚周形名家》、胡适《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德问题》、游国恩《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朱东润《陆机年表》、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第2—4期连载）、叶德辉《元私本考》（第2—4期连载）等文。

郑振铎《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徐守桢《现代科学进化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高维昌《周秦诸子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余嘉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2号发表《目录要籍解题》。

陈宗山《南洋华侨革命史略》由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印行

5 月

1 日　缪凤林在《史学杂志》第 2 卷第 2 期发表《中国民族由来论》。

第 3、4 期合刊连载。作者指出，“近世以还，西人研究地质、古生物、人类、人种及考古诸学者日繁。史家承其余波。论述一民族之历史。莫不先之以此民族所隶属之种族”，及“此民族之由来”。17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始创中国人种西来说，并提出十种不同来源，清末以后最为中国人相信的为巴比伦说，“迄今日而称述之者不衰”。文章从地理、人种、年代、文物等方面主要对此观点进行了驳斥。

同期还刊载了景昌极《历史哲学》（第 3、4 期合刊连载）、钱穆《诸子系年考略》、郑鹤声《史汉研究绪言》、陈汉章《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点校要略》等文。

10 日　顾颉刚在《清华学报》第 6 卷第 1 期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引发今古文学派的又一轮争论。

此文约 15 万字，是《上古史研究讲义》所论“帝系考”之扩展。顾氏以为“这是我第一次所作的有系统的研究文字”，“很有可喜的发见”。文章讨论了五行学说的起源、从邹衍到刘歆五行学说的演变、古史系统的递变、王莽的改制等等，认为刘歆所造世纪、改造古史系统，目的在于为王莽称帝寻找历史根据。刘起釪认为此文对古史中的帝王体系的清理，正是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所作的一次精细的解剖；而且主要运用了先秦的材料来揭露汉代的编造，正是一次“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的具体行动，一篇专题考辨文章“收到了比它专题范围广泛得多的学术效果”。

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5 月 20 日，陈槃撰文云：“《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顾先生思深体大、成一家言的著作；同时也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研究五行学说的第一部著作。书中分析阴阳五行的原流影响和检举刘歆之窜乱故籍，处处深切著明，发前人之所未发。”1934 年 10 月 6 日，童书业撰《五行说起源的讨论——评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认为“这篇文章，是当代古史学界一篇最伟大的作品，他把从战国到新代因现实政治造成的各种伪古史系统，和由伪古史说造成的现实政治，整盘清理了一下，详细地说明它发生和经过的情

形，其搜征的严密，论断的精确，在在足以表见作者头脑的清晰和目光的锐利”。

但对于顾氏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学者多有批评。钱穆在《评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认为，“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罅漏”，顾先生“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识其为一流”。顾颉刚为钱穆这篇评论作跋语道：“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曾身与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也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同期还刊载了冯友兰《公孙龙哲学》、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等文。

20日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简称“社联”。发起人朱镜我、李一氓、熊得山、邓初民、吴黎平（吴亮平）、林伯修（杜国庠，又名吴念慈）和王学文等。“社联”的上一级行政组织是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由上海各左翼文化团体社联、左联、剧联、教联等共同组成）。社联内的党团则归党的文化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而“文委”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社联”的性质是中共掌控下的担负政治使命、发挥政治功能的文化斗争机构。

1930年9月，“社联”创办了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后又创办了机关报《新文化》。《社会科学战线》只出了一期，改以《新思潮》为机关刊物。《新思潮》由朱镜我担任主编，王学文等是编委。社联还创办了许多学术文化刊物，如《新思想》月刊、《文化斗争》月刊、《研究》月刊、《社会现象》周刊等等，前后独办和合办的刊物达30余种。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中提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三、严厉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五、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开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社联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社联”根据中共的指示在《新思潮》第 5 期上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着重批驳托派的错误观点。当时参与其事者回忆说，“社联”进行的理论斗争主要是同中国的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不久，又先后在北平、广州等地设立分部，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此外，“社联”还在日本的东京设立了东京分部。

1933 年，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和党内所谓左倾路线的干扰，“社联”组织遭到很大破坏，遂于当年 6 月与“社研”合并，改称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仍简称“社联”。1936 年春，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紧，“社联”停止活动，大部分成员转入各界救国会的工作中，走向抗日前线。

21 日　杨成志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 129—132 期合刊发表《云南民族调查报告》。

是月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1 分发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此文后标“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作者对艺风堂拓本长庆唐蕃会盟碑之吐蕃文、《蒙古源流》等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彝泰赞普的名号进行辨正，“解释其差异之所由来”，且“相稽其年代之先后，以订正中国西藏二国旧史相传知伪误”，以为“治唐史者之一助”。

傅斯年在《史料论略》中以陈氏此文作为“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的例证，并说“我的朋友陈寅恪先生，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若干种，尤精梵藏经典。近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以长庆唐蕃会盟碑为根据，‘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读，皆赖以订’。此种异国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项史料者更属至少，苟其有之，诚学术中之快事也”。

同期还刊登了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丁山《召穆公传》，傅斯年《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姜原》等文。

徐中舒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1 分发表《耒耜考》。

作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与许多民族一样，遵循由狩猎游牧演进到农业社会的步骤，故试图“从一两件农具上面试探农业演进的消息”，并指出“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全社会的经济状况，

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文章由“文字上的耒”、“耒的形制”、“文字上的耒及其形制”、“耒耜通行的区域”、“耒耜名称的混淆”、“古代耕作状况”、“牛耕的兴起与耒耜的遗存”等节构成。作者不仅从甲骨文、金文、典籍文献中梳理出大量有关耒、耜的字形、记载，还将古钱币、现存实物等引为论据，对耒耜的起源、形制、发展等进行了周密的考证。

该文发表后立即被学界关注，被研究者认为是徐中舒的成名作。日本学者关野雄后作《新耒耜考》。徐中舒后来又将此文中涉及的牛耕问题拓展为《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原》一文。

李则刚编《革命大事年表》由上海爱知学社出版。

此书将17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大事分为各国革命大事年表、民族运动大事年表和国际大事年表三类依次排列，使人一目了然。

凌纯声、商承祚开始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从5月至8月，史语所民族学组研究员凌纯声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祚开始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进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民族学田野调查。1934年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陈序经在《岭南学报》第1卷第2期发表《孙中山与孔夫子》。

该文从多方面分析了孙中山与孔子的思想异同，并认为“若孔子而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代表，则孙先生可以说是近数十年来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

同期还刊载了赖义辉《岑参年谱》等文。

吴贯因《中国经济史眼》（又名《中国经济史概论》）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张文治编《诸子治要》由文明书局出版。

吴黎平（吴亮平）《社会主义史》由南强书局出版。

6月

1日　故宫博物院创办《史料旬刊》。

此刊由单士元主编，专门刊载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文献“可供考征者”，其中“珍贵材料不少”，如雍正安南勘界案、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嘉庆诛和珅案、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道光朝留中密奏等。这些清代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的珍贵档案公诸于世，对研究清

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至1931年7月1日停刊时，共出版40期。

2日　国民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

此法令涉及私有、公有文物的区别、保存、地下文物的发掘、文物的流通、研究、出国等问题。法令颁布以后，对史语所等科研机构的地下发掘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此法定于1933年施行。

4日　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成立。

该所分设工具之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地学、哲学、教育学、文学、民俗学八组，其中史学组研究对象包括史前史、制度风俗、宗教、天算及其他学术史，社会变迁、民族兴亡、中外交通、年表及年谱、史学方法、译述等；地学组研究对象包括方志整理、地理沿革等；哲学包括思想变迁、学案等；文学包括作风变迁、体制沿革等。

该研究所先后开展的研究工作有编纂《廿四史人地书名索引》、《金文汇编》、《历代外国传研究》、《石器时代的年代推测工作》、《汉晋学术编年》、《五代以前道教变迁考》、《编辑方志叙录》、《塞氏文明史译述》、《中国学制变迁史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等。

30日　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由大连中日文化协会出版。

是书为罗振玉1928年应松崎柔甫之邀讲学之讲稿。全书分“古今学术之递变”、“本朝学术之渊源”、“本朝学术流派”、“本朝学者之研究方法”、“本朝学术之得失”等五章。

是月　钱穆在《燕京学报》第7期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

原名《刘向刘歆王莽年谱》，《燕京学报》编辑改今名，经修改后又收入《古史辨》第5册上编。本文主要就康有为谓古文经乃刘歆伪造以媚王莽而助篡之说细加考辨，“因先编《刘向歆父子年谱》，著其事实。事实既列，虚说自消”。钱穆仿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体例，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新学伪经考》之不可通者，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皆一一加以指明。

钱氏采用以史治经的方法，“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何佑森指出：“《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这部书根据的仅仅是一部《汉书》。很多非有新资料不能著书立说的人，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人，通常不讲经学。钱先生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亦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向歆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钱穆撰《年谱》的目的是“撤藩篱而破壁垒”，破除学术界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成见。晚清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造伪之说，几成定论。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出，一扫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的不白之冤，破除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在近代经学史上有划时代的贡献。青松《评〈刘向歆父子年谱〉》称：钱文“列举康氏之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皆甚允当”，“是学术界上大快事”。孙次舟在《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一文中说：“刘歆并无遍窜群籍之事，此自钱宾四先生刊布其《刘向歆父子年谱》已大白于世”，其文“颇足关康有为辈之口”。缪凤林盛赞钱文为“近人的一篇杰作”。钱文刊出后，在北平学术界造成了很大震动。原北平各大学原本都开有经学史及经学通论之类的课程，皆主康有为今文家言。此文出，各校经学课多在秋后停开。有人认为钱著使晚清以来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1933 年 6 月，钱氏又发表《周官著作年代考》（《燕京学报》第 11 期）一文续申前说。

同期还刊载了刘朝阳《从天文历法推算尧典之编成年代》、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钱南扬《宋元南戏考》等文。

何炳松《通史新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为两编：上编共分十章，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比的理论与应用，均加以系统的讨论；下编共分十一章，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其与他种历史之关系，均加以浅显的说明。

何炳松说：“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Ch Seignobos*：*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一书。著作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而《应用于社会上之历史研究法》，实为《史学原论》一书之“撮要节本”。

本书提出了三点意见：（1）史料和著作因该分开，而后通史的观念方明。（2）现在我国流行的通史义例似是而非。（3）“通史不宜独尊也”。

何炳松编写此书的目的，重在阐明通史观念。“吾国旧日之所谓通史，《史记》一书实为嚆矢，其难满今日吾辈之意固不待言。至于章学诚通史观念之明确，固远驾西洋史学；然亦终以时代关系，未能以切实之方诏示后世。……西洋史家通史义例之或能稍补章学诚辈之缺憾者，其可不稍负介绍之责乎？此著者所以不揣固陋有本书之纂述也。”同时，又不可独重通史。许多人以为现代理想的史学著述应以通史为正宗，其他文献均可付之一炬。何炳松提出在历史研究上“实不能只重通史之论著”，还要重视其他史书编写体例，特别应当“多花心力于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上”。

卢绍稷《史学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大学和高中通常开设“史学概要”、“历史研究入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课程，旨在指导学生习史与研史。迄卢氏撰写此书之前，这方面的出版物虽不算少，但适合高中学生的却不多。作者有鉴于此，“乃编著是书，以应学术界之需要”。(《自序》）本书就是在他两次讲授史学概要课程的讲义的基础之上刊改而成的。

全书正文共七章。书末以何炳松《中国史学演化之陈述》一文作为附录。作为一部通解读物，本书最大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而论述简明扼要。兼论中西史学，泛及读史、研史和教史问题，论时能由博返约，有纲举目张之效。本书另一特点是充分吸取了作者师友的相关研究成果。

吴贯因《史之梯》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全书共分六章：导言、史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历史进化之历程、史家地位之变迁、史学与史料、读史与论史。本书最可称道之处是，其中论述史家社会地位，把当时的史家看作国民之代表，最后所谈三点意见在当时也有积极意义。

1937 年上海文化书局再版，更名为《史学概论》。

曹聚仁《中国史学 ABC》由世界书局出版。

本书是一部普及性作品，叙述中国史学发展大势较有条理。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2 分发表《〈敦煌劫余录〉序》，首提“敦煌学”。

此文是陈寅恪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陈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痛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作者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年余年间，东起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但是“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其原因一是由于“国人治学，罕具通识”，一是由于“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讨其内容”。作者最后呼吁，国内学者应该借助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帮助，“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以“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

陈氏此文虽是一篇序言，但是由于首提“敦煌学”，及指点如何运用敦煌文献等，影响深远。但是此文所提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

论断，也先后有学者提出质疑。

同期还刊载了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丁山《说鼎》、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等文。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西夏文专号”。

此专号刊载西夏的相关史料、图像、释文、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如罗福苌《宋史夏国传集注》、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等。

方壮猷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 1 卷第 2 期发表《契丹民族考》。

第 3 期连载。文章内容包括“契丹国号考”、“契丹宫名考”、“王号官号及其他”、“地名及其他”、“物名及其他”等。该文是契丹研究领域的重要论文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徐炳昶《阻卜年表》、陈云路《中华民族之女系时代》、董璠《说文或体字考叙例》、杨宗震《明堂通考》、段琼林《宋槧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记》等文。

陈受颐在《岭南学报》第 1 卷第 3 期发表《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

文章对《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的中国文化观进行了剖析，认为他对中国文化的攻击和鄙夷，“是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情的表征，不是受任何人的驱使，或任何人的暗示”，且自 1705 年后 15 年未变。笛福之所以会对中国文化不满，是由于其宗教信仰、爱国热情、商业兴趣等原因。文章也对笛福同时代的多位英国作家、牧师等人之中国文化观进行了分析。

同期还刊载了谢扶雅《现存老子〈道德经〉注释书目考》等文。

朱偰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5 卷第 1、2 号合刊发表《南洋之过去与将来——中国民族向南洋之发展与西力东渐后中西势力之消长》。

文章内容主要有“中西史料之分类与西人寻求中国史料之热烈”、“中国民族向南洋之发展”、“西力东渐”等。

同期还刊载了陶孟和《社会研究的困难》、程树德《从〈说文〉中发见之古代社会》、刘蕃《民族概念与国民概念》等文。

张云伏《国际运动史》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顾颉刚推荐钱穆任燕京大学讲师。

7月

15日 《动力》杂志创刊。

《动力》杂志只出两期，7月15日出第1期，9月30日出第2期。因严灵峰和任曙的主要文章在《动力》杂志上发表，他们被称为“动力派”，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新思潮派的主要对手。

任曙、严灵峰之间也互相争执，经常彼此攻击。严骂任是“侦探先生”；任骂严是“叛徒”、“机会主义”者；严骂任是“叛徒理论家”、“下流的经济研究家”、“过左专家”、“小家伙”；任又讥笑严是“东抄西袭”；严也讥笑任是“创造大家”、“经济通”，所说的是“先天理论”。从本质上看，他们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严灵峰说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势力，任曙也认为中外资本不分彼此。尽管一个主张内在论，一个主张外铄论，他们都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何干之说：任、严“他们所抱的见解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他们的方法论和见解，非常机械，所以我赠给他们一个名衔叫‘机械派’”。

严灵峰在《动力》创刊号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作者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中是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或领导的地位”。

21日 陈寅恪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除对冯著进行评价外，还对应该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发表意见，并对当时的研究状况提出了批评：“凡著中国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史有，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为长叹息者也。”

陈寅恪审查报告中虽以冯友兰的哲学史为评审对象，未直接提及胡适，但其中实针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导言”中所提出的治学宗旨、方法和材料运用，对胡氏所标榜的“评判的态度”、“系统的整理”、“审定史料的真伪”，一一加以针砭。冯友兰后来也坦承：陈寅恪对他这部书的审查报告，和当时另一位审查者金岳霖一样，都是与胡适那

一本著作比较的。

是月　商务印书馆同时推出何炳松主编的“中国历史丛书”和“中国史学丛书”。

“中国历史丛书”收录陈功甫编《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930 年 7 月）、王志瑞编《宋元经济史》（1931 年 2 月）、《日俄战争与辽东开放》（1931 年 4 月），宋佩韦编《王守仁与明理学》（1931 年 5 月）、《东汉之宗教》（1931 年 5 月），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930 年 12 月），王钟麒编《三国之鼎峙》（1931 年 5 月）、《晋之统一与八王之乱》（1931 年 9 月），陶希圣编《辩士与游侠》（1931 年 6 月）、《西汉经济史》（1931 年 8 月）等。

“中国史学丛书”是一套年谱类丛书，共收 43 种，主要有郑鹤声编《袁枢年谱》（1930 年 7 月）、《班固年谱》（1931 年 2 月）、《司马迁年谱》（1931 年 9 月）、《杜佑年谱》（1934 年 4 月），胡适编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年谱》（1931 年 8 月），蒋天枢编《全谢山先生年谱》（1932 年 12 月），姚名达编《朱筠年谱》（1933 年 4 月）、《邵念鲁年谱》（1930 年 12 月）、《刘宗周年谱》（1934 年 10 月）、《程伊川年谱》（1937 年 4 月），蒋致中编《牛空山年谱》（1933 年 9 月），朱芳圃编《孙诒让年谱》（1934 年 3 月），傅振伦编《刘知几年谱》（1934 年 11 月），王遽常编《严几道年谱》（1936 年 1 月）、《沈寐叟年谱》（1938 年 7 月），陆谦祉编《厉樊榭年谱》（1936 年 8 月）、皮名振编《皮鹿门年谱》（1939 年 2 月），张若谷编著《马相伯先生年谱》（1939 年 12 月）、《史可法年谱》（1940 年 6 月），杨得恩编《文天祥年谱》（1939 年 9 月），罗香林编《颜师古年谱》（1941 年 4 月）等。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2 册由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出版。

此书最初是作者在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的讲义，约 80 万字。讲义在两校分别铅印和油印后，一时洛阳纸贵。但他却认为这部讲义还只是急就章，于是又向各地书肆购买有关史料书籍，全面修订《中国近世史》。当时收藏家们和各图书馆都以搜罗宋元版本为贵，而他却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不为人们注意和重视的中国近代史料，所以一时所获甚丰，多为罕见的海内孤本和稿本。当其费数年之力将书稿修订完毕时，不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南京沦陷，书稿毁于战火。1944 年，他将讲义稿交南方印书馆出版。

全书共八章，梳理了西方殖民之发轫、中西通商、基督教与西洋学术的传入、满清的崛起及文字狱等问题。自序中对“上古中世”与“近世”

作了明确区分："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古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一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通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一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中国近世史之开端，当自新航路之发现始。"因为自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已使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自后中西关系的演变、民族思想的发展、近世革命运动的产生，都发源于此。他曾明确地反对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认为是"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指出：近代史著作众多且各有长处，"其最完善的为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民国十八九年，郑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中国近世史，曾编有讲义，共二十八章，起自明季，至民国年止。此书即系根据讲义改编而成；全书体大思精，甚为赅备，惜迄今仅出二册。"

陆一远编《社会进化史大纲》由光明书店出版。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邹静芳编《西洋经济思想史》由上海法学社出版。

李笠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1 卷第 2 号发表《论编制中国目录学史之重要及困难》。

8 月

商务印书馆开始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正史汇刻以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为最流行，但其中所依据之明南北监本脱漏改窜较多，为学者诟病，商务印书馆"蓄志辑刊善本"，乃搜求数年，分四年出齐。

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 本第 2 分发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

作者认为佛教东传之后，"印度神话亦随之传入"，佛教经典与中国文学关系密切，佛经故事逐渐演化，成为文学作品内容，"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则可以窥见时代之风气，批评作者之技能"，为"治小说文学史者"一助，并以《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为例，概括出"故事演变之

公例”。

同期还刊载了林语堂《支脂之三部古读考》、朱希祖《钞本甲乙事案跋》、徐中舒《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法帖残叶跋》等文。

董作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2分发表《殷墟沿革》、《甲骨年表》。

1928年，董作宾被中央研究院派遣到安阳调查殷墟，并筹备科学发掘。董氏根据和小屯村民的走访谈话，记录了大量关于殷墟和甲骨文的资料。1930年4月，撰写《殷墟沿革》，主要详于介绍当地情况。同年7月1日，又撰写《甲骨年表》，将甲骨文从发现到1930年4月间有关甲骨文的发现、收集和研究的情况，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据李济言，《甲骨年表》系董氏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书。

1937年，董氏在胡厚宣帮助下，又出版《甲骨年表》增订版。

郑鹤声《史汉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3章，第一、二章分从传略、组织、源流、系列、制作等方面研究《史记》、《汉书》，第三章将二书从体例、叙事等方面比较。1933年2月该书再版。

《文化斗争》月刊由“社联”创办。

主编潘汉年撰写的《本刊出版的意义及其使命》指出：“本刊的具体工作是：（一）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二）加紧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三）苏维埃文化运动的理论与实际。”

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9月

1日　柳诒徵在《史学杂志》第2卷第3、4期合刊发表《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

作者指出，江苏人以谷为生，“故衡生计，以米价为主”，以此可知，此文虽以考辨江苏一千六百年间米价变迁，实际亦是探究江苏人一千六百年间生活之难易。文中有《光绪中江宁布政使司所属各府厅米价表》、《光绪中苏州布政使司所属各府厅州县米价表》、民国《苏州米价表》等。

同期还刊载了蒙文通《经学抉原处违论》、《三代文化论》，柳诒徵《南监史谈》，张尔田《真诰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略钞》，李光季《三史考》，汤用彤《读慧皎〈高僧传〉札记》，缪凤林《中国民族史叙论》，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董作宾《甲骨文研究的扩大》

等文。

蒙文通在《史学杂志》第2卷第3、4期合刊发表《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

作者认为“三古之世，黄河流域之气候如今日之长江。古代长江流域之气候，如今日之珠江”，中国文化随气候变迁逐渐由北向南发展，而“展大于三河”。此文不仅被认为与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等文一起对中国历史气候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且对中华文化生成与气候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

8日 《古史辨》第2册由朴社出版。

第2册承继第1册所做的研究，其上编讨论古史问题，收有顾颉刚1926年所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世界的想象》，主张夏、商、周三代国境只在黄河流域，周是氐羌中的一种。中编讨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收有周予同《经今古文学》等。下编是各方面对第一册的评论。

10日 “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创刊。

在创刊号上，谷荫（朱镜我）发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梁平发表《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对新月派、新生命派等的观点进行批判。

梁平在《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科学只有依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方能得着稳固的基础，社会科学无庸说，即自然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上最伟大最具体的结晶物。近代历史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正因为他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斗争的理论而且还是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15日 《社会科学战线》创刊。

此为社联的机关刊物。发刊词中提出其任务是：“以反驳非马克思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如取消派等的理论为中心，并发表中国社会科学运动底指导理论。”只出一期即停刊。

30日 梁思永主持在黑龙江昂昂溪进行考古发掘，后撰成五万字的《昂昂溪史前遗址》。

是月 朱希祖在《国学季刊》第2卷第3号发表《汉十二世著纪考》。

朱希祖认为汉之“十二著纪”，即为“汉之起居注”。朱希祖将《汉著纪》和《汉书》本纪排列对比，得出了两者体例大不相同的结论，并以此否定了“著纪”是“著录于本纪之谓”的观点。

同期还刊载了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朱倓《明季南应社考》、黄文弼《蒙新旅行之经过及发现》等文。

历时三载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结束。

此次考察不仅成果丰硕，尤其是居延汉简的发现，给汉代历史研究开辟新的史料来源和领域，而且对此后的西北考古产生了深远影响。

汤象龙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 1 卷第 3 期发表《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

该文约万字，是汤象龙利用清宫档案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篇论文。作者认为道光时期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外流导致了国内金融紊乱，清政府为解决危机不得不严厉禁烟，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这是我国最早从国内经济层面分析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论著。

王士达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杂志》第 1 卷第 3 期发表《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

第 4 期、第 2 卷第 1 期连载。此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中国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化，并对相关原因等亦加以探索，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方便可靠的数据，也有益于深入了解近代中国。

(英) Charles Bell 著，宫廷璋译述，竺可桢、向达校订《西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系“史地小丛书”一种，介绍了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英国对西藏的“远征”等情况。该书同月又被商务印书馆以《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为题收入“地理丛书”中出版。

吴其昌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中国家族制度中子孙观念之起源》。

容肇祖在《岭南学报》第 1 卷第 4 期发表《阎若璩的考证学》。

李剑农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1 卷第 3 号发表《明代的一个官定物价表与不换纸币》。

(法) 牟里著、冯承钧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顾颉刚推荐吴晗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馆员。

10月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该书生动细致地叙述了自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其中各政治派系之间的倾轧、斗争做了较详尽的叙述、分析。由于作者曾参与不少政治活动，分析颇能切中要害，且书中披露了不少稀见史料，故出版后迅速赢得声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1965年，作者删去该书“导论”和第12章“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解释和今后去路”，并稍作修订改名为《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各版本都有多次重印，如第1版在1932年重印后，1972年台北学生书局又重印。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4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梳理了中国从上古至民国的法律发展的历程，并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中国古代法律研究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该书的另一优点是将甲骨文、金文等资料引入中国法律史研究。有研究者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科的基本定型。

1937年作者又出版了《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

（苏）普列哈诺夫等著、刘侃元译《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由春秋书店出版。

该书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等十一人文章的摘抄，分“唯物史观之历史的准备”、“达尔文与马克思”、“自然条件与技术”等几个专题。

（美）桑戴克著、陈廷璠译《世界文化史》上册由重庆书局印行。

因应教学之需，时间仓促，译本存在不少问题。该书后又出现两种中译本：倪受民译本，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冯雄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大学丛书之一。

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多开设“世界文化史”或“西洋文化史”课程，不少取桑戴克之书为教材。

董之学《各国民权运动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李兆洛编《历代纪元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廷灿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

严锦秀《各国革命史》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出版。

11 月

4 日　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在山东临淄及历城县发现史前遗物，为了便于发掘研究，该年 10 月 27 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与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切磋后，以中央研究院名义，致函山东省教育厅，提议由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教育厅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中央研究院负“科学的指导之责”，山东省政府负“保护之责”，经费共同负担，“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

7 日　顾颉刚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

是月　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组成考古工作队对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

这次发掘由李济主持。1931 年，李济在《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一文中指出，选择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希望为“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选择“一个若明若暗的时期作一个起发点”；第二是为了探索“中国东北大平原”是否也有石器时代，如果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发掘发现此遗址共有两层，此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首次发现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该遗址名命名为“龙山文化”。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是由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李济认为：“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次年 10 月对此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由梁思永主持。

李镜池在《史学年报》第 1 卷第 2 期发表《〈易传〉探源》。

文章否定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认为《易传》非孔子作，并考辨推测了《易传》诸篇的著作年代。

同期还刊载了曹诗成《战国时儒墨道三家尧舜的比较》、顾颉刚《洪水之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校点古今伪书考序》、卫聚贤《〈尧典〉的研究》、齐思和《儒服考》、瞿兑之《古代之竹与文化》、朱士嘉《中国第一个留学生》、王桐龄《〈会真记〉事迹真伪考》、奉宽《旧京西山故翠微寺画像千佛塔记跋》、韩叔信《燕京大学校友门外恩佑恩慕二寺考》、韩叔信《俄领西土耳其斯坦与中国在历史上之关系》等论文。

徐文珊在《史学年报》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之所以五花八门，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观念不同。活着观念相同，而他们的用意，思想，立场，背景，种种方面之不同，遂至把同一事，同一人，记出许多不同样的现象来”。作者根据公认可靠的书籍，分析从周朝起不同时代的历史观：西周末东周初“人们心目中的历史，只是天道运行的表现”，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孟子，道家不同于儒家，“把伦理化的历史推翻”，“拿历史作了发表学说的工具”，法家代表性人物韩非“心目中的历史，已经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并且本着‘人类是进化的’这个原则，主张前进、反古”；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将历史看作是“载道统的东西”，这种态度“是史学界的破天荒，而对于历史的本旨也比较近是了”，西汉末年“史学界有一次大破产”，就是刘歆利用利用历史为王莽篡汉制造根据，把历史“看成任何人可用的工具”；东汉班固“受了刘歆的余毒，戴着古文家的眼镜，作出一部《汉书》”，“虽不是要利用历史，发表什么学说，但是至少作了刘歆的功臣”。东汉以后，“中国的史学界，便慢慢的入了轨道，态度则由盲从而转变为怀疑，工作则由创造而渐变为整理了”。

翦伯赞开始在《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期上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系列论文。

作者指出，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是“亚细亚的生产形态”之说是“似是而非”的，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他说，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村社会已到了“转变的时期”，即逐步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这种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斗争的必然性。

这标志着翦伯赞开始投身中国社会史论战。

顾荩丞编著《国学研究》由世界书局出版。

第1册为“经部”、第2册为“史部”、第3册为“子部”（1931年5

月出版）、第 4 册为“集部”（1932 年 11 月出版）。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共七章，分别探讨了“中国文献之渊源与价值”、“中国文献之世界化”、文献的结集、审订、翻译、编纂、刻印等问题。1933 年 3 月再版。

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由上海光明书店出版。

至 1934 年此书三版时，作者重新订正并改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1935 年 7 月又出版增订本。

梁园东在《东方杂志》第 22 号发表《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

第 24 号连载。作者专门就顾颉刚疑辨古史的研究方法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提出了批评意见。文章从两个方面做了阐述：第一，整理古史方法上传统的错误和古史辨；第二，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质疑。

陈廷杰《经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魏野畴《中国近世史》由开明书店出版。

陈怀、孟冲《中国近百年史要》由中华书局出版。

马君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由中华书局出版。

12 月

1 日　周佛海在《新生命》第 3 卷第 12 期发表《三年来之本刊》，《新生命》停刊。

周佛海说：“中国社会探究，是本刊的第三个特色。国内各大杂志，在三十六期中包含中国社会专攻的论文，没有比本刊再多的。这种研究在第一年中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论争的急先锋。自第二年以后，国内各公开密秘刊物，对于本刊这类论文的主旨，不加反对，便须接受。”

同期刊登的《新生命月刊编辑部启事》公告：“本刊于三卷十二号以后即行结束。”

8 日　朱希祖因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失败，提出辞职。

1930 年底开始，北京大学史学系发生了要求学校罢免系主任朱希祖，改革课程设置的罢课学潮。这次学潮一直僵持到 6 月，最后由校史学会议决出甲、乙、丙、丁四项议案，作为复课条件向“蒋校长（梦麟）交涉”。其中包括聘请陈翰笙、陶希圣担任教授，以及开设“一中国社会史、二唯物史观研究、三历史哲学、四中国文化史、五西洋文化史、六考古

学”等课程。

支持朱希祖的代理校长陈大齐调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校长由蒋梦麟接任，并暂代史学系主任之职。与蒋关系甚密的傅斯年实则幕后掌控史学系，1931 年 10 月陈受颐接替蒋梦麟担任系主任，情形仍是如此。

15 日　潘光旦在《人文月刊》第 1 卷第 10 期发表《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

第 2 卷第 1 期连载。

26 日　顾颉刚为清华大学历史学会作《中国史学界之将来》的演讲。

是月　（美）班兹著、向达译《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向达翻译自出版于 1925 年的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第一篇，题名《史学》。全书共分三章：史学之性质及其目的、史著进展中之几种重要现象、新史学或综合史学。

作者班兹（又译巴恩斯）是 20 世纪初美国“新史学”倡导者鲁宾逊的弟子，受其《新史学》一书影响很大。全书以“新史学”派的理论方法，评价过去传统史学的发展及其特征，阐述了“新史学”派若干年来历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趋势。

本书是我国 30 年代译介的“新史学”派理论著作中较有影响的一部。1934 年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改题《史学史》。1940 年又列为《社会科学史纲》第 1 册史学出版。1931 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雷震译《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是《史学》同文异译本。雷震翻译过程中曾得到与鲁宾逊学派颇有渊源的黄文山、陆懋德、黄哲公的多方指点。

陈垣在《燕京学报》第 8 期发表《耶律楚材之生卒年》。

王国维作《耶律文正公年谱》从《元史》说，认为自明昌九年至乃马真三年（1244），耶律楚材恰为五十五岁。陈垣对此说提出质疑，他以楚材子耶律铸之生年推其卒年，考出耶律铸生于辛巳（1221），《元史·耶律楚材传》载楚材死时铸年二十三，由此年下推二十三岁，恰为乃马真二年（1243）；他又以楚材父耶律履之卒年证其生年。耶律履卒于明昌二年（1191），《耶律楚材神道碑》称其“三岁而孤”。由明昌二年上推三年，为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即为楚材之生年，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乃马真二年，恰为五十五岁。把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各提前一年。

同期还刊载了方壮猷《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张星烺《菲律

宾史上李马奔 Limahong 之真人考》（随后李长傅在《燕京学报》第9期发表《菲律宾史上李马奔之真人考补遗》进行呼应，黎光明在《燕京学报》第10期也对此文进行了“补正”），颜希深《莽量函率考》，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等文。

《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出版。

报告刊载了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小屯与仰韶》，董作宾《获“白麟”解》，傅斯年《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等文。

郑鹤声编著《中国史部目录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全书分十章，第一章介绍我国史书渊源，第二、三章介绍史部位置、源流，第四、五、六章介绍史目流别，第七章介绍刘知几以下诸家的史部分类，第八、九章介绍史料与史体、分类法，第十章为结论。

郑鹤声在书中说“目录学者，读书之门径，而史部目录学，则又读史之门径也”。作者从介绍我国史书的渊源和史部的位置入手，详细地叙述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和史目正录、别录与今录的流别，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历史文献分类法，并且结合史料学和西方历史文献目录学对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的今后发展进行了阐述。这部书所论述的史部目录学，已超越了清代学者们所介绍的目录学为各种文献篇目及版本的学问范围，而成为揭示历史文献目录的源流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

迄今为止，该书还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史部目录学专著。此书曾在50年代和70年代又分别由上海和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再版。

张国淦《历代石经考》由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

书分二编，上编考源流，下编考文字。作者于“每一石经考之前冠以提纲一篇，使读者先得明了之概念。卷末附历代石经一览表以年代为纲，分著其原流变迁，尤便检寻，治经学者必备之要籍”。

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史学》创刊。

发刊词云：“同人等深望今后能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哲学的眼光整理国史。”

创刊号刊载了缪凤林《国史上之民族年代及地理述略》，陈训慈《浙东史学管窥》，傅斯年讲、王培棠记《考古学的新方法》，马古烈《欧洲各国对于中国学术之研究》等文。

朱希祖在《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发表《汉唐宋起居注考》。

朱希祖认为西汉尚无起居注，而东汉“始有起居注”，然“史有明文者”仅明帝、灵帝、献帝三人。汉时尚无起居注专官，魏晋时“始有著作

郎，而起居注或为其所撰者”。唐代起居注与国史“皆非专属开元，上自武德贞观，下迄开元天宝，或系并包，或仅数代，均未可知”，而唐代起居注官，有起居郎和起居舍人。此外朱希祖还考证了“宋高宗德寿宫起居注”和“宋孝宗起居注”的相关问题。此文与《汉十二世著纪考》一文梳理了“起居注”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同期还刊载了方壮猷《匈奴语言考》、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敖士英《汉初正朔考》、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等文。

马叙伦《读两汉书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金申受《稷下派之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国桢《顾宁人先生学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贾逸君《中华民国史》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

吴理屏（吴亮平）编译《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由上海心弦书店出版。

（美）汉斯·康著、刘君穆译《东方民族论》由民智书局出版。

黄文弼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发表《居延海考》。

向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6号发表《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

是年

春，金陵大学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

设立该所旨在研究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且协助该校文学院发展文史课程，鼓励师生研究本国文化，经费为霍尔基金资助的30万元。该所设史学、考古学、目录学、东方学四门，徐则陵任主任（后李小缘继任），王钟麟、吕凤子、商承祚、李小缘、徐益堂、吕叔湘等任专职研究员，吴景超、黄云眉、贝德士、雷海宗、陈登原、刘国钧、刘继宣等任兼职研究员。

先后开展的课题有商承祚《商周文化》、《甲骨文字及金文研究》、《商辞》（与徐则陵合作），陈登原《周季迄秦代文化》、《颜习斋哲学思想》，徐则陵（养秋）《两汉文化》、《本国史学家之史学方法》，贝德士《中国统一政治之形成》、《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徐益棠《中国外来民族之文化》、《西南民族史》、《本国历史地理》、《中国考古学史》，刘继宣《蒙古

史研究》，吴白匋《宋辽金交涉史》，李小缘《本国史学参考书目》、《欧美东方学杂志论文索引》、《考古学名词辞典》（青铜部分，与徐益堂合作），陈恭禄《本国史研究》，刘国钧《六朝著述目录》、《六朝思想史》，王钟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概观》、《日本史学家关于中国史学之研究》等。

该所对于研究本国文化所需之资料、古籍、古物莫不尽力罗致，意在“考古籍以求史，考古物以证史”。该所开办后成果显著，收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丛刊”出版的著述有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1932）、《邵二云先生年谱》（1933），蔡桢《词源疏证》（1932），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1932）、《颜习斋哲学思想述》（1934），贝德士编《西文东方学论文举要》（1933），商承祚编《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释》（1933）、《殷契辑存考释》（1933）、《十二家吉金图录》（1936）、《长沙古物闻见记》（1939），孙几伊《河徙及其影响》（1935），孙文青编《南阳汉画像汇存》（1937），李小缘编《云南书目》（1937），王伊同《五朝门第》（1943）等。

该所抗战西迁后，因经费稳定，研究所受影响不大，故成绩卓著。1951 年，该所停办。

春，金毓黻发起组织东北学社，着手编辑《东北丛书》。

该丛书 10 集 87 种 418 卷，收录了不少关于东北的珍贵文献，如《辽小史》、《金小史》、《辽方镇年表》、《金方镇年表》、《渤海国记》等，其中不少是家藏本和传抄本。此书的辑印出版，不仅保存了众多东北文献，也对此后的东北史地研究意义重大。1931 年，金毓黻将丛书名改为《辽海丛书》，由辽海书局开始出版排印本，至 1934 年出毕。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6册由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出版，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

为完成这部巨著，张氏花费 17 年时间，参考 274 种中文书籍和 42 种外文资料。此书内容包括自上古到明代的中国与东起葱岭以西、印度、西到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各国交往的历史。

此书自从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954 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和欧洲之间传播科学思想与各种技术的情况”一章中指出，他使用的中文参考书首推《中西交通史料汇篇》。这部书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氏亦因之成为我国中外关系学科的开创者之一。

伦敦大学陶内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国联的委托，考察中国社会，提出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

在其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的结论是：“一直到昨日为止，

中国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行动，既未影响西洋，也未受西洋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中国之长期孤立，一部分因为中国自己的文明基础异常安定，另一部分是由于西洋在十九世纪继承了科学和技术的新财产之结果，所以，中国最近的历史之景色显得缩短了。当西洋还不知道那些根本的生活技术的时候，中国已经精通了某些根本的生活技术。当西洋用木犁耕作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已经用铁犁耕作，而当西洋已经用钢犁耕作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用铁犁耕作——中国，好象这种情形一个样，早已把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一种型式达于一种高的水平线了，可是不会感悟到去改良它或是去革除它之需要。"

陶内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波及西方史家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从马士（H. B. Morse）到费正清，都把中国社会视为停滞、落后的"传统社会"，有待于西方的"冲击"与改变。

春，旅法三年的侯外庐返回国内，不久担任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系教授。

他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着重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和主要内容。此时，他又重新开始翻译《资本论》。

吕思勉自谓此年开始服膺马列主义。

吕氏云："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

陈寅恪被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为教授。

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后，陈寅恪被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为教授，陈寅恪在史学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

梁思永学成回国。

梁思永以《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一文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为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回国后，梁思永先后主持和参加了黑龙江昂昂溪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奠基人之一。

春，辽永庆陵被发掘，出土了庆陵哀册，对辽史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冬，为组织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社联"着手建立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